THE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TH CENTURY

20世纪后半期 中国史学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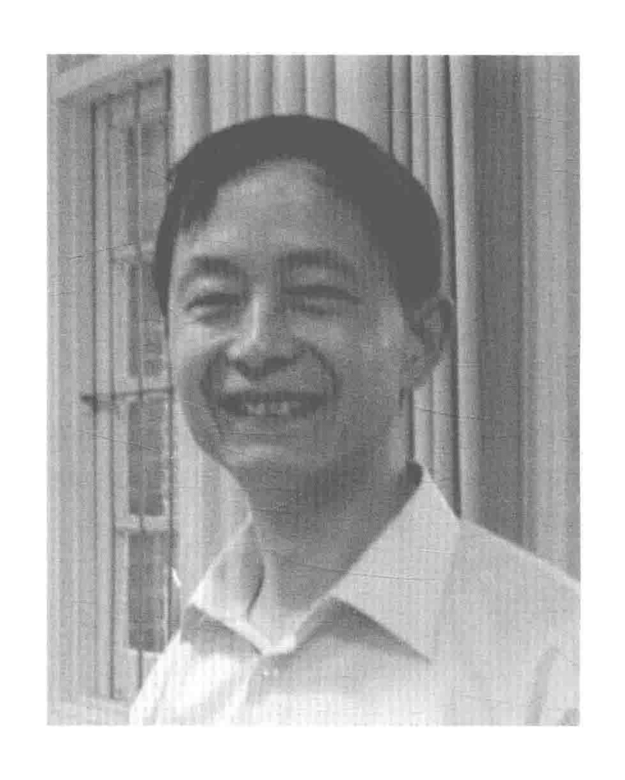
上册

周一平　主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资助项目

本书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经费、扬州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一平基金资助出版



周一平　扬州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理论》、《中西文化交汇与王国维学术成就》(与沈茶英合著)、《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与王松合著)、《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中共党史史学史》、《中共党史研究90年》、《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蔡和森》、《瞿秋白与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稿》、《毛泽东生平研究七十年》、《毛泽东生平研究史》、《邓小平生平研究史》、《中共党史文献学》、《日版〈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校勘与研究》(《一平文库》之一)、《江泽民重要思想研究述评》(《一平文库》之一。主编)、《新时期创新思想论》(合著)、《岁时纪时辞典》(与沈茶英合著)等。

目　　录

绪　论

一、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研究的目的、意义及思路

（一）研究的对象、范围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是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经验教训。是对 20 世纪后半期 50 年中国大陆史学及台港澳史学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研究情况、研究成果进行研究、总结、评价，如对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各个领域、世界历史研究各个领域、中国历史研究各个领域及各专史研究领域的研究情况、研究成果进行研究、总结、评价，总结其中经验教训，探讨经济、文化全球化大潮中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趋势，探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一国两制条件下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趋势，探讨如何建设和谐、繁荣的史学界。

具体研究的内容主要是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史著、史家、史学流派、史学思潮、史学机构、史学团体，中国史学界的争论、斗争，中国与外国史学界的争论、斗争，中外史学交流及其共同发展，史学理论、历史理论、史学方法论、历史记述方法的发展，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展、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历史资料的发现、整理的发展，等等。史著、史家是史学面貌、史学发展最主要的载体，史学流派、史学思潮、史学理论、历史理论、史学方法论、历史记述方法、史学界的争论与斗争、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展、跨学科研究的发展等都要通过史著、史家反映、体现，史著、史家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研究内容。而史著、史家，不仅包含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的，也包含中国台港澳地区；不仅包含中国历史研究各个领域，也包含世界历史研究各个领域、各专史研究领域、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各个领域；不仅要研究通史的史著、史家，也要研究断代史、事件史、器物史、人物史等各方面历史研究的史著、史家。

（二）研究的目的、意义

在 2000 年前后，很多学者呼吁加强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与总结，[①]而加

---

① 如马宝珠：《加强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与总结》，《史学理论研究》2003 年第 3 期。

强对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的研究与总结更为重要，其经验教训尤其深刻，对今天的史学建设与发展最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1. 分清成绩与失误、主流与支流，准确把握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发展的全局，推动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对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要不要分清主流与支流，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主流是好还是不好，特别是对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史学怎么看，存在着一些分歧。“文革”前十七年史学的主流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其间也有某些局限性，是支流。有人把支流当主流，认为十七年史学是“完全政治化”的，与“文革”时期的史学一样，一无是处，有人甚至认为主流就是不好的。不少学者则不同意上述的看法，认为主流是好的，支流不能代替主流。不能只讲失误、阴暗的一面，也要讲成绩、光明的一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向是正确的，应肯定，应坚持。①对任何事物的看法是否正确、是否科学，首先取决于思维方式是否正确、科学。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分清主次地看问题，就易于得出科学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采取形而上学、机械的思维方式，片面地、极端地、以偏概全、不分主次地看问题，就难以得出科学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是有的学者对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的评价不够正确、未能被社会认可的重要原因。正确认识、评价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分清成绩与失误、主流与支流，这关系到怎样认识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全局，也关系到 21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全局。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分清主次地看问题，倡导、光大科学的思维方式，正确认识、总结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经验教训，必将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也能更好地发挥历史学在社会建设、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2. 总结经验教训，继承宝贵遗产

中国大陆“文革”前十七年史学、“文革”史学的经验教训都值得深入总结，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庸俗化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不正确的，是必须克服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综合国力极大增强，“盛世治史”，中国史学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史学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而且在诸多领域都有一批世界瞩目的学术成果问世，多卷本、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不胜枚举。同时也应看到，由于长期以来不良史学思潮、风气的影响，由于市场经济的某些消极影响，史学界还存在着某些不规范的做法，学科建设

---

① 详见陈其泰：《正确评价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2007 年第 4 期。

还有待发展,学术体制还有待完善。这些方面的经验教训都需要认真总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总结经验教训,才能端正价值取向、明确前进方向;继承宝贵遗产,才能创造新的业绩。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离现实最近,对现实史学最有影响,其中的经验教训、宝贵遗产对现实也最有影响。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发展及其经验教训、宝贵遗产的总结,是最具现实意义、社会意义、史学意义,是21世纪中国史学界必须首先完成的一个重大战略任务。完成这一任务,有助于中国史学在21世纪中坚持正确方向,创造新的史学辉煌。

3. 探索规律、特点,端正史学方向

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点与规律有密切联系。探索和把握规律、特点,对于端正方向,把握发展、推动发展、创造新业绩,是至关重要的。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有没有规律?规律是什么?有哪些特点?如何认识这些特点?中国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中外学术界的看法更不一致。对规律、特点看法的不一致,必然导致对发展方向看法的不一致。笔者认为,纵观20世纪中国史学走势,可以发现基本趋势和规律是:一、中国史学向现代化、科学化、学术化发展。二、中国史学向社会化、大众化发展。三、中国史学日益走向世界。这些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任何人无法阻挡的。而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发展的最显著特点是,中国史学阵营格局,特别是中国大陆史学阵营格局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成中国大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走向全社会,成为社会大众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空前普及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理论体系在曲折发展中不断完善,成为中国史学的主导。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特点是20世纪前半期不具备的。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大陆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外史学交流的飞跃,中国史学的全球化视野发展,不仅50、60年代不可比拟,20—40年代也不可比拟,并极大地推动着中国史学的发展。认清、把握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特点,澄清对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特点的模糊认识,找出在顺应规律上还存在的问题,是总结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的重要任务。这将对21世纪中国史学端正方向、健康发展、创造新业绩起重要的导向和推动作用。

4. 全面准确把握、运用、发展唯物史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学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石,一百多年来已被证明是科学的历史

观，已被越来越多的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及史学家所接受。[①]但是，由于中国大陆 50 年代、60 年代以及“文革”时期，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曾被有些人片面地解释甚至歪曲、教条主义地运用，有些人没有把科学的理论体系与对科学理论的片面的理解、运用区别开来，或者没有正确认识唯物史观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问题，便对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产生了怀疑，认为唯物史观本身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过时了”，主张全面超越唯物史观等。又由于西方史学理论的不断涌入，一些“新”的、“时髦”的理论被有些人接受，而把唯物史观当作“旧”理论抛弃了，或者在“反保守”名义下反对坚持唯物史观。[②]有的人提出“恢复叙事传统”及“回到乾嘉去”，认为历史研究走向历史哲学的路径、历史观的发展，不是中国史学的进步，而是倒退。[③]这不仅把 20 世纪后半期史学发展及其成就基本否定，也否定了历史哲学、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作用、价值。很多学者对这些对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表示怀疑、否定的观点提出了批评。[④]

20 世纪 80 年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逐渐出现政治危机，至 90 年代初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解体，史称“东欧剧变”，这使社会主义事业、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了严峻的挑战，这自然影响到中国，以上即可见一斑。为了回应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的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中共中央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提出：“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澄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⑤]其中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工程，包括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新深入研究。而对 20 世纪后半

---

① 加拿大学者杰拉德·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有两种中译本，一是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二是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用某些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和概念分析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原理进行了新的论证。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是一种“功能的解释”，从而维护了生产力的首要性、经济的首要性。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岳长龄序，吴英《柯亨为马克思历史理论辩护述评》（《史学理论研究》杂志等 2016 年编印：《第 19 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可以参见。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中文版有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1 年版），对十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一进行了批驳。周一平《关于撰写人民史的几点思考》（《南开学报》2014 年第 4 期），也提到了外国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认同，可以参见。

② 详见李珍：《“唯物史观与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综述》，《高校理论战线》2002 年第 5 期。

③ 何平：《历史叙事功能的退化与史学危机——兼论历史评价问题》，《探索与争鸣》2005 年第 2 期。

④ 详见瞿林东：《关于坚持唯物史观的几点思考》，《高校理论战线》2002 年第 6 期；瞿林东：《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南开学报》2002 年第 2 期，等等。

⑤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发[2004]3 号，2004 年 1 月 5 日，详见《百度·百科》。

期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历程和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理解、运用的历程和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总结，澄清对唯物史观的模糊、错误认识，实事求是地评价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取得的进步和成就，全面准确认识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及其完善问题，全面准确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建设、学术建设、学科建设、学术体制建设、学术规范建设，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工程的进展，这不仅将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主流地位，也将有利于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意识形态中的主导、主流地位；不仅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有重大意义，也将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重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呼唤着、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学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多元化的大众化的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阶段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学建设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的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需要总结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学建设离不开总结20世纪后半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的经验教训。

5. 推动中国史学界的和谐建设和发展

中国史学界内部之间，中国史学界与世界（各国）史学界之间，存在分歧，存在矛盾、斗争，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但怎么解决？采取什么方式、方法解决？是平心静气地讨论还是血雨腥风地拼斗？史学是学术园地，不是军事战场，不应该进行你死我活的拼杀，不应该互相攻击，更不应该进行人身攻击、谩骂。而应平心静气地讨论，应和平共处，互相尊重，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在中国大陆的“文革”年代，宁“左”勿右形成风气，一批卓有成就的史学家，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受到仇敌般的批判，还受到了非人的人身迫害，并殃及家属、朋友、同事、学生等。学术界没有了温文尔雅的君子之风，没有了平心静气、推心置腹的笑声、悦声。这些都破坏了、阻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直到“文革”结束，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极“左”的“斗争”成为历史，宁“左”勿右的风气日益清除，社会开始和谐发展，学术

界、史学界开始和谐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大繁荣起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史学研究也大繁荣起来。

没有和谐发展，就没有健康发展，就没有真正的繁荣。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深刻的，认真全面总结之，有利于不断维护、推动史学界的和谐建设和发展，从而不断维护、推动史学的繁荣。推动史学界的和谐建设和发展，也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建设和发展，推动中华民族、全球华人社会的和谐建设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发展国内统一战线、国际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从"革命统一战线"到"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再到"爱国统一战线"，即不革命的、不赞同社会主义的，只要爱国，只要主张"一个中国"的原则，就要团结。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不是排斥一切可以排斥的人、斗争一切可以斗争的人。这是中国社会和谐建设、国际社会和谐建设的一个指导方针。这对于中国学术界、史学界和谐建设也有指导意义。

(三) 研究的思路

在20世纪过去了十余年后来研究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有利的一面是，或许可以更冷静、更客观地认识、评判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但不利的一面是，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包括研究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的成果已经很多，不说汗牛充栋至少也充架了，要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实在有难度。

任何研究都应有学术史的介绍，以下列出已出版的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研究的成果。[①]

20世纪80年代已有：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49—1989》(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周朝民等《中国史学四十年：1949—1989》(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白钢等《历史学的发展趋势》(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此外，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也略有涉及。林甘泉等著《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则是专题史类型的。港台有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吴安家《中共史学

① 20世纪70年代，台湾已有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史学研究的书出版，如逯耀东《中共史学的发展与演变》(时报文化事业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吴安家《中共史学批判论集》(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等。中国大陆当时还没有相关的书出版。

新探》(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1983 年第 1 版、1988 年第 3 版)、逯耀东《史学危机的呼声》(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7 年版)等。

1987 年开始,天津教育出版社推出《学术研究指南丛书》,至 1996 年,已出版的与历史研究相关的书有:乔治忠等《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1996 年)、朱凤瀚等《先秦史研究概要》(1996 年)、周天游《秦汉史研究概要》(1990 年)、张国刚主编《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1996 年)、李天石等《宋辽金史研究概述》(1995 年)、李治安等《元史学概说》(1989 年)、李小林等主编《明史研究备览》(1988 年)、陈生玺等《清史研究概说》(1991 年)、乔还田等《洋务运动史研究叙录》(1989 年)、李喜所等主编《辛亥革命研究一览》(1991 年)、冯尔康《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1988 年)、宓汝成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1989 年)、夏良才《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概览》(1991 年)、张一文等《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概览》(1991 年),等等。

20 世纪 90 年代还有:姜义华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历史学(1949—1989)》(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王学典《20 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刘新成主编《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夏杏珍主编《五十年国事纪要·文化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中国史学会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青年学者论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陈启能主编《建国以来世界史研究概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金应熙《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述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等等。中共党史方面有张静如等主编《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台湾出版的书有陈木杉《中共编写"中华民国史"真相探讨》(编译馆 1994 年版)、陈木杉《大陆学界编写"中国历史"的理论与实际》(编译馆 1996 年版)、宋晞《民国以来的中国史学论集》("国史馆"1999 年版)等。

2000 年以来,相关著作更多,如:曹家齐《顿挫中嬗变——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西苑出版社 2000 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邹兆辰等《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1 年版)、罗志田主编《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下)(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王学典《20 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黄敏兰《20 世纪百年学案:历史学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周文玖《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张

剑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王学典主编《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李文海等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历史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其中包括牛润珍《关于历史学理论的学术论辩》、罗新慧《20世纪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辩》、王东平《中华文明起源和民族问题的论辩》、梁景和《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岑大利《中国农民战争史论辩》、赵晓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研究与论争》、方敏等《中国历史人物研究论辩》等;中国史学会秘书处《中国史学会五十年》(海燕出版社2004年版);瞿林东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系列》丛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007年版),其中包括陈其泰等《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2005年)、侯云灏《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2007年)、肖黎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2007年)、张广智主编《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2007年)、汪受宽等《20世纪中国史学论著要目》(2007年)、马宝珠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提要》(2007年)等;陈祖武等主编《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史学专辑》(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2007年版),其中包括董新林《中国古代陵墓考古研究》、赵超《简牍帛书发现与研究》、张海鹏等《中国近代史研究》、余太山主编《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吴怀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于沛《世界史研究》、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林頫《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宋镇豪等《甲骨学殷商史研究》、李锦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朱瑞熙等《宋史研究》、李锡厚等《辽西夏金史研究》、刘晓《元史研究》、钞晓鸿《明清史研究》等;盛邦和主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文学科·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姜义华等主编《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杨念群《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理论嬗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王学典主编《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李学勤等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历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瞿林东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瞿林东《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王学典等《20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姜义华等《历史变迁与历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王学典等编《20世纪中国史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李振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案丛

书》(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其中包括王彦辉等《古史体系的建构与重塑: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何晓明《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李振宏等《民族历史与现代观念: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郭世佑等《突破重围: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臧知非《生存与抗争的诠释: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王学典等《唯物史观与伦理史观的冲突:阶级观点问题研究》、周祥森《反映与建构: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王先明《走向社会的历史学:社会史理论问题研究》等。还有王雪萍主编《传统与现代: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年》(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王学典《新史学与新汉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等。

专题性的还有:陈其泰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蒋海升《"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赵梅春《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赵毅等《20世纪明史研究综述》(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钱茂伟主编《浙东史学研究述评》(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曾业英主编《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陈廷湘主编《新时期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周一平《中共党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周一平主编《中共党史研究9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李文主编《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等。

还有,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常建华等《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厉声等主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1989—1998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达力扎布《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

此外,相关的著作还有:汪永祥等《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备要》(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蒋大椿《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巴蜀书社 1992 年版)、王学典《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瞿林东《史学与史学评论》(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陈启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瞿林东《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陈其泰《史学与民族精神》(学苑出版社 1999 年版)、王银春《人类重要史学命题》(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盛邦和《解体与重构:现代中国史学与儒学思想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陈支平《历史学的困惑》(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等等。

还出版了一批中国当代著名史学家的传记,如:谢保成《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年版)、朱政惠《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0 年版)、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0 年版)、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0 年版)、瞿林东《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王学典等《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0 年版)、王永兴《陈寅恪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苏双碧等《吴晗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等等。还有: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等《郭沫若研究三十年》(巴蜀书社 2010 年版)、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 1986 年版)、金景芳等《金景芳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戴家祥等《戴家祥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王利器等《王利器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王钟翰等《王钟翰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邓广铭《邓广铭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周一良《周一良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杨向奎等《杨向奎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又有:姜义华主编《史魂——上海十大史学家》(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年版)、王尔敏《20 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以及中州古籍出版社 3 卷本《中国史学家评传》、山西人民出版社多卷本《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1982—1987 年版)、书目文献出版社多卷本《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1982—1990 年版)等。

台港史学有:王晴佳《台湾史学五十年:1950—2000》(台北麦田出版社 2002 年版),高明士等《战后台湾的历史学研究(1945—2000)》(台北"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2004 年版),周佳荣等主编《当代香港史学研究》(香港三联书店 1997 年版),郭铁鎗、莫岳云等主编《台港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研究评析》(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等。

论文发表的更多,如:白寿彝 1981 年发表《回顾与前瞻》、1982 年发表《六十年

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林甘泉《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新的起点：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和展望》，罗志田《学术与社会视野下的 20 世纪中国史学》，卢钟锋《回顾与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五十年》，金冲及《中国史学研究的现状与继续推进史学研究的思考》，瞿林东《20 世纪的中国史学》（上、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五十年的理论建设》、《中国史学史研究五十年的进展及未来的前景》、《深入研究 20 世纪中国史学》、《关于影响 21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几个问题》，吴怀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 50 年》，陈其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地位的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建国后十七年历史研究及唯物史观的价值》、《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完全政治化"说的商榷》，陈启能《近二十年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蒋大椿《改革开放以来史学领域理论研究》，许殿才《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趋势》，耿天勤《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三大趋势》，乔治忠《中国史学发展前景之我见》，马宝珠《加强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与总结》。另外，台港论文有邓元忠《近半世纪来中国大陆的史学》（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 25 期）等。

在这些众多的论著中，瞿林东主编《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云集了一大批全国一流的专家进行研究，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包括对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发展都作了深入研究分析，非常有理论深度，有不少新思考。比如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唯物史观怎样推动了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 20 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什么？ 20 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20 世纪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 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史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受到"左"的路线干扰，但从全局上说，历史学还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①]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史研究的巨大成就作了充分肯定，并强调了要处理好几个问题：一、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就与其他史学家的成就完全对立起来；二、不能把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与史学创新对立起来；三、史学方法论与历史观不能割裂。[②]能抓住并提出以上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思考，就难能可贵，能思考后提出自己的看法，更难能可贵。

作为二三流甚至未入流的研究者，再想在理论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实在是困难

① 瞿林东主编：《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1 页。
② 瞿林东主编：《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1—125 页。

的。面对这样的困境怎么办？没有任何讨巧的路径和方法，只有下更大力气开展研究，力求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资料工作做得扎实一点，基本史实搞得清楚一点，那些长期被忽略的细节多挖掘一点，研究领域和视角能拓宽一点，疑难的理论问题能解决一点，通过深入的研究能提出一两个新的看法，争取在一两个点上能有所突破、有所超越，能有一两个地方能让学者、读者眼睛一亮、精神一振，能被认为是有独立研究心得的、不是人云亦云的成果，这样大概可以对得起学术界、史学界了。笔者们的研究、论述，就是按照这一思路展开的。

二、20 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发展大势

(一) 世界社会、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

人类社会是历史记载、史学产生发展并得以存在的基础。人类社会发展的面貌，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面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发展面貌，决定着史学的发展面貌。

20 世纪后半期，世界由战争、冷战走向和平、竞争、共同发展，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由冷战走向和平共处，在竞争中互相学习、不断创新、共同发展是世界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互联网的发展加快了一体化趋势。

对于中国来说，1995 年启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后，[①]中国与世界接轨势不可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经济现代化建设、政治现代化建设、文化现代化建设、社会现代化建设，势不可挡，不断推进。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

在社会发展大趋势中，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社会发展主题。在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中，马克思主义遭受挑战但继续在中国大陆并将长期在中国大陆占主导地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① 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缩写 WTO)1994 年 4 月 15 日成立，取代了 1947 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GATT)。1995 年 7 月 11 日，中国正式提出加入世贸组织的申请。2001 年 11 月 10 日，在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审议并批准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一个月后，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理论会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世界社会、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决定着中国史学发展大势。

(二)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发展大势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发展的大势或趋势，可以分为 50 年的总趋势和不同阶段的趋势(阶段性趋势)、不同地区的趋势、不同分支学科的趋势等。阶段性趋势，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史学发展的趋势，“文革”时期史学发展的趋势，改革开放以后史学发展的趋势等。不同地区的趋势，如大陆史学发展的趋势、中国台湾史学发展的趋势、中国香港史学发展的趋势等。不同分支学科的趋势，如史学理论研究的趋势、史学史研究的趋势、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趋势、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趋势、中国当代史研究的趋势、世界史研究的趋势等。以下主要探讨的是中国史学 50 年发展的总趋势、50 年的大势，即社会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史学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后呈现出来的主要的基本的趋势。

对于 20 世纪，文学界的朋友说：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这 100 年是很糟糕的 100 年，也就是说人类在这 100 年中过得很不幸。……20 世纪的人类已经完全丧失了 19 世纪以前人类那种高贵的气质。20 世纪的人类在痛苦之下变得屈辱、卑污。因此从本质上讲，我是比较反对企图美化、打扮、总结“20 世纪美好成就”的动机和努力的。[①]史学界的朋友认为：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既取得了辉煌成就，也经历了坎坷路程。[②]认为历史观的进步是 20 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20 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中国通史的研究、认识和编撰。[③]20 世纪后期，中国历史学建立了完整的学科体系，包括史学理论和史学史、考古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各种专门史以及历史文献学[④]。对 20 世纪的看法是多种多样的，对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发展大势的看法也众说纷纭，已有数十位学者发表了看法，以下摘取其中一部分：

瞿林东认为 20 世纪(含后半期)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一是近代化和科学化逐步深入的趋势，二是社会化和大众化逐步扩大的趋势，三是逐步自觉面向世界

---

① 孔庆东：《回望 20 世纪》，孔庆东：《口号万岁》，华龄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 页。

② 戴逸：《中国历史学的百年历程》，北京市社联《学界专家论百年》，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4 页；瞿林东等：《百年史学展新颜》，《人民论坛》2000 年第 12 期。

③ 瞿林东：《20 世纪的中国史学(下)》，《历史教学》2000 年第 5 期；又见瞿林东主编：《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8—50 页。

④ 戴逸：《中国历史学的百年历程》，北京市社联《学界专家论百年》，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4—45 页。

的趋势。①

姜义华等认为：主要趋势是史学多元化、多样化发展。②

张文认为：两大趋势是科学化趋势，人文化趋势。③

侯云灏认为：一、马克思主义史学仍是中国史学的主流；二、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流的整个历史学必将出现百花齐放的多元化发展态势；三、历史学将摆脱实证模式向当代新史学方向迈进；四、历史研究的领域将进一步拓宽，史学将会更加关注社会现实，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得更加紧密；五、学科化趋势。④

赵兴彬认为：一、在与国外史学界的频繁对话和交流中阔步发展；二、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兴起和日益走向深化；三、"现代化"研究成为史学界的重大课题；四、历史现象与历史规律的探求向多层次发展；五、历史知识的普及更加多样化。⑤

耿天勤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呈现三大趋势：一、历史学自身理论问题研究的展开和史学理论方法的多元化趋势；二、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史学学科的多样化趋势；三、史学国际交流的加强和走向世界国际化趋势。⑥

于沛指出：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中外文化交流、碰撞和交融的广阔背景下，中外史学的联系与交流将会进一步加强，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既不会脱离当代国际史学发展的主流，同时也不会失去自己悠久的传统，相反会在保持自己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更加自主地健康成长。……中国史学将从全球视野出发，用世界的眼光，广泛地汲取任何有益的营养，而使自己不断获得发展的新的动因，中国史学将为世界历史科学以及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近 20 年来，中国历史研究所表现出的理论化趋势，在未来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一方面，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历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支持和指导，在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推动历史科学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在研究成果的表述上，将更加重视研究结论的理论描述和理论概括，当然，这有别于以"概

---

① 瞿林东：《20 世纪的中国史学（上）》，《历史教学》2000 年第 3 期；又见瞿林东主编：《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2 页。

② 姜义华等主编：《20 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 历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0—64 页。

③ 张文：《浅议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指导思想及其方法——兼谈史学的发展趋势》，《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 年第 4 期。

④ 侯云灏：《20 世纪中国史学思潮与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44—346 页。

⑤ 赵兴彬：《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得与失》，《学术研究》1999 年第 7 期。

⑥ 耿天勤：《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三大趋势》，《郑州大学学报》2004 年第 3 期。

念”为研究内容的所谓“理论历史学”，并不失历史学的学科基本特征。①

何平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呈现三大趋势：一、在历史解释中，以社会文化形态观念和现代化理论为基本框架的新的解释范型，补充甚至取代了 80 年代以前被广泛使用的从苏联借来的那种简单化的一元单线论历史编纂理论。过去那种千篇一律的政治、经济、军事史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兴起的文化史、社会史写作打破了；二、80 年代中国历史编纂学对其研究对象进行了重新定向。编纂研究的重心由政治（阶级斗争）、经济（生产关系）和军事史（起义、革命、战争）转向了社会经济史、文化史和思想史。一整套新的研究题目被提出来，并受到了广泛的注意。以旧的研究问题为题材的历史著作逐渐减少；三、80 年代中国史学出现了引人注目的革新历史写作理论和方法的努力。近半个世纪国外社会学、人类学、发展经济学、心理学和历史哲学等领域的新理论概念和新的研究方法开始渗透进中国史学中。这种渗透与引进丰富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提高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水平。②

钱茂伟指出：趋势是：一、历史观的一主多辅；二、研究视角的多样化；三、课题选择的市场化；四、通俗史学的长足发展；五、学科发展的综合化；六、研究手段的电脑化。③

焦润明等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已呈现三大发展趋势：一、综合化趋势，即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向，须要通过跨学科的、综合化的手段来解决学术问题；二、微观化研究趋势，即历史研究越来越细化，越来越“破碎化”，学术分工越来越细，研究的方式越来越专业，问题越来越小，越来越碎；三、信息化、电子化趋势，而这些趋势将推动网络史学的发展。④

徐思彦谈到了“租界”趋势。“租界”是台湾一个学者的提法，即在历史学领域内划出某一范围作“租界”，供给非历史学科的学者进行研究。现在许多搞文学、社会学、法学的学者都在“登堂入室”研究历史问题，这种现象可能会在 21 世纪越来越多。⑤

也有人谈到了史学的边缘化趋势。⑥

各种各样的看法还有很多，总的来说，有的从宏观出发，有的从中观出发，有的

① 于沛：《20 世纪中国史学：特点和趋势》，《学海》2001 年第 4 期。
② 何平：《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史学发展若干趋势》，《史学理论研究》2000 年第 1 期。
③ 钱茂伟：《21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及对策》，《浙江学刊》1999 年第 5 期。
④ 焦润明等：《论网络史学的研究对象及方法》，《辽宁大学学报》2010 年第 1 期。
⑤ 详见杨林坤等：《2007 年全国历史学高级论坛会议纪要》，《史学集刊》2007 年第 4 期。
⑥ 傅允生：《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与史学的边缘化趋势》，《浙江学刊》2004 年第 3 期。

从微观出发。究竟应该怎么看发展趋势？大概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重视的：

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学者们说的“科学化”、“理论化”趋势与此有关。这是中国大陆史学发展的一个大趋势。一方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仍在发展，不断扩大影响；①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这自然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大陆占主导地位，并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作坚实的基础，从中获得强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坚持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制度，而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这不仅规定了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的发展方向，也规定了中国文化、史学建设的发展方向，中国的史学事业、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事业、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决定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将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起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将一起与时俱进、不断发展。这样的形势和趋势是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没有的。而且随着“一国两制”的发展，这一发展趋势也会影响到香港、澳门、台湾。

在 50 年的春夏秋冬、晴阴风雨历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曲折中、在各种交锋中、在相互借鉴中，已积累了经验教训，已找到了正确发展、持续发展的路径——在改革开放中，在面向人民、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中，在文化多元化、史学多元化的发展和竞争中，吸收一切优秀成果，丰富自己，发展自己，更新自己，增强活力，增强渗透力，增强影响力、号召力，提升话语权，努力引领世界潮流。

中国的史学发展已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不会妨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反而可以增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动力、活力。

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的话语、语境，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有自己的话语、语境。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中，会扩展、转换话语、语境，使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增强影响力、号召力，能让更多的人接受，对更多的人产生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是面向人民、面向世界

---

① 详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2 页。法国哲学家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也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远不是已经枯竭了，它还年轻，几乎还在童年，它好像刚刚在发展。所以它仍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转引自《致读者》，《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0 年第 1 期，第 5 页）

的，会包容、吸取世界一切优秀成果，会打破与各种文化、各种学术、各种史学的隔膜，会在文化潮流、学术潮流、史学潮流中日益发挥多方面的影响，发挥引领作用。

理论研究、历史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重要性日益显现，这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科学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这将大大推动史学的科学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美籍华人史学家唐德刚对史学发展的设想是：兼采中国传统史学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现代西方史学派三家之长，铸造一个综合性的第四家[①]。这"第四家"，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作指导，兼采诸家之长，应是上策，应是好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在如火如荼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不断与时俱进，这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学发展的基础和方向并推动其也不断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科学民主、多元大众的史学，就是新阶段的发展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二是面向人民。学者们说的"大众化"、"社会化"、"市场化"就与此有关。

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帝王将相是统治者，史书的编写是由帝王将相的意志决定的，主要是写帝王将相的历史，主要是写给帝王将相看的。中国古代官修的二十四史，是由帝王将相的意志决定的，主要是写帝王将相的历史，主要是写给帝王将相看的，被批评为"帝王家谱"。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或其代表是统治者，他们的意志决定了史书编写的主流。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平等、主权在民的价值观深入人心，有一些学者在人民史观的主导下主张写"人民史"。19 世纪就有（英）J.R.格林《英国人民简史》、《英国人民史》，（美）麦克马斯特《美国人民史》问世[②]。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梁启超受到西方史学影响提出写"民史"，但梁启超并没有写出"民史"，20 世纪前半期中国也没有一本真正的"民史"出版[③]。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群众的意志开始真正决定历史书的编写，为人民群众写历史，写人民群众的历史，历史写给人民群众看，成为历史书编写的重要趋势和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从人民的利

---

① 唐德刚：《史学与红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 页。

② 关于外国学者写人民史的情况，可参见周一平：《写人民史的几个问题》，《南开学报》2014 年第 4 期。

③ 商务印书馆 1933 年出版过曹松叶《中华人民史》。这本"人民史"，原名为"中华民族的留痕"，以朝代更替为线索，从先秦写到民国的北伐，基本上是一部简明的中国通史，不是真正的人民史。对此书的评判，详见周一平：《写人民史的几个问题》，《南开学报》2014 年第 4 期。

益出发、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以人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全部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是人民群众，也决定了写历史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要突出人民群众，写历史要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因为人民群众既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也是历史书写的终裁者。少数人、某一部分人认同、满意的而人民群众不认同、不满意的历史记述、历史书，总会被人民群众否定、淘汰。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历史书的编写开始突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如范文澜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与后，写法就有不同，1954 年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中谈到：修订本增加了一些新观点，其中第一个是"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本书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把旧类型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否定了"。①群众史观、人民史观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取代了英雄史观成为历史观的主流。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分六编：地理编，社会编，创造编，制度编，学艺编，人物编。还不是理想的人民史）问世。以人民群众为主人的社会史、风俗史、科技史等著作大量出版。一大批文笔优美、通俗易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史学著作问世。

人民群众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需求、要求不断提高，对史学的需求、要求也不断提高。尽管为人民群众写历史、写人民群众的历史、历史写给人民群众看，在中国大陆还不能让人民群众完全满意，但人民群众的不满意，正鞭策着编写历史不断面向人民，不断让人民群众满意。

人民群众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会通过市场反映出来，历史编写受市场影响是自然的。大众化的通俗性的历史书，看的人多，市场大，这方面的历史编写要发展。纯理论纯学术的历史书，看的人少，市场小，这方面的历史编写要不要发展？也要发展。即便看的人少，也还是有人看，说明也是人民群众需要的。面向人民群众，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多方面的需要。人民群众、社会需要大众化的通俗性的历史书，也需要纯理论、纯学术的历史书。接受、适应市场挑战，不放弃、不抛弃学术追求，这是应有的价值取向。

三是面向世界。这是很多学者都已看到、感觉到的。这是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的大趋势，是中国经济、社会走向世界的

---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第 4 版，第 10 页。

大趋势决定的，是世界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大趋势决定的。

中国史学面向世界是经济、政治、文化大环境决定的，同时也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决定的。首先是中国史学发展需要学习、借鉴世界的优秀成果、优秀理论方法、先进科学技术。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中国的史学能不能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这就要求中国史学有全球化视野，有冲出国门的大发展，这就必须面向世界、走向世界、了解世界、学习世界。世界意义的文化是在世界文化的交流、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世界意义的史学，也是在世界史学的交流、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没有交流、竞争，就没有发展，史学也是如此；其次，中国史学发展，中国史学地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没用的，需要得到世界史学界的认可、支持，这也需要加强与世界的沟通、学习；再次是中国史学发展需要中外合作，以增加活力，与经济发展需要中外合作一样，这就需要面向世界加强交流、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最初的二三十年，曾经因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与西方很多国家的交往少了，因“一边倒”而形成的与苏联的火热关系也曾降到冰点。在这样的大环境里，如有学者指出的：“20 世纪 50 年代以降，中国史学界和其他学科领域一样基本上处于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特别是与西方学术界缺乏学术交流。”①这自然或多或少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中国全面推行“开放”政策，真正以一个大国的雄姿和世界各国平等交往，开始于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此中国迈开了走向世界的大步，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渐增强，中国开始在世界崛起。这为中国史学面向世界大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硬件、软件支持。

中国史学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事件是：1980 年 8 月，以夏鼐为团长的中国学者代表团作为非正式成员国应邀参加了第 15 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世界历史学会大会），中国代表团向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提出了入会申请，1982 年被批准为正式成员国。从此以后，中国史学界与世界史学界的交流多方面、多渠道地迅速发展。

如学者互访、讲学，一些世界知名学者相继来中国访问讲学，②一些中国学者到国外了解、把握了世界史学潮流。在新一轮的出国留学潮中，无论是归国或不归国的留学生，都以各自的方式、方法推动了中国史学走向世界。一些国际性的学术

---

① 详见陈启能等：《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与中国》，《山东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 期。

② 详见陈启能等：《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与中国》，《山东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 期。

会议，在中国频频举行。一大批有世界影响的史学著作、史学理论方法论著作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如：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柯林伍德(R.M.Collingwood)《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波普尔(K.P.Popper)《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等《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威廉·德雷(William H.Dray)《历史哲学》(王炜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伊格尔斯(G.G.Iggers)《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伊格尔斯(G.G.Iggers)等《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陈海宏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斯坦纳德(D.E.Stannard)《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冯钢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哈多克(B.A.Haddock)《历史思想导论》(王加丰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勒高夫(Le Goff)等《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晏可佳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王建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沃尔什(William H. Walsh)《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布洛赫(Marc Bloch)《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弗拉德(Roderick Floud)《历史计量法导论》(肖朗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一部新的世界史》(吴象婴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香港、台湾也有一些中译本史学著作在大陆流行，如：柏克(Peter Burke)《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江政宽译，麦田出版公司1997年版)、詹京斯(Keith Jenkins)《后现代历史学：从卡耳和艾尔顿到罗逖与怀特》(江政宽译，麦田出版公司1999年版)、托什(John Tosh)《史学导论：现代历史研究：目标、方法、新方向》(赵干城等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译介著作数量之多，是20世纪前半期所未有，更是20世纪50—70年代所未有。伴随着的是，信息论理论方法、系统论理论方法、计量史学理论方法、心理史学理论方法、社会史学理论方法、比较史学(中外比较研究)理论方法、后现代主义等，在中国大陆史学界风靡一时，产生了重大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一批卓有成就的老一代海外华人史学家也开始回到祖国讲学，他们的著作开始在大陆出版，并受到追捧。黄仁宇“大历史”观、余英时“内在理路”论、唐德刚口述史学在中国大陆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致大陆一度兴起“黄仁宇热”、口述史学热等①。

以上这些既展现了中国史学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新面貌、新趋势，也推动着中国史学进一步面向世界、走向世界。中国史学在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实现了中国史学的理论、方法、观念、视野等跨越式发展，一批批有史学新潮流气息的著作不断问世，这一发展势头在持续，并势不可挡。

当然，中国史学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步伐还可以迈得更大更快。中国学者的全球化意识、视野、技能还需要更大更快的提升。中外合作的经济项目、外资在中国的经济项目已很多，但中外合作的史学项目还不多，似乎还有点拘束。如中国大陆 1996 年立项的重大科学研究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 年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分公司 2000 年版）。《简本》一发表就遭到国际学术界很多知名专家学者的批评。尽管可以亡羊补牢，但如果 1996 年立项时就有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意识，就加强与国外专家学者的交流，吸收国际学术界的一切优秀成果、先进方法，或者采取中外合作研究的方法，大概就易于提高研究水平、科学水平，易于被国际学术界认同。中国史学界各个领域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中国应更大更快开展广泛的中外文化、史学交流，开展史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创造新的史学潮流，做世界史学潮流的引领者，这正是中国史学家发展中国史学、发展世界史学应负、应担、应尽的责任。

四是面向现代化。学者们说的信息化、电子化趋势，研究手段的电脑化趋势等与此有关。

《历史研究》1962 年第 6 期发表过一篇商鼎《电子计算机在历史科学中的应用》，这是将苏联《历史问题》杂志 1962 年第 8 期发表的乌斯季诺夫的《电子计算机在历史科学中的应用》作了摘要介绍。当时苏联史学界已有人开始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历史研究，而当时中国的史学界大概很多人还没有见过或摸过电子计算机。当时中国现代化建设还在起步。

---

① 详见周一平、许曾会《20 世纪 40—60 年代留美之美籍华人史学家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史学》，《学术研究》2012 年第 10 期。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发展，自然带动了中国史学研究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同时，发达国家的史学现代化建设，也鞭策了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建设。

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爆炸时代，每天都产生数以百万计的信息。就历史领域的信息而言，每年中国大陆出版的相关书籍约 2 000 种，博士、硕士论文 1 000 篇以上，①报刊论文 15 000 篇以上。②如果加上台港澳，加上世界各国的史学信息，那就是天文数字。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电子计算机及其技术的发展、普及，将天文数字的信息数据库化、电子化，使信息能远距离传输、查阅，给学术研究提供便利的信息利用，已成为信息工作的基本任务，成了信息时代的大趋势。③

古代的司马迁写《史记》，用毛笔写在简上，大部分资料也抄自于简，50 余万字写了几十年，耗费一生精力。以后可写在纸上了，仍有“非人磨墨墨磨人”的感叹。20 世纪前半期，王国维、梁启超，包括郭沫若、范文澜等，写作仍用毛笔，仍有“非人磨墨墨磨人”的感叹。至 20 世纪 50—70 年代，写作仍用毛笔的人还有，但大多用钢笔，写作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在纸上，俗称“爬格子”。资料要一页一页去看，并抄成一张一张卡片，待写稿时再把卡片上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写在稿纸上。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中国开始迈向“e”时代（网络时代、大数据时代），这一切都改变了。坐在家里打开电脑就可以看到想看的书、想看的文章，“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已成现实。不再需要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资料室等一个一个地来回跑（不需要跋山涉水，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资料都可以利用网络查阅），不再需要一本书一本书地买、借，不再需要一本杂志一本杂志、一张报纸一张报纸地翻，不再需要一抽屉一抽屉地做卡片，写书、写文章也不再需要用毛笔、钢笔等任何笔。以上问题只要轻点鼠标、键盘就可以解决。资料搜集、引

---

①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以“历史”为词检索博士、硕士论文，2011 年：题名 1 118 条，全文 158 837 条。2014 年：题名 1 205 条，全文 156 127 条。2015 年：题名 1 383 条，全文 157 731 条。

②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以“历史”为词检索，2011 年：期刊题名 10 627 条、全文 488 284 条，报纸题名 6 161 条、全文 199 039 条。2014 年：期刊题名 10 449 条、全文 477 602 条，报纸题名 4 495 条、全文 161 442 条。2015 年：期刊题名 10 680 条、全文 473 204 条，报纸题名 5 245 条，全文 167 963 条。

③ 章开沅谈到：近些年利用电脑建立历史文献资料库已经蔚然成风。苏州档案馆率先把馆藏苏州商会档案二千余卷全部扫描上网，供海内外研究者查阅利用。我非常欣赏这种做法，因为既节省了编辑出版之劳，又保存了档案的原生态，可供研究者做更为客观的独立分析。详见章开沅谈：《展望 21 世纪的张謇研究》，《南通大学学报》2007 年第 1 期。

用之便利、快捷，写作之便利、快捷，已胜以往几倍、几十倍、几百倍。而且，无论走到哪里，在什么地方，只要带着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随时随地都可以（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在飞机、火车、轮船上都可以进行研究，时间荒废减少到最低。掌上一部手机，不仅联络方便，也可以随时随地上网查阅资料。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资料搜集和研究已成大趋势。无纸化的商品交易在日益发展，无纸化的学术研究也在日益发展。

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是搜集资料，资料的全面、真实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优劣、成败。在资料日益数据库化的当今，全面搜集资料不仅可能而且更为便捷。

如搜集范文澜的资料，输入"范文澜"三字进行网上检索，他的99%著作、论文以及他的生平事迹、对他的回忆、研究都能了解、掌握。他的著作（目录）基本上可以通过网络掌握，其中有一部分可以在网上下载，有一部分可以在网上低价购买。他的论文基本上可以在网上搜集、下载。如范文澜的《应该注意的三个要点》（《新史学通讯》1951年第4期）、《科学工作者应怎样展开"新我"对"旧我"的斗争——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的讲话》（《科学通报》1952年第三卷第1、2期合刊）、《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历史教学》1958年第6期），等等，都可以在网上下载阅读。而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刊物，在一般图书馆已很难找到。即便到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大图书馆去找、去阅读，大概往返时间、等待时间也不少，看两三篇文章至少需半天。而现在利用电子计算机和网络，这只需几分钟。[①]网上提供的著作、论文，要引用其中的文字，可以在文字识别后粘贴，减少了文字输入之劳，更不必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

黄一农提出"e"考据时代（利用网络进行历史考据的时代）已来临。他的著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便是他多年搜集"e"文本，进行"e"考据的成果。比如明末天主教徒瞿汝夔的经历一直不详，成了谜，黄一农通过台北汉学研究中心所制作的

---

① 1915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搬运至北京京师图书馆。陈垣每天租一架驴车到图书馆阅读《四库全书》，有时遇上风霜雨雪，来回要三四个小时。就这样，陈垣读了十年（详见吴夏平《谁在左右学术——论古籍数字化与现代学术进程》，《山西师大学报》2010年第3期）。而今已有《四库全书》数据库并光盘，坐在家里打开电脑就可以查阅，还可以通过检索工具，很快找到想看的资料。而且电脑检索比人工翻阅查找有更高的查准率、查全率。此外，还有中国古籍善本查阅系统数据库、《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数据库等等。台湾的汉籍全文数据库，1997年3月正式对外开放。

《明人文集联合目录及篇目索引资料库》,从数据库中收录的 2 500 多种明人文集中检索到了大量瞿汝夔的资料,搞清了瞿汝夔与嫂通奸后出走,后入天主教的较详细情况。余英时评价其书"引用资料之丰富,更令人望洋兴叹"。朱维铮也对此书征引文献之浩博备加赞赏。①黄一农本是学物理的,后研究天文学,1987 年转向史学研究,由中国天文学史转向与此密切相关的近世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于是有了《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很多明清史专家难以完成的著作。黄一农在明清史研究中后来居上,外行成内行,其成功的秘诀就是善于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资料搜集和研究。他没有披沙拣金甚至大海捞针似地把数以千计的明人文集、数以万计的各种资料,一本一本、一页一页地去翻,他利用电子计算机快速解决了很多、很多问题。

"e"时代使资料的计量分析成为可能,一些计量史学的论著问世正得力于电子计算机及相关的分析软件。

"e"时代使随时追踪史学研究新动向、新成果成为可能,使史学研究查新工作变得便利,从而有助于史学研究避免重复劳动,实现创新。

"e"时代使史学研究的讨论、批评(史学批评)、论著的发表变得方便、自由并且能互动。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在网上对任何史学问题、历史问题发表意见,都可以把自己的史学研究成果发到网上(而且可文、图、声并茂),不再受报刊杂志出版社的限制。任何人都可以听到更多好的意见,学习更多好的经验,接受更多有益的教训。借助于网上众人的智慧,史学研究中纠错更为迅捷,再现的历史能越来越接近真实,历史研究求真求信的原则有了大环境的支持、保障、监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有了强势的硬件、软件支撑。网络史学将日益扩大影响力②。

"e"时代使史学研究者不断更新知识、更新观念、更新思维方式、更新研究方法,不断拓展视野,不断进行创新型研究,不断推动史学新发展。

身处"e"时代,不懂电脑,不会操作电脑,不善于利用网上资源,就要在研究中落伍,不仅会落后于国外的同行,也会落后于国内的同行,这也是大趋势。

当然在"e"时代治史,不仅需要有扎实的计算机功底,仍需要有扎实的传统史学基础。比如上网查某人的资料,此人的经历需大致了解,此人的字、号、别名,与此人有关系的所有人及其经历、字、号、别名等都需了解,需要有建立在史学功底上的问

① 李天纲:《E 时代的考据之魅》,《书城》2007 年第 4 期。

② 详见焦润明:《网络史学论纲》,《史学理论研究》2009 年第 4 期。

题意识，否则某人的资料就难以“一网打尽”。又如“e”史料铺天盖地，鉴别、考证史料真伪的技能、功夫仍不可少。“e”时代会带来的局限性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①]

中国虽已进入“e”时代，但资料的数据库化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还不是所有的历史研究资料都已数据库化、电子化了。数据库没有的资料，还应该人工搜集，否则资料的不全，研究仍有局限性。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就有数据库以外的资料没有搜集到，也受到了批评。[②]这说明尽可能多的资料甚至所有资料的数据库化的进程要加快。各种各样的电子资源、各地、各局域网的电子资源无障碍地共享还有待于发展。网上史学交流平台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世界和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世界和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发展，学术研究手段现代化发展，这样的趋势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大有裨益。一方面，应利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另一方面，网络已构建了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比现实世界更丰富多彩的更吸引人的网络世界（虚拟世界）、网络社会（虚拟社会），带来了对物质观、实践观、联系观、矛盾观、动力观等的新认识，[③]马克思主义会在这些新认识的基础上有新发展。网络世界、网络社会的内在（发展）规律需要探讨，这也会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自然会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此外，中国全面推进的现代化建设所促动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史的研究，也正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

五是走向和谐与繁荣。史学多元化、多样化发展趋势等与此有关。

20世纪前半期，中华民国时期，政治上、军事上的斗争你死我活，文化上、史学上的斗争也你死我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受压制、迫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传播的先驱者李大钊被北洋军阀政府杀害，中国辩证

---

① 详见吴夏平：《谁在左右学术——论古籍数字化与现代学术进程》，《山西师大学报》2010年第3期；焦润明：《网络史学论纲》，《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4期；陆象淦：《现代历史科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410页。

② 熊熊指出：《五渠瞿氏家谱》与《瞿氏家乘》因没有电子化，黄一农没有搜集到，是《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的一大缺漏。详见熊熊：《e时代的两头蛇》，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9期（2008年3月）。

③ 参见高维钫：《计算机网络问题的哲学断想——关于历史观的点滴思考》，《北京邮电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裘伟廷：《关于网络的哲学思考》，《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孙伟平：《信息时代唯物史观出现新变化》，《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10日第5版。

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传播的先驱者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先驱者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先驱者蔡和森、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的先驱者邓中夏、中国农民运动史研究的先驱者彭湃等都被国民党政府杀害。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随时都有被暗杀的危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完成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资本家、地主被基本消灭，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成为时代主题，社会应趋于和谐。但因为"左"倾思想、"左"倾思维方式的不断发展，片面强调事事（矛盾）都在斗争中发展、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到"文革"时期，"斗争"发展到高峰。季羡林的话大概很能说明问题："建国以后，眼前虽然有了希望了，然而又今天斗、明天斗，这次我斗你，下次你斗我，搅得知识分子如我者，天天胆战心惊、如履薄冰，斗到1966年，终于斗进了牛棚。"①季羡林的《牛棚杂忆》详细写了自己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情况，并说：当年打派仗的时候，所有的学校、机关、工厂、企业，甚至某一些部队，都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独左"、"唯我独尊"。现在看起来两派都搞打、砸、抢，甚至杀人、放火，都是一丘之貉，谁也不比谁强。一个原来是亲爱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属两派，则夫妇离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阋于墙"，天天在家里吵架。②当时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当时的史学是"斗争史学"。当时的史学文章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战斗科学"。③1965年，《学术月刊》上发表了史学文章《让历史科学成为战斗的武器》，文章强调：国内外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要增强敌情观念，把笔杆子和枪杆子紧密联系起来，充分发挥历史科学这一战斗武器的作用。"历史研究工作者如果缺乏枪的观念、缺乏敌情观念，斗争意志不旺盛，就必然会走上为学术而学术、为历史而历史的资产阶级学术研究的道路"。④有的文章强调：史学不是"古寺沉钟"，而是战斗的匕首。⑤自然的，此类"战斗力"强的文章满天飞，"宁左勿右"、"上纲上线"、"贴标签"式的大批判文章满天飞，学术研讨演变为学术阶级斗争，演变为政治斗争，演变为

① 季羡林：《百年回眸》，载北京市社联：《学界专家论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② 季羡林：《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2版，第2页。

③ 巩绍英：《站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高峰——略谈学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历史教学》1963年第10期。

④ 同甫等：《让历史科学成为战斗的武器》，《学术月刊》1965年第2期。

⑤ 刘绍孟：《迎接伟大的1958年，争取在历史科学战线上获得更大的成绩和胜利》，《史学月刊》1958年第1期。

“你死我活的斗争”。①一批有才华有成就的史学家受到迫害，甚至家破人亡。如雷海宗被打成右派，很快抑郁病逝。如翦伯赞含恨自尽。

没有和谐的环境，没有民主自由的环境，没有人人心情舒畅的环境，没有人尽其才、各显其能的环境，怎么会有学术繁荣！没有不同学派和谐共处、共荣，怎么会有学术繁荣！政治干扰太多，禁区太多，怎么会有学术繁荣！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的中国史研究开出“五朵金花”，五个领域的研究是有成绩的，不应否定，但并没有百花齐放，并非是百个领域都有成绩，文化史研究、社会史研究等“花”就没有开、就没有什么成绩。所以论繁荣，至多是“五朵金花”的小繁荣，而没有整个史学领域的大繁荣、全面繁荣，就史学领域整体而言，还谈不上繁荣，至少没有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那样的繁荣。“文革”的一个时期，中国古代史研究更是几乎只有儒法斗争史“一朵金花”在开，更谈不上百花齐放、全面繁荣了。

“文革”结束以后，人心思和谐，人心盼繁荣。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代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宣布不再搞运动，社会、人们的心思摆脱了“斗争”，转向建设、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即繁荣是硬道理，成为很多工作的指导思想。以后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也成为硬道理，也成为很多工作的指导思想。经济、社会和谐起来、繁荣起来，文化、史学也和谐起来、繁荣起来。

中国经济的和谐与繁荣体现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私营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等)并存、互补、共同发展，即经济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中国社会的和谐与繁荣体现在单位人转向社会人，各种社会组织发展起来，即社会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在稳步推进。文化和史学的和谐与繁荣、多元化多样化发展，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同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也给予中国史学走向和谐与繁荣、实现多元化多样化发展以强大的推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史学走向和谐与繁荣、实现多元化多样化发展，是海内外的学者都有感觉的。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治与学术关系日趋和谐，政治干预学术日少，政治尊重学术、支持学术日多，学术不再与政治混同，

---

① 《人民日报》1966 年 6 月 3 日第 1 版《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说：“在史学中，和在其他科学中一样，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是绝对不能和平共处的。这只能是谁战胜谁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学术问题用学术方法解决，不再用政治方法解决；二是思维方式、研究方法有了解放和突破。唯上、唯本本、唯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的思维方式日渐消除。随“风”转的习气日渐消除。[①]“宁左勿右”、“上纲上线”、“贴标签”式的大批判文章日渐消除。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心平气和的研究、讨论蔚成风气。求真求信，实事求是，客观研究、分析、论述，成为共识。各种的研究方法都开始尝试、运用。各种各样的理论都开始了解、借鉴；三是与台港澳的友好学术交流，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学术交流发展起来。意识形态的隔阂日渐消除。以前是“敌人”，现在是朋友，以前“不共戴天”，现在同桌笑谈。[②]以前的“台港澳关系”、“海外关系”是坏东西，现在是好东西。化敌为友的交流，大大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繁荣。四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发展起来，文化史、社会史的发展尤为迅猛，跨学科研究、多学科合作研究日益发展。各领域的论著大量发表出版，多卷本、大部头的著作屡见不鲜。工程浩大举国合作的项目陆续立项。[③]五是人尽其才、各显其能。个人的兴趣、爱好、特长得到尊重，不再受到限制、压抑。不同观点、不同学派和谐相处、取长补短。史学家主体意识觉醒，有个性的著作不断问世。

有学者认为：20 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史学是一种脱胎于“战时史学”而又无法摆脱“战时史学”局限的史学。[④]这如果说的是 20 世纪后半期的 50—70 年代“文革”结

---

① 共运史学者谈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众多的论著中“固然仍有陈旧空疏之论者，但相当一部分已不再是以前那类跟着政治风向跑的‘奉命之作’，而是学者自己的独立研究成果了。其中有些可以称得上新颖大胆、别开生面，或在老问题上提出新见解，或把视野扩大到新的‘空白’领域，甚至闯入以往无人敢于逾越的‘禁区’。所有这些，有力地动摇了先前在长期思想钳制下形成的僵化郁闷的状况，创造了共运史研究繁花开放的局面”（李景治主编：《国际共运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4 页）。

② 金仁芳：《台湾民国史研究概况》（《档案与史学》1994 年第 2 期）谈到：1981 年一些日本学者发起在东京举行辛亥革命学术会议，邀请了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由于当时两岸人民不能接触，台湾学者只能和另一些日本学者在横滨举行辛亥革命研讨会，而不能参加东京的会议。1989 年 8 月 2 日，台湾民间学术团体“台湾史研究会”的几位学者利用回大陆探亲之便，以个人名义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举办了台湾研究学术交流会。这是海峡两岸学者第一次在大陆共聚一堂进行学术交流。以后大陆、台湾的学术交流迅速发展。

③ 如夏商周断代工程、清史工程等。

④ 王学典：《20 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3—144 页。张艳国称 20 世纪 50—70 年代的中国史学是“斗争史学”，详见张艳国：《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再发展：继承与创新》，《社会科学辑刊》2000 年第 1 期。当时确实把史学当成“战斗的武器”、“战斗的匕首”（详前）。当时的文章还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就是一种斗争的科学、革命的科学”（翦伯赞：《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人民日报》1957 年 7 月 14 日）。“史学的业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在理论上进行阶级斗争”（尹达：《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红旗》1966 年第 3 期，《人民日报》1966 年 3 月 2 日第 5 版）。

束是可以的。在奉行“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时期，中国社会仍有“战时”、“斗争”色彩，中国史学有“战时”、“斗争”色彩是难免的。但70年代末以后，中国史学开始摆脱“战时”、“斗争”色彩，这应是事实。

当然，中国史学走向和谐与繁荣还需要进一步加油，还需要多方面努力。

如20世纪50—70年代“文革”结束对一些史学家的批判、打击、迫害，使一些史学家受到身心的摧残，有的含恨离世，有的家破人亡，这些史学家难免有怨气，这些史学家的家属、学生难免有怨气，有的至今仍有怨气。这些不和谐的因素，仍需要采取积极措施，仍需要时间去消除。

如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体制内学者、体制外学者的分野，要善待体制内学者，也要善待体制外学者。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研究都要发展。官方史学、民间史学都要发展。要发展民主平等友善的学术批评。

如中国大陆与台港学者要和谐相处，中国学者与世界各国学者要和谐相处，马克思主义派学者与非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反马克思主义派学者要和谐相处。从世界范围来看，马克思主义派学者是少数，马克思主义派的学术观点要善于让更多的人接受，这是马克思主义派学者的重要任务。

如理论建设、方法建设、资料建设都是史学建设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都要发展。叙事研究、理论研究，通俗著作、学术著作都要发展。为政治服务的研究、不为政治服务的纯学术研究(可以谈主义，也可以只研究问题)都要发展。宏观研究、微观研究，跨学科研究、不跨学科研究，新理论新方法研究、旧理论旧方法研究，只要创新、不炒冷饭都要发展。各个领域、各种问题的研究都要发展。不要顾此失彼、重此轻彼。

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学在面向人民、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让所有的智慧、才华、潜能迸发，弘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吸收世界史学的优秀成果，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水平、学术水平、技术水平，不断推出精品、传世佳作，不断走向繁荣，这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每个人都有责任为创造和谐繁荣的社会、和谐繁荣的学术、和谐繁荣的史学出力、作贡献。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历史理论研究

一、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的认识回归理性[1]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形成于30年代。其后，得到发展，逐步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走向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脉络。以下记述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与讨论。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进入了广泛传播和发展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中国大量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著作，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潮，这对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传播、运用，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促进中国史学的科学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成长起来，共同推动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的认识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以下分三个阶段进行论述：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17年"（1949.10—1966.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发展的时期之一。马克思主义成为全中国人民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顺理成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的主流。[2]其标志性的体现就是马克思、

---

① 本节主要参考了张剑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李文海、龚书铎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历史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陈祖武等主编：《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史学专辑》，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2007年版；肖黎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陈其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瞿林东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瞿林东：《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张剑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

②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主流地位的确立，可参见郑珺：《论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导地位的确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增刊；蒋海升：《1951：唯物史观派主流地位的确立》，《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成为畅销书，全社会、整个史学界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蔚然成风，写书、写文章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话蔚然成风，唯物史观是正确的，唯心史观是错误的，日益成为共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科学研究的生命线，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历史科学”，①也日益成为史学界的共识。1957 年，翦伯赞发表文章说：“解放以来，我国科学家、教授在思想改造中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有些科学家、教授通过自己的那门科学的研究，在不同的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些科学家、教授已经初步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且已经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因此，可以说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已经在我国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领域中建立了统治地位。”②1958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史学界的成绩时首先指出：“经过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经过历次社会改革运动的实践，经过自己的业务的实践，许多历史科学工作者，背叛了原有的阶级立场，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批判了为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的历史观点，接受了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服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点，这是一个根本性质的变化。”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有过讨论、交锋，但并不深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的普及过程中，这方面的讨论开始深入，同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科学通报》1953 年 7 月号(第 7 期)发表刘大年《中国历史科学现状》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今后的任务是进一步认真、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真正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人民日报》1953 年 8 月 11 日又发表刘大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历史科学的基础》，进一步强调：“历史科学只有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使一切人类社会的

---

① 奚原：《历史科学研究必须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学术月刊》1958 年第 5 期。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有很多文章、著作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使历史成为科学，包括周予同这样的学者也这么说，详见周予同：《“厚今薄古”与历史科学大跃进》，《学术月刊》1958 年第 5 期。

② 翦伯赞：《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人民日报》1957 年 7 月 14 日。翦伯赞《历史科学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1958 年 7 月 15 日)也谈到：“在(1952 年)院系调整以前，资产阶级的教授们还是企图霸占大学历史学的讲坛，拒绝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进入大学。”“院系调整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进入了大学和研究机关，并且取得了支配地位。在全国各地的历史学研究机构和各高等学校的历史系中，一般都插上了红旗。”

③ 刘绍孟：《迎接伟大的 1958 年，争取在历史科学战线上获得更大的成绩和胜利》，《史学月刊》1958 年第 1 期。文章中还说，当时的史学工作者说：“会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话，现在已经是不稀罕了。”

历史得到正确的解释。"随后，向达在1953年10月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解放四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发展概况》(署名"方回")，文章并没有对刘大年文章提出批评，只是强调了资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而没有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谈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和出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科学工作者团结的一个有力证明，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科学方面的一个鲜明的指示"。向达的文章遭到了批判。白寿彝发表《历史资料的伪装》，对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只重视资料的观点及其学者(向达、荣孟源、雷海宗)进行了批判。其中批判向达道:"有人妄想用历史资料的编辑来偷换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向达就是这样作的"。"向达装作看不见马克思主义的巨大作用，是想把历史资料抬高到历史工作的主要地位"。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的"作者致辞"，"已活画出一个以史学界前辈自居的野心家顽抗历史科学，决心走资产阶级的道路……"[1]强调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无疑是对的，但认为重史料就是走资产阶级道路，这还是有点过分。这是当时史学界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反映，也是当时学术界火药味很浓氛围的反映。

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不重视或重视不够、强调不多的史学家，如向达、雷海宗、荣孟源等遭到批判。[2]有的文章说:右派分子雷海宗、荣孟源等更妄图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用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旧史学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我们国家的指导地位是固若磐石的，任何敌人想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都只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3]

---

① 白寿彝:《历史资料的伪装》,《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

② 批判的情况可参见邓广铭:《评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历史研究》1957年第11期;胡厚宣等:《批判向达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历史研究》1957年第11期;孙定国:《揭穿雷海宗反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恶毒手法》,《历史研究》1957年第11期;吴廷璆:《驳斥雷海宗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历史研究》1957年第12期;翦伯赞:《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等等。

③ 刘绍孟:《迎接伟大的1958年,争取在历史科学战线上获得更大的成绩和胜利》,《史学月刊》1958年第1期。这篇文章还批判了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说:还有一部分人口头讲的是马列主义,骨子里却是个人主义,甚至有的史学工作者说:"马列主义不是私有的,咱也会了,会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话,现在已经是不稀罕了。"把马列主义当作商品兜售,天气好就把货色摆出来,一有风雨就收起来了。这种人在阶级斗争中是很危险的。在社会变革的紧急关头,就容易迷失方向,我们历史科学工作者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改变自己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本质,"脱胎换骨"改造自己,古人说"不破不立",只有破资本主义立场,才能建立会主义立场,只有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立场,才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观察和研究一切历史问题,才能成为忠实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历史科学战线上的斗士。

1958年，经济上搞“大跃进”，史学界也跟随着搞“大跃进”，并掀起了“史学革命”，[1]史学界的一些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强调：“历史科学战线是文教科学战线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战线上同样必须有一个大跃进。在大跃进中，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必须鼓足革命干劲、力争上游：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和教学的水平，对一切反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进行无情的揭发和批判，使它在群众面前无所遁形。”[2]“历史学的跃进，首先是扫除思想障碍，障碍跃进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也突出地表现在厚资料而薄理论的倾向。这里所谓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好像只要有了资料没有理论也可以成为史学专家，反之就不能成为专家。学历史的人是要占有史料，而且占有的史料愈多愈好，但是如果不学马克思主义甚至轻视马克思主义，即使占有史料，也不过是一个白色专家，甚至还有变成右派的危险。由于厚资料而薄理论，就使得我们的历史学丧失了战斗性、创造性。……必须把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反掉，才能提高历史学的思想性、科学性、战斗性，才能使历史学沿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向前跃进。要反掉资产阶级思想，就必须在历史学领域内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替历史学的大跃进开辟道路。”[3]不仅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更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战斗性，强调史学战线要“兴无灭资”。火药味更浓了。

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的认识也出现了一些片面性。

当时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强调“不断地加强和巩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历史科学的领导地位”。[4]这是有合理性的，但进行形而上学的走极端式的论述、进行片面的论述，就会走向正确的反面。如有的文章强调：“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历史上万能地、最正确地、十分完备而严整的科学。”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联共（布）党史》中的一章）“真正是马列主义哲学思想底顶峰”。[5]这种“万能”论、“顶峰”论，显然是反辩证法的，是形而上学的。

---

① 关于“史学革命”的情况，可参见张剑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② 吕振羽：《必须有一个史学战线上的大跃进》，《历史教学》1958年4月号。

③ 翦伯赞：《兴无灭资，发展历史科学》，《历史教学》1958年4月号。

④ 朱杰勤：《历史科学与调查研究》，《学术研究》1963年第2期。

⑤ 郑天挺：《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纪念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七十周年》，《历史教学》1953年第5期。还可以参见刘绍孟：《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的谬论，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而斗争》，《史学月刊》1957年第11期；凌汉如：《必须坚持历史科学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地位》，《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1期。

有的文章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结论,是从客观材料引出来的事物固有的规律;结论既经得出,如马克思所说,它就变成了指南。对于历史研究工作说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是我们向着尚未研究或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历史领域进行研究的唯一科学武器。有了这个武器,我们才能正确地分析史料,并且能够具有对于史料的敏感,抓住重要的关键性的东西,而不致使自己淹没在史料文献的汪洋大海之中。"①这里就是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所有结论都是"指南",都是普遍真理,还把这样的看法说成是"马克思所说"。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所有结论都不会过时,都绝对正确,这显然也是反辩证法的,是形而上学的(以后这种"所有结论"论、"普遍真理"论用到了论述、宣传"毛泽东思想"上。不仅是所有结论是"普遍真理",就是所有词句也是"普遍真理",即"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有的文章强调,历史研究"必须以唯物史观基本核心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为指导"。②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的核心"就是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方法"。③"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历史的唯一科学方法"。④"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学术的唯一方法"。⑤把阶级斗争理论视为唯物史观核心,强调历史研究必须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强调"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学术的唯一方法",这显然是片面的,是"阶级斗争为纲"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有的文章强调:历史研究必须"把理论摆在第一位,把史料摆在第二位"。⑥有的文章则把资产阶级史学批得一无是处,说:"资产阶级伪造一切商品,也伪造历史。报酬最高的作品正是历史的捏造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那些作品。"(按:说这是恩格斯的话)"由此可知,资产阶级所谓历史科学,不过是把历史学当作辩护阶级支配和阶级剥削的工具罢了。"而"研究历史科学,如果取消、排斥马克思列宁主义,其结果必然是陷入资产阶级历史学的泥坑,成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⑦把资产阶级的史学全部视为伪造历史,显然是不客观的。以上表明,形而上学的走极端的思维方式已发展

---

① 东方明:《加强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和讨论》,《红旗》1964年第5期;《人民日报》1964年3月28日。
② 衷尔钜:《历史科学的任务和古为今用——与冯友兰先生商榷》,《哲学研究》1963年第5期。
③ 王日东:《关于阶级分析方法——学习札记》,《人民日报》1962年11月29日。
④ 钟师宁:《阶级分析是研究历史的根本方法》,《哲学研究》1963年第3期。
⑤ 民:《〈学术研究〉杂志关于学术研究方法论的讨论》,《哲学研究》1963年第3期。
⑥ 陈守忠:《历史科学如何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西北师大学报》1964年第2期。
⑦ 凌汉如:《必须坚持历史科学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地位》,《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1期。

起来。

但也有一些史学家在为全面认识、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而坚持斗争。①

尚钺撰写了《与刘大年同志谈谈学术批评》(写于1957年,1958年4月投给《历史研究》,没有被刊用)指出:“所谓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历史,不是把理论和历史的客观事实对立起来,完全相反,而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的指导下,把详细占有的史料,整理出吻合科学规律的系统来。也就是必须做到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即有明确的观点去统一材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引用词句是次要的,因为我们从事历史科学工作的人,要从客观事实出发来解决问题,就必须依靠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问题,不是用经典著作的个别字句当捆仙绳来捆与自己学术见解不同的人;或者当翻天印来打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人。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根据丰富的史料,使持不同意见或相反见解的人理屈词穷,放下武器。”②这篇文章对当时历史研究中的只重“理论”不重史料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了批评,对把“推翻”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标签随便向与自己见解不同或见解相反的人头上贴的不尊重人的大批判手法、把学术研究政治斗争化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1961年,范文澜发表了“反对放空炮”的讲话,指出:马克思写的《法兰西内战》一书,写时间、地点、人物都非常具体,非常扼要,许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原则,就是从这些事实中抽象出来的。我们有些史学工作者,不能说他不想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动起笔来,却把历史事件忽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久前《人民日报》又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发表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社论。然而我们的这些同志总是听之藐藐,懒得作调查工作,把自己杜撰的一些公式和规律,演成篇幅,说这就是论文,或者说这就是著作。……强调:应认真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创造和毛主席所提倡的严肃的学风在我国历史学界发扬起来。③批评了当时历史研究中不重视具体历史的研究、只“放空炮”的不良

---

① 宗越:《闲话自封的马克思列宁的代言人》(《文汇报》1957年5月1日第3版),批评了当时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不良学风,可以参见。

② 《学术批判参考资料(尚钺文章选录)》,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处1960年印,第56—57页。尚钺的看法,还可以参见刘涤民《就〈中国历史纲要〉一书内容尚钺答范文澜批评》,《文汇报》1957年5月7日第2版。

③ 范文澜:《反对放空炮》,《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

学风。

1961 年，翦伯赞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阐述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历史理论的观点，谈到了要反对唯心论也要反对经济主义："既要看到经济，也要看到政治和文化，还要看到它们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过分强调政治、文化，否定经济的决定作用，这是唯心论。但过分强调经济，并把经济的规律绝对化，否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经济主义。"谈到了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以致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原则，在中国史的研究中都不能应用，这是修正主义。但过分地强调世界史的一般原理原则，并按照外国的历史来安排中国历史，好像外国史上有过的中国必须有，而且不能和外国史不同，这是教条主义。"谈到不能用原则代替历史而应从历史引出原则时说："理论挂帅，不是只要理论不要史料，不是用空洞的抽象的社会发展史的一般原理原则代替具体的历史，只是说要用这样的原理原则分析具体的历史。理论挂帅不是用一般原则去套历史，把史料作为理论的注脚；而是用理论去分析史料，通过史料的分析，对历史事件或问题，作出理论的概括。不是用原则代替历史，而是从历史引出原则。"谈到要坚持历史主义但要反对客观主义时说："要严格地运用历史主义的原则，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在他们自己的历史条件之下加以说明。但如果过分地用历史条件与倾向为某一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落后、反动进行辩护，这就不是历史主义而是客观主义。"①还谈了一系列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规范、方法。翦伯赞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提倡全面、准确理解、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虽然难免有当时时代和形势的印记、气息，但仍可以被视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论述的最高水平。

宁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理论阐述方面也做出了成绩，也主张应全面、准确理解、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②

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及与之相关的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等的地位被无限拔高，一些正确看法及其发表者遭到了批判，尚钺、宁可、翦伯赞、范文澜等都被批判。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全面、准确理解、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很难，片面地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却大行其道，并

①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人民教育》1961 年第 9 期。

② 详见丁守和：《从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谈起》，《史学理论研究》1992 年第 3 期；编委会：《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泛滥成灾。

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密切相关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问题的讨论，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也有所展开，胡素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几个问题讨论的简介》（《教学与研究》1963年第5期）、胡素卿《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几个问题讨论的简介》（《教学与研究》1963年第6期）、胡素卿《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几个问题讨论的简介》（《教学与研究》1964年第1期）等文有比较客观、平和的介绍，可以参见。其中介绍了当时就生产力的要素问题、生产力的性质问题、生产力发展的动力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问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问题等发表的一些不同意见。

（二）“文革”10年（1966.5—1976.10）

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宣传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夺回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领导权、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打倒封资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革命”。在史学领域是“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的“大革命”。在极“左”思想理论的指引下，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被打成“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甚至被迫害致死。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论著被诬为“封资修”、“大毒草”，被批得一无是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史学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没有思考、讨论的余地。“文革”时期发表的研究历史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为当时政治服务的、为“文革”服务的，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影射史学”、“七真三假”风靡南北，史学变为“政治阴谋的工具”。①而这些当时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实际上已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分道扬镳或背道而驰。“文革”时期，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遭到大破坏，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的解释和认识被严重扭曲，“文革”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已无科学性可言。

“文革”结束后的最初两年，“两个凡是”思想占主导地位，还是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文革”也没有被彻底否定，尽管史学界开始拨乱反正，但“文革”

① 黎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的影响无法彻底清除。如1978年6月郑州大学历史系发表《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繁荣我国的历史科学》文章，仍强调："史学从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①这仍然是"阶级斗争为纲"的语言，是"文革"的语言。

史学界彻底清除"文革"影响，是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取代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以后，是在"文革"被彻底否定以后。

(三) 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12—2000)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路线端正了，思想路线端正了，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迎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学术界、史学界也迎来了开放、发展的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的认识也迎来了全面认识的新时期。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人们的思想逐渐解放，百花齐放的畅所欲言的学术讨论开展起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的学术讨论也前所未有地开展起来。

首先是清算以往的一些片面、错误的认识。如诸葛计《驳"四人帮"在农民战争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历史研究》1977年第1期)、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组《历史唯心主义的标本》(《历史研究》1977年第2期)、丁伟志《"四人帮"是历史科学的敌人》(《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等很多文章都对"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的破坏进行了批判。学者们指出，"四人帮"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章中，堆砌了很多的"马克思主义"词句、术语，但他们的文章中，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是用来吓唬和欺骗人的庸俗的套语和标签。"四人帮"的历史研究法，是一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从而割裂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阉割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一种从臆造的原则出发，而不是从历史的事实出发的实用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与他们的主观唯心论的世界观紧密相联的，是他们那种狂妄无知的主观随意性和极端反动的唯意志论在方法论上的表现。②

在反思"文革"的同时，对"文革"前的一些片面、错误的认识、做法也进行了检讨。

余明光指出，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文革"，"左"的思想影响是主要的，表现

① 郑州大学历史系：《高举毛主席的旗帜　繁荣我国的历史科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3期。

② 瞿林东：《评"四人帮"的历史研究法》，《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4期。

在:一、“以论带史”变成“以论代史”;二、“以阶级斗争为纲”“打破王朝体系”,“以农民革命为线索编历史”。“文革”时期,“阶级斗争为纲”变为儒法斗争、路线斗争为纲;三、“统治阶级无好人,农民英雄无缺点”,“唯成份论”,“贴标签”;四、“服从斗争需要”,实用主义。①

林甘泉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左”倾思想对史学界的影响主要是:一、对封建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没有认真采取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二、对于外国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不但知之甚少,而且采取一种盲目拒斥的态度;三、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当作教条,研究工作中存在着片面性和简单化、公式化的毛病;四、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理解得过于狭窄。我们过去把史学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提法现在看来并不全面。②

张剑平认为,十七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教训主要是:一、以学术批判代替百家争鸣,片面地、过分地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极大地妨碍了历史学自身的健康发展;二、对西方史学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缺乏深入的分析,未能处理好历史遗产的批判和继承问题;三、中国史学界在这一阶段并未认真地从事对社会主义建设至关重要的课题研究。③

张艳国认为,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开始,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内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将马克思主义史学曲解成“斗争史学”,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尤其是长期错把苏联史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全盘照搬了苏联史学的模式,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的流风所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受到冲击。这个偏离,使中国史学在长时间内经历曲折,在思想迷惑中徘徊。④

在清算以往片面、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的深入探讨开展起来。探讨的主要问题是:

1. 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的作用和地位

由于“文革”时期搞“七真三假”导致假历史泛滥,社会中滋生了一些对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反感(也受到国外一些史学家指责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为政治服务的史

---

① 余明光:《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研究》,《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 年第 2 期。

② 林甘泉:《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观》,《人民日报》1998 年 6 月 20 日第 5 版。

③ 张剑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问题》,载瞿林东等主编:《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④ 张艳国:《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再发展:继承与创新》,《社会科学辑刊》2000 年第 1 期。

学的影响），80 年代初出现了“回到乾嘉去”及“重振叙事传统”的思潮，这种思潮重史实、轻理论，或多或少否定或忽视几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成就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作用。①有的在“反保守”名义下反对坚持唯物史观。②有的认为唯物史观有缺陷。③很多史学家，有老一代，有中青年，纷纷撰文肯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科学性，肯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及几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成就。如尹达《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科学研究》（《中州学刊》1982 年第 3 期），白寿彝、瞿林东《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学史研究》1983 年第 1 期），刘大年《关于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世界历史》1983 年第 4 期），尚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光明日报社史学专刊编《历史理论研究》，重庆出版社 1984 年版），方国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史学研究的新局面》（《云南社会科学》1984 年第 1 期），庞卓恒《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论是发展史学理论的重要一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 年第 1 期），金景芳《研究中国古史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社会科学战线》1990 年 1 期），戴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史学发展的关键》（《高校理论战线》1995 年第 8 期），陈其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地位的思考》（《浙江学刊》1999 年第 1 期），林甘泉《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发展》（《史学月刊》2000 年第 1 期），吴怀祺《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特点》（《中州学刊》2000 年第 1 期），李振宏《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州学刊》2000 年第 1 期），等等。以后还有瞿林东《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南开学报》2002 年第 2 期）、《关于坚持唯物史观的几点思考》（《高校理论战线》2002 年第 6 期），陈其泰《建国后十七年历史研究及唯物史观的价值》（《淮阴师范学院学

① 参见庞卓恒：《史学需要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齐头并进》，《求是杂志》2000 年第 11 期。

② 详见李珍：《“唯物史观与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综述》，《高校理论战线》2002 年第 5 期。

③ 详见侯惠勤：《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的若干倾向》，《高校理论战线》2005 年第 10 期。2001 年《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也提出“唯物史观确实存在着理论缺陷”。这遭到不少学者的批评，如吴英、庞卓恒：《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与蒋大椿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马捷莎：《“超越”还是“回复”——与〈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商榷》（《社会科学辑刊》2002 年第 4 期），王锐生：《唯物史观：发展还是超越？》（《哲学研究》2002 年第 1 期）等等。张立达：《评蒋大椿和吴英、庞卓恒围绕唯物史观的理论争鸣》（《史学月刊》2003 年第 3 期），认为蒋大椿文与吴英、庞卓恒文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周祥森：《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交锋——对新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论的评论》（《史学月刊》2004 年第 3 期）认为：蒋大椿提出的“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发展史上，是一种全新理论形态的历史观。

报》2003年第5期），等等。①

学者们强调，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及当代价值在于：一、它从本质上是贯串着实践观点的历史唯物论；二、它是一种以承认历史规律为前提的历史决定论，这种决定论是辩证的而非机械的决定论；三、它是揭示社会复杂关系、发展过程和结构的历史辩证法。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结论，如关于社会实践、社会结构、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历史发展动力的原理，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今天仍将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②

戴逸指出，历史研究要不要用理论指导，其实质就是科学研究要不要接受前人的理论成果、学术成果。人类社会发展是有某种规律的，如果承认前人已经发现的一些重大的基本规律，那么就不能拒绝用前人的理论成果来武装自己、指导自己的研究。完全不用理论来指导，不接受前人的理论遗产，一切从头研究，这样的科学家是没有的。研究数学，你能抛开毕达哥拉斯吗？能抛开阿基米德吗？当然不能；研究天文学你不能离开哥白尼；研究物理学你不能离开牛顿、不能离开爱因斯坦。自然科学要用前人的理论作为指导、作为基础，那么为什么社会科学就不需要理论指导呢？这是说不通的。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是研究人类社会最科学、最正确、最完善的理论。因此，用它来指导历史研究是使我们取得成果的关键因素。③

---

① 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的指导作用肯定的文章很多，如康健文：《历史研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记贵州省史学会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座谈会》，《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林雨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史学研究——论“以论导史”》，《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卢文中：《遵循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思维规律　开创世界史研究新局面》，《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王道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进一步搞好二战史研究》，《军事历史》1989年第6期；王汝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繁荣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凡嘉：《为什么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在各种学说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前线》1990年第7期；石云霞：《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体系不容否定》，《高校理论战线》1991年第3期；许殿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地位学术讨论会纪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廖学盛：《坚持唯物史观，不断提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能力》，《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张顺洪：《坚持唯物史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陈先达：《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与当代价值》，《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5期；李珍：《用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的现实思考》，《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9期；沈长云：《在历史研究中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王桂泉等：《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理论探讨》2008年第3期；侯惠勤：《略论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田心铭：《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田心铭：《为什么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二论“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8期；田心铭：《评几种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观点——三论“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9期，等等。

② 李珍：《“唯物史观与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综述》，《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5期。

③ 戴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史学发展的关键》，《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8期。

庞卓恒指出，理论和史料的关系，翦伯赞说得非常好。他把史料比喻为野马，说如果不带着缰绳去驾驭，它不知会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而理论就好比驾驭野马的缰绳。没有理论指导去探索史料，至少也是事倍功半。但理论若不掌握史料，也是空洞的理论。“回到乾嘉去”思潮，不会太长，只摆过程不讲理论也是长久不了的。人们读书总是需要从中得到一些启示。西方新史学告别兰克，我们这里回到乾嘉，这是一个明显的反差。当然，西方告别兰克，没有走多远，又出现了徘徊。但告别兰克毕竟是西方新史学的一个主调。他们告别兰克，并不是抛弃兰克，而是改变兰克的那种单纯描述过程的来龙去脉，而不研究事物的趋势、规律的模式。①

李振宏指出，从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对封建主义史学的取代，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代资产阶级史学，无不是以理论方法论的变革为先导，没有理论方法论研究的重大突破，就不会有整个历史科学的新的转机。这是一条史学史上的真理，也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科学内部学科之间的重要依存关系。只要我们不带任何偏见，只要我们敢于正视百年来中国史学变革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对于整个历史科学发展的重要性，是很容易被肯定和确认的。②

吴怀祺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转型时期史学发展，可以不必再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这样的观点值得商榷。首先，这种观点在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发展史学工作对立起来，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明了史学创新的道理之所在。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说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要不断深化，李大钊曾指出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说：“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其次，当代史学史发展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有活力、创造力的。近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各种考验，日益证明当代史学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③

以后田心铭强调，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绝不是停留在字面上的抽象空洞的理论争论，它直接同代表不同阶级、社会集团利益和意志的不同理论在思想领域的交锋和争夺相关联，反映了现实社会中不同经济、政治力量的相互较量。一些人在提出种种观点质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推出了种种西方资产阶级的乃至源自封建社会的思想理论，同马克思主义争夺意识形态阵地

① 庞卓恒：《史学需要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齐头并进》，《求是杂志》2000年第11期。

② 李振宏：《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州学刊》2000年第1期。

③ 许殿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地位学术讨论会纪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

和指导地位。①

总之，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不是别的理论），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内在的普遍联系，历史的发展不再被认为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一个有规律可循的过程，这个历史过程不再是不可认知的，而是可知的。这就奠定了历史学成为科学的基础。这就决定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才能得出真理性认识，才能达到科学的境界。尽管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选择是多种多样的，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仍然是历史研究的正确选择。

另外还应值得注意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是不是就无条件的一定科学、客观？不是的，是有条件的。第一，要看用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来指导，是用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还是用与时俱进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用马克思经典作家的个别词、个别结论句以及用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就会脱离科学、客观，甚至远离科学、客观，“文革”时期的史学就是例证；第二，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与用任何科学的理论指导研究一样，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一个运用方式、方法、水平的问题，机械的教条主义式的运用，断章取义、张冠李戴式的运用，也会脱离科学、客观，甚至远离科学、客观；第三，同样都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研究，不同的人达到的水平是不同的，这与个体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理解、掌握的程度有关，与个体的理论素质、文化素质以至实践经验有关。所以同样都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研究，有的人的研究成果可能离科学、客观近些，而有的人的研究成果可能离科学、客观远些。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历史研究科学、客观与否，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而且科学、客观与否又往往与主观因素有关。客观与主观是辩证的关系，不能机械地、绝对地、片面地看问题。

2.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本内容

在百花齐放的探讨中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本内容有了新认识。

知识经济、市场经济、虚拟社会（网络社会）的发展，推动人们对社会、对历史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的认识不断发展，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也不断发展。在历史创造者、历史动力等问题火爆的讨论中，提出了很多新看法（详见《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论

---

① 田心铭：《评几种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观点——三论“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9期。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外来文化论”、马克思主义被“实践否定论”、马克思主义“非学术论”等进行了反驳。

争》、《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大讨论》等节），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动力论等等，已成为唯物史观的新内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唯物史观是发展的、与时俱进的，成为共识。张维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唯物史观提出的新课题》（《哲学动态》1993年第4期），陈季宁《浅议知识经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的新课题》（《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3期），魏小萍《唯物史观若干热点问题研究综述》（《哲学动态》1994年第9期），仲伟民等《新时期以来唯物史观理论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吕立峰《全国"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综述》（《现代哲学》2004年第2期），许殿才《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河北学刊》2007年第1期），张剑平《新时期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成就》（《河北学刊》2007年第1期），张越《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发展》（《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张旭鹏等《近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4月26日），侯云灏、曹守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就综述》（《学术研究》2008年第12期），张莉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解读"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陈峰《超越决定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大变革》（《东岳论丛》2009年第1期）等文中，对唯物史观的新认识有所介绍，可以参见。其中谈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取得很多成就，如：对唯物史观内涵和外延的新阐发；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取得较大突破；史学方法有了更新和多样化；对历史学功能有了新探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研究取得新进展。①

在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的基本内容的新探讨中，庞卓恒、吴英师生写了不少有深度、有新意的文章，如：庞卓恒《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论是发展史学理论的重要一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庞卓恒《从多样性探寻规律——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启示》（《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吴英等《历史决定论管窥——与李明华同志商榷》（《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4年第3期）、庞卓恒、吴英《什么是规律：当代科学哲学的一个难题》（《天津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庞卓恒《生产能力决定论》（《史学集刊》2000年第3期）等。以后又有：庞卓恒《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吴英《对马克思分工—阶级理论的再解读》（《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庞卓恒《真理、信念与历

① 侯云灏、曹守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就综述》，《学术研究》2008年第12期。

史研究——兼说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 年第 1 期)、吴英《对唯物史观几个基本概念的再认识》(《史学理论研究》2007 年第 4 期)、庞卓恒、吴英等《唯物史观及其指引的历史学的科学品格》(《历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庞卓恒《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四次论说及历史哲学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 期)等。其中对于规律、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阶级等都有新的认识。

此外,如王东等《现代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构想》也提出了一些新认识。文中先指出了以前唯物史观教科书的十个弱点:(1)比较注重生产关系的革命变革,而多少有些忽视生产力系统的内在矛盾和自我运动;(2)比较注重生产力中最基本的实体要素,而多少有些忽视科学技术、信息加工、科学管理、精神生产力等非实体要素;(3)比较注重生产资料的经济结构(所有制),而多少有些忽视生产资料的技术结构;(4)比较注重对社会各方面做出科学抽象,而多少有些忽视对社会有机体的整体考察;(5)比较注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多少有些忽视对文化、文明、价值等愈益重要的社会现象的考察;(6)比较注重物质生产,而多少有些忽视人自身的再生产和精神生产;(7)比较注重社会意识形态,而多少有些忽视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8)比较注重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和社会结构的考察,而多少有些忽视人的主体活动、实践活动、创造活动;(9)比较注重对社会的宏观考察,而多少有些忽视从微观角度分析人性、人的本质、人的个性、人的需要、人的个体行为规律;(10)比较注重社会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过渡时期的工作重心,而多少有些忽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任务,特别是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问题。然后谈了唯物史观内容的现代化:就是要对现代科技革命最新成果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新鲜经验做出哲学总结,在历史观的理论内容——原理、规律、范畴上进行全面的知识更新。如系统论等纵断科学,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肯定蕴涵着丰富的哲学结论,尤其是社会控制论,有可能为历史唯物主义增添一个新的方面——作为自组织系统的社会的控制和管理。马克思晚年写下的关于人类学的四篇笔记,看来有意于涉足这个新领域,而今天人类学、文化学、科学学、未来学众多学科的长足进展,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开拓了新的理论视野,远非马克思当年可比。某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理论中一个重大空白是人的心理问题。实际上马克思把重心放在劳动过程、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上,同时也初步剖析了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这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心理。但总的看来,他对心理问题研究得确实较少,因为直

到 19 世纪 70 年代心理学才形成一门独立科学，这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造成了马克思历史观的一个缺憾。而今天心理学已发展成一个成果累累的科学群，包括初具规模的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行为科学、创造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个性心理学、比较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我们完全有科学依据对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问题做出哲学概括，填补马克思历史观中的这个重要空白。这就需要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的原理、规律、范畴，来补充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而决不能仅限于把新的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科学成果作为个别实例，塞到旧体系、旧框架中，作为原有原理和范畴的解释和附注。提出：立足唯物史观的经典形态，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创造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①]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是有合理之处的。

以上的很多新认识，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前所没有的，也是不可想象的。有新认识的文章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②]

---

① 王东等：《现代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构想》，《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 年第 2 期。

② 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的新认识，还可参见胡素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几个问题的研究情况综述》（《教学与研究》1981 年第 3 期），胡素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问题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1982 年第 2 期），周溯源：《近几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概况》（上）（《青海社会科学》1985 年第 1 期），周溯源：《近几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概况》（下）（《青海社会科学》1985 年第 3 期），李唤等：《1986 年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讨论概述》（《教学与研究》1987 年第 3 期），周积泉：《十年唯物史观发展的反思》（《学术月刊》1988 年第 12 期），李澄等：《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晋阳学刊》1989 年第 1 期），黄可人等《建立唯物史观新范式》（《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 年第 5 期），郭晓晖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种理解》（《甘肃理论学刊》1991 年第 5 期），刘福森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92 年第 3 期），何中华：《马克思唯物史观新诠》（《山东大学学报》1993 年第 2 期），瞿林东：《历史理论领域研究的重大成就》（《中州学刊》2000 年第 1 期），刘曙光：《完整准确把握唯物史观的出发点》（《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 年第 4 期），王孝哲：《社会历史规律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创造的吗？》（《江汉论坛》2000 年第 9 期），等等。以后还有覃正爱：《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及其体系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广东社会科学》2001 年第 1 期），拥军等：《如何看待"历史"——兼论唯物史观的历史维度》（《复旦学报》2001 年第 2 期），毛豪明等：《论唯物史观的三大基本特征》（《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1 期），张立达：《评蒋大椿和吴英、庞卓恒围绕唯物史观的理论争鸣》（《史学月刊》2003 年第 3 期），方卫兵：《唯物史观的历史发展与当代创新》（《理论月刊》2004 年第 1 期），张世满：《马克思恩格斯农奴制理论的再认识》（《史学理论研究》2006 年第 3 期），郭艳君：《论唯物史观研究的微观维度及其当代意义》（《史学理论研究》2007 年第 2 期），陈胜云：《马克思历史叙事真实语境的当代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 年第 3 期），刘连强：《论马克思的历史性解释原则》（《学习与探索》2007 年第 3 期），王桂泉：《唯物史观的当代走向》（《党政干部学刊》2007 年第 12 期），李福麟：《当前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中的三个重大议题》（《理论学习与探索》2008 年第 1 期），王德峰：《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祛蔽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 1 期），赵绥生：《唯物史观理论体系逻辑起点问题研究综述》（《西安欧亚学院学报》2008 年第 2 期），吴英：《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近三十年探讨的回顾和展望》（《历史研究》2008 年第 6 期），张成诗：《对后唯物史观及其脉络的思索和探寻》（《长白学刊》2009 年第 3 期），赵景来：《全球化与唯物史观研究范式若干问题讨论综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 年第 1 期），冯景源：《唯物史观研究需要摆脱单一文本解读的模式——探寻唯物史观"原生态"的方法论原则》（《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 期），等等。

3. 如何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

如何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学者们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①

张艳国提出，要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优良学风和传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工作，真正在中国特色与中国流派上下功夫。②

吴英提出，今后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似应从两方面着力。一是正本清源，即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解读，着重从理论体系上对唯物史观的诸原理做到准确地理解与阐释。二是与时俱进，结合国内国际出现的新现象、新形势、新问题，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做出有说服力的解析，以丰富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并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③

桑新民指出，唯物史观要现代化，不仅要挖掘和吸收新概念范畴，更主要的是要给原来的范畴、原理注入时代精神，使之与现代生产、科学、社会的发展进程合拍、同步。④

陈峰提出，要在史学本身寻找问题，也要共享文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邻近学科的问题，最大程度地开放和扩散思路。……总之，要多方位、多角度地获取问题资源，应尽力避免将马克思主义史学孤立起来。……只有转换问题视野，在问题的刺激下穷研史料，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才有可能从描述走向分析，从空疏走向缜密，取得实质性突破。⑤

瞿林东提出，要坚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创新。要把唯物史观同研究对象结

---

① 关于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还可参见朱佳木：《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几个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9 年第 4 期；陈忠平：《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建立中国历史哲学》，《社会科学辑刊》1987 年第 5 期；尚劝余：《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宝鸡师院学报》1988 年第 2 期；张维久：《关于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问题》，《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86 年第 2 期；张雄：《历史唯物主义面向未来的发展趋势》，《江苏社联通讯》1987 年第 4 期；卢海峰：《唯物史观与后现代主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2 期；张艳国：《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再发展：继承与创新》，《社会科学辑刊》2000 年第 1 期；叶汝贤：《唯物史观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 年第 3 期；于沛：《关于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新形态的思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 年第 4 期；田鹏颖：《唯物史观的理论前设及其启示——兼论将实践哲学原则进行到底》，《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 年第 1 期；于沛：《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史学理论研究》2009 年第 3 期；何萍：《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转换》，《学习与探索》2009 年第 5 期，等等。

② 张艳国：《新世纪我们依然肩负着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任》，《求是杂志》2000 年第 11 期。

③ 吴英：《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 60 年》，《史学理论研究》2009 年第 4 期。

④ 桑新民：《唯物史观现代化的几点思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 年第 1 期。

⑤ 陈峰：《学术视野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山东社会科学》2006 年第 8 期。

合起来，从研究对象中概括出新的理论认识。这种新认识，不只是对唯物史观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①运用唯物史观，要有气度，要有吸收那些有益的理论和方法的雅量与勇气。②

吴怀祺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吸收中外文化中的精华，不断发展自己，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担当起指导新时期史学发展的重任。从考据风到方法论热、西方史学理论介绍热以及国学热、文化热等等，在各种思潮中，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吸收新的东西发展自己、回答新问题。③

有的学者强调了要学习、借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当代西方史学的优秀成果。

程汉大指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指导的前提下，注重吸取其他史学流派的营养，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理论特征：一、反对自我封闭，坚持开放式研究；二、坚持“自下往上看的史学”研究视角；三、提倡总体史观，注重宏观分析；四、鲜明的反教条主义倾向，勇于创新的理论探索精神。④

这些显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应该借鉴的。这方面的文章在 2000 年以后还有很多，如：张文涛《E.P.汤普森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2006 年第 2 期），王立端《二战后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特点》（《史学理论研究》2007 年第 1 期），王加丰《20 世纪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7 年第 2 期），梁民愫《霍布斯鲍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史学理论研究》2007 年第 2 期），陈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片述》（《史学理论研究》2007 年第 2 期），沈坚《法国新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7 年第 2 期），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概况及对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启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 年第 1 期），鲁克俭《近年来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思想史梳理》（《教学与研究》2008 年第 7 期），张广智《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意义与特征》（《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 10 期），等等。张广智呼吁，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研究，尽早编写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倘若不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还谈什么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还谈什么守护

---

① 瞿林东：《坚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创新》，《求是杂志》2000 年第 11 期。

② 瞿林东：《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南开学报》2002 年第 2 期。

③ 许殿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地位学术讨论会纪要》，《史学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

④ 程汉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理论特征》，《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2 期。

与拓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学中的主导地位，开掘与深化更成了一句空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已有十多种，《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没有一部，实在汗颜。①

对现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张广智强调：要积极引进，消化吸收，以求“洋为中用”。②于沛也强调：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将对外国史学及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介绍和研究，紧紧地同中国史学的建设联在一起。③

总之，如有的学者说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向前发展，一定要继承和超越。不继承是不行的，不超越也是不对的。不超越，怎么发展呢？我们在理论上通过思想解放，摆脱了教条、僵化的束缚，吸收百家之长；在整理史料、在集体攻关上能使用现代科学技术，有正确的理论、方法论，有良好的学风，是能超越的。④

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需要继承，需要学习、借鉴，更需要创新。只有不断创新，不断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之树才能常青，才能增强指导能力，增强影响力，才能应对、战胜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1999年有学者谈道：“在当下中国的学术格局与语境中，唯物史观派史学已从学坛上的强势者沦变为弱势者，正在承受来自民间话语的冷落与排斥。”⑤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不是已“沦变为弱势者”，还可以研究，但这无疑给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的发展敲响了警钟，也提醒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工程的展开，正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措施。

马克思主义史学工程建设，不仅要下大力气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写出有说服力、征服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更要有一批、一大批人实实在在、踏踏实实地用科学的理论指导沉下去做实证研究，在具体历史研究中不断创新，拿出原创性的、学术价值高的、能传世的史学成果，即拿出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涌现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研究学术实力、学术权威性。史著、史家是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水平的两个重要载体，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在史学界、在全社会的印象如何、影响如何，归根到底就看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面貌如何。

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的认识和探讨不断发展，将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史

① 张广智：《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中的几个问题》，《复旦学报》2005年第5期。
② 张广智：《西方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州学刊》2000年第1期。
③ 于沛：《西方史学的传入和回响》，《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
④ 张磊：《马克思主义史学要继承也要超越》，《求是杂志》2000年第11期。
⑤ 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页。

学及其理论创新、发展，也将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和史学大师的涌现。

二、史学理论研究走向独立发展

史学理论是研究、诠释、论述史学的理论问题的，如要回答：什么是“史学”？史学是怎么产生发展的？史学有什么功能作用？史学研究的目的任务是什么？怎么进行史学研究？等等。史学理论是史学实践、历史研究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提炼，是史学自我反省、反思和自我认识的理论产物。一般地说，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其中包括“史学”发展的基本理论，但与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史学”发展史及其基本理论问题不同，与历史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历史（发展）基本理论问题也不同。史学理论也研究史学史研究中涉及的史学基本理论问题，也研究历史研究中涉及的史学基本理论问题，如史学史研究、历史研究的经验教训、研究的规律、研究的立场、研究的思想理论、研究的方法手段等，又如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史学史，等等①。

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已有一些重要成果，如唐刘知幾《史通》、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等，阐述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史学理论，对推动中国古代社会的史学发展发挥过一定的作用。降至中国近现代，尤其是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更多。20世纪初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1年）、《新史学》（1902年），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梁启超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等，阐述了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对20世纪前半期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发展，发挥过一定的作用。而李大钊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发展发挥过一定的作用。翦伯赞1938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长沙新知书店1938年版），也是阐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要著作。此外还有朱谦之《历史哲学》（泰东图书局1926年版）、《历史哲学大纲》（上海民智书局1933年版），柳诒徵《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吴贯因《史学概论》（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卢绍稷《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

① 陈启能、瞿林东曾对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概念和研究内容进行过专门辨析可以参见，详见陈启能：《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光明日报》1986年12月3日；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版)，胡哲敷《史学概论》(上海中华书局 1935 年版)，李则刚《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重庆独立出版社 1943 年版，为 1919—1920 年间在北大史学系开设"史学概论"课的讲义)等十余种。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各种派别的理论互相竞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史学领域"一统天下"，一方面没有什么别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竞争，另一方面史学理论被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被视为是史学理论的全部。直到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外国当代的史学理论涌入中国，影响中国的史学界，形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主导、各派史学理论互相竞争的格局。史学理论的自觉意识(独立意识)也被唤醒，史学理论走向独立发展，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以下分两个阶段述之。

(一)"被替代"(1949.10—1978.12)

从 1949 年 10 月到 1978 年 12 月，可以分三个阶段来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 17 年；"文革"时期；"文革"后两年。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17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这对于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的崭新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即史学理论被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被视为是史学理论的全部。这与当时苏联的影响密切相关，各行各业都学习苏联"老大哥"，历史学也学苏联。当时中国的一些学者发表文章强调：苏联历史科学的成就是异常重大和惊人的，是我们应当努力学习的典范，一定要坚决地、诚恳地向苏联历史科学学习。[①]学习苏联的一个具体体现是大量翻译、出版苏联的书，翻译发表苏联的文章。如《历史教学》1953 年第 1 期、第 2 期连载了苏联《历史问题》杂志 1952 年 7 月号发表的社论《历史唯物论是历史科学的理论基础》，这篇社论的观点以后发生了这样的演化：历史唯物论是历史科学的理论基础→历史唯物论是历史科学的理论→历史唯物论是历史科学的全部理论。因为当时宣传

① 郑天挺：《坚决地诚恳地向苏联历史科学学习——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历史教学》1957 年第 11 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历史学学习苏联的情况还可以参见黄元起：《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照耀下中国历史科学的诞生与发展》，《史学月刊》1957 年第 11 期；刘绍孟：《迎接伟大的 1958 年，争取在历史科学战线上获得更大的成绩和胜利》，《史学月刊》1958 年第 1 期。

“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历史上万能的、最正确的、十分完备而严整的科学”。[1]于是研究史学理论只要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就可以了,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研究史学理论。于是《史学概论》不再出版,从 1950—1980 年中国大陆没有一本《史学概论》的书出版(台湾有出版,如徐文珊《中国史学概论》,台北:维新书局 1967 年版),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类的书出版,如:吴黎平、艾思奇《科学历史观教程》(北京三联书店 1950 年版),河南大学编印《历史唯物主义与革命人生观》(1950 年印,河南大学预科教材),胡绳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学习杂志社 1951 年版,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第 2 版,《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第一册),龚敏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上海:新人出版社 1952 年第 2 版),北京政治学院编印《历史唯物主义讲授纲要:初稿》(1953 年印),北京广播函授学校政治教研组编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讲授提纲:初稿》(1956 年印),东北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编印《历史唯物主义纲要》(1956 年印),中共中央第五中级党校哲学教研室《历史唯物主义教学提纲》(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黎明《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 1956 年版),艾思奇《历史唯物主义报告摘要》(四川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钱仲宜等《历史唯物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孙叔平《历史唯物主义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1959 年第 2 版、1961 年第 3 版),南宁市高等院校编印《历史唯物主义辅导教材》(1974 年印),等等。类似的书还有不少,此外翻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也不少。相应的,一些学校的历史系也不开《史学概论》的课了,如果开也是讲“历史唯物主义”,有的学校开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课。白寿彝曾谈道:“在 50 年代,同志们在一起谈天,提起史学概论来,都认为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写这么一本书;同时也认为,在高等学校历史系应该开设这门课程。至于这本书应该怎么写,这门课程应该讲些什么,大家一时想不出办法来。一年一年过去了,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认真讨论过。后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开了这门课程,主要讲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我并不认为这种讲法是对的。因为我觉得,如果只讲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就应该叫历史唯物主义,不应该叫史学概论。我为这个课程内容问题,多年来一直感到不安。”[2]这说明: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开设《史学概论》课,后来开了也是讲“历史唯物主义”。

---

① 郑天挺:《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纪念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七十周年》,《历史教学》1953 年第 5 期。

②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题记》第 1 页。

1960 年，上海高校历史协作组计划编写《史学概论》教材，[①]但最终没有编写出来。黎澍也开始编写《史学概论》，但也没写成。[②]原因都可想而知。1965 年，山东大学历史系编写过一个《史学概论教学大纲》，其主要的内容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二、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讨论过《史学概论》怎么写。为什么不讨论呢？显然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代替了《史学概论》，所以就不去讨论了。

《史学概论》的书不出了，《史学概论》的课不上了，是不是史学理论研究就停止了呢？不是的。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学习、普及，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下，历史理论研究有了大发展，开出了“五朵金花”，即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还有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等问题的研究也有很大进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下，史学理论研究虽然不是全面展开，但也对一些史学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关于史学研究的对象、任务，有一些文章发表，尤其是史学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研究有所展开，如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问题、史论关系问题、历史研究的“今”“古”关系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发表文章很多，并出版了书。出版的书有：

陈旭麓《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1955 年版），是报刊上发表的三篇文章修改汇总后的集子。三篇文章是《评价历史人物与历史教学》、《论历史人物及其阶级》、《评价历史人物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基本是研究史学理论问题的。

嵇文甫《关于历史评价及其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是八篇讲演、报告、文章汇总的集子。其中《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关于历史评价中的几个矛盾问题》、《关于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历史教育与爱国思想》、《怎样对待文化遗产》、《胡適唯心论观点在史学中的流毒》等，是探讨史学理论问题。《对一些历史问题应该怎样看》，则是探讨历史理论问题的。

嵇文甫《学习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存稿》（河南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也是一本论文集，其中《学习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问

① 详见周恒：《发挥集体力量　提高教学水平　上海高校教师进一步加强协作》，《文汇报》1960 年 12 月 10 日第 2 版。

② 详见罗思鼎：《评“文科教材”》，《文汇报》1966 年 8 月 12 日第 3 版。黎澍编写《史学概论》没有完成也遭批判。

题》、《在历史研究中深刻地贯彻阶级斗争观点》、《在历史研究中抓特点、抓新东西》等与史学理论有关，而《谈判·武器·人民群众——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一点体会》、《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读〈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与史学理论关系不大。

崔士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吉林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是一本论著，分五个部分：一、什么是阶级；二、在阶级社会中各种社会现象是有阶级性的；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四、过渡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五、阶级分析方法。是一本政治理论读物，也是一本史学理论读物。有的书则完全是政治理论读物，如敢峰等《谈谈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中国青年出版社1965年版)，是《青年修养通讯》中的一种。回答了农村青年关心的现实中的17个问题。如《看人对事可以不讲阶级立场吗?》、《在阶级斗争中怎样擦亮眼睛?》、《村里没有地主富农，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吗?》、《怎样对待地富家庭出身的青年?》等。

关于讨论或涉及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文章还是有一些，如奚原《历史科学研究必须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学术月刊》1958年第5期)比较多地探讨了史学理论问题，当然也反映了当时政治形势的气息。文章一开始说："历史科学研究往何处去？走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老路，还是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呢？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抱残守缺，还是挺胸前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呢？对这个根本方向问题，不少史学工作者并没有真正解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近一个多月来，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的全体人员展开了一场步步深入的大争辩。争辩的中心便是：历史科学研究能否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怎样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很自然地涉及到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一、历史科学研究的目的性；二、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三、资料与观点、史料学与历史学；四、个人名利与集体主义；五、如何有效地保证历史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等。经过争辩，大家体会到：每一个来自旧史学界或在资本主义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史学工作者，如果不从思想深处解决上述根本问题，彻底进行破资立无的两条道路斗争，严肃地进行自我思想改造，就无法跟上整个社会主义大跃进形势的需要，自己则有停滞不前甚至成为时代渣滓的危险"。①这里谈到的讨论的五个问题，其中一、二、三、五是史学理论问题，其中的第四个问题，也与史学理论相关，是史家修养问题。文章便就这五个问题进行了论述(以下所引均见

① 奚原：《历史科学研究必须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学术月刊》1958年第5期。以下的引文，均见此文。

此文）。

关于历史科学研究的目的，文章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史学目的论，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史学目的论：有些史学工作者“认为历史学的目的就是考订史料和补前人史考的空白，似乎不一定需要马克思主义，也不一定联系当前实际；或认为把史料排比排比，写成著作，就算是摆出了人类社会之演进，找出了事物的因果关系，足为现代人之资鉴了；也有认为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大量的史料，史学的目的仅在于把它们整理出来传之后代；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属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意义、范围和目的的论见”。“我们所要建设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这门科学的根本目的是要研究一定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用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这个鲜明的目标，应该成为每一个历史科学工作者的奋斗方向”。还指出：“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服务，是否会由于阶级成见和政治意图，而损害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呢？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要永远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因而它不仅是为了解放自己，也为了解放全人类，它没有任何自私的偏见，最忠实于真理，最忠实于客观历史发展规律，因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革命性、党性和科学性是完全一致的。相反的，正是一切剥削阶级和反动统治者，即使他们不敢公开宣称利用历史学为自己的罪恶统治服务，实际上他们是以阶级的偏见在歪曲历史和利用史学，这是非常明显的！”还指出：“有人怀疑，历史终究是研究过去的事，如何为现在服务；或认为有些项目可以作用于现实，有些则不可以。这些看法是不妥当的。”这里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根本目的是要研究一定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用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这有正确之处，但不一定很全面。说研究史料，就是资产阶级的，说一切剥削阶级都以阶级的偏见在歪曲历史和利用史学，这也是不全面的。认为一切历史研究都要为现实服务，这也是不全面、不客观的。

关于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1958 年 3 月 10 日，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得到史学界的热烈响应，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吴晗、刘大年等人都发表文章，表示赞同。对史学研究来说，如果“厚今薄古”提倡多研究点近现代史，多研究点现实问题，这是可以的，这应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当时一股风地强调：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兴无灭资或兴资灭无两条道路的斗争”，[①]这样就把厚今薄古当作一个政治原则，把厚今薄古

---

① 详见《文汇报》1958 年 4 月 8 日第 1 版发表的报道《历史学家必须厚今薄古　范文澜指出这是兴无灭资或兴资灭无两条道路的斗争》。

与厚古薄今与否的问题当作政治斗争来看，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没有学术讨论的余地了。[①]这显然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了，是不利于学术发展的。

关于资料与观点、史料学与历史学问题，文章谈道："史料考证工作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一部分，史料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这是应该肯定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许多史学家，他们继承清代乾嘉以来汉学家们的考证学，吸收欧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考证方法，作出了一些成绩，他们的有益的经验是应该重视和发扬的。但这决不是说资产阶级的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可以完全等同起来，两者是有区别的。例如，……资产阶级史学家往往是形而上学的看问题，片面地所谓忠实于史料，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完全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鉴别和判断史料的价值。有人说：'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不行，还是搞点史料考证吧！'这种想法是行不通的，搞史料考证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因为史料考证是为历史研究服务的，今天要用旧的史料考证学来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服务，显然是不能适应了。"这里肯定资产阶级的许多史学家的考证成绩、有益的经验，是客观的。但认为旧史料考证学不能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服务，似乎是不够客观的。

文章说："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占有大量资料的统一。"这是合理的。但文章在批评了夸大史料考证作用的各种说法后说："所有这些对史料学的夸大，都阻碍了历史科学的进展。多数旧史学家并不明白地说出自己的这种主张，只有傅斯年之流才公开宣传'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史学便是史料学'，危害更大。去年史学界的右派分子也正是利用这一点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无耻进攻。"又说："要使历史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每一个史学工作者都必须从史学观点和史学方法论上，展开破资立无的两条道路斗争。"这里又有政治感情色彩了，又把史料学与历史学问题政治化了。

关于如何有效地保证历史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文章强调要加强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科学研究的领导，"唯有加强和巩固党的领导权，旧史学才

---

① 关于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的问题，当时基本上一面倒地认为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政治斗争。如余子道等：《历史科学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复旦》1960 年第 1 期)强调，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的斗争，其本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历史科学中的反映"。通过这场斗争，"使历史科学中巩固地树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进一步解决了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给历史科学的大跃进创造了有利的形势"。强调"坚持政治挂帅，贯彻两条道路斗争"，"创造出新的历史科学的大学问"。

能改造，新史学才能发展，历史科学才能完全成为无产阶级手中的战斗工具”。

关于个人名利与集体主义问题，文章说：“我们提倡个人独立思考和独创精神，但必须和集体力量、群众智慧相结合。”这是正确的。又说：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是资产阶级坏思想，“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处处与科学研究、与国家规划、与集体主义发生矛盾，危害极大”。“克服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更是扫除历史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各种障碍中的最根本的一个”。这是当时坚持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大锅饭”体制的反映。所谓“破私立公”扩展到了一切领域，在当时个人奋斗被视为“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作怪，是“资产阶级坏思想”。这实际上忽视了个人的独立人格，乃至人权，是不利于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是不利于学术发展的。

这篇文章论述的史学理论的五个问题，是当时社会中较重要的问题，所以没有涉及其他史学理论问题，自然是因为其他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并非是当务之急。这篇文章是当时集中论述史学理论问题的重要文章，但其论述是有局限性的。

稍后，徐嗣山《历史科学的对象与任务》（《江苏师院学报》1962 年第 5 期），研究了史学理论的重要问题——史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问题，这是当时不多见的一篇史学理论专论，而且尽管难免有当时的政治气息，但学术色彩还是很浓的。文章首先指出：“为了说明历史科学的对象与任务，第一，要说明历史科学的特性；第二，要说明历史科学和邻近科学的区别与联系。”[①]文章便是从这两个方面展开了论述。

关于历史科学的特性，文章指出：“历史科学的特性是把社会历史的发展理解为合乎规律的客观过程，是概括历史材料、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科学。”因此，“历史科学的对象就是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则是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能否说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性，是衡量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客观标准”。这里对历史学及其研究对象、任务的论述，还不够全面。把“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只作为历史学的研究任务，而不作为研究对象，这样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既是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也包括研究其中的发展规律、经验教训等等。同时，认为历史学的研究任务只是“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而没有其他任务，显然也是不全面

① 徐嗣山：《历史科学的对象与任务》，《江苏师院学报》1962 年第 5 期。以下引文均见此。

的。什么是社会发展规律呢？文章说："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认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决定性条件是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的发展过程和决定这一过程的经济关系的发展过程。这就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里把阶级斗争放在社会历史发展决定作用、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首位，显然是受到当时阶级斗争形势、"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影响，这样的认识无疑是有局限性的。

关于历史科学和邻近科学的区别与联系，文章谈到了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与政治经济学、与文学艺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与联系。在谈历史科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与联系时，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历史科学则是研究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的社会关系的全部综合的发展过程，及其客观规律性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历史过程的指南，……却不能代替对历史发展具体过程的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科学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没有理论概括的历史和没有事实根据的理论，都不能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和发展方向。……不论以史代论也好，或以论代史也好，都是没有把史料和观点结合起来成为有机的统一体，都不能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观点与史料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观点不能脱离史料，史料也不能脱离观点。观点和史料必须结合起来。我们研究历史既要详细占有史料把握事实的总和，又要有正确的理论的指导"。以上的论述，粗看起来还是有点辩证的，没有大问题，只是"观点不能脱离史料，史料也不能脱离观点"的说法还值得研究。文章以下的论述就出现了问题，说："历史唯物主义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认识论来武装历史科学，使它对历史过程作出客观的解释，并且帮助它在科学研究中体现党性原则。历史科学则通过对社会历史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的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来补充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这里说"历史唯物主义"要"帮助""历史科学""在科学研究中体现党性原则"等，是有失合理的。历史科学研究的目的、任务是要"体现党性原则"吗？是要"提供丰富的材料来补充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吗？显然是不能这么说的。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为历史学的政治化、为历史学的"注经式"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关于历史科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文章指出："历史科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同的地方，是历史的研究方法和逻辑的研究方法的不同"。"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都是把历史过程反映出来的科学方法。它们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的不同表现"。"这两种方法的差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不是各不相干，而是相互补

究的。所以，在历史研究中，必须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和联系的原理”。“历史科学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它不是从理论形式而是从历史事实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中来找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性的”。这里讲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文章只探讨了历史科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和联系，没有探讨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当时，没有一篇文章探讨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因为史学理论被历史唯物主义取代了。

这篇文章的政治色彩或者说党性原则也是有一些反映的，文章强调了“鲜明的党性必须贯彻在对历史事实的具体分析中”。历史科学“要发挥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战斗作用”。但总的来说，这是一篇从学术上探讨史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问题的文章，从学术上来看，文章中有些概念的运用还不够准确或不够明确，有些认识还不全面、不深入。反映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下的史学理论研究还是起步阶段。

萧萐父《历史科学的对象问题——冯友兰先生的史学思想商兑之一》（《哲学研究》1964 年第 3 期），也研究了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研究对象问题。文章在概念的运用上，已较徐嗣山文章更准确些。文章认为冯友兰提出的哲学研究一般、史学研究个别，否认了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发展规律，否认了观点与资料的统一。指出：资产阶级旧史学，始终弄不清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它不是把历史个体化，就是把历史公式化；不是用史料学顶替历史学，就是把历史学屈从于历史哲学。文章强调了一般规律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文中也探讨了历史学与历史唯物论的区别与联系。指出：历史学区别于历史唯物论，有其本身在方法论上的特点，这就是区别于逻辑方法的历史方法。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伟大贡献，正是基于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把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看作是对立统一的，二者不可分割。逻辑的方法，也就是历史的方法，不过摆脱了一定范围内的具有偶然性的历史形式；历史方法，也决不能脱离逻辑方法，不过是通过历史形式来揭示一定范围内的历史进程的客观逻辑。如果把历史科学的具体性理解为拒绝科学抽象、排斥研究规律，理解为经验主义的现象罗列，那就大错特错了。以上的论述，与徐嗣山文章的论述是差不多的，或者说雷同。而以下的论述是徐嗣山文章中没有的。文章指出：从总体上说，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综合人类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历史的具体研究所达到的“由特殊到一般”的最伟大的科学成果。有了历史唯物论之后，历史的科学研究，只能沿着“由一般到特殊”这一辩证认识的途径把历史唯物论的普遍真

理与历史研究的具体对象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历史研究才能成为科学；而科学的历史研究在其特殊领域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具体化也就必然对这些原理有所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学的关系，决不如冯先生所说是一个讲规律、一个讲个体，各不相涉；虽有历史唯物论作"方法与指南"，历史研究仍不能成为科学；历史研究对历史唯物论不必有所"补充"、发展，我们不能同意冯先生这些观点。我们认为，历史唯物论与历史学的真正区别，在于它们是对人类历史的本质的认识的两个不同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这是以认识整个社会历史的共同本质为目的；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过程，这是从认识某一历史现象的特殊本质以及这种特殊本质与共同本质的互相联结为目的。两者的本质联系，也就在于这两个认识过程在本质上是互相联结、不可分割的。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现在和未来都仍然在继续综合现实和历史研究的新的科学成果中而不断地丰富着和发展着；同时，在历史唯物论指导之下的各种具体历史科学继续深入研究着人类历史各个方面的特殊本质、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从而也必然不断地加深和丰富着关于人类历史的共同本质、普遍矛盾和一般规律的认识。[①]这里讲历史学与历史唯物论的区别与联系，已较徐嗣山文章有所"发展"，但这个"发展"似乎是发展了局限性。文章强调的历史研究只能是"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过程，"有了历史唯物论之后，历史的科学研究，只能沿着'由一般到特殊'这一辩证认识的途径把历史唯物论的普遍真理与历史研究的具体对象结合起来"，历史研究就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具体化"，即历史研究只能是"以论带史"，而不能是"论从史出"，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衷尔钜《历史科学的任务和古为今用——与冯友兰先生商榷》(《哲学研究》1963年第5期)，探讨了史学研究的任务。文章批判了冯友兰"历史学的任务，就是扩大对于过去人类社会的认识"。指出：冯的说法"是一种没有目的性的研究"，是片面的、错误的。强调：毛泽东说的"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科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

关于史学方法论讨论的文章也有一些。如东方明《加强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和讨论》(《红旗》1964年第5期)，首先强调了史学方法论研究的重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工作中的运用。我国

---

① 萧萐父：《历史科学的对象问题——冯友兰先生的史学思想商兑之一》，《哲学研究》1964年第3期。

大多数史学工作者都承认只有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才能使历史的研究成为科学。但我们的史学界对于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和讨论还是注意不够的。结合我们历史研究工作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系统地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也做得不够，不仅没有这方面的专著，这方面的论文也很少。关于史学方法论的讨论，也是比较少的。看来，加强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和讨论，是提高我们历史研究工作的质量，提高我们史学工作队伍的一个关键。[①]接着，文章就史学方法论的两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论述。第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指导的重要性。文章指出：没有一定的方法论作指导的史学家，实际上是没有的。在历史研究工作中，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就是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作指导。所以，立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破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论，是非常重要的。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如果轻视理论思维，忽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作用，不仅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连两件事实"也联系不起来"，而且还会误信歪曲事实的史料，被剥削阶级的偏见俘虏。这就是说，在阶级性很强的历史科学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作用更加重要。文章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在历史领域的大海里航行的指南针，如果没有这个指南针，就不可避免地要迷失方向，花多大力气也不能达到目的地。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既要努力发掘史料，更要努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的分析史料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结论，是从客观材料引出来的事物固有的规律；结论既经得出，如马克思所说，它就变成了指南。对于历史研究工作说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是我们向着尚未研究或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历史领域进行研究的唯一科学武器。有了这个武器，我们才能正确地分析史料，并且能够具有对于史料的敏感，抓住重要的关键性的东西，而不致使自己淹没在史料文献的汪洋大海之中。这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的重要，有合理性，但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结论"都是历史研究的"指南"，这就不合理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是会过时的。第二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重要性。文章认为，在方法论的讨论中"需要着重探讨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如何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强调：历史研究工作的实际证明：对于历史事件做出科学或比较科学的说明的，都是正确地或比较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而历史

① 东方明：《加强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和讨论》，《红旗》1964年第5期，《人民日报》1964年3月28日。以下引文均见此。

研究工作中的方向性的错误，则无一不是这样或那样地背离了阶级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或历史方法，就是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中来考察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在分析社会历史问题时，“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语），这就是说，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阶级斗争环境，从当时的阶级对立及其演进中进行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绝不是与阶级观点对立的。历史研究工作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是这样或那样地违背了阶级观点的结果，而不是由于强调了阶级观点。正确地运用阶级观点，不会产生非历史主义倾向。这里实际上肯定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是万能的、绝对正确的历史研究方法。然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即便在阶级社会中，也有一些现象、事件是没有阶级性的。

巩绍英《站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高峰——略谈学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历史教学》1963 年第 10 期），也探讨了史学方法论的一些问题。也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指导的重要性，说：“只有站在先进的革命的立场，从历史科学的‘绝顶’上面，纵览全局，看清楚全部历史的来龙去脉，即规律性：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展开真正的调查研究工作。这样调查得来的材料，才是真正的实际，而不是在阶级的偏见或传统成见下面掩蔽、歪曲了的实际。从这样的实际出发，经过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才能构成客观真理认识中的一个阶梯，对于改造世界的伟大任务有积极的意义。那些抱着一尘不染、超然物外的客观主义态度的人，尽管辛辛苦苦，却很难摸索到真理的边缘。……如果为考据而考据，自居于马克思主义营垒之外，作壁上观，而且是舍本逐末、支离破碎，怎能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混为一谈呢？”[①]同时强调：“学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一个支流。”这样就把学术探讨阶级斗争化、政治化了。

有的文章强调：“要从社会现象中，透过表面的现象把握住深藏在内部的本质，就得依靠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这个分析方法的核心就是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改造社会的重要武器”。[②]

---

① 巩绍英：《站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高峰——略谈学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历史教学》1963 年第 10 期。以下引文均见此。

② 王日东：《关于阶级分析方法——学习札记》，《人民日报》1962 年 11 月 29 日。

有的文章强调了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历史的根本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历史的唯一科学方法”。①

《学术研究》1963 年第 2、第 3 期开辟专栏进行了学术研究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发表了十余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文章认为：“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对于进一步提高学术研究水平有重大关系。”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学术的唯一方法”。“从事历史研究，如果脱离了阶级分析方法，是无法得出全面的、正确的结论的”。②

关于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讨论，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讨论，也涉及了方法论。

从以上列举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史学理论研究，在研究对象、任务上比较强调研究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方法论上比较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强调理论、观点的重要，强调阶级分析方法的重要。强调：资料是非主要的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学习理论③。要反对“厚资料而薄理论”的倾向④。于是“以论带史”占了上风。一些主张“论从史出”的史学家遭到批判。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戚本禹等人，把“论从史出”的口号打成“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⑤。

当时对史学（历史科学）的认识还有两个重要的看法：史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史学是政治的工具。换言之，史学要为阶级斗争服务，要为政治服务。

《历史教学》1956 年第 6 期发表的社论《向历史科学进军》谈道：历史科学是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在祖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的今天，历史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战线上对于发扬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用社会发展的规律知识武装人民以及对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前途教育这些方面，将要发挥极为重大的作用。⑥这里涉及了历史学的作用，并且从当时社会、形势出发作了解读。这里没有从阶级斗争理论去解读历史科学，是中共“八大”精神的体现。1956 年中共“八大”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

---

① 钟师宁：《阶级分析是研究历史的根本方法》，《哲学研究》1963 年第 3 期。

② 民：《〈学术研究〉杂志关于学术研究方法论的讨论》，《哲学研究》1963 年第 3 期。

③ 郭晓棠：《一个迫切的建议——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理论》，《史学月刊》1964 年第 7 期。

④ 翦伯赞：《兴无灭资，发展历史科学》，《人民日报》1958 年 3 月 18 日。

⑤ 详见张剑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 2003 年版。

⑥ 社论《向历史科学进军》，《历史教学》1956 年第 6 期。

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为此，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57 年“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看法发生变化。1957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①]此后，直到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解读历史科学成为主流。如 1959 年发表的刘尧庭等《从思想战线斗争看十年来历史科学的发展》就指出：“历史科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主要是研究阶级斗争的科学，为阶级斗争服务的。由于他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科学，所以历史科学本身的发展也是和阶级斗争分不开的，如果不能在思想战线上击溃各式各样的反动敌人，科学的历史就不能夺取阵地得到发展。只有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者，他们才以阶级的偏见，怕说阶级斗争；他们的目的在于模糊阶级斗争，因而提出虚伪的、超阶级的、脱离政治的、为学术而学术的骗人口号。”[②]这里完全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解读历史科学，完全把历史科学政治化，否认其学术性。有的文章说历史科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③]有的文章说：“历史学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工具。”[④]有的文章说：“历史研究是阶级斗争思想斗争反映最尖锐的场所。”[⑤]这表明，在“左”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史学理论研究与整个史学研究一样，“左”的色彩日趋浓厚，片面地、极端化地看问题（思维方式）日趋严重。

与强调史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相联系的是，强调史学是政治的工具，强调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日益被突出。在 1957 年开展“反右派”运动以后，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完全被放在了第一位，政治活动（生活）中是这样，社会活动（生活）、经济活动（生活）、文化活动（生活）也是这样。1958 年 1

---

①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95 页。

② 刘尧庭等：《从思想战线斗争看十年来历史科学的发展》，《史学月刊》1959 年第 10 期。

③ 如敏：《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座谈如何在历史科学工作中贯彻毛泽东思想问题》，《安徽史学》1960 年第 3 期。

④ 衷尔钜：《历史科学的任务和古为今用——与冯友兰先生商榷》，《哲学研究》1963 年第 5 期。

⑤ 余子道等：《历史科学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复旦》1960 年第 1 期。

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错误倾向,反对空头政治家(名红实白)和迷失方向的经济家这样两种人”。“思想、政治是统帅”。[①]1958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政治挂帅是勤俭办企业的保证》的社论,此后“政治挂帅”成为中国共产党全党、中国全社会的口号,“政治挂帅”成为各行各业的头等大事。史学界自然也要“政治挂帅”。有的文章在批判尚钺时就强调,“尚钺同志的私人科学体系的错误,使我们深深感到政治挂帅在历史科学工作中的重要性”。[②]有的文章说:“我们全休历史科学工作者坚定地跟着党走,坚持政治挂帅,贯彻两条道路斗争。”[③]当时所谓的“政治挂帅”,就是把政治放在第一位,即把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放在第一位,于是强调历史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很自然的了。当时专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就不少,如:余子道等《历史科学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复旦》1960年第1期),邵循正《历史科学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北京大学学报》1960年第2期),陈守忠《历史科学如何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西北师大学报》1964年第2期),奚原《历史科学研究必须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学术月刊》1958年第5期),等等。还有田昌五《为保卫历史科学的党性而斗争》(《历史研究》1960年第5期)、唐长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党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江汉学报》1964年第12期)、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红旗》1965年第13期,《人民日报》1965年12月8日第5版)、尹达《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史学月刊》1966年第2期,《历史教学》1966年第4期)等。

1963年,刘节发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学术研究》1963年第2期),文中说:“阶级斗争的理论用之于当前政治是切实有效的,用以解释古代历史事件,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教条化、机械地利用起来呢?这确实成为问题。相反地,如果恰如其分地把历史事件的真相写对了,倒是真能够古为今用的。以上所说的话可能很片面,而且又可能有很大的错误。为得好好体现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揣冒昧,大胆妄言。希望精通马列主义的专家们不吝教之,是为祷切!”[④]刘节的文章表明:一、刘节这位清华研究院梁启超、王国维的弟子也主张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了。二、刘节认为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重要的是要“恰如其分地把历史事件的

---

①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5页。

② 黎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私人科学》,《人民日报》1960年2月4日。

③ 余子道等:《历史科学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复旦》1960年第1期。

④ 刘节:《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学术研究》1963年第2期。

真相写对”。这样的说法，学术味道很浓，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历史事件的真相都写不对，怎么为政治服务？如1961年吴玉章强调过的“史实可信是科学的最基本的要求。一切正确的理论都是从可靠的事实中引出来的。如果史实错误，不管议论多么宏伟，也是站不住脚的”。[①]试想，如果用假的历史事件（伪史学）为政治服务会有什么结果？结果只能是造成社会对历史研究的不信任。当然刘节的说法还需要更全面些。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刘节的看法，自然“有很大的错误”。一下子就有三四十篇文章来批判刘节的错误。有人批判刘节为什么没有正面回答要服务的“当前政治”是“什么政治？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还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或地主阶级的政治？”说刘节的说法实质是：如果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去解释古代历史，往往不免要“教条化”，要“机械”，要“成为问题”；反之，如果要“恰如其分地把历史事件的真相写对”，就不能“把古代的历史事件样样都纠缠在阶级观点上去”。刘节的意思就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不能用于中国古代史研究，就是反对阶级斗争理论，而这正是政治问题。[②]有人强调：“在历史研究中要不要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的问题，乃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问题，实质上也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历史科学领域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问题。”[③]有人强调：不用阶级分析方法去研究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则是根本办不到的”。[④]车载《谈研究历史与为政治服务》（《学术月刊》1963年第12期）指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历史观，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与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态度相适应，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态度相适应，前者否定阶级斗争，反对阶级分析，后者肯定阶级斗争，主张以阶级观点分析问题。”刘节“对于历史与现实的一系列看法，是有阶级性的，他反对阶级分析的见解，是在替资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样就把“为政治服务”的讨论完全政治化了。而且，把历史观与政治态度完全等同起来，也是牵强附会的（关于对刘节的批判，还可以参见吉敦谕《学术界对刘节先生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

---

① 吴玉章：《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严肃学风　提高历史科学的学术水平——1961年10月16日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教学与研究》1961年第4期。

② 张玉楼：《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评刘节〈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人民日报》1963年6月18日第5版。

③ 谷风：《广东历史学界就刘节的〈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的观点展开讨论》，《学术研究》1963年第4期。

④ 夏书章：《阶级与道德——兼评刘节先生〈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中山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

批判》,《历史教学》1964年第1期)。

当时的历史研究文章大多都强调历史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有的文章说:"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任务,就规定了'古为今用'的方向,这个方向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这是历史科学的根本方向"。"历史科学把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当作自己的使命"。"历史科学只有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才能获得更加丰富、更加生动的发展"。[①]似乎不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历史科学就不会发展。似乎中国大陆以外,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历史研究,就毫无科学性可言。

有的文章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是以当前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为出发点的,是以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为出发点的"。"我们历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为当前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未来共产主义理想奋斗。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家,应该同时做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家;我们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人,我们是为革命而学术的人。把学术研究同革命事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我们史学工作者应该经常担负的任务"。[②]似乎不做革命家就做不了历史家,学术研究不同革命事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行。

有的文章还以史学发展史来论证史学从来就是政治的工具,指出:西方古今两大"客观"史学家,古代希腊的修昔底德,近代德国的朗克,他们的著作都是为政治服务的,都体现了各自阶级的党性。他们都工于史论结合,他们的著作都有史有论,是史书,又是隐蔽起来的政论。"所以史论结合、古为今用,历史家同时意味着是政治家、历史是政治的工具等等,在史学史上,都是自古已然,并非直到今天才有的。"[③]这样似乎就把史学著作与政论(政治)著作、史学家与政治家等同起来,把史学与政治等同起来,抹杀了史学的学术性质、学术品格。[④]

这些看法,显然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这种把历史研究政治化的倾向,是不利于史学的学术建设和发展的。

---

① 衷尔钜:《历史科学的任务和古为今用——与冯友兰先生商榷》,《哲学研究》1963年第5期。

② 郭晓棠:《一个迫切的建议——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理论》,《史学月刊》1964年第7期。

③ 吴于廑:《论西方古今两个"客观"史学家》,《江汉学报》1963年第6期。

④ 关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还可以参见蒋大椿:《近五十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2. “文革”时期

“文革”时期没有什么论述史学理论的书出版，文章还是有几篇，从中可看到“文革”时期对史学的看法。

“文革”时期的史学也走到了极“左”。从史学理论研究来说，不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来解读历史学，更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解读历史学，强调史学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把一些“文革”前合理的、正确的史学观点，全盘否定，把“文革”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说成是资产阶级史学，把“文革”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史学阵地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而且史学成了不容讨论的走极端的政治批（判）斗（争）的工具（“文革”前对批判文章的反驳文章还有发表，“文革”时期不再有），成了“你死我活斗争”、杀人不见血的利刃（吴晗、翦伯赞等都是在先遭到史学的政治大批判后，在“文革”时期被迫害致死）。

“文革”刚开始，《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人民日报》1966年6月3日），其中谈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运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的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点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点出了史学斗争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社论”没有点名地批判翦伯赞等人是盘踞史学阵地的资产阶级“权威”（按：《人民日报》1966年3月25日已发表戚本禹等人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说：“他们用所谓‘历史主义’即唯心史观，来反对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们顽固地否认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尽情污蔑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他们叫嚷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让步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一笔抹杀。他们歌颂的，只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帝王将相。他们是史学界里的‘保皇党’”。“史学界里的资产阶级‘权威’，进行种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是适应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反抗社会主义的需要的。这些‘保皇党’，就是保护旧制度，保护守旧派，保护旧思想，也就是保护为资本主义复辟作准备的思想阵地”。[①]这样把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说成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资产阶级

① 《人民日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人民日报》1966年6月3日第1版。以下引文均见此。

“权威”，说“历史主义”就是唯心史观，这实际上是对“文革”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的否定。

“社论”强调：“史学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一放松，就被资产阶级占领。在这里，不是用唯物史观解释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就是用唯心史观解释历史，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在史学中，和在其他科学中一样，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是绝对不能和平共处的。这只能是谁战胜谁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史学的斗争，不仅是阶级斗争而且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与“文革”时期的社会一样，“打气”、“杀气”弥漫。“社论”强调，“霸占一些史学阵地的资产阶级‘权威’，在某些部门里实行了对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必须把被资产阶级‘权威’霸占的阵地，一个一个地夺取过来”，“我们就是要把被你们篡夺了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重新夺回来，在你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地盘上，重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这不仅把“文革”前史学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也完全把史学看成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了。

接着，《人民日报》又发表署名晋群新的文章《〈历史研究〉是资产阶级史学的反动堡垒》（《人民日报》1966 年 10 月 23 日），把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办刊方针是“百家争鸣、实事求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作出过一些贡献的《历史研究》全盘否定。说《历史研究》是“史学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堡垒”，是“史学界那些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的工具”，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活标本”。[①]列举黎澍主编的《历史研究》的主要罪状是：

第一，反对 1958 年以来的史学革命，叫嚷：“当前学术界的倾向是‘左’，应该反一下。”黎澍把反对无产阶级史学革命作为《历史研究》的中心任务。为此，他提出了两个反动的口号。一个口号是反对“公式主义”，鼓吹“严谨的学风”。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污蔑为“公式”，而把资产阶级的烦琐的史料考据，吹嘘为“严谨的学风”。这就是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历史研究，反对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妄图以资产阶级的反动史学代替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另一个口号

① 晋群新：《〈历史研究〉是资产阶级史学的反动堡垒》，《人民日报》1966 年 10 月 23 日第 6 版。以下引文均见此。

是宣扬"先立后破"论，鼓吹"大胆提出问题"。其目的就是要迫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放弃对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鼓励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出来"争鸣"，呼唤牛鬼蛇神破门而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这两个口号实际上就是《历史研究》的反动纲领。

第二，为了贯彻这个反动的纲领，黎澍还实行了一条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组织路线。黎澍同史学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如邓拓、吴晗、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之流（按：这里不称这些人为"同志"，意味着已是敌人。"文革"时期的规则是：称"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不称"同志"是敌我矛盾）结成死党，共同策划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历史研究》一贯宣扬邓拓、吴晗、翦伯赞之流的反动史学论点。黎澍让大批反共老手、遗老孽少，在《历史研究》上大肆放毒，形成了一支反革命的合唱队。黎澍依靠这支反革命队伍，在《历史研究》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只准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不准无产阶级左派进行反击。

第三，黎澍一方面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把毛泽东思想污蔑为"公式"、"迷信"；另一方面，大谈其史料的"重要性"，反复强调"要掌握全部史料"，"要掌握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要"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认真钻研史料，大胆提出问题"。他要将历史研究引导到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并妄图将青年史学工作者引导到资产阶级的"史料学"即烦琐考据中去，要青年埋到故纸堆中，脱离现实，为他们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培养接班人。

第四，史学界的资产阶级右派，长期地打着"历史主义"的黑旗，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主义"简直成了他们替一切反动制度、反动阶级、反动思想作辩护的万应膏。黎澍之流摆出一副"辩证法老手"的架势，教训我们说：在许多历史著作中，阶级观点多了，但是"没有辩证法"，就是说没有"历史主义"。黎澍等人企图用"历史主义"给各种资产阶级的反动谬论作护法，保护地主资产阶级的旧史学不受批判。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无产阶级就是要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砸它个稀巴烂。……对于资产阶级的东西、修正主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就一定要把它打倒、把它消灭。

1958年以来的史学革命是存在着一些"左"的东西的，反那些"左"的东西是正确的；反历史研究中的"公式主义"，提倡"严谨的学风"是正确的；提倡"历史主义"也是合理的，怎么都成了"反革命"？成了"资产阶级专政"？引导学生，认真钻研史料，大胆提出问题，怎么成了"为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培养接班人"？完全颠倒了黑

白。而且一派对敌斗争的语调。“打倒”、“消灭”完全是对敌政治斗争、对敌武装斗争的语调，是不应该用在学术研究上的。而且退一步讲，任何一种学术观点或思想理论，能被“打倒”、“消灭”得了吗？当然不能。主张一种学术观点或思想理论的人的肉体是会“消灭”的，但他主张的学术观点或思想理论，如果有价值就不会被“消灭”。

《历史研究》杂志 1974 年第 1 期发表“短评”：《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研究历史》，再三强调：史学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说：“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历史。”要“进一步发挥历史科学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为反修防修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战斗作用”。[①]文章为“文革”时期的史学叫好。如强调研究儒法斗争史的重要政治意义，说：“认真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对于彻底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反动思想根源，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又如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和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的开展，有力地推动了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史学战线呈现出从未有过的革命景象，形势一派大好。”这是说“文革”史学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革命”史学，史学“形势一派大好”。

随着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人民日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发表，全国掀起批判史学家及其论著的热潮，史学界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其论著被全盘否定、被批斗。随着《〈历史研究〉是资产阶级史学的反动堡垒》的发表，全国掀起批判学术刊物的热潮，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刊物被全盘否定、被停刊（《历史研究》是因为宣传儒法斗争史需要而复刊）。这样很多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论著、观点，被“文革”时期的历史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史学大批判否定了。

3. “文革”后两年

整个史学界开始拨乱反正，主要是清算“文革”时期的极“左”史学，出了《影射史学批判》（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等一二本书，批判

---

① 《历史研究》杂志“短评”：《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研究历史》，《历史研究》1974 年第 1 期。以下引文均见此。

“四人帮”史学的文章有将近百篇，也有零星的重新评价“历史主义”、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及为翦伯赞恢复名誉的文章。全面探讨史学理论的文章还没有。整个史学界，遭受多年的伤害，元气大伤，要恢复元气还有待时日。有的文章仍强调：“史学从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①这仍然是“阶级斗争为纲”的语言。有的文章一方面批判“四人帮”“把史学与政治等同起来，利用历史进行反革命活动”；另一方面仍强调，“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阶级斗争的科学，它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要拨影射史学所造成之‘乱’，返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之‘正’”。②不少文章仍然有浓厚的政治（批判）色彩。显然，要真正解放思想，转变思维方式，史学理论研究要真正走上健康独立的学术研究道路，还有待时日。

（二）走向独立发展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端正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中国社会的思想大解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大发展，学术民主建设也大发展。学术研究的禁区日益被打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外学术交流大发展，外国当代的史学及其理论传入中国，给中国史学界以鞭策、启发。中国史学及其理论研究，犹如插上双翼，起飞翱翔。中国史学各领域都健康、快速地发展。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也真正获得了新生，并独立发展、迅速成长。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史学理论界发起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的讨论，并延伸到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研究的唯一方法”，基本被否定了。很快，史学界普遍认识到了史学理论研究的薄弱、史学理论建设的滞后，史学理论应进行独立的学科建设的问题被提出来了。

各高校的历史系开始开设《史学概论》课，编写《史学概论》教材。1980 年 12 月，在山东济南召开了有 23 个单位参加的《史学概论》教材讨论会，重点讨论了山东大学和云南大学受教育部委托编写的《历史科学概论》教材初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史学概论》、史学理论研讨会。与会代表一致呼吁各级领导机关、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以及报刊杂志都要重视史学理论的研究，把它看成是一个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否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与会代表认为，史

① 郑州大学历史系：《高举毛主席的旗帜　繁荣我国的历史科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 年第 3 期。

② 梁寒冰：《历史学要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作出贡献》，《历史教学》1979 年第 1 期。

学概论中史论部分和哲学课中历史唯物主义部分，难免会有一些重复，对此究竟怎样做才好些，还要进一步研究解决。除了史论部分，教材还应包括一些属于史学研究所必须的知识或具体方法的介绍。像史料考订、历史编纂方法、目录学、史学史等各种基础知识都可提要介绍，着重指出它们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①尽管当时对《史学概论》教材的理论认识还不够成熟，但已可以看到，当时已达成共识，《史学概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代替《史学概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概论》教材的编写，是史学理论研究走向独立，史学理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进行建设的开始。在这次讨论会上，代表们提议成立史学理论研究会，组建了史学理论研究会筹备组，这也是史学理论研究新起点的一个标志。②

在这次《史学概论》教材讨论会以后，《历史科学概论》教材作了修改，1981 年印了试用本，在部分高校历史系试用。1982 年再次进行修改，1983 年正式出版（详后）。

随着中国史学界理论问题讨论、方法论讨论的深入，随着《史学概论》编写的深入，对史学理论的理性认识也日益深入。

1983 年 2 月 9 日，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召开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座谈会。会上何兆武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是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然而它却不能直接代替史学理论，正如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并不能直接代替物理学中的基本粒子理论一样。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以往的史学理论研究工作显得有其不足之处。③瞿林东也说，现在，我国历史学界的许多同志都有这样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一般科学具有指导的作用，但不能以它去代替一般科学的基本理论的研究。具体地说，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它自身的基本理论和发展规律。这些理论和规律不能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但又不是后者所能完全代替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④沈仁安也说：我们应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⑤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不能直接代替史学理论，这

---

① 项观奇：《关于史学概论教材和教学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2 年第 2 期。

② 详见项观奇：《〈历史科学概论〉教材初稿讨论会》，《文汇报》1981 年 3 月 16 日第 3 版。

③ 白寿彝等：《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座谈会发言摘要）》，《世界历史》1983 年第 3 期。

④ 白寿彝等：《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座谈会发言摘要）》，《世界历史》1983 年第 3 期。

⑤ 白寿彝等：《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座谈会发言摘要）》，《世界历史》1983 年第 3 期。

样的理论认识终于被明确地提出来，并达成共识。座谈会上很多学者还就如何进行史学理论建设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发表了1983年2月9日史学理论座谈会的发言摘要，同时发表《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的评论员文章，文章归纳了座谈会的发言，指出："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①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代替史学理论，没有独立的理论，就没有独立的学科，没有独立的历史学理论，就没有独立的历史学学科，呼吁加强史学自身理论的建设。如何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文章提出：一、研究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史学课题。像《历史科学与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与现实》、《历史科学与群众教育》等这样一些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密切关系的题目，就很值得研究。显然，不解决现实提出的问题，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有生命力。这是一个史学研究的根本方向问题；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特别是有关历史的著作。还可以研究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普列汉诺夫、卢森堡、梅林、葛兰西等的著作。我们对这些著作过去研究得很少；三、清理、总结中国史学的传统，尤其要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和传统；四、研究近年来历史科学研究中提出的或者争论的许多理论问题；五、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方法论的历史和现状。在这方面，我们至今还很闭塞，所知甚少；六、研究史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这篇文章尽管还较强调研究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史学课题，却没有同时强调研究学术研究中提出的学术课题，而初步指出了建设的路径，但文章中所谈问题意义重大。《史学概论》的编写，《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发表的史学理论座谈会的发言摘要及评论员文章，可以说吹响了建设独立的史学理论学科的号角，标志着史学理论的自觉意识、独立意识已被唤醒。

此外，1983年4月，中国史学会暨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重点讨论了历史学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作用问题。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

---

① 本刊评论员：《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以下引文见此。

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1984 年 11 月，全国首届史学理论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以后每年或每两年举行一次。各省市也举办地方的史学理论研讨会。1987 年，史学理论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后改名《史学理论研究》)。1993 年，全国性史学理论研究学会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成立。20 世纪 90 年代，史学理论被列为历史学二级学科中的第一位，史学史被列为历史学二级学科中的第二位，以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合并为一个二级学科，列为历史学二级学科中的第一位。史学理论在历史学上的地位、在学术上的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这些是史学理论研究日益升温、日益引起重视的体现，同时也大大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推动了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

最可喜的是，史学概论、史学理论的著作陆续出版，大量的文章不断发表。

1983 年 3 月，葛懋春等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即受教育部委托编写的教材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出版的第一本史学概论教材。此书的主旨是“概述关于历史科学的理论、方法和一般知识”，“帮助学生联系历史研究的实际，逐步学会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同时，也相应地使学生掌握一些研究历史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①]在书的《绪论》中阐述了对“史学概论”的一些理论认识。谈到：“史学概论”的“中心任务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的角度帮助、引导学生跨入历史研究领域”。它的研究内容主要是：一、说明什么是历史科学；二、论述历史科学的特点、研究方法；三、解释历史编纂的一般原则。总之，就是概论历史科学是怎样一门社会科学，应该怎样从事历史科学的研究及怎样进行历史科学著作的写作。[②]同时说明：“我们采用历史科学概论一语，是考虑到它不是侧重于讲史料处理和历史编纂的史学概论。……我们是把历史科学概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概论来理解的。”[③]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全书就“历史和历史科学”、“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辩证考察人类历史的运动过程”、“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史论结合”、“中国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考古学和历史研究”、“中国史学史概述”、“欧美史学史概述”、“当代国外几种史学方法述评”等设专章进行论述，而没有论述历

---

① 葛懋春等主编：《历史科学概论·说明》，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卷首。

② 葛懋春等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绪论》第 1—2 页。

③ 葛懋春等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绪论》第 7 页。

史编纂学(1980 年 12 月《史学概论》教材讨论会上,提出可以有历史编纂法、目录学等内容,没有被采纳)。

书中在谈“史学”的理论问题时说:“在阶级社会里,历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①历史科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历史科学与以往的历史学的不同主要是:一、指导理论不同。历史科学以唯物史观作指导。二、阶级属性不同。“以往的历史学,都是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历史科学是属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以往的历史学,以剥削阶级的利益要求为转移,总会有意无意地歪曲历史、篡改历史;历史科学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没有任何阶级私利和偏见需要掩饰,相反,倒是要求尊重历史实际,如实地反映人类历史运动发展过程。所以,历史科学能够被称为真正的科学,又是与它的无产阶级属性相一致的”。②这里说历史科学是“为人民服务的”,不再说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人民”的范围很广,为人民服务,服务的对象很多,服务的内容很多。这样的认识客观、合理多了。当然,书中强调历史科学的“无产阶级属性”,政治色彩还是有一点,似乎还不够客观。不属于无产阶级的史学,就没有科学性吗?

1983 年 7 月,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出版的第二本史学概论书。这本书的写作提纲草稿是 1981 年 11 月提出的,到 1982 年 1 月,提纲定稿,1982 年 12 月,完成书稿。白寿彝主编此书的想法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论述中国史学遗产的几个重要方面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这本书也想论述一下国外的史学,因为所知太少,也就不写了”。③这也是白寿彝对史学概论内容一个基本看法。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全书设了以下章节:

第一章　叙论(设“历史、史料、史学”,“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本书的编写大意”三节)

第二章　历史观(设“社会生活和历史观点”,“历史观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学习唯物史观,推进史学工作”三节)

---

① 葛懋春等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9 页。

② 葛懋春等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0—21 页。

③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 · 题记》,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卷首。

第三章　历史文献(设“中国历史文献的繁富”,“中国历史文献学上的成就”,“历史文献在史学工作中的地位”三节)

第四章　史书的编著(设“史书的体裁”,“史书的编和著”二节)

第五章　史书的体例(设“古老的传统和全局性的体例”,“记时、记地和记人”,“载言、载文、议论及其他”三节)

第六章　历史文学(设“历史和文学”,“中国历史文学的成就”,“历史文学的写作经验”三节)

第七章　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

第八章　近代史学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第十章　当前的主要任务

从以上的章节设置中,可以看到,此书对于“中国史学遗产的几个重要方面的成就”论述很多,即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有较为全面的介绍,对于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大有裨益。其中的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等内容,是葛懋春等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中没有的。这本书的不足,就是白寿彝说的没有写外国史学,即大多是从中国史学的发展(古代、近代、现当代)出发,从中国史学的遗产(古代、近代、现当代)出发,来看史学、论史学,而不完全是从整个世界史学出发来看史学、论史学。这本书的中国民族特色很浓厚,书名如果是“中国史学概论”,就很贴切。

从此书的章节设置也可以看到,全书的学术色彩也很浓。书中强调:“史学工作在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发挥它在教育上的重要作用。”①这样的史学认识,已与 20 世纪 50—70 年代的认识不同了。只是第九章专设第三节“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杰出贡献”,强调:“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的理论,内容很丰富,对研究中国历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②这样的安排和论述,似乎还有一点点 50 年代、60 年代学术的色彩,80 年代后期、90 年代出版的《史学概论》一般就没有这样的安排和论述了。

1984 年,田昌五等《历史学概论》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丛书》的一种,篇幅稍小。此书完稿于 1983 年。作者认为:《史学概论》要介

①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题记》,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83 页。

②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题记》,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81 页。

绍的是学习和研究历史这门学科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观点、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手段。它是史学理论、史料学、史学史、史学评论、史学工具书等分支学科的概括和综合。①这里对《史学概论》的理论认识很不够。《史学概论》应有自己的独立的学科体系，不是史学理论、史料学、史学史、史学评论、史学工具书等分支学科的概括和综合。《史学概论》应研究史学的基本理论，而不是基本观点。作者还说："本书的性质类似历史唯物主义，但又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②《史学概论》有自己的独立的学科体系，怎么可以"性质类似历史唯物主义"？作者对《史学概论》的理论认识是有欠缺的，所以全书的结构也就有欠缺。全书设了以下章节：

第一章　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按：这是历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而不是基本观点）

第二章　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设"两种历史观"、"历史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二节）

第三章　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

第四章　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第五章　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第六章　历史学的过去和现状

第七章　研究历史必备的资料和工具

第二章的全部内容是论述唯物史观，没有论述"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加上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确实可以看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只是第一章、第六章、第七章，论述了史学诸问题。全书的重心是论述"历史唯物主义"。这显然不是一个合理的《史学概论》体系。这大概与此书的"勉强"为之有关。如作者说的，编写《史学概论》"需要有相当渊博的知识才能胜任。而我们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史料方面的素养，都是很不够的；只是为了不辜负河南人民出版社的雅嘱，才勉为其难，权且献拙"。③学术研究、科学研究是不能"勉强"的。当然，此书仍有亮点，如第七章的内容，大多是前两书所没有的。第三章第一节第四小节"阶级分析方法是一种重要的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是当时关于阶级斗争理论、阶级分析方法研究新进展的反映。

---

① 田昌五等：《历史学概论・前言》，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② 田昌五等：《历史学概论・前言》，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③ 田昌五等：《历史学概论・后记》，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1985年6月。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的编纂开始于1983年，1984年完成。此书认为："史学概论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史学这一学科的概述和回顾，它包括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识的学问。"①（这里说"史学概论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够全面客观，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概论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因为中国大陆以外，也有不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史学概论》）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全书设了以下章节：

第一章　绪论（论：史学概论的对象和任务；内容和范围；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学习的意义和方法）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的伟大变革（设"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的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三节）

第三章　历史科学的基础理论（设"生产劳动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和基础"，"历史上人类的共同体"，"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人类历史的辩证运动"四节）

第四章　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第五章　史料与史料学

第六章　历史编纂学

第七章　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

第八章　史学评论（设"史学评论的性质"，"史学评论的标准"，"史学评论的作用"三节）

第九章　国内外近现代史学流派述评

第十章　史学的发展和史学工作者的修养（设"历史和现实"，"现实的变革和史学的发展"，"史学的发展与史学工作者的修养"三节）

从以上的章节设置中可以看到，此书对"历史科学的基础理论"论述，是有深度的，是优于葛懋春等主编《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的。在介绍史学的基本知识时，设专章论"史学评论"，在史学概论书中论述史学评论（史学批评）的基本理论问题，这是第一次。史学评论（史学批评）是有待发展的一个史学新分支

① 吴泽主编：《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前言》第1页。

学科，对这个学科的重视，足见史学视野的开阔(田昌五等《历史学概论》提到：《史学概论》“是史学理论、史料学、史学史、史学评论、史学工具书等分支学科的概括和综合”，详前。但没有对史学评论进行论述)。第十章专论史学工作者的修养，也有点新意。其中谈到史学工作者“要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要逐步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技能”，“要不断更新知识，扩大知识面”等，[①]是数十年中国史学实践的经验教训及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形势对史学要求的总结。

书中提到“检验和发展唯物史观”(第二章第二节第三小节标题)，强调：“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看作一种自我封闭的体系，认为经典作家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提出的任何一个结论都不能改动的看法，是极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将随着现实社会的变革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②]这些论述都是有积极意义的，都较 50—70 年代的史学认识有很大进步。

姜义华、瞿林东等《史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以后有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修订版、2010 年修订版)，是 20 世纪 80 年代收关的史学概论著作之一。这时，改革开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外学术交流进一步发展，思想更解放了。史学界对西方史学的了解更多了，对中国史学的经验教训认识更深刻了，自然对史学的认识也更全面、深刻了。这在《史学导论》中有了反映。此书认为：《史学概论》的任务是“从历史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出发，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成就，将人类认识历史的主体活动作为客观存在，系统地研究它的一般过程、主要特征、基本规律，确定现代史学发展的途径，推动历史研究活动和整个历史学沿着进一步科学化与社会化的道路，更加有效地发挥它的积极的社会功能。为此，史学导论需要认真总结和概括国内外以往的与现今的史学理论研究成果与史学实践经验，将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历史本体论、史学形态学及历史认识主体自身的研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系统而全面地揭示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分析史学研究中所运用的各类方法，权衡古往今来对于历史本体及历史规律的探究，考查历史研究成果的各种社会表现形态，明确历史学家为提高自身的素养、无负所承担的时代使命应走的必由之路，高屋建瓴，推动历史学能够与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同步前进”。[③]这里

---

① 吴泽主编：《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94—398 页。

② 吴泽主编：《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90 页。

③ 姜义华等：《史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 页。

对史学概论、对史学的认识较80年代初期有了很大进步。首先，这里论述的史学概论体系，基本上已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影子了；其次，强调了从史学的全局(中外古今整个史学)出发，尤其要利用现代科学成就来认识史学、论述史学；再次，强调要推动历史研究活动和整个历史学沿着进一步科学化与社会化的道路，更加有效地发挥它的积极的社会功能，而不再说要推动历史研究活动和整个历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最后，基本确立了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主体论的《史学概论》体系。基于以上的认识，全书设了以下章节：

引言：史学导论研究的对象与任务

绪论：历史学的历史发展及其社会功能与科学地位

第一章 历史认识的基本特征

第二章 研究历史的主要方法

第三章 历史本体与历史规律的探究

第四章 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

第五章 历史学家的素养与时代使命

章的设置少了，但都能切中要害，反而更全面更深入了。如已不设专门章来叙述中国史学的发展、外国史学的发展，在《绪论》中设了以下节、小节：

第一节 历史意识的产生和历史学的形成

一 从传说到记述

二 鉴诫史学的成立

三 从理性史学到科学史学

在这一节里，把古今中外的史学合成一个整体，进行了统一全面的论述，而不是中国史学、外国史学以及封建史学、资产阶级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分割开来论述。这样，确实“高屋建瓴”，反映出全球的视野、全局的眼光。学理性、体系性更加凸显，学术性更加凸显，而意识形态色彩淡薄了，论述更有客观性。全书其他部分的论述也是这样，这是全书的一大特色。

此书还提出了很多新认识(观点)。如论述史学功能时，指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作用，一是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作用，首先是帮助人们认识历史发展规律。并指出：“不能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些能恰当地反映自己时代的需要的真正先

进的社会力量，他们的活动也有助于揭示一般社会学的和历史的规律，符合这些规律所表现的趋势。”[①]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全面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但决不能将其视为可以一劳永逸地接受的一种凝固的真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能不断地凝聚新的认识。”[②]

又如在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时谈到：

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虽然时间不长，由于集中自己有限的力量，解决了当时现实斗争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建立了功勋，因而迅速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重。然而，成功并不等于就没有弱点。实际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它形成时开始，便存在着一系列弱点。首先，在基本理论上受到了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代表的简单化、教条化、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没有来得及深入而全面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整个学说，没有来得及深入而全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各个不同派别的理论与观点，更没有像马克思本人那样广泛吸收现代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等新的科学成果，不断地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致使产生了相当突出的公式化及实用主义化倾向。将阶级斗争绝对化，将农民运动、农民战争、农民的均平思想理想化，都是这种倾向导致的结果。其次，在历史构架、研究体系上过分单一化，表现了目标与行为严重短期化的倾向。……严重地限制了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与历史研究重点的转移，妨碍从多方位、多角度对各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展开实事求是的深入研究，结果，必然导致难以适应时代要求。其三，在史学研究的学风与组织上，带有很深的行政权力支配的烙印，干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个体及群体的独立研究、独立思考。其四，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分歧和对立绝对化，以一概排斥的态度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结果，封闭了自己，妨碍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生气蓬勃的健康发展。[③]

书中还分析了这些弱点产生的原因。这样的论述，是此前诸书中很少见的，是当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新认识的反映，是对史学认识的进步的反映。这样的认识

---

① 姜义华等：《史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8 页。

② 姜义华等：《史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8—49 页。

③ 姜义华等：《史学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42—344 页。

在“文革”时期不可能有，50 年代也不可能有，这是社会、时代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发展了，人民群众发展了，思想文化发展了，自然就推动了史学的发展，史学的理性认识也就有了飞跃。此书的出版，表明中国史学理论的研究日趋成熟。

20 世纪 80—90 年代出版的史学概论类书籍还有很多，如赵吉惠《历史学概论》（三秦出版社 1986 年版）、王有录等主编《史学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赵吉惠《史学概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杜经国等《历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姚太中等主编《史学概论》（东方出版社 1991 年版）、贾东海等主编《史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文思启主编《史学概论》（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徐明文等主编《史学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孙恭恂主编《历史学概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庞卓恒主编《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等等。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更是反映了当代史学研究的新潮流、新趋势。

此外，研究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书也有很多，有些综论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书与《史学概论》书相近，如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王正平《史学理论与方法》（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宁可等《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李清凌《史学理论与方法》（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3 年版）、杨豫等《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王旭东《史学理论与方法》（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等等。还有彭卫《穿越历史的丛林：史学论》（北京：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等。其中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也从史学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三方面展开论述，以后又不断修订出版，日臻完善。

还有蒋大椿《唯物史观与史学》（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张艳国《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等等。

还有白钢等《历史学的发展趋势》（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蒋大椿《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巴蜀书社 1992 年版）、雷戈《历史与意义：论作为时代精神基础的元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吴廷嘉等《历史唯物论与当代史学理论的发展》（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陈其泰《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学苑出版社 1999 年版）、魏小萍《历史主客体导论、从宏观向微观的深化》（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袁吉富《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

还有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陈启能等《苏联史学理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罗凤礼主编《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中央编译社1996年版),等等。

1986—1987年出版了《史学理论探索丛书》,其中有《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等《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等《系统论与历史科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学研究室《历史科学的反思》(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历史科学规划小组史学理论组《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等。此外,1986—1987年,山东教育出版社推出了《当代外国史学理论丛书》。1987—199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推出了《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丛书。

以上可视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理论研究热潮的一个缩影。

史学方法论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内容,史学方法论也可以进行独立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会推动史学方法论研究,史学方法论研究也会推动史学理论研究。20世纪80年代,史学方法介绍、研究迭掀热潮,与史学理论研究形成热潮有关。当时史学方法论的书有:金观涛等《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科学普及出版社1983年版)、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项观奇《历史比较研究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赵吉惠《历史学方法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彭卫等《历史学的视野:当代史学方法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金观涛等《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发展的哲学》(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赵光贤《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范达人《当代比较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范达人等《比较史学》(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霍俊江《计量史学基础: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彭卫《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田晓文《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西方心智史学述评》(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胡波《历史心理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于兴仲《历史学习法:比较与解析》(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

从《史学概论》开始编写以来,有关探讨《史学概论》理论问题的文章、史学理论研究的文章、史学方法研究的文章,开始不断发表。文章太多,限于篇幅,不再枚

举。以下这些文章可以参见：张耕华《近年来史学概论研究中若干问题讨论述评》（《历史教学问题》1987 年第 5 期），蒋大椿《我国新时期史学方法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史学理论》1987 年第 2 期），赵吉惠《史学理论研究正在成为热点》（《史学理论》1988 年第 2 期），王正《十年来我国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研究述评》（《社会科学家》1989 年第 3 期），蒋大椿、李洪岩《近四十年来史论关系研究综述》（《历史研究》1992 年第 2 期），王渊明《近年来史学理论研讨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1993 年第 4 期），仲伟民等《新时期以来唯物史观理论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5 年第 3 期），蒋大椿《改革开放以来史学领域理论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9 年第 4 期），瞿林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五十年的理论建设》（《安徽大学学报》1999 年第 6 期），周文玖《五十年来史学理论发展之回顾》（《河北学刊》2000 年第 3 期），许殿才《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趋势》（《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第 2 期），许殿才《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与阶段性特点》（《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张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的简要回顾及评价》（《江西社会科学》2005 年第 1 期），刘方现《近年来围绕唯物史观的理论争鸣》（《历史教学》2005 年第 3 期），许殿才《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河北学刊》2007 年第 1 期），张剑平《新时期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成就》（《河北学刊》2007 年第 1 期），张旭鹏等《近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 年 4 月 26 日），张越《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发展》（《天津社会科学》2007 年第 4 期），于沛《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三十年：1978—2008》（《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 2 期），吴英《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近三十年探讨的回顾和展望》（《历史研究》2008 年第 6 期），侯云灏、曹守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就综述》（《学术研究》2008 年第 12 期），等等。还有牛润珍《关于历史学理论的学术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等。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有一些是 50 年代、60 年代已经研究过的，如史学研究的对象、任务、目的、功能以及方法论等，这些老问题的研究，往往都有了新认识，前面的论述已可略见（史学功能问题的研究，还可参见徐国利《关于新时期史学与现实关系讨论的回顾与总结》，《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 年第 1 期）。也研究了不少新问题，如：

80 年代，有学者提出建设“史学学”。宁可认为史学学是认识客观历史、研究

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的史学分支学科，研究历史学本身的理论、方法问题。[1]汪光华认为史学学包括了理论、方法论、基本知识几部分，重在研究历史认识论问题。[2]沃兴华认为“史学学”的研究对象是史学研究本身。揭示史学研究中的主观意识活动与客观历史之间的矛盾，从理论上概括和总结这一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基本经验，这就是史学学所应当承担的研究任务。而其研究范围是史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知识。[3]后赵兴彬发表《“史学学”的创建及其意义》(《齐鲁学刊》1997 年第 3 期，这是《史学学》书稿的“导言”)，说：“史学学”又称“史论学”、“元史学”。是以历史学自身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学的特点和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关于历史学的一种“中观理论”，它比“史学概论”更为科学。只有创立“史学学”并最终取代“史学概论”，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历史学的飞跃。强调“史学学”与“史学概论”不同，而其章节的设置，主要是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史学发生论、史学中介论、史学形态论、史学应用论、史学工程控制论等。[4]应该说，这样的设置与“史学概论”差不多，或者说“史学概论”也可以这么写。“史学学”提出后，响应者寥寥，大概因为“史学学”实际上就是和“史学概论”差不多。如赵兴彬说的：“史学学”在 80 年代初期提出后，这一课题的研究很快在理论界销声匿迹，既无人再论及，更不见以“史学学”命名的著作问世。[5]当时真正研究“史学学”的人确实很少，大概只有赵兴彬坚持研究。2004 年赵兴彬《史学学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年版)问世，其主要内容就如他的设想那样，阐述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史学方法论等，还是与“史学概论”相类似的。

现实中出现、提出的问题，也促使史学界进行研究和回答，如“史学危机”，这个问题研究的文章至少有百余篇。1986 年弓力发表文章说，应当承认，在历史学界的确出现了一些反常的现象：高校招生，自愿报考历史的考生减少；纵使学了历史也心不在焉决意不择历史研究与教学为终生事业者增多；历史系毕业生接受单位不广，除教学与科研之外，其他更广泛的社会行政等部门则对之不很欢迎；对于历史学学子潜心研究的成果，出版部门不乐于承接出书任务，即使出版了销路也不畅，销量不大。这些问题，连同史学研究方法上的种种问题，便形成了“史学危机”

---

① 宁可：《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历史研究》1984 年第 3 期。

② 汪光华：《论史学学的几个基本问题》，《社会科学》1986 年第 1 期。

③ 沃兴华：《论史学学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社会科学》1986 年第 1 期。

④ 赵兴彬：《“史学学”的创建及其意义》，《齐鲁学刊》1997 年第 3 期。

⑤ 赵兴彬：《“史学学”的创建及其意义》，《齐鲁学刊》1997 年第 3 期。

之说。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将其笼统地称之为“史学危机”不免有些过分的悲观。一则，历史学本身并不存在什么“危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解放思想，历史学领域又回到了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春天，呈现出了少有的繁荣景象。这个主流是应当肯定的。二则，历史学的发展趋势也不会出现危机。历史学是一门客观性与科学性、主体感与现实感都特别强的学科，研究范围真可谓包罗万象，它是一门永远研究不完的科学。另外，就其史学研究方法与史学理论所存在的问题而言，即使我国史学研究的特点与时代发展、变化不很适应，但是，我们相信，这只是一个过程问题，一个社会转折时期所出现的必然现象。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历史学必然在完成一个认识过程、适应过程之后逐步跟上社会脚步的。因而，它谈不上是什么“危机”。强调：史学研究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不等于是“危机”，是可以改进的。①

1987年，金重远说：近年来有不少人在谈论所谓“史学危机”，在报刊上撰文者有之，在会上大声疾呼者亦有之，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国的史学研究已经进入了一条死胡同。情况果真如此吗？我看是很值得商榷的。文章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学习、再认识还很不够，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创立新的历史体系，要下很大功夫，还刚开始。要打开史学著作的销路，确实要改变文风。学历史的是有前途的，历史学涉及面甚广，掌握这门知识的人完全可以胜任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的工作，要注意的倒是如何使历史学科和其他有关学科结合起来，尽量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使历史教学跟上当代科学发展的步伐。②

1987年，龚书铎谈道：近年来，“史学危机”的说法颇为流行。对于此说，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意见分歧，自不足为奇。而之所以存在分歧，除去对“危机”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史学研究现状估计的差异。不过，二者之间也还是异中有同，无论主“危机”说或非“危机”说，不少同志认为，史学研究存在僵化、单调的现象，影响了史学的发展，需要加以改变。这恐怕不能说是无端的夸张。建国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史学研究确实很有成绩，但由于极“左”思潮、教条主义的影响，弱点和不足也是明显的。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多方面去分析，不过至少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是方法、角度、

---

① 弓力：《从“史学危机”谈起》，《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② 金重远：《亦谈所谓“史学危机”》，《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领域的单一化，一是理论的薄弱。①

徐梓指出：对于那些没有变革意识的人来说，他们满足于些小的成绩，认为史学是没有什么危机可言的。而对于那些永不自满自足、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人，他们认为，已有的成绩都属于过去，史学落后于时代，不能体现今天的特质，就是不容置疑的危机所在。因此，史学危机的提出，标志着史学队伍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出现。他们深具忧患意识和对自己事业的热爱，以不妥协的精神力图使陈旧老态的历史学蜕变出与时代合拍的新史学。长鸣的警钟哪怕是言过其实，从来也都是有益于我们的事业。它催我们反省，促我们创新，提醒我们对可能造成灾难的警觉，革除潜在的危机。只有意识到了危机的心理压力，才能引发解除危机的动力。“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救”（海德格尔）。我相信，历史学会在危机的忧患中走向一个新的时期。②

1988 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戴逸代表谈到现在仍然是“哲学贫困，历史学危机，经济学混乱，法学幼稚”，呼吁振兴社会科学。③

1990 年，孙代兴《关于“史学危机”与史学功能问题——兼评史学领域的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 年第 5、6 期）指出，有两种危机说：一种认为是史学的功能和价值日益衰落，当前处境困难，似乎面临“危机”，感到忧虑，要求改革。另一种认为是“五四”以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危机，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及其理论使我国史学陷于僵化、失去了史学的实证科学的特性，因此，应当予以清理和否定。文章认为，史学改革应加快进行，但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危机是不存在的。④

直到 2001 年，有的文章还说“史学危机”“不但没有过去，而越来越严重了”⑤。

争论很多，意见分歧，但史学要改革、要开放、要创新、要发展、要面向社会、要面向人民群众、要关心人民群众的心声和需要，这是共识。关于“史学危机”的讨论，以下文章可以参见：姚之若《史家谈“史学危机”述要》（《甘肃理论学刊》1988 年第 5 期）、李勇《“史学危机”与史学改革开放的紧迫性》（《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

---

① 龚书铎：《从“史学危机”想到的》，《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7 年第 1 期。

② 徐梓：《史学危机：症结与超度》，《江汉论坛》1987 年第 9 期。

③ 《人大代表戴逸建议振兴我国社会科学》，《光明日报》1988 年 3 月 30 日。

④ 孙代兴：《关于“史学危机”与史学功能问题——兼评史学领域的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 年第 5、6 期。

⑤ 陈涛：《没有过去的史学危机》，《枣庄师专学报》2001 年第 1 期。

学版)》1995 年第 2 期)、江湄《当代中国史学的“两难之境”——对史学危机的一种回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5 期)、牛润珍《“史学危机”与史学如何应对市场经济》(牛润珍《关于历史学理论的学术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沈慧然《当代中国“史学危机”现象与学术界研究浅述》(《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2 期),等等。台湾逯耀东《史学危机的呼声》(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7 年版)等也可以参考。

20 世纪 90 年代还讨论了一个热门问题——后现代主义史学。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在西方最早出现于 20 年代、30 年代,到 60 年代,在哲学和建筑学界已流行。70 年代后成为社会学家经常使用的一个词,也给文学界、史学界产生极大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思想理论的涌入,后现代主义也在中国得到介绍。“后现代主义”一词在中国大陆出现是在 1981 年(详见冯石岗等《后现代主义研究和评论的回顾》,《邢台学院学报》2008 年第 4 期)。在中国大陆最早介绍后现代主义的书是 1986 年出版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弗・杰姆逊著、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这是美国杜克大学杰姆逊教授 1985 年 9—12 月在北京大学讲学的记录稿,刚讲完就出版,1987 年又出第 2 版,足见在中国大陆受到了欢迎、产生了影响。接着是《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詹克斯著、李大厦译,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年版)等。中国学者较早的著作有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以后有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北京:三联书店 1997 年版)、张国清《中心与边缘:后现代主义思潮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等等。王晴佳等《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2000 年版;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对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其对西方史学的影响作了较全面的论述。从文章来看,1986 年也有了,如曲翰章《“后现代主义”和唯物论》(载《世界哲学年鉴(1986)》,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以后有董朝斌《文化的现代困惑——读〈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国图书评论》1989 年第 1 期)等。介绍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文章,有安克斯密特著、罗筠筠译《历史编纂学与后现代主义》(《国外社会科学》1990 年第 6 期)等。此后 10 年,发表的后现代主义文章有数百篇,其中与史学相关的有王一川《支离破碎的话语世界——后现代主义简析》(《北京社会科学》1993 年第 2 期)、曹天予《对科学史后现代主义观的反思》(《哲学动态》1993 年第 8 期)、徐宏力《论后现代主义的无深度文化》(《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年第4期)、谭晓枫《永远的飘逝:后现代主义历史观一瞥》(《三峡学刊》1994年第2、3合期)、盛宁《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1期)、因子《有关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1997年第1期)、邓元忠《后现代西洋史学发展的反省》(《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3期)、张永华《后现代观念与历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卢海峰《唯物史观与后现代主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李幼蒸《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分析批评》(《哲学研究》1999年第11期)、王晴佳《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吴莉苇《史学研究中的后现代取向——从几部论著看后现代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利弊》(《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等等。

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史学已产生很大影响,已有后现代主义的史学著作,详见王晴佳等《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邓元忠《后现代西洋史学发展的反省》(《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3期)等。但对中国大陆的影响还有限,中国大陆对后现代主义基本上还只是进行介绍、研究、评价,还未见有用后现代主义理论指导写的史学著作出版。1998年,有学者指出"后现代主义的出局,指日可待"。①综合看,中国大陆对后现代主义及其史学的评价,批评为多。

有的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可以看作是20世纪的怀疑主义。②有的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科学主义"的理智活动。是一种批判性的解构战略,抱着怀疑和疾世愤俗的态度去看待世界和文本,其目的并不在于获取最大限度的清晰理解,而在于批判和摧毁。③有的学者说: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荒诞与虚无;后现代主义的结果:破坏与颠覆。④

谭晓枫指出:历史通过符号传存下来。面对符号中的历史,有两种不同的观念。一种认为符号中沉积的历史信息包蕴着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秘密,另一种则怀疑符号掩盖了历史的真相。从某种程度上,这两种不同的观念正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分界岭。⑤

① 季广茂:《从辉煌到没落——后现代主义的中国命运》,《山东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② 智河:《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述介》,《哲学动态》1992年第2期。
③ 因子:《有关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1997年第1期。
④ 叶娟丽:《浅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⑤ 谭晓枫:《永远的飘逝:后现代主义历史观一瞥》,《三峡学刊》1994年第2、3合期。

盛宁指出：怀特认为，史学家与文学家所感兴趣的事件可能不同，然而他们的话语形式以及他们的写作目的则往往一样，他们用以构成各自话语的技巧和手段也往往大体相同。因此，“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可以说是半斤八两，不分轩轾”。其症结和原因究竟何在呢？在于怀特把历史仅仅归结为文本，把那个实实在在发生并产生影响的事件彻底地放逐了。他们一直在文本的层面上讨论历史。而我们则认为，“历史”首先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件，其真实性首先表现为一种先于文本的存在，而不是文本。又指出：解构主义的阐释理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不承认语言有最终的所指，……然而语言的实际运用则总有其最终的所指。亚里士多德说，“历史”说的是已经发生的事，而“文学”则说的是可能发生的事。两者的区别其实就是一个是否有最终的所指。具有最终所指的“历史”无论如何也应有纪实的成分，无论如何也不能等同于文学虚构，这就是我们唯物主义者对于怀特的一个最简单的回答。[①]

曹天予指出：后现代主义者否认理性和进步。如果(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不要求史学著作的真实性，历史学家以认知为基础的责任就无从谈起，而在科学史学实践中就会产生“怎么都行”的混乱局面。[②]

王晴佳等指出：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有三大冲击：一是否定启蒙运动以来基于观察及归纳的科学方法；二是主张真相及知识之相对观，不承认我们可掌握确切的知识，相信不同的文化将产生其自身的真理；三是多半人对于人类得以直接接触到或掌握到外在之“实体”(reality)之怀疑。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致历史学的死命。后现代主义则是想从根本上消除史学，也就是要从历史知识的取得之认识论及对文字书写之质疑上来否定史学的价值。史学失去原有的地位，与虚构的小说没有两样。[③]由于一切都是相对的，就没有高低好坏之分，史学界将会造成混乱。史家有可能顶着后现代主义的帽子，任意解释历史，甚至发明或制造史料，对于现有的史料也以自己的论述来解读，完全无视当事人或其他学者的主张，认为他们只是受表象蒙蔽，如此将使得史学界失去学术规范，流落到虚无主义的地步。总之，纲纪荡然，毫无秩序，好坏不分，可能是最大的流弊。这种极端的相对主义流

---

① 盛宁：《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1期。

② 曹天予：《对科学史后现代主义观的反思》，《哲学动态》1993年第8期。

③ 王晴佳等：《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

弊到极致，可能会造成社会秩序的崩解。[①]如果说后现代史学对当今史学还有正面的影响，那就是提醒史家不只在处理史料时更为慎重，也在研究过程中以及呈现研究成果时，更能注意到许多以前未曾察觉到的盲点。以企求更细致周延地了解历史。[②]

卢海峰指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从根本讲是基于唯心史观基本立场上的批判，是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是不同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确实又对我们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启示：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质疑，对于我们揭露和批判西方文化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欺骗性和基础的不稳定性具有重要启示作用。二、后现代主义对西方文化的多维度的分析和批判，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和分析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具有重要启示作用。三、后现代主义对传统西方文化的逆向思维分析法，对于我们全面地分析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四、后现代主义思潮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虚无、主体死亡、理想破灭、传统丧失、游戏人生等的理论和心态，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西方社会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状态具有重要启示作用。五、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已经实现现代化并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西方社会文化状态和社会矛盾状态的分析和批判，对于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国人民来说，具有重要启示作用。[③]

有的学者指出：后现代主义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激进后现代主义等不同的类型。[④]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局限性的超越，是对现代世界观的扬弃与超越。[⑤]

有的学者指出：后现代主义的实现将意味着全新的生存逻辑，意味着人性的自我超越，意味着真正的大同世界的诞生。它不是存在于现代性缝隙中的短暂反抗，而是开创和建设新世界的持久行动。后现代主义文化也将成为未来的主流文化。指出：由于在前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之间有某种共同性，而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末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前现代文化的精华，所以，中

① 王晴佳等：《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01 页。
② 王晴佳等：《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01 页。
③ 卢海峰：《唯物史观与后现代主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2 期。
④ 因子：《有关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1997 年第 1 期。
⑤ 董润明：《思维方式的革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超越》，《社会科学》1997 年第 4 期。

国的智慧在建设后现代文化方面存在着不可忽略的优势。中国文化走向繁荣的真正希望正在于此。[①]

关于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讨论，到2000年以后仍在继续。总的来说，后现代主义把史学与文学等同起来，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否认所有历史文本的客观性，是绝大多数史学学者不能接受的。后现代主义史学有没有生命力，历史将给予检验和回答。

关于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讨论，还可以参见田薇《后现代主义研究综述》（《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4期）、吕川《后现代主义研究综述》（《社会科学动态》1999年第7期）、张宗艳《走进新世纪的后现代主义研究综述》（《党政干部学刊》2006年第4期）、冯石岗等《后现代主义研究和评论的回顾》（《邢台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等。

新的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还有不少，如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区分、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自然科学方法的引进、跨学科研究等，因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论述。其基本情况，可参见牛润珍《关于历史学理论的学术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肖黎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新气象还有史学理论史研究的逐步开展和深入（详见蒋大椿《近五十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文章很多，书也出版了一些。如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还有叶汝贤《唯物史观发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赵家群等《新技术革命与唯物史观的发展》（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孟庆仁《一个新历史观的足迹：唯物史观发展史纲》（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版）、艾福成等《唯物史观史纲要》（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等。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理论研究史”这样的著作还没有问世，中国史学理论界还须加倍努力。

80年代、90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带动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理论研究，这也是史学理论研究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如方志学的理论研究大发展（这与新方志编纂兴起也密切相关），80年代、90年代出版的方志学理论研究著作有十多种，如《方志学概论》（来新夏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方志学概论》

---

① 王晓华：《后现代主义的真谛》，《探索与争鸣》1998年第8期。

（薛虹，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中国方志学通论》（傅振伦，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8 年版）、《方志学通论》（仓修良，齐鲁书社 1990 年版，方志出版社 2003 年 2 版）、《当代方志学探论》（张仲荧，巴蜀书社 1990 年版）、《中国城市方志学概论》（罗来兴等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0 年版）、《新方志编纂学》（吴奈夫，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 年版）、《中国方志学概论》（杨军昌，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等等。

其他各种史学理论研究的书有：《中共党史学概论》（王仲清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张静如，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版）、《民族史学理论问题研究》（陈育宁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民族史学概论》（陈育宁，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2006 年增订版）、《蒙古秘史学概论》（甄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交通史学概论》（魏启宇，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军事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郑祖襄，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8 年版），等等。

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推动了史学的发展，各分支学科的史学理论研究发展，也推动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与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对史学研究的支持、扶助分不开；与中外交流的发展分不开，也与史学理论研究发展的带动分不开；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的振兴，跨学科研究的大发展，都与史学理论研究、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引领分不开。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自然能大大提高各个方面历史研究的自觉性。“史学建设首先是史学理论的建设，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逐渐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①

史学理论研究和建设仍需要进一步发展，这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要坚持正确理论，坚持学术品格，要扩大交流，吸取精华，要从史学实际出发，不断创新。要加快培养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专业人才。这些人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的功底，有开阔的视野，通晓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通晓西方史理论，通晓中国史学，通晓西方史学。有更多这样的人才，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就会有更多的发展。

---

① 于沛：《史学理论研究与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学习与探索》2001 年第 1 期。

三、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大讨论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发展动力论在中国讨论的概况

20世纪初年，唯物史观的历史发展的经济动因论藉翻译的著作开始在中国传播，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日本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1903年《浙江潮》编辑所印行)。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杨匏安、李达、瞿秋白等也宣传了历史发展的经济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但20年代、30年代，很少涉及阶级斗争动力论。

毛泽东在30年代、40年代较明确地谈到了阶级斗争动力、人民动力。1939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谈到：“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①1945年4月，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关于历史动力的论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理论界、史学界自然产生直接的影响。

1954年，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中谈道：“中国封建社会按三个时期四个大段向前发展，它的推动力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生产力的体现者——农民阶级(包括一切被剥削者)反对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地主阶级(包括一切剥削者)的阶级斗争……(以下引毛泽东关于‘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革命是历史底火车头，农民革命战争起着速度不高的火车头作用，但决不能否认它是推动历史的火车头。”③范文澜的观点是毛泽东的观点的引申，而这样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界的主导观点。

1956年，中共“八大”在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做出了正确的决议，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能满足其需要的矛盾。1957年10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④

---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25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31页。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版，第30—31页。
④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95页。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重申了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主要矛盾的看法并被大会所接受。1962年9月24—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从现在起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党的大会就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①此后，"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成为中共中央对全党全国人民的一个号召。到1964年11月，中共中央正式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的口号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面上工作的指导方针。"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②

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学术研究自然也要以此为指导思想。史学界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可以说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种历史理论的诠释。政治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无产阶级的，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资产阶级的。在史学上坚持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反对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资产阶级的。如1958年一篇署名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的文章中说的：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论旨。有人认为，矛盾的斗争即阶级斗争不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甚至还会起一定的破坏作用，没有矛盾斗争的和平统一，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种说法，显然是荒谬的。还有人认为，矛盾斗争的缓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但当矛盾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就对社会发展起阻碍和破坏作用了。这种看法也是荒谬的。这些说法产生的根源，不（就）是立场问题，就是思想方法问题，或者是二者具备。这些说法是根本违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也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资产阶级宇宙观与无产阶级宇宙观的斗争。文章还谈道：我们历史工作者，

①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198页。

② 详见杨明伟：《"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口号的由来》，《炎黄春秋》1998年第8期。

必须进一步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特别以毛主席著作为纲，在政治与思想战线上把“兴无灭资”的斗争进行到底，拔掉资产阶级的白旗，插上无产阶级的红旗。[①]1963年署名的《关于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动力问题》的文章，似乎是要谈生产力，实际上是强调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力量，强调阶级斗争的决定作用。指出：第一，一切离开生产关系来谈社会的发展问题，就必然要离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动力的根本原理；第二，抛开生产关系、抛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来谈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动力，在政治实践上是极为有害的。因为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表现为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如果说，生产力的发展可以离开生产关系发展，也就是说，它可以离开一定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发展，在方法论上也必然要走上“无冲突论”的道路。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着：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所以，我们在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就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否则，离开阶级斗争来埋头建设，离开政治来发展经济，那是会事与愿违的，而且我们在革命斗争中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还会有丢失的危险呢。[②]学术文章中引用政治文件《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足见当时政治形势、政治理论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此后，《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前线》1964年第12期，作者：吴瑞章）这样的文章也不少。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还出版了很多宣传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书，如郭影秋等《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甘肃人民出版社编印《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第1、2、3辑（1963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辽宁人民出版社编印，1976年）、《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等等。直到1978年初，还

---

① 陈崇钫：《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教学问题》1958年第11期，第12—15页，第11页。

② 黄顺基等：《关于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63年第6期，第12—14页。

出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社队经营管理》(中共陕西省委农业学大寨办公室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们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自然对阶级斗争的理论进行反思。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了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又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取代了“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对史学界、学术界的拨乱反正起了指导作用。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大讨论就顺势应时展开了。

卫兴华1978年发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批判了“四人帮”只讲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不讲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污蔑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这篇文章虽然还没有对阶级斗争是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进行探讨,但已谈到:无论在任何社会,生产力作为一种进步力量,都推动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历史前进。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产生、发展,社会革命的产生、发展,无一不是以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为前提的。[①]实际上是隔了很多年后重新强调了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大讨论的正式启动,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的1979年初。

《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发表刘大年文章,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认为: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前进,不能自然而然地改变历史,要通过阶级斗争、伟大的革命运动来变革历史。对于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是十月革命时的俄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的中国,生产力相对落后,或者落后得很远,但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反过来,一些西方国家生产力水平相对地高,以至高出许多,至今仍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这集中说明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自行变革历史,它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才能推翻旧社会、旧制度,建立新社会、新制度,改变历史的进程。私有制社会里,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②]

1979年2月,林章发表文章强调:阶级斗争的存在和发展是生产力的发展决

---

① 卫兴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光明日报》1978年4月10日。

② 刘大年:《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在太平天国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1979年3月2日出版)。

定的。生产力发展才是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①]接着,1979 年 3 月,石流等也发表文章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根本动力。[②]

1979 年第 2 期《教学与研究》发表刘泽华等的文章,提出: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从历史总过程看,生产斗争决定着阶级斗争。因为:第一,生产斗争最终决定着阶级的构成,并且是阶级斗争的基础;第二,生产斗争与人类相始终,而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第三,阶级斗争不总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动力。落后阶级向先进阶级的斗争就不是动力,而是阻力。先进阶级向落后阶级的斗争一般说来对生产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但有时方针、政策错误,也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阶级存在的本身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在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的发展不再是以阶级斗争为动力,而是要求阶级走向消灭。[③]

1979 年第 2 期《中国青年》发表邢贲思文章,强调:生产斗争比阶级斗争更根本。谈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是把阶级斗争夸大为最根本的社会实践,而把生产斗争放在从属的、次要的地位。这根本颠倒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重蹈了历史唯心主义的历史是由暴力创造的“暴力论”。[④]

1979 年第 2 期《社会科学研究》发表戴逸文章,指出:如果把阶级斗争当作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那么,我们便可以逻辑地得出:阶级斗争规模愈大,次数愈多、愈频繁,社会前进就愈快。可是,实际情况并不这样。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也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但只有联系生产才能表现它的推动作用,离开生产就谈不上。[⑤]

在讨论中,一种长期被忽视的历史发展“合力”论提出来了。1979 年第 2 期《四川大学学报》发表伍宗华等文章,指出:关于历史发展的“合力”理论,是经典作家对历史动力问题最全面最深刻的说明。如果忘记了它,仅仅摘引经典作家的片言只句,企图证明只有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或者说生产力的因素可

---

① 林章:《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解放日报》1979 年 2 月 13 日。

② 石流等:《论社会发展的动力》,《文汇报》1979 年 3 月 13 日。

③ 刘泽华等:《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1978 年 10 月初稿,1978 年 12 月改稿),《教学与研究》1979 年第 2 期。

④ 邢贲思:《生产斗争比阶级斗争更根本——兼谈夸大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教训》,《中国青年》1979 年第 2 期。

⑤ 戴逸:《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社会科学研究》1979 年第 2 期。

以独立地直接推动历史的发展，那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对于那些构成历史发展的全部合力的各种因素，我们既不能把它们加以割裂，用一个去否定另一个；也不能将它们简单地平列起来，恣意抹杀起主导作用的力量。[①]1979年第2期《近代史研究》发表宋士堂文章，也认为：推动历史发展是社会各种矛盾运动所汇集起来的一种合力。[②]

以上几篇文章发表后，又有更多学者发表文章，谈自己对历史动力问题的看法。如苏双碧《略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王戎笙《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吗?》（《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孙达人《“贯串于人类历史的根本性规律”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答戎笙同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漆侠《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沈定平《关于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张海鹏《论历史发展的动力》（《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方永祥《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安徽师大学报》1979年第4期）。

《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3日发表编者文章《欢迎参加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指出：这个问题的讨论将有助于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同时发表了董楚平《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此后陆续发表了一些各种各样观点的文章。至1980年4月15日《光明日报》又发表编者语，指出：先后收到来稿一千多篇。由于版面限制，只能选择其中一小部分发表。本期发表三篇不同意见的文章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将暂时告一段落。同时希望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能取得一个比较一致的、正确的看法，更好地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同时发表的三篇文章是：刘伯涵《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在中国封建制时代的历史作用》、罗耀九《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生产力》、卫正勋《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内部的矛盾运动》。

不少杂志、学报都开辟专栏讨论历史发展动力。如《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1期开辟“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专栏，发表了阳正泰等《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张莘如《阶级斗争并非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柯昌基《生产力、阶级斗争和阶级协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黎邦正《生产力和阶级斗争都是历

① 伍宗华等：《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② 宋士堂：《试论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

史发展的动力》、汤再林《社会基本矛盾推动历史的发展》、伍宗华等《谈谈历史发展的“合力”》等。

1979 年初至 1980 年底公开发表的讨论历史发展动力的文章至少有百余篇。而且各省市历史学会、各高校历史系都召开了学术讨论会讨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①]有的还把讨论的情况在报刊上介绍，如：龚延明《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综述》介绍了杭州大学历史系和浙江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的学术讨论会的情况（《杭州大学学报》1979 年第 4 期），又《浙江省历史学会、杭州大学和山东大学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光明日报》1980 年 1 月 8 日），王世华《省史学年会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79 年第 4 期），《安徽省史学年会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光明日报》1979 年 11 月 27 日），孔立《解放思想，各抒己见：历史系师生热烈讨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79 年第 4 期），《厦门大学历史系师生讨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光明日报》1980 年 1 月 15 日），《广东历史学会讨论社会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学术研究》1979 年第 6 期），徐泰来《湖南省史学会举行年会讨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0 年第 1 期），龚益鸣《“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本校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学术讨论会见闻》（《暨南学报》1980 年第 1 期），《吉林大学历史系举行“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学术讨论会》（《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0 年第 3 期），《农民战争的作用和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首届年会讨论纪略》（《四川大学学报》1980 年第 3 期）。哲学界也纷纷讨论这个问题，详见《武汉大学哲学系哲学教研室讨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问题》（《光明日报》1979 年 6 月 14 日）、胡素卿《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综述（特约稿）》（《哲学动态》1980 年第 8 期）、《全国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会侧记》（《哲学动态》1981 年第 3 期）等。

1979 年、1980 年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讨论历史发展动力最热的两年。1981 年以后，关于讨论历史发展动力的文章少了一些，但每年总有一些文章发表，少则数篇，多则数十篇。21 世纪以来仍然每年有讨论历史发展动力的文章

---

① 胡素卿：《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综述（特约稿）》：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史学界和理论界的同志们围绕着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到今年 6 月为止，在报刊杂志上先后发表了近百篇讨论文章，本刊也陆续收到一些来稿，各地的历史学会、高等院校的历史系和几乎所有的史学研究单位都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也是十分踊跃的（《哲学动态》1980 年第 8 期）。

发表。如 2008 年发表的相关文章就有 30 多篇。

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是历史理论的最大问题之一，也是哲学的最大问题之一，学界、社会对其孜孜不倦地探讨是必然的。而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的讨论是前所未有的，是思想解放的、百花齐放的。

(二)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历史发展动力讨论的主要观点

1. 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主张这一观点的要点是：1.生产力是社会生产中最根本、最革命的因素。2.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革命的性质和社会的性质。①

刘金城等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社会形态的更替。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生产关系的量变或部分质变，也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②

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认为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经常起作用的动力，但不是根本动力，因为没有人民的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也不能自动改变生产关系。③

2. 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主张这一观点的，以上已具体提到了刘大年、朱绍侯、黄振等，还有孙达人指出：一切社会的生产力都不能不由一定的人们来代表，在阶级社会里，由一定的阶级来代表；一切社会的生产关系都不能不体现着人与人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由对抗着的不同阶级来体现；一切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都不能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阶级社会内表现为阶级斗争和革命。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的真正动力，或者说是历史唯一的实际动力的原理；毛泽东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原理，恰恰是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具体而深刻地贯串到底的必然产物。④苏双碧认为：如果认为只有生产斗争才是社会历

---

① 徐泰来：《湖南省史学会举行年会讨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0 年第 1 期。

② 刘金城等：《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求是学刊》1980 年第 1 期。

③ 孔立：《解放思想，各抒己见：历史系师生热烈讨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79 年第 4 期。

④ 孙达人：《"贯串于人类历史的根本性规律"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答戎笙同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9 年第 3 期。

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忽视了阶级斗争的动力作用，对历史发展的进程就很难说清楚，也就无法解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怎样解决的。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种阶级社会，这些社会形态的更替，其直接的推动力量无例外地都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阶级斗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①

对于阶级斗争是不是始终推动历史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只有在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阶级斗争才能发挥历史发展动力的作用；另一种意见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时，阶级斗争也能使生产关系保持稳定（如控制剥削的限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②

不同意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观点的学者，以上已提到了戴逸、刘泽华等，其他学者的其他观点如下：

萃松指出，阶级斗争不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更不是根本动力。应该承认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比阶级斗争更根本。这不仅是因为不论在有阶级的社会，而且在无阶级的社会里，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总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受生产斗争所制约的，阶级斗争总是要为生产斗争服务的，为它的发展开辟道路、创造条件的。阶级斗争成为历史的直接动力是有条件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不再起直接动力作用。③

陈必龙也指出，阶级斗争不是根本动力：一、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二、一切阶级斗争都根源于经济利益；三、并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④

有的同志指出，阶级斗争是生产关系再生产（即创立新的生产关系）的主要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其他手段包括：国家政权所推行的经济政策、财政政策、法律制度以及观念形态等。把阶级斗争看作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的观点，在作为社会形态标志的生产方式中，排除生产力，而片面强调生产关系；在以生产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总体中，排除其他各种关系，而片面强调阶级关系；在对立统一的阶级关系中，排除统一性，而片面强调斗争性。这种简单阶级斗争论缩小了历史

---

① 苏双碧：《略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79 年第 3 期。

② 孔立：《解放思想，各抒己见：历史系师生热烈讨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79 年第 4 期。

③ 萃松：《阶级斗争决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南昌大学学报》1979 年第 3 期。

④ 陈必龙：《阶级斗争与社会发展的动力》，《解放军报》1979 年 8 月 21 日。

唯物主义的理论阵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力。①

吉彦波认为，以“阶级斗争”作为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存在着以下问题：其一，不符合“动力”范畴根源性、初始性要求。对于电力机车来说，动力是电压，而不是电动机，对于蒸汽机而言，动力是煤和煤燃烧发出的热量而不是蒸汽机；蒸汽机、电动机是把电力传递到作用对象上去的中介。同理，对于阶级社会而言，阶级斗争是阶级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采用的手段，是动力和作用对象之间的中介而非动力；其二，不符合“动力”范畴的价值性、方向性要求。阶级斗争并非都是正义的。有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的斗争，同样有统治阶级、压迫阶级对被统治、被压迫阶级的斗争。因此，一般地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是以偏概全、不符合历史动力所要求的价值性规定；其三，以阶级斗争为阶级社会发展动力也不符合动力的连续性要求。阶级斗争是时有时无的、断断续续的。阶级斗争不是也不可能不间断地进行下去。②

3. 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主张这一观点的，除了邢贲思、刘泽华、萃松等，还有黄英贤指出，生产斗争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生产斗争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唯一手段，是发展精神文化的基础。生产斗争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斗争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重大力量。生产斗争是各种经济形式和管理体制形成和变化的基础。生产斗争是一切阶级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的根源。生产斗争是决定阶级斗争的发生、形式、性质、内容、规模和结局的根本因素。生产斗争是决定生产关系发展和更替的根本动力。③

不同意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的观点主要如下：

沈定平指出，戎笙所说的在生产过程中，人和自然的关系可以在排除社会关系的任何影响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向前发展，这种纯粹的、抽掉了社会关系的生产斗争过程，在人类社会尤其是阶级社会中，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④

---

① 龚益鸣：《“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本校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学术讨论会见闻》，《暨南学报》1980 年第 1 期。

② 吉彦波：《对“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质疑》，《理论与改革》1999 年第 4 期。吉彦波：《阶级斗争：阶级社会的杠杆》，《长白学刊》1999 年第 3 期；《阶级社会里的阶级斗争：不是动力是杠杆》，《雁北师范学院学报》1999 年第 1 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

③ 黄英贤：《生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华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 年第 3 期。

④ 沈定平：《关于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 4 期。

阳正泰等认为，提生产活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会造成一种误解：只要人们不断地去和自然界作斗争，而不去解决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就自然而然地前进了。假若不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解决阶级之间的矛盾，单纯的生产活动既不能引起生产力质的飞跃，也不能对社会的前进起到推动作用。[①]

4. 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两股动力在阶级社会中交替作用从而推动历史发展

有人认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两股动力。在阶级社会中，这两股动力交替地起作用。在各个封建王朝初期，往往比较注意发展生产，这时生产斗争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阶级斗争便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了。[②]

张海鹏也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时生产斗争起主要作用，有时阶级斗争起主要作用，而人民群众都是动力的主要源泉。[③]

杜绍顺进一步认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种动力交替起作用，三大实践活动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以哪种实践活动为主要动力，取决于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哪种实践活动。[④]

5.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王戎笙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但在各个时期表现的形式是不同的，有时表现为用阶级斗争去改变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有时表现为用武装斗争去摧毁保护落后的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有时表现为用国家权力保护先进的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时表现为劳动人民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去发展生产力。[⑤]

李鸿烈进一步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性是发展动力。如果说矛盾的斗争性、阶级斗争是新社会取代旧社会的直接动力的话，那么社会诸因素的矛盾统一性，特别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性，则是每一社会形态生产力发展

---

① 阳正泰等：《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1期。

② 孔立：《解放思想，各抒己见：历史系师生热烈讨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③ 张海鹏：《论历史发展的动力》，《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④ 杜绍顺：《三大实践活动交替表现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华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⑤ 戎笙：《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吗？》，《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

的根本动力。①

不同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主要是：

孙达人指出，戎笙同志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就势必要遇到两个难题：当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和当时的生产关系发生了矛盾的时候，为什么能够改变当时的生产关系以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呢？又是什么力量使它变成现实的呢？戎笙同志认为是通过“自发调节”。实际上“自发调节”在封建社会中是不存在的。而且，离开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就根本无法解释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为什么能够使当时不适应的那部分生产关系发生改变。怎么能从封建地主阶级或统治阶级及其政策中去寻找历史动力？②

阳正泰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这种观点不能反映无阶级社会和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区别。③

6. 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方永祥指出，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构成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是贯串人类社会始终的社会基本矛盾，其中生产方式则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第一，社会基本矛盾是构成人类社会的有机整体，贯串人类社会始终的基本方面，而生产方式则是这些基本方面的基础；第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矛盾，只是社会基本矛盾主要是生产方式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社会关系的表现。这些矛盾斗争的展开、解决的源泉和动力是生产方式；其解决的最终目的，从根本上说来，也只是为了解决生产方式的矛盾，以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第三，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或者说社会形态的变革（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虽然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表现，但却首先是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必然表现和结果。只有坚持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才能深刻理解整个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④

郑伟力进一步认为，生产方式诸因素的整合作用是推动人类社会根本性发展变化的动力。⑤

---

① 李鸿烈：《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1 年第 2 期。

② 孙达人：《“贯串于人类历史的根本性规律”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答戎笙同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9 年第 3 期。

③ 阳正泰等：《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社会科学研究》1980 年第 1 期。

④ 方永祥：《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安徽师大学报》1979 年第 4 期。

⑤ 郑伟力：《生产方式诸因素整合作用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财贸研究》1998 年第 2 期。

卜凤至认为,"生产力根本动力说"、"生产方式根本动力说"都割裂和歪曲了社会内部矛盾的完整性和辩证性。因而不能科学地揭示出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①]

7. 生产力内在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本源动力

卫正勋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完全依赖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它有一种自己增殖、自己更新的趋向,也就是它的内在矛盾性。这种自身的矛盾运动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和本源动力。生产力内部的矛盾运动,首先是生产工具的发展引起的,比如:先进生产工具同只具有落后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的矛盾,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之间的矛盾,生产工具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暴露与解决,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过去有个传统观点,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不是生产力的内部矛盾运动引起的,而是由外部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的,而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则是由上层建筑所决定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只有首先不断变革上层建筑,接着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本末倒置的理论,因为它把生产关系特别是上层建筑看成是社会发展本源和最终原因,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完全背道而驰。[②]

不同意生产力内在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可以参见"1.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3.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等中的不同意观点。

8.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为什么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一、按照辩证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应是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只能是人类社会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二、生产斗争说明不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③]

田崇勤指出,有的同志根据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从而断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生产力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那么,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又是什么呢？有的同志根据生产力在生产方式中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断言生产力就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唯

---

① 卜凤至:《从社会矛盾统一体看历史发展的动力》,《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② 卫正勋:《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内部的矛盾运动》,《光明日报》1980年4月15日。
③ 徐泰来:《湖南省史学会举行年会讨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0年第1期。

一的根本动力，没有必要因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有着巨大反作用因而纳入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中。从而认为不能把生产关系当作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关系尚且不是动力，上层建筑就更是如此了。他们把矛盾两个方面割裂开来，用一个方面否定另一个方面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样既否定了矛盾对立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而且也否定了矛盾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发展的唯物辩证法原理。有的同志承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却反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他们看来，上层建筑中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如果把上层建筑也看成推动社会历史的一个因素，就违背了一元论的唯物史观。这些其实都是误解。在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虽然是最基本的，但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是一对基本矛盾。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去掉任何一项或一对矛盾，就不可能正确理解整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也就不可能正确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及其规律性。①

不同意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的观点主要是：

张文军等指出，社会基本矛盾动力论，从其内容来讲，与“合力论”基本一致，但也有缺点。一、它没有把社会基本矛盾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而根据我们的观点，社会基本矛盾仅仅在人类社会历史一定发展阶段上才存在；二、它强调的只是社会因素：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而忽视了外部环境、自然环境和个人意志的作用。②

9. 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合力”

合力说理论上的主要理论依据是恩格斯致布洛赫信中关于平行四边形与合力的那段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78 页）。主张这一观点的，除了伍宗华等及宋士堂，还有吴廷嘉指出，恩格斯历史合力说的主要内容是：一、任何历史事变，都是各种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也即历史合力的总结果；二、历史合力的表现形式是参预历史活动的每个人的意志与行为的相互冲突与交融；三、历史合力的发生机制是历史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四、这种交互作用的程度、影响和后果是不平衡的，其中经济因素是初始的、决定性的。这四条原则是运用唯物史观考察历史的基本研究方法。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事物的普遍联系法则，把这一原则具

---

① 田崇勤：《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安徽师大学报》1979 年第 4 期。

② 张文军等：《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系统》，《山东社会科学》2005 年第 2 期。

体运用到史学研究过程中，正是历史合力论的基本内涵。它可以有效地防止历史研究中片面化和僵化的倾向。它不只是适用于探讨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也适用于历史研究的全过程的所有的研究领域，适用于对一切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运动的分析研究之中。①

王询认为，合力说可以把唯物史观在宏观层次上的理论与微观层次上的理论结合起来，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②。

张文军等认为，和诸动力论比较起来，"合力论"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它把社会发展的动力看做一个动力系统，在这个系统内，影响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都占有一个适当的位置。并且，这个系统以及系统中各要素的位置，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样一种观点，才符合唯物辩证法，才能充当正确解释各种社会现象的方法论武器。③

不赞同的主要观点是：

黄振指出，按照"合力"的观点，社会基本矛盾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表现出来的阶级斗争的双方，无论是起推动作用的还是起阻碍作用的力量和因素，无论其作用的大小，统统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都是实现社会变革的杠杆。显然这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基本原理的。并不是任何影响历史进程的因素都具有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在推动社会前进的因素中，也不是任何因素都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④

张瑞生指出，历史合力论，并没有回答，在这个相互较量、相互影响的合力当中，谁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谁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谁是处在一种中立的消极的状态。因此不是也不可能是回答谁是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⑤

杨章钦也指出，"合力论"把"合力"现象作为一种终极力量，是较为虚幻的，是不科学的。合力论以人为出发点不足取，它夸大了外因的作用，极易与唯心主义历

① 吴廷嘉：《"合力"辩——兼与刘大年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② 王询：《也说"合力"——与刘大年先生商榷》，《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
③ 张文军等《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系统》，《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④ 黄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阶级斗争》，《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
⑤ 张瑞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一个科学命题——与黎澍同志〈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商榷》，《理论导刊》1986年第11期。

史多元论混淆界限。[①]

此外，张一兵认为，恩格斯没有说合力论适用于一切社会，合力论是不适用于共产主义社会的。[②]窦晓东则认为，合力论适用于一切社会。[③]

10. 科学技术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

科学技术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在理论上得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强有力支撑。

有人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历史的发展，但两者不能等同。生产力的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科技越发达越先进，人类社会越进步。因此，科学技术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没有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④]

王能昌指出，马克思称"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5页）。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科学一方面是物质生产力，是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另一方面，科学是在知识形态上的生产力，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是精神生产力。科学不仅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而且还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都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精神力量。[⑤]

不同意见可以参见"15.创新、人的创造性力量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11. 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有人指出，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且是比阶级斗争更为重要的动力。在原始社会就有部落之间的斗争，在阶级消灭以后，民族差别和民族斗争还会长期存在。生产力的发展和民族斗争、民族融合有密切关系。在古代，土地的扩大和劳动人手的增多，往往通过民族斗争来实现；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通过民族之间的交流而不断改进；劳动者的素质通过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而得到提高。在我国历史上经历过三次大的民族融合过程（两周到秦汉、"五胡乱华"、辽金元到清），对于形成伟大的中华民族，对于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在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有人持相反

---

① 杨章钦：《对社会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两点探讨》，《福州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

② 张一兵：《恩格斯社会历史观"合力说"之新解》，《现代哲学》1991年第2期。

③ 窦晓东：《恩格斯社会历史观"合力说"探析——同张一兵同志商榷》，《现代哲学》1992年第1期。

④ 孔立：《解放思想，各抒己见：历史系师生热烈讨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⑤ 王能昌：《试论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的看法，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之所以发展缓慢，落后于西方，原因固然很多，而落后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征服和统治，则是重要原因之一。[①]

12.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史学界的主导观点。1979 年以来讨论历史动力问题时，这一观点仍被提出，同时引起热烈的讨论。

1979 年，有人指出，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的真正的动力，或称原动力。所谓动力，是指始终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社会性质、推动社会形态转变的决定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人民。人民创造了历史，人民的生产活动是一切活动的基础，是历史发展的前提条件，人民群众是阶级斗争的主力军，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是革命思想的唯一源泉。人民这个原动力派生出三种动力：生产力，阶级斗争，先进的革命理论。[②]1980 年 3 月 6 日，俞兆鹏发表文章指出：生产力本身不会自动发展，推动它的发展必有一种更根本的动力。这个原动力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③]

1984 年，黎澍发表《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历史研究》1984 年 5 期)，以后又发表《历史的创造者和创造历史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 年 1 期)、《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光明日报》1986 年 7 月 30 日)、《历史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文汇报》1987 年 12 月 15 日)，也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提出质疑。这使整个史学界、学术界开始关注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历史创造者的讨论热烈起来。

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赞同观点及反对观点，详下。不同意见也可以参见“15.创新、人的创造性力量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13. 人的实践活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蒋大椿指出，历史前进的最高标准是生产力发展状况，因此只有那些推动生产力发展以及推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向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前进的人的实践活动，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究竟哪些人的什么样的实践活动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呢？一、生产活动；二、自然科学实践；三、进步的剥削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实践活动；四、革命的阶级斗争；五、进步的剥削阶级、集团为建立适应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新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及按照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改革、调整原来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活动，也是

---

① 孔立：《解放思想，各抒己见：历史系师生热烈讨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79 年第 4 期。
② 孔立：《解放思想，各抒己见：历史系师生热烈讨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79 年第 4 期。
③ 俞兆鹏：《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江西日报》1980 年 3 月 6 日。

历史前进的动力；六、在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存在分工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和人民群众凡是推动各该意识领域向着更加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向着更加接近人民的方向发展，并能通过政治、经济等中介，归根到底对生产力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科学的或文艺的实践活动，乃是各该意识领域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总之，凡是直接地或归根结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人的实践活动是历史前进的动力。究竟哪一种是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呢？这是由当时具体的客观社会存在决定的。[①]

李文斌认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②]活动即实践。这是人的实践活动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另一种表述。

郝立忠不同意人的活动是社会发展原动力的观点，指出，人的实践只是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而不是社会发展的起始的（或第一的）推动力；动因也只是形成动力的导因，而不是动力本身。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出“动力”的动力，这个力量就是也只能是管理。管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社会实践中的首要表现，是联系人类社会诸要素、促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起始力量。因而，只有管理才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③]参见“16.管理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14. *劳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

牟清指出，生产力作为人类的生产能力，在人进行生产之前，只是作为潜在的生产力被储存，通过生产劳动，将人的潜在能力释放出来，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而作用于劳动对象。在由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过程中，人的生产劳动起了决定作用。没有劳动，就不会有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潜在的生产力再大，也是不现实的。劳动是生产力实现的唯一途径，是生产力形成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力本身主客体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劳动引起和推动的。在生产力系统中，劳动者是决定其他因素的主体力量。劳动者通过劳动不断积累生产经验，形成新的劳动技能，通过劳动改进旧的劳动工具，创造新的劳动工具。新的劳动工具的出现，应用于劳动过程中又造就出具备新的劳动技能的新劳动者。劳动者、新的劳动工具、新的劳动者、更新的劳动工具，通过劳动过程，

---

① 蒋大椿：《历史的内容及其前进的动力》，《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 4 期。

② 李文斌：《社会发展动力网新构想》，《娄底师专学报》1989 年第 1 期。

③ 郝立忠：《管理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东岳论丛》1989 年第 5 期。

不断地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为什么劳动能够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呢？这可以从劳动的特质和劳动的历史作用两方面认识。劳动的特质有二：一是物质性，二是创造性。劳动对人类历史的作用，首先，人的劳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其次，劳动是社会形成的基础。社会的发展、社会制度的更替，最终也依赖于劳动推动的结果；再次，人的劳动也是人类自我发展的动力；最后，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同劳动的发展相统一的。劳动是从简单到复杂地发展着的，社会和人也是从简单向复杂发展的。劳动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①]牟清的主要观点是“劳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同时也强调了“人的创造性劳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

“劳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与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可以参见“3.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劳动也是一种人的实践活动，可以参见“13.人的实践活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15. 创新、人的创造性力量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1995年5月26日，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发表《努力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的讲话，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②]“创新动力论”遂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相关文章陆续发表了二百多篇。著作也有出版，如夏东民等《江泽民创新思想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周一平等《新时期创新思想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等。

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主要观点是：

张晓冬指出，创新至少可以有观念创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层面，它们共同直接推动着社会发展。一、观念创新为社会发展创造舆论环境，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二、科技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强大杠杆；三、制度创新为社会发展提供政策和体制保证。创新直接动力观是对社会发展直接动力问题的理想概括，回答了一切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而不只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弥补了现行各种动力观点的不足。[③]

赵振华认为，科技创新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动力，体制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机制动

---

① 牟清：《人的创造性劳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理论学刊》1992年第3期。

② 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③ 张晓冬：《创新：一种闪耀着辩证法和人性双重光辉的社会发展直接动力观》，《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力，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①]

吉彦波等把创新动力论和人民动力论作了比较分析，指出，一、人民动力论是革命的理论，创新动力论是建设的理论。二、"人民动力论"更多的是历史规律意义上的真理论，而"创新动力论"则更多地是现实选择中的价值论。三、"人民动力论"和"创新动力论"是普遍和特殊的关系。人民动力论是普遍，而创新动力论是特殊。最后，我们看"创新动力论"对于"人民动力论"的发展：一、"创新动力论"是对"人民动力论"创造历史主体认识上的发展。二、"创新动力论"是对"人民动力论"创造历史手段上的发展。三、"创新动力论"是对"人民动力论"创造历史认识上的发展。[②]

孙启贵等认为，纵观人类社会，必有某种最基本的动力机制，它决定和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路径和总的方向，成为所有不同动力因素的基础。这种动力机制，归纳起来无非两种：一种是技术创新，一种是社会创新。[③]

16. 管理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郝立忠指出，要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起始动力，就必须首先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关系进行概括和抽象。在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中，人们不外乎处理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有人的分工协作。而要搞好人的分工协作，就要进行人的组织管理。同时，还要进行生产过程管理和财物管理。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要的就是对人的织织管理问题。只有人的组织管理搞好了，才能真正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关系，进而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不论人类社会进行什么活动，都必须以管理作为起始的推动力量。不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都是人的活动的结果。管理则是推动这一活动的起始力量。没有管理，人就无法很好地从事这些活动。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有明确的目的作指导。管理则是人们把目的付诸现实的首要环节。管理旨在通过合理的计划、组织和协调，使用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最大限度地实现目标。管理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起始力量，又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得以成功的保障。虽然生产、科技、教育等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它们

---

① 赵振华：《"创新动力说"探析》，《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1 年第 3 期。

② 吉彦波等：《创新动力论：历史动力研究的新发展》，《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2 期。

③ 孙启贵等：《技术创新与社会创新：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未来与发展》2007 年第 10 期。

都是比管理低一个层次的推动力。它们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更为直接，却不是起始力量。①

冯天策不同意管理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的观点，指出，像管理这样一种主观意志行为也被堂而皇之地鼓吹为社会发展第一推动力，且论列其现实意义，可见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是多么远了。但是，无论科学多么发达，社会管理多么完善，人的主观意志也不可能决定历史的发展。②

17. *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类不断扩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

有人提出，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类不断扩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正是这种需要促使人们去进行历史活动，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并认为只有把握住这个“需要”，理论才是彻底的。③

赵军政指出，人的需要是实践的内在动力，这是一条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规律，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④

不同意人的需要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主要是：

韦杰廷指出，不是人们的需要和欲望决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人们的需要和欲望。如果说，人们的需要和欲望也是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一种动力，那么，它们也只能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动力。我们并不否认这种精神动力的作用，但我们决不可把这种动力当作历史的根本动力。否则，就会违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就会片面强调人的欲望和需要这种主观因素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忽视客观物质条件和客观规律。⑤

18. *人的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是历史发展动力*

吉彦波指出，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成为历史发展动力呢？首先，它必须是矛盾的统一体。其次，它必须是反映历史何以能够发展的终极原因。再次，它必须是最终的抽象。“人的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作为历史发展动力，能满足如上条件。首先，它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观点，能以自

---

① 郝立忠：《管理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东岳论丛》1989 年第 5 期。

② 冯天策：《论社会发展的动力——评〈管理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东岳论丛》1990 年第 2 期。

③ 龚益鸣：《“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本校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学术讨论会见闻》，《暨南学报》1980 年第 1 期。

④ 赵军政：《人的需要是人的实践动力的历史证明》，《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89 年第 4 期。

⑤ 韦杰廷：《人的需要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兼与严钟奎等同志商榷》，《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0 年第 4 期。

身内在矛盾的同一和斗争推动自身发展并进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其次,需要与生产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再次,需要与生产的矛盾是对历史发展动力的一个极度抽象。①

郝立忠不同意“人的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指出,不论是生产力,还是人的需要,都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但是,生产与需要的矛盾是不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呢? 当然不是。不仅不是第一推动力,甚至也不是推动力。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只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反映,其本身并不是一种现实力量。作为推动社会发展动力的,只能是解决这些矛盾的现实力量。只有这些矛盾解决好了,社会才能向前发展。否则,这些矛盾越尖锐、越突出,社会便越混乱。而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加强社会管理。因为社会管理的目的就是解决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不是社会的各种矛盾自身,而是对社会各种矛盾的解决,是解决这些矛盾的现实力量。社会发展的程度,也只能以这些矛盾解决的程度来衡量,而不能以这些矛盾本身来衡量。这些矛盾解决得好,社会就进步,就向前发展。否则,就停滞,甚至倒退。②

19. 人的需要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徐兴庚指出,在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众多动力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个最根本的终极动力的,那就是人的需要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第一,我们讨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所谓人类社会,其最基本的因素即是人和与人类社会有关的自然界。或者说,人类社会即是人和人类有关的自然界的统一体。所以,人与自然的矛盾即是这统一体的根本矛盾。因为人从根本上说是个需要的主体,因而我们把人的需要与自然的矛盾看作人类社会历史的最终推动力。诚然,人的需要和自然,各自都是由其他东西推动的,例如人的需要即是由生命有机体的进化和社会经济生活的状况推动的,自然也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原因。但是,推动人类社会构成因素发生发展的动力,不能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动力。第二,我们探讨社会历史的最终动力,只能到社会内部的矛盾中去寻找,如果脱离这一矛盾,到其他因素或矛盾构成因素中去寻找,结果只能是走向荒谬的无限循环。而人的需要与自然的矛盾是人类社会中最根本的矛盾。作者还认为,把人的需要与自然的矛盾理解为社会历史的最终动力,较之原先的那些历史动力观,起码有两点优越性。首先,

① 吉彦波:《历史发展动力应是人的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理论学习月刊》1989年第11期。

② 郝立忠:《管理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东岳论丛》1989年第5期。

它更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原意；其次，它恢复了人的需要在社会历史动力观的地位。①

人的需要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是根本的动力的观点，与人的需要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可以参见“17.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类不断扩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

20. 人的欲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有人主张，人的欲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欲望，包括需要、要求、理想等。没有欲望就没有人类历史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经济的发展，阶级之间的斗争，无不隐藏着人类的各种欲望。卑劣的欲望——贪欲和权势，推动着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崇高的理想——“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推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鼓舞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不断前进。所以，可以这样说，生产力只是历史发展的标志，阶级斗争只是在阶级社会中推动历史发展的一种手段，只有人们的欲望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②

陈为指出，中华民族振兴自我、赶超西方文明的愿望，确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把整个民族维系在一起。这是全民族发奋图强的力量源泉，也是推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③

欲望和需要有相似之处，可以参见“17.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类不断扩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18.人的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是历史发展动力”、“19.人的需要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21. 物质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为什么物质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有人指出：一、人对物质利益的需求，是社会生产的起点和目的，它贯串于人类社会的全部过程，推动了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二、阶级矛盾源于物质利益，阶级消灭依靠物质利益；三、物质利益也是剥削阶级调整生产关系的杠杆。④

赵俊臣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进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都是直接、间接

---

① 徐兴庚：《马克思主义历史动力观略辨》，《九江师专学报》1990年第4期。
② 孔立：《解放思想，各抒己见：历史系师生热烈讨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③ 陈为：《浅析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6期。
④ 胡素卿：《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综述（特约稿）》，《哲学动态》1980年第8期。

地为了物质利益，推动一些阶级之间或一个阶级内部联合起来同另一阶级进行斗争的动因，也只能是物质利益。在人类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的真实目的，或者说推动阶级斗争的根本动力，都是为了争得或保护本阶级的物质利益。因此，否认了物质利益这个根本动力，也就否认了阶级斗争，也就谈不上有社会的任何发展。①

任玉玲等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以生产力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在这个复杂系统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物质利益。物质利益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因，而是社会发展诸因素中最深层次的客观动因。离开物质利益而考察社会的各种矛盾，都将因离开人类生存、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历史前提"而重新掉进唯心史观的泥坑。②

苏宗强指出，物质利益是人们进行政治活动的物质动因，是人们从事文化活动的物质动因，是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内在动力。物质利益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它是隐藏在人们的精神动力背后的物质动因。③

高宪杭不同意物质利益是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指出把物质利益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是不妥的。一、物质利益本身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物质利益是由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和产品分配方式决定的，这正是生产关系的问题，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二、物质利益归根到底要靠发展生产力来解决。当然物质利益也可以靠掠夺、盗窃、骗取获得，但这是物质利益的转移问题，不是物质利益的产生问题。要正当地得到物质利益，必须靠发展生产力来解决。所以，把物质利益说成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还没有说到问题的根本。再说，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好物质利益问题，不但不是动力反而是阻力。④

22. *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有人提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个科学概念的规定性，就在于不能离开人类生存发展的矛盾的存在和解决，以及不能忽视产生和解决这些矛盾的任何一种因素。配称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的，只能是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同时又以其内涵的各种因素表现为直接动力）。因为人类社会的各种实践活动，都是社

---

① 赵俊臣：《阶级斗争的动因是物质利益》，《云南日报》1979年11月23日。

② 任玉玲等：《物质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原因》，《河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③ 苏宗强：《论物质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华中师院学报》1985年第4期。

④ 高宪杭：《试论社会发展的动力》，《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不可分割地联系着、运动着的方面，既体现着贯串整个历史长河的经常存在的矛盾运动，又体现着人类不断解决这些矛盾的全部实践。所谓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不仅具有人类为获得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意义，而且必然包含着人类为保证经济与文化发展所必须进行的解决社会内部矛盾的全部活动（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意义。无论是阶级社会还是无阶级社会，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无非是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①]

赵轶峰进一步指出，历史发展的动因在于人们迄今为止以经济活动为主要基础的全部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历史地演变着的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中人的自主选择发挥日益增强的作用，未来历史的发展，几乎可以肯定会增加某些我们迄今从未给予注意的新的重要因素。[②]

杨立国等也认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恩格斯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③]

23. 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两种生产的矛盾运动推动历史发展

黄焕山认为，两种生产的矛盾运动推动历史发展，指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另一个是进行人类自身的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然而人类自身的生产起繁衍人种的作用，个人生命的生存，无疑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没有人类社会，自然也就无所谓物质资料的生产。因此单有前者，而无后者，或者反之，人类都会走向灭亡。物质资料的生产，总是由一定数量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特定生产方式下结合而形成的，而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劳动者，没有劳动者就不能使用生产资料，也就无所谓生产，因而没有人类自身的生产，也就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而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一定的分配方式又决定着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也就没有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类社会正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构成的一个矛盾统一体。它们的发展决定社会的发展，它们的规模、程度、状态与性质，决定社会发展的规模、程度、

① 龚益鸣：《“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本校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学术讨论会见闻》，《暨南学报》1980 年第 1 期。

② 赵轶峰：《历史发展动因论》，《中国史研究》1989 年第 3 期。

③ 杨立国等：《论社会历史规律的内在推动力》，《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5 期。

状态与性质。只有从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矛盾统一体中，才能找到推动历史发展的钥匙。①

王安琦则认为，唯物史观所说的人类社会的现实前提和基础，既不单纯是物质资料生产，也不仅仅就是除此之外再加上人类自身生产，而是由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所组成的统一的社会生产，即直接生活的生产。首先，按照一般系统论的观点，整体不等于各个部分的总和，而是出现了整体的新质。所以，仅仅把人类社会的现实基础归结为两种生产还是不够的，并没有跳出因素论窠臼。要真正体现人类社会现实基础的整体性质，只有把它看作包含两种生产在内的更高一级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正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其次，对于人类社会现实基础的这种理解，还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两种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肯定直接生活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的现实基础，也就意味着承认这种生产是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进而也就必然承认组成直接生活生产的两种生产在社会发展中是始终起作用的。②

24. 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赵吉惠认为，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指出生产力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且其性质和发展水平又是衡量社会发展高低的物质标志。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力，主要的应该去寻觅是何种力量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推动生产力发展，从而引起社会结构一系列变化的物质力量，才是历史发展的最根本力量。而这种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力量就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从中国历史及世界各国的发展看，通过调整生产关系都可以对生产力发展起直接的推动作用。③

赵俪生则认为，社会经济的内部动力是生产力。生产力是动力，生产力跟生产关系的矛盾也是动力，这二说并不互相违背和排斥。单独生产关系自己不能成为动力，因为在一种情况下，它不仅不是动力，而是阻力；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与生产力的配合，才形成为动力。生产关系自己是不行的。④

杨生民不同意生产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详见“5.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

① 黄焕山：《人类自身的生产也决定历史》，《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 1 期。

② 王安琦：《论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 1 期。

③ 赵吉惠：《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西北师大学报》1980 年第 2 期。

④ 赵俪生：《从土地所有制角度来理解农民战争的几个问题——兼论历史前进的动力》，《兰州大学学报》1981 年第 2 期。

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25. 社会改革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1978 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取得巨大成就，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黄起治《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延边大学学报》1984 年第 3 期)、培琳《改革是中国历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西北民族大学学报》1987 年第 3 期)这类的文章陆续发表了五十余篇。

苏天明等 1980 年发表文章指出，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里发挥的动力作用，既可以社会革命的暴力形式表现出来，也可以社会改革的和平形式表现出来。在历史上也进行过许多次社会改革，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前进。社会改革，不仅在从旧社会、旧制度向新社会、新制度的根本转变过程中能发挥巨大的动力作用，就是在各个阶级社会里，在生产关系基本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漫长岁月里，当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阻碍了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时候，社会改革就能起到调整那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环节，使生产关系又基本适合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从而推动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忽视社会改革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否认社会改革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动力，并不是实事求是的。①

以后，康文斌提出，社会改革是变革历史的直接形式和动力，社会改革处于历史动力系统的最高层次，是诸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表现为各种动力合力作用的凝聚点。社会改革之所以成为诸动力合力作用的凝聚点，是因为诸动力的内在要求，都只有通过社会改革才能实现。诸如需要和利益的满足、基本矛盾的解决等，只有通过社会改革才能实现。而社会改革作为诸动力合力作用的凝聚点，则表明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革是诸动力协同作用和合力作用的结果，体现了社会改革在历史动力系统中的独特地位、作用和意义，也表明，关于历史动力系统问题，关于历史的合力问题，关于诸动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作用问题等等，都只有结合社会改革理论的研究，才能全面完整地阐明。②

陈虎等指出，改革有非暴力、暴力(革命)等形式。可以说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进步都是由改革推进完成的，改革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改革的成败与社会、国

---

① 苏天明等:《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浅谈》,《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0 年第 2 期。

② 康文斌:《社会改革在历史动力系统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晋阳学刊》1993 年第 2 期。

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可以说改革与创新是人类得以进步、飞跃的主要动力之一，是历史发展的永恒主题。①

一些主张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的学者，大都不太赞同改革、改良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可参见“2.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26.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黎澍《历史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专门设了“恶的历史作用问题”一节，很简要地论述了恶的历史作用。谈道“恶是历史发展动力”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世界联系的加强，殖民地民族的觉醒，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这是进步，这个进步的动力是恶。而与进步相伴的又是与进步相反的现象或副作用。②此后，关于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问题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和讨论，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都有学者撰文讨论这个问题。

黎澍并没有说清楚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恶”的含义是什么，冯溪屏分析了恩格斯对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看法，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一方面，黑格尔把善理解为道德意志的肯定方面，把恶理解为否定方面。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对既存的社会事物的否定，若用既存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来看，是恶的。但正是这种恶，造成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以，恩格斯在解释黑格尔关于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的第一层含义时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3页)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用旧的道德标准评价为恶的东西，恰恰是新事物的因素的萌芽，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表现。然而，这种新事物的因素，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用新的道德价值体系来评价，必定是一种善。另一方面，黑格尔还把某种情欲——贪欲和权势欲等，视为道德意志的一种表现，是恶。黑格尔认为，“从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或者简直可以说是利己的企图而产生的人类活动”，乃是“绝对精神”实现其历史原则的手段或表现形式，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或者说，人的恶劣的情欲，如果体现了“绝对观念”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就能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杠杆。所以，恩格斯这样阐发了黑格尔命题的第二层含义：“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① 陈虎等：《改革与创新——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5期。

② 黎澍：《历史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文汇报》1987年12月15日。

第四卷第 233 页）恩格斯在这里所表述的黑格尔的思想，并不是抽象地讲贪欲、权势欲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是说当由这种贪欲或权势欲的推动而产生的“人类活动”体现了某种历史必然性的时候，它才成为历史的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①

查昌国指出，“恶动力”思想，在西方始于基督教的原罪说：亚当、夏娃吃了禁果，犯“原罪”，“堕落”为人，其后代皆不能以自力避免“原罪”，因而人的本性是恶的。正因为自己是罪恶的存在，所以人要不断地追求完善，为得救而奋斗。黑格尔是把“恶”归属于精神范畴，从人的情神发展角度分析“恶”的作用，论证“恶”是人道德完善与超越的原因和动力。②

赵家祥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同样认为“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但他们不是把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归结为“天意”、“自然的意图”、“理性的机巧”之类的东西，而是归结为人自身的实践活动，归结为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主要是归结为人的物质生产活动。③

有一些学者提出，要准确地认识恩格斯对恶的历史作用的论述。

陆贵山指出，马克思主义不否认恶的历史作用，但从来没有把恶当作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写道：“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段话明明写着：“在黑格尔那里”，因此只能解释为是恩格斯对黑格尔的伦理思想的概括性转述，而决非恩格斯本人的论点。恩格斯的意思是说，黑格尔看到了恶的历史作用，比费尔巴哈从崇拜抽象的人出发单纯地鼓吹空洞的“善”和泛爱主义要显得全面和深刻，并非申明自己主张“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段话的引用者们为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来支撑自己的理论，竟然将黑格尔的论点说成是恩格斯的主张，用制造一个恩格斯的手段向马克思主义挑战，这是一种极不严肃的学风。④

陆贵山的文章发表后，李玉铭发表《恶的历史作用与文艺创作问题》（文学评

① 冯溪屏：《恶的历史作用辨析——读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札记》，《玉溪师范学院学报》1989 年第 1 期。

② 查昌国：《“恶”促使人自我超越与道德完善——黑格尔“恶动力”思想浅析》，《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2 年第 3 期。

③ 赵家祥：《简论“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江汉论坛》2002 年第 9 期；又见赵家祥：《一种不可遗忘的历史动力——关于“恶”的历史作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6 期。

④ 陆贵山：《对文艺的非理性主义的理性审视》，《光明日报》1990 年 4 月 12 日。

论》1992年第1期)进行了批评。很快,陆贵山对李玉铭的批评也进行了反批评,指出从总体、全局和主导方面看,"恶"和"卑劣的贪欲"不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和"根本动力",而人民、以人民为主体的阶级斗争,体现人民利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才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和"根本动力"。①

徐冲德指出,马克思主义肯定恶的历史作用,绝不等于肯定恶在任何时代、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是历史发展的杠杆。从恩格斯的多次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恶的历史作用是针对文明社会的产生和整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而言的。而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无论是在古代的原始社会,还是现代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道德上的恶并不一定具有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恶的历史作用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前提的,一旦剥削制度被彻底消灭,恶也就失去了其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而社会历史仍将继续前进。②

李雨村指出,"恶动力说"同时犯了两个错误:一方面陷入伦理相对主义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又步入伦理绝对主义误区。他们不加任何分析地一律把情欲、物欲、权欲统斥为恶的本性的发作,从而确认恶是个人人生目的与历史发展的驱动力,但又不愿对人的欲望哪些是合理的应当满足的予以充分肯定,更不打算对不合理的欲望作出具体的令人满意的分析,笼统地把一切欲望斥之为"恶",且又得出它是历史与社会发展动力的简单结论,这是不足以说服世人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分析恶的真实历史作用时,除了无情的义愤和强烈的谴责之外,没有一丝一毫对它肯定的意思。我们对于经典作家的某些论点和论断,绝不能离开当时的客观前提和语言环境,而仅仅抓住一些只言片语,加以主观的理解。今天我们必须摒弃"恶动力说"。③

李觐指出,一、大多数道德之恶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阻碍作用。二、有些道德之恶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另一条件下不起积极作用。三、有些道德之恶在对历史发展起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起着很大的消极作用。对这类道德之恶的历史作用也必须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④

---

① 陆贵山:《怎样理解恶的历史作用与文艺创作问题》,《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

② 徐冲德:《恶的历史作用刍议》,《社会科学》1992年第7期。

③ 李雨村:《"恶动力说"质疑》,《江淮论坛》1997年第4期。

④ 李觐:《正确认识道德之"恶"的历史作用》,《淮阴工业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4期。

谢广宽指出，黑格尔并没有提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恩格斯的那段论述不是对黑格尔思想的简单转述，而是对黑格尔“人性本恶的思想比人性本善的思想更伟大”这个观点作了发挥，进一步提出了“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的伟大思想。恩格斯加上“在黑格尔那里”这几个字，只是指出了这一命题的思想来源。但恶只是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它本身并不等同于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并不等同于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不是恶，……构成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力的，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的行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伦理领域可以以恶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不排斥它也可以以善的形式表现出来。“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恶都可以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恶能否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表现出来的形式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还要看它能否适应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有顺应历史发展规律、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恶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才能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成为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恩格斯提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一命题只是强调了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并没有主张“恶动力说”。而且恩格斯在论述恶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对这些恶进行了道德上的批判和谴责，因此，任何人不能打着恩格斯的旗号用恶动力说来为现代社会中的欺诈、背信、贪污、受贿等恶的行为作辩护。[①]

27. 精神动力已成为历史发展的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

孙显元指出，在历史发展的动力中，不仅存在着精神动力，而且精神动力的存在是社会运动与自然运动的根本区别。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决定作用。一种是功能决定作用，另一种是本原决定作用。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和政治决定精神，这是本原的决定作用，属于本原决定论范畴；精神反作用于政治，政治和精神反作用于经济，这是功能的决定作用，属于功能决定论范畴。人类的“现实生活”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从本原决定论的观点看，归根到底，经济生活决定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从功能决定论的观点来看，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同样决定着经济生活，它们是相互决定的。因此，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不只是经济动力，政治动力和精神动力同样起着决定的作用。如果唯物史观肯定“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

① 谢广宽：《恩格斯与“恶动力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论析》，《许昌学院学报》2005 年第 6 期。

素,而且“现实生活”又包括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那么,我们必须肯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它们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各种社会动力的决定作用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比重,是要发生不断变化的。就是说,在功能决定作用中,起着第一位决定作用的,并不始终是经济动力,也可能是政治动力或精神动力。在物质需要得不到极大的满足时,经济动力一般地起着主要的作用。但是,在今天的社会中,一方面,物质生产有了高度的发展,而且物质需要的满足又总是有限度的;精神需要的不断产生和满足则是无限的,从而在发展的总趋势上,产生了精神动力作用的日益上升而成为第一位决定作用的历史趋势,经济动力则最终会降低为非主要动力。另一方面,精神生产的不断发展,并日益渗透到物质生产中去,直至知识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超过土地、资本和自然资源的作用,使精神生产逐步地成为物质生产的基础。这时,社会的精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便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知识经济的到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它使精神动力成为历史发展的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今天,时代把精神动力提高到了社会动力的首位,成为第一位的决定作用。纠正忽视精神动力的倾向,实现哲学研究从经济动力研究向精神动力研究的转向,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①

28. *层级动力说*

有的同志指出,凡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一切因素和力量,都应该属于“动力”的范畴。科学技术、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阶级斗争、先进的政治制度和革命思想,等等,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不在于哪个是动力,哪个不是动力,而在于这些动力分别处于哪个层级,具有什么特点,如何推动历史前进。社会形态的层级结构依次是,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依次是,生产力、同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政治制度、反映生产力要求的意识形态。在这种层级结构的矛盾系统中,前者是后者的根源,后者依赖于前者,但它们都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动力,缺一不可。不过,由于这些因素和力量分别处在不同的层级、它们作用的特点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方式各不相同。有时这一层级动力的作用比较突出,有时另一层级动力的作用又比较突出。②

张守意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动力有着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外

---

① 孙显元:《论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合肥联合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② 胡素卿:《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综述(特约稿)》,《哲学动态》1980年第8期。

部的表面的，即上层建筑领域（精神的动力和暴力等）各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就上层建筑来说，其主要功能特点是“能动性”；第二个层次是阶级斗争，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第三个层次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它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动力。[①]

(三) 几点初步的结论

以上围绕唯物史观历史动力论的众说纷纭的意见，足见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唯物史观的历史动力论的讨论多么火爆，现在要企图归纳出几点公认的结论，大概是不可能的，只能就迄今为止讨论中笔者认为是较为合理的意见归纳几条如下：

1.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首先要坚持从物质、人、实践出发考察历史、社会，从人的实践出发，从经济基础出发考察历史、社会，而不是从人的意志、愿望、动机出发考察历史、社会。人是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主体，是创造人类社会、历史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人类社会，没有人类历史，没有生产力，没有生产关系，没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没有阶级、阶级斗争。生产力发挥作用、阶级斗争发挥作用、科学技术发挥作用都离不开人、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创造性活动。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创造性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力量。

其次要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但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发展、经济基础推动上层建筑发展，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是第一性的；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推动经济基础发展，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是第二性的。

2. 坚持辩证法基本原理

坚持矛盾的运动、斗争推动事物发展，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斗争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的所有矛盾运动、斗争都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其中的基本矛盾运动、斗争起基本的推动作用，其中的主要矛盾运动、斗争起主要推动作用。人只有在矛盾运动、斗争的实践中才能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只有在矛盾运动、斗争中才能对人类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

---

① 张守意：《从历史发展动力看改革开放》，《惠州学院学报》1992 年第 2 期。

坚持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基本原理。不能一成不变地静止地看问题。社会矛盾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方面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不是静止不变的。从历史发展、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看，动力有第一性、第二性之别，但推动每一具体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什么，由具体的当时的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决定。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主要矛盾不同，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也不同。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哪个对人类社会发展起主要推动作用，要具体社会、具体时期、具体地区具体分析。

坚持辩证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看问题，而不是机械地、片面地、极端地、非此即彼地、割裂地看问题。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众多的，是互相联系、互相支撑、互相制约的，只有一种力量是动力其他都不是动力的"唯一动力"说，如"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等，都是不妥当的。

人的实践活动要全面地辩证地看，创造性的、方向是前进的与历史发展规律一致的实践活动才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推动作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作用要全面地辩证地看，创造性的、方向是前进的与历史发展规律一致的各种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运动、斗争才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动力、作用要全面地辩证地看。动力、作用是多种多样的，是正动力、正作用还是反动力、反作用？要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分析。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前进的动力、作用是正动力、正作用。阻碍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前进的动力、作用是反动力、反作用。正动力、正作用与反动力、反作用不应混为一谈。

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前进的矛盾运动、斗争要全面地辩证地看，其中的矛盾运动、斗争可以是对抗性的也可以是非对抗性的，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非暴力的、和平的，可以是激烈的也可以是和缓的、和谐的，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前进的矛盾运动、斗争并非一定是对抗性的、暴力的。

3. 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要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任何科学理论都需要与时俱进、新陈代谢，否则一落伍，就失去现实性、科学性。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要坚持，更要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主张吸取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成果丰富、发展自己的理论。21世纪的今天，就是要吸收当今世界一切优秀成果，吸收新文化、新理论的合理成

分，来丰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并用发展了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历史研究，指导历史动力论的研究、讨论。

要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受传统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个别论断的束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强调自己的理论不是教条，研究任何问题不能从已有的本本、教条出发。只有从新的社会的新的实际出发、从新的历史事实出发，进行新的科学探索，才能实现理论创新，才能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比如，21 世纪以来，社会制度的变革是不是在发生新的趋势？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是在发生新的变化？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不是在发生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是不是在发生新的变化？这些都要实事求是地、解放思想地探索研究，在探索研究中进行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4. 历史研究要与时俱进

一个学科不与时俱进、新陈代谢，就会被淘汰。历史研究要与时俱进、新陈代谢，视野拓展、研究对象升级、话语更新是必然趋势，研究的多元化是必然趋势。历史研究的与时俱进、新陈代谢，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的研究也会与时俱进、新陈代谢，也会不断有新的认识。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史学研究的全球化趋势也势不可挡。封闭的井中自乐的研究一去不复返。任何历史、历史理论、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要追求科学性，就必须有全球的视野，必须倾听全球的意见，必须追求更多学者、全球学者的认同，必须在全球的论辩中站得住，历史动力的讨论及观点也是如此。

新世纪的历史研究及其研究任务，已不只是研究一幕一幕阶级、阶级斗争，也要研究生产、生产斗争、科学、科学实验，研究人与自然关系史、环境史、能源史等已日益重要，这自然会使“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的论断不合时宜。

研究历史的重要任务是探索规律、总结经验教训，以有益于面对未来。21 世纪的历史研究，不仅要探索总结阶级斗争的规律、经验教训，也要探索总结政治建设的规律、经验教训，更要探索总结经济建设的规律、经验教训，探索总结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经验教训，探索总结社会建设的规律、经验教训，探索总结环境、生态建设的规律、经验教训，才更有益于面对未来、迎接未来、建设未来、开创未来。这应是历史动力讨论、史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

关于历史发展动力论问题的讨论，还可以参见牛润珍《关于历史学理论的学术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肖黎主编《20 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等。

四、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论争

（一）历史创造者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宣传、讨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马克思、恩格斯曾说："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阶级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①]马克思、恩格斯还揭示了无产阶级是埋葬资本主义旧世界、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基本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工人的歌中得到了通俗的反映："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苦大众。"（法国工人诗人鲍狄埃 1871 年写的《国际歌》）

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力量的揭示，在俄国 1917 年"十月革命"中得到了证实，从此，工农群众改造世界、创造世界的力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明确提法，黎澍认为，是苏联哲学家普·尤金、巴·伯纳丁在 1939 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的，是对 1938 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中某些观点的引申，后来苏联人编写的《历史唯物主义》书都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章节。[②]这是事实。《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2 页。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论述，可参见刘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非苏联学者的首创》（《理论探索》1988 年第 1 期）、陆剑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学术创新——论中国化的"历史创造论"》（《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 年第 5 期）等。

② 黎澍：《论历史创造者及其他》，《历史研究》1984 年第 5 期。尤金：《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载苏联《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39 年第 5 期，伯纳丁：《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载苏联《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39 年第 7 期。两文由博古中译，收入博古编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第 4 册（延安解放社 1941 年版，1943 年再版）。博古中译本，尤金作"尤琴"（第 1219 页）；伯纳丁作"伯那丁涅"（第 1167 页）。尤金文引用了《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观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说，人类社会底历史首先是由劳动群众、物质财富底生产者创造的，他们在机器之旁、在田野里，当创造物质财富时，创造着历史。他们之创造历史，更在人类历史的转变时机、在社会震动的时机，这时候人民、群众、劳动者决定着斗争底结局"（第 1190—1191 页）。伯纳丁文也引用了《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观点，强调了"历史底创造者，首先就是劳动群众，他们是社会物质财富底创造者，是社会底最重要的生产力"（第 1144 页）。"人民是历史底创造者，这在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中也明白地得到解答，人民的创造力，这就是世界艺术天才作品所创造的强有力的灵感力底无穷尽的源泉。"（第 1160 页）（以上页码均为沈阳中华人民共和国书局 1949 年翻印本《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第 4 册）

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撰写)指出："生产物质资料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以及因有相当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发动着生产工具并实现着物质资料生产的人——这些要素总合起来，便构成为社会底生产力。但生产力还只是生产底一方面、生产方式底一方面，……生产底另一方面，生产方式底另一方面，便是人们彼此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关系，即人们底生产关系。……社会发展史首先便是生产发展史，数千百年来新陈代谢的生产方式发展史、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发展史。由此可见，社会发展史同时也就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底历史，即身为生产过程中基本力量并实现着社会生存所必需物质资料生产的那些劳动群众底历史。由此可见，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便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底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底行动，而是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底历史、劳动群众底历史、各国人民底历史。"①既然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那么历史是劳动群众创造的、劳动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不过，这样的观点，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挥。

在20世纪20—50年代，苏联共产党人的思想、列宁的思想、斯大林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是巨大的，②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依靠和发动工农群众才能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被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宣传并付诸实践是自然的。

长沙新知书店1938年初版、桂林新知书店1939年再版的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增加的《群众领袖与历史：再版代序》(1939年3月1日)就说："只有群众的力量的兴起，才能执行任何一个历史的行动。反之，没有群众的力量，任何历史的行动也是不能实现的。因此，群众的力量与行动，是一切过去以及未来的历史行动决定的力量。"③又说："历史是被群众、被革命的劳动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的广大人民所

---

①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38年中文版，第152—153页。

② 在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时，中国共产党人按照列宁、斯大林的指示、思想去做是无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视苏联为"老大哥"，仍强调按照列宁、斯大林的指示、思想去做。当时发表的文章就有：若：《列宁主义永远活着，并无往而不胜!》，《世界知识》1954年第3期；萨坡什尼克夫、汤侠声：《列宁主义战无不胜的力量》，《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5年第1期；吴大琨：《永生的列宁主义》，《文史哲》1955年第4期；荣孟源：《历史科学工作者遵循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前进》，《大公报》1953年3月26日；郭沫若：《中国科学工作者循着斯大林指示的道路前进!》，《科学通报》1954年第3期，等等。《文汇报》1949年11月7日第3版《书的消息》中提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早已成为中国人民最爱读的书本之一。"《文汇报》1954年10月3日第6版发表束世澂《只有学习苏联》。《文汇报》1957年11月11日第2版发表裴文中《在学术上，向苏联学习什么?》，亦可见苏联的影响。

③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桂林新知书店1939年再版，第9页。

创造，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者的见解。"[①]并引用了恩格斯的话："所谓一种历史的动力，决不是什么单独的个人，即使这个个人是一个杰出的个人，而是广大的群众。"(按：没有注出处)[②]引用了斯大林的话："在以往，人们都以为领导者是历史的唯一创造者，而不承认大众对历史的创造作用；现在，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现在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不仅是决定于领导者，而首先是决定于群众，决定于百万百万的劳动阶级。工人与农民……他们生产所有的生命要素，给予全世界人类以衣食——他们才是新生命的真正英雄与创造者。"(按：没有注出处)[③]指出，认为人类历史是英雄决定的，群众不过是英雄手中的工具，这是法西斯崇拜英雄、鄙视大众的历史理论。[④]翦伯赞在再版的《历史哲学教程》增加《群众领袖与历史：再版代序》，作了以上的论述、宣传，无疑是受到了《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影响。

在 1941 年 5 月至 1945 年 4 月的延安整风运动中，《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是学习文件，其影响自然不断扩大。同时，博古编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4 册)由延安解放社 1941 年出版、1943 年再版，其中第 4 册收入了尤金《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伯纳丁《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劳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影响不断扩大是自然的。

1944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致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⑤]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⑥]1945 年 5 月，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其中谈道："毛泽东同志经常说：人民群众是真正伟大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只有依靠了人民群众，才是不可战胜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真正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⑦]

1949 年 5 月，范文澜在北京大学作"谁是历史的主人"的讲演时谈到："生产力是由生产工具和'人力'组成的。'人力'里面包括劳动技能和生产经验。生产工具

---

①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桂林新知书店 1939 年再版，第 16 页。
②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桂林新知书店 1939 年再版，第 16 页。
③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桂林新知书店 1939 年再版，第 17 页。
④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桂林新知书店 1939 年再版，第 18 页。
⑤ 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22 页。
⑥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1031 页。
⑦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50 页。

是谁制造的？由谁使用呢？很明白，生产工具是劳动人民制造的，也是由劳动人民使用的。例如工人造了铁犁，农民使用铁犁来耕种。既然生产力是历史的推动力，那么制造生产工具和使用生产工具的劳动人民便是历史的推动者，也就无疑是历史的主人。"同时又说："中国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加上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和统治阶级中在政治上、军事上作过有益于人民事业的人。过去的历史是以帝王为主的历史，我们今天要推翻它。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①范文澜1940年到延安，得以经常与毛泽东交谈，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他的讲演一方面受到毛泽东及《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影响，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共中央要求大规模地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宣传的反映。

《人民日报》1949年9月7日发表华明《工作干部应好好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谈道自从我们进入平津以后，改造新区知识分子、职员、工人的思想，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中央指示要大规模地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宣传"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主人"的思想，党内、党外参加这一学习运动的人是成千成万的，在思想改造上、在克服轻视劳动人民的观点上、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观点上确实收了很大效果。可是我们有些在工厂中工作的干部，他们过去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既然很生疏，此次又因忙于接管工作，顾不上参加这个伟大的学习运动，有些人或者还有轻视理论学习的观点，这些人必须补课。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被中国共产党人广泛宣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自然进一步成为有政治意义、有理论意义、有学术意义、有实践意义的主流思想，并更加广泛地宣传。

1950年4月17日晚上19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社会科学讲座由艾思奇讲"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社会发展史第一章第三讲)。1950年7月24日又在上午、晚上两次播放"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社会科学讲座。

《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1日第7版发表《来稿文摘》谈道：如对于土改问题，

---

① 1949年5月29日《进步日报》，转引自黎澍：《论历史创造者及其他》，《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陈其泰：《"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论题的价值——兼评〈历史的创造及其他〉》，《齐鲁学刊》2000年第5期。

② 华明：《工作干部应好好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人民日报》1949年9月7日第5版。

《长江日报》进行了连续的“地主是谁养活的?”的讨论;对于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问题,《解放日报》作了“英雄造时势? 时势造英雄?”的讨论。都收到了相当大的宣传效果。

《人民日报》1951年5月24日发表《两年来北京市的在职干部理论学习》,谈道:一九五〇年四月到十月是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市委宣传部开始重视学习的思想领导工作,举办系统的全市性的理论讲座;并决定乙、丙两班都学习《社会发展史》,请艾思奇同志定期作报告。其重点是学习历史唯物论的几个基本观点,以达到改造思想、改进工作作风的目的。这个阶段学习的收获比较大,干部普遍接受了劳动群众创造历史和阶级斗争的思想。新干部中的超阶级观点、个人英雄主义和部分老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均得到揭发和批判。①

《人民日报》1952年5月1日发表马叙伦《迎接劳动人民的世纪》,谈道:“几千年来,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地流汗、流血、劳动、生产,用血和汗织成人类的文明,创造和发掘了人类无穷无尽的财富,自己却很少享用,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毫无例外地被不劳而食的统治者们强取豪夺,恣意挥霍,还有血腥的破坏和践踏。真正的朴实的历史创造者,长期被冒牌的‘主人’诬蔑为‘群氓’,为‘流寇’。然而历史终究是劳动的历史、劳动人民的历史,它必然遵循着劳动群众的意向前进的。”②这大概可以作为民主人士也接受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思想的反映。

《人民日报》1954年4月22日发表(苏)瓦谢茨基《列宁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再次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正确地、科学地确定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凿地指出了,正是广大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社会的历史是物质财富生产者的历史,是创造着社会生存所必需的一切的劳动者的历史。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理论著作中较有影响的是舒湘(李书厢)《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一书。此书山东人民出版社1955年12月第一版、1956年第二版,1959年又出第二版修订本。书分四章:

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理论

二、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伟大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

四、反对夸大个人作用和个人崇拜

---

① 《两年来北京市的在职干部理论学习》,《人民日报》1951年5月24日第3版。

② 马叙伦:《迎接劳动人民的世纪》,《人民日报》1952年5月1日第3版。

③ (苏)瓦谢茨基:《列宁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日报》1954年4月22日第3版。

其中第一章分六节：

1. 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
2. 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观能动作用
3. 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4. 人民群众是变革社会制度的决定力量
5. 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文化的创造者
6. 个别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这样一个从四个方面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肯定杰出人物的一定作用的理论框架，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沿袭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史学界的相关文章有：1951年范文澜发表的《应该注意的三个要点》，是谈讲历史课应该注意的三个要点，其中第三点是："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伟大祖国的一切珍贵遗产，主要是过去劳动人民留传给我们的。讲历史首先要讲明这一点。过去统治阶级中某些人物，也曾对历史有或大或小的贡献，必需予以表扬，作为珍贵遗产的一部分。"①这些思想成为范文澜修订他的《中国通史简编》的指导思想。

1954年，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中谈到：修订本增加了一些新观点，其中第一个是"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科学，便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和将相底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底行动，而是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底历史、劳动群众底历史、各国人民底历史'(《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一五九页)。本书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把旧型类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否定了。"②范文澜的观点在当时史学界是有代表性的，③也可从中看到《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影响。

但当史学界在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出现了一些偏向时，即提出"打破王朝体系""打倒帝王将相"，范文澜也对此进行了批评：这种论调好像是很革命的，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阶级社会是由互相对立着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构成的。打破

---

① 范文澜：《应该注意的三个要点》，《新史学通讯》1951年第1卷第4期。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版，第10页。

③ 沈起炜：《中学历史教材应该怎样变？》也强调："教材内容必须更加突出人民群众为历史主人这一原理。"《文汇报》1958年3月26日第2版。

王朝体系，抹掉帝王将相，只讲人民群众的活动，结果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了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本是真理，但是把它绝对化、片面化，只承认历史上的劳动群众，不承认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这就成了谬论。这种谬论应当受到大家的反对。①

从社会实践来看，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进一步推动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深入人心。《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1 日发表社论《庆丰收，再跃进！》，谈道：“今年的农业大丰收给我国人民带来了丰硕的物质财富，也带来了丰硕的政治思想的财富。大丰收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胜利，一切条件论、习惯论、地区落后论等等右倾保守的论调都彻底地破产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彻底失败了。辩证唯物主义在同各种形而上学思想的斗争中，放出了灿烂的光辉。所有对农业生产大跃进散布悲观论和怀疑论的人，都在一个根本问题上惨败了，这就是他们总是对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估计得过低；他们不相信觉醒了的亿万群众能够创造古今中外都没有先例的奇迹。和这种思想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从来都坚定地认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在生产的一切因素中，人是最宝贵最有决定性的因素。当亿万人民找到了自己的奔向幸福的道路、决心做自然的主人的时候，惊人的奇迹就会在他们的手下层出不穷地创造出来。这就是今年的农业空前大丰收，向我们提供的最有益的教训。”②

“文化大革命”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观念进一步强化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响彻中国大地。“文革”一开始就猛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群众运动的镇压，不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如《人民日报》1968 年 7 月 2 日第 4 版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破坏和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动谬论》等）。以后在批陈（伯达）整风、批林（彪）批孔（子）中都批判了“天才论”、英雄史观，批判了“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如《人民日报》1974 年 1 月 3 日第 3 版纪军《奴隶·英雄·历史——批判林彪的“英雄史观”》，《人民日报》1974 年 3 月 1 日第 2 版杨育才《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批判“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等）。

---

① 详见《文汇报》1961 年 5 月 31 日第 1 版报道《纪念太平天国革命一百十周年首都史学界举行学术讨论会》。

② 《人民日报》社论《庆丰收，再跃进！》，《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1 日第 9 版。

“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端正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成为主旋律，不仅重大的现实问题开始大讨论，重大的理论问题也开始大讨论。1979 年开始了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详上），对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提出了质疑，认识到：在理论上把阶级斗争视为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是站不住脚的，在现实社会中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有害的。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涉及了“历史合力”，涉及了人民群众是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于是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随之掀起波澜。

《哲学动态》1980 年第 1 期发表刘性风《由谁创造历史和历史的创造过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已讨论了历史创造者问题。文中谈道：原始社会因为没有阶级，所以原始社会的发展是“现实人类创造的”。在阶级社会，要想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创造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形态，人民群众（包括新兴的剥削阶级）就必须同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拼死的斗争才能实现。所以，新的社会形态、新的历史阶段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包括具有革命性的剥削阶级。但是，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是物质资料生产者，劳动人民不仅是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此文坚持了“奴隶创造历史”，即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文汇报》1980 年 4 月 25 日第 4 版发表余霖等《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奴隶创造历史论”质疑》，对“奴隶创造历史”、“英雄不创造历史”提出质疑，认为“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主要论点是：一、人们要问，剥削阶级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不起作用吗？人们要问，专门从事于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脑力劳动者不创造历史吗？不是的。古今中外的史实早已证明，个人能够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力量。斯巴达克、陈胜、吴广、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孙中山，还有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历史的创造是不能缺少他们的；二、马克思说“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斯大林说“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但决不允许把“首先”变成“唯一”，排除其他社会成员的作用。此文虽然只是对“奴隶创造历史”提出质疑，实际上就是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提出质疑。文章发表后引起一定的反响。《文汇报》1980 年 6 月 5 日发了一组摘要文章，并发编者按：

> 本报四月二十五日发表了余霖、安延明的文章《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对“奴隶创造历史论”的观点提出质疑。一个多月来我们陆续收到不少读者来信来稿，为贯彻“双百”方针，活跃学术空气，现将部分信稿摘编发表如下。

这一组文章中,张侯真《"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符合历史事实》、韩楷《应当把"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前进"区别开来》都赞同余霖等文章的观点。而刘性风《"奴隶"创造历史,"英雄"不创造历史》、任哲《理解"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含义要从实际出发》、周毅民《历史是进步阶级创造的》、奚介凡《恩格斯的话不能用来证明"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则不赞同余霖等文章的观点。不赞同的主要观点是:一、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没有否认英雄、领袖在历史上作用;二、英雄、领袖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三、创造历史是指推动历史前进,反动阶级不是历史创造者。

稍后,《文汇报》又发表了张学禄《质疑的质疑——与余霖、安延明同志商榷》(《文汇报》1980 年 6 月 27 日)、马鸣《恢复奴隶创造历史本来面目》(《文汇报》1980 年 9 月 22 日)等文,也不赞同余霖等文章的观点。

在《文汇报》上开始的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一些反响,如 1981 年辽宁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会上有的同志提出,不能把杰出人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某一具体历史事件所起的所谓"决定作用",混同于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决定作用"。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决定作用",是有其特定含义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基本原理相一致的,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决定作用",主要是指:第一,是决定历史发展的最终源泉和动力;第二,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和一般趋势;第三,决定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即社会由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至于杰出人物对于具体历史事件所起的那种"决定作用",如果把它放进整个历史运动的过程中去看,也仍然只是加速或延缓、促进或阻碍历史发展速度和进程的作用,而不是以上三种意义上的"决定作用"。提出"人民群众"是由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两部分相结合所构成的一个整体,而不是个体机械相加的"群体"。历史就是靠了这个整体的推动向前发展的。其中任何一个方面,不管是领袖还是群众,其作用再大,顶多也是个主要作用,而绝不是决定作用。如果夸大一个方面的作用,认为一个方面就能决定历史,那就是犯了以部分代替整体的错误,其结果不是陷入"英雄史观"的深渊,就是导致无政府主义的错误。而当割裂二者的"结合",认为二者"分别都起决定作用"的时候,就是重蹈历史上"二元论"的覆辙,从而陷入"共创论"的泥坑。①足见,讨论在不断深入。

---

① 详见辽宁省社联:《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辽宁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讨论纪要》,《哲学动态》1981 年第 9 期。

在宏观讨论历史创造者的同时，还讨论了一个具体问题——谁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文汇报》1981 年 1 月 19 日发表王锐生《谁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强调，除了没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原始氏族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都是脑力劳动者创造的。和亚民等在《关于历史创造者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武汉大学学报》1981 年第 3 期）一文中也强调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精神财富的直接创造者。认为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的“概括”、“总结”和“推广”、“传播”恰恰是直接创造精神财富的方式。不通过这些方式，即便生活在实践斗争的丰富源泉里，也是不可能创造出精神财富的。同时强调，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是属于劳动群众的。

1980—1981 年，发表的讨论历史创造者的文章十余篇，比讨论历史发展动力的文章少得多，可见当时历史创造者的讨论远没有历史发展动力的讨论热，这从本刊记者《全国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会侧记》（《哲学动态》1981 年第 3 期）也可以看到。

历史创造者的讨论真正掀起高潮，是在黎澍发表了几篇文章以后。1984 年，黎澍发表《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历史研究》1984 年第 5 期），1986 年发表《历史的创造者和创造历史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 年第 1 期）、《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光明日报》1986 年 7 月 30 日），1987 年发表《历史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文汇报》1987 年 12 月 15 日），这使整个学术界关注这个问题的讨论，并延续到 21 世纪（从 1985—1989 年至少有八十余篇文章发表，而同期历史发展动力的讨论文章为二十余篇，其中有的文章也涉及讨论历史创造者；1990—1999 年有五十余篇，而同期历史发展动力的讨论文章为三十余篇）。黎澍文章的发表，引起了讨论热烈，各种观点争相发表，推动了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有的学者指出，黎澍发表文章，意在推动解放思想，意在表明历史的创造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唯物史观是可以讨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可以讨论的，要从史实出发，从历史学的实践出发，验证唯物史观，验证马克思主义。[①]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

（二）围绕黎澍观点的讨论

1. 黎澍的主要观点

（1）把一切历史都归之于人民群众的创造，很难说得通。

①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提法源于苏联哲学家对《联共（布）党史》一

---

① 黄敏兰：《黎澍为什么要讨论历史创造者问题》，《探索与争鸣》2008 年第 9 期。

书中某些观点的引申和附会，是与“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相对立而产生的命题。但这种提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这样说过。因为劳动群众固然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然而却不能代替在第一次历史活动的基础上相继发生的一切领域的历史。

② 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只讲英雄创造历史固然不对，提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有片面性。这两种提法都离开了创造历史的前提，仿佛历史是英雄或人民群众随心所欲地创造的，皆未脱唯心主义的窠臼。

③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提法实际上否定了一切较高级的科学文化艺术作品的真正创造者——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的贡献，贬低了脑力劳动者的价值(以上见黎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历史研究》1984 年第 5 期)。

(2)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观点逻辑推理三个错误:

① 把物质条件创造者和历史创造者完全等同起来。实际上创造物质条件无非是历史的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固然有决定历史面貌和发展水平的作用，但是不能等同或者包括全部历史内容。

②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与“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相对立而产生的命题。双方仿佛在辩论这样一个问题“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必须在英雄和人民群众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回答。把人民群众和个人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也是不足取的。

③ 把无所不包的历史看做是由一个独一无二的力量创造的。事实是:英雄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创造一切历史;人民群众也一样，不能创造一切历史(以上见黎澍《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光明日报》1986 年 7 月 30 日)。

(3)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提法不科学:

① “主人”一词含义有二:一是物主(或所有者)、家主、东道主，历史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不同于可以为任何人所有的事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主人”的提法缺乏科学性;二是文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如“主人公”、“主人翁”、“主角”等等。不能说所有的历史都是人民群众当主角、主人，不同的历史有不同的主角、主人。比如政治史、军事史、教育史、艺术史、宗教史……等等，就离不开帝王将相和剥削阶级上层人物的活动。他们制定与执行政策，他们的高明的或者愚蠢的决策、正义的或非正义的行为，具有推动或者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

②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提法，不能科学地概括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反而容易引起一种误解，似乎自古以来劳动人民在一切历史活动中充当主角，能够主宰社会和掌握自己的命运。劳动群众在历史上是作为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而活动的，他们总是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没有或很少有受教育的可能，因而他们的历史作用经常是以曲折的、不显著的有时甚至是被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有在大规模反抗残暴统治的斗争高潮中，他们才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而这种斗争在古代不是也不可能是经常发生的，这种反抗又总是以失败而告终。所以，用“历史的主人”这样的概念来概括历史上人民群众的地位，不能不使人感到距离事实太远。

(4) 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的提法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个提法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常提到的。“人们”泛指所有的人(以上见黎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历史研究》1984 年第 5 期)。

黎澍的有些观点是在他以前已有人提出了，有些观点则是他新的思考和论述。黎澍的文章一发表，引起学术界的震动。一些刊物立即介绍他的观点，如《天府新论》1985 年第 1 期发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文艺理论研究》1985 年第 2 期发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一提法缺乏科学性》，都介绍了黎澍的观点。与此同时，赞同和反对黎澍观点的文章也陆续发表。

2. 赞同黎澍观点的主要观点

(1) 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提法

蒋大椿认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创造者的提法是不全面的(按：“只有……”的说法无疑是不全面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提法，是否含义就是“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创造者”，似乎不能随意下断语)。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创造者的完整认识是：第一，人类历史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社会关系中活动的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第二，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是人民群众，同时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历史的创造；第三，人民的历史，革命的历史，是群众自己创造的，同时又充分肯定英雄人物和人民领袖的重大作用。[①]

洪孙凯指出，如果认为只有人民群众才创造历史，那么，社会发展过程中暂时倒退的历史是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呢？况且，如果只是人民群众才创造历史，那么，由于人民群众是指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人们，就必然得出社会历史发展是直线

① 蒋大椿：《关于历史创造者的理论考察》，《世界历史》1985 年第 11 期。

进步的结论(按:“就必然得出社会历史发展是直线进步的结论”似乎牵强)。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统一的原理。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在这里没有直接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而是强调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是有其科学含义的。这表明在历史的创造过程中,人民群众是起推动作用的一方。正因为肯定了矛盾的这一方,也反过来表明了历史创造过程中矛盾的另一方,即起阻碍作用的力量的存在。从对这些论断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不只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在进行历史的创造时,只代表了矛盾的一个方面,即起积极作用的方面。不能把“创造历史”与“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了。①

彭秀兰指出,认为反面人物与反动阶级的活动阻碍历史进步,不能说是创造历史,这种观点是欠妥的。首先,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中的“人们”是一个中性字眼,并没有作阶级定性,而且这一判断适用于全部人类而不仅仅是阶级社会。“创造”也是中性概念,不表示价值判断。并没有仅仅把推动历史进步的活动看作是“创造”历史;其次,人类的历史虽以进步为趋势,但不能说只有进步才是历史,而把倒退排除出历史;再次,如果说进步阶级、正面人物的活动才算是“创造”历史,反之便不算,这在理论上犯了简单化的毛病,无视历史的复杂性。先进阶级、正面人物也有违反历史进步的时候,这时的活动算不算“创造”历史呢?另外,资产阶级在今天早已是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了,但我们还要搞“一国两制”,还要外国资本家来投资。如果不否认资产阶级的某些活动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进步意义的话,能否也列入“创造”历史的活动之列呢?当然,劳动群众是人类中占绝大多数的主体成分,决定着历史的基本进程与方向②(按:可以承认,推动历史前进的部分,阻碍历史前进的部分,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如果创造是个中性词,那么也可以说创造历史包括创造前进的历史、创造倒退的历史)。

吕喜林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倒不如说成是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口号。从整个历史实际创造过程看,这一观点是不全面的,它夸大了群众在阶级社会创造历史的作用,而否认了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作为统治阶级,是当时历史的主要开创者。强调要

---

① 洪孙凯:《也谈谁创造了历史——兼与艾力农、方文同志商榷》,《理论月刊》1986 年第 8 期。

② 彭秀兰:《从历史的本质看人的作用——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命题的辨析》,《天中学刊》1996 年第 4 期。

充分肯定杰出人物对历史的创造作用(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理论,并不否认上升时期统治阶级的作用)。①

孙洪义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口号是有极大局限性的,如果用这个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指导研究历史,这个观点的片面性就立刻暴露出来了,因为它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实际。一、它是主张极端民主化的人的理论依据。一些人片面鼓吹自由和民主,主张削弱党的领导,往往利用这个理论;二、由于片面理解这个口号,往往与深化改革的思想解放发生冲突。这个口号往往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旧观念的思想来源,造成打击人才、鼓励庸人的不正常现象;三、我们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片面理解这个口号便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和失误。在一些落后地区,一些村民不修水利,反而集资修庙拜佛,这正是对这个口号的莫大讽刺。思想落后的群众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力量吗?②

纵瑞华指出,在阶级剥削社会里,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这一对矛盾中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难道我们可以一方面认为是被剥削阶级创造了阶级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承认是剥削阶级主要地规定着阶级社会的性质吗?在阶级社会里,被剥削阶级对历史的创造所起的作用相对来说是次要的。劳动人民在原始时代是历史的唯一创造者,在阶级社会几乎被剥夺了创造历史的权利,只有到了共产主义才又成为了历史的唯一创造者③(按:社会性质由生产方式决定,由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力之一是劳动者,生产工具也是由劳动者创造的,从本质来讲,劳动者决定社会性质。奴隶的劳动及劳动关系决定了奴隶社会的社会性质。农民的劳动及劳动关系决定了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劳动人民在阶级社会几乎被剥夺了创造历史的权利”,这一论断是不全面的。不仅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有创造历史的权利,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创造历史的权利,在这些社会中平民、劳动人民通过创造成为杰出人物的很多)。

郝立忠指出,有的认为,生产力本身不会自动发展,推动它的发展必有一种更根本的动力,这个原动力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才是世界的创造者。因此,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之日起,人民群众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不错,人类社会是

---

① 吕喜林:《进步力量和杰出人物是历史的创造者》,《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1 期。

② 孙洪义:《应当区分历史的创造者与制造者》,《河北学刊》1990 年第 2 期。

③ 纵瑞华:《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再考察》,《青海社会科学》1991 年第 2 期。

由人组成的，人类社会也是由人来推动才向前发展的。但人类用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现实力量又是什么呢？人本身是社会的构成要素，而人类用来推动社会发展的只能是由人类产生出来的现实力量，而不是人本身。因而，不仅不能说人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甚至不能说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只是动力的来源，而不是动力本身。①

吉彦波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个命题有局限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他们创造着历史。他们为什么要创造历史？这个命题却不能回答。同时，创造历史的主体并不等同于创造历史的动力。②

段国炼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但只适用于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也就是只适用于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和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对其他历史阶段不完全适用。“人民”只有在国家存在的地方和时候才存在着，在国家还未产生或消亡的条件下，它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把“人民群众”联为一体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来使用，至多适用于国家存在的社会；对国家不存在的社会，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应采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样一个命题。③

（2）关于物质财富创造者

王也扬指出，劳动者的生产劳动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的说法，在物质财富创造上排除了劳动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针对“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提法，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因为离开了劳动对象和资料，劳动便失去了前提，仅仅成为自然力的表现。同理，如果离开了生产的组织和管理，离开了一定的生产关系及维护这种关系的经济、政治制度，任何有效的社会性劳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按：战争时期，没有人管理，农民照常劳动）。而社会生产的组织和管理，经济、政治制度的建立、实施和调整，在阶级社会一般是统治阶级所为。此外，在劳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生产力一部分的科学也大多是由剥削阶级成员所创造的（按：科学是脑力劳动者创造的）。④

王学典指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既定的生产水平上，没有剥削和压迫，就

---

① 郝立忠：《管理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东岳论丛》1989年第5期。
② 吉彦波：《历史发展动力应是人的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理论学习月刊》1989年第11期。
③ 段国炼：《关于历史创造者的思考——兼与黎澍同志商榷》，《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④ 王也扬：《我看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根本不可能有生产本身。承认剥削与压迫是生产发展的必要的社会形式，就等于说剥削阶级也同样参与了生产历史的创造。而且剥削阶级的一些阶层和集团还以组织者、管理者的身份直接进入了物质资料的具体生产过程，直接参与了生产历史的创造。这都说明生产的历史是在劳动阶级与剥削阶级所结成的对抗关系中共同创造出来的。①

刘文健指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拉布里奥拉把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家的活动也看成是一种社会劳动行为，称它是“积累的劳动”。这种劳动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特殊劳动行为。剥削者、统治者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创造活动虽然不完全是劳动行为，但只要是促进历史发展的行为则无疑是一种社会劳动行为。而且是高层次的劳动行为，高层次的劳动行为比低层次的劳动行为推动历史的作用要大得多。同时认为，阻碍历史发展的行为不是劳动行为。②

（3）关于主人、主角

李新认为：“历史上不少重大问题的决策都是帝王拍板的（按：从本质上讲是人民委托统治者拍板或统治者代表人民拍板），……如果说奴隶、农民、工人已经是主人，那又何必还要起来斗争？《国际歌》中唱道，我们要做天下主人，说明工人阶级还不是主人。”③（按：起来斗争是要夺回主人的权力）

王也扬指出，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大约有这样几种意思：一、人民群众是人类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活动构成了历史的主要内容；二、世界是人民创造的，世界上的一切本归人民所有，从“天下者人民的天下”推导出“历史者人民的历史”；三、人民群众的意志就是历史的意志；四、人民群众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并非有这几种意思，主要是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出发的）。第一种意思一般说来是可以成立的，但这应该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才贴切，“主人”与“主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而这里所说的“主体”是取“事物的主要构成”之意，至于所谓“认识的主体”则要另作分析。第二种意思，我们已经论证了世界并不完全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那么世界上的一切悉归人民所有也就无从谈起。况且，现实中“创造”和“所有”、“当家作主”并无必然的联系，在私有制下，财富的创造者并不等于拥有财富，可以任意支配财富。即

① 王学典：《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文史哲》1988年第1期。
② 刘文健：《社会成员的劳动行为创造和推动历史》，《唐都学刊》1988年第4期。
③ 李新：《治史方法浅谈》，《中学历史》1985年第6期。

便在今天的公有制下，这个问题也还值得研究。因此，由“天下者人民的天下”进而说“历史者人民的历史”就不那么符合事实了。第三种意思要分别而论。从人民群众最终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意义上说是一种理解，从人民的意志直接支配历史进程上说则又是一种理解，而后者在社会发展的相当历史阶段内是达不到的，其时人民意志对历史的决定作用表现为潜在的、间接的、不自觉的。第四种意思，在历史上，谁充当了主角也要具体地看，不同的历史、不同的舞台会有不同的主角。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那么，在一定时期内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代表，应该是该时期的主角。诸如奴隶社会中的奴隶主阶级，封建社会中的封建阶级（按：地主阶级、农民阶级都是封建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等。社会主要矛盾是变化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也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这就是说，社会新生产力的代表者，当它还没有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时候，就不具有主角的资格。同时，矛盾的两个方面在转化过程中处于势均力敌、相互对峙的时候，也不能只将“主角”简单地归于一方。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苏联人民及其统帅斯大林可以说是历史的一个主角，西方反法西斯盟国及其领袖丘吉尔、罗斯福也是历史的主角之一，而发动罪恶的侵略战争，使亿万生灵涂炭的纳粹德国及其首领希特勒能说只是这段历史中的一个次要角色吗？①

初允穆提出：“在阶级社会中在历史舞台上充当主角的是杰出人物。”②（按：主角应与主人不同）

3. 反对黎澍观点的主要观点

（1）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等是否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提法

方文认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提出并反复论证的观点，不能说是《联共（布）党史》和苏联哲学家提出来的，不能说阐述这个观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法国工人诗人鲍狄埃1871年写的《国际歌》：“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苦大众。”已经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传遍了全世界。③

吴自韬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是马克思的全部思想，也不能说

① 王也扬：《我看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② 初允穆：《对“历史的创造者”的再认识》，《枣庄师专学报》1987年第1、2期。
③ 方文：《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科学原理》，《理论月刊》1985年第7期。

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全面分析。认为用“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或“决定力量”来表达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创造者这一原理，较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更为准确，更易于统一认识。①

李文山指出，肯定“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的，既不是发端于1938年《联共(布)党史》对民粹派的批评，也不是确立于1959年的《苏共党史》，而是列宁在1914年写的专著《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②

陆世澄谈到，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兰茨·梅林，1887年发表《略论“伟大人物”》一文，指出这种“伟人创造历史”的说法乃是“愚蠢的迷信”。“路德不是16世纪初教会改革运动的创造者，而只是执行者”。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作为历史的执行者，而不是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梅林在1893年写的《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见解。这说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③

郭瑞祥强调，不必计较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是否用过这一提法，而在于这一提法本身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穷尽马克思主义，因而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并不一定都是马克思、恩格斯亲自用过的。④

(2) 关于创造历史的含义

陆丽娜指出，“在历史上起作用”和“创造历史”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什么叫创造历史？创造历史，是指推动历史前进，尤其是指推动历史发生质的变化，使历史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更高的阶段前进，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更高的社会形态前进。创造历史，最典型的意义，就是实现社会的革命变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创造历史，就是这个意思。反动阶级、反动派、反动人物，虽然也在历史上起作用，但他们起的是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因而决不能说，他们也创造历史。代表反动统治阶级的英雄人物如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梯也尔(镇压巴黎公社)，起的是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谈不上创造历史⑤(按：曾国藩被清政府誉为中兴名臣)。

薛克诚指出，要把创造历史活动与参与历史活动区别开来。创造历史活动指

---

① 吴自韬等：《也谈历史的创造者》，《文摘报》1985年7月7日。
② 李文山：《论历史的自我创造及其动力——兼与黎澍同志商榷》，《汉中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
③ 陆世澄：《梅林论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教学》1984年第1期。
④ 郭瑞祥：《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兼与黎澍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⑤ 陆丽娜：《论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研究》1985年第4期。

推动历史前进的各种活动,参与历史活动指人所参与的一切社会实践活动,既包括推动历史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又包括阻碍历史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讲到人们创造历史时,总是强调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必须尊重客观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规律,这个提法本身也就意味着人们参与历史活动是一回事,创造历史活动又是一回事,不顾客观的历史条件,不顾社会发展的规律的社会实践活动,决不是创造历史的活动,而只能是阻碍历史发展的活动。①

郭瑞祥认为,对“历史的创造者”、“创造历史”的理解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指历史观,“历史的创造者”是指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这里的“创造历史”不是指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是指主宰历史命运。广义的“创造者”与“参与者”同。从狭义来讲,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只能是一种,而不可能是两种或多种。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只能是人民群众,英雄只起非决定性作用。英雄创造历史不能成立,共同创造论也不能成立。②

(3)关于人民群众的含义

陆丽娜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在创造历史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他们本身就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个命题本身就包括了承认这些英雄人物在创造历史方面的作用。可是,如果把这些英雄人物的作用无限夸大,说历史是由这些英雄人物创造的。那么,在这个“英雄创造历史”的命题中,显然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给否定了。道理很简单:“人民群众”的概念可以包括“英雄”的概念,而“英雄”的概念包括不了“人民群众”的概念。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法国足球队去年以来在欧洲足球大赛中成绩卓著,连战皆捷,队长普拉蒂尼表现突出,屡建奇功,被视为英雄,法国总统密特朗给他授了荣誉勋章。该怎样评价法国足球队的胜利呢?当然是法国足球队创造了这个成绩,在这个评价中,无疑已经包括了普拉蒂尼的功绩。如果为了突出一下,还可以补上一句:普拉蒂尼立了大功。但如果不说法国足球队创造了这个成绩,而说普拉蒂尼一个人赢得了历次比赛的胜利,这个评价是不能够成立的(按:只有一个队长、指挥、司令员,能成球队、乐队、军队吗?能比赛、开音乐会、打仗吗?不能)。如果想表明英雄人物的作用,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原理中早已说得清清楚楚了,何必非要强调“英雄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历史”?(按:共同创造论,把两者并列,

① 薛克诚:《历史究竟是谁创造的?——与黎澍同志商榷》,《杭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② 郭瑞祥:《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兼与黎澍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没有明确或混淆了主次）提出这种命题，实际上不过是思想上不完全赞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个原理的一种羞羞答答的表示，总觉得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似乎贬低了英雄人物的作用，或者至少没有充分表达英雄人物的作用，因而想对它作某种修正和补充，这种看法，从本质上说，仍就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影响的残余。①

田心铭也指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中，“人民群众”指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社会力量。“人民群众”和阻碍历史前进的人们之间并没有一条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在何种程度上对历史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他就应在相应的时间和程度被看作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所以“人民群众”是一个包括了所有推动历史前进的人们的整体范畴。“英雄”指的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代表了群众的愿望要求、对历史发展作出贡献的杰出人物，而不是指站在群众之外或群众对面的个人。人民群众和英雄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但并非是人民群众和它之外的“英雄”共同创造了和推动着历史，而是人民群众的作用作为整体包含着杰出个人的作用，而英雄只有当其作用包含于群众之中从而推动了历史前进时才成其为英雄。因此，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并不意味着否定英雄的作用。②

苏双碧认为，人民群众应当包括创造历史起过积极作用的各个阶级的成员。人民群众应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劳动人民或下层群众，二是指社会各阶级的主要成员，而前者是主体。人民群众整体包括被人民群众推举出来的杰出人物。“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提法，从本质上看是没有错的，但原先的解释是有错误的，主要是把“人民群众”仅仅理解成劳动人民，把它和统治者截然对立起来；同时又把人民群众这个群体与杰出人物对立起来，这样一来许多现象就无法说清楚。由于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理解不全面，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认为写历史主要应写人民群众的历史，在封建社会主要写农民战争，甚至取消帝王年号；二是由于历史进程以杰出人物的意志和行动为标记，就不承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这些看法都欠全面。③

方文指出，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其中劳动群众（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是人民群众的主体，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处在上升时代的剥削阶级也

---

① 陆丽娜：《论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研究》1985 年第 4 期。

② 田心铭：《也谈历史的创造者、推动及其他》，《理论学刊》1987 年第 1 期。

③ 苏双碧：《略论阶级分析和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史研究》1986 年第 4 期。

属于人民的范畴，他们和他们的代表人物也参加历史的创造。反动统治阶级某些代表人物，如果认清历史发展趋势和人民的愿望，站到人民立场上来，也可能转变成人民的一分子，参加历史的创造。①

翟风提出，毛泽东讲“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这个“人民群众”是与“敌人”相对立的政治概念。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不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是与“个人”相对立，是指社会全体成员。②

王乃之指出，看问题要看本质。本质看起来不如现象的堆积全面、详细、公允，但它却更好地凸显了事物的本质。如“黄河向东流”，这里剔除了黄河也向北、向南流。同样的道理，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不否认人民群众中有一部分人落后，有惰性。但如果说上述命题都是不对的，是不全面的，应该把剔除了的部分加进去，说黄河是向北、向南、向东流的，这就是复玉为璞了。③

（4）关于新的生产方式代表者

郑邦才指出，生产关系是影响生产力的外部原因，生产力中人的因素才是决定生产力的内因④（按：生产力中的人主要是生产者）。王乃之指出，新的生产方式的阶级构成是一对而不是一个，而代表新的生产力的是生产者，促进新的生产方式的诞生的还是生产者。由于生产者愿意接受新的生产方式，才使新的生产方式能够战胜旧的生产方式。所以不能认为先进阶级只是剥削阶级一方⑤（按：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的矛盾中，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矛盾中，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该全面、辩证地看）。

（5）关于财富的创造

春阳强调，劳动人民中出现了一批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如瓦特、富兰克林、爱迪生、狄慈根、罗蒙诺索夫和高尔基等，都出身于劳动人民或本人就是劳动者或工人。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表明劳动人民直接参与了精神财富的创造。⑥

刘德明等提出，只承认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精神财富的创造

① 方文：《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科学原理》，《理论月刊》1985年第7期。
② 翟风：《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不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2期。
③ 王乃之：《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与黎澍同志商榷》，《西华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④ 郑邦才：《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什么?》，《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⑤ 王乃之：《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与黎澍同志商榷》，《西华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⑥ 春阳：《也谈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创造者的提法》，《国际政治研究》1985年第3期，《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

者、变革社会制度的决定力量，还不是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还要承认人民群众是社会的最高管理者(按：即人民群众参与了创造财富的管理及其他管理。很多管理者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才是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观点。①

翁寒松指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的命题，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谁创造谁未创造、谁创造得多谁创造得少”的思维怪圈中，转移了原先的命题，影响了对实质东西的把握，结果当然只能是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本意。②

(6) 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是创造历史的组成部分

赵常林指出，黎澍把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等视为历史舞台，舞台不等于戏本身。这种比喻是不恰当的，这实际上把“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排除于历史之外了。其实它正是历史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又指出，黎澍混淆了“历史的唯一创造者”和“历史的创造者”两个概念，从而从“人民群众”不是历史的唯一创造者得出“人民群众”不是历史创造者。按照这种逻辑，我们每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不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建设全部的社会主义。③

方文指出，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不仅仅是创造历史的前提，也是创造历史的最基本的活动，决不能把物质生产排斥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之外。④

(7) 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不是随心所欲的

田心铭指出，黎文批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命题似乎认为人民的动机和观念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因此它“没有脱离唯心主义的窠臼”，是不妥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或推动历史前进的思想，只是唯物史观完整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与整个体系其中包括历史发展客观必然性、规律性的思想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并无主张人民群众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之意。对待这一观点，同对待唯物史观的其他任何观点一样，只能联系整个体系去理解，不能把它从整个体系中孤立地抽取出来去理解，然后给予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否则，“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命题同样也可以被解释为主张人们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⑤

冯穗指出，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也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而不是随心所欲的。一、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首先受到生产力条件和现实的社会地位(在阶级社会里则

---

① 刘德明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新解》,《理论导刊》1995 年第 1 期。
② 翁寒松:《对谁是历史创造者问题的一点看法》,《新视野》1990 年第 4 期。
③ 赵常林:《关于历史创造者的几点看法》,《光明日报》1986 年 10 月 8 日。
④ 方文:《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科学原理》,《理论月刊》1985 年第 7 期。
⑤ 田心铭:《也谈历史的创造者、推动及其他》,《理论学刊》1987 年第 1 期。

是阶级地位)的制约;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和具体结果是不相同的。①

(8) 人民群众以社会分工的方式创造世界

刘贤奇针对黎澍说:“生产越发达,社会生活领域越扩大,社会分工越细,人们就越是被固定在某个领域内活动,各自创造各自的历史。”(《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指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即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必定是社会联合的扩大。在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然经济,人们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近代社会化大生产,社会分工高度发达,人们不仅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在全世界联合起来。在这种高度分工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孤立地活动。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表明,人们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创造历史。②

冯穗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内含着对社会分工和阶级区分的肯定。人民群众包括社会分工中各方面的人们,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阶级社会里,它还划分为阶级。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就在最大的范围内概括了历史发展动力的主要承担者。③

田心铭指出,黎文批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命题否认了社会分工,是没有根据的。“人民群众”包含了社会分工中各行各业的人们,人民群众创造或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本来就是在社会分工中完成的。④

(9) 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含义

苏双碧认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含义是:一、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这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社会的一切矛盾斗争、进步、发展都离不开物质基础;二、杰出人物是人民群众所拥戴而产生的,任何杰出人物都有自己的群众基础;三、人民群众的事业是历史演进的主要内容,人民群众的主流是站在推动历史前进一边的。⑤

马原生认为,人民群众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创造者,因为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

① 冯穗:《也谈历史的创造者——评黎澍同志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的否定》,《高校理论战线》1991年第2期。

② 刘贤奇:《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评黎澍同志的历史多元论》,《长白学刊》1992年第2期。

③ 冯穗:《也谈历史的创造者——评黎澍同志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的否定》,《高校理论战线》1991年第2期。

④ 田心铭:《也谈历史的创造者、推动及其他》,《理论学刊》1987年第1期。

⑤ 苏双碧:《略论阶级分析和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

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基础；人民群众是促进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强大动力；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决定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根本方向。①

刘云波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客观解释是：一、是群众的意志决定着英雄的行动而不是英雄的意志决定着群众的行动；二、群众的意志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决定历史发展的面貌和进程。②

郭瑞祥指出，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说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说人民群众创造了一切历史，更不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各个领域，只有人民群众在起作用，而其他人——帝王将相、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艺术家等等——是不起作用的。郭瑞祥认为，黎澍指责的不是别的，是他自己的误解。郭瑞祥认为，如果只指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其实只是说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参与者，必须进一步说明人民群众的意志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即在活动和思想两方面都说明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如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说的“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才能真正说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讲人民群众是阶级斗争的“主力军”、社会革命的“主体”，这是英雄史观也可以接受的，关键问题是这个“主体”是按照谁的意志行动的。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每一次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革命运动，都是由人民群众的意志决定的，而不是人民群众盲目地听命于英雄人物的结果。③

马世荣认为，黎澍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的逻辑推理有三个错误，是不能成立的。而是黎文本身有逻辑错误。如黎文说：“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上，人民群众是被统治者，是奴隶，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这里有概念混乱的逻辑错误。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来说，是一个哲学范畴而不是经济范畴，把它说成是“被剥削者”，实际上等于混淆这样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事实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属于人民群众范畴的既有被剥削者也有剥削者，并不都是被剥削者。④

许俊达认为，不能说只有当人民群众是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创造历史的意义而

① 马原生：《人民群众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创造者》，《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② 刘云波：《也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益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③ 郭瑞祥：《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兼与黎澍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④ 马世荣：《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逻辑思考》，《胜利油田党校学报》1989年第4期。

行动时即人民群众发挥了历史主动性时才是创造历史，而人民群众尚在沉眠不醒的状态中就没有创造历史。自觉性或历史主动性不是人民群众是否创造历史的尺度，而是人民群众怎样创造历史的尺度。人民群众是不是历史创造者？这是个定性问题。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范围和作用有多大？这是个定量问题。人民群众怎样（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创造历史？这是个方式问题。而黎澍似乎忽视了其间的区别。黎澍没有给“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命题肯定或否定的定性回答，只谈该命题是谁提出来的、人民群众物质生产创造历史的范围有多广、精神财富是谁创造的，从而把定性问题与定量问题混淆起来了，并且无形中把“人民群众是否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论题偷换成了“人民群众是否是一切领域的历史的创造者”的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提法并没有错，只是那些从“左”的方面对它进行曲解并把这种曲解当成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应该予以肃清。①

朱昌彻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完全正确，应予坚持，但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这个原理的理解不准确，论证不科学，应予修正。一、教科书在论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三条理由中只讲了劳动群众如何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如何决定社会制度的变革，没有讲到知识分子和处于上升时期的剥削阶级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作用；二、谁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谁就是历史创造者，这样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谁是历史的创造者问题是一个历史观问题。所谓历史观，不是对历史现象进行描述，不是对历史活动进行简单判断。历史观是要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最深刻的本质，是要研究历史发展的最一般规律。谁是历史创造者的问题，回答的是：谁是历史命运的主宰者？谁是历史发展趋向的决定者？谁是历史发展的推动者？它不要求回答哪些人参与了历史活动，哪些人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和社会精神财富。英雄史观和唯物史观的争论，不在谁创造了物质财富、精神财富，而在谁是历史的主宰②（按：谈为什么是历史主宰，就离不开谈具体的创造）。

张瑞生还提出了历史创造者讨论的两点启示：一、应当完整准确地论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科学命题，不能再有片面性；二、要广泛地深入地宣传和实践“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科学命题。我们一定要正视，由于唯心史观

① 许俊达：《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一文质疑》，《社会科学评论》1985 年第 10 期。
② 朱昌彻：《也谈历史创造者问题》，《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89 年第 3 期。

特别是英雄史观长期占统治地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作为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远没有深入人心。在一些人的思想中，英雄史观还有很深的影响。在苏联，在我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现象，一段时期内的严重存在，就是有力的证明[①]（按：班丽婵《张默闻：英雄创造历史》，《市场观察》2007 年第 12 期；包明明《许知远：精英创造历史》，《课堂内外（高中版）》2009 年第 5 期等还时常见诸报刊，这些文章虽然不是探讨历史创造者的理论文章，但可以看到“英雄”情结、英雄史观在社会中有广泛的影响。又如，中国的极少数干部只把有权的人、有钱的人奉为上宾，而不把群众放在眼里，亦可见群众史观、群众路线并未深入干部心中）。

（10）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

翁寒松指出，“奴隶们创造历史”、“英雄与奴隶共同创造历史”这两个命题都不够准确，唯一科学而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一命题既肯定了人民群众归根到底具有决定历史发展的主体性作用，又不排斥杰出人物的作用。[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观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实践本体哲学终结了旧哲学的必然结论，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实践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③]

艾力农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主人”应该是“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意思就是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黎树对主人的含义作了两种解释，但是就没有提出“主体”这一层含义，是不全面的。至于说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而不是属于主人的地位，那是说的他们在剥削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政治上不能当家做主。政治上人民群众是否当家做主即是否处于主人翁的地位，同他们实际上是否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有区别的，不应当混为一谈[④]（按：从理论上讲，人民是主人，管理者是公仆。即便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真正成为主人也有一个过程）。

何了然强调，知识分子是生产力的代表者。知识分子是政权的建设者。知识分子是文化的传播者：一、经验的总结；二、知识的交流；三、理论的发展。必将加快

---

① 张瑞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一个科学命题——与黎澍同志〈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商榷》，《理论导刊》1986 年第 11 期。

② 翁寒松：《对谁是历史创造者问题的一点看法》，《新视野》1990 年第 4 期。

③ 翁寒松：《论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观点的哲学前提》，《新视野》1990 年第 3 期。

④ 艾力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黎澍同志商榷》，《理论月刊》1985 年第 6 期。

整个社会成员向工业知识工人、农业知识工人、服务知识工人方面转化。知识分子将成为社会主角[①](按:知识分子是人民群众的组成部分,知识分子是主角,也即是人民群众是主角。人民群众的知识分子化,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区别,是社会发展的方向)。

(11)“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关系

祝马鑫认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提法并不矛盾。这两种提法是针对不同的问题,从不同的理论层次上回答人类“创造历史”的问题。“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讲的是具体的历史,这种具体的历史离开人们中的任何一部分人都不可能构成完整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讲的是社会发展意义上的历史,它是抽象的,只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没有包括历史的全部内容,它只是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决定历史的大趋势、大方向,是站在哲学的高度,即最高的理论层次上,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②]

马世荣认为,祝马鑫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提法并不矛盾,在逻辑上有错误。[③]

田心铭指出,以往论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实际上是正确回答和论证了历史前进的推动者问题,而绝非是主张唯有人民群众才参与了历史活动和历史事件的构成这种显然荒谬的观点。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来”代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不够的,因为它虽然正确回答了“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问题,却没有回答“谁是历史前进的推动者”这一更重要的问题。[④]

尹德今指出,用历史的内容是所有的人的活动构成去代替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一命题是不科学的。因为每个人的活动只是全部历史内容中的一小部分,每个人的活动,即使是杰出人物的活动也不能决定历史整体的发展。整个历史发展不是由各个人决定的,也不是这个人决定一部分,另一个人决定一部分。决定整个历史发展的只能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决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决定整个历史的发展。[⑤]

---

① 何了然:《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兼谈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淮北煤师院学报》1996 年第 3 期。

② 祝马鑫:《略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含义》,《光明日报》1986 年 9 月 10 日。

③ 马世荣:《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逻辑思考》,《胜利油田党校学报》1989 年第 4 期。

④ 田心铭:《也谈历史的创造者、推动及其他》,《理论学刊》1987 年第 1 期。

⑤ 尹德今:《试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绥化师专学报》1985 年第 3、4 期。

冯穗指出,既承认所有的人都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并以不同性质和方式的作用进入整个历史进程,又突出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决定作用,才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把两者对立起来或片面地强调任何一方,都是不可取的。只承认历史是人人的历史,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即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唯物史观的背离。[①]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与“合力论”有联系,参见“(12)关于历史合力”。

(12) 关于历史合力

甄铭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不意味着一切历史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更不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各个领域中,只有人民群众在起作用,而其他人不起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指人民群众在历史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命运的主宰者。这个原理并不排斥“在不同的领域里,不同的人物在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也不否认恩格斯关于“合力”的说法。[②]

张云勋认为,人们创造历史的历史合力论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动力论,在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中各有各的地位和作用,既不能截然对立,又不能相互取消和代替。单纯强调哪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为了避免因创造一词的不同含义而引起误解,可以改用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或基本动力等提法,使之精确化。但却不能用“人们创造历史”的命题来取代它。毛泽东关于“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动力”的论断,把创造和动力联系起来,使创造一词具有明确的含义,对于我们研究历史创造者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③]

薛克诚指出,“合力论”是指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力量,其任务(或者说实质)在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动力论”仅指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那种力量,它只属于“合力论”中的一种力,而不是它的全部。因此,不能从恩格斯的“合力论”中得出历史是人人所创造的结论。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说成是人人创造的,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是不科学的。它没有揭示出事情的本质。第一,它没有揭示出历史发展动力中的正力与负力,第二它没有区分出个人与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不同作用。只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命题才是一个科学

---

① 冯穗:《也谈历史的创造者——评黎澍同志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的否定》,《高校理论战线》1991 年第 2 期。

② 甄铭:《应当继续坚持和发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兼与黎澍同志商榷》,《学术界》1987 年第 5 期。

③ 张云勋:《历史合力与历史动力》,《江淮论坛》1986 年第 3 期。

的命题。①

张瑞生指出，历史合力论，并没有回答，在这个相互较量、相互影响的合力当中，谁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谁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谁是处在一种中立的消极的状态。因此不是也不可能是回答谁是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在合力中，谁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呢？"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命题，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②

"合力论"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有联系，"(11)'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关系"可以参见。另可参见"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大讨论"。

(三) 围绕新英雄史观的讨论

与黎澍观点有联系的是新英雄史观的提出，所以说有联系，因为两者都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

黎鸣提出一种"新的英雄历史观"：按照信息哲学的观点，创造即是给出新的、综合的信息(包括自然信息和文化信息)选择。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是信息量不断增殖的过程。谁为信息量的增殖做出了贡献，谁就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这些创造者是人类中的少数。人类的多数是行为的模仿者、学习者、重复者，是传统因循者，并不是创造者(按：模仿、学习、重复中也可以有创造。在重复的量变中会产生质变。科学实验几十次、几百次、几千次的重复，每一次都会有新发现、新进展，最终的成功是几十次、几百次、几千次新发现、新进展的集大成)。而且，重复行为，由于"熵增原理"，反而造成系统信息总量的衰减，造成相对而言的社会倒退。历史的真面目是：创造者创造历史，英雄创造历史！而"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用"人民"这一汪洋大海淹没了真正创造者的功绩，用平均主义的快刀削去了英雄高耸的头颅，是历史科学中的"吃大锅饭"。给"人民"这一具笼统的偶像戴上"创造者"的桂冠，这一命题并不比"上帝是历史的创造者"更真实③(按：创造者、英雄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

启良基本赞同黎鸣的观点，强调，历史是那些为社会发展提供新知识、新思

① 薛克诚：《历史究竟是谁创造的？——与黎澍同志商榷》，《杭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② 张瑞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一个科学命题——与黎澍同志〈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商榷》，《理论导刊》1986年第11期。

③ 黎鸣：《历史是创造者创造的》，《光明日报》1986年12月17日。

想、新手段的人创造的。人民群众中有一部分人有发明创造，是历史的创造者，大部分没有发明创造，不是历史创造者。说人民群众是物质生活资料的提供者，没有人民群众提供物质生活资料，创造发明者一天也活不下去，更谈不上发明创造，所以说最终的历史创造者是人民群众。这样的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其一，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的是谁为社会作出开创性的贡献从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问题，而不是谁养活谁的问题；其二，人民群众为非劳动者、非体力劳动者提供物质生活资料，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分工，双方是互利的。并非是所有的非劳动者、非体力劳动者都能创造历史，没有能力的人吃了人民群众提供的粮食，也不能创造历史。因此，从提供生活资料这一点上，是不能论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①

不同意黎鸣观点的人较多。

聂世明指出，"熵增原理"即热力学第二定律只是有限系统的物理学定律，它既不适用于无限的自然界，也不适用于人类社会。因而，用"熵增原理"不仅帮不了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忙，反而越发暴露了少数人（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理论偏见。社会历史包括信息历史，但并不就是信息历史，更主要的是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历史，也包括文化、科学、阶级斗争、社会形态变革的历史，等等。把社会信息量的增殖看作是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仅阉割了历史的丰富内容，更重要的是抹杀了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物质资料生产。信息量的增殖是代替不了物质财富生产的。信息历史不能取代社会历史。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社会是按照一定要适合的规律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把信息系统的从无序走向有序看作是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不仅否认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也根本说明不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又指出：不论是"新的英雄"还是"旧的英雄"，也不管是"人性英雄"还是"兽性英雄"，都是人类中的少数。只承认这些人类中的少数英雄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从而也就否认了人类中的多数，否认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英雄是能够反映时代的要求、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在社会发展中起进步作用的杰出人物。就个人作用讲，英雄人物的作用大于普通人的作用。但是，英雄人物是人民中的代表，英雄的作用也包括在人民的历史作用之中，并不存在离开人民创造历史作用的

① 启良：《也谈历史的创造者——与黎鸣同志共商》，《争鸣》1989年第4期。

英雄作用。①

卢纯田指出，物质资料生产是创造历史的前提，没有物质资料生产，就没有人类一切其他历史活动。人类历史只能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是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斗争中不断创造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历史，而不是“不断增殖信息量”的历史。把大多数单纯模仿、重复、循环操作的人从历史的创造者中排除出去，历史就将变成一片空白。离开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靠绝少数对社会信息量增殖作出贡献的人，是创造不出历史的。②

洪涛指出，科学技术的创造与历史创造是有联系的，又是有区别的。“新的综合的信息选择”不能构成或取代历史的创造。第一，要进行“综合”和“选择”，就要有可供进行“综合”和“选择”的信息，离开了人民所提供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大量有用的信息，任何天才的头脑都无法进行“综合”和“选择”，从而也就无法创造历史；第二，任何“新的综合的信息选择”要起到创造历史的作用，必须见诸社会实践。如果没有人民的实践，没有人民去模仿、学习、驾驭和操作，无论多么先进、多么理想的“综合”和“选择”，都只能是一纸空文。钻木取火方法的发明，如果不让人们去学习、模仿、重复和循环操作，那人类至今仍处在茹毛饮血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进步的缓慢，不仅不是学习、模仿多了，而是少了。在信息社会，能够“给出新的综合的信息选择”的英雄人物并不能包打天下。因为，在信息社会，绝大多数人仍要从事信息管理，如果没有众多的人去分配和传递信息，那么再好、再新的信息，也会变成过时的、无用的信息，这项工作做不好，同样会造成信息污染、信息失控。③

辑哲指出，黎鸣所说的“创造者”创造的历史只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创造性行为（发明创造等）和非创造性行为（模仿、重复）的总和，才构成了特定意义上的历史的“创造力”，“创造”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又指出，古往今来的创造者们的创造活动和“创造品”多得无法计算，但真正能够在社会现实中实现的仅是很少的一部分。这很少的一部分，恰恰正是由于被非创造者们接受了，并去“模仿”了、“重复”了，或说是付诸实践了，才使其价值得到了实现，才使其有幸能够以一般意义上的创造性来参与对历史的特定意义上的“创造”。从这个意义上

① 聂世明：《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评〈历史是创造者创造的〉》，《郑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② 卢纯田：《人类历史是“不断增殖信息量的历史”吗？》，《光明日报》1987年2月4日。

③ 洪涛：《浅谈历史的创造者》，《甘肃理论学刊》1989年第5期。

说，众多的直接参与社会实践的非创造者们总是在默默无闻地、不知不觉地“创造”着历史，而主要在精神领域驰骋的创造者们只能是非常有限地但却是有意识、有目的、颇有心计地参加历史的创造。另外，非创造者们因为其数量在社会中占绝对优势，也因为其非创造性行为在社会实践中也占绝对优势，所以是现实社会的主体，因而也是历史的主体，即一般所说的“历史的主人”。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从这一根本意义上，认定人民群众（基本上是非创造者）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承认英雄人物（主要为创造者）在历史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又指出，非创造性行为也显然不会以绝对意义上的重复和循环来参与“历史的创造”，在重复中也会有创造。人类社会的创造中有重复、重复中有创造的创造性行为和非创造性行为维持和“创造”着人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①

周德金指出，“新英雄史观”把劳动人民的劳动活动看成是一种简单的模仿行为、重复行为，这种有意贬低劳动人民劳动活动意义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亦是十分有害的。须知，人类社会中没有绝对重复的实践行为，也没有简单重复的历史现象。仅从形式上看，劳动人民的劳动活动仿佛是重复性的活动，但内容上却在不断地更新，不断地把生产向广度和深度推进，不断地增加着社会财富的总量，不断地提供社会财富发展变化的新信息，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和新生活的创造者。普通劳动群众及其生产劳动活动，是科学家、思想家们提出新思想、新观念、新发明、新创造的源泉，也是科学理论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伟大力量。科学理论在未付诸生产实践之前，只是可能的生产力，要把它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就要靠普通劳动群众的实践。任何一项科学发明、发现，单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将它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②

新英雄史观还有一些观点：

孙洪义提出，杰出人物是历史创造者。从前的历史创造者只能是居于历史主导地位的历代剥削阶级统治者，他们是当时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力量。历史的进程如何，只能取决于统治者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和运用。战争的胜负、经济的繁荣与衰落、国家的统一和分裂，都是由统治者的行为来决定的。人民群众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怎么能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呢？人民在那个时代不是主人，也不是历

① 辑哲：《历史的“创造者”与创造者的历史——与黎鸣同志商榷》，《理论月刊》1987年第6期。

② 周德金：《评“新英雄史观”》，《黄冈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史的创造者。在革命的时代,人民群众仍然是历史的制造者而不是创造者。那么谁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呢?是革命的领袖和领袖集团。革命领袖们和人民群众组成了新社会的创造力量,但是在革命发展的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革命领袖而不是人民群众。革命的失败,责任在领袖而不是群众。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责任只能由革命领袖负责。同样,在遵义会议的关键时刻,显然毛泽东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的。是毛泽东真正起到了历史创造者的作用,他挽救了中国革命。说毛泽东创造了历史,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是毫不夸张的(按:遵义会议如果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反对"左"倾路线,毛泽东路线能占上风吗?毛泽东路线占上风是不是民心所向、军心所向决定的?革命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参与,只有几个领袖摇旗呐喊,能成功吗?脱离了人民群众的人还能成为领袖吗?)。我们并不否认红军战士的根本作用,但红军如果没有英明领袖的指挥,面临的很可能是全军覆灭的历史悲剧。推动历史前进的历史创造者始终是革命领袖和领袖集团而不是人民群众,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这是客观规律的必然表现。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讲,用杰出人物来称谓促进历史发展的创造者比较合适。①

周喜衷也认为,有时是英雄创造历史,有时(主要是大变动时期)是英雄和人民共同创造历史,其中尤以英雄的作用为最。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历史是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共同创造的。而共产党的领导是主要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谁造成的?不是人民,是个人意志造成的。群众只是这一历史的参与者、服从者,群众还是没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被个人意志所主宰。谁主宰历史命运,谁就是历史的当然创造者,他也是历史的负责者②(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人民群众反对、抵制。而且最终被否定,正是人民群众意志决定的)。

周溯源也主张,英雄与人民共同参与了历史创造。还谈到"权力对历史的创造",指出,握有权力的首脑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惊人的。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权力起着制约作用。人民群众总是接受权力的指挥③(按:这实际上仍是在讲英雄的作用)。

---

① 孙洪义:《应当区分历史的创造者与制造者》,《河北学刊》1990年第2期。

② 周喜衷:《创造历史与掌握命运》,《争鸣》1987年第1期。

③ 周溯源:《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新思考》,《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吉彦波直截了当提出了英雄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历史的"群英史观"。既然历史进步的标志是"出新"，历史价值的取向是"首创"，历史本质的要求是创造，那么，探讨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寻找历史的主人，就应该用"创造史观"，即谁为历史增加了前所未有的东西——新事物、新方法、新思想、新技术、新知识……并且这些新东西是有益于人类进步、人类幸福，有益于生产力水平提高的，谁便是历史的创造者。比如，一个制砖工人，他虽然没有新工艺、新机器、新方法等方面的创造，但是他每天辛辛苦苦地和其他工人一样，为社会增加了几百几千块砖坯，这算不算历史创造者呢？按传统观点，这应该算，因为，这也是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但是，按照创造史观，这不算历史创造活动，因为他没有为历史提供前所未有的新东西[①]（按：工人的砖可以盖以前没有的新房）。无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唯物史观的新形态来指导自己的实践，这个新的形态便是创造史观。而创造史观的确立，同时也论证着一种新的历史主体论——群英史观——群众和英雄共同创造历史，英雄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起着主导的作用，人民群众作为英雄的基础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起着主体的和基础的作用。群英史观是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呼唤自己的英雄之理论反映，是在历史主体论问题上时代精神的反映。[②]英雄的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群众的英雄是创造历史的主导，群众和自己的英雄共同创造历史。[③]

这种英雄、群众共同创造历史的观点，突出了英雄是创造的主导，实际上是新英雄史观。

对于以上观点的批评，可以参见以上对黎鸣观点的批评。也可参见上面"(3)关于人民群众的含义"一节。

附带说一下，进入 21 世纪，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的文章，每年仍有一些发表。这些讨论已不属"20 世纪后半期"的范围，从略。

(四) 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的政治性、现实性

历史创造者问题，是一个学术问题，同时又因为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路线

---

① 吉彦波:《从历史本体论到历史价值论——创造史观刍议》,《理论探讨》1996 年第 2 期。

② 吉彦波:《群英史观:"共创论"的再认识》,《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7 年第 2 期。

③ 吉彦波:《马克思的世界观不是教义——〈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札记〉的"札记"》,《运城学院学报》1997 年第 1 期。

相关，与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相关，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关，所以又包含着政治意义、社会意义，有强烈的政治性、现实性。这就难怪有的文章的政治色彩很浓。

如王乃之谈道，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革命运动的实践提出来的一个命题。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同无政府主义者、同民粹派在革命实践上的分歧，首先就是：是按英雄史观干还是按唯物史观干。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历史是由领袖人物决定的，革命党不需要发动群众，也不需要争取、瓦解对方的群众，只要有一两个英雄人物把对方的领袖刺死，就可以"一颗炸弹换万民自由"。而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认为不能像无政府政党那样单枪匹马地去冒险，而应把工夫用在发动群众上，结果胜利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命题，对革命实践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们有什么理由抛弃它呢！[①]牛方玉也指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深刻地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视角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表达的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②]

反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涉及了政治和现实意义。如前文孙洪义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口号是有极大局限性的，如果用这个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指导研究历史，这个观点的片面性就立刻暴露出来了，因为它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实际。一、它是主张极端民主化的人的理论依据。一些人片面鼓吹自由和民主，主张削弱党的领导，往往利用这个理论；二、由于片面理解这个口号，往往与深化改革的思想解放发生冲突。这个口号往往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旧观念的思想来源，造成打击人才、鼓励庸人的不正常现象；三、我们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片面理解这个口号便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和失误。在一些落后地区，一些村民不修水利，反而集资修庙拜佛，这正是对这个口号的莫大讽刺。思想落后的群众是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力量吗？[③]（按：这是不是等于说群众路线是错误路线？"杰出人物是历史创造者"难道不是个人崇拜、家长制、精英政治、上层路线、英雄史观、天才论的理论依据？很多事物、很多问题是有两面性、多面性的，不能只看一面，要全面地看，要把握其主要的方面、主导的方面）吉彦波也说，群众史观在阶级斗争的年代是正确

---

① 王乃之：《创造者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与黎澍同志商榷》，《西华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② 牛方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命题再阐释》，《理论学刊》2008年第1期。

③ 孙洪义：《应当区分历史的创造者与制造者》，《河北学刊》1990年第2期。

的，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群众史观失去了其现实指导作用。只强调"群众史观"，而不具体分析群众中谁是英雄、谁创造历史，会形成功过不分、平均主义、吃历史大锅饭，会打击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不利于历史进步。并且从六个方面否定群众史观的合理性：一、从逻辑学集合概念的理论来分析其不合理；二、从普遍与特殊、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看其不合理；三、它和历史创造的实际过程，和认识的规律、常识都是不相符的；四、它有明显的客观主义色彩，忽略了人的主体性、主观能动性、历史创造性和选择性，把复杂多变、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活动简单化教条化了；五、群众史观是具体历史时代、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带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和条件性，在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泛滥的年代里，它一方面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和英雄虚无主义，另一方面也成为个人崇拜的工具；六、群众史观有着形而上学、对着干的片面性弊病和阶级斗争的火药味①（按：这不仅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否定群众史观，也是在普遍意义上否定群众史观）。

赞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涉及了政治和现实意义。如晓根谈到（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要求全党坚持唯物史观，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谈到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把马列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中共"十二大"报告，在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时也强调："归根结底，是由于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原理，坚持马列主义的人民创造历史的科学原理。"谈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牢固树立党的群众观点，认真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党群关系便密切，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否定和搞乱了理论，淡化群众观点，不执行群众路线，党的事业就要遭到挫折，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②俞晓光也谈道，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必须坚持。这一原理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依据，一切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是实现党在各个时期的基本路线的关键。而作为一种哲学观点的"人人"创造历史的说法，实际上是现实种种脱离群众思想倾向的反映，由此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原理的否定，客观上滋长了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

---

①　吉彦波：《群英史观："共创论"的再认识》，《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7年第2期。

②　晓根：《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云南民族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义，并为之提供了某种理论依据。因此，重申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①(按："主人"问题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现实问题、政治问题，是个谁为谁服务的问题、谁服从谁的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马克思主义的管理者是人民公仆的思想的体现，是管理者为人民群众服务、管理者服从群众人民。如果人民群众不是主人，管理者是主人，那么管理者便不是人民公仆，不是管理者为人民群众服务、管理者服从人民群众，而是人民群众为管理者服务、人民群众服从管理者)。周德金指出，"创造者创造历史"是"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在理论上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对立，在实践上为推行"精英政治"提供理论依据，为建立由少数"政治精英"统治的国家政权而鸣锣开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②

历史创造者问题，一方面，是一个有政治含义的学术问题，作为学术讨论、学术探讨应该无禁区，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应该百家争鸣，允许各种意见、观点发表，在讨论中应该避免泛政治化，不要打政治棍子，不要用政治斗争的方法来解决学术问题，要通过学术讨论，用学理来说服人。另一方面，对一个有政治含义的学术问题持有一定的政治意识、政治警觉也应该允许，但必须注意的是不要随意或轻易对某个问题作政治判断、政治评价。

(五) 几点初步的结论

在20世纪80年代历史创造者讨论的二三十年后，仍有人重新拣起当年的论点，写成并无新内容的文章，甚至抄袭当年的论点，再次发表，这一方面是学术腐败的反映，另一方面大概是没有谁来做过讨论的结论缘故。一直没有人来做结论，或许是因为难以有定论，或许因为要冒风险。而本节是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研究进行总结的一部分，对某些问题做一些结论，哪怕是初步的结论，以抛砖引玉，大概是应负的责任，于是不揣愚陋，谈些看法。这些看法，只是就笔者认为较为合理的意见归纳几条，那些笔者认为尚难把握的意见只得存而不谈，以待来者。

1.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要坚持从经济基础出发考察历史、社会，作出判断，而不是从个别人的意志、愿望、话语出发考察历史、社会，作出判断。谁是历史的创造者，不能以由某个人说过

---

① 俞晓光：《历史的创造及其他——评"人人创造历史"说对群众史观的诘难》，《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② 周德金：《评"新英雄史观"》，《黄冈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什么话决定，不能由某些人的愿望决定，而应该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出发来进行考察、判断。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的。而人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是人，这个人是劳动群众（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是人民群众。生产关系的发展受生产力推动，同时也由人的斗争推动，人的斗争主要是劳动群众的斗争（在阶级社会中是各阶级、各阶层的群众斗争）、是人民群众的斗争。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诞生，人民群众的斗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民群众可以是一种物质力量、经济力量，可以是一种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历史力量，任何一个个人、一个领袖人物都不可能同时具有这些力量。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推动出发，可以肯定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也可以肯定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不论是谁说过或谁没有说过，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是历史事实，是被历史实践证明了的，是可以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当然“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或许更具普遍意义，适合于一切社会）。

从经济基础出发、从物质基础出发考察历史、社会、自然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基础上的，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是受制约的，不是随心所欲的。奴隶社会的人民群众进行奴隶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创造，创造奴隶社会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群众进行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创造，创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奴隶社会的人民群众不可能进行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创造，不可能进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创造。中国的人民群众创造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美国的人民群众创造美国的历史、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的人民群众不可能创造美国的历史、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美国的人民群众也不可能创造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工人进行工业的创造，农民进行农业的创造，演员进行表演的创造，科学家进行科学的创造，政治家进行政治活动、政治斗争的创造，……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创造各行各业的历史。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反映的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宏观看法，而不是微观看法、不是对个别历史的看法。“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也反映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宏观看法，也不是微观看法，也不是

对个别历史的看法。人类社会历史的宏观发展,需要宏观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微观发展,需要微观分析;具体的历史、个别的社会需要具体、个别的分析。不能从一时一地,不能从个别事、个别人,而要从整个历史发展、整个社会发展来看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决定性力量,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2. 坚持辩证法基本原理

坚持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基本原理。不能一成不变地静止地看问题。社会历史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也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不是静止不变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人民群众也变化、发展,创造历史的内容也变化、发展,人民群众直接或间接创造历史的途径、手段、方法也变化、发展。

用变化、发展的观点看,人民群众可以转变成英雄,英雄可以转变成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不断创造着英雄,涌现着英雄,英雄不断来自于人民群众,回归人民群众。

坚持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而不是机械地、片面地、极端地、非此即彼地看问题。说人民群众创造一切,说只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样极端地、非此即彼地看问题是不科学的。同时,也应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命题,并非是说人民群众创造一切、只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命题也承认人民群众以外的人也参与历史创造,也肯定人民群众以外的杰出人物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这一命题也不否认人民群众中有一部分人并不参与创造历史,即不具备劳动能力、创造能力的人,丧失劳动能力、创造能力的人,不参与创造历史。这一命题也承认人民群众每一个个体在历史创造中作用是不一样的,其中有些人是主要创造者,有些人是次要创造者;有些人是直接创造者,有些人是间接创造者;有些人是高层创造者,有些人是底层创造者;有些人是高级创造者,有些人是低级创造者;有些人的创造影响大,有些人的创造影响小甚至没有影响;有些人在创造中起积极作用、促进作用,有些人起消极作用、促退作用。人民群众以外的人,有些在历史创造中起积极作用、促进作用,有些则起消极作用、促退作用。

辩证地、全面地看,人民群众不只是劳动群众,也包括非劳动群众;不只是体力劳动者,也包括脑力劳动者;不只是被管理者,也包括管理者;不只是多数的普通人,也包括少数的英雄、杰出人物;不只是没有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人,也包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人。在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英雄,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代表人民群众的英雄,被人民群众推举为领袖的英雄,是人民群众的一分子。与人民群众对立的、最终被人民群众抛弃的人,不是人民群众的一分子。

3. 有些问题可以进一步研究

如非人为因素是否也参与历史创造？怎么创造历史？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如何？（条件是被人使用）又如历史创造者讨论的是人类社会史的创造者，自然历史的创造者是什么？这个问题搞清楚，对解决人类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会有帮助。

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还可以参见牛润珍《关于历史学理论的学术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肖黎主编《20 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等。

五、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争鸣[①]

一般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问题，大多是一个史学理论问题。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价，则大多是历史理论问题。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国自古以来一直进行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新的研究，对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也进行了新的研究，在理论问题上，在具体历史问题上都有了新的认识。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理论问题的讨论，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49 年 10 月到 1976 年 10 月，初步探讨了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和标准，如提出了历史主义标准和阶级标准等，在 1957 年以后，基本上比较强调阶级标准。第二阶段是 1977 年以后，尤其是 9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史学界对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占主导的阶级标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许多曾引起争议的历史人物展开了争鸣。此后，对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讨论开始摆脱原有阶级标准和历史主义原则的模式，人物评价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一）20 世纪后半期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概述

1. 1949 年 10 月至 1976 年 10 月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在史学研究领域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广大史学工作者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和进行教学，探讨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动力，批判和清理唯心史观。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 60 年代前期，史学界相继对一些重大的史学理

---

① 本节参考了方敏等：《中国历史人物研究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肖黎主编：《20 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等。

论问题、历史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其中就包括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问题。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讨论，曾有过三次高潮，①其中涉及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大致如下：

在研讨中，历史主义原则和阶级观点是一直被反复强调的，而且历史主义原则一度占据主导。在 1957 年反右派运动开展以前，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如何正确地运用历史主义原则及其分析方法去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1951 年《学习》编辑部发表文章《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反对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一文，对历史主义的内涵进行解释："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历史主义。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我们在评判历史人物时，应该从这些人物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看他们在当时的条件下究竟是起了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还是起了阻碍进步的作用，因此既不能以今天的尺度去衡量他们，也不能脱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来谈论他们的进步性。"又进一步强调，坚持"科学的历史主义"，首先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即"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②1952 年，翦伯赞发表《关于历史人物评价中的若干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人物评价观作了透辟的分析，"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当然不是要求我们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历史人物；而是要严格的联系到这个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历史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因为一定的历史时代只能产生一定的历史人物，这是历史的局限性。如果把这种历史的局限性置之不顾或估计得不够，都不能正确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③荣孟源认为，分析历史人物须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按照这个原则来处理历史人物，我们就不应该以今天的尺度去衡量古人，也不应该以固定的"永恒正义"去评论人物，而是应该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去进行具体的分析。评论历史人物以这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为标准，而同样的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又是起着不同的作用的。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把历史科学弄成一笔糊涂账。④陈旭麓也强调"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评价历史人物，不要以今天社会发展的条件来衡量历史人物"。⑤"如果我们以今天所达到的社会生产和政治文化的水准去要求历史人物，不但历史上找不着好人，而且也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是把我们所处的新社会与历史人物

---

① 详见方敏等：《中国历史人物研究论辩》第一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学习》编辑部：《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反对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学习杂志》1951 年第 12 期。

③ 翦伯赞：《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历史教学》1952 年第 9 期。

④ 荣孟源：《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41 页。

⑤ 陈旭麓：《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新知识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7 页。

所处的社会等量齐观，这是非历史唯物主义的”。[①]“(历史人物)对历史社会起了推动进步的作用还是起了阻碍破坏的作用。这个原则不但是评判历史人物的标准，同时也是我们自己处理事物的标准”。[②]范文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应该对整个封建时代的历史，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的态度，对于个别的历史人物、个别的历史事件也同样应该采取历史分析的态度。无分析地一律抹杀或一律颂扬，都是主观主义的、非历史主义观点的表现。[③]吴泽强调：要用“发展或历史主义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才能“还他个本来面目”。“必须把历史人物放在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考察，不要拿现代人的水平去衡量古人，犯上非历史主义的历史否定论”。[④]

在强调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的同时，一些学者对历史人物评价中存在的一些非历史主义的倾向进行了分析和批评。翦伯赞提出要避免对历史人物描述现代化、理想化：“为了进行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我们是应该表扬一些值得表扬的历史人物，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有权把历史人物现代化或理想化，而是给予他们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应该知道，把历史人物现代化或理想化起来，不但不能帮助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而是相反地妨害了它，正确的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对于历史人物的处理，应该不仅是培养人们对杰出的历史人物的爱，让人们因为我国有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而感到骄傲，而且应该让人们进一步认识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不论如何杰出，但比之我们今天的新的英雄人物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异。”他明确指出，反对影射史学，“我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办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特别是今天的现实与历史上的现实已经起了本质上的变革，把历史上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等同起来，那不是把历史上的现实现代化使之符合于今天的现实，就是把今天的现实古典化去迁就历史上的现实，两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⑤]嵇文甫认为，要防止两种偏向：一种是“‘左’倾”的偏向，“这是历史否定论”；又一种“右倾”的偏向，“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把过去的人都宽容了、原谅了”。“这是两种极端的看法，对于历史上的人物不能漫而言之，笼统

① 陈旭麓：《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8页。
② 陈旭麓：《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0页。
③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人民教育》1951年第6期。
④ 吴泽：《历史人物的评判问题——为展开武训批判而试论》，上海棣棠出版社1951年版，第44页。
⑤ 翦伯赞：《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历史教学》1952年第9期。

一大包都宽容，或笼统一大包都骂倒。对于现实人物必须有分别，对于历史人物何尝不然”。[1]尚钺认为，“不能用现代人的观点和感情去要求古代历史人物和事迹，并且更不能随便把现代的术语去硬套古代人头上”。[2]

阶级观点是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尺。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著作、文章中，阶级分析的方法是当时史学界普遍公认的历史研究法。嵇文甫在《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中指出，要站稳阶级立场，反对客观主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以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依据”。[3]翦伯赞提倡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要并行使用，“当作一个人民的历史教师或历史研究者评论一个历史人物，是应该公开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去和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对历史人物的歪曲作坚决的斗争；但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不就等于要用今天的，乃至今天无产阶级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而是要我们用无产阶级的历史观点，即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评论历史人物”。[4]紫翔则强调历史人物的阶级立场，“处理一切问题，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5]陈旭麓认为：“我们不可能离开阶级来评价历史人物，也不可能离开思想行动来空谈历史人物。”但他同时强调：“从阶级出发评价历史人物，当然不是简单的将每个历史人物身上贴上阶级的标志，筑成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个人的阶级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以此我们不但要掌握其阶级出身，更要掌握其阶级变化的可能与事实，而变化又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必须研究其具体的思想行动以及他所参与的事件所发挥的作用。所以历史人物的出身与社会地位，不能作为绝对的标志；更重要的，是要就其思想行动、社会影响以及发展过程，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且有些历史人物，虽然没有离开统治阶级的地位，可是他的思想行动所代表的利益，不止一个阶级而包括当时社会的各阶级，对这样的历史人物，我们也就不可一概而论。”[6]刘桂五认为：“现在学术界大多数人都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用科学观点来解释问题，历史科学工作者也在用阶级观点来分析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这当然是好现象，不过一个历史人物究竟是哪一个阶级的人物，是哪一阶层的人物，必

---

① 嵇文甫：《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二月十八日对新史学会河南分会演讲)，《新史学通讯》1951 年第2 期。
② 尚钺：《如何理解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教学与研究》1956 年第 4 期。
③ 嵇文甫：《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二月十八日对新史学会河南分会演讲)，《新史学通讯》1951 年第2 期。
④ 翦伯赞：《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历史教学》1952 年第 9 期。
⑤ 紫翔：《历史教学中有关历史人物评价一些问题》，《历史教学》1953 年第 1 期。
⑥ 陈旭麓：《论历史人物及其阶级》，《历史教学》1954 年第 10 期。

须进行具体分析才可以断定，不然，给历史人物随便加上阶级或阶层的字样是于事无补的。”[①]以上可以看出，20 世纪 50 年代前半期，大多还是主张采取辩证的态度评价历史人物，在评价历史人物时，阶级观点受到重视，历史主义原则也得到强调。

史学界在坚持历史主义原则和阶级观点的基础上，对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也进行了讨论。总体看来，主要坚持三种标准，即对人民有利标准、历史作用标准和全面评价的标准。荣孟源认为，评论历史人物，首先，要以这个人的思想行为在当时是推动还是阻滞社会发展，是增进还是破坏社会生产，是有利还是有害于劳动人民为标准，而不是以什么空洞的抽象的“好”或“坏”为标准。也就是说人物“好”与“坏”的标准，不是根据什么固定的伦理来规定的，而是根据社会发展规律来规定的。我们不应该抛开社会阶级关系来孤立地评论一个人，而是要研究这个人在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其次，要全面评价历史人物，“根据这个原则，评论历史人物，必须具体地分析人物的全部历史、他的一切方面，以及一切有联系的问题”，[②]“既然是全面的分析，就须研究人物一生的变化，从其变化中去观察，而不是截断历史，只就某人的一言一行来评论其一生”。[③]“全面地分析历史人物，就是要注意事情的复杂关系，注意事情的是非轻重，注意事情变化的情况，此外一切有关联的事物，也都是应该注意的。对于人物任何片面的看法都是不科学的，忽视了某一方面会发生错误，夸大了某一方面也会发生错误”。[④]瑞云在《对评价历史人物的几点意见》中也提到，要看历史人物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社会起推动还是阻碍作用，是代表还是违反人民的利益。[⑤]

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把史学界一大批学者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学术研究、对“百家争鸣”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此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逐渐形成，提高阶级斗争觉悟成为全社会的重要任务，尽管仍有一些学者强调历史主义原则，但历史主义原则开始受到阶级观点的打压。

1959 年，郭沫若在《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讲到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他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如同其他方面的历史研究一样，应该根据辩

---

① 刘桂五：《关于历史人物传记著述中的几个问题》，《读书月报》1956 年第 10 期。

② 荣孟源：《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49 页。

③ 荣孟源：《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52 页。

④ 荣孟源：《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53—54 页。

⑤ 瑞云：《对评价历史人物的几点意见》，《光明日报》1954 年 12 月 23 日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进行研究。当然,我们要坚守我们的阶级立场,从事批判。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历史是发展的,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这样就比较易于正确看清他们在历史上所应处的地位。"[①]1959 年,吴晗在《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初步意见》中再次指出,"分析人物不能单纯从阶级出身来决定一切,而要看他的言论、行动和成就,对时代的贡献等等"。"评价历史人物应从当时当地人民利益出发,他的作为对当时当地人民是好是坏,对生产起促进还是起破坏作用,对文化艺术是起提高还是起摧毁作用,这是一个标准。不能拿要求现代的人的标准来衡量古代人,那样就没有一个人会及格了,这样做,是非历史主义的"。此外,他还着重提到了道德标准的问题,"社会性质改变了,道德标准也必然随着改变,这是个历史发展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应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出发,而不能拿今时今地的道德标准去评价彼时彼地的历史人物"。[②]1960 年,吴泽等提出,"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是以历史时代为背景,以历史作用为标准,加以全面分析。现在看来,不是在于反对以历史作用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而是如何理解和掌握它"。"强调动机的同志,其错误就在于他们脱离了支配历史人物动机的社会背景而考察个人动机。这样就把评价历史人物从属性的因素,当作了决定性的因素来看待"。"动机是一个不易把握的因素。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考察动机,而是在于如何考察历史人物的动机"。他们还提到了关于历史人物品质和个性的问题,"评级历史人物,主要是以其政治实践为依据,但并不是说,完全排斥对人物的品质和个性的估计。问题是在于如何估计"。[③]1963 年,宁可提出,认识到应当用阶级观点来看待历史事物,并不意味着就有了辩证的思想方法,反之也是一样。把它们之间的联系看作是必然的,以为只要有了阶级观点,自然就有了历史主义,这不免是一种机械的、简单化的理解。[④]以上这些看法基本上是强调历史主义的,但很快被否定。

有不少学者发表文章强调了阶级观点。如林甘泉发表《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再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新建设》1963 年第 5、10 期),林杰发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没有必然联系吗?》(《文汇报》1963 年 10 月 24 日),田昌五发表《对马

---

① 郭沫若:《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9 年第 4 期。

② 吴晗:《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初步意见》,《历史教学》1959 年第 12 期。

③ 吴泽等:《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若干理论问题——论一年来评价曹操讨论中存在的问题》,《学术月刊》1960 年第 1 期。

④ 宁可:《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历史研究》1963 年第 4 期。

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探讨》(《光明日报》1963 年 10 月 31 日),等等。林甘泉认为,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核心,它本身就包含着深刻的历史主义要求,深深地浸透了历史主义的精神。在历史研究中,越能贯彻阶级观点,就越能深刻而彻底地揭露历史真相;如果离开了阶级观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历史主义。他举例说,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当时当地标准"说,是脱离了阶级观点的,因为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各有自己的标准;同时这种说法也是非历史主义的,因为许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只有在后代才能看出它们的结果和意义,如用"当时当地标准"衡量,就根本无从说明。他认为,任何对阶级观点的背离,都只能导致非历史主义。林杰认为,应该十分肯定地说,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看待历史事物,就必然有了历史主义。他说,在阶级社会里,没有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不存在不是历史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意味着历史的运动,历史的运动意味着阶级斗争。只要有了阶级观点,就必然有了历史主义,反之亦然。如果认为两者没有必然联系,实际上就是把两者割裂开来。如果把两者割裂开来,使阶级斗争观点脱离历史主义,使历史主义脱离阶级斗争观点,就不可能对历史现象作出科学的说明。田昌五认为,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精髓。现代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者也谈什么"历史头脑",谈历史事实、时间、地点、事件、人物、历史意义等等,他们的历史主义或者是"为历史而历史",或者是"根据现代解释过去",总之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而把人的主观精神当作历史的动力。所以,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对立起来,离开了阶级观点来谈历史主义,就会堕入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陷阱。[①]

关锋等也发表文章强调,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人物是一定的经济关系的产物,个人活动为阶级关系所决定。所以评论历史人物必须进行阶级分析。而否认分析批评历史人物的局限性,也就谈不上阶级分析。而脱离阶级分析,历史人物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②]

1965 年,戚本禹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进一步说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研究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没有"历史主义",就要犯"否定一切"的"非历史主义"的错误。问题的提出使人感到惊异。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怎么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因而必须要用一种"历史主义"来补偏救弊呢?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里,怎么会有一种脱

① 王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问题的讨论》,《人民日报》1963 年 11 月 28 日第 5 版。
② 关锋等:《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人民日报》1964 年 2 月 22 日第 5 版。

离了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呢？强调那种脱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即那种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内容的"历史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根本谈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企图用一种离开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来补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偏"，救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弊"，那只能是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①

过分、极端强调阶级观点，也导致了"唯成分论"占了上风。孙祚民的"唯成分论"被史维国批评，史维国指出："判断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的阶级立场，必须以他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学说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为依据，不能以他的家庭出身和成分为依据；同样，对一个政权的阶级性质的判断，必须看它实行什么政策，它所实行的政策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不能根据各级官吏的成分或家庭出身来判定。如果采取唯成分论的方法，来判断当代的或历史上的政权的阶级性质，以及政治家、思想家的阶级立场，那就必然引出十分错误的结论。"②而孙祚民又反批评说，史先生不同意拙稿结合阶级成分考察一个人阶级立场的方法，而另外提出了一个决然相反的原则。他说："判断一个政治家的阶级立场，绝对不能（请注意，是"绝对不能"！）以他的阶级成分为依据，而必须以他的政治活动是为哪个阶级谋利益为依据。"即必须绝对把阶级成分这个因素排除掉。我们认为，这更是带有原则性的严重错误。像史先生那样做法，唯成分论固然被"反掉"了，但同时也取消了阶级分析。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孙祚民强调，阶级成分与阶级立场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判断一个人的阶级立场，是绝对不能丢开阶级成分的。③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11月30日被《人民日报》转载，掀起了对吴晗的政治批判，随后很多文章批判了吴晗的"历史主义"。艾力耘《以革命的批判精神评价历史人物——与吴晗同志商榷》，指出："吴晗同志背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精神，在评价历史人物问题上陷入了复古主义的错误"。"从吴晗同志的实践来看，他的所谓'当时当地的标准'，实质上就是照搬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的意见。吴晗同志的所谓'当时当地的标准'，就是封建主义的标准、资产阶级的标准。看来吴晗同志背弃无产阶级的批判

① 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红旗》1965年第13期。

② 史维国：《是阶级分析，还是唯成分论？》，《哲学研究》1963年第6期。

③ 孙祚民：《坚持阶级分析，还是取消阶级分析？——评史维国先生的观点》，《哲学研究》1964年第4期。

的革命精神，已经走得相当遥远了”。“他（吴晗）所主张的历史分析，恰恰是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他所反对的非历史主义，却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①武慰萱《是强调阶级分析，还是反对阶级分析？——评吴晗同志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指出吴晗三大错误：一、片面强调历史人物的个别性、特殊性，从而抽掉了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二、以反对“唯成分论”为借口，反对对历史人物进行阶级分析；三、反对指出古人的阶级局限性，主张评价历史人物的“当时当地标准”，主要是当时当地剥削阶级的标准，是同阶级分析方法根本对立的标准。②与此同时，主张“历史主义”的翦伯赞、宁可等一批学者都遭到猛烈的政治批判。

“文革”开始以后，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成为主题，阶级斗争史观发展到了极致，“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被进一步绝对化、教条化，阶级斗争的观点被用以“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判定一切”。历史研究完全阶级斗争化、阶级观点化，史学完全沦为为“文革”政治服务的工具。历史人物研究，全面“标签化”、极端化。凡是剥削阶级人物、错误路线的执行者，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从来没有做过好事；凡属革命者、正确路线的执行者，都是十全十美的英雄，从来没有做过错事、坏事。

“文革”后期，搞起“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崇尚法家，评价历史人物，皆以是不是法家为标准，是法家，就是好人；是儒家，不是法家，就是坏人。例如对三国时期人物的研究，诸葛亮是“东汉末年、三国初年的法家代表”。③刘备是“一个法家政治家”。④都给予了肯定。而关羽则被扣上“儒家代表人物”的帽子，是“儒家营垒中的一个死硬派”，“‘武圣人’关羽也和‘文圣人’孔老二一样，总是要被一小撮阶级敌人用作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工具的”。“当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考察一下关羽其人，肃清‘武圣人’的反动影响，这对于推进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总结阶级斗争的经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是有益的”。⑤所以要借“评法批儒”来批武圣人关羽，就是影射、批判当时军队里“四人帮”痛恨的人。

---

① 艾力耘：《以革命的批判精神评价历史人物——与吴晗同志商榷》，《前线》1965年第24期。
② 武慰萱：《是强调阶级分析，还是反对阶级分析？——评吴晗同志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人民日报》1966年2月17日第5版。
③ 唐明邦：《诸葛亮评传》，《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4年第3期。
④ 路牧：《略谈历史上的刘备》，《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74年第4期。
⑤ 鲁戈：《论历史人物关羽》，《文史哲》1975年第3期。

2. 1977—2000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端正了政治路线，端正了思想路线，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史学界也拨乱反正，回到健康正确发展的轨道。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也开始有新的探索。

第一，在“文革”结束之初，批判了“四人帮”对历史科学的破坏，开始扭转历史研究中的种种错误倾向。吴奈夫《批判“四人帮”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的唯心史观》一文指出：“为了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和思想是非一一纠正过来，肃清其在史学领域内的流毒和影响，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彻底批判‘四人帮’在影射史学中贩卖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这是摆在我国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但文章中仍没有摆脱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思维方式，仍强调：“在史学领域，必须深入、系统地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反动的世界观，使我国的历史科学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①苏双碧在《论历史人物评价》中批判了“四人帮”对历史人物的歪曲和捏造，“以儒和法，革命和反动，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等等来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尺，让几千年来，成千上万的历史人物在各自相反的两面旗帜下站队，表面上界线分明，实际上面目全非，不唯历史人物本身被莫名其妙地强迫到正反两面旗帜下站队，就连今天的人也看不清楚旗帜之下的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②

在清算“四人帮”史学的时候，也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或者说仍然沿袭着“文革”时期的思维习惯，即“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对“文革”时期被肯定、颂扬的历史人物就进行否定。如被江青吹捧的吕后一度被全盘否定。有的文章说，从本质上看，吕雉“不过是公元前一百多年那个时代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个庸人，一个妇从夫贵，因缘附会，侥幸爬上高位并且侥幸抓到大权的庸俗女人。她心胸狭窄、嫉妒多疑，贪婪而又残忍，十分狡猾而相当果断，善于玩弄阴谋诡计而毫无大略，缺乏远见。她的智略与她的野心极不相称。尽管在这么大的国家里抓了皇权十几年，却几乎没有做过一件足以书于青史的好事”。③有的学者则认为，这样评价历史人物的做法是不妥当的，指出：“‘四人

① 吴奈夫：《批判“四人帮”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的唯心史观》，《江苏师院学报》1978年第1期。

② 苏双碧：《论历史人物评价》，《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③ 周修睦：《吕后评传》，《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帮’横行时，吕后红得发紫；‘四人帮’垮台后，吕后臭不可闻。”这是“在影射史学的迷魂阵里翻跟头，戴着‘四人帮’制造的枷锁造‘四人帮’的反”。应当“抛弃影射法，有分析、有区别、有对比地来评价历史人物和批判现实人物”。认为对吕后评价应当基本肯定，这主要体现在吕后对四大关键问题的态度和行为，即铲除诸异姓王、保持边疆安宁、恢复和发展汉初生产、总结了秦王朝失败的教训。而吕后走向反动，则起自“惠帝死，立年幼的少帝而自己临朝，……这才是真正的阴谋篡权”。“对吕后的评价，应以公元前187年高后元年临朝称制为界限，此前应予肯定，此后的晚期篡权应予否定。……总的来说，还是功大于过，应该基本肯定”。并提出：借鉴法和古今人物对比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有其坚实的哲学基础，……完全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的”，[①]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正确方法。这是历史人物评价中摆脱旧思维提出的新看法。

第二，科学、辩证地运用历史主义原则和阶级观点评价历史人物达成共识。片面地、极端地强调阶级观点的重要已销声匿迹。李蔚《略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评价历史人物》一文，对“历史人物为什么一定要作阶级分析，怎样进行阶级分析，阶级分析有什么科学和现实的意义”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我们对阶级社会里的各种历史人物，如果不作阶级分析，弄清他们的阶级属性及其言行‘对谁有利’就有可能敌我不分、人妖颠倒，更谈不上从本质上看清那些历史人物真正的地位与作用，从而给予恰当的评价。”对于怎样对历史人物进行阶级分析，作者认为，首先“要根据历史人物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其次，不能单纯强调其阶级出身和主观动机，要着重分析这个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及其实践活动对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过什么作用；再次，必须要分析和批评它的局限性”。[②]苏双碧在《论历史人物评价》中认为，阶级分析法主要是考察历史人物活动的阶级斗争背景，以及历史人物的思想行动所反映的阶级利益，并不是简单地按照“公式”去贴阶级标签。“如果按照历史人物的阶级地位来判断历史人物的作用，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但是，那样做却是什么问题也不能说清楚的”。而且他进一步指出，阶级属性历来就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阶级属性和代表的阶级利益并不是完全一回事。[③]罗耀

---

① 吴尚宇：《批判江青必须否定吕后么？——兼谈历史人物评价和古今人物对比中的方法论问题》，《齐鲁学刊》1981年第2期。

② 李蔚：《略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评价历史人物》，《兰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③ 苏双碧：《论历史人物评价》，《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九《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指出，历史人物评价的根本标准是“看他对社会财富的生产是促进还是阻碍，即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谈到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作者首先提到了阶级分析法，但他指出“阶级分析方法决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实事求是，把历史人物放在他所处的时代中，从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变化出发，去分析他的阶级代表性，而不是简单地以阶级成分去肯定或否定他们”。①安长春通过学习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总结道“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和方法，就包涵着阶级的分析和历史的分析”。②肖宏发认为，要从八个方面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把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去分析；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法，反对唯成分论和简单化；正确对待历史人物的气节和个性品格问题；依据发展的阶段性去评价历史人物的功与过；正确对待历史人物的翻案问题；充分肯定历史人物的科学文化成就；注意处理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的关系，坚持两者相统一的原则；注意处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坚持近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相结合的原则。③陈祖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要处理好五种关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历史人物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关系；历史人物与阶级的关系；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功与过的关系。④

如何才能科学、辩证地运用历史主义原则和阶级观点，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具体意见。如彭明强调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订正一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占有材料，弄清历史事实，是进行历史研究的最基本的条件。弄清历史事实，才能准确判断。要弄清事实，不仅要详细地占有材料，还要对材料进行分析，作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考订工作”。其次，评价历史人物要分析历史人物成长的时代和各种社会条件，“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势时？这是历史的老问题了。我们当然是应该首先肯定前者，其次才谈得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还提出，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处理好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要具体地分析历史人物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不要回避和篡改历史事实；不要被现象所迷惑，而是要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既不要苛求，也不要溢美；评价历史人物要进一步拨乱反正；要顾及全面；编写和讲解人物传

---

① 罗耀九：《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高校社会科学》1990 年第 4 期。

② 安长春：《全面评价历史人物——学习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札记》，《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 4 期。

③ 肖宏发：《全面评价历史人物原则试探》，《广西社会科学》1994 年第 2 期。

④ 陈祖清：《评价历史人物要处理好五种关系》，《荆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2 期。

记要寓论于史，力求形象化。[①]邓鸿光提倡评价历史人物要遵循认识规律，“如何遵循认识规律去评价历史人物，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他提出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这两个因素：“事实性认识，是以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以及这些实践活动对当时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作为认识的对象。这一层认识，主要是对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进行朴素的了解，其结果是认识历史人物面貌。价值性认识，是以历史人物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这些实践活动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所具有的影响，结果是给予历史人物以一定的历史地位。”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②]简桐认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首先是历史人物的社会实践活动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促进还是促退，其次是视其对精神文明的贡献如何，同时评价历史人物“还应注意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所持的态度和所起的作用。所谓关键时刻，是指社会主要矛盾已白热化，历史到了前进与倒退的关头，这种历史人物称为关键性人物”。[③]史苏苑《关于历史人物评价五题》，提出历史人物评价要注意五个问题，即人物特性和历史外貌问题，政治表现和学术成就问题，生前成就和身后影响问题，民族英雄的斗争活动和思想感情问题，哲学观点和政治态度的关系问题。[④]此外，史平太认为，评价历史人物时要重视野史的价值，“作为史学或志书工作者，为研究历史事件并力求展现历史原貌和全面了解与评价历史人物，在深入实际收集资料进行考证时，翻阅正史和官方保存的文字记载，也有必要发掘阅读一些‘野史’，这对于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是不无裨益的”。[⑤]

崇实《浅谈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提到关于帝王将相、民族英雄、农民起义领袖三个类型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评价帝王将相，“应主要着眼于他们统治时期采取的政策措施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统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其他方面则不必苛求”。“评价那些有作为的帝王将相时，应该功、过分明”。关于民族英雄，作者认为评价起来较为复杂，国内民族斗争中的某些人物可不可以称民族英雄，作者的答案是肯定的。关于农民起义领袖，作者认为：“我们只有对农民和农民起义领袖的革命性和历史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称赞，才能充分显

---

① 彭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历史教学》1980 年第 6 期。
② 邓鸿光：《评价历史人物要遵循认识规律》，《华中师范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 年第 4 期。
③ 简桐：《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理论问题》，《史学月刊》1987 年第 3 期。
④ 史苏苑：《关于历史人物评价五题》，《史学月刊》1982 年第 5 期。
⑤ 史平太：《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评价历史人物》，《郑州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 年第 2 期。

示出历史的主流。”[①]田昌五认为:“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就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在阶级社会中,历史人物和他所代表的阶级之间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对与之对立的阶级亦然。因此,要正确评价历史人物,首先就要把握住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②]

第三,对历史人物评价研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总结。吴廷嘉在《历史人物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中明确提出,历史人物的研究“往往集中于政治人物或人物的政治活动,视野和课题比较狭窄,研究手段也相对陈旧,同一人物争执也常常会比较激烈,长期相持不下,从而影响了人物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开拓”。他认为:“历史人物研究线索和角度的单一化和线性化,给研究的科学性带来了混乱和困难,也给人物研究屈从政治形势和宣传的某些暂时性需要留下了空子,而这种研究结果很难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些主要表现在人物研究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上。同时“研究历史人物个体和群体关系,也是实现人物研究角度多维与交叉的重要突破口”,他指出“离开群体研究个体,使个体研究缺少广阔的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历史背景,研究就很难正确辨别历史人物的活动领域,也很难深入把握其社会作用,研究角度也就势必单一化、线性化”。[③]简桐认为,学术界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存在五种问题:把历史人物的阶级性与历史性的分析对立起来;阶级分析简单化;对历史人物只作静态分析,不作动态观察,对他们的历史作用只论功过,而不深究为什么由功到过或由过到功的转变;把历史与现实简单对比;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④]孙文范等也指出,“以成败论英雄,便是史学界评价历史人物中比较明显的错误倾向之一”,因此,“我们评价一个人,不应根据其一时一事的表现,应当考察其一生的全部历史活动来判定功过”。他同时指出,“还有一种倾向,即以主观动机作为评价的依据。这也是一种片面认识”,判断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应依据客观效果。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作者认为:“这个标准既不应该是包罗万象的条条框框,也不应该是无法捉摸的‘政治需要’,这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综合考察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看其对当时社会和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和历史进步起了推动促进作用,还是起了阻碍和破坏作用,前者即予肯定,后者即予否定,如果

① 崇实:《浅谈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延边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 4 期。

② 田昌五:《历史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谈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 年第 1 期。

③ 吴廷嘉:《历史人物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安徽史学》1986 年第 3 期。

④ 简桐:《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理论问题》,《史学月刊》1987 年第 3 期。

两者兼而有之,则分别情况,视其大小,予以恰如其分的判定。"[①]胡一华在《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反对的倾向》中指出,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反对这几种倾向:强迫古人变今人,违背历史主义;苛求古人;把历史当做政治的附庸;大刮翻案风;逆推法,以后期的表现否定前面的贡献;阶级分析简单化,唯阶级成分论;模式化;形而上学概念化。他最后总结道:"要想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求真求实为己任,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运用科学的方法,持严谨审慎的态度,是可以做好评价历史人物工作的。"[②]他还就以往的评价历史人物中流行的传统模式"阶级论"和"方面论"提出了看法,认为它们的最大缺陷是"不能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还其原本面目"。在评价历史人物时,采取两者结合的"综合论"方法,就可以弥补其不足,"以达到真实地评价历史人物,还原其本相的目的"。[③]杨天保认为:"传统评价方式不能完整表达新的史学功能、不能拓展新的研究空间、时常产生不真实的结论。"他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认为是评价标准的不稳定性易引起多元化的结论,史料总体上的绝对无限性和相对有限性,使得评价永远是一个近似值,坏的学风和社会风气损害了评价的科学性。[④]

周伟文将学术界关于历史人物评价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作了概述,即"阶段论"、"方面论"、"历史条件决定论"、"综合论"等。他认为应注意两点:一是要有"一字千金"实事求是的态度;二是要防止脸谱化,防止宣传天才论、宿命论,切忌简单化。[⑤]瞿林东认为,出现对同一个历史人物不同评价的原因在于评价者见识上的高下、资料上的多寡、判断的当否、爱憎标准的不同。从方法上强调要"知人论世",论定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善恶是非,一是要察其言而观其行,二是看其是促进还是阻碍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⑥]江连山对历史人物评价原则进行总结,认为有历史主义原则、阶级分析原则、动态(或发展)原则、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原则、动机效果统一论原则。具体操作上主要考察历史人物的社会实践活动,从历史人物所处环境考察其社会实践的动因、状况、结果。[⑦]他同时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苛求古

---

① 孙文范、李治亭:《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人物评价》,《史学月刊》1982年第1期。

② 胡一华:《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反对的倾向》,《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3期。

③ 胡一华:《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是"阶级论"和"方面论"的结合——评价历史人物方法之二》,《丽水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

④ 杨天保:《评价历史人物的研究方式不宜拔高》,《玉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4期。

⑤ 周伟文:《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述略》,《九江师专学报》1987年第3期。

⑥ 瞿林东:《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⑦ 江连山:《杂议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绥化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

人，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和观点评价古人，“不仅要考察和要求历史活动家比其前辈提供新东西，也应考察和适当要求但不是苛求其必须提供后代乃至现代要求的东西”。[①]林璧属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存在两个难题，“其一是如何保证研究者准确地评价历史人物？其二是在具体的历史人物评价中，如何从方法上解决历史人物评价分歧”。他认为解决方法是，“坚持实事求是、‘真’的标准，应该评价所引导的行为是合乎人类发展性和社会进步性的”。[②]胡戟总结了评价历史人物中存在的传统标准，即正统论、忠奸论、统分论、成王败寇论、道德论、气节论和今年流行的阶级论、生产力论、规律论、动机效果论、正义非正义论、当时当地大多数人意志论等。他认为：“不同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历史观，衡量历史和作为历史评价的标准是不相同的。我们不能指望在这个问题上找到最终的一成不变的结论，只能用相对比较进步的历史观来指导当前历史研究的实践。”[③]

第四，新的评价方法、标准不断被提出，历史人物评价走向多元化。1986 年，吴廷嘉提出，在研究历史人物时，评价标准的科学化是一个关键，“为了如实地反映历史人物活动及其作用的多重性、多向性与不平衡性，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也应实现在多元化基础上的统一”，“历史作用评价标准也是一个多元与统一的问题”。他指出：“不能缩小甚至抹杀道德评价的意义，道德评价是人物评价的组成内容之一，也是人物总体评价中不可缺少的要素。”[④]道德评价往往也牵扯到气节观的问题，罗耀九认为，气节观和爱国主义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项标准，“我们不应该因为李秀成的失节而否定他一生的功绩，但也不能因为李秀成是英雄人物而原谅他的失节行为”。[⑤]钟文典认为，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要讲气节，但不唯气节论。“对待历史人物如果只讲气节，不及其余，不是从他们的一生一世进行全面的考察，不问他曾经为国家和人民做过多少好事，只抓住某点有失气节，就不加分析地全予否定。这样做，极易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既无法说清历史，也难免厚诬古人，这样也不易得到人们的赞同”。“对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评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绝不能因为李秀成在‘供词’中有失节的表现，就把他定为‘叛徒’，否定他在太平天国历史上所

① 江连山：《关于评价历史人物功绩问题刍议》，《史学理论研究》1998 年第 1 期。
② 林璧属：《历史人物评价两难题》，《史学理论研究》1999 年第 2 期。
③ 胡戟：《论历史评价的环境标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4 期。
④ 吴廷嘉：《历史人物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安徽史学》1986 年第 3 期。
⑤ 罗耀九：《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高校社会科学》1990 年第 4 期。

建树的功绩”。[1]苏双碧指出，用气节观评价历史人物要特别慎重，“气节标准要结合其他标准一起考察，气节和事业的正义性是紧密相联的”。[2]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研究历史人物，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新研究、评价方法。吴廷嘉在研究方法上，提到了心理分析法、历史人物的个性研究和历史比较法，此外还有“从遗传科学角度，展开人物家族史研究；运用社会学专题统计分析和抽样调查方法，对人物群体进行深入分析”等。[3]吴达德也认为，过去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过分强调政治因素和阶级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没有把历史人物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来研究，忽视了人的心理活动和心理因素对其行为的影响”。心理研究法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矛盾，“在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问题上，革命导师们从来没有说过阶级分析方法是唯一的方法，从来没有否定过其他科学方法的作用，特别是从来没有否定在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中正确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心理分析法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是“可以深化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可以丰富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可以更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4]简桐提出了通过学科交叉的方式研究历史人物的观点，“挖掘历史人物的个性，就不能不对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作剖析。因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在这里也是有用武之地的。……遗传学的方法也可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低层次的方法，……人才学的方法对评价历史人物也有相当的帮助”。[5]

有的学者提出了用环境标准评价历史人物，以胡戟为代表。他的《论历史评价的环境标准》一文提出，以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优化和恶化，作为评价历史时代或历史人物的标准。“环境是指社会的人文环境和生活的物质环境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自然的生态环境。这环境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品质，好和变好就给这段历史以肯定，坏和变坏就否定”。“环境标准是从最主要的社会实践效果来作检验的标准，是一个非常实在的关乎每个人生活品质的标准，用于评价历史时容不得半点虚假”。[6]

有些学者从史学史的角度总结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史苏苑《略论我国历史

---

① 钟文典：《历史人物研究与气节问题》，《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
② 苏双碧：《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③ 吴廷嘉：《历史人物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安徽史学》1986年第3期。
④ 吴达德：《历史人物研究与心理分析》，《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
⑤ 简桐：《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理论问题》，《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
⑥ 胡戟：《论历史评价的环境标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人物评价问题之发展》追溯了中国古代到近代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他认为："封建时代的历史学家，虽然在论述宇宙观和一些自然现象时，也曾有过不少精辟的唯物主义语言，但一当涉及到历史领域，特别论述到历史人物和事件时，就总是都成了历史唯心主义者了。"而在近代，梁启超主张探讨历史的"公理公例"，"这标志着他已触及到了历史规律性的边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比封建阶级史学家明显进步的地方。但他毕竟未能成为唯物主义史学家"。"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使中国的史学界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从此开始了以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评价历史人物的新页"。最后他总结道："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评价历史人物中的共同特点是：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肯定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伟大功绩；具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无产阶级的民族观看待民族间的矛盾和战争；主张男女的真正平等；努力通过复杂的现象以认识历史人物的本质，并从而以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①田文红从史学史的角度，谈了《三国志》中对人物的评价问题。他认为《三国志》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直接关系到《三国志》一书的价值及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其评价标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陈寿对历史人物及其事迹进行直接评价，另一类是比较间接，借他人之口进行评价。②汤勤福试论了朱熹的历史人物评价法，认为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特点是采用了双重标准，一是义理标准，二是功业标准。前者是朱熹评价历史人物的出发点和归结点。③梁满仓回顾了郭沫若替曹操翻案所引发的历史人物评价理论的讨论，认为这促进了史学界普遍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引起了学术界的百家争鸣，推动了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④何汝泉略论了郭沫若的历史人物评价标准，认为郭沫若是"我国史学史上首先提出历史人物科学评价标准的史学家，他把这个标准归结为'人民本位'"。关于这个标准，作者认为是科学的，"不仅在学术上有开创的价值，而且在政治上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郭沫若具体评价的一些历史人物可以讨论，这不影响评价标准自身的科学性。⑤邓鸿光从毛泽东对鲁迅、孙中山和白求恩的评价中得到了启示，一是考察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对于他所处的具体的

---

① 史苏苑：《略论我国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之发展》，《史学月刊》1986 年第 6 期。

② 田文红：《〈三国志〉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2 期。

③ 汤勤福：《试论朱熹的历史人物评价法》，《上饶师专学报》1998 年第 5 期。

④ 梁满仓：《郭沫若替曹操翻案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研究的推动作用》，《郭沫若研究》（第 10 辑）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6 页。

⑤ 何汝泉：《略论郭沫若的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史学理论研究》1994 年第 3 期。

历史阶段、具体的历史环境所具有的意义；二是考察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对于人民的利益所具有的意义；三是考察历史人物的道德风貌所具有的普遍教育意义。[①]

第五，对中国近现代史人物、中共党史人物、反面人物的评价，提出了一些新看法。关于中国近现代史人物的评价，孔祥吉认为，应该"破除尊卑之界，运用比较之法，多层次、多角度对历史人物进行剖析，不可忽略史料的发掘"。[②]丁守和认为，在近代史人物研究中存在这些问题：研究比较一般化，"有些人物研究或传记，实际上主要是讲了一个过程，……看不出他一生经历中的起伏波浪、曲折复杂，也看不出其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性格的具体表现"。研究片面性，"研究革命先驱者的思想，不分析当时的复杂情况和他们所受多种思想的影响，是片面的"。某些评价过于拔高，"在某些人物研究或人物传记中，看来似有拔高的现象，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在李大钊、萧楚女、孙中山、朱执信、邓演达、杨度等人物的评价上或多或少出现这种情况"。[③]王纪河认为，从大的方面来讲，评价中国近代历史人物"应该依据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发展变化的情况，分析、研究、总结其在各个历史时期、历史阶段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从小的方面看，评价历史人物应考察其变化，分期、分阶段地评说，这叫做阶段论的评估法。他最后总结道："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其本来之是，非其本来之非，功是功，过是过，既不因功掩过，也不因过抹杀其功，功过相比，权衡再三，然后得出一个符合个人实际情况的总的历史结论。这样评价历史人物，比较公允、合理、妥贴。"[④]徐梁伯指出，如何评价民国时期历史人物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他认为不应简单地以政治意识形态划线，并作为评价民国人物的唯一标准，而是应该与评价古代和近代人物一样，根据其是否有益于全民族国家人民的最高利益，是否有利于当时社会的发展、进步，以及服务于这一目标的个人社会实践的道德品质作综合考察。他以林森为个案，认为林森前半生追随孙中山反清、革命、建国、护法，是革命爱国的前半生，对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他的后半生虽然坚持反共立场，但出于爱国的赤诚，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训政建国，主张抗日，并未因个人的实践给全民族国家人民的最高利益造成重大的损害。因此，

---

① 邓鸿光：《关于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标准的思考》，《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

② 孔祥吉：《谈近代史研究中人物评价问题》，《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7年第1期。

③ 丁守和：《关于近代史人物研究和评价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

④ 王纪河：《浅谈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他的后半生未必是反动的后半生。[①]马勇总结了 50 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针对近十年来日本“侵略有理”论以及“汉奸有理”论对中国学术界的渗透和影响，汪精卫、陈璧君、周作人、胡兰成等汉奸被美化，他认为这些问题的发生背景复杂，一个最值得注意的迹象是“这些历史人物的亲属及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所在地政府或团体的介入，使历史人物研究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许多本来并不难解决的问题成为旷日持久的争论难点，许多本不该翻案的问题也重新翻案，使问题越来越复杂”。他进而指出：“科学研究毕竟是一种科学，如果历史学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事实，就只能沦为一种‘史学广告’，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那确实是学术的堕落。”[②]

在中共党史人物评价方面，赵崇田认为评价党史人物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正确评价党史人物的关键。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就是严格忠于历史事实，具体分析历史事实，提出切实的见解，得出科学的结论。对反面人物，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去评价”。提出了评价党史人物要把握三个基本环节，“评价党史人物必须紧紧把握时代、阶级和个人主观条件三个基本环节”。坚持两个基本原则，就是历史主义态度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最后，认为评价党史人物要有明确的目的，要通过对党史人物的评价，认清历史发展的规律，引导人们向前看，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总结历史经验。[③]柳之对党史人物的评价进行了反思，认为存在三点问题：对党史人物的评价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研究方法简单，不注意横向研究。[④]

对反面人物的评价方面，虽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史学界对反面历史人物的评价较之过去客观得多了，但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赵荣达通过探讨孔祥熙的出身，发现在评价反面历史人物的问题上，存在着简单化和公式化的现象。他分析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首先是我国史学界存在着一种“左”的血统论的观点，需要认真扫除；其次是史学界一些人对反面人物的思想演变过程缺乏分阶段的细致研究和求实的分析，而是采用一种近乎文艺写作的手法来任意丑化，这也不是评论历史人物的科学态度；再次，对反面历史人物的德、能、才、学往往不能分别加以评

---

① 徐梁伯：《民国时期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刍议——以林森为个案》，《江苏社会科学》2000 年第 6 期。

② 马勇：《50 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

③ 赵崇田：《关于党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天津商学院学报》1988 年第 3 期。

④ 柳之：《党史人物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河北学刊》1988 年第 6 期。

论，偏重以德定论，否认能、才、学，这是不客观的；最后，是对待有关反面人物的史料应抱有分析的态度，应弄清史料的来源、背景，史料提供人和史料所供人物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是第一手的、当事人提供的史料，就完全可信。[①]夏宏根在《略论反面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在评价反面历史人物时首先存在以偏概全、不加分析地把反面人物说得一无是处的问题，他提到蒋介石、林彪等人的例子，认为："历史本来就是复杂多样的，因此历史人物也往往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在各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往往表现出各个互相矛盾的现象。……应当看到，反面人物也有一个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其次是夸大错误，把原来属于一般认识上的错误说成是罪恶，"之所以夸大错误，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说坏人坏，总不会有错。似乎把反面人物说得丑恶一点是没关系的"。再次是牵强附会，把与反面历史人物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硬挂到他们头上。复次，回避历史，将反面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抹去不提，"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与为反面人物涂脂抹粉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如果曲笔讳言，避而不谈，不仅有悖于史家'直笔'原则，不能对他们作出合情合理的评价，而且使人无法看清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最后，简单对号，反面历史人物脸谱化、公式化，这主要表现在"血统论、无能论、生活糜烂"等方面。[②]罗耀九也认为评价历史人物要防止受感情支配，提到了反面人物"并非是一个脸谱，在分析具体人物时不能一概而论"。[③]

（二）具体历史人物评价的研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中，对具体历史人物的研究很多，以下择其与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方法关系较密切的，略作叙述，其详可参见方敏等《中国历史人物研究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1. 关于孔子的评价

孔子是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关于孔子的讨论主要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50—60年代前半期，嵇文甫等学者发表文章评论孔子及其思想的阶级属性，肯定了孔子在历史上的作用，掀起了研究和讨论孔子的第一个高潮；第二个时期是"文革"十年，大搞"批林批孔"，对孔子及其学说全盘否定，文章基本没有学术价值可言；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

---

① 赵荣达：《关于孔祥熙的出身——兼论反面历史人物评价中的一些问题》，《晋阳学刊》1981年第6期。
② 夏宏根：《略论反面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求实》1986年第3期。
③ 罗耀九：《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高校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放以来,学术界重新客观地评价孔子及其影响,全国各地建立起了一批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对孔子的研究和讨论进入了一个新高潮。以下概述之。

50 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嵇文甫《关于孔子的历史评价问题》(历史教学 1953 年第 8 期),他认为:"孔子代表着封建贵族,他是个贵族思想家和贵族教育家,这大概没有问题了。但是能不能因此就判定他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起过一些进步作用,没有一点贡献呢? 我想不能这样说。"孔子所提倡的"仁"是一种人文思想表现,"孔子正是集中了这种人文主义思想而成为其最伟大的代表。这种人文主义的精神,不仅形成孔子及其门徒们绝妙的丧祭理论,并且贯彻到他们的整个道德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不离人而言天,不离行而言知——在后来中国思想史上发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形成一种特殊的思想传统"。①

60 年代,刘桂东等《论孔子》肯定了孔子的功绩,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大教育家,同时又是一位大思想家,在政治、教育和学术文化等方面,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孔子思想的保守部分是孑遗而不是主流。孔子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建立的繁富的学说和他积累的丰富的教和学的经验,是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善于批判利用,是会有"温故而知新"和"化腐朽为神奇"之作用的。②任继愈认为,"目前学术界基本上有两派对立的意见:认为孔子是春秋时期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孔子的思想中进步的方面是主要的,这一派姑且称为甲方;认为孔子是春秋时期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子的思想中保守方面是主要的,这一派姑且称作乙方。我是属于乙方的"。"如果对孔子这个历史人物进行全面评价,他的贡献大于他的缺点;单就哲学这一个方面看,他的缺点多于他的贡献"。③严北溟认为,评价孔子是复杂的,这主要体现在关于"孔子的阶级立场究竟是什么?"他认为,孔子"维护周礼,反对法治,他的毕生努力在于挽救奴隶主贵族的没落政权",因此,从孔子在当时具体阶级斗争中所表现的政治态度看来"无法否认他是站在奴隶主贵族的保守立场","却也必须承认他的思想客观上适应了奴隶制崩溃的趋势,反映了某些时代进步的要求"。此外应该怎样全面评价孔子学说的历史作用和影响,他认为:"必须把孔子本人和后人对孔子的涂抹、歪曲、利用区别开来,还给孔子以本来面目,而不

---

① 嵇文甫:《关于孔子的历史评价问题》,《历史教学》1953 年第 8 期。

② 刘桂东等:《论孔子》,《江苏师院学报》1962 年第 5 期。

③ 任继愈:《孔子——奴隶社会的保守派、封建社会的"圣人"》,《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2 年第 4 期。

能把一切都写在这位‘圣人’账上。”①周予同认为，讨论孔子问题，“首先要注意史料问题；这就是说，首先要区别哪些史料可信、可用，哪些史料不可信、不可用。第二，讨论孔子，要同‘儒’、‘儒家’和‘儒教’区分清楚。第三，孔子思想，或者扩大些说，儒家和儒教的思想，以及由这些所形成的文化，对于亚洲以及其他地区所发生的影响，在今天，应该加以注意，汇集资料，写出论文或专著，决不能再加忽略了”。最后，他认为要加强研究孔子的基本功“文字的透彻会通是研究的第一关”。②

“文革”期间与孔子相关的文章发表甚多，但都是全盘否定孔子及其学说，不再详论。

“文革”结束，尤其是80年代后，孔子的研究和评价成为传统文化研究中的重中之重，有关孔子的研究领域日趋扩大。关于孔子的历史地位及其思想的评价，张岱年、罗祖基、严北溟等学者持肯定态度。③另有一些学者主张“不宜抬高孔子”，如蔡尚思认为，孔子的思想是“好古”、“学周礼”、“从周”的，这也就是说，他是开倒车而不是向前进的，是主张根本性问题不能变革而枝叶性问题可以变革的。④金景芳认为，“孔子的政治态度是消极的，被动的”，“决不想起来革命，推翻旧政权，改建新政权”。“孔子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以至于超越中国历史的界限，受到长期的尊重，首先在于他是伟大的教育家，而不在于他的政治思想”。⑤关于孔子的核心思想“仁”及其“仁学”的研讨，李泽厚认为：“孔子思想的范畴是‘仁’而非‘礼’。后者是因循，前者是创造。”⑥匡亚明认为：“仁的思想，就是孔子的哲学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孔子的政治思想、道德思想、教育思想、文献整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前提。”⑦刘蔚华探讨了孔学与仁学、仁学的性质及其流变等问题，他认为，孔子不是发明仁学的第一人，却是完成仁学系统化的思想家，其贡献在于解决了“仁”与“礼”的相互关系，形成了仁学的规范体系，提出了一套“成仁”的修养方法，对后世产生

---

① 严北溟：《怎样评价孔子》，《学术月刊》1962年第7期。

② 周予同：《有关讨论孔子的几点意见》，《学术月刊》1962年第7期。

③ 张岱年：《孔子与中国文化》，《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罗祖基：《在孔子研究方法论上与刘蔚华同志的分歧》，《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严北溟：《谈孔子研究的宏观与微观》，《孔子研究》1986年第2期。

④ 蔡尚思：《不宜抬高孔子——评匡亚明的〈孔子评传〉》，《书林》1986年第1期。

⑤ 金景芳：《孔子思想述略》，《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

⑥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

⑦ 匡亚明：《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91页。

了深远的影响。①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由孔子本身转移到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②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尤其是与现代化关系为学者所关注。③与此相适应的是，现代新儒学研究也成为一个学术热点。④孔子研究不断拓展新领域，⑤大大向前发展。

2. 对秦始皇评价的研讨

自古以来，史家对秦始皇的评价褒贬不一，批评者以贾谊及其《过秦论》为显，指出始皇焚书坑儒、滥用民力，致秦朝“二世而亡”，赞美者如明代学者李贽，称其为“千古一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 50 年代翻案风的影响，史学界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展开了讨论。夏蕉卿认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是对文化的摧残，从当时来看是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无论焚书也好，坑儒也好，无疑都是一种手段。它的目的，是要达到禁止‘以古非今’，巩固中央集权制”，是进步与反动的斗争。他反驳了这一事件“扼杀当时‘百家争鸣’的璀璨文化发展局势，摧残古籍”的意见，认为这种观点过分扩大了“暴力”的作用，把“暴力”看成可以决定一切的东西；片面地扩大了历史的事实，不符合历史的真相。⑥罗焕泰以一分为二的方式评价了秦始皇，认为：“公正地说来，秦始皇他确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秦始皇对于当时的历史是有贡献的，不仅有而且大；对于整个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

① 刘蔚华：《论仁学的源流》，《齐鲁学刊》1982 年第 1、2 期。

② 颜炳罡：《五十年来孔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3 期。

③ 如杨玉珍：《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文化动因》，《东岳论丛》1995 年第 1 期；王锐生：《儒家思想与东亚的现代化》，《中国哲学史》1996 年第 4 期；杜志华：《价值——制度互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分析的新视角》，《新视野》1997 年第 1 期；叶国洪：《儒家思想与中华现代化：西方文化冲击儒家思想的历史个案的回顾》，《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2 期；姚传德：《儒家思想的现代性》，《新东方》1999 年第 3 期；王赞源：《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经营》，《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1 期，等等。

④ 如方松华：《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社会科学》1996 年第 5 期；余秉颐：《评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价值观》，《哲学研究》1997 年第 5 期；叶赋桂：《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特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1 期；李翔海：《论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教学与研究》1998 年第 9 期；郑家栋：《“魂不附体”与当代儒学的定位》，《求是学刊》2001 年第 2 期；蒋国保：《现代新儒家的理想、困境与迷失》，《江海学刊》2001 年第 2 期；李维武：《全球化与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学术月刊》2001 年第 9 期，等等。

⑤ 如欧阳矩明：《孔子执政思想刍议》，《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6 期；李国榕等：《孔子的社会心理思想探析》，《东岳论丛》1987 年第 3 期；张广汇：《孔子社会稳定思想探析》，《北方论丛》1997 年第 5 期；赵靖：《谈孔子的管理艺术》，《孔子研究》1998 年第 4 期；王恩来：《孔子人才思想通论》，《孔子研究》1998 年第 1 期；温韧等：《孔子人口观初探》，《孔子研究》1999 年第 3 期，等等。

⑥ 夏蕉卿：《对秦始皇的评价》，《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59 年第 3 期。

不仅有而且大，这是我们必须肯定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即从秦始皇所施行的各项政策给予人们带来的灾害来说，它过分地役使人民，他是一个‘暴君’。但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必须要‘具体分析，全面照顾，重点掌握’，不应当就这样否定他在如上所说的对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对民族和文化发展的贡献，只有这样，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人物所采取的正确态度。”关于焚书坑儒这一事件，他认为："这是使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二千多年来蒙受不好的评价的最大原因。”他肯定了焚书“为了统一思想，为了巩固专制主义的集权统治，……焚书是手段，禁止以古非今的反动思想言论才是目的，手段是粗暴了些，但它却是有进步意义的，这是必须肯定的，而且是主要的。同时，秦始皇也并没有把所有的诗、书、百家语全部烧掉，中央博士官府仍藏有这些书，而当时民间也有暗中保藏古书的，否则，在今天秦以外的古书我们将一无所见”。[1]史苏苑就秦始皇的翻案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将秦始皇一生的主要事业归纳为七大类。认为千百年来，(史家)就是既歌颂了秦始皇的“雄才伟绩”，又谴责了秦始皇的贪婪残暴。事情既然早已如此，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和根据来勉强为他翻案呢？充其量说，只是予以新的更全面、更恰当的评价而已。[2]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四人帮”鼓吹“批林批孔”、崇尚法家，史学界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其历史地位和作用被特意抬高，并与现实联系起来。1973 年，白寿彝《论秦始皇》："长期以来，孔门的信徒们，反对以致仇恨秦始皇的革新，散布一些关于秦始皇的错误论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的反动立场和反动的思想体系决定了他们对新生事物的仇恨。他们也仇恨秦始皇，并妄图利用陈旧的错误观点的习惯势力的影响，来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同样，苏修也借秦始皇大做文章，同林彪一伙互相唱和。”他还提到了评价秦始皇的目的，就是“有助于揭露、批判这些叛徒们反动论点的极右实质。这是一场理论战线上的斗争，也是一场政治战线上的斗争”。[3]施丁《秦始皇——厚今薄古的专家》也指出："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起了促进统一和促进封建制发展的进步作用，是我国古代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关于焚书坑儒，他认为："这是秦始皇打击‘以古非

---

① 罗焕泰：《试论秦始皇——秦始皇功大于过，“暴君”的称号应该翻案》，《史学月刊》1960 年第 3 期。
② 史苏苑：《谈谈关于秦始皇的评价和翻案问题》，《郑州大学学报》1964 年第 2 期。
③ 白寿彝：《论秦始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73 年第 1 期。

今'、尊儒反法的反动派，破坏他们篡权复辟的阴谋活动，坚决'厚今薄古'，崇法反儒，巩固统一和加强封建制中央集权的进步措施，是坚决反对复古路线、继续推行革新路线的突出表现。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取得了路线斗争的新胜利，就严重地打击了妄想篡权复辟的反动势力，使得各项厚今薄古的政策措施，能在全国顺利地继续推行。"①

"文革"结束后，全国掀起了纠正"文革"时期错误思想的热潮，对秦始皇的历史评价也趋向理性。金立人在《评秦始皇》一文中，纠正了"文革"时期"四人帮"把秦始皇抬到吓人的高度，只准讲其"盛"，不可言其"衰"的话语导向。他认为："秦始皇是残暴地压迫、剥削农民阶级的地主阶级总代表，这是第一位的；同时又有一定的历史功绩，是厚今薄古的专家(毛泽东曾说过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这是第二位的。他既在好些方面阻塞了社会的前进，甚至倒退；同时，他又为社会的进步创设了条件。"②

3. 关于项羽的评价

对项羽的评价最早由杨翼骧提出，1954年他在《历史教学》上，发了《为什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一文，提出"关于项羽是否为农民起义领袖的问题，有些同志认为有研究一下的必要"。怀疑者主要基于"项羽出身于旧楚国贵族；曾坑杀秦降卒二十万；秦朝灭亡后，项羽分封了十八王"。杨翼骧认为"项羽是秦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这是因为项羽响应了农民起义，积极参加了农民革命战争并击破了秦朝的主力军，"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过程中，项羽是始终代表着农民阶级的利益，领导着农民军进行坚决英勇的反秦斗争，而且起了主要的作用的。我们可以肯定的说：项羽是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虽然项羽在推翻秦朝的统治后，走向反动的道路上去了，完全违背广大人民的利益了，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批判一个历史人物，评定他的进步作用或反动作用，是要依据他所活动的历史阶段分别予以正确的评价的"。③张传玺支持杨翼骧的意见，认为项羽是秦末农民起义的主要力量。项羽的阶级立场，认为他自始至终都代表旧贵族的利益，一直站在旧贵族的立场上。从起义动机和政治主张来看，符合旧贵族的利益。就其历史作用而言，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就是以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推动或者阻碍了社会发展，推进

---

① 施丁：《秦始皇——厚今薄古的专家》，《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3年第4期。

② 金立人：《评秦始皇》，《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

③ 杨翼骧：《为什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历史教学》1954年第5期。

或者破坏了社会生产，有利于或者有害于人民为标准。项羽在秦亡前是农民军的主力，振奋士气。秦亡后，起到了反动作用，体现在分割天下及由此产生的楚汉争霸给人民带来的危害。"这样的政治主张(分封)已不适合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了。刘邦与项羽的争斗，不能单纯看作是两个野心家的斗争，实际上体现了两个不同阶级力量的对抗，项羽代表着没落的旧贵族势力，而刘邦则代表着新型的地主阶级，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农民的利益，在政治上反映了统一的要求"。并认为："当时如果没有复辟之举，统一的帝国会很迅速的建立的；即使有复辟之举而无像项羽这样'才气过人'、英勇善战的旧贵族，帝国的统一也是很快的。那么，人民的苦难是会减少的很多的，生产也能较早地得到恢复发展。所谓项羽的反动，就是从这里看到的。"从刘邦和项羽二者的比较来看，项羽失败原因：一为刘邦的政治思想比项羽进步，就是分封与统一的做法；二为项羽与旧贵族之间存在的矛盾；三为个人作风上的原因。①

"文革"时期，受影射史学的影响，农民起义领袖的评价问题被纳入到所谓"儒法斗争"的轨道，项羽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歪曲。"文革"结束后，对其认识才有所转变。郑达炘认为，项羽的农民起义领袖地位应予以肯定，"项羽诛宋义、救钜鹿，力挽狂澜，在反秦斗争中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为诸侯将乃至刘邦所不能比拟，这就使项羽自然而然地成为继陈胜、吴广之后的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楚汉之争'既然不属于农民战争的范畴，也就不能以此来否定项羽前期曾经是个农民起义的领袖。至于坑降卒、屠咸阳的失策，只能说明项羽作为农民起义的领袖有较大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同样不能作为否定其农民起义领袖历史地位的依据"。②熊铁基认为，项羽是坚持反秦斗争的农民起义领袖，"他的步调和起义农民的步调始终一致，表现了和秦政权势不两立的斗争坚定性和彻底性，正因为如此，他才被农民群众承认为自己的领袖，并获得农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从他们中吸取了无穷的力量；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对农民战争作出重大的贡献，取得反秦斗争的伟大胜利"。但他同时认为，项羽是"封建统治权争夺战中不得人心的失败者"。其失败的原因不在分封，而在不得人心，"他军队成分中的消极因素和他个人性格中的消极因素，都随着抗秦斗争的胜利和战争性质的转变而

① 张传玺：《项羽论评》，《文史哲》1954年第10期。

② 郑达炘：《项羽的农民起义领袖地位应予肯定》，《福建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大为暴露”。①

4. 对曹操评价的研讨

在南宋以来的戏剧、小说中，曹操一直以“奸臣”的形象出现，人们对这一印象根深蒂固。1956 年，万绳楠发表了《关于曹操在历史上的地位问题》一文，从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探讨曹操在历史上的地位问题。他指出，曹操“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比他所起的破坏作用要大”。在文学上，曹操的诗是“建安风力的代表。他的诗几乎都是乐府诗，他可说是一个最初打破汉代地主文学作风，使诗歌乐府化成歌谣化，以求表达真正的思想感情的人，是一个魏晋以来最初大力赋予诗歌以灵魂的人”。②1959 年 1 月，郭沫若陆续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替曹操翻案》和《中国农民运动起义的历史发展——序〈蔡文姬〉》等论文，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等方面充分肯定了曹操的历史贡献。自此，关于曹操的评价问题逐渐在全国史学界和文学界引起了热烈讨论。郭沫若指出：“把曹操当坏人，当成一个粉面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③针对史学界一些学者把曹操曾镇压过黄巾农民起义作为否定曹操的一个重要依据，郭沫若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全面地看，“打黄巾军固然是曹操一生中最不光彩的一页，但曹操打败黄巾军以后，又将参加黄巾起义的农民精锐者组成了他的武力基础青州军，使之免掉了瓦解流离之患”。在这个基础上，曹操实行的屯田政策，“把流民编置在荒地上进行生产，既可解决流民问题，又可恢复开发生产”，因此，“曹操虽然打了黄巾，但并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对于民族问题的处理，郭沫若认为，曹操平定乌桓“是反侵略的战争，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获得了空前的胜利，消泯边患，救回了被奴役的汉民”，“他把三郡乌桓平定了，而乌桓的其他部落的侯王大人们却对他心悦诚服，服从他的指挥”。④由此可见，“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应该是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⑤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史学界一片“打破王朝体系”的呼声中，郭沫若敢于出来为曹操翻案，显示了其历史主义的史学素养。翦伯赞也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光明日报》1959 年 2 月 19 日)，认为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

① 熊铁基：《评项羽的功过是非》，《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 年第 4 期。

② 万绳楠：《关于曹操在历史上的地位问题》，《新史学通讯》1956 年第 6 期。

③ 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光明日报》1959 年 1 月 25 日。

④ 郭沫若：《替曹操翻案》，《人民日报》1959 年 3 月 23 日。

⑤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 8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06 页。

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像这样一个中国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却长期被当作奸臣，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替曹操恢复名誉”。[①]随后，国内出现了围绕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研讨热潮。

吴泽指出“曹操虽出身于宦官家庭，但却走着反宦官的政治道路”。而官渡之战打垮了袁绍世族地主军阀割据势力，“对人民是有利的，对河北一带社会经济发展起有积极推动作用”。[②]李旭从阶级观点出发，肯定了曹操历史上的功绩，广兴屯田恢复生产、打击豪强促进统一、保卫民族巩固国防、解放思想发扬文化。[③]杨国宜认为曹操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我们从政治、军事、文学三个方面考查了曹操的活动，他都是反正统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与要求。因此，我们说曹操在历史上起了好的进步的作用，是一个应该肯定的人物”。[④]杨荣国、李锦全从东汉末期豪强大族与人民的矛盾激化入手，评价曹操对豪强的打击和限制是其活动的主要方面，肯定了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⑤]邹贤俊对曹操所处的历史环境作了简要的叙述，认为当时的社会矛盾，是被剥削被压迫的、身份正日益降低的农民阶级与主要由豪强大族、官僚、封建军阀等所组成的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舞台上，曹操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是值得肯定的。[⑥]左行培、姚公骞认为，曹操在历史上是一个被歪曲了的人物。“他在舞台上被歪曲得更厉害，得到了粉面角色的遭遇。这是不公道的。曹操一生做了不少的坏事，对人民犯了罪过，这些坏事，应当否定，应受斥责，但是这不是曹操主流的一面。曹操也做了许多有利于历史发展、生产发展的好事，从总的方面来看，曹操的评价，应当予以肯定。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曹操的一个应有的看法”。[⑦]

虽然史学界普遍肯定了曹操在历史上的作用，但也对其镇压农民起义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吴泽认为，曹操是“地主阶级中剿压农民起义的能手，是不容掩饰的巨大

---

① 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光明日报》1959年2月19日。
② 吴泽：《关于曹操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5期。
③ 李旭：《曹操是怎样的一个历史人物》，《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2期。
④ 杨国宜：《论曹操在历史上的作用》，《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2期。
⑤ 杨荣国、李锦全：《从曹操的时代看曹操》，《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3期。
⑥ 邹贤俊：《应当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曹操》，《华中师范学院学报（历史版）》1959年第3期。
⑦ 左行培、姚公骞：《论曹操在历史上的作用》，《科学与教学》1959年第3期。

罪过”。[①]杨国宜指出“曹操镇压黄巾起义，确是一件不可原宥的罪过。在这一点上，他遭到后人千年万载的咒骂，是罪有应得”。[②]邹贤俊批判了曹操镇压农民起义，“不仅违背了起义军希望推翻旧王朝、重建新王朝的直接斗争目的，而且也是与他们‘要粮食、要土地、要活下去’这一最终的基本要求相对立”。[③]但戴裔煊则认为，地主阶级的曹操与农民有共同性，在肯定曹操与农民之间有矛盾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曹操与农民之间的这些共同之处，认为曹操诱降压迫黄巾军的说法完全缺乏史实根据。[④]

关于曹操是否是民族英雄的问题，也有史学家提出了反对意见。杨柄在《曹操应当被肯定么?》一文中认为，“曹操对三郡乌桓的战争在时间上既不是乌桓侵边之际，在目的上也不是为了反抗异族侵略”，他是为了消灭袁氏残余势力，“具有内战和外战两重性质”。[⑤]柳春藩、苏金源认为：“当时三郡乌桓与西汉初期的匈奴和东汉晚期的鲜卑不同，已经成为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曹操对三郡乌桓的战争不能说是对外族的战争，这个战争是中国内部各统治集团间、有乌桓上层参加的争权夺利的战争。”因此，不能说曹操是反对外族入侵，他“不是‘民族英雄’，袁尚、袁熙也不是‘国贼汉奸’”。[⑥]

由于对曹操的评价日趋热烈，一些史学家开始对评价标准和方法进行反思。唐光祚反对评价中出现的两种倾向，“第一，反对从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出发，否定曹操在历史上的作用；第二，反对对曹操过分推崇，隐恶扬善，甚至把邪恶也说成功绩，硬给曹操脸上抹红粉”。[⑦]吴晗认为，由于研究曹操的“方面多，成就大，缺点也多，从各个不同角度去了解，因此，个人的看法不一致是很自然的”。要研究和讨论曹操，首先要去掉正统观点，“从当时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人民的感受来估价曹操，而不能用今天的时代、今天的标准来估价他”。其次，要一分为二看待曹操在历史上的作为，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⑧]吴泽等认为：“对被歪曲的历史人物给予重新评价，或者说‘翻案’工作，是必要的。……所谓‘翻案’，应该理解为根据历史唯物主

---

① 吴泽：《关于曹操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5期。

② 杨国宜：《论曹操在历史上的作用》，《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2期。

③ 邹贤俊：《应当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曹操》，《华中师范学院学报(历史版)》1959年第3期。

④ 戴裔煊：《应该如何评价曹操》，《理论与实践》1959年第6期。

⑤ 杨柄：《曹操应当被肯定么?》，《新华半月刊》1959年第12期。

⑥ 柳春藩、苏金源：《关于曹操的评价问题》，《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第2期。

⑦ 唐光祚：《如何评价曹操》，《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2期。

⑧ 吴晗：《从曹操问题的讨论谈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教学》1959年第7期。

义理论原则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①

此外，张真依据《世说新语》、《三国志·魏志·武帝记·曹瞒传》，比较历史中的曹操与文学艺术中的曹操。认为曹操作为艺术形象是有其存在价值的，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艺术的真实性是两个不同的逻辑学范畴。文学家不可避免在生活的基础上采取集中、提炼和典型化的手法。②

到目前为止，曹操是东汉三国时期的一位对历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这要归功于郭沫若发起的这场为历史人物翻案的讨论。

5. 李纲评价

对李纲研究和评价的热潮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讨论中可以看出阶级观点的影响很大。敬贤发表了《对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想法》一文，谈了自己评价历史人物的看法，特别提到了评价历史人物不光要考察其思想意识如何，还要考察他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思想意识。认为：“李纲作为两宋之际坚决抗金的大臣，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思想、言行，有值得赞扬的一面，这也是他主要的方面。”但是“他（李纲）所处的社会，即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存在着阶级对抗的社会；他毕竟不是遗世而独立的”。对于评价李纲“以生灵为意”的观点，他认为：“剥削阶级中的某些阶层与派别的所作所为，在特定的情况下能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有一定程度的一致，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做到所谓‘得民心’，这首先还是为了他们本阶级、本阶层的利益，而不是首先为了广大人民群众。”此外，“撇开有关的其他方面，孤立地强调李纲的‘以生灵为意’、‘为人民解脱灾难’、‘得民心’……等等，显得这一历史人物似乎对于当时的人民群众来说，是一个单方面的施舍者，他能给人民群众以一切，而看不到当时的人民群众给予他的强大支持与深刻影响；同时又显得他似乎是一个非古非今、又古又今的特异人物，而模糊了他作为两宋之际抗金斗争英雄之一的真实形象”。③王瑞明不同意敬贤的看法，指出，“李纲是两宋之际抗金斗争中出色的英雄”，“‘以宗社为心，以生灵为意’，是他与投降派最大的分歧之点”。“从此展开的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

---

① 吴泽、谢天佑：《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若干理论问题——论一年来评价曹操讨论中存在的问题》，《学术月刊》1960年第1期。

② 张真：《曹操——从生活素材到艺术形象》，《戏剧报》1959年第11期。

③ 敬贤：《对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想法》，《江汉学报》1963年第7期。

不能简单理解为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阶层或势力集团的斗争，因为抗战，主要是群众的意志，抗战派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不能简单地认为，李纲是统治阶级中之一员，……不容许把民族英雄李纲这类杰出人物的光辉成就加以缩小或抹杀，以致把抗战派等同于投降派，把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将领与奴颜婢膝的卖国走狗相提并论。二者是有界限、有区别的”。[①]此后，李涵不同意王瑞明的看法，认为李纲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镇压农民起义的，“李纲在历史上的成就和他的罪过一样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是抹杀或缩小不了的”。[②]紧接着，洪流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李纲的历史地位基本可以肯定，最值得肯定的是“他在两宋之际对抗金斗争作的贡献”。认为作为抗战派代表人物的李纲，虽然在路线上与投降派有显著区别，但是“这种区别毕竟是地主阶级内部当时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至于在维护封建统治、压迫剥削农民，不论是投降派还是抗战派，基于他们共同的阶级利益，始终一致”，“把地主阶级内部在对外政策上的不同，看成是抗战派与投降派之间唯一的区别，显然是不对的”。[③]此后，王瑞明和李涵又多次交换了意见。李涵《对封建统治阶级正面人物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再与王瑞明先生商榷》，就李纲对待农民起义的立场有无转变、李纲爱国思想的实质、李纲抗金与对待农民起义的动机与效果等问题进行说明。其一，李纲始终都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武力镇压农民起义。不能把李纲的招纳和让步政策混为一团，对李纲的让步政策可以给予适当的肯定，招纳手段不值得肯定；其二，认为王美化了李纲的爱国思想，并提出“李纲的爱国思想是他思想中的精华，对抗金战争提出了许多深刻的宝贵的见解，就局限性而言，主要是从地主阶级立场出发，民族利益从属于阶级利益”，与忠君报国思想密切联系。[④]此外，张炳耀也受到王瑞明一文的启发，认为：“李纲的可取之处是他那种敢于向女真贵族掠夺者作斗争的反抗精神，是他在一定程度上重视人民抗金力量的认识。……此外，可取之处就不多了。”并且认为，王瑞明所肯定的李纲“以宗社为心，以生灵为意”对“今天指导伟大的运动来说有什么意义，对发展我们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会起什么作用呢”。[⑤]

---

① 王瑞明：《评价历史人物应有哪一些“想法”》，《江汉学报》1963年第10期。

② 李涵：《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李纲——与王瑞明先生商榷》，《江汉学报》1963年第10期。

③ 洪流：《两宋之际的抗金斗争与李纲——王瑞明同志〈评价历史人物应有哪一些“想法”？〉读后》，《江汉学报》1963年第11期。

④ 李涵：《对封建统治阶级正面人物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再与王瑞明先生商榷》，《江汉学报》1964年第1期。

⑤ 张炳耀：《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离开阶级分析》，《江汉学报》1964年第1期。

6. 关于史可法评价的研讨

20世纪50年代初，史学界就史可法是不是民族英雄进行了讨论。1951年，丁正华《史可法是民族英雄吗?》一文，认为“史可法不是这样的爱国主义者，他的爱国主义已经和安内攘外主义结合起来了”。“人民只觉得他可怜，并不觉得他可敬”。“史可法是民族英雄吗？我认为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①]支持其观点者有章冠英，他在《略论史可法》一文中指出：“史可法是一直被认为是民族英雄的人物，但在今天认真研究史料，会发现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在史可法的政治生活中，抵抗满清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他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乃是花在和农民起义军作战上”。“当引狼入室的大汉奸吴三桂被南京小朝廷封公时，他竟也额手称庆。……在这里，史可法充分表现出是一个没有民族气节的人，他对异族侵略者的仇恨，远不及他对‘民喜于从’的‘贼’的仇恨；也充分表现出，他对于恢复华夏的事业，远不及对消灭李自成的‘事业’来得着急”。“只要看看历史资料，就可知道，他没有坚守扬州的信心，在清兵进攻面前感到丧气。所以扬州城并未很好地防备，军队没有布置停当，工事没有修牢，因为军队的掠夺，民众不能与他一心，在作战当中又显得仓皇失措，没有良好的指挥。因此，最后史可法虽然死了，但并不能就以此就尊他为民族英雄”。[②]秦子卿认为，史可法“算不上民族英雄，不够与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相提并论；但也不应是完全否定的人物，不能和龚鼎孳、洪承畴、钱谦益之流混为一谈”。他指出：“史可法虽然出来‘督师’淮、扬，但他实际上要打的主要对象并不是满洲贵族统治者，而是农民军。……史可法建议在江北设立四处藩镇，主要目的是为了防御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挥戈东南”。“史可法从‘督师’以来的所言所行，除了大量的是‘讨贼’‘灭寇’之类外，确实没有多少抗清的事例”。“在扬州城破以后，史可法‘自刎不殊’，逃至小东门，被清兵俘虏。但扬州人民仍在敌人的铁蹄下做殊死斗争，……这种斗争的光荣如何能归于史可法呢?”[③]

坚持史可法是民族英雄的有朱活，他明确指出，“史可法的宁死不降，为了殉阶级抑或殉民族”，这是中华民族“珍贵的遗产”。[④]魏宏运认为，虽然史可法是明朝皇室忠诚的拥护者，从人民的血污中起了家，当了农民运动的镇压者，但在民

---

① 丁正华：《史可法是民族英雄吗?》，《历史教学》1951年第5期。
② 章冠英：《略论史可法》，《历史教学》1952年第8期。
③ 秦子卿：《我对史可法问题的看法》，《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④ 朱活：《民族英雄史可法》，《历史教学》1951年第8期。

族斗争成为主要矛盾后，他开始转变抗清，最后死守扬州从容就义，实一民族英雄。①艾明则认为，对于史可法镇压农民起义的评价，“史可法对农民起义军犯下的罪行远远没有杨嗣昌、卢象升、马士英、左良玉之流那么严重。如果我们把史可法和这一帮人笼统地一样看待，按照现在的观点来说，恐怕也不太符合政策吧”。关于史可法抗清问题上，作者认为“欲有所为而不可为”是主要的，“史可法虽处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里(南明王朝的腐败无能)，却挺身而出，‘独木支大厦’”。②

7. 对李秀成评价的研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史学界对李秀成的评价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1964年8月，戚本禹的一篇《怎样对待李秀成投降变节行为》，把李秀成打成“叛徒”，一时成为定论。史学界清一色地对李秀成持批判态度，为其辩护者或寥寥无几，或所言甚微。厦门大学历史系教师在对李秀成及其《自述》评价问题的讨论会上展开争论，有一些教师认为：“李秀成写《自述》行的是一条‘苦肉缓兵计’，以伪降欺骗敌人，伺机‘东山再起’是革命的策略。李秀成的一生是伟大的，是英雄。”而有的教师认为：“从《自述》的内容看，李秀成的确向敌人表示了投降，但要考虑到他始终没有成为反动阵营的一员，反过来镇压革命，所以仍然是农民领袖，不能直斥之为叛徒，历史上像这样的农民领袖也不乏其人。”一些教师认为：“李秀成向敌人表示投降，晚节不忠是否认不了的。但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必须看他一生活动的主流，他们认为忠于革命就是李秀成一生的主流。应当说李秀成前忠后不忠，对他的变节行为应当谴责，对他的功绩也要充分肯定。”与上述意见相反，更多的教师认为：“李秀成在被俘后，经不起阶级斗争的考验，宛转求生，乞贷一命。他在囚笼里写的供词，美化了敌人，丑化了革命，把太平天国的机密暴露给敌人，并向敌人提出了收降太平军余部的‘招齐章程’，还迫不及待地妄图亲手实行这一毒计。这表明，李秀成已彻底背叛了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如果把对革命的叛变，说成是革命的策略，只能是为李秀成投降变节辩护。……盖棺定论应直斥之为叛徒。”③

此外，肖英华谈到：一、李秀成是投降变节分子，如果还歌颂他的“功”，其必然结论是有功的人投降也不要紧。这违反我们培养红色革命接班人的要求，违反党的教育方针的要求；二、粉饰李秀成的叛变行为有害于对革命接班人革命意志的教

① 魏宏运：《民族英雄——史可法》，《历史教学》1952年第8期。
② 艾明：《恢复史可法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③ 李扬：《厦门大学历史系教师讨论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3期。

育,破坏学生的是非观念;三、"这一场论战惊醒了我,过去抱着同情英雄落难的心理看《自述》,看不清其中心内容和用意所在,现在看来不过是为了投降清朝、瓦解太平军以图个人荣华富贵罢了"。"过去为什么不能认清李秀成是个叛徒,根本原因在于自己的思想觉悟不高。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加强自我革命,才能很好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教学任务"。[①]而魏千志则批评了对李秀成的评价中存在的错误观点:一为温情主义思想,就是同情叛徒的思想,"这种温情主义思想的存在,不仅使我们在研究历史问题时达不到正确的认识,划不清大是大非,就是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也极易陷入危险的道路";二为折衷主义观点,所谓的叛前叛后分开论、"全面"看待、时间长短论等都是属于此,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形而上学,要不得;三为历史局限性论,就是李秀成的叛变来自于时代阶级的局限性;四为活命哲学思想。[②]总之就是全面批判李秀成。由此可以感受到,"文革"山雨欲来之势。批李秀成为"叛徒"也成为"文革"批"叛徒"的先声。

"文革"结束以后,史学界对李秀成的评价才趋公允。郭毅生等《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与李秀成伪降问题》一文,提出了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首先,要"按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尺度","评价历史人物必需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可苛求于前人";其次,对功过参半、瑕瑜并见的历史人物,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尺度,"严格按照历史人物在其一生各阶段不同的历史作用,予以客观的、科学的衡量。是其所当是,非其所当非,既不回护其过,也不淹没其功"。以此观点,作者认为李秀成,"应看他的主流和看他的历史作用,而不是挑剔他的《自述》"。[③]李庚其指出,就李秀成而言,他的一生的主流是革命的。他在革命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受命于危难,扶大厦之将倾。在其十几年戎马生涯中,爱护民众,注意发展生产,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都有辉煌的成就。在革命的后期,他起了革命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对于李秀成的《自述》,作者认为,要进行具体而冷静的分析,"其可取之处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极珍贵的天国史料,并提出了'防鬼反为先'这样一个对一百多年前的农民领袖来说,极为可贵的反侵略思想"。"但'自述'中的自污之言和招降的建议则是十分错误的,……从客观效果看,这对于太平军余部的继续斗争和后世人民的革命,都会产生消极的影

① 肖英华等:《笔谈李秀成评价问题》,《历史教学》1964年第10期。
② 魏千志:《对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中几种错误观点的分析批判》,《史学月刊》1965年第4期。
③ 郭毅生等:《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与李秀成伪降问题》,《文史哲》1979年第4期。

响，是应该否定并给以批判的”。[1]陈清泉认为：“李秀成对太平天国革命是建立过伟大功绩的，这是他一生社会实践的主要方面，他是出色的农民领袖。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也有许多不可克服的弱点和严重的错误，但这只占居次要地位。”关于怎样看待其《自述》，作者认为，《自述》包含内容很多，不是“自白书”、“乞降书”所能概括的，尤其是李秀成提到的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建议（防鬼反为先），体现出他的高瞻远瞩。最后作者提出了对评价历史人物几个问题的看法，“评价这样的人物（功过交叉）应当从实际出发，考虑其全部历史，指出他的是非功过，不应攻其一点，不及其余”。[2]

8. 关于陶行知的评价

对陶行知的评价有凌汉如的《试论陶行知先生的评价》，赞扬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即为大众服务、为工农服务；提倡艰苦劳动，反对剥削；憎爱分明，为政治服务。批判了陶行知的“教育学说和哲学思想也有严重错误的地方”，“陶先生的‘行是知之始’中的‘行’，实际上是抽象的‘行’，是超阶级的‘行’。没有社会性，也没有历史的发展”，“没有发展提高，只是停留在低级的感性阶级”。“陶先生不了解或者不承认实践与理论相互依赖的关系，所以他只强调实际工作的行动，而看轻理论。如果按照‘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来教学，必然要造成无计划、无目的，给学生无系统知识的不良后果。正确的作法，是理论结合实际。因此，我们既要反对死读书的教条主义，又必须反对脱离理论的经验主义”。[3]乐喜对陶行知的评价进行综述，认为有两种趋向，一是推崇备至，一是近乎否定。[4]此外，还有戴白韬《对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认识的初步探讨》、董纯才《我对陶行知先生及其生活教育的认识》和邓初民《我们必须对陶行知先生给以重新评价——纪念陶行知先生逝世十一周年》。[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探讨，曲曲折折，但最终

---

① 李庚其：《如何评价李秀成》，《历史教学》1979 年第 9 期。

② 陈清泉：《论李秀成——兼论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 2 期。

③ 凌汉如：《试论陶行知先生的评价》，《安徽史学通讯》1958 年第 3 期。

④ 乐喜：《试谈陶行知先生的评价问题》，《安徽史学通讯》1958 年第 1 期。

⑤ 戴白韬：《对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认识的初步探讨》，《人民教育》1951 年第 6 期；董纯才：《我对陶行知先生及其生活教育的认识》，《人民教育》1951 年第 10 期；邓初民：《我们必须对陶行知先生给以重新评价——纪念陶行知先生逝世十一周年》，《人民教育》1957 年第 7 期。

走向了理性。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全面、辩证、实事求是，不能“贴标签”，不能以偏概全，不能从某种政治需要出发，已达成共识。

六、“五朵金花”——中国古代社会五个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①

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界探讨了许多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其中，中国古史分期、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土地所有制、汉民族形成等五个问题的讨论尤其热烈，被称之为“五朵金花”，有史学园地绽放的五朵美丽鲜花的意思（“五朵金花”也是当时一部电影的名字，讲五个美丽姑娘的故事）。以下作一概述。

（一）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

土地所有制属于经济关系范畴，属于经济基础范畴，是唯物史观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的重要历史问题之一。1919年以后，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在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史学界对土地所有制问题的研究也不断发展，有一些著作问世，如陈登元《中国土地制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等。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邓拓等也对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经历了领主所有制到地主所有制的演变过程。只是在两者的交替阶段上看法不尽相同。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研究得到进一步重视。1954年，侯外庐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皇族所有制”的观点，1956年又在《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一文中指出了“皇权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形式贯穿了秦汉明清的全部封建史”的观点，③而他的这一理论体系的大致形成是1959年发表的

① 本节参考了牛润珍：《关于历史学理论的学术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罗新慧：《20世纪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王东平：《中华文明起源和民族问题的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岑大利：《中国农民战争史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赵晓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研究与论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肖黎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重大问题论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王彦辉等：《古史体系的建构与重塑：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理论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何晓明：《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李振宏等：《民族历史与现代观念：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臧知非：《生存与抗争的诠释：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

② 卢钟锋：《回顾与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③ 参见侯外庐：《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

《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一文。[①]

侯外庐《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的发表,引起了热烈讨论。1956 年 9 月 13 日,胡如雷在《光明日报》发表《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对侯外庐先生意见的商榷》一文,对侯外庐的“皇族土地所有制”观点提出了商榷。1957 年 1 月 3 日,侯绍庄在《光明日报》发表《试论我国封建主义时期的自耕农与国家佃农的区别——与胡如雷先生商榷》一文,对胡如雷进行了反批评。此后,胡如雷又进行了回应。此后,有很多讨论的文章发表,如韩国磐 1959 年发表《从均田制到庄园经济的变化》,提出了封建土地国有制在中世纪占据支配地位的观点。[②] 1957 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由三联书店出版。1962 年,南开大学历史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问题讨论集》(上、下)由三联书店出版。这一时期出版的著作有王亚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华东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贺昌群《论两汉土地占有形态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李亚农《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吴大琨《中国的奴隶制经济与封建制经济论纲》(三联书店 1963 年版)、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等。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 1979 年版)其中第一章中系统地论述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尽管该书的出版是在“文革”结束后,但其初稿的完成却是在 1964 年。足见当时这一问题研究的热门。

以下将主要观点分别介绍。

1. 封建土地国有说

1954 年,侯外庐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既然东方专制帝王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了解全东方情形的关键,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自秦汉以来的中央专制的经济基础了。在欧洲,中央集权是封建主义没落以至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产物,在中国早期封建就有了中央专制,这正表明了政治史之依存于经济基础——皇族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历代党争的真实根源、中国历代君主之直接利用宗教而无皇权、教权分立的根源,也可以从这种经济基础上说明。”[③]这里

---

① 侯外庐:《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新建设》1959 年第 4 期。

②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序言》,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 页。

③ 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8—239 页。

初步提出了封建土地国有说的基本主张。封建土地国有说后来得到不少学者的充实和完善。

如从探源土地国有的最初途径来充实封建土地国有说的内容。韩国磐指出："说到西晋的占田制和北魏到隋唐的均田制，追溯其渊源传统，又不能不涉及到在西周井田制度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情况。……在此后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还起着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占田制和均田制，也可说正是在这种作用和影响下出现的。"[①]何兹全认为："氏族公社时期，土地是公有的，属于公社所有。……公社解体后，国君、国王、皇帝都从酋长那里继承下来他对公有土地的权力，……汉代以后，土地国有、王有的事实一直是存在的。"[②]高敏指出："我国在唐代中期以前封建的土地国有制的确存在，地主土地私有制虽然也存在，但还没有超过封建的土地国有制，特别是北魏以来，由于它带着原始的氏族土地所有制的严重残余而进入中国，从而大大加强了我国原有的封建土地国有制的严重残余，甚至取得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态。"[③]

又如从社会形态的发展来考察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具体表现形式。贺昌群在《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一书中探讨了封建土地国有制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的历史性和具体形态。他指出：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封建国家，"当封建化初期的秦、汉之际，表现在社会财产占有关系上，在对劳动力和劳动产品的支配上最为激烈。历东汉、魏、晋、南北朝，便由强而弱。隋、唐统一中国之后的近百年间，一度集中表现在均田制、租庸调法和府兵制的三结合上，成为中国古史上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回光返照'，仿佛油干灯草尽时最后出现的一道光亮"。[④]贺氏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的认识，是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的，而不是认为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都占据主导地位。这种阶段性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更加接近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的真实状况。

韩国磐在这方面的论述更加系统，他论述均田制时指出："从董仲舒的限民名

---

① 韩国磐：《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几点意见》，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册)，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307 页。

② 何兹全：《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自序》，鹭江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 页

③ 高敏：《我国封建社会没有土地私有制吗?》，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册)，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293 页。

④ 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贺昌群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293、294 页。

田、师丹的限田、王莽的王田、司马朗的恢复井田议、曹魏的屯田，一直到西晋刘宋占田和占山的规定，都充分体现出封建国有土地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支配地位。固然这些办法有的见诸实行，有的仅是议论，有的实行得好些，有的实行得差些，但这并不妨碍封建土地国有制的本质，而只是封建土地国有制运用的不同形式而已。这种封建土地国有制，就是从北魏到隋、唐时均田制施行的依据。或者说，均田制就是封建土地国有制运用的又一种形式。"[①]即不仅井田制是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具体表现形式，而且董仲舒、师丹、王莽、司马朗等人的建议和措施，以及曹魏、刘宋等朝所采取的屯田和占田等，都是封建土地国有制占据支配地位的表现。韩氏还论述了唐代中期均田制遭到破坏后出现的庄园经济的封建国有土地的实质，"在庄园成为土地占有的主要形态后，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本质的东西并没有发生变化，封建土地国有制这个东方和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特点亦未根本改变。所变动的是，封建土地国有制表现的方式不同，不是以占田、均田等过去的形式表现出来，主要是通过庄园形式表现出来"[②]。韩国磐认为："直到资本主义萌芽前后，私人土地所有制才发达起来。"[③]

总之，封建土地国有说的主要观点是：封建土地国有制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定时期是存在的，并且在一定时期还占据了主导地位。

不同意封建土地国有说的主要观点：

唐陶华分析了以古罗马为代表的"古典的土地私有制形态"和近代美国的土地所有制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干预的史实，指出："土地所有权受到国家权力的支配，土地买卖和土地使用受到国家权力的限制，都不能作为土地属于国有的证明。"[④]应该看到，封建统治阶级在不同的时期对国家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多少加以限制，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土地私有制的性质，只是使土地的所有制形态变得更加多样化。

束世瀓指出："'全东方'并不是完全没有土地私有制，……战国以后，商鞅变法使民得买卖土地，显然是土地私有制。自此以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也显然是土地私有制。即在侯先生也承认秦汉以后有'一定的私有制'存在。

---

① 韩国磐：《从均田制到庄园经济的变化》，《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36 页。

② 韩国磐：《从均田制到庄园经济的变化》，《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83 页。

③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序言》，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 页。

④ 唐陶华：《向中国封建土地国有制论者质疑》，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册），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335 页。

问题在于侯先生认为：'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观念是比较缺乏的。这里所谓法律观念是指所有权在法律上的思想，至于在法律之外的事实是另外一件事。'这就把一切历史事实都有可能摒弃在法律之外，而中国就基本上没有私有制了，这种研究方法是可商的。"①杨国宜指出："从事实上看，战国以降公社瓦解、土地买卖，我们就不能再说'没有土地私有制之存在'，'缺乏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土地私有权的标准，是土地是否成为可以出卖的商品。在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之际，公社瓦解，集体土地所有制逐渐破坏，土地买卖的记载，历见不鲜。……土地买卖越到后来就越普遍，用不着多举例。侯先生自己说过：中国封建社会是有土地买卖权的。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并不缺乏土地私有的法律观念，当然更不能说没有土地私有制之存在了。固然，在封建社会中，由于等级隶属和人身依附的结果，土地私有权总是受到很大的限制、很不巩固，不是'完全自由的'，但毕竟还是存在'封建式的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卷一，页五四六。《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页二〇)。"②

戚其章指出："在北魏和唐初施行均田制的情形下，土地国有制似曾居于主要的地位。但问题在于怎样来认识这种土地国有制。依我的意见看来，这种土地国有制与其说是经济现象，不如说是政治法权现象，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治力量来维持的。因此，我们应该把它当作列宁说过的'过了时的上层建筑'来理解。"③他说："事实上，北魏和唐初的均田制却不曾，也不可能彻底地实行。例如北魏均田制颁布之初，就遭受到地主阶级的激烈反对，'豪富兼并者，尤弗愿也'(《魏书·食货志》)。北魏所均之田主要是'无主荒地'，并不曾真正地侵犯到大地主的利益。唐初的均田制也规定了官僚地主可以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所以均田制并不能完全消灭兼并……均田制的实行并不能证明土地国有制在一定的时期居于主要地位。相反地，均田制的不能彻底实行及其迅速崩溃，正足以说明当时生产关系的基础仍是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正因为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发展是合乎经济规律的，所以它才能够屡次地击败依靠政治力量而施行的均田制。"④

① 束世澂：《论封建社会中的土地国有制问题》，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册)，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87 页。

② 杨国宜：《略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册)，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95—96 页。

③ 戚其章：《论我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册)，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112 页。

④ 戚其章：《论我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册)，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112—114 页。

吕作夔指出:“很多同志把封建社会前期封建国家对土地的法权与地主土地私有制混为一谈,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存在的实质性差别。例如:封建国家只有拥有土地法权,并不实际经营土地,而地主大多数都是直接经营土地;封建国家对于土地只有授予权,而无卖买权,地主则有卖买权;封建国家通过土地的法权控制征税户口,而地主通过土地所有权直接获得地租,等等。我们在研究封建土地所有制时,只有区分各种占有形态,才能更好地阐述因所有制形态的变化,而引起政治、经济变化的客观规律。”①

2. 封建地主所有制

1954年出版的王亚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一书,认为封建地主所有制占据中国封建社会主导地位。书中指出:“由秦到清这两千多年间,除了在两晋南北朝那一段时间,曾因战乱及外族侵入关系,呈现过倒退到原始形态的自然经济的现象及以后局部出现了庄园组织形态外,地主经济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②

胡如雷提出:“我认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包括国家土地所有制及地主土地所有制,而占支配地位的却是地主土地所有制。我这里所以用‘国家’代替了‘皇族’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地主政权是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产生的驾乎整个地主阶级之上,同时又代表整个地主阶级的政权,皇族只是地主阶级中虽然地位很高但人数很少的一个集团。所谓国家土地所有制也就是地主政权代表了全部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③

在胡如雷看来,侯外庐将中国封建社会占支配地位的土地所有制概括为皇族土地所有制是不够准确的。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实质在于“地主政权代表了全部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所以,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实质就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因为有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基础,所以才出现了地主政权;因为有了地主政权,所以才出现了土地的国有,才出现了皇族。把皇族的产生及皇族土地所有制作为我国封建政权产生的基础是倒果为因的说法”。④这是因为,在胡如雷看来:“就封

① 吕作夔:《小农经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页。

② 王亚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9页。

③ 胡如雷:《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对侯外庐先生意见的商榷》,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5页。

④ 以上引文参见胡如雷:《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对侯外庐先生意见的商榷》,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9—60页。

建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实现而言，占支配地位的是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不是皇族土地所有制，国家土地所有制是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的历史现象，从而也就只能成为它的补充形态。"[1]

当然，无论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私有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制，均与理论上的"私有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就是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用近代的尺度去衡量中世纪的事物，是不完全合适的"。[2]这些批评可以说是具有其合理性的，在一定意义上指出了对于封建社会的私有制或私有权进一步研究和努力的方向所在。同时，也为我们进行学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反思、审视视角。

不同意封建地主所有制的主要观点：

束世澂指出："对土地的私有权，是指个人对某一确定土地具有一定程度的占有权和支配权(出让是支配)而言。而这种权力可以是完全而自由的，也可以是不完全不自由的，但同样都可以称为土地私有权。既然完全而自由的私有不存在于封建社会，那么，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权是不完全不自由的了。这是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的特性，不论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土地所有制皆具有这个特性(但有程度差异)，这叫做'封建式的私有'。在封建社会，一切都打上了封建烙印，作为社会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不可能不被赋予封建性。"[3]

杨生民指出：胡如雷"忽视甚而无视封建权力和特权与土地的结合、政治手段和暴力在地主获得土地中的作用。在胡如雷同志的笔下，中国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国有土地与私有土地的互相转化、地主对农民土地的兼并，似乎都是按经济原则通过土地买卖进行的。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自由土地私有制二者之间的界限和差异"。[4]

3. 封建土地国有制和封建地主所有制并存说

周良宵指出："我们说中国封建社会存在过土地国有制；但我们不能同意把土地国有制当成静止不变的东西来理解。有些同志认为，我国封建土地国有制从来

---

① 胡如雷：《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对侯外庐先生意见的商榷》，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7页。

② 田泽滨：《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讨论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81页。

③ 束世澂：《对〈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的意见——和侯外庐先生商榷》，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58页。

④ 杨生民：《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就是如此，甚至到解放前夕还是这样，这当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会引导我们犯很大的错误。……封建土地国有制是一个历史形态，是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的。也有些主张土地国有制的同志在我国历史上一些土地私有的事实面前迷惑不解，企图对它们作出过于勉强的解释，这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和封建土地国有制并存的还有其他形态，这也是事实。"①

有的学者则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分析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国有制之间的互动。例如，高敏对北魏土地制度的分析："只有一方面既承认我国封建社会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另一方面又承认在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存在着奴隶制土地国有制的严重残余。而且由于拓跋族带着原始的氏族土地所有制的严重残余进入中原，从而加强了我国原有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因素，似乎在均田制严格推行时期，封建土地国有制居于统治地位。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商品经济的发展、高利贷的盛行而来的，是土地买卖的日益盛行，土地私有制的法律观念日益加强，地主土地私有制完全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②

4. 若干共识

学者们在相互的讨论、批评与反批评中，也不断纠偏，逐步取得了一些共识：

第一，土地制度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经济现象。它包含着土地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等多种内涵，独自构成了复杂的理论体系。在土地制度的结构中，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是最为关键的三个组成部分。这三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各成其体系。相互的联系决定着一种土地制度的相对稳定的实质，各个部分的独自发展和作用又为整个制度结构的运动变化提供了新的取向。同时，土地制度无论就其整体的存在，还是各个独立成分的发展变化，又都与整个社会经济其他结构相互作用、受其影响，从而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发展之中。相对而言，在土地制度的三个基本成分中，所有权与占有权的运动比较缓慢，多呈静态，而它的存在和性质又对使用权的运动变化有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③

第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表现形式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有一个发展过程。如有的学者所言："在同一社会形态里，占支配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也是可以转

① 周良宵：《要从发展的观点来认识封建土地国有制》，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册），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216 页。

② 高敏：《我国封建社会没有土地私有制吗?》，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册），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295 页。

③ 参见王晋新：《15—17 世纪中英两国农村经济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2—13 页。

化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将呈现出阶段性来，居于主导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①地主制经济也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是地主制经济的萌生期和继续发展期，"既然处于过渡形态，发达完善的地主制经济非可一蹴而就，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才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②

5. 讨论的意义

只有对中国历史上的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国有制的运动、变化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才能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较深入、准确的认识。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对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第一，推动了对农民起义及历史发展动力的研究。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找到其爆发的经济根源，尤其是土地所有制变化的根源，就起义的实际效果看，通常能够看出经济方面的变化。因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变化在政治上的反映，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则反映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经济上的要求。从不同土地所有制之间的起伏消长的层面来看，会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有更深刻的认识。

第二，促进法律史的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经济领域的法律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开始的。有的学者正是从法律的角度对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问题进行了考察，提出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的观点。

第三，开创了中国经济史乃至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局面，促成了中国经济史学的诞生。关于这点，不仅 20 世纪 90 年代的学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学者也有一种鲜明的自觉。中国经济史学的诞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结束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自发状态，进入到自觉研究的新阶段。

第四，直接促进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结合。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的，它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很多历史问题的研究。它从最基础的理论层面上促进了史学界对中国古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历史人物评价，以及汉民族形成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为这些重大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经济理论的支撑。中国封建土地所

---

① 齐振翚：《试论战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辽宁大学学报》1982 年第 4 期。

② 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地主制经济论——封建土地关系发展与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1 页。

有制问题的讨论，对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第五，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一步中国化、民族化的重要表现，既是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深入结合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对以往的历史研究进行检讨和超越的重要领域。通过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深入研究，才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更加具有中国历史研究的特色，才能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加深人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和理解。

此外，对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讨论的经验教训加以认真总结，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也有重要意义，也是推动史学研究发展的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课题。

6. 余响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来，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讨论虽不能说热门，但仍有著作出版。如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齐鲁书社1984年版），乌廷玉《中国历代土地制度史纲》上、下册（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林甘泉主编《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岳琛等《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版），等等。还有袁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胡如雷《从汉末到唐中叶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霍俊江《中唐土地制度演变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于干千《唐代国家土地政策变迁与土地制度演进》（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武建国《五代十国土地所有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伍丹戈《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赵令志《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等等。著作出版的数量比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更多了。论文不多，也有一些，如史介《关于秦汉土地制度的几种看法》（《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耿元骊《十年来唐宋土地制度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1期）、施伟青《关于运用秦简材料研究土地制度的若干问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等。总的来说，研究仍在不断深入。

（二）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中国古史分期，主要指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的分期以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

的分期。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讨论较多、分歧较大的集中在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上。

中国古史分期，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较早，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刘师培等均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过程中，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得以展开，有不少成果。①但真正从学术研究角度进行深入讨论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事。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古史分期问题是“五朵金花”中最先提出来加以探讨的。1950年3月19日，郭宝钧在《光明日报》发表《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当日，郭沫若就写了《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一文(《光明日报》1950年3月21日发表，后收入《奴隶制时代》)，提出了“殷、周都是奴隶社会”的观点。郭的观点引起了史学界热烈的争论。

1950年7月5日，郭沫若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申述一下关于殷代殉人的问题》，1952年，郭沫若出版了《奴隶制时代》(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充实了战国封建说。1954年8月，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修订本。这两部书的出版，“把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③至1956年上半年，讨论达到了高潮，1957年下半年，争论一度趋于平缓。60年代初期，讨论在形式上由全国性的争鸣转向地区性的辩论。

这一时期出版的著作还有：李亚农《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文史哲杂志编辑部编《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丛》(中华书局1957年版)、束世澂《中国的封建社会及其分期》(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社会的形成问题》(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江西省历史学

---

① 关于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起始、过程、各种观点的形成以及不同观点之间的论战批评，详见林甘泉等：《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罗新慧：《20世纪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等论著。

② 卢钟锋：《回顾与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③ 田居俭：《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三十年》，文史知识编辑部：《中国史学研究动态》，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39页。

会《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等等。

在这一时期的论争中,形成了四种主要观点:一、西周封建社会说,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徐中舒、杨向奎、王玉哲、王亚南、束世澂等学者为代表。代表作有: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群众》第 4 卷第 4、5 期,1940 年 9 月)、《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辑刊》1954 年第 1 期)、范义田的《西周的社会性质——封建社会》(《文史哲》1956 年第 9 期)等。二、战国封建说,以郭沫若为代表,吴大琨、田昌五等亦主此说。代表作有:郭沫若《中国奴隶社会》(1950 年北京大学讲演)、《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1951 年 2 月)、《关于奴隶与农奴的纠葛》(1951 年 2 月)、《奴隶制时代》(1952 年 2 月)、《关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1959 年 3 月)等。三、以侯外庐和周谷城为代表的两汉封建说。代表作有: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与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见《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和周谷城《中国奴隶社会论》(《文汇报》1950 年 7 月 27 日)等。四、魏晋封建说。以尚钺、王仲荦、童书业、王思治、日知和何兹全等学者为代表。代表作有:尚钺《如何理解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教学与研究》1956 年第 4 期)、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 年第 8 期)等。这些不同的观点,除了对某些资料有不同的看法以外,在理论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反映在以下的问题上:

1. 判断奴隶制社会的标准

第一,判断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标准是生产力发展状况。吴大琨在 1954 年《历史研究》上发表《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指出:"我们无论要区别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也好,要区别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也好,都不能不同时注意到这一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把'区别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主要关键'认为只是在'剥削方法的变换上',而忽视生产力的变动,这是不符合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于范文澜同志在理论上,没有把'生产力'的概念搞清楚,因此也就没有能重视划分社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力的客观标准。"①

第二,判断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是否是奴隶社会,其重要的标志则是考察社会中的主要劳动者的社会关系,也就是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关系如何。时希哲《与吴大

① 吴大琨:《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 1956 年版,第 127 页。

琨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底标准问题》指出：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存在着的“特有法则”：当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候，并不决定于奴隶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情况，而是决定于“剥削形式的改变”。[①]有的学者认为：古史分期的关键是区分每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者的身份与地位。中国历史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再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关键是占人口多数的“人民”的倾向和地位如何。因此，也就有了区分社会形态性质的根本标志。[②]

第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互动去把握古史分期问题。这不是说哪种生产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是说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因素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郭沫若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指出：“封建制社会和奴隶制社会并没有多大的悬殊；只是直接生产者在奴隶制下可以公开地大量屠杀，而在封建制下的屠杀起初是不公开，其后是法律上禁止（当然偷偷打杀仍然是不免的）。又奴隶制社会是氏族社会的延续，多量地含有血族成分，而封建制则是多量地含有地域成分的奴隶制。”[③]在郭沫若看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区别并不是生产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的重大的变革，而仅仅是直接生产者的生产关系、社会地位，乃至地域与血缘在不同时期社会关系中所起的作用的不同。关于这一点，吕振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了，并在50年代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吕振羽在文章中说：“我们便应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去把握。构成生产力的要素为人类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因而一般的说来，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的生产工具，自然无明显的重大区别；但是前者的劳动力系属被看成为工具一般的全无人格的奴隶，后者已具有一半人格的农奴。”[④]吕振羽说的“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去把握”一个社会形态的性质无疑是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2.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史学家在借鉴苏联史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进行了研讨。其中，以侯外庐、吴大琨、周谷城和童书业等人的观点最有代表性。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社会历史形态的亚细亚

① 时希哲：《与吴大琨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底标准问题》，《文史哲》1955年第8期。
② 参见史学史研究室编：《新史学五大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③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④ 吕振羽：《殷代奴隶制度研究》，《吕振羽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5页。

生产方式。侯外庐在1963年指出:“不论在古代、在近代,都有个别的情况,在‘古典的古代’以外。显然有亚细亚的古代,在通例的近代以外,也显然有殖民地(甚至像帝俄那样)。”①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侯外庐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便是:土地氏族国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间的结合关系,这个关系支配着东方古代的社会构成,它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②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构成的生产方式,是由于氏族共同体所公有的生产资料(田邑土地)和以氏族全体成员(即族众)为主的劳动力互相结合而成。这种生产方式是东方古代社会的,亦即马克思所指出的‘亚细亚的’。在这一生产方式支配下的整个世界的东方古代,是属于世界史上的奴隶社会的第一个阶段。”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本已指出过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与资本主义的几种生产方式;但对于这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中外学者曾引起许多争论,而终未解决。直至1939年苏联发表了马克思的遗著‘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以后,我们才获得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这就是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实即一种公社的财产形态,即公社的土地所有制,与古典的私有财产形态——土地私有制不同。我国殷周时期无疑已是奴隶制社会(早期奴隶制社会),而同时保存着以公有财产为基础的农村公社或家族公社,这是古代东方社会最显著的特点。”④更有学者认为,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的井田制相符合。⑤也有学者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不能够简单地与井田制相附和。⑥

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独立的阶段。周谷城在1950年指出:“如果要把‘亚细亚式的’几个字来形容中国社会,则任何一段都可以加上这几个字。中国社会的任何段落所历时都很长,任何段落的个性都

① 侯外庐:《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研究与商榷》,《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53页。

② 侯外庐:《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研究与商榷》,《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③ 杨棫:《论殷末周初的社会性质——关于我国早期奴隶制的探讨》,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2页。

④ 斯维至:《关于殷周土地所有制的问题》,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9页。

⑤ 吴大琨:《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22页。

⑥ 戚其章:《关于西周社会性质的问题——与吴大琨先生商榷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18—219页。

不是十分明显，由前一段到后一段的转变也都不甚显著。凡此等等特点，或可勉强称之为亚细亚式的。至于各段的名称，仍只能是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等。”[①]这就等于否认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王亚南也有相似的看法。[②]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一种长久的经济因素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不同经济形态之中，这也正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的分歧关键原因之一。很显然，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能简单地当作一种社会形态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社会形态相提并论。

如何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众说纷纭，见解各异，但也有某些共识，如：(一)中国古代夏、商、周三朝是典型的亚细亚社会；(二)自秦汉至清末，中国土地私有化程度虽逐渐增长，但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早期亚细亚特征。[③]

3. 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制社会

在20世纪30年代的讨论中，奴隶社会的有无就已经引起学者们的热烈争论。[④]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奴隶社会是否为中国历史的必经阶段也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主张中国没有奴隶制社会的学者主要有：岑仲勉、王玉哲、雷海宗、童书业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奴隶社会说有进一步发展。张广志指出：“为了证明中国古代也像古典世界那样曾经经历过一个奴隶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大抵是循着如下两条路子开展研究工作的。第一条路子，可以郭老为代表。其特点是：比较严格地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奴隶和奴隶社会的见解立论，在诸如什么样身份的人才算是奴隶，什么样性质的社会才称得起奴隶制社会这样一些理论上说得通、站得住脚。其失在于：以古典世界为楷模，大做中国史的改铸工作，把中国古代广大非奴隶的劳动者普遍加以奴隶化，借以满足在中国构筑希腊罗马式的‘超奴隶社会’的需要。不用说，这是一条削足适履、依模铸物，靠歪曲史料以满足既定理论需求的路子，自然不足为训。另有一些历史学家(在触及具体问题时，本不属于此一类型的郭老有时亦会厕身到这类人的行列中去)，他们意识到在古代中国是很难找到大批的、希腊罗马式的、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奴隶

① 周谷城：《中国奴隶社会论》，《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6页。

② 王亚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9—70页。

③ 孙承叔：《打开东方社会秘密的钥匙——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代社会主义》，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117页。

④ 参见温乐群等：《20、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37页。

的……但却囿于‘奴隶社会乃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成说，硬是要在中国另行制造出各种名目的奴隶，另行制造一个有别于古典世界的中国牌号的奴隶社会来。这样的同志，比较尊重中国史的实际，在具体问题上每能言中，这是好的，但他们给所谓‘中国式的奴隶社会’所添加的种种名目，却很难在理论上站得住脚。”①沈长云指出：“我们旷日持久的古史分期讨论便是在预设了‘中国不能没有奴隶社会’的前提下进行的。从实际出发，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没有过一个奴隶社会。商代不是奴隶社会，因为其时作为社会生产主要承担者的‘众’或‘众人’并不是什么奴隶，而是各个氏族组织的族众；西周、春秋也不是奴隶社会，那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庶人与商代‘众人’是同样性质的农民；战国、秦、汉广大的编户齐民更不是什么奴隶。可是过去在‘中国不能没奴隶社会’的指导原则下，大家非要把这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朝代说成是奴隶社会，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来讨论所谓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也就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下限到底应断在什么时候的问题。……它告诉我们：正是教条主义、公式主义阻滞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在中国的健康发展。”②在这些学者看来，在中国，继原始社会之后到来的早期阶级社会，或是“村社封建制”社会，③或可称之为“氏族封建制社会”。④

主张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学者指出：“我们未尝不可以说，东方奴隶制是一种农奴制，但绝不是封建农奴制，而是属于奴隶制范畴的东西。正像奴隶制有不同的形态一样，封建制也有不同的形态。在亚细亚形态的基础上，根本不可能形成封建农奴制。”⑤把这种类似于农奴制，却又和封建农奴制有着根本的不同的具体社会形态，称之为家族奴隶制或宗族奴隶制较为合理。田昌五指出：“在东方，由于公社解体异常缓慢，家族奴隶制继续发展为占统治地位的形态，经历了一整个历史时期。家族奴隶制和原始公社关系残余是结合在一起的，但它不等于原始公社关系，组织在公社形式中的奴隶也不是公社成员。如果把两者等同起来，必然导致奴隶制的二元论，甚至否定奴隶制。”⑥可以说，公社这一社会载体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

① 张广志：《“中国奴隶社会”研究中的几种常见提法驳议》，中国先秦史学会秘书处编：《中国古代史论丛》，第 8 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45—246 页。

② 沈长云：《在历史研究中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03 年第 1 期。

③ 张广志、李学功：《三代社会形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4 页。

④ 晁福林《夏商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29 页。

⑤ 田昌五：《马克思恩格斯论亚洲古代社会问题》，《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03 页。

⑥ 田昌五：《马克思恩格斯论亚洲古代社会问题》，《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99—100 页。

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和作用下，会隐藏着本质并不相同的阶级内容。傅筑夫认为："中国同样经历过一个奴隶占有制阶段，而且这个阶段经历的具体时间还相当长。但中国的奴隶制度却又发展得极不充分，直到殷商末年奴隶制度濒临崩溃时为止，始终没有发展到希腊罗马那样高度发展的奴隶制度。"①傅筑夫指出奴隶与农奴的区别是："奴隶不但没有自己的生产工具，而且连他的人身还是别人所有的工具——'会说话的工具'。所以在奴隶制度下，只有奴隶主的经济，没有奴隶的经济。农奴有法律上或事实上属于他的土地，有自己所有的生产工具（犁、牲畜等等），他只是以一部分时间在领主的公田上服无偿劳役，而以另一部分时间来经营自己的农田，所以在井田制下或欧洲的庄园制下，不仅有领主经济，而且有农奴经济。有没有'自己的经济'，便是农奴与奴隶的根本区别点，至于他们是不是被剥削和人身是不是自由，是不能作为区分两者的标准的。"②可以说，作为变例的奴隶制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的存在是客观事实。

4. 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意义

第一，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意义在于它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历史研究课题具有的世界意义。正是古史分期问题的探讨，才使得国际史学界更加关注中国史学界、更加关注中国史学。通过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第一次把古代东方、古代美洲的历史纳入世界史研究的范畴。③中国古代的历史，尤其是上古史首次成为外国学者集中精力关注的对象。因而，整体上的世界历史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中得到了有力的贯彻和体现。广大东方国家的史学家以及西方一些进步史家以更为广阔的眼光来看待除了欧洲以外的各个地区的历史，把这些地区的历史纳入到体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世界历史研究中去。这对于改变"故意抹杀东方各国历史，故意抹杀中国历史中优秀的东西"，认为"唯有西方文明才配称为世界文明"，才是"世界历史的中心"的观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反对"欧洲中心论"，意义非同寻常。④

---

① 傅筑夫：《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若干特殊问题（代序）》，《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三联书店 1980 年版，第 2 页。

② 傅筑夫：《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若干特殊问题（代序）》，《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三联书店 1980 年版，第 4 页。

③ 参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E.C.威尔斯科普夫：《古代史分期问题：把古代东方和古代美洲纳入世界史的发展过程》，郝镇华编：《外国学者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68—186 页。

④ 参见曹守亮：《1949—1966 年"十七年史学"的再认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4/2005 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17—321 页。

第二，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一步发展。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过程中兴起，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次讨论的政治意义在于促进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时也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发挥了重要作用。“50 年代的大辩论，则是在革命取得胜利的基础上，中国学术界在理论上的第一次大练兵。这次大辩论，带动了两代人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老一辈的许多学者，刚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中认识了马列主义，通过这些辩论，又从自己的业务领域进一步认识到，马列主义不仅善于解决历史的宏观问题，而且比传统的考据学和简单的逻辑推理更能解决历史的微观问题，从而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学术上、政治上完善了自己。年青一辈，刚进入史学门槛，就从那次大辩论中活学到社会发展史，认识到历史科学的实践意义和它的时代任务，从而努力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加速了自己的成长。这就是那次大辩论不能磨灭的头一个历史功绩”。①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和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重新讨论中，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这样评价：“从一定意义上说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成长和发展的一部重要记录。因为真正应用马克思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是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开始的；而在这半个世纪中，也正是分期问题的讨论，推动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提高。”②

第三，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建设。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继“古史辨”思潮之后不仅继续将中国上古史的具体研究推向深入，而且也逐渐探讨出新的研究范式。它使人们认识到，史料学尽管重要，却并不能完全代替整个历史学的研究。历史学的研究需要理论的指导，需要逻辑的推理、抽象、概括和提高，即便是史料的研究事实上也要有理论的支撑。对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问题在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化和学科化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资料最为贫乏和寡缺的先秦、秦汉史，却率先得到最为清晰、精细、深入的清理，其功劳不能不归于‘古史分期问题’论战”。③正确解决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不仅可以揭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直接推动古代史（包括通史、断代史、专

---

① 林乃燊：《怎样理解中国奴隶社会的上限和下限——与梁作干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评论》1985 年第 7 期。

② 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25 页。

③ 王学典：《“假问题”与“真学术”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一点思考》，《20 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18 页。

题史)的研究和教学,而且还有助于中国古代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

5. 余响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以来,不仅对以前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纷纷进行总结,讨论也仍在继续,特别是中国没有奴隶社会说,在学术自由讨论的氛围中强力迸发(以上已略有介绍)。

80 年代和 90 年代以来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著作,如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田昌五《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赵锡元《中国奴隶社会史述要》(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6 年版)、张广志《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朱凤翰《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尚钺《尚氏中国古代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田昌五《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齐鲁书社 1992 年版)、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 1992 年版)、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 1995 年版)、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罗新慧《20 世纪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等等。

(三)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只有零星的研究。真正大规模的学术研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的。特别是 1954 年 10 月 10 日,李希凡等在《光明日报》发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1955 年 1 月 9 日,邓拓在《人民日报》发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文,这些文章涉及中国资本主义关系萌芽问题,于是这一问题的讨论很快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至 1956 年 10 月 1 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已经编成了八十万字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下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讨论集·编者的话》说:“在这短短的几年中,所得到的收获是超越了前代几十年的总成绩的,我们的史学家这一努力,对于中国历史科学的功绩,无可否认,是巨大的,因为这些功绩基本上改变了中

国历史科学的外貌，把中国历史从漆黑一团的没有规律、没有发展的'特殊论''长期性'和'停滞论'的糊涂现象中挽救出来了。"[①]1960年2月，由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又由三联书店出版了。此外，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三联书店1956年版)，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吴海若《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关梦觉《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初步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等著作也相继出版。1954—1965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形成了高潮。[②]

1. 讨论的主要问题及观点

第一，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分别有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清说等。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应该出现于明清时期，"许多史学家认为是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叶。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内部起了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在手工业、农业和商业等方面都明显地可以看到。手工业方面，江南民间丝织业中的织机和工人数量大大增加，'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出现了工场手工业。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种发生过程，即生产者变成商人与资本家，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在当时的丝织业中都可以看到。在棉纺织业中，出现了以棉花收买布匹的包买主。除了丝织业和棉纺织业外，景德镇的陶瓷也出现了大批的雇佣工人。农业方面，一大部分农田转化为丝织业等原料生产。一条鞭法反映出商品经济的发展、徭役制的死亡，并促进着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过渡。私有土地迅速发展，出现了经营地主，在江南已可看到直接生产者与土地所有者的契约关系。商品货币关系进一步发展，新的商业城市兴起，国内市场形成。在对外通商问题上，商业资本家和封建地主保守派之间引起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性质的斗争在过去历史上还没有过"。[③]可见当时已认识到，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两种途径，以及对外通商交往在资本主义萌芽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已相

---

①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编者的话》，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页。

②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基本历史和具体内容，可详见赵晓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研究与论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③ 杜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下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93—1094页。

当深入。

第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程度及其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当时有的学者写道:

> 大致有三种看法:(一)认为当时还是完整的封建社会,并无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出现;(二)承认当时已有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出现,甚而承认它在某些地区的某些行业还得到了些发展;但又承认它还只是开始出现,或初步发展,对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破坏,甚而对清朝封建政权统治力量的盛衰消长,还没有也不能起多大作用;(三)认为当时资本主义生产萌芽不仅已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而且还有了相当的发展。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代表者的市民阶级的前身,已在政治舞台上出现;思想上提出了自己的阶级的要求,行动上也表现出自己的力量。有的同志并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已进入资本主义的"所谓原始积累时期"或"从经济观点看,已是资本主义的'所谓原始积累'时期了。"①

第三,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水平。从研究的门类看,这一时期主要侧重于民营手工业、矿业、丝织业、陶器业、造纸和印刷业等行业的发展水平的研究。有的学者指出:"明代手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城市的繁荣,在某些方面,自然经济已开始被商品经济所逐渐破坏,不仅景德镇的瓷器行销各地,而宣城的纸、遵化的铁、云南的铜和银、无锡等地的活字版印刷品也多供用全国。其中最显著的是纺织手工业的产品,因为北方地区的农村纺织不发达,一般是依靠南方的棉布和江浙的绸缎的输入;而南方以松江为首的棉织业中心和分散各地以及广东、福建的机户,其原料却反依靠北方的产棉区域。因此,可以说明代手工业的一部分已经从家内副业走向市场,而倾向于工业劳动的使用,逐渐变化为小商品生产者,即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是在滋长着。"②

第四,明清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考察。如傅衣凌指出:"明代地主阶级的获得劳动人手,不单纯是依靠于雇佣劳动者,而且在很大部分是依靠于封建劳役制的佃农或工役制的佃农,为这旧有生产关系之内在的

---

① 李之勤:《关于中国清初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发展水平问题——和吴大琨商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下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65—566页。

② 李光璧:《明代手工业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页。

牢固的坚韧性，这也限制着明代地主经济的扩大不是那么顺利，所以在明代的农村生产关系里，虽表露有若干裂痕，并出现有若干的新的因素，但其进行总是那么迂回而缓慢，在每一阶段中都有些进步，却始终未能突破旧有的生产关系。”①还有的学者注意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带来的新变化，“史学家们还指出，这种变化在社会风气和文化娱乐等方面也表现出来。过去遭受鄙视的商人地位提高了；逐末营利成为风气了；商人的奢侈浪费的生活，造成社会上的繁荣现象；封建礼法和秩序开始受到冲击了；从而文学歌曲方面也出现了反映这种社会生活的作品”。②

2. 讨论后的讨论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本身，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再次被讨论。

第一，“注经”说。毛泽东 1939 年所著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③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有一些学者认为，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与经典命题相关。④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讨论中确实有学者引用了毛泽东这段话，1957 年三联书店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下）收入的 33 篇文章中引用毛泽东话的主要有：侯外庐《17 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潮的特点》（第 91 页）、尚钺《清代前期中国社会的停滞、变化和发展》（第 160 页）、钱宏《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若干手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第 271 页）、傅筑夫等《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第 295 页）、陈湛若《略论红楼梦社会背景——评吴大琨先生的几个论点》（第 733 页）、黎澍《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第 742 页）、吴海若《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第 835 页）等七家。其他文章没有引用。讨论文章中广为征引的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主要是：

---

① 傅衣凌：《明代江南地主经济新发展的初步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68 页。

② 杜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下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094 页。

③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626 页。

④ 陈支平：《历史学的困惑》，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5 页。

(1) 较多数劳动者在同时、在同地(或在同一工作场所)、在同一资本家的命令下,生产同种商品,在历史上和在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概念的出发点(《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84页)。[①]

(2) 包含着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雇佣劳动制,自上古就存在的;其偶发的个别的形态曾经在好几个世纪内,与奴隶制度相并存。但是只在必需的历史前提已经成熟时,这一隐藏着的萌芽方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选》,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55年版,第二卷,第110页,恩格斯注)。[②]

(3) 资本主义经济不能一下子产生,劳役经济不能一下子消灭(列宁《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63页)。

(4) 世界商业与世界市场是在16世纪开始资本的近代生活史的(《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49页)。[③]

(5) 关键在于,既在封建社会的母胎内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又在发展过程中未能走进近代的资本主义世界,这即是如马克思所说,既为旧的所苦,又为新的发展不所苦,死的抓住活的(参看《资本论》序言)。[④]

(6) 商品生产与发展了的商品流通——商业——是资本主义依以成立之历史的前提(《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3页)。[⑤]

(7) 从分散的小生产者长出资本主义的简单合作(列宁《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5页)。[⑥]

(8) 商业资本,正如吴先生所说,绝对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它是"历史上最古老的自由的资本存在的方式",它在一切社会中都存在过,而且"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其自身说,不足以媒介成又一个生产方式到别一个生产方式

---

① 傅衣凌:《明代苏州织工、江西陶工反封建斗争史料类辑》,第22页;钱宏:《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若干手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第239页。

② 傅衣凌:《明代江南地主经济新发展的初步研究》,第63页;傅筑夫、李竞能:《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第295页;徐文、江思清:《从明代景德镇磁业看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第686页(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3页);吴海若:《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第836页(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3页)。

③ 侯外庐:《17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潮的特点》,第91页。

④ 侯外庐:《17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潮的特点》,第104页。

⑤ 傅筑夫、李竞能:《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第296页。

⑥ 孔经纬:《中国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第467页。

的过渡,也不能把这种过渡说明”(《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404 页)。①

(9) 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在 14 世纪、15 世纪,已经稀疏地可以在地中海沿岸的若干城市看到,但资本主义时期是从 16 世纪开始(《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904 页)。②

上列《讨论集》中学者所引用经典作家的论述很不全面,但也能窥其大略。③这大概可以说明,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不能归结为只是对毛泽东的话的论证、注释。而且当时有不少学者强调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脆弱、微小乃至夭折,事实上他们持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相反,从 90 年代以来对“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批评者的批评看,倒是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即资本主义的逻辑。由于中国事实上没有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从而导致了他们把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当作是对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过渡的论证。这显然是批评者对那个时代学术史的误解。这些批评者将资本主义萌芽及因素的研究,一概归入“欧洲中心论”的范畴,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批评者并没有真正走出“欧洲中心论”的阴影。④以至出现了“许多中国的历史学者甚至以前是资本主义萌芽论者,看到海外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批评之后,马上放弃了自己的体系”的奇怪现象。⑤这也透露出当代史学界在国外理论和观点的冲击下无所适从的倾向,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子。

再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并非开始于毛泽东作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断之后,“在中国最早考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则是吕振羽。吕振羽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是针对新生命派和托派的‘外铄论’而提出来的。这种‘外铄论’认为,中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就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吕振羽则根据历史事实提出,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了新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⑥这一观点吕振羽在 1933 年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

① 陈湛若:《略论红楼梦社会背景——评吴大琨先生的几个论点》,第 714 页。

② 陈湛若:《略论红楼梦社会背景——评吴大琨先生的几个论点》,第 705 页;束世澂:《论北宋时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第 804 页注。

③ 文章中所引用的观点选择与否的标准,是看其所引用的经典作家的观点是否对其论文具有全局性的影响或立论上的指导意义,有则列,没有则不列。

④ 陈支平:《历史学的困惑》,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44 页。

⑤ 陈支平:《历史学的困惑》,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44 页。

⑥ 蒋大椿:《吕振羽史学的始创性贡献》,《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2 期。

济史讲义》和1934年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等文中已作了论述。邓拓1935年发表《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第2卷第4期),1937年发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也都涉及这个问题,后文指出:"在西欧资本主义侵入以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若干条件,但是还很不成熟。"①有的学者指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开始于1930年前后爆发的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史大论战。"②因而,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说成是对毛泽东的论断的注释,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时间上都说不过去。

第三,综观整个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始末,可以发现对这一问题予以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中国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台湾学者甚至是西方学者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如台湾学者刘石吉参加全美中国研究学会(AACS)1987年年会的论文是《明清市镇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综合讨论与相关著作之评介》,其中说道:

> 明清时代地区兴起的市镇,可以说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发源地,这几乎是前此学者所共同接受的观点,综观明清江南市镇历史的发展:宋代以来,直到15世纪末年,可以说是它的萌芽与形成时期;16世纪以后,其成长与发展已十分明显。1500—1800年的三百年间,地方志资料显示这是一段市镇稳定成长时期,尤其在正德、万历以迄乾隆年间,市镇的数量平均增加1～2倍以上,而且有许多市镇达到空前的繁荣。这与明末以来江南一带商业资本主义萌芽,及清初全国统一,恢复安定、和平与社会经济繁荣有密切关系。许多市镇在明清之际,由一个乡村聚落,快速的发展成为地方贸易的中心,且往往成为数千或万户人口的大市镇。这些大市镇多数分布在苏州府城附近及邻近各县。18世纪苏州米市及商品经济之繁盛,可推知彼时正是苏州发展至最高峰的时代,而其临近各市镇,亦多受苏州商业机能的影响而肇兴。③

---

① 邓拓:《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邓拓全集》第一卷(历史卷),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514页。

② 仲伟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学术界》2003年第4期。按: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社会史论战是不同的,似不应混同。

③ 刘石吉:《明清市镇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综合讨论与相关著作之评介》,《社会科学家》1988年第4期。

刘石吉能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这样的论文，国际学术会议能够把这一题目确定为会议的选题，完全昭示了这一研究课题所具有的世界性、世界学术意义。①

日本学者对这一问题也很关注。其中以中国学者翻译的《日本对明清史的研究》②最值得关注。该文以时间为线索，分为"1946—1957"、"1958—1962"、"1963—1967"、"1968—1972"、"1973—1977"年五个部分，对"二战"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史学界对明清史的研究发展历程作了系统的梳理，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史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所涉及问题的关注。③对于明清时代历史的总体看法，日本学者认为："明清时代是中国传统的集约成熟时期，并且是创造近代力量的萌生时代。日本史学界对此从各个方面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④这里所谓"近代力量的萌生"大约与之同时期的中国学术界所探讨的"资本主义萌芽"大致相同。即便是主张"冲击—反应"模式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也部分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在《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和再版《美国与中国》中，承认中国近代化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⑤而费正清的学生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其《亚洲史》中则这样评价明代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1970 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把明代的这些发展趋势称为'资本主义早期的萌芽'，这些见解是非常合理的。"⑥

第二，"情结说"。此说最早见于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

① 参见石锦：《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理论的评价》(杜念中、杨君实编：《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9 年台北版)；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 1986 年版)；布罗代尔：《商业的运转》(Fernand Braudel, The Wheels of Commerce, Civiliation and Capitalism 15—18th Century, Vol. Ⅱ, 1979, New York)。转引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7 页，注释①。

② 本文原为国际历史学会日本国内委员会编撰的《日本历史学的发展与现状》中东亚章中国节的明清部分。它包括 1960 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十一回、1965 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第十二回、1970 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十三回、1975 年在旧金山召开的第十四回、1980 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十五回等会议报告中的有关明清史部分。它包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 1977 年间的日本明清史研究的主要成就的说明。

③ [日]和田清、酒井中夫、佐伯富、田中通彦、奥崎裕司、佐佐木宽著，冬哥、大鹏、松林译：《日本对明清史的研究》，《松辽学刊》社科版 1985 年增刊。

④ [日]酒井中夫撰，松林译：《日本对明清史的研究》之"1963—1967"部分，《松辽学刊》社科版 1985 年增刊。

⑤ 参见王新谦：《对费正清中国史观的理性考察》，《史学月刊》2003 年第 3 期。

⑥ [美]罗兹·墨菲著，黄磷译：《亚洲史》，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96 页。

年第8期)一文。[1]他否定了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奉命史学”的说法,指出毛泽东的著名观点只不过是“当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及爱国者的共同看法”而已,这就决定了这一观点不仅成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史坛的“共识”,而且在80年代和90年代亦仍是中国学人的坚定“信念”。[2]他指出,在没有弄清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对“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命题的认识,就只能是一种尚待证明的假设,以假设作为基础的信念,当然也就只能是一种主观愿望,或一种情结。如同中国学者没有弄清楚“资本主义萌芽”的具体所指,西方学者同样也没有弄清楚“资本主义”的具体和科学的内涵。因而,“以往许多学者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实际上研究的是历史上的商品经济、雇佣劳动、早期工业化或者其他经济变化,而不是资本主义萌芽”。[3]作者最后分析了“资本主义萌芽情结”的实质是由“争气”的民族情态和“单元——直线进化”史观的产物。

许涤新等不同意李伯重的看法,指出:“我们考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也绝不含有‘中国也有’,争一口气的意思。”[4]陈支平也指出:

> 20世纪50年代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学者为探讨中国传统社会资本主义因素成长过程所付出的努力。中国学者的目的是打破东方停滞论,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带有国家和民族情怀。因为这20世纪以及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历史学者抱着国家与民族的情怀而从事学术的研究,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学者们所不能回避的。以美国、欧洲的情景而论,虽然他们十分标榜“学术的自由与公正”,但是他们研究历史学的国家民族政治情怀丝毫不逊色于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尤其是他们中的部分学者在批评中国历史学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就搀杂着某些非学术性的动机,甚至是严重的政治偏见在内。[5]

“‘意识形态’和‘党派偏见’并不必定导致‘歪曲’真相,并不总是消极因素,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某种政治信念和现实追求就没有历史学家执意要弄清楚某些真相

---

① 尽管陈支平曾作《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三大情结》一文,提出20世纪中国历史学具有“政治情结”、“道德情结”、“洋人情结”的观点,但作者并未对“情结”这一术语作出界定(参见陈支平:《历史学的困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6页)。从作者的文意看,陈文“情节”一词,似有特征之意。因而,与李伯重文中的情节似不相同。故不应笼统混为一谈。

② 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年第8期。

③ 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年第8期。

④ 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⑤ 陈支平:《历史学的困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43页。

的动力”。因为“学术史上的‘答案’由学者提出,但‘问题’,特别是那些重大‘问题’,从来都是由‘时代’提出、时代‘命题’、学者‘作文’的,可以说历来如此”。[①]

再说,90 年代以来,在思想解放、学术研究自由的氛围中,仍有不少学者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有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以国际转口贸易和国际金融业务为主要特征的商业资本。[②]有的学者主张,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内部的最初形态。[③]还有人将其定义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是封建社会后期、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时,所萌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④]明代嘉、万年间这种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工场手工业经营,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资本主义萌芽。[⑤]这些研究,其认识水平已较以前深入得多,完全是学术研究,而没有什么任何“情结”。

而且,“资本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聚讼甚多”的问题,从西方学术界对“资本主义”难以作出让绝大多数人都认可的定义并不妨碍对资本主义的学术研究,对“资本主义萌芽”没有达成共识,也应不妨碍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对“资本主义”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能废除资本主义这一术语一样,“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学术界也同样不能被废除,这是因为:“作为概念的‘资本主义萌芽’虽来自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经典理论,并不直接对应于中国历史,但却是我们进行具体研究的定向前提。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抽象概念,对具体对象的叙述也就只能就‘机工’而说‘机工’,就‘机户’而说‘机户’,虽然不会出错,但却是正确而无效的同义反复。”[⑥]这种研究所造成的弊端可能是历史研究的破碎化、繁琐化,而与宏观的历史考察无补。

3. 研究新趋势——比较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深入,[⑦]中外现代化研究和经济史研究的兴起,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被纳入到中外比较的视野,并呈现出强劲的发展趋势。

---

① 王学典:《放逐“现实”回避“问题”:90 年代学风的致命伤》,《山东社会科学》2004 年第 8 期。

② 张跃发:《近代文明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 页。

③ 陈勇:《国史纲要》,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86 页。

④ 张研:《清代经济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58 页。

⑤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1 页。

⑥ 胡成:《“资本主义萌芽”与本土化研究的思考》,《史学理论研究》1999 年第 2 期。

⑦ 根据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的统计,1949—1982 年 4 月学术界发表的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文章共计 302 篇。其中,1978—1982 年 4 月有 94 篇,约占总数的 1/3。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比较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80—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多是从中外封建社会史、经济史、现代化研究等角度对资本主义萌芽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称之为实证比较阶段。其中的典型是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讨论,如王宏钧《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三百年》(《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庞卓恒《西欧封建社会时间较短的根本原因》(《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孔经纬《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主要经济根源——1982年10月在广州中国封建经济结构问题研讨会上的大会发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4期)、龙锦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索微》(《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3期)等。其中,庞文具有明显的自觉比较意识,是20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研究的典范之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批比较研究的代表作,如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郝侠君等主编《中西500年比较》(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版)、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等书。其中后两书均有专文对中西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把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推向了深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将比较研究方法运用于中西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尽管取得的成果是初步的,但对于新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的探索却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阶段仍有资本主义萌芽比较研究的实证成果出现,另有一些成果凸显了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反思基础上的比较研究特征,可称为反思比较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既对以往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进行反思,又在反思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资本主义萌芽的比较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比较研究成为一大发展趋势。中国学者的代表性论著有张国臣《中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比较研究》(《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黄凤兰《经济振兴当以史为鉴——中英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原因之比较》(《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严立贤《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段建宏《封建社会后期中西手工工场之比较——再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6期)、厉以宁《资本主义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等。在中西比较方面产生较大影响的国外学者,有马科斯·韦伯、白乐日、琼斯、王国斌等。此外,对中国明清时期

进行研究的外国学者如费正清、弗兰克、彭慕兰等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当然应该注意:“在西方学者逐渐认识到东方停滞论并不完全正确时,一些学者也从比较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问题。无可否认,他们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兴起的模式,完全是西方的,是拿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的。”①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比较研究,由于研究者大多具有较宽广的研究视野,使得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相当的深度和新意,而且也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从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中国史研究课题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史研究的课题,成为资本主义起源问题这一世界性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课题,引起了国际史学界的关注。这恰好说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是一个学术课题,并非是“伪命题”,也谈不上有什么中国情结或意识形态情结。

4.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学术意义及其局限性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历史意义,许涤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中已有较为详尽的论述,②此不赘述。

有三点社会意义可补充:第一,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性热点问题,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很显然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鉴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占有的地位和影响,对于事实上没有经历过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探讨一下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的原因,以便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应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第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事实已经同方兴未艾的现代化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了。现代有的学者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近代化发展的两大标志之一。国内也有一些学者把资本主义萌芽当作现代化启动的前提和内因。因此,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事实上与现代化研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第三,对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对于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规律,对于灵活理解历史的复杂性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从学术意义来说,至少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的持续与深入,在很大程度上使明清史研究,尤其是明清经济史研究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性的研究领域。半个世纪以来,致

① 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导论》,学林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 页。
② 许涤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2 版,第 29—36、726—753 页。

力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中国大陆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受到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日本、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可以说国外对大陆史学的许多认识和了解，就是从接触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探讨开始的。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突破了长期支配中国传统史学的那种'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的狭隘眼光，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加以研究，从而促使中国史学摆脱了原有的封闭状态，成为国际现代史学的一个部分"。①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学术意义的估计并不仅仅在其所取得的学术成果本身，更应把它放到整个中国现代史学史中加以考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一研究领域及以往研究者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将会受到更大的重视。

其次，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持续探讨，促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学科建设。恰是由于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大大促进了史料学和文献学的建设。为了进行研究，"人们几乎翻遍了这一时期丝织业、棉纺业、矿冶业、农业、商业、手工业、市镇等方面的有关资料"，②还大量征引了正史、官书、奏议、地方志、笔记、文契、账簿甚至档案材料。这些材料的整理不仅为后世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乃至明清史进行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史料和文献基础，而且事实上也丰富和完善了史料学和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界对江南市镇的研究，"特别是对地域性商人集团和乡村市镇的研究，开创了中国区域史研究的先河"。③对于社会经济史，"从国内的情景而言，今日历史学界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基础，都是在那个时代奠定的"。④

再次，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探讨有力破除了史学研究中"欧洲中心论"的迷信。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使史学工作者对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同时，"这个研究打破了自黑格尔以来盛行于西方的'中国停滞'论及本世纪中期以来流行的'冲击——回应'模式的束缚，使得我们能够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历史，并把研究的重心放到中国自身，着重从中国内部去发现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⑤当然彻底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还任重道远。

---

① 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现代中国史学》，《历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② 王学典：《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文史知识》2002 年第 1 期。

③ 陈支平：《历史学的困惑》，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50 页。

④ 陈支平：《历史学的困惑》，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50 页。

⑤ 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现代中国史学》，《历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复次，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对于中国现代史学中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研究方法的提升、改进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对“资本主义萌芽”讨论提出尖锐批评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讨论在中国现代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还引发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大争论，并且对 90 年代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也具有重大影响”。[①]正是在这绵延不断的研究与探讨中，对商品经济、雇佣关系、工场手工业甚至自然经济、封建社会等理论问题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经济史研究的计量方法、比较方法等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在对资本主义萌芽本身的研究上，方法和理论也有明显的改进。这对于中国经济史学之社会科学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②]

最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不仅促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化，而且极大地改善了学风。当时就有学者对讨论过程中出现的不够严谨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若干年来在讨论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文中，好些作者都运用徐一夔‘织工对’的材料来说明资本主义萌芽于明初。但没有深究‘织工对’的年代与职业问题。究竟它能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的萌芽呢？近年来有些同志对此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明确了一些问题。由此可见，对史料的深入考证与分析，对研究历史科学还是基本的工作。今后如何集中力量，广泛调查与收集有关资料，进行严格的分析，对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十分迫切的。”[③]此类批评，推动着学者们改进学风，推动着理论研究、资料研究及理论与资料的结合研究更加实事求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有更多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论著问世，这些研究成果的学风之严谨，也得益于吸取了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经验教训。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当然不能视而不见。毋庸讳言，当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教条、机械的倾向。有的研究者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抽象地谈论资本主义萌芽；有的学者在研究具体历史的过程中又存在着简单化的弊端；意识形态色彩也有较明显的反映，这些都是应该引以为训的。[④]

---

①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6 页。

② 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现代中国史学》，《历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③ 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 · 前言》，三联书店 1960 年版，第 4 页。

④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学术意义及其局限性分析，还可参见赵晓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研究与论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第七章《资本主义萌芽论争的学术意义及历史局限》。

（四）中国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

一般来说，只有以不堪忍受残暴的剥削和压迫，以推翻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为目标的农民斗争，才能称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左传》、《史记》中就有记载。以后历代史书中也都有记载。但大部分的中国古代史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对农民起义大多怀有偏见，大多按照封建"正统"观念、按照"成者王，败者寇"观念来记述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近代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虽然高举'史学革命'的大旗，以批判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为己任，但在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上，仍未越出传统观念的樊篱。真正对农民战争作出肯定评价的是 20 世纪初的革命派人士"。[①]20 世纪以来，不断有学者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进行研究。出版的论著中，除了周谷城 1930 年写成的《中国社会之结构》、蔡雪村《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亚东图书馆 1933 年版）和薛农山《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分析》（神州国光社 1935 年版）等书，对农民起义的评价是较之前代史家有了深入，但总体来看，仍然是否定的多、肯定的少。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指导研究，才使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翦伯赞《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学习》1951 年第 3 卷第 10 期）、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历史研究》1959 年第 3 期）、宁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农民政权问题》（《新建设》（《1960 年 10、11 月号》）、白寿彝《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性质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 年第 1 期）、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 年第 4 期）、孙祚民《关于中国农民战争中的皇权主义的问题》（《历史研究》1961 年第 5 期）等文章，都是农民战争研究的代表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农民战争的主要研究成果，可见历史教学月刊社编《中国农民起义论集》（50 年代出版社 1954 年版），赵俪生等主编《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新知识出版社 1954 年版），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新知识出版社 1956 年版），李光璧等编《中国农民起义论集》（三联书店 1958 年版），景珩、林言椒主编《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 1961 年版），史绍宾主编《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等。此外，当时出版的专著有刘开扬《秦

① 侯云灏：《从 30 年代的两部中国农民战争史论著看早期中国农战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7 年第 3 期。

末农民战争史略》(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漆侠等《秦汉农民战争史》(北京三联书店 1962 年版)、洪焕椿《明末农民战争史略论》(江苏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等等。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侧重于对中国历史上较有影响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进行梳理、发掘。如王天长《陈胜》(《光明日报》1951 年 11 月 17 日)、黄祖长《项羽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文史哲》1955 年第 9 期)、赖家度《从南朝氏族制度看唐寓之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历史教学》1952 年第 6 期)、柳春藩《北魏初期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史学月刊》1957 年第 2 期)、季镛《唐太宗"贞观之治"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光明日报》1953 年 5 月 30 日)、谷祖英《翟让究竟是在哪一年起义的》(《光明日报》1953 年 11 月 14 日)、韩国磐《黄巢起义事迹考》(《厦门大学学报》1956 年第 5 期)、何鹏毓《北宋末年方腊的农民大起义》(《新史学通讯》1951 年第 1、8 期)、吴晗《元末红军起义》(《新建设》1954 年第 11 期)、金毓黻等《李自成被害地点已经考定》(《历史研究》1956 年第 6 期)、童书业《李自成死事考异》(《山东大学学报》1957 年第 2 期)、孙次周《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历史研究》1957 年第 1 期)、来新夏《反清的秘密会社》(《历史教学》1956 年第 10 期)、陈诗启《试论清代中叶白莲教大起义》(《厦门大学学报》1956 年第 3 期)等文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这一特点的反映。这也就使得中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用这么一条线索贯串出来。当然这种研究,现在看来是初步的,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史上的意义却是不容忽视的。二是研究了一些与中国农民战争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尤其是 1958 年至"文革"前这段时间,史学界就农民战争的性质、农民政权的性质、让步政策和皇权主义、平均主义以及两者的关系、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等问题展开了探讨。

"总体来说,50、60 年代关于中国农民战争问题的论争是一个学术问题,论者往往根据大量的史料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论者主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上来讨论问题,当然,阶级的观点是此时期探讨中国农民战争的主要观点"。[①]同时,"把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之间的关系的论断,作为讨论中各种意见的指导思想"。[②]这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是不

---

① 王兆胜等:《回读百年:20 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第三卷,大象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20—821 页。

② 姜义华等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 · 历史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05 页。

该回避的事实。

以下叙述当时讨论的几个主要理论问题及主要观点：

1. "让步政策"论与"反攻倒算"论

1951年，翦伯赞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一文中提出："中国历代以来的农民暴动，虽然一个跟着一个失败，没有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但每一次大暴动都或多或少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因为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①]这被当时的史学界称为"让步政策"论。1963年，翦伯赞作了进一步阐述："在经历了一个大的农民战争之后，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恢复封建秩序，稳定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有时对农民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但不是对每一次农民战争都让步，他们对于那些小的局部的农民战争是不会让步的。让不让，让多少，这要决定于阶级对抗的形势，决定于农民战争带来的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变化。不要毫无分析地在每一次农民战争之后，照例写上一节封建统治阶级的让步。"[②]漆侠对此也作了阐述和发挥："在推翻残暴黑暗的专制统治的同时，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对新的封建统治起着一种极大的改造作用。这种改造作用表现在：新当权的封建统治集团在革命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农民实施让步政策，从而对当时人民最痛恨的剥削制度某些环节加以改变或调整，缓和和减轻了剥削压迫的程度。"[③]漆侠把让步政策概括为"革命斗争——被迫让步，再斗争——再让步"的公式。可以认为这是"让步政策"推动历史前进的最简洁的表述形式。

1965年9月22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第315期发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孙达人的文章《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文中强调："伟大的农民战争冲破了封建罗网，根本改变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才使农民获得了自由。相反，在农民战争失败之后，新建政权的'让步政策'实质上恰恰就是剥夺农民夺得的这种自由，重新束缚农民。"同时认为，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表现在推翻和改造了封建

---

① 翦伯赞：《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学习》1951年第3卷第10期；《历史问题论丛》，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5—76页。

②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3年12月22日。

③ 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07页。

王朝，削弱了封建的生产关系，没有什么根据说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非要透过“让步政策”不可。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十分赞赏。这年 12 月 21 日，在杭州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到他对这篇文章的看法：现在出了个小将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孙达人的文章，只讲古代，不讲近代；看了近代史，这个问题就更明白了。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是“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这时得到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慈禧和皇帝逃跑了。以后慈禧就搞“扶洋灭团”。[①]“反攻倒算”论就这样产生并得到毛泽东的肯定。

还有一种折中的观点。如朱绍侯认为：“农民战争过后，封建统治阶级实行的政策是让步政策与反攻倒算兼而有之。统治者经常是让步政策与反攻倒算互用、并用，甚至在同一个政策、同一个诏令中，就是两者都有。”[②]

1966 年 3 月起，“让步政策”开始被当作反动的史学观点加以批判。正常的学术研究和讨论中断。“文革”时期对“让步政策”的批判进一步升级，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让步政策论”必须再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西北大学历史系编《“让步政策”批判集》（西北大学出版社 1973 年版）等书相继出版。“文革”结束后，正常的学术研究和讨论恢复，“让步政策”和“反攻倒算”的争论在史学界又被重新提起。[③]

“让步政策”与“反攻倒算”都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采取的措施，都是为巩固其统治服务的。让步政策，是相对于前统治者而言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过后，新统治者就其整体的统治政策作出一系列的调整，是社会发展形势的必需。当然封建统治阶级的让步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反攻倒算则是相对于参加过起义和斗争的农民而言的。其针对的范围相对于让步政策来说要小些。

“让步政策论”和“反攻倒算论”是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农民战争研究中的两个视角，都属于阶级斗争意识在历史研究领域中的表现，两者不应截然分开。让步是反攻倒算基础上的让步，让步后会有反攻倒算，反攻倒算是让步之外的一种统

---

① 参见穆欣：《毛泽东与〈光明日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23—424 页。

② 朱绍侯：《关于历史发展动力和农民战争作用问题》，《河南师大学报》1980 年第 1 期。

③ 参见柳植：《谁是历史的主人——略谈秦末农民起义与西汉政治的关系》，《陕西师大学报》1977 年第 1 期；厚安：《论朱元璋——兼评“让步政策”》，《甘肃师大学报》1977 年第 3 期。

治手段。一个封建统治者往往会“让步政策”与“反攻倒算”并用，即所谓刚柔相济。把处于矛盾统一体中的双方绝对对立起来，不恰当地强调一个方面否定另一方面，就很可能造成认识和评价上的片面、偏差。

2. 平均主义和皇权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较早在文章中对平均主义进行论述的是赵俪生。他在1953年写的《恩格斯怎样分析德国的农民战争》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许多次农民起义和战争，空想的，亦即乌托邦的理想，是很多的。”①此文尽管没有具体提出“平均主义”的概念，却已涉及中国历史上的“平均主义思想”，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的评价。

关于平均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大陆的史学工作者看来，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中国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且每个时期都具有不同的特点。有学者指出：“随着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作为封建社会内基本阶级之一的农民阶级，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首先就是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发展，在唐宋的农民起义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表现，宋代又比唐代为突出。到了明代这种平均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提出了像‘平均土地’这样具有革新土地关系意义的口号，而且还勾画出一个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图案。到了太平天国，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就发展到了更高阶段。”②

如何认识、评价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有的学者指出：

> 农民群众的这些“均贫富”、“均田”的口号，在历史上始终并不曾成为现实，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也并没有消灭过封建的社会制度。这是不难理解的。农民阶级不是埋葬封建社会的阶级，……当起义者一旦想把这些口号付诸实现时，就会发现：当时的经济条件中并没有提供其实现的客观基础。那些动人的口号、天真的幻想也就不能不在现实面前化作浮云而消逝。……尽管这些思想还并没有发展成为像列宁所说的19世纪俄国革命时代那样的“平均”、“平等”思想。……但是它仍然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它是小生产者、小所有者的产物，同时又是在当时条件下对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土地兼并猛烈反抗的产物。它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空想，但又是在起义过程中起过极大

---

① 赵俪生：《恩格斯怎样分析德国的农民战争》，《赵俪生文集》第一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页。

② 戎笙：《试论明代后期农民阶级斗争的性质和特点》，《历史研究》1958年第10期。

动员作用的空想。①

对于农民阶级平均主义产生的根源，有的学者作了如下的分析："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都消灭了一部分地主阶级分子，均分了一部分地主的土地，或者把部分地主的土地以其他形式分散到农民手上，使沉重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多少被减轻了一些，因此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没有一次古代的农民战争，会触及到封建剥削与封建压迫的另一个社会基础，即这个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生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正是在这个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新的封建剥削关系，土地重新从农民手上流入另一批地主手中，农民仍然要承受沉重的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②这里不仅指出了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产生的根源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且还从理论触及到农民阶级的皇权主义思想存在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即为什么"农民反对封建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③事实上，平均主义思想，作为封建社会中朴素的思想之一，也只能是皇权主义下的平均。在很大程度上，皇权主义是实现平均的保障之一。皇权主义之所以也会存在于农民阶级的思想中，是因为皇权或许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够做到一定限度的"平均"。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农民阶级要反对的从来就不是皇帝制度、专制制度，更不是什么抽象的封建主义，而是反对使他们的生活进行不下去的豪强劣绅、贪官污吏和无道昏君。这既是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皇权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农民阶级对所谓的"清官"、"好皇帝"的向往和歌颂，这在历代都可以找出一些例子来，而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对封建社会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冲击和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和皇权主义理想的具体实施。如果说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思想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中的表现的话，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则可以将皇权主义思想看作是农民阶级在政治上的理想和要求。

对于农民阶级的皇权主义思想，宁可强调："农民尽管从地主阶级那里接受了皇权主义的影响，但却对它进行了改造，使得它呈现了封建皇权主义不曾有过的新的、复杂的、革命的内容。因此，片面夸大农民的皇权主义思想和农民战争的皇权

① 蔡美彪：《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② 陈嘉铮等：《论"四权"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关系》，《学术月刊》1960年第12期。

③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3年12月22日。

主义性质，或把它看成跟地主阶级的皇权主义一样，都是错误的。”[1]这样的论述反映了当时的研究深度。

中国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的讨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仍在继续和深入。其中董楚平的观点，在这方面具有较大的影响，而其观点系统化的代表著作是《农民战争与平均主义》（方志出版社 2003 年版）。

3. 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

关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毛泽东 1939 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曾作了论述：

>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2]

毛泽东说的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给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予以充分肯定，这成为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评价农民战争的指针。直到“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被否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确立，农民战争是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才开始展开讨论[3]。

1979 年 10 月 23 日，董楚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

---

① 宁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皇权主义问题》，《光明日报》1960 年 12 月 13 日。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25 页。
③ 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可参见《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一节。

力》一文，对“把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看作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真正动力”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说：

> 长期以来，我们把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看作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真正动力。有的同志甚至把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都归功于农民战争的推动，认为每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都起过这种推动作用。“四害”横行期间，有的地方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仅仅归结为农民战争史，按照农民战争史进行分期。他们一方面把农民战争的作用抬到如此吓人的高度，另一方面又说每次农民战争都是失败了。既然失败了，又怎能推动社会发展呢？既然每一次都推动了社会前进，又怎能说都是失败的？
>
> 其次，既然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每次较大的农民战争都起过推动作用，而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举世无双的，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理应发展很快。事实却不是这样，中国封建社会时间漫长，发展缓慢。为什么动力最大，而速度很慢呢？相反地，欧洲有些国家几乎没有农民战争，也就是说几乎没有动力，或者说动力很小，却偏偏较早进入资本主义。这是为什么？
>
> 有人鼓吹阶级斗争万能论、暴力万能论，把阶级斗争说成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动力的大小与暴力的大小成正比，阶级斗争越尖锐、越激烈，社会就发展的越快，一切缓和阶级矛盾的改良措施只能延缓甚至阻碍社会的发展。翻开中国古代史一看，却不是如此。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的西汉初年，隋文帝时期，唐、明前期社会发展最快：一旦矛盾尖锐化，发展速度就慢下来，甚至停滞倒退。这又是为什么？①

董楚平不同意农民战争完全失败的观点，但不主张把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抬得过高（又见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 年第 1 期；《农民战争补说》，《史学月刊》2005 年第 7 期等）。董楚平的观点，有人赞同，也有人不赞同。如周良宵等发表《关于农民战争的任务和作用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80 年第 4 期），就对董楚平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有的学者指出，董楚平“偷换了概念”，“对‘唯一动力’论进行了‘质疑’，就中竟把‘真正动力’和‘唯一动力’两个不同的概念，放在等同的地位，质疑起‘真正动力’

① 董楚平：《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光明日报》1979 年 10 月 23 日。

论来了”。[①]应该清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毛泽东，提到过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推动力、直接动力及真正动力，但没有说过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大陆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论不多见，更不是主流。60 年代，特别是“文革”时期，随着“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形成、发展，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才成为主流。[②]“唯一动力”论，是不合辩证法的，应该否定。但阶级斗争是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农民战争是不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可以研究的。“唯一动力”论与“真正动力”论似应区别对待。

对于农民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史式比董楚平更进一步指出：“正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所以农民起义的次数就多；也正因为农民起义的次数很多，所以让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也就很长。换句话说，农民起义不仅不能推动历史快速发展，而且往往会造成一种循环，即旧的王朝倒塌了，新的王朝又建立起来，有时甚至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③]有的学者论太平天国运动时说：“太平军引起的长达十几年的内战和反文明的政策，打断了中国探求近代化的可能。”[④]

苏双碧则不同意农民战争阻碍了历史进步的观点，指出：“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每一次大的农民起义都严重地打断了封建化进程，断送了封建化所取得的成果，并使社会重新退回到封建化的起点上去。因此，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农民战争非但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历史进步’。……所有这些，也是有片面性的。因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总是爆发在封建王朝极端腐败、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而停滞不前的时候。封建统治阶级没有能力来调整社会出现的危机，而使历史继续向前发展的。”[⑤]这时，“唯有借助农民战争力量的推动，才能扭转这种被迫停顿的历史局面。因此，农民战争是具有扭转乾坤的作用的，它的伟大功绩是不可低估的”。[⑥]宁可也指出：“从一段长时期看，农民起义对社会生产的

---

① 范传贤：《正确评价农民战争的革命意义和历史功绩》，《福建师大学报（哲社版）》1984 年第 1 期。

② 参见宁可：《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 年校庆增刊。

③ 史式：《太平天国不太平》，重庆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13 页。

④ 潘旭澜：《太平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 页。

⑤ 苏双碧：《百家争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苏双碧史学理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99—400 页。

⑥ 苏双碧：《对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历史评价——为翦伯赞先生学术纪念会而写》，《苏双碧选集》，华星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85—586 页。

继续和发展是有利的，起义中的破坏则是不得已而付出的代价。否定阶级斗争的作用，把暴力和革命在一定时期给生产带来的破坏归之于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斗争，无视这种斗争是统治阶级剥削、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必然结果，是统治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看不到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正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一种表现，缓解或消除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为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开辟了道路，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错误的。”①

4.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农民战争研究的评价

董楚平认为：“长期以来，关于农民战争的作用问题，存在着三个现成的结论：一、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二、农民战争全部失败；三、每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都能推动社会前进。我们研究农民战争都忙于为这些结论作注释，而这三个结论本身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②

黄敏兰认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农民战争研究，一、理论对解释史料有误导；二、无原则地美化起义者；三、随意确定史料的真伪、歪曲史料等等。③

余焕卿不同意黄敏兰的观点，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所以农民起义的原因就是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同时，起义者的阶级成份是贫苦农民，战争也就具有了革命的性质。黄敏兰认为这样的理论是错误的，这是片面的。黄敏兰认为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九宫山、被当地武装突袭而死说是为了美化农民领袖，是为了服从某种“时代背景”，是“为了政治的目的却偏要掩盖历史真相”。这是“用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者不能认同的说法，来批评一种完全不存在的现象”，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余焕卿强调：40年来，关于农民战争出版了300多部著作、4 000多篇论文，那么，存在着黄敏兰所举失误的占多大的比例？黄敏兰在撰文之前是否翻阅过它们的大部甚至全部？从文中所举的作品来看，没有超过10部(篇)。④

有人提出50年代就不应搞农民战争史研究。漆侠回答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她要改造这个社会，改造各个学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对过去史学著作中对农民起义称‘盗’、称‘贼’的局面应不应该改变？

① 宁可：《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校庆增刊。
② 董楚平：《农民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浙江学刊》1980年第1期。
③ 黄敏兰：《评农战史专题中的严重失实现象》，《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
④ 余焕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战史的评价问题》，《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所以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一门学科。建国以来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总的来说有成绩，有拔高农民战争的观点，也有说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修理工'的错误观点。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否定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这是一门新的学科，是一门适应时代需要的学科，不能轻易地否定它。"①

有人提出前十七年的历史研究把中国史变成了农民战争史，林甘泉回答说，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不少史学工作者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把农民起义的革命性和历史作用拔得很高。这种错误观点当然应该纠正。但是前些年流行一种说法，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历史研究把一部中国史变成了农民战争史。这种说法我不赞成"。②

孙祚民也认为，完全否定前十七年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是错误的，并分析了原因，说："随着我国近年来对外开放和学术交流，这些形形色色的史学观点也传播进来。有的同志由于缺乏洞察实质的识别能力，竟然把它们当成了'现代科学的崭新思想和有力的方法'。反过来则把通过剖析社会经济结构探求历史发展终极原因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说成'变得无能为力'。甚至大声疾呼要使'现代科学的光芒照进晦暗迷人的历史研究中来！'这就在客观上把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体系，放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之上，并贬低以至否定了我们史学研究的卓著成绩，显然是十分错误的。"③

余焕卿还从另一角度评价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如果说研究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是近年来中国史研究者的一个共识的话，那么研究下层民众的历史，也是国际史学在'二战'以后的新动向。可怜而又可贵的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们史学界只有农战史研究与这一新动向符节若合。尽管这只是一个侧面，但毕竟还是有对这一领域的贡献。"④

5.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还有没有前途？

有人认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几乎冷落到了门

---

① 漆侠：《马克思主义是认识历史最有效的工具》，邹兆辰、江湄、邓京力：《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页。

② 林甘泉：《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邹兆辰、江湄、邓京力：《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页。

③ 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史哲》1984年第5期。

④ 余焕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战史的评价问题》，《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可罗雀的地步。①实际情况可能并不尽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来，还是出版了一批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著作，如《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第一卷（孙达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农民战争简史》（谢天佑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明末农民战争史》（顾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卷》（朱大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农民战争史·隋唐五代十国卷》（李斌城，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孙祚民主编，孟祥才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朱大昀主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农民战争史·宋辽金元卷》（孙祚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十大农民起义》（王家范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瑶族农民起义史》（邓有铭等著，漓江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近代各族农民战争考论》（张山，华语教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华古代农民战争》（李言，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白光耀编著，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关于隋末农民起义的若干问题》（胡如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末路英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冯克诚，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不平则鸣：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周力，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农民战争与平均主义》（董楚平，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农民问题——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第十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孟祥才，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农民战争史论辩》（岑大利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生存与抗争的诠释：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臧知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著作。这说明了农民战争史研究似乎还取得了一些进展。

究竟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还有没有前途？还能不能发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应该乐观些。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对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多层次、多系统研究还有待于展开。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研究农民战争历史作用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绝对的'动力'或'阻力'这样纯粹定性分析的争论上，而应当作系统研究和多层次分析。可以把封建社会结构按横的方面划分为统治系统、生活系统和剥削系统，由于各系统职能的差异，农民战争对它们的影响和作用也不会相同。同时也可以从纵的方面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对现存封建结构的作用，可称为近期影响；二是对农民战争以后新建立的封建

① 丁云：《中国农民战争史第九次学术讨论会述要》，《理论前沿》1997年第2期。

结构的作用，可称为中期影响；三是对整个封建结构发展趋势的作用，可称为远期影响。作系统的和多层次的研究分析，将会有更多的说服力。"①

第二，对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多领域多学科研究还有待于展开。有的学者提出了太平天国社会史研究具体的构想，主张对太平天国的各类人物（从领导层、将领到士兵、基层行政人员等）分别作为太平天国本身的构成因素，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或选择太平天国境内的某个县或乡镇，研究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官民关系、生活、社会风习在太平天国统治前后是否有所变化，与清统治区是否有所异同。②如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1996年出版的《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一书，从社会史的角度对相关史事进行剖析，从而勾勒出一幅新颖生动的太平天国史画卷，是值得借鉴的。

第三，不仅中国的资料需要进一步挖掘，国外的资料更需要挖掘。如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续编，就是国内资料的新挖掘。而西文资料也是太平天国史料的一大宝库，可以大大弥补中文记载的不足，但国内学者挖掘利用西文资料的情况却一直很不理想，从而使研究的深度受到限制。倘若能够重视利用西人原始著述，重视吸收、借鉴西方学者论著中的相关研究成果，无疑会有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茅家琦教授利用外文资料研究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③

可以说，从社会史、经济史、宗教史、中外交往史、环境史、灾难史、历史心理学等学科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进行新的研究，仍是学术研究的需要，仍有广阔的学术前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不会成为"死学"。

有的学者论革命史研究说："革命史的研究虽然年头已久，但还有很多领域待开拓，一些禁区待打破。'危机'是有的，但那是僵化思想的危机，'从原理到结论'或'以论代史'的危机，而不是革命史本身的危机。"④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也是这样。

当然，要使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不因为随着历史研究角度和范式的转换而变得凋零、衰落，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以及80年代和90年代的农民战争史

---

① 李桂海：《农民战争历史作用问题之我见》，《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3期。

② 参见王庆成：《我研究太平天国史的经历和体会》，《习史启示录——专家谈如何学习中国近代史》，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119页。

③ 夏春涛：《20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④ 董正华：《多种"范式"并存有益于史学的繁荣》，《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

研究进行总结和反省，在理论指导、研究方法、史料的搜集等方面都进行开拓和创新，是必须的。这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再次走向繁荣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正如有的学者所论："从学术自身发展的要求出发，围着意识形态转的现象应该得到改变。对于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研究来说，今天是到了一个需要认真回溯、总结、清理并使之终结的时代。但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一直延伸进今天的时代，农民问题、农民的历史和现状，是我们认识国情的最为重要的方面。所以，抛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和农民问题研究、乡村社会研究等等，仍是一个需要深入开掘的领域。……希望从新的历史高度对之重新审视，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反思的精神，清理以往的研究，开拓新的思路，以期使被极度冷落的农战史研究，再次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并绽开出比传统的'五朵金花'更为娇艳、也更富有生命活力和科学魅力的史学鲜花。"[①]

（五）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关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可上溯到梁启超。他在《五千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对"中华民族"的源流、演变作一大致的梳理。此后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其中，较有影响者是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光华书店1948年版）等。[②]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界对民族问题进行的研究，存在一些问题，50年代初有学者指出："中国史学者向来对于种族与民族没有明确的科学概念。资产阶级学者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把民族看作永恒存在的人们生活共同体，却不是看社会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例如孙中山先生解释民族构成的因素，为血统、语言、宗教、风俗、生活等，他不但忽略了民族形成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之联系性，而且把血统列为民族构成的要素之一，把种族与民族混淆起来，把民族看作种族或部落组织的延续与扩大，这样，也就是说民族是永恒存在的东西或超历史的范畴了。到了蒋介石反动派政权建立以后，中国法西斯的大汉族主义者，更是否认了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存在，认为各少数民族都是'百世一支'的黄帝子孙，显然是荒谬绝伦的谰言。由于这种反动思想的传播，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家，对种族与民族这两个名词的使用，固然十分混乱，就是进步的史学界，对这个问题也常发生错误，如吕振羽在其《中国民

① 史学月刊编辑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笔谈》，《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

② 关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发展史，可详见王东平：《中华文明起源和民族问题的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族简史》的初版序言中也对自己的著作在民族问题的认识上作了检讨。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种族与民族究应如何看法，是需要作深入的研究。”[①]那时的主要问题是：首先，把民族看作是一个超历史的范畴，是纯思辨的概念；其次，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和种族问题还没有作深入的辨析。20 世纪 50 年代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就是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展开的。

斯大林曾给“民族”下了一个定义：“民族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②]也谈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民族形成的推动，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③]苏联学者格・叶菲莫夫根据斯大林的观点，1953 年撰文提出：“中国民族曾具有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民族所固有的许多特点，它是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间形成。”[④]这引起了中国史学界的高度关注。范文澜在 1954 年第 3 期《历史研究》上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提出了汉民族秦汉时期开始形成说（详下）。于是中国史学界就此展开了讨论。除了叶菲莫夫的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间形成说，范文澜的秦汉时期开始形成说之外，还有明代后期形成说，这以杨则俊为代表，从清代起形成说，以康拉德为代表。[⑤]到 1957 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由三联书店出版，可以看出当时讨论的盛况。

1. 秦汉时期汉民族形成说的讨论

1954 年，范文澜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中即根据斯大林的定义，指出秦汉时期的汉族已经具备了形成为民族的基本特征：“《礼记・中庸》篇托名孔子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中庸》篇所谓今，显然是指秦统一以后，这与《史记・始皇本纪》所记秦始皇的统一措施是符合的。荀子的学说通过李斯在秦朝实现了。按照四个特征，‘共同的语言’就是‘书同文’。李斯作小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书或不正，辄举劾之。这说明自秦汉起，用以表达语言的字体全国完全一致，更不用说语法结构上的一致了。‘共同的地域’就是长

---

① 黄元起：《中国历史上的种族与民族》，《新史学通讯》1954 年第 1 期。

②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8 页。

③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6 页。

④ 格・叶菲莫夫：《论中国民族的形成》，苏联《历史问题》1953 年第 10 期，中国《民族问题译丛》1954 年第 2 辑。

⑤ 参见张正明：《试论汉民族的形成》，《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44 页。

城以内的广大疆域。‘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状态’就是‘行同伦’。”[1]至于“共同经济生活”，范文澜着重论述了秦汉时的经济联系问题与不同范围的国内市场形成问题。文章引用了战国以来的一些历史资料，说明国内交通已经发达，商品流通在经济生活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样便自然形成了国内的大小市场。还指出了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的不同之处：中国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恰是在大小市场的联系下将地主大工商豪华的经济生活与农民小工商苦辛的经济生活联系起来。总之，“共同的经济生活”在秦汉时期也已经具备了。“汉民族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并不是因为有了资本主义才开始成为民族的。斯大林给民族下了定义：‘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斯大林又说：‘必须着重指出，把上述任何一种特征单独拿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不仅如此，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页）依据上述原理来看中国历史，自秦汉时起，可以说，四个特征是初步具备了，以后则是长期的继续发展”。[2]

范文澜的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揭开了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的序幕。当时有一些学者支持，也有一些学者不赞同[3]。

官显指出：“秦统治者统一文字是事实。但这并不等于说秦统治者统一了语言。范文澜同志的错误就在于认为秦统治者统一了文字，就统一了语言。把文字的统一和语言的统一混为一谈。”[4]蔡美彪指出：“范文澜同志举出长安、苑、临淄、邯郸等市场，这些大小市场的存在是肯定的，但它们都还是局部的地方性的市场，而不是全民族的统一民族市场。……秦汉以来已有经济联系也是事实，但这种联系仍然不外是部族范畴的‘封建经济所允许的联系’。它和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经济联系，有着本质的差别。”[5]张正明指出：范文澜所主张的“中国在战国和秦汉时，商品交换已经占有重要地位，大小市场和经济中心已经形成了”的观点是错误的，

① 范文澜：《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页。

② 范文澜：《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6页。

③ 林征：《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新建设》1955年第10期。

④ 官显：《评“独特的民族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2页。

⑤ 蔡美彪：《汉民族形成的问题——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42页。

原因就在于“忽视了民族市场与非民族市场的重大区别。明代后期以前的市场，其实还称不上是民族市场——统一的国内市场。……范文澜同志既然忽视了民族市场与非民族市场的区别，也就分不清民族与部族的区别，所以难怪会把‘自秦汉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前’的汉人共同体称为‘独特的民族’了，其结果必然是在实质上否定了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历史范畴”。[①]这些认识显然受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观点的影响。

嵇文甫指出：“如果照斯大林的说法，中国历史上的汉族，只好说是部族了；但是如果说汉族是部族，也有事实上的困难。范先生肯定说，汉族不是资产阶级民族，也不是部族，而是在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东西，所以也叫它为民族；因为它具有民族的四个特征。中国在秦汉时代已经开始了民族形成的过程，担任民族形成任务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封建地主。很明显，这种说法是和斯大林所说有些出入的。那么是不是范先生就违反了马列主义了呢？还不能作这样简单的看法。马列主义有一条：要从事实出发，不要从概念出发。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反复引用列宁的话‘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一定拘守斯大林对民族和部族的说法，是不是会陷于从概念出发呢？一定拘守斯大林的话，那中国直到近代还没有形成为民族，那么中国近代史上义和团的民族运动，只好叫它是部族运动，而汉族、回族一直到解放前，只好说它是部族，这恐怕是有问题的！当然也不能说范先生的说法就已成定论。”[②]嵇文甫这些话，与其看作是对范文澜的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批评，倒不如看作是对当时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中所存在的从概念出发、拘守理论不知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的教条主义倾向的批评。

2.“独特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和中华民族

特殊民族，是由范文澜在《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中提出的：“汉族自秦汉以下，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③]范文澜的观点的要点是：一、汉民族自秦汉时期粗具民族形成特征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这一漫长的时

---

① 张正明：《试论汉民族的形成》，《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7—48页。

② 嵇文甫：《关于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关于历史评价及其他》，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7—48页。

③ 范文澜：《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页。

期，可以称为“独特民族”。自然，这一民族之所以独特主要是相对于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所存在的；二、范文澜认为，在中国自始至终是不存在斯大林所定义的资产阶级民族的。因为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以前自不必说，就是到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也没有形成所谓的资产阶级民族。

官显指出：“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所具有的决定意义的是原始公社生产方式；部族所具有的决定意义的是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生产方式；民族所具有的决定意义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范文澜同志认为他所说的‘独特的民族’既非部族，也不是资产阶级民族（当然不会是氏族或社会主义民族）。那么，应该说他所谓‘独特的民族’，就不是在如上述的历史上的某种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而是一个超出于历史上诸生产方式之上的东西了，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超历史的概念。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范文澜同志在他的论述当中，对民族所由产生的基础——生产方式，这一决定性问题没有加以论证的理由了。”①

当时的讨论述评文章中谈道：“范文澜关于汉族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为‘独特的民族’的结论受到了不少人的反对。曾文经在文章中问道，如果说汉族在秦汉时已经形成为‘独特的民族’，那么这种‘民族’是和那一种社会制度联结在一起呢？谁是这种‘民族’的领导力量呢？杨则俊更进一步指出，由于范文澜片面地强调了汉族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殊性，实质上却是取消了汉族形成为民族的特殊性问题。”②

“中华民族”，是 20 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日益成为人们使用频繁的语汇。这也在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正在向自觉的阶段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范文澜就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范文澜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一文中分“伟大中国的主人是伟大中华民族”、“汉族是怎样形成的”、“各有光荣历史的少数兄弟民族”、“近代中华民族发展所受到的障碍”、“中华民族将以无比的速度发展起来”等部分，对中国历史的创造主体、汉族、近代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前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范文澜指出：“汉族发源黄炎族，五千年来，吸收了数以百计的大小民族，终成巨大的汉

---

① 官显：《评“独特的民族”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68—69 页。

② 林征：《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新建设》1955 年第 10 期。

族”。[①]并形成中华民族。在范文澜的论述中，包含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多元一体”，以及汉民族作为主体民族构成为中华民族的观点。这对于民族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后来一些学者在这方面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亚农指出：“由于我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早应消灭于周初的周族的宗法制度，一直保存其残骸于近代；相反地，应该迟到16、17世纪才出现的各地区的融合以及民族的联系，却早在两千年前就出现于古代中国，竟使我们的历史学家们眼花缭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中华民族是形成于鸦片战争时期，有的又说：不，中华民族是形成于明清之际；第三者说，是宋朝；第四个说，是唐代；最勇敢的又说，是秦始皇的大一统之后。说法甚多，但我们并不打算来参加这一争论，我们只想根据具体的历史事实来看一看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②]他认为：在春秋末期大规模地发展起来的商业资本，提出了成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要求，“秦始皇的出现，仅仅是迟早的问题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无可争议地，在要求形成全国市场的经济基础上，出现了一个具有共同的疆域、血统、言语、文化的伟大的中华民族”。[③]李亚农把汉民族最初的形成与中华民族雏形的具备大致看作同时了。而且他并没有以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的理论的观点为依据，而是倡导根据“具体的历史事实来看一看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3. 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再认识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对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无疑受到了斯大林的相关理论的影响。当时有的学者已看到了斯大林理论的局限性，以后的学者就看得更清楚了。

1957年，周恩来指出：“在我国，不能死套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那个定义指的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民族，不能用来解释前资本主义时代各个社会阶段中发生的有关的复杂问题。”[④]

李亚农指出：“在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的时候，我们建议放弃‘经济中心’这一概念。必须出现了经济中心，然后才能够形成民族的理论，既不一定符合于前引列宁的观点，也不能说明中国的历史发展，徒然引起我们头脑的混乱。因为，尽管有

---

① 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范文澜全集》第十卷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② 李亚农：《李亚农史论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28—829页。

③ 李亚农：《李亚农史论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36页。

④ 国家民委政研室编：《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了经济中心，假如它的生产力并不强大，集散的商品并不多，则它生产的以及集散的商品在本地区及其附近地区就可以推销出去，不一定要求形成全国市场；又假如它的生产力十分强大，集散的商品十分多，则它生产的以及集散的商品，即有了全国范围的市场，也还是嫌市场狭小，必须寻觅国外市场，此时，商业资本所要求的也不一定是全国市场；而形成全国市场的要求，恰好就是产生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动力。因此，在我们讨论中华民族的形成的时候，实在用不着'经济中心'这一概念。"①

有的学者指出："经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与中文'民族'一词相对应的词汇进行探讨，人们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民族'以前，一直上溯到文明之初这段历史时期的人们共同体，也是用'民族'这个词汇来表达的。……一些同志用'古代民族'这个称呼来涵盖文明社会直到资产阶级民族出现以前的民族共同体，是比较符合马克思著作的原意的。汉族，或者她的古称华夏族，应该就是我国的'古代民族'"②。

有的学者指出："我国自周秦以降2 000多年间停滞在封建社会发展阶段，近代以来的百余年间则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况且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极不平衡，除汉族和若干少数民族已不同程度地发展起某些资本主义因素外，绝大多数民族尚处在前区资本主义诸发展阶段。这就意味着，包括汉族在内的我国各民族，都离斯大林指称的'现代民族'范畴甚远，因而他们自然难以完全具备那四个特征。其实，民族作为一定时代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它的四个特征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成熟、完备的。……我们反对生搬硬套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坚持运用历史的、具体的、辩证的分析方法，力求体现马克思主义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科学结合，所以没有把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人们共同体区分为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而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民族的实际，把它们统统确认为民族。"③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认为，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存在很大缺陷，尽管在指导人们客观地认识民族这一历史范畴的本质属性方面，曾起到重要的作用，抵制了在民族概念问题上的各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错误

---

① 李亚农：《李亚农史论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38页。

② 沈长云：《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上古史探研》，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76页。

③ 宋蜀华、陈克进主编：《中国民族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251页。

观点，但是，随着民族研究和现实考察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和关于民族、部族发展模式的论述，还不能说是一个科学的、完备的理论体系。同世界各国和中国各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的实际情况相对照，还不免具有一种简单化、公式化和绝对化的弊病，没有对民族这一动态的历史进程给以最本质的概括。①

有的学者指出："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等四个所谓特征是并列的，并且是'缺一不可'的。而实际上它们有的只是民族形成的条件，例如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地域等，本身并不是民族共同体得以区别于其他人们共同体的必须具备的本质特征，不具有民族的特定属性。把民族形成的条件和形成后的民族所具有的本质特征混淆起来就会造成一系列的误解。……民族作为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其特征必须具备相应的稳定性。在这个方面，民族的文化共同性和自我认同的归属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四特征'模式的民族定义，恰恰没有着重于这一点。"②有的学者指出：民族定义应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由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等要素所形成的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民族自我意识的比较稳定的共同体。"③

4. 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的重要意义

较之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中国史学界其他问题的讨论状况，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时间短，争论所引起的范围也比较小，也有一些简单化倾向，④但其意义仍然是不能忽视的。

首先，它是自 20 世纪以来，学界对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探讨和认识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阶段。中华民族内涵在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而对中华民族作理论上的概括则是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有的学者指出："'民族'一词，在古代汉语里没有构成，大约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从日文中引进，当时含义并不统一，直到目前，各家使用也不完全一致，不过比较通行的是泛指从古代到现代所有处于不同社会发展水平的稳定民族共同体。在民族一词出现之

---

① 陈育宁：《民族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 页。
② 陈育宁：《民族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 页。
③ 参见吴金：《我对民族概念问题的一些理解和意见》，《民族研究》1986 年第 5 期。
④ 参见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43 页。沈长云：《在历史研究中坚持于发展唯物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03 年第 1 期。

后，不久也就出现了'中华民族'一词，最初是指中国的主体民族，即汉族；随着中国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日益自觉地结成整体，它的全部含义才得到充分的阐明：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许多民族在结合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①中华民族之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发展到自觉阶段。外国列强的入侵所造成的中华民族面临的空前的危机是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另外，与此几乎同时开始的关于中华民族理论的学术探讨也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这种探讨反映在顾颉刚、罗香林、周谷城以及翦伯赞、吕振羽、范文澜等史学家的论著中。例如顾颉刚批评了"五大民族"一词在对中华民族认识上所具有的消极意义，认为"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他"以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自战国秦汉以来逐步形成的，其血统错综复杂，其文化亦没有清楚的界限而是相互牵连。指出对边疆、民族问题不应讳疾忌医：'试想那班眈眈逐逐的侵略先锋早在中国境内下了百余年的功夫了，……我们还不敢讲真的历史，他们却大谈其假的历史，……要想对付他们，惟有我们自己起来，向边地同胞讲实在的历史'，以求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共同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②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这一点，从范文澜的《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的基本观点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范文澜、黄元起、嵇文甫、李亚农等学者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观点，不仅对当时作为民族史研究指导思想的斯大林关于民族的理论有着辩证的认识，而且对汉民族的形成问题也有着理性的分析。

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华民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中以翁独健、白寿彝和费孝通等学者的探索最为突出。无疑，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学者们的探讨基础上取得的。

其次，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民族史学的发展。1923年，梁启超在《五千年中国进化概论》时较早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③梁启超所说的"中华民族"只是指汉族，这是不全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国民族史学界果断地抛弃了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各学派，并对其进行了批判，应该说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为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推动了研究的进步。

---

① 陈连开：《中华民族的含义初探》，《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②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3页。

③ 梁启超：《五千年中国进化概论》，《梁启超史学四种》，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4页。

有的学者将民族学的苏维埃学派称为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派，[①]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民族史学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50年代初步建立，并取得丰硕成果应该说与对苏联民族史学派的密切交流有关。这种交流绝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而是有所继承、有所发展。有的学者指出："中国民族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于20世纪初叶，但其真正获得发展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②]

再次，当时的讨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规模的民族普查提供了理论的依据，进而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促进了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民族普查、民族识别，确认民族的标准基本上是斯大林下的民族定义。[③]而民族识别无论对于了结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还是对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振兴中华民族，都有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即民族学、民族史研究不仅有科学价值，也有重大的政治意义。[④]

复次，不论在当时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分歧有多大，但其中有一点是达成了共识的：通过中国的学者之间的相互探讨科学地否定了外国学者提出的"汉族西来说"[⑤]。无论是对于自觉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还是自发的部族的形成问题的讨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学者基本上都认为在中国本土上形成的。正是通过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才为学术界辩驳"中国民族西来说"，奠定了理论的

---

① 李绍明：《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体系》，郎维伟、袁晓文主编：《民族研究文集》，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111页。

② 方素梅：《最近十余年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

③ 参见杜玉亭：《求中国民族学之魂》，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④ 参见宋蜀华等主编：《中国民族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249页。

⑤ 关于"汉族西来说"，李亚农在《西周与东周》一书中给出了较为详细的论述："18世纪中叶，都·给纽（de Guignes）第一次在法国科学院发表了一篇演说，企图证明中国民族发源于埃及的一个殖民地。这个说法之荒唐，实在是荒唐到了不攻自破的程度。继都·给纽而起的正是拉苦倍里。拉苦倍里以为《书经》中的'百姓'二字，是在汉族西来，征服了土著民族之后，自称'百姓'，以区别于土著民族的。'百'字的北京音是pai或po，广东音是Pak或Bak，而这个广东音正是中国的古音；所以Bak或Pak，乃是族名，'姓'即种族的意思。这个Bak族原来居住在巴比伦，后来才迁移到东方的。试看西部亚细亚的地名，很多都有Bak或Pag的音，例如：Bakhadi，Bactra，Bakhtan，Bakthyari，Bagdad，Bagistan等等。拉氏由此进一步主张黄帝（Huang-ti）并非中国土著的统治者，而是西方Bak族的酋长。他是带领着他的人民从巴比伦移居到中国西北部来的。这个结论已经够瞧了，但拉氏并不以此结论为满足，他企图更进一步说明中国的黄帝就是巴比伦王苦都尔·纳孔特（Kudur Nakhunte）。据拉氏的说法，黄帝别号有熊（Yu-hiung）氏，熊的古音是Nai，而Nai即Nak的转化，因此，如果我们把Nak和Huang-ti结合起来，就变成了Nak-Huang-ti，这不是强大的巴比伦国王Nakhunte，是谁呢？"（《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07—608页）

基础。

最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的发展。随着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的深入，中国民族史尤其是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也一一提了出来，如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问题、历史上的疆域问题、历史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问题、历史上民族战争问题、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随着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的深入，成为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史学界热烈讨论的问题。[①]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大大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吕振羽谈到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对于史学的意义时还指出："这不但对我们研究原始公社制度史、奴隶制度史、农奴制度史有很大的帮助，可以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而且给我们开辟了研究中国史的新领域，将大大有助于我们对两周社会性质的解决。"[②]

(六) 古代社会理论问题讨论的反思

对"五朵金花"的讨论全盘否定，是不客观不公正的。王思治指出：五十年开展的五朵金花的讨论，现在有人持否定态度。实际上，不同学术观点见仁见智，的确使人们开拓了眼界。对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认识中国历史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因此这些问题的讨论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教育过程，也是尽量去发掘资料，阐述自己看法的过程，所以不能否定。[③]但"五朵金花"的讨论仍是值得反思的。

1. 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希凡和蓝翎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被认为是第一篇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红楼梦》的学术成果。尽管这是唯物史观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成果，但却也十分明显地反映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待史学遗产的看法，由此揭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界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热烈讨论。李希凡指出了以实证性的史学研究对待史学遗产的不足，认为："新红学在曹雪芹家世的考证上，是作出了贡献的。但他们把《红楼梦》仅仅看成是作者的'自叙传'——曹頫即贾政，'曹雪芹即贾宝玉'(胡適)，把一部具有伟大时代意义的'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学杰作，说成'只是老老实实地描写成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胡適)，或者是什么《红楼梦》的'基本观念是'色'、'空'，'不脱

① 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43—544 页。

② 吕振羽：《史论集》，三联书店 1960 年版，第 173 页。

③ 许殿才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的成就与未来研讨会纪要》，《史学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离东方思想的窠臼'(俞平伯),等等,这不只完全抹杀了这部伟大杰作深远的现实社会意义,也完全否定了它的文学的典型创造沁人心脾的艺术魅力。"[①]同样的历史,同样的历史研究,也只有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才能凸显出它们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史学遗产观才能完整的表现出来。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引起了"一场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大风波,或者称之为思想批判运动",然而它的不"普通"之处却正如李希凡所指出的"因为它触及到'五四'以来一派学术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②]这场思想文化战线上,尤其是史学界的"大风波"同关于《武训传》的批评运动一样,"澄清了历史观上的一些问题"。[③]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占领史学阵地的具体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史学别开生面,取得不少成果,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尽管50年代和60年代特别是"文革"时期,一些极"左"思潮,一些简单化、片面性、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歪曲、损害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一些自由化思潮产生了影响,但经历了曲折之后,不少学者还是发自肺腑地说:"我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所勾勒出的社会关系,从总体上最贴近历史,或者说解释力最强。"[④]"有人以古史分期讨论长期得不出统一的结论为由,否定作为这一讨论的理论依据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但是,离开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更难找到统一的历史分期标准,意见会更加分歧,讨论会发生更多的枝蔓,更难获得统一的认识,徒增纷扰而已"。[⑤]这应是几十年史学研究、学术研究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2. 正确认识和处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认为史学只能进行纯学术的研究,不应为现实服务、为政治服务,是不对的;认为史学必须为现实服务、为政治服务,不应进行纯学术的研究,也是不对的。1958年前后,从"古为今用"、"厚今薄古"口号的提出,到大搞"史学革命",直到"狭隘阶

---

① 李希凡:《华岗校长与"百家争鸣"》,《文史哲》2003年第3期。

② 李希凡:《华岗校长与"百家争鸣"》,《文史哲》2003年第3期。

③ 胡尚元:《建国初史学界的武训批判述论》,《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

④ 刘泽华:《分层研究社会形态兼论阶级——共同体综合分析》,《洗耳斋文稿》,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71页。

⑤ 李根蟠、张剑平:《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与古史分期讨论——李根蟠先生访谈录》,《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

级观点的泛滥”,“史学”与“政治”关系被“左”倾化了。出现了把历史作为工具,用歪曲历史达到为现实政治政策作注脚的做法,把历史学的致用变成历史学的滥用,把科学的历史学变成实用主义的历史学。最后就是历史学在“文革”时期被大糟踏、大破坏,完全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

用政治的方法处理学术问题也是不对的。1957年6月2日,雷海宗作了《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的讲演。他否认为了奴隶制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所具有的普遍意义,认为:“世界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奴隶社会阶段。既然如此,历史上也就没有一个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或转化的问题。”[①]雷海宗的学术观点是否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但在当时他受到了不正确的政治批斗。把纯粹的学术观点上升为政治错误,从而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取消了学术研究,“从而使无奴隶社会阶段问题成为禁区,助长了古代社会史研究中的简单化和公式化的倾向,关于古史分期的讨论便是因此受到局限的”。[②]尚钺主张魏晋封建论,这是学术观点,却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对他进行政治批判,甚至剥夺了他讲授历史和发表意见的权利。[③]这样做就扼杀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扼杀了学术发展。

3. 发展实事求是、平等和谐、讲科学、讲道理、讲道德的学术争鸣、学术批评

史学的发展当然离不开社会发展的驱动,而史学自身发展的活力之一就是争鸣、批评。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推动事物的发展,史学内部的争鸣、批评推动史学的繁荣、发展。但这种争鸣、批评,应是实事求是的、平等和谐的、讲科学、讲道理、讲道德的,而不是唯我正确、居高临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走极端、扣帽子、打棍子的。

尹达指出:“从我国重要问题的自由争论上以及学术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上看,近几年来虽说已有初步开展,但是决不能说已经十分健康了。……在开展学术上的批评的时候,我们应当是采取说理的方式,应当是有根有据地分析研究某一理论的缺点或错误的关键。而不应采取简单的方式,戴上几个使人难以接受的帽子,就算了事。学术研究是一件细致的工作,批评任何一种理论或学说,都需要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分析。从理论上以及史实的根据上进行充分的研究,确切

① 雷海宗:《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96页。
② 曹家齐:《顿挫中嬗变: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
③ 尹达:《深切怀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尚钺同志》,《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地找出其所以不对的关键所在，才能够具有说服力量。简单地一笔抹杀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①

有的学者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真理（或对事物的正确认识）是由争论、争鸣确立或证明的。就学术发展、艺术进步而言，争鸣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我们拒绝‘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式的‘左评’，反对骂倒一切的‘酷评’，不屑于受经济利益驱动的‘炒评’，不赞成维护小圈子的‘派评’。每个批评者、争鸣者都应怀着对历史、对今人和后人负责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对作家作品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②

这是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学术讨论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今天学术讨论应该认真注意的。

① 尹达：《改进历史科学的研究工作——为毛泽东同志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十五周年纪念而作》，《尹达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8页。

② 张学正：《争鸣的环境、规则与风度（序言）》，《文学争鸣档案》，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第二章　史学史、史学批评史研究

一、中国史学史研究

史学史，就是历史学的历史、历史研究的历史。史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也有自身的客观发展过程。对这个客观发展过程进行总结、认识，就是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史学史是历史学家对过去一切史学活动的反思，研究史学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及其规律、经验教训。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史学"的发展史，与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略有不同。

中国史学的发展源远流长，但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是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梁启超192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其中有《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一章，概述了中国古代史学从起源到清代的发展，这被认为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开始。1926—1927年，梁启超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专列"史学史的做法"，就这门专史建立的必要性、研究对象、基本内容、编写的特殊困难和原则等进行了论述，说："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①初步论述了史学史的一些理论问题。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史理论建设的开始。30年代，中国史学史专著开始出现，如：曹聚仁《中国史学ABC》(世界书局1930年版)、卫聚贤《中国史学史》(持志书院1932年印，暨南大学1933年印)等。40年代更多：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魏应麒《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周谷城《中国史学之进化》(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版)、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社公司1947年版)、何炳松《中国史学史》(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等。有的书印刷年月不详，如陆懋德《中国史学史》(北平师范大学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华书局1989版，第153页。

铅印本）、蒙文通《中国史学史》（四川大学铅印本）等。很多大学历史系都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并由名家主讲。[①]这表明，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史学科已建立并有一定规模。中国史学史学科在民国时期的发展，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标志之一。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下的史学史研究逐步发展起来，学科理论和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和成熟，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但这个过程是曲折的，以下分阶段进行论述。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17 年”（1949.10—1966.5）

从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可分为两期：沉寂时期（50 年代）和活跃时期（60 年代前期）。

1. 沉寂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编写的中国历史教材，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等已有，但“中国史学史”教材没有。民国时期出版的几本《中国史学史》书，因为存在着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或者说立场、观点与马克思主义不符，不能作为教材用，有些大学历史系就不开“中国史学史”课了，即没有将“中国史学史”课纳入教学计划。而史学史研究似乎连带着放慢了或停下了脚步。曾经的中国史学史名家金毓黻也不研究中国史学史了。杨翼骧曾谈到：“1950 年，我认识了对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前辈金毓黻先生。金先生那时已自外单位调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教授，与史学系的教师一起学习马列主义，讨论思想改造问题。因开会频繁，时常见面。他虽年逾花甲，但学习积极，每次发言都认真检查自己，态度诚恳，深为大家所敬重。有一次散会后我悄悄问他：‘先生还研究史学史吗？我过去没有机会做您的学生，今后能向您请教史学史的问题吗？’他说：‘我们现在要紧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旧思想，业务上的事情将来再说吧，况且我已多年不研究史学史了。’”[②]这个时期史学史研究的“沉寂”，说明什么？说明都在盼望、催促尽早出台新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编写方案，也在盼望、催促新型的中国史学史教材尽早问世。

1956 年，《史学译丛》第 2 期发表了苏联《历史问题》杂志社论——《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这是一篇苏联史学界关于史学史理论问题的文章。文章说：“历史科学史的目的是研究许多世纪以来的历史知识的积累过程和历史科学的发生与发

---

① 详见牛润珍：《20 世纪中国史学史著作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 年第 8 期。

② 杨翼骧：《史学史研究的今与昔》，《史学史研究》1994 年第 4 期。

展的过程，研究历史科学发展的规律性，表现具体历史环境、阶级斗争和当代的政治、哲学及其他观点对于历史思想的制约性。”文章还阐述了这门学科的重要意义和对待史学遗产的态度。这篇文章的发表，提供了一种新型中国史学史研究、编写方案的参考意见，正是盼望和催促新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编写方案，新型的中国史学史教材尽早问世的一种反映。[①]

1959 年纪念五四运动 40 周年的学术活动中，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学术报告有“‘五四’以来中国史学发展”，[②]实际上就是一个史学史的学术报告。1959 年 5 月 5 日，《文汇报》第 5 版发表徐仑长篇文章《“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历史科学》，分三节：一、“五四”以前史学思想的转变；二、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三、历史科学的两条道路斗争。这实际上就是一篇史学史的论文，尽管还不是很成熟。这就表明新型的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已经萌芽。

大学历史系不开史学史课，这是说不过去的，不会长久的。20 世纪 50 年代末，讨论历史教学改革，自然提出要开史学史课。白寿彝曾回忆道：“50 年代的教学改革，通过教学计划的拟定，把史学史正式列入计划。后来文科教材中规定了史学史的项目。当时，同志们对于史学史应该作为一门课程列入教学计划，是一致同意的，但是否列入必修，却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认为，列为必修的条件还不成熟，不如暂定为选修，为必修做准备。后来，这个意见在会议上通过了。”[③]史学史课列进了教学计划、教材计划，更迫切地等着新型的史学史教材尽早问世了。而史学史课没有被列为必修课，大概也是因为还没有好的史学史教材。

2. 活跃时期

1961 年 4 月，教育部召开的文科教材会议确定编写《中国史学史》和《外国史学史》(复旦大学耿淡如主编。关于西方史学史的研究情况详下)。《中国史学史》分成三部分：《中国古代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吴泽主编)、《中国现代史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尹达主编)。一石激起千层浪，被积压已久的史学史研究激情顷刻间澎湃起来，怎么编写史学史、史学史基本理论问题的大讨论席卷大江南北。北京、上海、广州、济南、武

---

① 参见乔治忠等：《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5 页。

② 详见《文汇报》1959 年 4 月 12 日第 1 版报道《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北京师大广泛开展学术活动各系师生准备提出许多专题研究报告》。

③ 白寿彝：《史学史工作四十年》，《史学史研究》1989 年第 4 期。

汉、西安等地召开了多次学术座谈会；学术刊物、报纸等也都纷纷发表相关文章。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从1961年5月至1962年初，先后开了三次关于如何编写史学史的座谈会，还有不少人在会外提供了意见。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一、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目的。意见比较集中在如何阐述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问题，多数认为包含有三种规律。第一种规律是中国社会发展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的反映，史学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第二种规律是一定时期的史学跟当代学术文化的交互关系；第三种规律是史学本身发展的规律。二、关于中国史学史古代部分的基本内容。大多数人同意白寿彝提出来的史学史应该包括的几个方面：第一是历史观点、史学思想；第二是史料范围的不断扩大和鉴定分析史料的进步；第三是史书形式的发展；第四是有关史书编写的制度。关于中国史学史究竟应该写哪些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关于历史家、历史著作的选择和评价，许多人都提出不同的意见。三、关于中国史学史的分期、上限，大家都主张从中国史学起源写起。但是从历史传说写起呢，从有文字的历史记载写起呢，或从史学已经形成一门学问写起呢，有不同的意见。至于下限，一种意见主张写到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在教育革命高潮里出现的厂矿史、公社史，如《门头沟煤矿史稿》、《清河制呢厂史》等都要写进去。认为这才真正开始去写劳动人民群众的历史了，虽然还在摸索中，但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另一种意见主张写到1949年建国以前。因为建国以后的史学发展，在最近几年内尚难总结出来。持这种意见的人居大多数；还有一种意见，主张写到李大钊为止。这是中国史学向马克思主义阶段转化的开始。此后，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家，史学中马克思主义跟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就激烈起来了。但这些历史家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前进中，总结他们的成就实在很困难。还是再过一些时候来写，更现实一些。关于中国史学史古代部分如何分期的问题，大家同意基本上与整个中国社会阶段的发展相照应。白寿彝认为可以考虑三个分期的标志：(一)以司马迁为划期的标志；(二)以刘知幾或杜佑作第二个划期的标志；(三)以明清之际的王、黄、顾为划期的标志。多数人认为可以考虑这样一个划期的办法。贺昌群提出分为四个时期：(一)司马迁开创纪传体，史学真正开始。在此以前为一时期；(二)司马迁到杜佑，是第二时期；(三)从郑樵、马端临直到明末，这一段有一个注重史论的特点；(四)清代考据学时期。四、中国史学史教科书的写法，大家认为，现在写史学史既要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又应该有不同于旧史学史的崭新面貌。对前人研究不足的地方要下工夫，对被人忽视的重要史家、史籍要发掘。要努力写出

史学发展规律，写出的史学史，决不应是史籍介绍、史家传记或史观的简单排比。大家认为，中国史学史还是一门有待建立的学科，都感到应该有长期的努力，联系更多的人分工合作，作些专题研究，出些论文集和专书，才可以逐步发展成为坚实的学术著作。①

上海史学会于 1961 年下半年，连续召开两次座谈会，集中讨论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内容、研究的目的以及史学史的分期等。会上有人提出，史学史的对象是研究历史学派的斗争，阐明史学家的阶级地位及其世界观，也即他们对待历史的态度；说明历史著作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指导思想；阐明史料存在的状况，阐明历史科学本身发展的源流，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产生，等等。有人认为，史学史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史学，是研究史学发展、变迁、递嬗的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历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斗争的历史。因此，史学史要对各家历史学说作出科学的评价，给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对史学遗产作清理工作，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史学史不仅仅是历史编纂与史料考订，应重视思想领域中的问题，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或哲学著作，虽然不属于史学家或历史著作，但是它对史学思想和著作发生很大的影响，史学史也应当研究。有人认为，史学史首要的任务在于阐明史学及史著本身发展的规律，例如在中国史学史里，应当说明诸如为什么魏晋南北朝的史学家特别多；为何清朝的史料学特别兴盛等问题。其次在于总结过去的史学成就，中国史学家一向重视史料的收集和保存；中国传统的史学一向重视历史与政治的关系，强调历史的教育作用，过去这些史学上的优良传统都有待于总结；再次就是对资产阶级伪史学进行具体批判。关于如何处理某些个别史学家和史学流派的世界观、学术与政治三者的关系问题，有人认为世界观有仅对自然现象的和包括对自然与社会现象一切观点的总和的本义和广义的两种提法。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学者，在自然观很多是唯物的，在社会观则是唯心的。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才是一元论的彻底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过去许多旧史学家，自然观是唯物的，历史观是唯心的；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都是唯心的，政治态度不一定是反动的。还有某些唯心主义的史学家，由于其在感性认识阶段，能严遵形式逻辑规范，在名物训诂、考证辨伪等古文献、古史上，确曾留下许多学术遗产，有待我们的总结批判

① 郭澎：《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 年第 1 期；《文汇报》1962 年 3 月 13 日第 3 版。

继承。必须严格区别世界观、学术与政治三者的不同，不能混淆。近代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政治变化极大，封建主义的和外国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相互交织；许多旧史学家思想复杂，前后多变，必须具体分析研究其主次关系，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有的还指出，学术思想一旦形成，有其独立性和延续性，编写史学史时，必须搞清各史学家和史学流派的源流、特点及影响。还有人指出，史学史在整个学术思想中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又受整个学术思潮的制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来加以估定。①

1962 年 1 月，上海史学会召开年会，史学史的对象和任务等问题，仍是讨论的重点问题。关于史学史的对象有以下几种意见：一、史学史是研究历史科学本身发展的历史，它主要研究历史学说思想史，历史编纂学史，历史文献的制作、发见和积累及其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史学的传播与交流，修史制度等；二、史学史的对象是史学思想、方法、思潮、流派等，历史编纂方法包括在内；三、史学史就是史学的历史，即史料、历史认识和史学方法三者结合的历史；四、史学史的对象有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史学评论、历史科学的辅助科目（如史料学、目录学等），史学思想（特别是历史观）是贯串史学史的红线。关于史学史的任务有以下几种意见：一、不但要研究和阐述阶级斗争在史学领域的复杂反映，分析和概括不同时期、不同学派、不同史家的史学理论与历史方法，还要提供充分的史学发展的历史知识，总结历史编纂和史学研究的丰富经验，论证史学产生、变化和成长的客观规律；二、主要是叙述人类活动的记录（即史料）逐渐增加和丰富的情况，分析人的历史认识的发展和演变，说明史学方法的改革和进步，介绍有代表性的史家，阐述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产生及其与各种资产阶级史学斗争的情况；三、解决历史科学中批判和继承的问题，具体任务有介绍史料的存在情况、总结史料学的研究成果，对历代史学家及其著作作出科学的鉴定，根据科学的最新成果，校订历史著作中的错误，揭示历史科学的发展规律，阐明史学领域内的思想斗争；四、对有些不一定有很多历史著作但在史学思想上有很大成就的思想家（如鲁迅），应很好估计并加以研究。②以上的探讨，比前两次座谈会的探讨更深入了。

1963 年 1 月，上海史学会召开年会，史学史问题仍是讨论的重点问题。其中，

---

① 《文汇报》1961 年 11 月 28 日第 1 版报道《上海史学会召开座谈会讨论史学史对象、任务和编写原则，并就史学史同历史哲学史等的区别与联系等问题作了探讨》。

② 朱维铮：《上海历史学会 1961 年年会讨论的几个问题的综述》，《文汇报》1962 年 2 月 11 日第 3 版。

朱永嘉对刘节《谈史料学和史学史》(见《文汇报》1962 年 6 月 14 日)提出批评,认为中国古代的历史编纂学在二千年中的发展,与历史哲学密切联系着。如《史记》、《汉书》、《通典》、《通志》和《通鉴纪事本末》等体例上的变革,都与史观相联系,刘节只承认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否认史观的发展进步,实际上是贬低和否认史观对历史编纂学的指导意义。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后来居上。封建社会中,司马迁虽奠定了历史哲学的基础,但并未排斥后代史家在各个问题上,结合当代特点,发展他的历史认识。至于历史哲学的革命,则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才出现的。朱永嘉对刘节的史料学看法,也进行了批评,认为刘节的说法,实质上是掩盖了乾嘉历史考证学的阶级属性。会上,吴泽、黄丽镛就魏源《海国图志》的思想倾向作了发言。①

1962 年底,广东历史学会召开年会,会上中国古代史组讨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围、内容、分期等问题。在讨论中一致认为,史学史内容应该包括历史哲学、历史编纂学、考据学、史料学、目录学等发展的历史。但对历史哲学、历史编纂学在史学史中的地位,则有许多不同的认识。刘节认为,史学史应以历史编纂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辅。史学史的任务在于把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写出来,把历史学家的历史哲学介绍出来,把历史学在发展途中和其他科学的关系写出来。但是,史学史主要是阐述历史学的发展过程,如果以历史哲学为主,必然会抛弃很多应该讲的东西,并且容易与哲学史混淆不清。陈千钧认为,史学史的内容和研究对象,就是清理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史学部分,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出一条史学发展的系统的线索——规律。史学史必须阐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什么必然产生某一类型的史学著作和史学家,史学家所写出的史学著作必然脱离不开当时的政治以及史学本身发展的特点。史学史既与哲学史、思想史、考证学、史料学、目录学有关,但又不能与之等同,而是史学发展的历史。曾庆鉴认为,史学史应以史学思想为主导,历史编纂学为基本内容,涉及考据学、目录学、史料学。因为史学是为政治服务的,而史家作史首先决定于他的立场、观点,然后才是写作方法,所以史学史的范围、内容必须有个主次。关于分期问题,刘节按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阶段来划分,把中国史学史分为五个时期:一、萌芽期——先秦、殷周两代;二、创建期——从两汉到隋唐五代;三、充实期——两宋、元明;四、发展期——清代;五、更新期——从清

---

① 惟真:《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讨论——上海历史学会 1962 年年会部分问题讨论综述》,《文汇报》1963 年 4 月 30 日第 4 版。

代晚期开始直到现在。陈千钧以社会分期为标准，提出四期说：奴隶社会时期（殷周到春秋末）、封建社会前期（春秋末至隋）、封建社会中期（唐到明中期）、封建社会后期（明中期至鸦片战争前）。曾庆鉴认为，分期要考虑史学发展的三方面因素：一、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反映；二、意识形态的斗争；三、史学本身的发展。他的分期是：一、史学的起源与草创期——司马迁《史记》出现以前；二、建立期——从司马迁到唐，即刘知幾以前；三、发展和充实期——从唐到明；四、畸形发展期——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前后；五、改良期——鸦片战争前后至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前。在分期问题讨论中，许多人不同意刘节把近代资产阶级的史学同现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史学同列为一个时期。①

在会议讨论的同时，探讨史学史理论问题的文章也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这不仅是20世纪50年代所未有，也是20年代以来所未有。如1961年耿淡如发表《什么是史学史》，首先对“史学史”的概念进行了阐释。他说：“史学史”这个词在外文用法里有时指“史学”，有时指“史学的发展史”，还有的指“历史编纂学的历史”。苏联史学家则用作“历史科学史”。总之，这个词在国外用得混乱。接着，他参考苏联历史学家对史学史的定义，对史学史的对象和任务进行了讨论。②然而，由于作者大量地运用反证，对于史学史的对象和任务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正面、完整的回答。其次，作者受苏联历史学家的观点影响较深，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在史学发展中的影响。再次，作者在论述中，历史、历史学、史学史等概念往往混合使用。虽然如此，这篇文章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1962年，刘节发表《谈史料学与史学史》，论述了史料学与史学史的关系，但重点还是讨论史学史问题：“史料学和史学史的写法，当然各有不同，……不过二者关系很密切。写史学史应该分别轻重，说出史料学的发展过程。”③这是说，写史学史，也要包含史料学的内容。1962年10月，刘节在广东历史学会作了“关于中国史学史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提出：史学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历史哲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考据学，而以历史编纂学为其主要内容。重申：史学史也就是史料学发展的历史。④

---

① 广东历史学会通讯组：《广东历史学会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范围、内容与分期问题的讨论》，《学术研究》1963年第1期。

② 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

③ 刘节：《谈史料学与史学史》，《文汇报》1962年6月14日。

④ 谷风：《刘节教授认为：中国史学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可分五个时期》，《学术研究》1962年第6期。

1963年,汪伯岩发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问题》,阐述了史学史研究的五项内容:一、史学家和史学流派在史学领域内的活动;二、历代历史著作;三、历史著作的体裁;四、历史编写的制度和组织;五、中国历代政治、经济与史学发展的相互制约关系。汪文认为,中国史学史的这五项内容可以分别钻研、独立研究。但一部中国史学史的编纂,就不能使它们平行并列,应把史家、史籍作为史学史内容的主要方面。在史学史内容的主要方面,又有作为核心的主导体系,那就是史学思想,"因为史家的史学思想,不仅规定历史作品的中心内容和编纂方法,而且能够具体地反映时代的脉搏,表现史学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关于阶级斗争在中国史学史中的地位,汪文说"阶级斗争像一条红线一样,贯串在三千多年来中国史学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文章最后总结道:"我们新的中国史学史,依照年代顺序,把史家、史籍、史体和历史编纂组织构成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内在联系紧密的有机体,并使这门学科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战斗性,投入火热的阶级斗争,为无产阶级政治和现实革命运动贡献一份应尽的力量"。[①]汪文关于中国史学史五项内容及其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具有一定的深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但也可看到文中已有当时"左"的思想的影响。

这一时期师宁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颇为活跃。1963年,他发表了《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影响》(《学术研究》1963年第3期),然后又发表了《有关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文史哲》1963年第4期)、《简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文史哲》1964年第1期)。其中《有关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一文对1961年以来史学史基本理论的讨论进行了评述。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中国史学史,自然应该不同于"旧史学史",应该"建设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有自己的"崭新面貌"。文章还就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包含"三种规律"问题,关于将古代史学现代化问题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②]提出的看法虽然不尽正确,却有利于将问题引向深入,有利于使用概念规范化。

1964年,白寿彝发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指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阐明我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在阐明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同时,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要批判地总结我国史学成果。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史研究的两大经常任务"。史学史上还有技术方面的发展规律、即史料学发展的规

① 汪伯岩:《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问题》,《文史哲》1963年第4期。
② 师宁:《有关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文史哲》1963年第4期。

律、历史编写形式发展的规律、历史文学发展的规律，研究这些规律，对于史学发展规律的总体理解上是很有必要的。总结成果，要注意分析史学作品的精华和糟粕，既要把它的精华和糟粕区别开来，又要把它们联系起来看，联系起来看，要比孤立地看更能看出问题来。在谈到具体研究的方法时，白寿彝提出："中国史学史工作中的占有资料，特别重要的是要集中精力，占领堡垒。"所谓堡垒，就是各时期的代表作。要先从研究代表作入手，逐个地击破，其余的史学著作的研究就势如破竹，比较省力。最后，他提出，研究中国史学史，还需要研究有关的外国资料。①

关于史学史理论问题研究的文章还有一些，如朱永嘉《论史料学、历史编纂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学术月刊》1963 年第 5 期)等。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些政治批判运动，"阶级斗争为纲"基本路线影响下的"左"倾思想，已影响了当时的史学史研究，以上已有反映。到了 1965 年，有的文章更"左"了，如林迅《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根本目的何在——对〈简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一文的商榷》一文说："师宁同志显然把旧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看成是同阶级斗争无关，超出于阶级之上了。那么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支配又如何理解呢？难道旧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不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吗？难道用一个'纯学术'的局限性就真的能把中国史学史研究和阶级斗争隔离开来吗？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②这篇文章"阶级斗争为纲"的色彩更浓了，政治批判色彩更浓了。

总的来说，60 年代初期，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已有深度，新型的中国史学史怎么写已有眉目。正是在学科的理论问题研究上的深入，为学科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大推动了史学史研究的发展。

在 60 年代初期史学史研究的小高潮中，白寿彝做了很多工作。一是完成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1964 年内部印行)。③该教本从先秦写到刘知幾，分作两篇，第一篇"先秦、秦汉间的史学"，第二篇"汉魏南北朝唐初的史学"。从《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的章节设置来看，怎么分期，还不够明朗。而且各章基本是以史家或史书名称为标题，在形式上还受到史部目录解题写法的影响。白寿彝曾评

①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人民日报》1964 年 2 月 29 日。

② 林迅：《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根本目的何在？——对〈简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一文的商榷》，《文史哲》1965 年第 1 期。

③ 1964 年 8 月内部印行，印数 500 册。现收入《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价《中国史学史教本》说，“现在看来，这本教材还摆脱不了一般学术专史的模式，旧的包袱还相当重”，[1]大概是就此二点而言。草创之书尽管有些不足，但在内容上则基本摆脱了旧式影响，重视从历史观点、历史材料、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等四个方面去揭示史著的成就和价值。史家生平、史书卷帙及修撰经过、流传情况等在其中占的分量很小。在介绍史著的完成过程时，注意到了时代背景对作者的影响及作者的学术渊源，表明力图把史学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研究。《中国史学史教本》特别注意抓住史家、史著的特点。如关于司马迁，重点剖析他的史学思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最能反映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因此成为研究的重点。白寿彝认为，如何看待天人之际，这是汉武帝时期重大的政治性理论问题。《史记》从历史上“究天人之际”，是跟当时正宗儒学所宣扬的、方士们所粉饰的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立说的官学相对立的，是以无神论跟有神论相对立的。《史记》以“通古今之变”的态度去看历史，这是跟正宗儒学对立的又一个方面，是跟后者倡言“天不变，道亦不变”“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相对立的。也就是以一种历史态度跟武断的非历史态度相对立的。《史记》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史记》提出来“通古今之变”的方法。其他如“《汉书》的博洽”，说明《汉书》以“博物洽闻”而对后世史学有重大影响。“陈寿的‘史才’”和“袁宏的‘名教’观点”从不同方面揭示了两位史学家的个性特点，并通过他们的个性，反映出魏晋时期的社会风貌，其中，不乏传神之笔。《中国史学史教本》能够从史著、史家的特点出发，将史学的发展写得有血有肉，明晓易懂，并从史学的四个层面剖析史著，深入到史著的内部，摆脱了要籍解题式的研究模式，明显地深化了史学史研究。《中国史学史教本》虽只是半部中国古代史学史，但新型史学史的面貌已初步呈现。二是从 1961—1964 年，白寿彝发表了关于中国史学史的文章近 30 篇，如《中国史学的童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 年第 2 期)、《司马迁与班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 年第 4 期)、《陈寿、袁宏和范晔》(《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4 年第 1 期)，等等。这些文章成为撰述史学史教本的基础。三是主编了《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该刊创刊于 1961 年 6 月，为内部交流刊物，不定期出刊，任务主要是配合中国史学史教材的编写。1964 年 7 月停刊，共出 9 期。每期大多有一个主题。9 期所刊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有影响、有价值的专题研究论文，如翦

---

[1]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77 页。

伯赞的《中国历史学开创者司马迁》、侯外庐的《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杨翼骧的《裴松之与〈三国志注〉》等论文都在上面转载过；二、札记随笔，如《读〈山海经〉札记》、《读〈左传〉札记》等；三、关于史学名著评论的选辑，如《〈三国志〉评论选辑》、《〈后汉书〉评论选辑》、《历代〈史记〉评论选辑》等；四、关于史学史基本问题的讨论（综述文章或专文）；五、中外史学史著作目录。每一期的内容对中国史学史教材的编写都很有用。

吴泽带领华东师范大学的团队也做了很多工作。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也完成了大部分章节和专题的初稿，并编了《中国近代史学史资料选辑》。[①]吴泽也发表了一些史学史具体问题研究的论文，如《王船山历史观略论》（《江汉学报》1962年第12期）、《魏源的变易思想和历史进化观点——魏源史学研究之一》（《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魏源〈海国图志〉研究——魏源史学研究之二》（《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等等。还举办中国史学史讲座，如吴泽讲"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观点"，[②]请柴德赓讲"关于陈垣史学研究"。[③]

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史学史活动也很活跃。1961年下半年，南开大学历史系开设的史学专题讲座有"中国史学史发展简介"。[④]杨翼骧发表了《我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天津日报》1961年12月6日）等。并在历史系的一次讲座中作了重新评价裴松之、范晔的学术报告。[⑤]

编写史学史教材，不仅带动了史学史理论问题的研究，更带动了具体史家、史著的研究，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初的四五年里与史学史相关的论文发表了240余篇（其中一部分论文已收入吴泽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一、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研究较多的是孔子、《左传》、司马迁或《史记》、班固或《汉书》、刘知幾或《史通》、《资治通鉴》、郑樵、顾炎武、王夫之、章学诚或《文史通义》、乾嘉学派、魏源、梁启超等，也有张磊《略论孙中山的社会历史观点》（《学术研究》1963年第1期）等等。

如关于《春秋》，束世澂《孔子〈春秋〉》，比较全面的评述了孔子与《春秋》的关

① 详见《文汇报》1962年9月4日第2版，本报记者：《大学教授的礼物》。

② 详见《文汇报》1962年6月5日第3版《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观点——吴泽在华东师大所作的一个学术报告的摘要》。

③ 详见祖贻：《华东师大文科开设多种讲座》，《文汇报》1962年4月10日第1版。

④ 详见《文汇报》1961年6月22日第1版《学术活动简报》。

⑤ 详见《文汇报》1962年7月5日第1版《学术活动简报》。

系,《春秋》与《春秋三传》的关系,重点研究了《春秋》的史观和它的编纂方法,对它在史学史上的地位作了评价。文章认为,流传至今的《春秋》是孔子作的,"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不是直抄而是有所笔削的",说"孔子以前的'百国春秋',性质也只是记注。只有孔子《春秋》有剪裁、有史义,才是第一部历史著作。记事本是史官的职守,孔子作《春秋》则是私人写史,他又是私家修史的开创者,替我国史学开辟了广阔疆土"。[①]杨翼骧认为,"实际上,孔子是根据鲁国和周王室以及其他诸侯国的史官的记载,加以修改,编写成一部简单的近现代史书,作为向学生讲授的课本,以进行辨别是非、劝善戒恶的历史教育","《春秋》虽然记事太简单,不能满足读史者的要求,但它是我国最早由私人写成的历史著作,在史学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②]

关于《左传》,徐中舒的《〈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和戚立煌的《〈左传〉历史观初探》较有影响。徐文的内容包括:《左传》的名称,《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左丘明与《左传》、《国语》的关系,《左传》所依据的文献,《左传》成书的年代及其流传。他说,《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省称,西汉时代并无此名。左丘明的年辈约与孔子同时,他是当时最有修养的瞽史。春秋时代史实的积累、会通,瞽史要起到主要的积极的作用。《左传》出自瞽史左丘明的传诵,最后由子夏一再传弟子搜集更多的文献,排比整理,剪裁润色,编写成书。[③]戚文从《左传》对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左传》的社会进化观、《左传》中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左传》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左传》对"史"的作用的见解等方面,对《左传》的历史观进行了分析,认为《左传》否定天道、鬼神,提倡中央集权,大胆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正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推动作用。[④]

对司马迁《史记》的研究,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多,涉及的问题也多,如关于司马迁的生卒年和死因问题、《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史记》的历史编纂学、司马迁的史学思想等。司马迁的生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以王国维为代表;另一种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以郭沫若为代表。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就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如郑鹤声、程金造等均从王国维之说,而王达津则支持郭沫若的观点,两种观点终未取得

① 束世澂:《孔子〈春秋〉》,《历史研究》1962年第1期。
② 杨翼骧:《我国史学的起源与奴隶社会的史学》,《天津日报》1961年12月6日。
③ 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历史教学》1962年第11期。
④ 戚立煌:《〈左传〉历史观初探》,《文史哲》1963年第6期。

一致。司马迁的卒年，主要有“武帝末年说”和“武帝以后说”。这个问题限于资料不足，也没有取得一致或接近的认识。翦伯赞、齐思和、陈可青、卢南乔等介绍了司马迁的生平、政治观点，论述了《史记》写作的资料来源、《史记》在中国史学及世界史学上的地位。白寿彝发表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成果较多，他对司马迁的叙事、论事的方法和特点作了细致的挖掘，归纳出《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的几种具体形式。其撰写的《司马迁与班固》，全面地评述了二人的史学成就。特别是他1963年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课，对《史记》的论述，更是视野开阔、见识高远。以后整理成册，以《史记新论》的书名于1981年由求实出版社出版。

关于班固和《汉书》，冉昭德从总结《汉书》的成就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认为《汉书》不失为断代史的典范。第一，班固掌握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并重视审查资料，辨别真伪。第二，班固善于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它一面继承《史记》，一面又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第三，在史书编纂上，整齐了纪传体的体例，为后世所沿袭。第四，对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有较详细的记载，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第五，在历史观点上，能从人民的利害关系，来衡量政治得失，能从经济关系来论述历史。①白寿彝称赞了《汉书》的博洽，但又认为《汉书》具有折中主义的特点。班固用正宗的观点，挤掉了《史记》的进步精髓。《汉书》在史学史上的成就，是在思想性和技术性矛盾下的成就，是技术性远远超过于思想性的成就。②

刘知幾、郑樵、章学诚是中国传统史学中三位著名史学理论家，历来为史学史研究所重视。关于刘知幾及其《史通》的研究，60年代发表论文多篇，并出现了争鸣。如白寿彝、侯外庐、任继愈③等人认为刘知幾具有无神论思想和历史进化思想，主要根据是《史通》对董仲舒、班固等人将灾异附会人事的若干说法进行了批判。王玉哲的观点则相反，认为在《史通》中，“刘知幾驳斥的不是灾异本身的不可信，而是驳斥和揭露从董仲舒到班固那些汉儒们对灾异解释的不确”。在原则上，刘知幾是相信鬼神灾异的。④学者们还对刘知幾的家学渊源、对各家史学的评论及其历史观、史学理论等进行了研究，而重点研究了他的历史编纂学主张。对郑樵的

---

① 冉昭德：《班固与汉书》，《历史教学》1962年第4期。

② 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

③ 白寿彝：《刘知幾的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9年第5期；侯外庐：《论刘知幾的学术思想》，《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任继愈《刘知幾的进步的历史观》，《文史哲》1964年第1期。

④ 王玉哲：《试论刘知幾是有神论者——兼与侯外庐、白寿彝两先生商榷》，《文史哲》1962年第4期。

研究，据统计，60年代发表的论文有11篇，研究范围包括郑氏的生卒年、郑樵写《通志》的经过、郑樵的学术生活、郑樵的史学思想。福建和厦门的史学界还专门举办研究郑樵的专题学术讨论会，出版了论文集。白寿彝《郑樵对刘知幾史学的发展》，从历史观、史学思想和历史编纂学三方面与刘知幾的史学进行比较，认为郑樵发扬了刘知幾的批判精神，一是反对阴阳无行、灾祥符瑞之说的正宗神学，二是反对褒贬之说的正宗史学，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①]关于章学诚的文章，约有12篇，研究了章学诚的方志学思想、目录学和校雠学。傅振伦《章学诚在史学上的贡献》、柴德赓《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等是较为系统的研究章学诚史学的文章。傅氏多从正面表彰章学诚对史学的贡献，如他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扩大了史学的范围，提出撰述和记注的区别和不同要求等。[②]傅氏在解放以前研究刘知幾时，比较重视刘知幾和章学诚对比，此文在以前的基础上又有所进展。柴文对章学诚批评较多，并说："像章学诚这样一位学者，我觉得近年来肯定得过多了些，批判得太少了。"如章学诚有歧视妇女、维护封建礼教的卫道观点，等等。[③]

60年代史学史研究的其他史家、史著情况，不再一一尽述。总的来看，这时期的研究成果资料比较扎实，论述严谨，反映出良好的学风。当然，当时政治上"左"的思想的影响，也难免有所反映。

正在史学史研究逐渐热起来时，"文革"的爆发，把刚刚开始的史学史研究发展的大好势头一下子扼杀了。

（二）"文革"10年（1966.5—1976.10）

"文革"时期，与整个史学界一样，史学史研究的领军人物都遭到批判、批斗，已经发表的论著大多被批为"大毒草"、"贩卖封资修黑货"，史学史研究戛然而止完全停顿，十年间，没有一篇史学史的文章发表。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1961年以后刚刚起步的《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编写，完全停顿。很多学校的史学史研究及史学课也一下子停了。如张孟伦就是在史学史研究的小高潮中，1964年在兰州大学历史系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写下了一些讲稿。但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讲课写稿，也都停下来"。[④]

---

① 白寿彝：《郑樵对刘知幾史学的发展》，《人民日报》1961年4月6日。

② 傅振伦：《章学诚在史学上的贡献》，《史学月刊》1964年第9期。

③ 柴德赓：《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光明日报》1963年5月8日。

④ 张孟伦：《中国史学史》（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自序》。

"文革"结束后的两年，又是一个"百废待兴"，随着史学领域的拨乱反正展开，历史学的各个领域建设逐渐走出"左"的阴影，走上正常发展轨道。但真正走上正常、健康发展轨道是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以后。

(三) 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12—2000)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以后，随着历史学的各个领域建设的复兴，史学史学科建设也随之复兴并加速发展。

白寿彝主编《中国古代史学史》、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尹达主编《中国现代史学史》等，重新上马，恢复研究。为了恢复研究中国史学史，一是招回一些老人马，二是培养一些新生力量。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院历史所都建立了史学史教研室、研究室。以后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又建立了中国史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华东师范大学史学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南开大学历史系率先招收史学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很快又招收史学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以后史学史硕士点、博士点不断增加。史学史研究的新生力量很快成长起来。各大学历史系相继开设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课，相应的教材陆续编印，有的公开出版，史学史教学、研究的队伍前所未有地迅速壮大起来。老中青史学史研究队伍的形成、壮大，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史学史研究迅猛发展的强大动力。1979年，白寿彝主编、"文革"前创刊的《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复刊，改名《史学史资料》，1981年又更名《史学史研究》，这一学术阵地的稳固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史学史研究的发展。

1985年3月，在北京举行了史学史座谈会，这是第一次全国性的史学史学术会议。[①]以后有关的学术会议陆续举行，也有力地推动了史学史研究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中外学术交流的发展，大陆与港澳台学术交流的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史学史研究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不仅学术论著的交流方便了，台港出版、发行、发表大陆的学术论著，大陆出版、发行、发表台港的学术论著，大陆学者读台港学者的论著，台港学者读大陆学者的论著，成为常态；学者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也方便了，相聚一堂开学术讨论会，易地讲学，易地进修、学习，也成为常态。1998年6月，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学者在台湾台中市举行史学史研讨

① 参见凌晨：《史学史座谈会纪事》，《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会,是两岸三地共同推动史学史研究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以后两岸三地的交流发展更为迅猛。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复兴并加速发展,首先反映在理论问题的研究上日益深入,这是史学史学科建设发展自身的需要,同时也受到了史学界史学理论研究发展的推动。史学史理论问题研究的深入,主要体现在:

第一,把史学思想、史学观、历史观作为史学史的重要研究对象、内容。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很多人对讲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内容时,大多把史学思想、史学观、历史观作为其中的一项。郭圣铭、陈光崇、王天顺、桂遵义、陶懋炳、仓修良等,在各自的文章或著作中,都有这样的认识。白寿彝在 80 年代初发表的数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讲的是史学史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一篇谈到的就是史学思想问题。吴怀祺《史学思想和史学史研究》,论述了研究史学思想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意义,并对史学思想的内涵作了界定,指出:"史学思想内容很丰富,要研究的东西很多,归结起来,是两个部分,一是史家(包括思想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二是关于史学工作方面的认识"。"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又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历史社会和历史过程的认识,二是对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史家对史学工作的认识也有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工作'的问题,史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体现为史料学观点、历史编纂思想、历史文学观点和历史研究方法论。……二是'为什么工作'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体现为史学价值论、史学的社会功能的观点。……诸如'垂训'的观点、'资鉴'的思想、史学'经世致用'的观点、爱国史学思想,等等,都是对史学工作意义的认识"。[①]这就为系统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史奠定了理论基础。

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重视史学思想。编者在制定撰写原则时,明确提出"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我国丰富的史学遗产进行批判、总结,重点放在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上"。[②]

第二,强调史学史要有"史"的特点。长期以来,中国史学史著作受史部目录解题的影响严重,"史"的特点不突出。民国时期的史学史著作自不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唯物史观的学习,认识到这个缺陷。但真正克服这一缺陷,并非易事,直到 80 年代,出版的几部史学史著作,仍然没有摆脱这一局限。对此,吴怀祺呼吁"史学史要有'史'的特点"。他指出:"史学史也是史,史学史专著应该有

---

① 吴怀祺:《史学思想和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研究》1986 年第 2 期。

② 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编者说明》,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史’的特点，这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从正式出版的许多专著来看，其中固然有许多优点值得我们重视，但‘史’的特点却是不明显”。要改变这种状况，他认为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注意探讨：一、史学史对史学要有综览全局的考察，要研究史学的发展规律。对于史学上的问题，既要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同时也要把握史学的总趋势，进行综合比较研究；二、史学史要研究每个时期史学的潮流和特点；三、史学史论述史学发展要和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联系起来进行考察。①白寿彝在总结80年代初的史学史著作编纂成绩时也说：“近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保留了要籍解题式的影响还相当重，这也许可以说，是史学史研究工作中所难免的过程。但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而这种改变的本身就是一种脱胎换骨的过程，不可轻估。”②强调：“要把史学发展过程的脉络写出来，至少能给读者一个比较清楚的发展轮廓。要把历史时代的特点及其跟史学发展的相互关系写出来。要把史学史的学术生活和学术成就摆在时代的潮流中去把握。”③这实际上给史学史著作的撰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的要求，也只有在史学史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才能提出来。

第三，在史学史分期问题上，重视考察多方面的因素。这一时期，史学史的分期问题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因为要进行史学史著作的撰写，首先就要解决这一实际问题。中国近代史学的分期，基本上是上限1840年，下限1949年，以五四运动为界，分前后两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的史学称当代史学。对此，没有多大异议。分期的不同看法主要是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有两段分期法、四段分期法、五段分期法、七段分期法之不同。④即使同样段数的分期，在怎样划段上也有不同。有代表性的分期有八种左右。之所以在分期问题上有分歧，主要原因是依据的标准不同以及对标准的把握不一。如有的以史书、史家等因素为依据，以不同朝代的兴替为分期标准，如张孟伦；⑤有的以史学自身的发展进程为分期标准，如陶懋炳；⑥有的以史学本身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点作为标准，如仓修良；⑦有的以社会形态的演

① 吴怀祺：《史学史要有“史”的特点》，《光明日报》1982年10月27日。
②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3页。
③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3页。
④ 参见张越：《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综述》，《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⑤ 见张孟伦：《中国史学史》（上、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1986年版。
⑥ 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⑦ 仓修良、魏得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变作为主要依据，如尹达；[①]还有的参考社会史分期，并综合考察史学史的多方面因素作为分期标准，如白寿彝。[②]中国史学史的分期还没有公认的定论，但重视考察多方面的因素，则日益得到多数人的肯定。

史学史理论问题研究的进展，自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学史论著的撰写，也大大推动了史学史学科建设。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复兴并加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反映是大量的内容多样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著作问世，新成果层出不穷，研究领域快速拓宽。从时限看，中国史学上自古代、下至近代以至于当代，都进入研究的范围。较之过去，近现代史学的研究受到更多的关注。从内容上，研究者们大多力图走出史官、史家、史著的模式，而关注史学发展的脉络及其阶段的特点，关注史学思想、史学思潮的演变，关注史学与其他学问的关系，关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有通叙史学之整体发展趋势者，也有着重论述某一断代史学面貌者，有着重爬梳史学流派而分别予以评价者，也有就某一史家或史著写成专书者；有专论某代官方史学者，也有专门研究野史者；有叙述史官制度的，也有集中论述某一史书体裁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还有就某个少数民族的史学作专门研究者。对各个时代的史家、史著、史学流派的研究日趋广泛深入。大花、小花、老花、新花形形色色、千姿百态，真正是一个百花怒放的大好景象！以下略述之。[③]

第一，通史型著作众多。1980—2000 年，以“中国史学史”为书名的通史型著作有 20 种之多，如：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 1982 年版）、仓修良等《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张孟伦《中国史学史》上、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1986 年版）、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高国抗《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施丁《中国史学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周春元《中国史学史》（贵州师大学报编辑部 1989 年印）、邹贤俊主编《中国史学史纲》（华中师范大学

---

① 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③ 以下参考了瞿林东：《走向中国史学深处——近二十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

出版社 1989 年版)、宋衍申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张家璠等主编《中国史学史简明教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 1997 年版)、李炳泉等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等等。以后,2006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寿彝主编六卷本《中国史学史》,从先秦论述至近代(1919 年前),这是篇幅最大的中国史学史著作。

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不仅重视对重要史家与史著的研究,对于二、三流的史家也作了介绍,如汉代的刘歆、蔡邕,唐代的敬播、秦景通、刘伯庄等。此书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专著。

刘节《中国史学史稿》出版在 1982 年,大概在 50 年代就已完成,是在中山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的讲义。1961 年的《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登载了刘节的讲义目录《中国史料学与史学史》,[1]分为两部分,即史料学目次和史学史目次。《中国史学史稿》是第二部分内容,只是没有了原讲义中的最后三目:经学、小学与史学,新史料与新史学,结论。《中国史学史稿》全书未设章节,以一至十九的数字标目,除"一、叙论"以外,其他标目下又以甲、乙、丙、丁分出细目。叙论所谈基本是他的文章《谈史料学与史学史》的内容,涉及史料学、史学史的基本问题及二者的关系;谈到了中国史学史的分期。同正文中的分期思想有所不同,这说明二者不是同一时期撰著的。关于该著的成就,陈其泰曾有评述:"第一,把重点论述各个时代的主要史家与综述一个时期史学发展的概况结合起来","第二,注意到不同时期所具有的时代特点","第三,注重阐述史学演进的渊源联系,考镜学术源流","第四,提供了比较丰富的材料"。[2]这几点评述,是很符合实际的。所谓综述和重点相结合,就是每讲一个时期的史学,总要先介绍这一时期史学的基本概貌,大致上都是按史官制度、主要史家、主要史籍、史学发展状况的顺序叙述。这方面,著者采纳了梁启超的做法。在这种一般论述的基础上,又进行了重点论述,如"两汉史学概观"后,专列"司马迁与班固";"隋唐五代史学概观"后,专列"刘知幾的史学";"两宋史学概观"后,专列"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郑樵的史学";"辽金元明史学概观"后,专列"王夫之的史论";"清代史学概观"后,专列"章学诚的史学",等等。这样的写法,既能

---

① 标题下注有"中山大学油印讲义,印刷年月不详"。

② 陈其泰:《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成果》,载《史学史研究》1983 年第 3 期。

使人了解这一时期的史学全貌，又能从微观处看出该时期的史学水平，是可取的。该著重视论述史学的学术背景和历史哲学，如在魏晋南北朝史学里，专列“文学玄学与史学”，以说明其时代特点。在“隋唐五代史学概观”下，也专立子目讲“唐代的历史家和他们的历史哲学”。其他如论述重要的史家时，都注重讲他们的历史哲学。刘节明确提出，史学史“要把历史家的历史哲学系统地介绍出来”，这些内容就是向着这个目标努力。该著资料丰富，如对史官制度的论述，作者征引资料十分繁富，以致达到数十种。该书大量地运用了表，以简洁的形式，容纳了极其丰富的内容，反映了作者的扎实的学术功底。白寿彝评价说：“刘节注意到史学思想，这比起金毓黻来是个进步”。[①]要之，刘节在吸收民国时期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作了新的探索，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仓修良等《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对史学史研究的内容有明确的阐发，说研究中国史学史，“就是要研究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过程，并找出它的发展规律，不仅表现在形式上（如史体的演变、史著的产生、史料范围的扩大等），而且表现在内容上（如史学思想、史学流派、史学传统等）”。全书分为四编，作者从标题上就有意识地表明其对中国史学史的分期和各期特点的看法，编次依次是：中国史学的起源和战国秦汉间的史学，人物传记为中心的汉魏六朝史学，主通明变的唐宋元史学，具有启蒙色彩的明清史学。

张孟伦《中国史学史》，资料丰富，资料范围广涉经史子集。如《周礼》、真德秀的《读书记》、戴埴仲的《鼠璞》、吴师道的《礼部诗话》等，皆为一般史学史研究者鲜为注意的书。对一些比较重要或有争议的问题，作者更重视探讨。如关于《左传》、《国语》的作者，三国时蜀国的史官设置问题，作者都不惜笔墨进行考辨，反映出作者独特的学术个性。

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出版的第一部贯通古代和近现代史学的史学史著作。上卷为古代史学史，由四编组成，第一编自上古至《左传》，为奴隶社会的史学。战国中期到唐代刘知幾的《史通》为第二编，从杜佑的《通典》至宋明之间的史论为第三编，明清之际到乾嘉史学、章学诚的史学为第四编。下卷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史学史，分两篇，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萌芽为分界点。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我国丰富的史学遗产进行批判、总结，重点放在史学

---

①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7 页。

理论和史学思想上”。

施丁《中国史学简史》在科学性和通俗性的结合方面取得成功，深受广大青年和学生的欢迎。以22万字的篇幅，分五编叙述了自中国史学的产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史学。简明扼要、主线清晰是本书的鲜明特点。书中涉及内容广泛，不乏独到见解，如“史学中的世族问题”、“各族史学与民族问题”、“史学中的玄学与骈文”等都写得很有特色，对司马迁和司马光的研究尤见功力。

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分为五期：先秦是童年期，秦汉为成长期，魏晋到唐前期为发展期，唐后期至宋元辽金为繁荣期，明清（鸦片战争前）为晚年期。每编之首，概论该时期的史学状况，然后分章论述。注意把中国史学与世界同期史学作横向比较，指出二者的优劣长短。某些地方，写得十分新颖，如“战国诸子史论”、“理学大师朱熹的史学”等，是其他论著中较少涉及的。

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比较简略。该书的史学史分期独树一帜，所分的五期是：一、王官之学时期——史书以及历史知识为瞽史和史官所垄断。时间自上古到春秋末年。二、史书体例成熟时期——王官之学流入民间，为史学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受到了统治者加强控制的制约。时间自战国到南北朝之末。三、官修史书定局与史学新发展时期——官修史书形式的呆定，通史与新史书体裁的勃兴。时间为唐五代宋元时期。四、民间史学异军突起时期——史学范围的扩大是私修史书继续发展的结果。时间为明清时期。五、史学蜕变时期——国内与国际形势的发展，革命思想的高涨及西方史学思想传入国内的影响。时间为清末到民国时期。书中对先秦史学的论述，挖掘深刻，多有创见。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有以下特点：第一，对史学史的发展有高度自觉的总结意识，注意吸收前人在史学史编纂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及研究成果，反映出世纪之末史学史研究和编纂的新水平。第二，重“通”。从远古写到20世纪初。关于20世纪的史学，附录了两篇论文：《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和《百年史学断想》。在断限上，致力写出一部通史著作。本书的“通”，更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一）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写出每一时代的史学特点，以反映中国史学逐步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即注意纵通；（二）注意写出史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三）对于重要的史学现象，能够“穷源溯流”地予以论述；第三，视野开阔，兼顾全面和重点；第四，自觉把中国史学史写成多民族的史学史；第五，明代史学部分占有相当的篇幅，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命题，填补和加强了史学史研究在明代史学上的一

些空白或薄弱环节。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本》,是在20世纪60年代撰写的《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的基础上,由瞿林东、陈其泰、吴怀祺、施丁、顾诚等执笔完成。有以下显著的特点:第一,"通"。一是纵通,即重视史学发展前后时期的联系,重视贯通古今的史学发展规律;二是横通,即"把史学家的学术生活和学术成就摆在时代的潮流中去把握"。在撰述上,注重点面结合,既充分注意到史学史知识的全面,又在这个基础上有重点地深入论述。第二,讲究历史文学,可读性强。本书在表述中,很注意文字的准确凝练。史学家的学术面貌和治学风格,往往能用很简洁的语言描绘出来,彰显出史学家特有的魅力。是一部高水平的中国史学史著述,又是一部切实可用的大学教本。

如此众多的通史型著作,是此前任何时期都不曾有的。这是中国史学史整体性研究、宏观研究大发展和学科建设大发展的重要体现。

第二,断代史学的研究成绩显著。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体现。1989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是较早的断代史学史论著。该著虽是一部论文集,但由于研究范围皆在唐代,且有较强的系统性,对进行断代史学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此后古代史学史方面有: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黄山书社1992年版)、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姜胜利《清人明史学探研》(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罗炳良《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以后还有:庞天佑《秦汉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周少川《元代史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为200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等等。

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蔚为大观。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1989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很快就有很多这方面的著作出版,如: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马金科等《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高国抗等《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蒋俊《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齐鲁书社1995年版)、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都是力作。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为论文集,所收论

文大都是原创性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中国现代、当代史学史研究后来居上。套用一句旧话，可以说“厚古薄今”转向“厚今薄古”，当然这不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史学革命”，而是拓展史学史学术发展空间，也是总结中国现代、当代史学史研究经验教训迫切需要的必然。主要著作有：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陈启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刘新成主编《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曹家齐《顿挫中嬗变：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以后有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黄敏兰《20世纪百年学案·历史学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还有研究20世纪地方史学的著作，如张伟主编《20世纪辽宁史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在新旧世纪之交，总结20世纪史学的著作不少，并且有广度、深度。以后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著作更多，如：张越《五四时期中国史坛的学术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为200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等等。

1989年，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来的史学成就与经验教训的著作出版了两部：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按理论、断代史、专史、国别史、地区史等编次，共收入38篇总结性或综述性文章。文章多出于对各专题研究有素的专家，不仅总结和评述了本学科的发展成就，而且还指出了不足，对学科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展望和建议，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周朝民等《中国史学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以时间为线索，叙述了中国历史学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40年来的发展脉络，分四编：第一编，初步发展（1949—1966）；第二编，严峻考验（1966—1976）；第三编，拨乱反正（1976.10—1979年初）；第四编，继往开来（1979—1989）。该书的长处是提供了比较详实的史学发展状况的资料，注重结合社会形势论述史学发展特点，梳理了历史学各分支学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进展状况。这两部著作，前者分专题论述，有纪事本末体的特点，后者分阶段论述，为章节体，可以相互补充。以后还有张剑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有了更深入的研究、论述。

专著之外，80年代以来，每年发表有关现当代史学史的论文50篇左右，约占中国史学史论文总数的20%～30%，20世纪史学日益成为研究热点。《历史研究》

辟有专栏“20 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发表一系列专史研究的回顾性文章及宏观研究论文。《光明日报》“史林版”重视登载研究 20 世纪史学的文章，并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座谈。全国许多学术期刊也开设了与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相关的栏目。在所发表的众多文章中，林甘泉《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①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②瞿林东《中国史学：20 世纪的遗产与 21 世纪的前景》、③与《百年史学断想》、④于沛《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⑤等，较有高度和深度，对认识 20 世纪史学发展的脉络和特点、经验和教训等具有重要意义。

林甘泉的文章以时间为线索，论述史学在各个时期的不同特征，基本反映出 20 世纪史学演进的几个阶段：辛亥革命前（传统史学的危机与“新史学”的酝酿）、辛亥革命后至 20 年代末（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及其重要建树）、30 年代至 1937 年抗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与西方近代史学理论的传入）、1937—1949 年（史学在战争的艰难环境中茁壮成长）、1950—1976 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及其经验教训）、1976 年至 20 世纪末（充满生机的新时期历史学），即主要从纵的角度论述了 20 世纪史学的发展。

瞿林东的文章将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相结合，论述了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20 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思潮、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成就，偏重从横的角度对 20 世纪史学进行论述。

戴逸的文章把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特点和成就概括为六点，给人以新的启迪。这六点是：第一，进化史观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的显著标志；第二，唯物史观的运用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伟大进步；第三，20 世纪史学除了进化史观、唯物史观以外，再一个特点就是理性的觉醒、理性精神的发扬；第四，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第五，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在各个分支学科中进行开辟和创造，有重大建树，建立了历史学全面、系统的学科体系；第六，在 20 世纪，新史料大批发现，其质量之高、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以前任何朝代的发现。

林甘泉和戴逸等还讨论了 20 世纪史学的学派问题，他们都认为，中国 20 世纪的历史学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实证史学派（林文称“近代实证史学”，瞿林

① 载《历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
② 载《历史研究》1998 年第 6 期。
③ 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 年第 5 期。
④ 载《世纪论评》1998 年第 1 期。
⑤ 载《历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

东文章中名“新历史考据学派”)，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20 世纪的上半叶，实证史学派是中国史学的主流。20 世纪的下半叶中国史学的主流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划分学派时，他们都认识到，不能简单地用阶级属性来标识某个学派和某种学说。林甘泉说：“这里我说‘近代实证史学’，而不说‘资产阶级史学’，是经过一番考虑的。长时期以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同志，习惯于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家称为资产阶级史学家。实际上这种提法是否科学和准确，很值得研究。”“学派分野和阶级分野虽然有一定联系，却不能完全画等号，这是我们考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时，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①]戴逸也说：“过去，用资产阶级历史学和无产阶级历史学来区别这两个学派，用阶级属性来标识某个学派和某种学说，这未必能十分确切。阶级属性是由经济和政治地位决定的，知识领域里的阶级划分要复杂得多。”[②]这些认识，很值得深思。

戴逸还谈到了过去不同史学派别的相互影响及学术继承性，说：20 世纪前半期的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有许多重要的相通之处，如进化史观、理性主义、爱国主义、求实精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吸收了实证史学的优点并加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其他学派之间有一个相互学习和继承的问题。研究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不能割断学术上的传承和联系，简单地把历史学家们置于相互对立的营垒之中。[③]吴怀祺在《历史学百年·总论》中也谈到类似的问题，说：“不能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其他史学家的成就完全对立起来；也不能把具有不同学术观点、学术风格，当然也有不同的缺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立起来，进行褒与贬。”[④]“在一百年的史学发展过程中，每一时期都出现史学大家。这里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有其他史学家。他们的成就都是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他们在思想上有争论、斗争，也相互影响、吸收。”[⑤]近年来，学术界有一种现象，抬高一些史学家而有意无意地贬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夸大他们之间的对立，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不公正的。上述论述，实际上涉及研究 20 世纪史学的观念和方法论问题，对于推进研究工作的深入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关于 20 世纪史学的经验教训，大多认为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史学和现实的关

---

① 林甘泉：《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
② 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 年第 6 期。
③ 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 年第 6 期。
④ 刘新成主编：《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1 页。
⑤ 刘新成主编：《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0 页。

系。戴逸说:“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是20世纪历史学汲取的重要教训之一。历史与现实是联系的,现实由历史发展而来,历史学从根本上说要服务于现实。……但是,为现实服务,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必须尊重历史学自身的科学性”。①“历史学要保持相对独立的精神,不能变成政治的侍婢”。②瞿林东也说:“史学关注社会,是史学的本质所决定的,人们对此可以有不同的认识,但却无法改变史学的这一本质”。“但是,这种关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史学必须确保自己的独立品格不受到损害。史学的独立品格就是求真”。③这些总结,是从20世纪史学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得出的,是正确而深刻的。

关于外国史学理论在20世纪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研究,从来是和中国史学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内容,甚至出现偏颇,但其主流则是吸收外国史学理论中有益的营养成分,以丰富、完善和发展中国史学。于沛强调:“引入和研究外国史学理论,要立足于中国史学坚实的基础上。对其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同盲目地排斥、否定一样,都将对中国史学带来严重的危害”。对外国史学理论的借鉴和吸收,决不能脱离中国史学的传统和现实,不能脱离广阔的中国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否则只能有害无益,适得其反。这也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所证明了的一条基本经验。④

对20世纪史学的研究在持续,它会是21世纪史学史研究的一个常思常新的课题。

第三,各代史家、史著的研究火爆。如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刘知幾、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顾炎武、黄宗羲、章学诚、魏源、梁启超、李大钊、郭沫若等人的史学得到较多的关注。不仅有大量的研究论文,还有相当多的研究专著。如对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发表的论文近千篇,出版的著作40余种。过去没有解决的疑难问题,根据新发现的材料,继续进行研究。施丁《司马迁行年新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就很能反映这一特点。此外,司马迁的民族观、道德

---

① 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② 戴逸:《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③ 瞿林东:《百年史学断想》,《世纪论评》1998年第1期。
④ 于沛:《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观、人才观、改革观、价值观、系统观、审美观、经学观、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人本思想、叛逆思想等，都有专文和专著进行探讨。周一平《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理论》（华东师大出版社 1989 年版），率先涉足了司马迁的史学批评新领域。

对班固和《汉书》的研究在原来的基础上，重点挖掘其有益的史学价值，如《汉书》的实录精神；班固对统治者的残暴和社会的黑暗之揭露；班固利用了《史记》的材料，又补充了许多新的宝贵资料；《汉书》中的“通识”；《汉书》对纪传体史书的完善；《汉书》的典雅的文字表述风格等。陈其泰《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三联书店 1994 年版）是这一时期全面研究《汉书》的代表作。

对刘知幾的研究，赵吕甫《史通新校注》（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是一个重要成果。在版本上，该书以浦起龙的《史通通释》为底本，利用明清两朝的多种版本，对通释本进行校勘，纠正了通释本的一些错误。作者充分吸收了前人对《史通》的评论和近人对《史通》的研究成果，注释更加翔实，并对刘知幾的史学思想作了细致的评述。另外，许凌云《刘知幾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赵俊等《刘知幾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等也是研究刘知幾的力作。

对杜佑《通典》的研究，李之勤、陈光崇、瞿林东等的论著比较引人注目，李之勤着重强调了杜佑的历史进化论思想；陈光崇也论证了这一点，叙述了《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料学上的贡献，分析了杜佑将“食货”置于首位所表现出的进步思想。瞿林东《杜佑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系统地论述了杜佑的政治活动、史学思想。

关于司马光的研究，论著较多，如宋衍申《司马光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等。张须（煦侯）《通鉴学》（开明书店 1948 年版），是系统研究《资治通鉴》的一本小册子，影响甚大。1981 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作者的修订本。对司马光的研究，除研究《资治通鉴》外，又扩展到司马光的其他著作，如《资治通鉴考异》、《稽古录》、《史剡》等。论述范围包括司马光的史料学思想、历史编纂学思想、历史文学、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易学思想，《资治通鉴》的修纂过程，历代对《资治通鉴》的校勘、注释、增补等。

关于郑樵的研究，吴怀祺用功较深，校补了《郑樵文集》（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作《郑樵年谱稿》，出版了《郑樵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使郑樵的研究有明显的推进。

汤勤福《朱熹的史学思想》（齐鲁书社 2000 年版），对朱熹的历史哲学、治史方

法论、史著编纂思想、史学批评思想及朱熹史学思想在宋代史学上的地位、朱熹史学思想对日本及朝鲜半岛的影响等都进行了深入研究、论述，别开生面。

顾炎武的研究，在 80 年代初有多篇文章发表，赵俪生、施丁、陈祖武等先生的文章比较有分量，此外，赵俪生还著有《顾炎武与王山史》（齐鲁书社 1986 年版），对顾氏的生平大略、重要思想、学术交游等作了宏观透视，并采用了作者搜集的新资料，反映了作者在顾炎武研究上的厚重积累。周可真吸收了多种顾氏年谱的成果，作了更加翔实的《顾炎武年谱》（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对章学诚的研究，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拓展。章氏的“六经皆史”的含义，章氏的“史德”论，章氏关于历史认识主、客观关系的认识，章氏对史书义例的论述，章氏的方志学理论，章氏对通史编纂的探索，章氏史学理论与刘知幾史学理论的不同点，章氏的易学思想等等，都有涉及。在盛赞章氏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重大贡献的同时，也认识到他的局限性。如认识到他的“史德”论，一方面是要尊重客观事实而不掺杂主观偏见；一方面又要求不背于封建名教。在章氏的史学研究上，仓修良的研究成果较多，出版有《章学诚与文史通义》（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章学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等著作。值得一提的是，1985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叶瑛校注的《文史通义校注》。此书虽是作者解放前的著作，但长期以来一直未出版。该书采用《文史通义》的大梁本，附有《校雠通义》，注文十分翔实，引据资料达 300 种左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书的出版，对《文史通义》的研究，应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此外，方诗铭等《钱大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顾吉辰主编《钱大昕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李成良《阮元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等，都是颇见功力之作。

此外，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起推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4 年起推出“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丛书，都收入了很多中国古代至近代历代史学家的传记。

现、当代史家的研究著作，特别是传记，大量出版。如：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2 年开始推出《国学大师丛书》，至 1999 年已出版的史学家“评传”有：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罗振玉、刘师培、陈寅恪、胡適、柳诒徵、郭沫若、顾颉刚、钱穆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起推出《往事与沉思》传记丛书，至 2001 年已出

版的史学家传记有:《我的父亲顾颉刚》(顾潮)、《谭其骧前传》(葛剑雄)、《谭其骧后传》(葛剑雄)、《蒲梢沧桑:九十忆往》(傅振伦)、《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何兹全)、《吕思勉传》(张耕华)、《我的父亲童书业》(童教英)等。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开始推出《20 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至 2000 年已出版的史学家"学术思想评传"有:梁启超、郭沫若、范文澜、顾颉刚、钱穆、傅斯年、翦伯赞、吕振羽、陈垣等。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8 年起推出的《百年人生丛书》中有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等。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起推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丛书》,1999 年、2000 年两年间出版的史学家学述有:《金景芳学述》、《王钟翰学述》、《王永兴学述》、《王利器学述》、《傅振伦学述》、《周一良学述》等。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推出《当代江苏学人丛书》,至 2003 年出版有:《历史学家韩儒林》、《历史学家罗尔纲》、《历史学家茅家琦》、《历史学家王绳祖》等。

此外,研究郭沫若的著作还有:卜庆华《郭沫若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年修订版)、龚济民等《郭沫若年谱》2 册(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1983 年版)、叶桂生等《郭沫若的史学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林甘泉等主编《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等,总计有数十种。

研究吕振羽的著作还有:刘茂林等《吕振羽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朱政惠《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戴开柱《吕振羽早期思想与实践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朱发建等《吕振羽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湘籍史学家研究丛书》之一)等。

研究翦伯赞的著作还有:张灿辉《翦伯赞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湘籍史学家研究丛书》之一)、张传玺《翦伯赞传》(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等。

研究范文澜的著作有:董郁奎《新史学宗师——范文澜传》(杭州出版社 2004 年版,《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之一)等。

还有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 1985 年版)、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 1986 年版)、冯尔康等《郑天挺学记》(北京三联书店 1991 年版)等等。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研究也向史学领域延伸。除了李大钊的研究较多(文章很多,著作后来有张文生《李大钊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

版)外,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史学关系的有: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出版社1993年版)、唐曼珍《毛泽东与中共党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邹兆辰《毛泽东对历史的考察》(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中共党史研究史家的研究著作也开始问世,如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蔡和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等。

除了研究著作外,研究现、当代史家、史著的文章更多。《晋阳学刊》编辑部把在刊物上陆续发表的现、当代史家的传记文章汇编成10辑《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1987年版),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杂志)编辑部等编了11辑《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1990年版),这两套传记集收入了中国现、当代很多著名史学家的传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自传,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史学史研究》的"人物志"栏目也刊载对现、当代史学家的研究文章、访问记,涉及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胡適、陈垣、陈寅恪、李济、董作宾、顾颉刚以及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吴晗、华岗、何干之、白寿彝等等。

总之,对历代史家,特别是现、当代史家的研究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很多史家的传记论著,对史家的生活经历、学术道路、政治思想、史学成就等都有深入的论述,很多著作可读性强,不仅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还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是史学史研究走出专史象牙塔,密切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反映。

第四,各种专史、专题史史学史著作异彩纷呈。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的重要体现。

史学思想、史学思潮研究成果极为丰硕。吴怀祺在出版《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以后,又主编了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黄山书社2002—2005年版)。断代史学思想史研究著作,详前"断代史学的研究成绩显著"。近代、现代、当代史学思潮研究成果有:胡逢祥等《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胡逢祥《社会变革与文化传统——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王学典《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学典《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邹兆辰等《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等。以后还有: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盛邦和《现代中国史学与儒学

思想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等等。

中国古代史学史相关的专题史研究成果有:许凌云主编《儒学与中国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等等。

史记研究史有:张新科等《史记研究史略》(三秦出版社 1990 年版)等。

文物研究史有:国家文物局《国之瑰宝:中国文物事业五十年:1949—1999》(朝华出版社 1999 年版)等。

方志研究史有:林衍经《方志学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王德恒《中国方志学》(大象出版社 1997 年版)、许卫平《中国近代方志学》(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等等。

中国现、当代史学史相关的专题史研究成果有: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曾景忠《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等等。

中共党史史学史异军突起,研究成果不少:

贯通型、整体型的成果:张静如等主编《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湖南出版社 1991 年版)、周一平《中共党史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田子渝等《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等等。

阶段型成果:郭德宏主编《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杨先材主编《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综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版),等等。

专题型成果:周一平《毛泽东生平研究七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周一平《毛泽东思想研究史稿》(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6 年版)、侯且岸《毛泽东研究史论》(北京出版社 1996 年版)等。述评类的著作与史学史著作的编纂方法有所不同,大多为专题论文汇编,有论文集特点,但还是研究史、学术史性质的著作,与史学史著作相近,所以也作一介绍。中共党史研究述评类的著作很多,其中有:石仲泉主编《毛泽东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陈绍畴主编《刘少奇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李海文主编《周恩来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任清等《国内邓小平理论研究述评》(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印进宝等《邓小平理论研究综述》(解放军出版社 2000 年版),等等。

中共党史史学史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张静如等人是开拓者,周一平又继续进行开拓,尽管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但成果还不多,各方面的建设刚刚起步,有待于更快地发展。

中国史学史的专史、专题史研究领域,有待开拓的还不少,中国史学史研究要向纵深发展,必须更多更快开拓专史、专题史研究新领域。

第五,工具书、资料书的编纂得到重视。工具书、资料书的编纂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哪个学科的工具书、资料书编纂发展的好,那个学科的发展就快就好。后来者要迅速进入一个研究领域,就必须通过相关的工具书来了解、熟悉这个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工具书、资料书出版了一些,较重要者如下。

中国史学史最重要的工具书是吴泽、杨翼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年版为分册本,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 年版为总册本),收入的词条包括历史科学的一般术语、史官、史家和史籍等,上自先秦下迄 1911 年。史官侧重选收古代部分。史家主要选收知名史学家,其史著失传但在史学史上具有影响甚或虽无史著但其另外的著作与史学关系密切者,也酌情收入。史籍包括史论、史著、典志、表谱、辑佚、史评及史籍校勘等。此外,外国人写的中国史书,中国人写的外国史书、通俗史学著作等也视其史学价值酌收。史家主要介绍传主的生卒年代、籍贯、名号、官职及史学成就;史著则主要介绍作者、内容、版本、注释及存佚流传情况等。对于一些特殊问题,如同书异名、外文译本等也加以说明。此书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唯一的史学史专业辞典,其编纂和出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稍后,周一平等组织编纂了《中共党史史学史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收入的词条包括中共党史学的一般术语、中共党史研究史家和史著等。此书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中共党史史学史专业辞典。此外有周伟洲主编《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7 年出版第一册(先秦至五代),1994 年出版第二册(两宋),1999 年出版第三册(元明),第四册(清)杨翼骧生前基本完成,但未出版,后由门生乔治忠等修订,2013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作为一部贯通性的史学史资料集,对史学史研究,既提供了真实、系统、丰富的资料,又起到了指示挖掘史料门径的作用。

乔治忠等《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是中国史学史

的研究史，也是指示中国史学史研究门径的工具书。集学术性、资料性、工具性于一编。

陈光崇主编，赵俊编辑《中国史学史论文、著作索引》（辽宁大学历史系 1983 年印），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史学史论著索引工具书。所收范围，自 1900—1981 年，包括 1949—1968 年台湾省报刊所载中国史学史方面的论文和 1900—1975 年香港、台湾出版的中国史学史方面的著作。为史学史研究进行检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杨燕起等编辑的《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台北博远出版公司 1990 年版），收集了自《史记》问世至 1949 年的有关《史记》的评论资料，采集书籍文献 400 余种。这些资料，既可展示各个历史时期《史记》研究的倾向、重点和新观点，又为进一步发掘史料提供了线索。这是一部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谢国桢的《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1932 年北平图书馆印的初版《晚明史籍考》为 20 卷，1964 年中华书局出版《增订晚明史籍考》，后又加修订，1981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 24 卷。汇集了十分丰富的晚明史籍资料，其中涉及的绝大多数史籍都是谢国桢自己的收藏，为一般图书馆所无。是研究明清史的一部必不可少的参考书，也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明清史学史研究奠定了重要的资料基础。

（四）反思与自觉

“任何一门科学，随着它的日益发展成熟，都必然要在两个方面取得成绩：一是对它的研究对象的研究的深入，二是对本学科自身的研究的深入，并且正是后者的发展水平，标志着该学科成熟的程度。也就是说，一门学科的发展，必然要不断进行对于自身的反省和认识，并把这种反省和认识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系统的知识体系，为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① 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应该说已有不少的研究，而史学史研究的反思还只是开始，需要更深入地进行，以便进一步提高史学史研究的自觉，进一步推动史学史研究的发展。

对史学史研究的反思应该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提高对史学史研究的地位、作用的认识。白寿彝在论及史学史在史学工作中的地位时曾说：“从发展上看，史学史是史学发展以后才有可能出现的。从学

① 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 页。

科结构上讲,史学史是较高层次的史学工作。史学只是研究历史。史学史要研究人们如何研究历史。它比一般的史学工作要高一个层次,它是从总结一般史学工作而产生的……史学史的工作就是要批判、总结我们这个行业的成就,……史学史的研究结果,可以上升为史学理论。史学理论或其中的一部分,可以上升为历史哲学。历史哲学既是史学,又是哲学。”①是不是现今的史学史研究者都有二十多年前白寿彝这样的认识,未必。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

第二,提高对史学史研究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对史学史研究社会价值的认识与对史学史研究地位、作用的认识密切相关,提高了对史学史研究社会价值的认识,就能进一步提高对史学史研究地位、作用的认识。从史学史学科的性质来说,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对象的价值判断。学术价值指研究这门学科的学术意义,在学术领域内有什么作用。社会价值指研究这门学科(或发展这门学科)对推动社会发展有什么作用。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具有统一的一面,因为学术领域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何在?首先,史学史是学术领域的一个学科,是学术领域、史学领域必不可少、必须建设的学科,史学史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研究活动,其研究成果及其提供的学术知识、学术认识,对史学建设、学术建设有学术意义、有学术价值;其次,史学史研究和总结既往史学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揭示史学发展的真相和规律,发现史学发展的真理,为现实史学的发展提供营养、资鉴、指导,从而推动史学的发展,这方面的学术价值也是巨大的。是不是了解、掌握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规律、真理,对于现实中的史学研究成败有重要意义。白寿彝创立新综合体以编纂大型的《中国通史》,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若没有对中国史学史的深入研究,是根本做不到的。史学史研究对于史学研究的推动作用是直接的,容易被认识。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社会价值何在?首先,史学史作为一个学科本身就是社会文化事业的一部分,把史学史研究好,把史学史学科建设好,本身就推动了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其次,史学史研究推动史学的发展,推动学术的发展,也在推动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发展;再次,史学史研究能推动史学为社会服务,使史学更有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比如推动史学更好地总结历

---

① 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的几点意见》,《史学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

史经验教训为现实社会服务，推动史学更多地提供有用的历史知识、历史智慧为现实社会服务，推动史学更好地发挥教育人民群众的作用为现实社会服务，推动史学更好地批判继承中国古代、近现代、当代的历史遗产为现实社会服务，等等。史学史研究还可通过研究历代史家如何关注思考现实、如何认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其史学作品对历史和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推动和影响当代史家关注和思考现实，推动当代史家的史学实践更好为现实社会服务。史学史学科的发展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受到社会发展推动的，反过来，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也将推动社会的发展。史学史研究的社会价值，不易被认识，或不易被全面认识，提高这方面的认识仍是迫切的任务。

第三，提高对掌握、运用科学理论的认识。史学史与任何学术研究一样，都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研究就会有局限性，就难以达到科学的境界。如梁启超、金毓黻等人就是因为理论认识的局限，导致不能明确区分"历史"与"历史记录"之不同，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客观的历史与人们主观的历史混在一起，导致了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认识上的混乱，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史学史研究的科学性。李大钊是最早对"历史"与"历史记录"做出明确区分的人。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接受了唯物史观的指导，诚如他说的"与吾人以一个整个的活泼泼的历史的观念，是吾人不能不感谢马克思的"。①

史学史研究和其他历史研究一样，都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因素：客观的历史实际，研究资料（史料），研究者。作为认识主体的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始终是最积极的能动者。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研究，总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总要通过分析、综合等思维方式来进行和实现。在这些过程中都要运用理论，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难以对杂芜的史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整理、研究，更不用说把握史学史的规律了。史学史学科的理论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关键，要正确进行理论建设，也必须用科学的理论作指导。要掌握、运用科学理论，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习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详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及"文革"时期，史学界在唯物史观的运用上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唯物史观本身的问题，而是没有全面准确地掌握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所以，这更说明，要总结学习、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经验教训，说

---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01 页。

明深入学习、全面准确掌握、运用唯物史观依然是历史研究、史学史研究的一项艰巨任务。

提高各方面的理性认识，才能提高史学史研究的自觉，才能创造史学史研究新繁荣。

二、西方史学史研究

1949—2000年，中国大陆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学术界过去有过总结。[①]这50年可分为1949—1978年、1979—1989年和1990—2000年三个时期，逐次论述如下。

(一) 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史学·学科建设蓄势待发(1949—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西方史学研究面临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以何种标准进行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标准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因此，理论学习重要性凸显出来。

1. 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奉苏联学者观点为圭臬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大量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为了便于史学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南开大学历史系1958年编印了《毛泽东论历史科学》，内蒙古师范学院历史系1961年编印了《毛泽东论历史科学》。全国范围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教育和学习，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

---

① 全面性的总结有：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研究在中国》，载《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他还有《我国新时期的西方史学研究》，《复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1期。另有《近20年来中国大陆学者的西方史学史研究(1978—1998年)》，《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尚有《我国四十年来对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与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3期。又有《当代中国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作为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的第十八章。此外，其《当代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的研究》，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中的第五章。陈启能：《建国以来世界史研究概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其中收入王晴佳《世界史理论、方法及外国史学史的研究概述》。周文玖：《中国的外国史学史研究》，作为《附录二》收在他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一书中。于沛：《世界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其中第五章为《新时期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于沛、周荣耀：《中国世界历史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五章为《外国史学理论研究》。

通过教育学习，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学者了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与方法，“更高的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①]“遵循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前进”，[②]“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前进”，[③]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

20世纪50年代，由于政治上“一边倒”，与苏联联盟，经济上得到苏联的援助，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向苏联学习，史学界也学习苏联。当时的学者说：“苏联的历史科学，与其他部门的科学一样，在近三十年来获得了照耀世界的辉煌成就。”[④]要“坚决诚恳地向苏联历史科学学习”。[⑤]

通过苏联学者，中国史学界偶尔了解到美国现代史学流派、美国历史学会活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情况。[⑥]苏联学者所写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卡莱尔、克罗齐、汤因比和西方史学方法的文章被翻译发表出来。[⑦]他们所写专著，例如维诺格拉多夫《近代现代英国史学概论》、[⑧]德门齐也夫等《近代现代美国史学概论》、[⑨]康恩《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⑩]和《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⑪]，也被翻译出版。这些论著成为中国学者批判西方史学的直接样板。尽管60年代初以后中苏关系恶化，但是苏联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者仍有很大影响。

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已重视了解外国史学动态。如《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

① 郭沫若：《更高的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二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② 郭沫若：《中国科学工作者循着斯大林指示的道路前进！》，《科学通报》1954年第3期。

③ 吕振羽：《历史科学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前进》，《历史研究》1960年5月卷。

④ 尚钺编：《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编者的话》，三联书店1955年版。

⑤ 郑天挺：《坚决地诚恳地向苏联历史科学学习——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历史教学》1957年总第11期。

⑥ 先翔译：《美国资产阶级史学中的现代流派》，《学术译丛》1959年第12期。P.艾朴德凯：《历史学家提出新问题（1955年12月28—30日在华盛顿举行了第70届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一之译，《史学译丛》1957年第1期。加斯顿·马纳科尔达：《第十届国际历史学家代表大会上的现代史学的主要流派》，俞旦初译，《史学译丛》1956年第6期。

⑦ И.H.罗尼·涅马诺夫等：《卡莱尔的社会史观点的主观唯心主义本质》，《史学译丛》1956年第6期。H.C.孔恩：《论贝奈戴托·柯罗齐的“历史主义”》，濮阳翔译，《史学译丛》1957年第2期。E.A.科斯明斯基：《阿诺尔多·汤因比的历史理论》，王易今译，《史学译丛》1957年第4期。阿拉布·奥格雷·艾：《阿诺尔多·汤因倍的文化史观批判》，黎汶译，《学习译丛》1958年第3期。叶·切尔尼亚克：《论资产阶级伪造历史的几种手法》，《外国学术资料》1962年第1期。A.E.库方娜：《美国资产阶级史学中的方法论探讨》，《外国史学动态》1964年第7期。

⑧ 何清新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

⑨ 黄巨兴等译，三联书店1962年版。

⑩ 张书生等译，三联书店1962年版。

⑪ 乔工等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

出版了《史学译丛》，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了《外国史学动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和世界通史教研室编辑出版了《历史问题译丛》。这些刊物有大量文章反映外国史学情况。不过，它们所透露的多是社会主义阵营史学情况，[1]即使有资本主义国家史学信息，也多是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学者那里转述过来的。

以苏联为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输入，既给中国学者的史学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也带来一定教条主义的影响。

2. 批判国内“反动”学术权威而波及西方史学

1958年，全国范围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史学界进而掀起了“史学革命”。有的学者提出，历史学必须“兴无灭资”，[2]“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3]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兰克客观主义、鲁滨逊新史学、汤因比《历史研究》、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等近代西方史学，均遭到批判。它们之所以在中国遭到批判，当然与苏联学者的批判文章被引进这个学术背景有关，而直接引起这一批判的则是由于批判国内资产阶级史学所波及的结果。

学术界批判兰克客观主义史学。最初，袁英光批判客观主义，是针对与胡適和兰克史学有着渊源关系的史语所史料学派而发的。[4]后来，吴于廑干脆把矛头直接指向兰克。他在《揭开朗克史学客观主义的外衣》一文中认为：“除了说客观主义是一块虚假的招牌，朗克史学是一个彻头彻尾具有资产阶级党性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流派，另外还能得出什么结论呢?”[5]他在另一篇名为《论西方古今两个“客观”史学家》一文中，重申这些看法，并指出修昔底德和兰克并非是超然物外的，那种所谓的客观主义是虚假的。[6]后来，施子愉在批判兰克及其后学时也说：“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史学家所谓研究历史的‘客观公正’的态度，只是掩盖他们阶级实质的幌子。”[7]总之，在那个时代，兰克史学被看成虚伪和反动的。

学术界批判鲁滨逊新史学。从50年代初开始，胡適就受到批判，之后何炳松、

---

① 如李华：《评两卷本〈南斯拉夫史〉》，《外国史学动态》1964年第6期。

② 翦伯赞：《兴无灭资发展历史科学》，《历史教学》1958年第4期。

③ 尹达：《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历史研究》1966年第1期，《考古》1966年第4期，《史学月刊》1966年第2期，《历史教学》1966年第4期。

④ 袁英光：《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史学观点批判》，《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1期。

⑤ 吴于廑：《揭开朗克史学客观主义的外衣》，《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60年第5、6期。

⑥ 吴于廑：《论西方古今两个“客观”史学家》，《江汉学报》1963年第6期。

⑦ 施子愉：《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中所谓研究历史的客观态度、科学方法的说法的批判》，《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年第2期。

蒋廷黻、向达都遭到批判。他们都曾经宣传鲁滨逊新史学。刘毓璜在批判何炳松历史观点时，连带上了鲁滨逊，全面否定鲁滨逊新史学。①齐思和对鲁滨逊是很有研究的，这一时期也公开批判鲁滨逊“反动多元史观”。②60 年代齐思和等翻译了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在“中文本序言”里，批判“‘新史学派’是当代美国反动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之一”，③通篇可见“谬论”、“反动”、“腐朽”等评价。

学术界批判汤因比和文化形态说。梁萍认为历史形态学是资产阶级反动观点。④袁英光也说：历史形态学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⑤他们是在批判雷海宗时而涉及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曹未风则直接批判汤因比，他说：汤因比“提出了和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反的学说”，⑥还说：“他的许多说法，不但是恶毒的，而且还是反动的。”⑦其他学者例如王绳祖、郭圣铭也都直接批判汤因比主观唯心主义，揭露其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和反苏反共实质。⑧颇有意味的是，遭到史学同行批判的雷海宗，1962 年去世前也写出批判《西方的没落》的文章，那就是《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 年第 11 期发表的雷海宗遗著《施本格勒及其〈西方的没落〉》。当然，其写作动机尚需进一步探讨。

这些批判是极“左”思想影响的结果，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像耿淡如这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西方史学研究起到不可磨灭作用的开启者，也发表《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与批判问题》(《文汇报》1962 年 2 月 11 日)。因此，批判资产阶级史学绝不是哪一个人的一时冲动。这些批判，固然有武断一面，给西方史学研究带来消极影响。但是，其对于西方史学研究贡献却不容忽视。其积极意义至少可以概括为：第一，使国内学者认清了西方史学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例如，1961 年起，史学界兴起“欧洲中心论”讨论热，⑨有学者探讨“欧洲中心论”的思想源头，⑩有学者揭露其反动本质。⑪这

---

① 刘毓璜：《批判何炳松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点》，《江海学刊》1958 年第 1 期。

② 齐思和：《批判鲁滨孙的反动多元史观》，《光明日报》1958 年 10 月 13 日第 3 版《史学》双周刊。

③ [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序言》第 1 页。

④ 梁萍：《雷海宗的反动的“历史形态学”观点批判》，《历史教学问题》1958 年第 2 期。

⑤ 袁英光：《“战国策派”反动史学观点批判——法西斯史学思想批判》，《历史研究》1959 年第 1 期。

⑥ 曹未风：《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批判之一》，《学术月刊》1958 年第 9 期。

⑦ 曹未风：《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批判之二——关于文明起源》，《学术月刊》1958 年第 10 期。

⑧ 王绳祖：《批判汤因比的历史观点》，《南京大学学报》1959 年第 2 期；郭圣铭：《批判阿诺德・汤因比的反动史观》，《文史哲》1962 年第 1 期。

⑨ 见《史学界讨论世界史中破除“欧洲中心论”问题》，《文汇报》1961 年 5 月 19 日。

⑩ 江爱沪：《“西欧中心”史学思想探源》，《安徽大学学报》1962 年第 1 期。

⑪ 朱杰勤：《“欧洲中心说”的反动本质》，《羊城晚报》1961 年 4 月 20 日。

对于中国学者认识西方的世界史写作是有意义的。第二,加深对西方史学某个方面的认识。例如,德国的客观主义史学家,提倡绝对客观,排除自我,曾经受到黑格尔和比尔德的抨击。今天看来,黑格尔和比尔德的观点是中肯的,对于认识兰克史学某个层面是有价值的。只不过是,中国学者在批判兰克史学局限的同时,却忽略了他对于史学的贡献而已。

3. 译著中的西方史学研究成果

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史学的研究,在西方史学名著译者所写序言和史学家简介中,可见一斑。这里举出一些例子,以说明他们对于西方史学研究所作的贡献,而且要说明他们关于古典史学观点都很中肯,可是对于近代史学多有偏见。

马雍等译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北京三联书店 1958 年版,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有 1957 年所写《塔西佗及其作品》。文中充分肯定《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的史料价值、卓越观点和优雅清新的文风。李雅书译《塔西陀〈编年史〉选》,其中《塔西陀简介》,对《日耳曼尼亚志》、《历史》和《编年史》评价很高,他认为塔西陀"不愧为古代杰出的历史家之一"①。王敦书译《李维〈罗马史〉选》(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一部分为《李维简介》。其中关于李维政治立场、历史观和方法的评论,至今仍然是经典之见。谢德风译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1977 年重印时加了《译者序言》。在序言中,他考证了修昔底德的出生年代、亲属关系、死亡之地,详细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历代的影响并分析其原因。总之,这些学者偶尔也指出西方古典时期史学家的不足,但主要是肯定其成就。这些观点至今还是被普遍接受的。

可是,对待西方近代以来的史学著作却不是这样。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翻译海斯、穆恩、韦兰等人《世界史》,1974 年写成《出版说明》,全面指陈书中的反动之处,总结道:"总之,本书是按照反动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和史学体系写成的,问题很多,需要注意批判地阅读。"②何新译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齐思和 1978 年 8 月完成《中译本序言》,全面批判其资产阶级性质,并认为:哈金斯《12 世纪的文艺复兴》、泰勒《16 世纪的思想与表现》、桑戴克《15 世纪的科学与思想》、D.海《意大利文艺复兴在它的历史背景中》等,"都反映了现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堕落程度"③。当

① 李雅书译:《塔西陀〈编年史〉选》,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8 页。
② 海斯等著,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译:《世界史·出版说明》,三联书店 1975 年版。
③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何新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18 页。

然，并不是所有翻译西方近代史学著作的学者都是这样。例如，郭圣铭译《格罗特〈希腊史〉选》，其《乔治·格罗特简介》就认为：在它以前还不曾有过这样详备的希腊史专著；格罗特继承了启蒙时期欧洲史学家的优秀传统，在历史著述中坚持必须纪实，事事都要有文献根据；格罗特是用历史来宣扬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民主自由，这在当时显然具有进步意义。[1]显然，他给予格罗特更多的是肯定。

这一时期，西方史学研究者，大多有留学背景，外语功底深厚，熟悉外国文化，研究与翻译相结合，他们对古典史学评价多中肯，而对近代史学基本否定。他们还翻译带有书目提要性质的著作，例如，何宁等编译《西方名著提要》（历史学部分）（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有的成果看问题具有辩证性，例如蒋湘泽《基佐的历史观批判》（《学术研究》1963年第6期）。这一时期的成果，尽管大多有着浓厚的“左”的气息，然而毕竟为以后学科发展开辟了道路。

4. 学科建设的启动和蓄势待发

1956年，《史学译丛》第2期发表了苏联《历史问题》杂志社论——《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中国史学界发表苏联史学界关于史学史理论问题的文章，一方面是中国史学受苏联史学影响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史学界期待进行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反映。

1961年4月，教育部召开的文科教材会议确定编写《中国史学史》和《外国史学史》。《外国史学史》由复旦大学耿淡如主编。这直接推动了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启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启动详前）。1961年底，上海召开了西方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会议决定由耿淡如主持编写《外国史学史》教材，由田汝康负责编译西方史学流派文选资料。同年，耿淡如发表《什么是史学史?》，提出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一些原则性意见，呼吁“这门科学急不容缓地需要建设起来！我们应不畏艰险、不辞劳苦，在这个领域内做些垦荒者的工作，我之所以提出本问题，不是妄图解答而是希望大家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2]这篇文章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具有开拓性的意义。1964年，王庭科发表《试论研究外国史学史的意义》（《文史哲》1964年第3期），重申外国史学史研究重要性。

耿淡如还与曹未风等人一起翻译汤因比《历史研究》节录本。[3]他指出，为了批

---

① 郭圣铭译：《格罗特〈希腊史〉选》之《乔治·格罗特简介》，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② 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

③ 1959—196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

判必须对西方史学进行介绍。[①]耿淡如还在复旦大学开设《西方史学史》课程，并于1964年招收国内首批西方史学史专业研究生。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些工作被迫中辍。[②]这些努力的意义，正如张广智所言：“在当时很困难的条件下，这位前辈学者为这一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③]

1956年，齐思和发表《〈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光明日报》1956年1月19日)，提出中西史学比较问题。1962年，他发表《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文史哲》1962年第3期)，再次提出中西史学比较研究问题。1962年2月底，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作了一次学术报告，谈到了欧洲史学史和中国史学史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指出，对中国史学和欧洲史学加以比较研究，可发现各自史学的发展规律。[④]今天看来，50年前他就预见了今天西方史学研究发展大势，其富有远见的洞察力不能不令人折服。他还翻译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对于后来美国史学研究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一时期，张芝联也为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贡献。他回忆早年史学研究时说：“1960年，贵阳师范大学历史系约请北大教授去短期讲学——‘传经送宝’，我去讲了一周，题目是《西方史学流派》，我介绍了四个流派：德国学派、年鉴学派、文化形态学派、大企业史派。”他后来在北京大学继续开这门课程。[⑤]

吴于廑分别完成《巴拉克劳夫的史学观点与欧洲历史末世感》(《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第8期)、《修昔底德其书与其世》(1963年)，[⑥]也是这一时期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他还发表《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江汉学报》1964年第7期)，此文虽然不是专门论述西方史学的，但是其中不乏相关内容。

“文化大革命”中，表面上西方史学研究陷入停滞，实际上，仍有学者在进行“地下”工作，只不过没有机会发表而已。例如，耿淡如翻译古奇《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从60年代初就开始了，出版于1989年。如果他没有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内坚持工作，其完成翻译工作并得以出版是难以想象的。谢德风译阿庇安《罗马

---

① 耿淡如：《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与批判问题》，《文汇报》1962年2月11日。

② 参阅张广智：《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285页。

③ 张广智等：《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8页。

④ 周朝民等：《中国史学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第219页。

⑤ 张芝联：《从〈通鉴〉到人权研究·我的学术道路(代序)》，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⑥ 这两篇文章收入《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史》，商务印书馆于1979年出第2版，书前有《译者序》，落款为“1963年1月10日初稿，1976年4月30日修改”。此例说明“文化大革命”期间，谢德风并没有停止《罗马史》的翻译和思考工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几年里，学术界虽然花了很多精力在批判极“左”思想，但是仍然没有摆脱“左”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已有学者开始了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如王觉非研究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①郭圣铭研究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和介绍文艺复兴意大利史学，②张芝联介绍法国年鉴学派，③周谷城研究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④郭圣铭重申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⑤这些研究尽管寥若晨星，然而预示着蓄势已久的西方史学研究就要勃发了。

(二) 重新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学科建设重整旗鼓(1979—1989)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全面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研究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也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⑥这成为新时期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大发展的基础。

1. 矫正过去30年对近代西方史学的否定

矫正对于客观主义史学的否定。1981年，张广智发表《利奥波尔德·冯·兰克》(《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和《兰克与兰克学派》(《上海历史学会一九八一年年会会议论文选》)，虽然批判了兰克唯心的宗教史观，但是没有因其资产阶级属性而简单加以否定。吴于廑写于1984—1985年间的《朗克史学与客观主义》，⑦表现出辩证分析的态度，与“文化大革命”之前截然不同了。特别是，张广智于1986年发表《试论兰克对近代西方史学的贡献——兰克逝世百年祭》(《历史教学》1986年

---

① 王觉非：《法国复辟时期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阶级斗争理论》分两部分，先后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和1978年第1期上。

② 郭圣铭：《马可波罗及其〈东方见闻录〉》，《人民日报》1978年5月1日。郭圣铭译：《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两位大史学家》，《外国史学摘译》(沪)1977年第5期。

③ 张芝联：《法国年鉴学派简介》，《法国史通讯》1978年第1期。

④ 周谷城：《〈罗马帝国衰亡史〉翻译答问》，《复旦学报》1978年第1期。

⑤ 郭圣铭：《应当重视史学史的研究》，《上海师大学报》1978年第1期。

⑥ 华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历史研究的新局面——中国史学会首次学术年会侧记》，《世界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6期；卢文中：《遵循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思维规律开创世界史研究新局面》，《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方国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史学研究的新局面》，《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

⑦ 此文为他在武汉大学的讲稿，后收入首都师范大学1995年出版的《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

第 10 期)，给予兰克更多的是褒奖而不是贬损。同年，朱本源发表《近两个世纪来西方史学史发展的两大趋势》(《世界历史》1986 年第 10 期)，突出了兰克史学作为一种历史叙述模式的意义。

质疑对于鲁滨逊新史学的全盘否定。张广智在承认鲁滨逊新史学局限的前提下肯定了其贡献，他认为一概视鲁滨逊新史学为欺骗工人阶级、替垄断资产阶级出谋划策的谬论，那是欠妥的。①赵世瑜结合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和中国史学现状，也提出要重新认识鲁滨逊新史学，认为对待鲁滨逊新史学大可不必横加非议。②夏祖恩的看法，是从不同意齐思和《新史学》"中译本序言"的观点引发出来的。他指出，对鲁滨逊及其新史学派所作的不公正评价，是值得商榷的。③

修正对于文化形态学说的简单否定。这一时期，关于文化形态的看法具有明显的辩证性，并最终走向基本肯定。郭圣铭在 1979 年的文章中对汤因比的评价比之过去缓和多和辩证多了。④刘昶则指出，对于《历史研究》进行细节批评是不妥的，⑤显然在为汤因比进行辩护。张志刚从其理论背景、思想渊源和治学态度上完全肯定了汤因比。⑥能反映出这一时期观点的还有其他一些文章，这里不一一摘录说明了。⑦总之，这一时期人们关于汤因比的看法与 50—60 年代已经大相径庭了。

2. 学科建设重整旗鼓、成就显著

1983 年，张广智就公开呼吁"给西方史学史一席之地"。⑧1986 年，他还翻译巴特菲尔德《史学史的课题及其范围》，⑨以达到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目的。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又一次受到普遍关注。

1984 年 8 月 18—24 日，教育部文科教材办公室委托四川大学举办西方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与会者一致强调西方史学史对于史学工作者的重要性，探讨了西方史学的对象和任务、基本内容与框架结构，提出教材的编写要体现中国特色。⑩会议决

---

① 张广智:《美国"新史学派"述评》,《世界历史》1984 年第 2 期。

② 赵世瑜:《扩张史家视野顺应史学潮流——重读鲁滨逊〈新史学〉的思考》,《读书》1987 年第 10 期。

③ 夏祖恩:《对〈新史学〉"中译本序言"的异议》,《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 年第 2 期。

④ 郭圣铭:《汤因比的史学理论及其影响》(下),《世界历史》1979 年第 4 期。

⑤ 刘昶:《历史与文明: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 年第 2 期。

⑥ 张志刚:《汤因比文明形态理论初探》,《史学理论》1987 年第 3 期。

⑦ 张和声:《阿诺德·汤因比的史学观》,《历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许启贤:《评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 年第 6 期。

⑧ 张广智:《给西方史学史一席之地》,《光明日报》1983 年 3 月 16 日第 3 版。

⑨ 发表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5 年第 9 期。

⑩ 张广智:《我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复兴:西方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侧记》,《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 年第 4 期。

定由张芝联、谭英华任正副主编，邀集学有所长的著名学者，就各自专长部分，分工撰写。①

1985 年 3 月初，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中外史学史研究座谈会。孙秉莹提出要进一步开展西方史学史的研究，②张广智回顾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状况，③谭英华就西方史学史研究问题谈了几点具体意见，④李雅书结合当代西方史学变化谈史学史研究问题，⑤郭圣铭谈到外国史学的学习问题，⑥张芝联概述了西方学者的史学史研究。⑦

1985 年 5 月，上海师范大学举办西方史学史讲习班，邀请国内著名学者为高校培训西方史学史教学师资。后来，部分学员在宋瑞芝、安庆征等策划下，合作出版了《西方史学史纲》(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成为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突出成果。10 月 21—25 日，武汉大学又承办召开西方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第二年谭英华写出了《导论》，并提交其他学者讨论。可惜的是，这几次会议所定决议并没有最终践行。

在统编的西方史学史教材出版之前，西方史学史通史著作实际上已问世。1983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郭圣铭的《西方史学史概要》，此书论述了古代希腊罗马时期至 20 世纪初的西方史学发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本西方史学通史专著，被学术界誉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⑧式的著作。因为成书在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还没有完全解放，意识形态色彩还较浓厚。

西方史学史断代史著作有孙秉莹《欧洲近代史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是在统编教材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推出的。此书论述了文艺复兴到十月革命这一时期的欧洲史学史，论述了欧洲资产阶级史学的兴起、发展，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诞生。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欧洲史学史”。⑨董进泉等人的《历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可以算作第二部断代史。

西方史学史专题著作有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此

---

① 张广智：《1985 年：中国西方史学史的一页：忆与谭英华教授的三次会见》，《史学理论研究》1996 年第 3 期。
② 孙秉莹：《进一步开展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史学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
③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研究在中国》，《史学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
④ 谭英华：《关于促进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史学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
⑤ 李雅书：《从当代西方史学的变化看史学史的研究》，《史学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
⑥ 郭圣铭：《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史学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
⑦ 张芝联：《西方的史学史研究的情况》，《史学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
⑧ 张广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史学史研究》1984 年第 2 期。
⑨ 启程：《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欧洲史学史》，《湖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 3 期。

书以历史观为线索，论述了各个时期中的代表性史学家、思想家的历史观。

西方史学家文选和传记集有田汝康等编译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郭圣铭等主编《西方著名史学家评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特别是，西方史学史中雅俗共赏的读物出现了。1989 年，复旦大学出版张广智《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此书采用散文笔调写成，在青年学子中产生很大影响。这一点在李勇《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跋》[①]和易兰《兰克史学研究・后记》[②]中得到证实。

3. 许多欧美国家的史学一起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

1980—1989 年间，中国学者继续关注苏联史学界情况。此外，欧美其他国家的史学，也受到关注，研究领域大大拓宽了。

关注美国史学。1979 年，何顺果关注美国的计量史学派。[③]20 世纪 80 年代，罗荣渠、王晴佳和余志森，开始研究当代美国史学问题。[④]黄绍湘、柯垒、陆镜生、李世洞、袁喜清等人的美国进步史学和新左派史学研究非常著名。[⑤]特别是，丁则民、杨生茂、段牧云等纷纷发表文章，论述特纳史学，[⑥]使特纳边疆学派和美国进步成为热门话题。中国学者能给人们提供最大和最集中的关于特纳及其学派信息的，当首推杨生茂主持编译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关注英国史学。谭英华研究了实证主义者博克尔、浪漫主义者马考莱的史学。[⑦]沈

---

①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③ 何顺果:《从〈苦难时期〉一书看美国“计量历史学派”》,《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 年第 10 期。

④ 罗荣渠:《当前美国历史学的状况和动向》,《世界历史》1982 年第 5 期。王晴佳:《当代美国史学研究动态》,《青年论坛》1986 年第 7 期。余志森:《流派林立:美国史学的重要特点》,《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 年第 4 期。

⑤ 黄绍湘:《评美国“新左派”史学》,《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 年第 2 期;柯垒:《进步史学运动评述》,《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 年第 12 期;陆镜生:《查尔斯比尔德和他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南开学报(哲社)》1987 年第 6 期;李世洞:《进步主义史学》,《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 年第 7 期;袁喜清:《美国新左派史学的前驱威・阿・威廉斯》,《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 年第 10 期。

⑥ 丁则民:《美国的“自由土地”与特纳的边疆学说》,《吉林师大学报(哲社)》1978 年第 3 期;丁则民:《“边疆学说”与美国对外扩张政策》,《世界历史》1980 年第 3、4 期;杨生茂:《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南开学报》1982 年第 2、3 期;段牧云:《美国“边疆史学派”的创始人特纳及其理论》,《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6 年第 10 期。

⑦ 谭英华:《试论博克尔的史学》,《历史研究》1980 年第 6 期;谭英华:《试论马考莱的史学》,《世界历史》1983 年第 1 期。

汉研究爱德华・汤普逊的史学。[①]柯林武德、沃尔什、罗素等人的历史哲学也得到了中国学者的研究。[②]

关注德国史学。耿淡如从古奇《19 世纪的史学与史学家》中摘译兰克部分发表出来，[③]许洁明、安庆征讨论了兰克的客观主义观点和方法。[④]马小彦、张一平研究了兰克学术对立面黑格尔的史学方法和世界整体观。[⑤]学者们还研究了雅斯贝尔斯、梅尼克和韦伯的史学思想。[⑥]

关注法国史学。孙秉莹、张广智等纷纷发表文章，使理性主义史学成为热点问题。[⑦]孙娴介、金重远、张芝联等人使当代法国史学也成为热点问题。[⑧]

拉丁美洲国家，例如墨西哥、古巴、秘鲁等国家的史学，也受到关注。[⑨]

除此之外，中国学者还翻译了西方学者的史学史著作。著名的有：董进泉译苏联学者《欧美近现代史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谭英华等译美国汤普逊《历史著作史》（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赵世玲等译美国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杨豫译英国巴勒克拉夫等《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姚蒙译法国勒高夫等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

---

① 沈汉：《爱德华・汤普逊的史学思想》，《历史研究》1987 年 6 期。

② 王晴佳：《思想之树长青——评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读书》1987 年第 2 期；何兆武：《沃尔什和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1988 年第 3 期；周照梅：《对罗素历史理论的一点理解》，《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 年第 1 期。

③ G.P.古奇：《兰克——〈19 世纪的史学和史学家〉》，耿淡如译，《世界历史译丛》1979 年第 3 期。

④ 许洁明：《略论朗克客观主义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史学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安庆征：《兰克客观主义史学述评》，《商丘师专学报》1988 年第 3 期。

⑤ 马小彦：《略论黑格尔的史学方法》，《中州学刊》1986 年第 5 期；张一平：《论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整体观》，《史学理论》1988 年第 1 期。

⑥ 卡尔・雅斯贝尔斯：《轴心期》，俞新天、魏楚雄译，载《史学理论》1988 年第 1 期；何兆武：《评梅尼克及其史学思想》，《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 年第 6 期；王容芬：《韦伯的比较史学研究及其方法》，《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 年第 2 期。

⑦ 孙秉莹编译：《理性时代的法国史学》，《史学史资料》1980 年第 6 期；张广智：《略论伏尔泰的史学家地位》，《历史研究》1982 年第 5 期；李成通：《简评爱尔维修的社会历史观》，《绍兴师专学报（社科版）》1988 年第 2 期；陈乐民：《伏尔泰的〈历史哲学〉》，《世界历史》1989 年第 5 期。

⑧ 孙娴：《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 年第 5 期；金重远：《当今法国史学界》，《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 2 期；张芝联：《漫谈当代法国史学与历史学家》，《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 年第 1 期；李小东：《萨特历史观述评》，《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 年第 1 期。

⑨ 萨那：《拉丁美洲史学思想与史学流派》，《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 年第 4 期；秦海波：《墨西哥史学流派发展概况》，《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 年第 1 期；陆国俊：《古巴的史学修正派》，《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 年第 4 期；张铠：《秘鲁史学发展概述》，《世界史研究动态》1983 年第 3 期。

本来西方史学的研究在如此喜人的形势下，可以走向全面繁荣；可是事实却没有这样，而是出现了波折。这一波折又直接与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有关。

4. 西方史学输入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形成一股势头很大的引进西方新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浪潮。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名著被大量翻译过来，例如，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等等。中国学者写出许多研究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专著，例如，项观奇《历史比较研究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金观涛等《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发展的哲学》（陕西科技出版社1988年版），等等。还有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译著和论著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这些翻译和研究成果使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史学有了更多了解，开阔了广大中国史学工作者的眼界，为正确认识西方史学文化和汲取其精华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中国史学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问题在于，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其中，有的理论和方法引进后，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挑战。

一般系统论方法被一些学者引进并加以宣传，一度非常流行。1980年初，《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在《贵阳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作者金观涛等接着把这篇文章扩展为25万字的专著《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后来又出版该书缩写本《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他还出版《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些构成新时期史学界系统论思潮的滥觞，这一思潮到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系统论方法取向中有几点非常值得提起：第一，它取消了历史发展终极原因；第二，它淡化了阶级意识和阶级关系；第三，对历史因素分析不分主次。而这些恰好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相背离的。还有人搬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地理论、汤因比《历史研究》中的文明形态论等，来解读中国，并且通过1988年夏天"电视政论片"《河殇》的热播，一时间流行起来，而金观涛恰好又是它的学术顾问。这种历史解读，既同历史唯物主义相背离，又有忽视历史事实的硬伤和民族虚无主义的局限。这些思想因素在一起，形成当时史学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从1987年开始，中共中央在全国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要求高校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学术界对《河殇》和金观涛的三本著作进行了批判。1989年，《历史研究》、《史学理论》、《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世界历史》五家杂志编辑部，邀请齐世荣等17位史学家，于9月11日就《河殇》进行了专题批判。12月13—14日，这五家杂志编辑部又邀请北京等五省市的部分史学家例如廖学盛等人举行座谈会，批判上述金观涛的三本书。[①]通过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西方史学研究处于整顿和反思状态，并为其后的进一步繁荣做好了准备。

这一时期，西方史学研究者既有老一辈学者，又有改革开放后培养起来的硕士、博士新生代，可谓群贤毕至，老少咸集；老一代中西兼通，新一代眼光敏锐、思想活跃，新老结合，相得益彰。这一时期，毕竟是改革开放的前十年，许多工作处于摸索之中，西方史学研究也是如此。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却为下一个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学术基础，积累了工作经验。

(三) 继续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欧美史学研究正常化·学科建设新空间(1990—2000)

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相伴随的是，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学习，学者们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提高史学研究的科学性”，[②]“历史科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③]这一学习活动有助于西方史学研究的开展。

1. 总体特点

学界对西方史学研究做了深入思考。从1990年以来，张广智一直强调西方史学引进和研究的重要性，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倡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把西方史学研究与中国史学研究结合研究。[④]朱政惠强调中西史学比较的重要性。[⑤]于

---

① 王和：《回击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挑战：部分史学家评析金观涛三本历史著作座谈会纪要》，《求是》1990年第2期，《人民日报》1990年1月19日第6版。

② 桂遵义、周朝民：《坚持马克思主义，提高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光明日报》1990年5月2日第3版。

③ 苏双碧：《历史科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求是》1990年第6期。

④ 这些文章有：《近十年来关于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若干思考》，《光明日报》1990年5月23日第3版；《我国新时期的西方史学研究》，《复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1期；《关于深化西方史学研究的断想》，《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对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几点“预测”》，《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刍议》，《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关于深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文史哲》2006年第4期。他还出版《超越时空的对话：一位东方学者关于西方史学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其中第4—21页集中谈了趋势问题。

⑤ 朱政惠：《关于比较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沛在回顾国内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之后，指出十分明显的不足。[①]其他学者，例如栾科军、张晓丹也就西方史学研究对象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②]

出现新一轮西方史学译介热潮。这里要提到一些重要的西方史学著作译丛。例如：上海三联书店“史学前沿”，上海人民出版社“社会与历史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历史的观念译丛”、“历史学的实践丛书”等。在翻译中，《国外社会科学》、《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山东社会科学》等起到重要作用。从数量看，翻译主要集中在史学理论和年鉴派史学方面。

全面关注和研究西方史学。学术界除了研究苏联和俄罗斯史学理论、方法和动态外，其他欧美国家的史学例如美国史学、英国史学、德国史学、法国史学、意大利史学、加拿大史学、瑞士史学、墨西哥史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这样，第二个时期全面关注和研究西方史学的良好局面得到保持。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并进。就研究的课题大小程度而言，宏观和微观兼而有之。学者有研究近50年的西方史学的，有论近100年西方史学的，有以18世纪、19世纪乃至整个近代西方史学为研究对象的，更有以整个西方史学为考察范围的。就微观研究而言，成果也颇为丰富，有研究一本书的，有研究某个人的史学的。

各类专著纷纷面世。名著提要和历史哲学家传记有，刘明翰主编三卷本《外国史学名著选介》（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郭圣铭等主编《西方史学名著介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文杰等主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历史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更多西方史学通史问世，例如：徐正《西方史学的源流与现状》（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夏祖恩《外国史学史纲要》（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王建娥《外国史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特别是，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被学术界誉为“一部‘经院式的’西方史学史”。[③]此

---

① 于沛：《我国近年的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其《西方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和方法》，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还载于《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② 栾科军：《略论西方史学研究对象和范围》，《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6期；张晓丹：《一个值得重视的学科：科学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

③ 张耕华：《一部“经院式”的西方史学史：读张广智〈西方史学史〉有感》，《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

书论述了古代希腊罗马迄现当代的西方史学，立论较客观公允。书中一方面强调，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把握西方史学发展的全过程，对西方史学的发展规律及其未来走向作出深入的分析，以便更好地吸收与借鉴西方史学。另一方面也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或指引），而非替代，更与昔日那种僵化的、教条的东西不可同日而语。①

专题研究全面开花，例如：张广智等《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罗凤礼《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在》（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等。

集中于当代的断代史学专著纷纷出版，例如：庞卓恒《西方新史学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张广智等《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徐浩等《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何兆武等《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罗凤礼等《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陆象淦《现代历史科学》（重庆出版社 1991 年版），等等。这些著作各有千秋。

2. 具体内容

从时间段上看，两头热，中间沉寂。从具体内容上说，历史哲学问题、年鉴派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重点研究的对象。

古典史学研究成果突出。不少研究成果是关于古典时期史学家个体的。例如，林芊、陈新讨论了希罗多德的史学。②概括研究古典史学的成果也很多，例如，郭小凌研究古典西方史学中的客观主义原则与史家个人的实践问题，③吴少梅探讨论古希腊史学的批判模式，④陈新论述古代西方历史叙述问题，⑤王建娥考察古代希腊的历史学范畴、方法、意识问题⑥等。

---

①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2 版，《导言》第 13 页。

② 林芊：《试探希罗多德〈历史〉中的史学方法》，《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88 年第 3 期；陈新：《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与西方史学的目的论起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第 1 期。

③ 郭小凌：《古典西方史学中的客观主义原则与史家个人的实践》，《史学理论研究》1996 年第 1 期。

④ 吴少梅：《论古希腊史学的批判模式》，《学术研究》1999 年第 9 期。

⑤ 陈新：《论古代西方历史叙述类型、动机与历史意识的萌生》，《人文杂志》1998 年第 4 期。

⑥ 王建娥：《古代希腊的历史学：范畴、方法和意识——兼论古希腊历史学的现代意义》，《学习与探索》1998 年第 2 期。

西方近代史学研究稍显沉寂。赖元晋、魏峰等研究启蒙史学问题,[1]刘颖讨论了 19 世纪西方客观主义史学思想,[2]徐波专门研究《圣经》与西欧史学的关联进行了研究,[3]王以欣、王敦书考察近现代西方学者关于希腊神话和历史关系的研究。[4]但是,总体来看,研究成果中论文数量偏少,这与西方近代史学的内容和地位是不相匹配的。

西方当代史学成为关注的热点。学者们关心当代西方史学总体发展,例如张广智一直关注"二战"后西方史学的重新定向问题,[5]并对其发展前景做出了思考。[6]陈启能总结当代西方史学的特点和趋势,[7]并论述了它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挑战和意义。[8]其他方面,例如当代史学理论、被冠以"新"字的西方史学等,都成为研究的热点。

历史哲学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西方学者的全球史观是中国学者关注的目标。90 年代中期,张广智就从全球史观角度研究了巴勒克拉夫世界史理论与实践。[9]后来的研究,使得全球史观在中国影响更大,《学术研究》和《史学理论》2005 年第 1 期组织了学者笔谈,就是很好的说明。此外,西方历史叙述、历史解释和符号学研究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年鉴学派史学研究成就卓著。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年鉴学派的输入成为西方史学输入的突出现象。[10]中国学者的研究,可以分为不同层次和类型。但是,以专著形式研究年鉴学派的则是张广智、陈新《年鉴学派》(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9 年版)。大体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年鉴学派产生的背

---

① 赖元晋:《18 世纪启蒙史学的地位和贡献》,《历史研究》1991 年第 4 期;魏峰:《试论启蒙时期欧洲史学的特点》,《山东社会科学》1996 年第 3 期。

② 刘颖:《简评 19 世纪西方客观主义史学思想》,《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8 年第 2 期。

③ 徐波:《〈圣经〉与西欧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7 年第 2 期。

④ 王以欣、王敦书:《希腊神话与历史:近现代各派学术观点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8 年第 4 期。

⑤ 张广智:《略论战后西方史学的"重新定向"》,《复旦学报(社科版)》1994 年第 6 期;张广智:《战后西方史学的重新定向》,《历史教学问题》1997 年第 4 期。

⑥ 张广智:《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前景》,《历史教学问题》1998 年第 4 期。

⑦ 陈启能:《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上),《光明日报》2000 年 10 月 20 日;陈启能:《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下),《光明日报》2000 年 11 月 3 日。

⑧ 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的演变与中国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5 年第 2 期。

⑨ 张广智:《"放眼世界,展示全球":巴勒克拉夫的世界史理论与实践》,《复旦学报(社科版)》1994 年第 1 期。

⑩ 参阅张广智主编《20 世纪中外史学交流》中第十五章《年鉴学派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景与基础、年鉴学派范式的演变、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当代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在史学认识论上的对话等问题。

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为热点。改革开放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①同时，中国学者也展开了广泛而细致的研究。许多西方史学史专著和不少论文都有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影响巨大，以至于《史学理论研究》2007 年第 2 期组织刊载了王加丰、沈坚、孙立新、梁民愫、陈新、张经伟等人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笔谈。

3. 新的趋势

这一时期，西方史学研究出现最大的新趋势是中西史学结合研究，具体可分为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和中西史学交流或者传播研究。

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成果显著。中国学者对于中西史学比较做了大量工作，其特征可以概括为：第一，学者们给予中西史学家及其著作以很多关注；第二，中西古代史学成为讨论的主要对象；第三，中西史学精神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第四，在比较研究中出现了明显的交锋，除了定性研究外，还有定量分析；第五，到目前为止大陆的中西史学比较没有超出台湾学者所涉及的范围，当然大陆学者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中西史学比较必须建立在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的深入细致的研究基础之上，否则比较研究无从谈起。从现有的成果看，就存在着对西方史学乃至中国史学的了解不够深入和全面的现象，以致出现发言太易或言论过激情况，这些观点还是值得商榷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差不多所有的学者都以西方史学来观照中国史学，并视西方近代以来的史学理论为圭臬，来衡量中国史学。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引进了形形色色的国外史学理论，基于人们普遍对西方文化优势的认同，结果发现中国传统史学中没有或者很少有像西方史学思想那样的理论，于是武断地以为中国旧史学是没有理论的或者缺乏思想的。关于以上具体情况，可以参阅李勇《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回顾》(《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6 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西方史学在中国传播研究兴起。这方面研究，俞旦初是拓荒者，其成果多收在《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中。继俞旦初者为胡逢祥，他的研究既有详实个案，又有恢弘眼界。于沛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

① 参阅张广智主编《20 世纪中外史学交流》第十六章《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就关注外国史学的引入问题。[①]何兆武研究近代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②]张书学和蒋俊分别研究何炳松和梁启超对国外史学的引进。[③]

中国史学在西方影响研究的勃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朱政惠(1947—2013)就提出从接受的角度研究史学,一直到90年代中期,他都主张研究不同国家地区史学的交流问题。[④]1996年3月26日,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他担任主任,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他走访了美国、韩国、英国和法国一些中国学研究机构,收集了大量海外中国学特别是中国史学史研究材料;其代表性成果大多见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朱政惠的努力,在实践上把中外史学交流研究对象,从外国史学输入中国导向外国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其他研究西方中国学中的成果还有不少,可以概述为:汉学家个人成就研究,美国中国学研究,其他国家的中国学研究。相关论文不具体列举。

中西史学交流成为西方史学研究新趋势。也是从80年代中期起,在中外史学交流领域,张广智没有停止过理论思考与实际探讨。这可以从他1992—2003年所发表的8篇文章中,得到说明。这些文章既有宏观思考,又有个案研究。

总之,1990—2000年,中国西方史学研究出现新气象。就研究队伍来说,越来越多学者加入进来,形成老、中、青共同研究的喜人景象,特别是,学者们通过建立起来的与西方史学界的广泛联系,为西方史学研究带来新的活力。从研究角度而言,出现了多视角、多层面的健康态势;从研究成果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繁荣局面。

(四) 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的西方史学研究,与社会发展同步,与政治运动息息相关,与对外开放密切相联。这50年中,它从开启走向繁荣与成熟,从简单走向复杂与深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在看到成就的同时,要认识存在的问题。

---

① 于沛:《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② 何兆武:《近代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张书学:《何炳松对西方史学理论的传播与贡献》,《浙江学刊》1994年第2期。蒋俊:《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文史哲》1993年第5期。

④ 朱政惠:《从接受的角度研究史学》,《历史教学问题》1986年第5期,《社会科学》1986年第11期;朱政惠:《注意国际间史学交流情况的研究》,《光明日报》1990年8月1日;朱政惠:《略说比较历史学中的"比较史学"》,《光明日报》1991年12月31日;朱政惠:《关于比较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上海)1993年第1期。

克服这些问题恰好是今后努力的目标。第一，汉译西方史学名著颇多，尚有改进之处。翻译工作是在充分理解原著基础上所做的“传话”工作，要求译者有足够的知识和修养。不容否认，当前汉译中有许多优秀作品，但是也不乏粗制滥造之作。为保证质量，汉译著作中，除了要有译名对照外，一篇译者序还是少不了的。而实际上不少译著见不到类似文字；第二，介绍或者编译的材料汗牛充栋，但是许多成果还属于低层次的。编译和介绍工作须臾不可废弃，只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译介层面上，而是要走深入研究的道路。不过，可以相信的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际学术交流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专业队伍将愈来愈壮大和成熟，西方史学的研究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第三，中西史学交流或者传播研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它可以深化中西史学比较，一种在考察史学在传播中发生变异的比较。它可以延伸中国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的写作。就西方史学史写作而言，可以增加西方史学在中国传播的内容，也可以增加中国史学在西方的影响部分。因此，今后在这方面尚需要更多的研究工作；第四，西方史学专题研究成果累累；但是无论与文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相比，还是与史学内部的其他学科相比还显得不够。西方史学是个复杂领域，从史学家个体到史学家集体，从单行著作到众多著作，从一种主张到思想潮流，从一国史学到国际史学，其中都有许多问题需要做专门研究。这既是西方史学研究的巨大挑战，又是难得的学科建设的机会；第五，西方史学家传记的写作已经出现了；但是，如果和中国史学研究相比，那么还缺少大部头西方史学家传记的写作。因此，今后撰写西方史学家传记集也是必须给予足够重视的工作，而且也是可行的工作。

三、史学批评及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

(一) 史学批评学科建设的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史学批评理论问题的研究、史学批评的学科建设迟迟没有展开[①]。社会的大发展在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的大发展也在 1978 年以后。随着批判“文革”史学、反思建国后十七年史学的深

① 1961 年 5 月 30 日《文汇报》第 1 版《欢庆建校五十六周年——复旦大学举行科学报告讨论会》报道中提到：复旦大学“开设了资产阶级学术评论课。如历史系的史学评论，中文系的西方美学介绍，哲学系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等”。当时的“史学评论”课，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没有进行史学评论的学科建设。1962 年 10 月 21 日《文汇报》第 3 版发表施锡才：《史评的先河——读〈文心雕龙·史传〉》，是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研究，还没有提出史学批评学科建设。

入，史学界开始认识到史学批评的重要价值和地位，痛感史学批评的滞后影响了史学的发展，开始了千百年一直没有进行的史学批评理论问题的研究，启动了史学批评学科建设。

第一篇史学批评理论研究的文章，是 1981 年赵俊发表的《史学评论有必要发展成为专门学科》(《辽宁大学学报》1981 年第 5 期)。这里说的“史学评论”也即是“史学批评”。文章谈到：“史学评论之所以必要，就在于它能够随时检查、总结史学研究的情况，及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彼此争鸣，互相促进，采长补短，共同提高，从而使史学研究获得一个经常的推动力。”为了推动史学的发展，有必要建设史学评论学科。报纸期刊应开辟史学评论栏目，并应创办史学评论专刊。高等学校历史系应该考虑开设史学评论专业课，促进史学评论队伍逐渐形成，推动史学评论更加深入健康发展。这里谈到了史学批评的作用、意义，谈到了如何建设史学批评学科。因为赵俊当时还是本科生(后来到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对史学评论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深入，文章中说的史学评论“是史学领域里的辅助工作”，显然是看低了史学评论的学术地位，忽视了史学评论对史学的指导作用。但这篇文章无疑吹响了史学批评学科建设的进军号，20 世纪 80 年代史学批评理论研究的大发展开始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大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南北重镇之一的华东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都开始了史学批评的理论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吴泽教授开始主编《史学概论》，其中设“史学评论”一章。全书 1984 年完成，1985 年 6 月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史学理论著作中第一次设专章论述史学批评的理论问题(在此书出版前，书的主要内容在《历史教学问题》上陆续发表。《历史教学问题》1985 年第 2、3 期分别发表了《史学评论(上)》、《史学评论(下)》)。此书论述史学评论的结构如下：

第一节　史学评论的性质

一、史学评论是对史学自身的认识

二、史学评论的阶级性和时代性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评论的根本特点

第二节　史学评论的标准

一、史学评论的客观基础

二、社会实践和史学实践是检验历史认识的根本标准

三、史学评论的标准

四、评论标准的客观性和历史性

第三节　史学评论的作用

一、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调节历史研究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

三、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的指导和提高

这里已可以看到，尽管没有对史学批评的所有理论问题进行论述，但对史学批评的重要理论问题“性质”、“标准”、“作用”等有了较深入的研究论述，而且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色彩，“社会实践和史学实践是检验历史认识的根本标准”的提出，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后在史学批评标准问题上新认识的反映。这样篇幅较大的、有一定深度的史学批评理论问题的研究论述在史学界还是第一次。在华东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重视史学批评研究的氛围中，周一平在1986年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理论》（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赵俊在1988年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瞿林东在1985年2月2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谈史学评论》。强调了“要重视史学评论”，认为史学评论的作用，以下两点是较重要的：第一，从史学的社会目的来看，史学评论是联系史学与社会的纽带之一；第二，从史学的自身发展来看，在信息社会中史学评论是史学工作中的一种高级形式的信息。提出要改变轻视史学评论成果的现象，改变史学评论“局促于一隅，偏安于末位”的现象，大力推动史学评论的发展。这篇文章对史学批评的作用等理论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以后，瞿林东参与了《安徽史学》1987年第4期的史学评论笔谈。这一期史学评论笔谈的《编者按》指出：

> 我们认为，史学评论是史学领域的重要一翼，一篇科学的评论文章，不仅可以给读者以启示、以引导，而且可以给作者以参考、以思索，促使研究向纵深开拓，有的甚至能对开创史学研究新局面起重要的促进作用。为了提倡和发展史学评论，我们特编发一组笔谈，希望能引起史学界的重视！
>
> 史学评论是一门科学，它应当成为史学领域内的一个分支学科，应当有它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史学评论家。因之，我们希望在加强对史学论著以及在某一时期的某种倾向进行研究、评论外，对史学评论学科的自身建设也应进行全

面的探索与研究。①

这里对史学评论作用的看法，基本上是瞿林东《谈史学评论》中的观点。这里提出了将史学批评作为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进行全面建设的号召，而且笔谈的九篇文章，为全面建设史学批评学科进一步奠定了理论基础。笔谈文章如下：

谢本书《史家评论与评论史家》、陈得芝《对史学评论应有正确认识》、徐宗勉《史学评论的三种作用》、刘修明《史学评论：历史科学发展的杠杆》、瞿林东《史学评论和史学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庄建平等《重视史学评论队伍的建设》、王珏《“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原则值得借鉴》、高鸿志《史学评论的目的、方法、态度、文风》、南炳文《坚持用唯物史观指导史学评论》。

这一组笔谈文章，涉及了史学批评的更多理论问题，如史学批评的指导思想，史学批评的目的、方法、态度，史学批评的队伍建设等等。这是20世纪80年代史学批评研究的高潮，有力推动了史学批评学科的建设。

此后，大江南北的史学批评理论研究日益火爆，有广度、深度的史学批评理论研究文章不断发表，如：

张占斌《论建立我国的历史评论学》(《湖北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牟安世《史学评论是推动史学发展的基本动力》(《安徽史学》1988年第3期)、郑先兴《关于史学评论的几个问题》(《南都学坛(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王建辉《试论史学批评》(《求索》1989年第6期)。

郑先兴《关于史学评论的几个问题》论述了“史学评论的性质”、“史学评论的内容”、“史学评论的任务”、“史学评论的标准”、“史学评论的方法与要求”等。这里谈的“内容”、“任务”、“要求”等，是此前研究史学批评尚未涉及的。其论“史学评论的内容”说，“史学评论的内容，简而言之就是史学”，但具体内容很多，“就史学研究者来说，史学评论从形式上可分为对研究者个人的评论和对研究者流派的评论。从内容上则可分为德评、才评、学评、识评四类”。②是有一定新意和深度的。

王建辉《试论史学批评》提出：“史学批评是从史学著述到史学理论的中介。”提出：“史学批评不是史学过程的终结，我们不会满足于仅用我们时代的观点去评判一件历史作品，而是要从个别去体认一般，从具体升华到原理与规律的认识，批评如果拒绝向理论的升华，则批评是不健全的。批评的着眼点在于理论的

① 《史学评论笔谈·编者按》，《安徽史学》1987年第4期。

② 郑先兴：《关于史学评论的几个问题》，《南都学坛(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建设，目的是建设新的史学理论，为新的史学理论催生，进而促成历史学运动的新行程。”这里对史学批评性质、作用、目的提出了新的见解。文中对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的关系也有深入的论述，认为，“史学批评是史学理论产生的基础”，“评论上去了，理论才好发展，评论的发展给理论奠定一个实证的厚实基础”。同时，“理论建设是批评实践的指导同时又应是后者的归宿”，“理论一旦形成便会对批评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批评需要理论的指引，说白了批评是应用一定的理论对史学进行的操作性研究。……而且批评本身有可能是一种误解，这就更需要理论的校正”。指出：史学批评的现状不令人满意，表层的现象在于批评的匮乏，深层的原因，“一是缺乏批评本体的理论，二是缺少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对批评的介入，史学评论对于理论的生疏，就不免使批评的力量显得钝化而底气不足，缺乏文化的穿透力与学术的辐射力。因此，开展中国的史学评论，深层的动力是理论的建设”。[①]这里对史学批评理论建设提出了新见解，对史学批评学科建设有指导意义。

这一系列文章的发表，标志着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史学批评理论研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标志着史学批评学科建设已轰轰烈烈地展开。

20 世纪 80 年代史学批评理论研究的大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的日益发展，除了周一平的《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理论》专著出版外，还有 30 多篇论文发表，如：叶建华《孔子的史学批评》（《齐鲁学刊》1989 年第 5 期）、赵俊《两汉史学批评述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9 年第 5 期）、施丁《谈谈范晔的史论》（《学术月刊》1988 年第 8 期）、叶建华《论〈文心雕龙〉在古代史评史上的地位》（《杭州大学学报》1987 年第 2 期）、赵俊《贞观年间史评探析》（《社会科学家》1987 年第 4 期）、施丁《司马光史论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吴怀祺《〈通志〉的史学批评》（《史学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施丁《王夫之对司马光史论的批评》（《史学史研究》1987 年第 2 期）、张承宗等《唐才常的史论》（《史学史研究》1988 年第 1 期）。并且发表了中国史学批评史通论性的论文，如：瞿林东《略说中国古代的史学评论》（《文史知识》1985 年第 6 期）、周一平《中国古代和近代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1988 年第 5 期）、王建辉《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萌芽与发展概说——从原始到唐代的刘知幾》（《江汉论坛》1989 年第 8 期）。

---

① 王建辉：《试论史学批评》，《求索》1989 年第 6 期。

这些论文为中国史学批评史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也标志着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史学批评学科建设已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一是史学批评的理论研究，一是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这表明，史学批评学科建设取得了以往几十年、几百年所没有的成绩，开创了史学的新天地、新气象。

（二）史学批评学科建设的深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史学批评学科建设，呈现出日益深入、全面开花的发展势头。一方面是史学批评基本理论的研究、中国史学批评史的研究更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另一方面是史学分支学科的史学批评（或者说史学批评分支学科）建设也开始了。

在史学批评基本理论、中国史学批评史研究中最有影响的成果是瞿林东在《文史知识》开辟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专栏，从 1991 年第 1 期至 1992 年第 7 期连续发表了 18 篇文章，分别是：《一个有待辛勤耕耘的园地——古代史学批评的历史和理论》、《直书与曲笔——史家作史态度与“心术”》、《采撰的得失——如何对待历史事实》、《史法和史意——从形式与内容的审视到思想的剖析》、《天与人及天人之际——关于历史变化动因的认识》、《人意・时势・事理——关于历史变动原因的认识（续）》、《会通与断代——观察历史的两种视野》、《读史当观大治乱得失——史学批评的一条重要标准》、《史学的审美——史书的体裁体例和文字表述》、《史论的艺术——关于历史评论的评论》、《心术与名教——史学批评的道德标准和礼法原则》、《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史学批评的方法论举例》、《素养・职责・成就——史家批评论三题》、《比较与批评——兼说史学批评的活力》、《时有古今述有体要——史学批评与知人论世》、《鉴识和探赜——走出史学批评的误区》、《史学批评家的历史命运——关于批评的批评》、《史学批评的社会意义——史学批评的不同视角和层次》。这些文章后来汇编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中华书局 1994 年 6 月出版。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史学批评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对很多史学批评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史学批评的意义、原则、方法、艺术及标准等，都作了更深入的研究论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史学批评理论研究进一步向广度、深度发展的又一个体现是史学理论著作中设立章节论述史学批评的书多起来了。

如姚太中等《史学概论》（东方出版社 1991 年版）设了《史学评论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一章（第一篇第二章），其下设两节：

第一节　史学评论的性质和内容

第二节　史学评论的标准和作用

李清凌《史学理论与方法》(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3 年版)在第五编《历史学方法(下)》设第四节《史学评论的方法》。这一节题名为“方法”,而实际论述的是:

一、史学评论的性质和作用

二、坚持政治与学术统一的史学评论标准

三、正确地开展史学评论工作

即实际论述了史学批评的基本理论问题。

王旭东《史学理论与方法》(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在上编第三章《史学理论的个别表述》中设第五节《史学评论》。论述了史学评论的基本理论问题。

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初版时,没有设立专章论述史学批评,而 1999 年再版时增设了《史学评论的理论与方法》一章(第十八章),其中设以下节:

一、史学评论的性质和作用

二、史学评论的一般角度

三、史学评论的价值标准

四、史学评论对史学家素养的要求

五、史学批评要成为真正的批评

这样的论述吸取了八九十年代史学批评研究的一些精华。其中“史学评论的一般角度”,是论述史学批评的视角,也是论述史学批评的内容。认为对史学家的批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对史学家历史观的评论,评价史学家历史认识的真实性、深刻性,从史学的角度对史学家研究历史的理论、方法及其学风进行评价①。这对史学批评的实践是可以起指导作用的。

90 年代以来,史学批评理论研究进一步向广度、深度发展的再一个体现是,加入史学批评理论研究的学者日益增多,发表的文章日益增多。如:吴廷嘉《千古得失寸心知——史学评论与史学之关系》(《世界历史》1990 年第 5 期)、王建辉《史学批评原理片论》(《安徽史学》1991 年第 3 期)、郭超《历史评论与史学评论》(《天中学刊》1991 年第 3 期)、郭超《论史学评论的价值标准》(《天中学刊》1992 年第 3

① 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49—455 页。

期)、罗凤礼《关于史学评论及其他》(《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徐松巍《关于史学评论的几点思考》(《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贺跃夫《史学的学术规范与批评》(《学术研究》1994年第5期)、游翔《史学批评若干基本问题研究》(《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雷戈《史学批评中的权力视角》(《长沙电力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期)、雷戈《史学批评学论纲》(《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陈新《史学批评还是历史批评——与雷戈先生商榷》(《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张晓校《史学评论:史学研究中不应少的薄弱环节》(《北方论丛》1998年第2期)、雷戈《史学评论与史学解构》(《求索》1999年第3期)、邓鸿光《论史学评论的标准》(《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6期)、邓鸿光《史学评论的内容》(《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白云《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学术论坛》2000年第2期)、邓鸿光《对史学批评性质与作用的再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其中王建辉《史学批评原理片论》论述了"史学批评的客体对象"、"史学批评主客体关系"、"史学批评的实践性"、"史学批评的时间检验"、"史学批评史是史学批评学的历史基点"等,不少是有新意的。其中"史学批评史是史学批评学的历史基点"一节中特别强调了史学批评学科建设应重视史学批评史的研究、建设,这是对20世纪80年代史学批评学科建设的总结,也进一步指明了以后史学批评学科建设的方向。

游翔《史学批评若干基本问题研究》论述了"史学批评的范畴界定"、"史学批评的内容构架"、"史学批评的方法"、"史学批评的功用"等问题。其论"史学批评的方法",概括为"知人论世:历史的批评"、"知势论人:逻辑的批评"、"衡短较长:比较的批评",是很有价值的。

雷戈《史学批评学论纲》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一、史学批评对史学结构所起到的变革;二、史学批评的性质;三、史学批评的界限;四、史学批评的对象;五、史学批评的目的;六、史学批评的原则;七、史学批评对于史学研究和史学理论的辩证互动。这篇文章对史学批评基本理论问题作的论述很多是有深度的。如论史学批评的性质说:

> 史学批评学建立的逻辑前提就是:历史学是一门需要批评的科学,是一门需要自我批判的科学,是一门离不开理论批评的科学,是一门只有依靠严格的理论批评才能得以发展和进步的科学。如果没有这种理论批评,那么,历史学就只能由历史的陈旧而演化成现实的腐朽。

> 史学批评学对历史学价值的揭示和对历史学缺陷的剖析，非常有助于捍卫和确认历史学的人文属性。历史学对人文价值的失落，对时代精神的偏离，对独立思考的背弃，非常需要史学批评学来拨乱反正，指点迷津。

如论“史学批评的原则”概括为：时代精神性原则，文化性原则，世界性原则，批判性的原则。都是有深度的。文章最后谈道：

> 总之，无论是从区分的角度还是从统一的角度看，史学批评、史学理论、史学研究三者都是一个辩证互动的有机整体。但在客观上和现实上，三者之间的辩证互动却恰恰突出和凸显了史学批评在史学本身这一整体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和优先性。因为，就现实的史学结构而言，它唯一缺少的就是史学批评这一环。所以，史学批评学的建构，对于史学本身的完善而言，并不仅仅起到一种补充和调节的作用，而且首先起到一种变革和定向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下一个充满希望的断语：史学进步的可能性恐怕就存在于史学批评的现实性。①

这里对于史学批评的地位有了更充分的肯定。

这些论述对于史学批评的基本理论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说明。还有对于史学批评及其理论研究现状的研究论述：

徐松巍《80 年代以来史学评论缺失刍议》(《北方论丛》1994 年第 3 期)

周祥森《试析史学评论界“栽花”盛行的原因》(《学术界》2000 年第 1 期)

周祥森《1997—1999 年史学评论状况评析》(《史学月刊》2001 年第 2 期)

这种史学批评及其理论研究现状的研究论述是 80 年代没有的，这些论述的出现是 90 年代以来史学批评及其理论研究又有了大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体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史学批评学科建设深入的再一个体现是史学批评史的研究也在向广度、深度发展。出版的著作有赵俊《〈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赵俊等《刘知幾评传：史学批评第一人》(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仓修良《章学诚评传：独树一帜的史学评论家》(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等。发表的论文比 80 年代更多、更广泛。通论性的有：沈雪林(周一平)《中国传统

---

① 雷戈：《史学批评学论纲》，《史学理论研究》1997 年第 3 期。

文化与史学批评》(《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4期)、陈剩勇《中国传统史学的批评模式》(《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2期)、游翔《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概说》(《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游翔《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范畴与标尺》(《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赵梅春《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的双重标准》(《兰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白云《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轨迹》(《学术研究》1998年第5期)、白云《史学审美——略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重要标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白云《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基本形式和基本方法》(《山东师大学报》2000年第6期)、张齐政《中西古典史学批评论》(《史学月刊》1998年第2期)、郭丹《卢奇安〈论撰史〉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比较》(《齐鲁学刊》2000年第4期)。

具体时期、具体人物、著作研究的有(80年代已作过的研究不录,一个问题的研究只录一种):赵俊《先秦史学批评述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4期)、赵俊《荀子与史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第6期)、赵俊《韩非子与史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0年第6期)、赵俊《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述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3期)、叶建华《从〈三国志注〉看裴松之的史学批评》(《晋阳学刊》1992年第1期)、程文标《从〈文心雕龙·史传〉到〈史通〉——简评刘知幾对刘勰史学批评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期)、瞿林东《重读〈通典〉史论》(《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瞿林东《两宋史学批评的成就》(《河北学刊》1999年第2期)、汪高鑫《朱熹的史论和史学评论》(《安徽史学》1994年第4期)、何晓涛《叶适的史评特色——以〈习学记言序目〉的唐史论断为例》(《中州学刊》2004年第2期)、赵荣蔚《〈唐史论断〉的史学批评特色》(《盐城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钱茂伟《论王世贞对理学化史学的批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王培华《归有光的史学批评及其意义》(《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6期)、罗炳良《邵晋涵史学批评述论》(《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周文玖《顾炎武的史评及治学》(《安徽史学》1997年第1期)、陈鹏鸣《章学诚"论古必恕"说在史学批评上的价值》(《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1期)、陈鹏鸣《章学诚史学批评的目的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叶建华《钱大昕的史学批评》(《学术月刊》1993年第2期)、白兴华《赵翼的史学批评》(《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3期)、姚晚霞《王鸣盛史评的显著特色》(《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

2 期)、罗炳良《清代乾嘉史家史学批评方法论的几个问题》(《河北学刊》1999 年第 2 期)、王记录《〈四库全书总目〉史学批评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99 年第 4 期)。从以上的论文中可以看到,中国史学批评史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史家、史著大体都已涉及了。把 80 年代以来的中国史学批评史文章的精华汇集起来,已完全可以组织成一部中国史学批评史。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史学批评学科建设全面开花的发展势头,体现在一些史学的分支学科的史学批评建设也发展起来。

方志学界在史学界建设史学批评学科热潮的影响下,也开始了方志学批评学科建设。一些方志学理论著作中开始设立专章论述方志学批评。如:

梅森《方志学简论》(黄山书社 1997 年版)为上、中、下三编,下编为“方志批评学与方志评论”、设了“方志批评学基础”、“民国及民国以前旧方志评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新方志评论”等章,既论述了方志批评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也论述了中国方志批评史,反映了方志学批评学科建设的新水平。

刘柏修等《当代方志学概论》(方志出版社 1997 年版)第七章《方志评论》设以下节:

第一节　方志评论的性质和原则

第二节　志书评论的标准

第三节　旧志的批判与继承

第四节　新编方志的总体估价

第五节　新志评论的现状和前瞻

其中“新志评论的现状和前瞻”谈到“新方志评论存在的问题”时指出:一是宏观与微观失调,二是搬套一般理论,三是批评文章模式化。[①]是值得整个史学批评界借鉴的。

方志学批评的论文也发表了不少。如:岳峰《谈方志批评》(《晋阳学刊》1993 年第 2 期)、蒋林《对方志批评的思考》(《新疆地方志》1995 年第 2 期)、爱达迈《关于新方志批评》(《中国地方志》1996 年第 1 期)、杜锡建《对古人方志批评的思考》(《中国地方志》1996 年第 1 期)、王照伦《志书评论脞议》(《中国地方志》1996 年第

---

① 刘柏修等:《当代方志学概论》,方志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50—251 页。

3—4期)、张景孔《方志批评若干问题论略》(《黑龙江史志》1997年第2期)、林衍经《方志评论的历史传统及其继承与发展》(《黑龙江史志》1998年第1期)、刘希汉等《关于方志评论的评论》(《黑龙江史志》1998年第1期)、刘德润《志书评论要实事求是》(《新疆地方志》1998年第1期)、欧阳发《试析方志评论的现状与出路》(《中国地方志》1998年第2期)、韩章训《方志批评学引论》(《黑龙江史志》1999年第1期)、刘希汉等《方志批评学也要与时俱进》(《中州今古》2002年第1期)、刘希汉等《关于方志评论的再评论》(《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6期)。可以说,方志学批评学科建设,已取得可喜成绩。

中共党史学界在史学界建设史学批评学科热潮的影响下,也开始了中共党史学批评学科建设。199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设立了《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史学批评》一章(第十章),下分三节:

第一节　中共党史研究批评的对象、任务和特点

第二节　中共党史研究批评的标准

第三节　中共党史研究批评的作用

论述了中共党史学批评的基本理论问题。此外也有些论文发表,如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批评刍议》(《党史研究与教学》1990年第6期)、周一平《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共党史研究批评最重要的政治标准》(《历史教学问题》1992年第3期)、《积极正确地开展党史学评论(卷首语)》(《北京党史》2000年第3期)。

尽管发表的中共党史学批评的论述不多,但还是为中共党史学批评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以上说明,史学批评学科建设已获得整个史学界的认同、参与,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三) 史学批评学科建设的展望

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史学批评理论研究的成果无疑可以汇聚成一部史学批评理论研究专著,但至今这样的专著仍然没有问世。瞿林东《史学与史学评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杨玉圣《史学评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周祥森《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都不是史学批评理论的专著,都是个人的文集,文集中只有很少的文章是论述史学批评的。瞿林东《史学与史学评论》,收入"论史学"文章20篇、"书评"23篇、"序跋"16篇、"札

记与短论”21 篇，基本上只有“札记与短论”中的《史学评论和史学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安徽史学》1987 年第 4 期史学评论笔谈文)是史学批评理论研究文章。杨玉圣《史学评论》，只有《把书评当作学问来作(代序)》、《学术书评与世界史学科建设》、《史学评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可能性(代跋)》等篇是研究论述了史学批评理论问题的。周祥森《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只有《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中国古代史评论概念的演变》、《先秦时期口头史学评论形态》、《学术著作评论的价值标准》、《试析史学评论界“栽花”盛行的原因》、《1997—1999 年史学评论状况评析》、《史学评论：21 世纪中国历史科学学科发展的一大趋势》等篇研究论述了史学批评理论问题。

关于中国史学批评史的研究已有好消息，2010 年白云《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理论问题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基本线索作了全面论述。只是中国近现代史学批评史、中国当代史学批评史的著作还是缺如。

总之，未来的首要任务，还是要编写出《史学批评概论》或《史学批评学》全面论述史学批评理论问题的专著。编写出《中国史学批评通史》及《中国近现代史学批评史》、《中国当代史学批评史》等专著。希望不久的将来，能看见这些著作一一问世。更奢望能看到《世界史学批评史》早日问世。只有这些著作一一问世，史学批评学科建设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才能算告一段落。

这需要史学界、史学家更重视史学批评，有更多的人用更多的精力进行史学批评研究。同时要加快培养史学批评的研究人才，扩大史学批评的研究队伍。还要努力扩大史学批评研究的阵地，要创办史学批评的专业刊物——《史学批评》或《史学评论》，及《中国史学评论》、《世界史学评论》等，如美国的《美国历史评论》(1895 年创办)那样，如中国文学界的《现代文学评论》(1931 年创办，李赞华编辑)、《文学评论》(1934 年创办，李长之编辑)、《文学评论》(1959 年创办，钱中文主编)、《通俗文学评论》(1992 年创办，叶生刚主编)、《世界文学评论》(2006 年创办，聂珍钊主编)那样。以便更健康、更严肃地开展史学批评，更大规模地开展史学批评理论研究、史学批评史研究。

经过二十多年建设，中国史学批评学科已有了长足发展，但比起在中国已有近百年历史的文学批评学科建设，史学批评学科建设差距还很大，文学评论、文学批

评史的专著已出版了很多①,而史学批评、史学批评史的专著出版太少。大概因为这一点,文学评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录书上早已成为独立学科,而史学评论还迟迟未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录书上成为独立学科。

1973年《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试用本):

I 文学

I0 文艺理论

I06 文学评论与文艺思想斗争

I2 中国文学

I206 文学批评和研究(文学评论)

I206.09 文学批判史

I207 各体文学批评和研究

而同书中的历史类:

K 历史、地理

Ka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历史、地理

注:入A"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此作互见。

K0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K01 历史唯物主义

K02 社会发展史

K03 史学专论

K04 年代学

K05 史料学

K06 历史研究

K07 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史学理论

K08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史学理论

K09 史学史

在总论类中没有"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类。②

---

① 较早在中国出版的文学批评理论著作是(英)温彻斯特(C.T.Winchester)著,景昌极、钱堃新译,梅光迪校《文学评论之原理》,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较早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是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27年版。

② 以上详见《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组编《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试用本),北京图书馆1973年版。

1990年第三版《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I 文学

I0 文学理论

I06 文学评论、文学欣赏

注："理论方法入此；对具体文学作品的评论、欣赏入 I1/7 有关各类"

I2 中国文学

I206 文学评论和研究

I206.09 文学批评史

I207 各体文学评论和研究

而历史类：

K 历史、地理

K0 史学理论

K01 史学的哲学基础

K02 社会发展理论

K03 史学专论

K04 年代学

K05 史料学

K06 历史研究

K09 史学史

"史学理论"类的增设，是史学分类的一大进展，但"史学理论"中没有"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类。又：

K2 中国史

K204 古代史籍

注："古代史籍及其注释、校勘、考证、评论研究入此。"

K207 研究、考订、评论

注："对史事、史料、历史分期等的研究、考订、评论入此；对中国古代史籍的注疏、考订，随古代史籍分。"①

"中国史"类中也没有"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类。对古代史籍的评论附在"古代

① 以上详见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史籍”类下。

再从论文分类来看。

上海图书馆编《全国报刊索引》1974年第1期：

J 科学文化

J7 社会科学

J732 地理

J733 传记

没有历史类。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历史研究的文章。

上海图书馆编《全国报刊索引》1975年第1期：

K 中国科学、文化

K72 历史

K73 地理

都不再设子目。

上海图书馆编《全国报刊索引》1978年第6期：

K 中国科学文化

K43 历史

下设“古代史”、“近代史”、“民族史”等子目。但没有“史学理论”、“史学史”，更没有“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

上海图书馆编《全国报刊索引》1981年第1期：

K 历史、地理

K91 史学理论

下设“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史学史”等子目。开始有“史学理论”、“史学史”等类目，是一个大进步。但“史学理论”排列在历史类的末位。还没有按照《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来分类。1990年，《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三版出版后，至1992年《全国报刊索引》才按照《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来分类：

上海图书馆编《全国报刊索引》1992年第1期：

K 历史、地理

K0 史学理论

K01 史学的哲学基础

K02 社会发展理论

K03 史学专论

K05 史料学

K09 史学史

“史学理论”放到了历史类的首位，但仍没有“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目。史学批评类的论文往往列入“史学理论”或“史学史”类中。直到 2008 年《全国报刊索引》第 1 期还是如此。

以上表明，史学批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录书中至今还没有独立出来，即目录学上还没有承认史学批评是独立学科。这一方面说明史学批评学科建设的发展还没有引起目录学界的关注，说明史学批评学科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但另一方面，南宋明清时期的目录书中已将“史评”独立出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录书中史学批评却没有独立，这似乎是一个大倒退，这似乎是目录学工作的“不作为”或失误。希望《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尽快修订，将“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独立成一类或一目。希望史学批评尽快在学术界、在目录学界取得独立的地位，这对于推动史学批评的学科建设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章　大规模历史文献整理与出版

一、《资治通鉴》与“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①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历史文化可谓源远流长，自文字产生以后，作为文化最重要载体的各种书籍文献，便一直没有间断地产生和流传下来。从西周初年整编殷商文献起，中国历代对各种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便也一直持续下来，并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时常出现大规模古籍整理的高潮，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20 世纪上半期，在整理出版出土文献，使中国学术取得迅速发展的同时，对前人流传下来的各种古籍文献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整理、校勘和出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在用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史学研究中，也重视对资料的考订证实工作，在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进行了扎实的史料工作，力图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非常重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整理。国家主席毛泽东，亲自要求对一些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古籍文献进行整理出版。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指示和关怀下，《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优秀文化典籍率先点校出版，其他各类古籍整理工作也相继跟上，造就了 20 世纪后半期古籍整理工作的蓬勃发展，成为中华文明前所未有的一项文化盛业。

（一）《资治通鉴》的整理

整理《资治通鉴》是在 1954 年开始的。当年 9 月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吴晗谈起《资治通鉴》，认为这部书写得好，建议整理出一个标点分段、便于阅读的新版本，并把这一任务交给吴晗办理。

---

① 本节参考了宋连生：《吴晗的后二十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0—82 页；傅德华：《半个世纪以来历史文献的新发现和历史资料的整理》，载复旦《史学集刊》第一辑《古代中国：传统与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10月，吴晗召集会议，开始部署具体工作。11月，由吴晗和范文澜领衔，成立了标点《资治通鉴》委员会，尹达、侯外庐、刘大年、翦伯赞、金灿然等任委员。随后在吴晗主持下，又聘请了王崇武、顾颉刚等十余位在京史学家组成标点工作小组，负责标点和分段工作。王崇武为召集人，顾颉刚为总校对，聂崇岐、齐思和、张政烺、周一良、邓广铭、贺昌群、容肇祖、何兹全等参加标点。规定标点分段工作一年完成。

但是，顾颉刚一人根本无法完成总校任务，于是在1955年2月成立校阅小组，由他与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共同审阅校订。标点范例由顾颉刚拟定，力求体例统一。5月，顾颉刚病，由聂崇岐主持工作。为保证质量，实行了严格的标点工作流程，即先由个人自行标点，再由两三人互校，然后交工作委员会复审。1955年底，《资治通鉴》全书标点完毕，次年2月由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个新的整理本《资治通鉴》是以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注本为底本，同时参考前人校勘过的宋、元、明各本，做了大量的文字校勘、搜集遗文、改正错简、增补阙文等工作，因而其质量超过以往所有传世各种版本。以后又陆续修订，标点本《资治通鉴》日臻完善。

(二)“二十四史”的点校整理

《资治通鉴》出版当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提出整理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指出“这是千秋的事业”，要做成“历史上最正确、最可靠、最有用的”一个定本。

1958年7月，毛泽东指示吴晗继续标点整理“前四史”。9月13日，吴晗、范文澜、尹达、侯外庐、金灿然等在开会时商定，将“前四史”的点校工作扩大为对整个“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由中华书局制定工作计划。

《资治通鉴》只有294卷，加上考异、目录等，大约600万字，而“二十四史”有3 259卷、4亿余字，无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为了完成这一工程，先后组织了20多所高校及科研单位，动员了数百位史学工作者，当代知名文史学家皆参与其事，如顾颉刚、白寿彝、陈乃乾、王仲荦、唐长孺、刘节、傅乐焕、翁独健、郑天挺、张政烺、王毓铨、启功、孙毓棠、王钟翰、杨伯峻、周振甫、赵守俨等，可以说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界各断代史研究水平最高的学者。

整个点校工作的具体分工如下：《史记》，顾颉刚；《汉书》，西北大学历史系；《后汉书》，宋云彬；《三国志》，陈乃乾；《晋书》，吴则虞；《宋书》、《南齐书》、《梁书》、《陈

书》、《南史》,山东大学历史系(王仲荦负责);《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武汉大学历史系(唐长孺负责);《隋书》,汪绍楹;《旧唐书》、《新唐书》,中山大学历史系(分别由刘节、董家遵负责);《旧五代史》、《新五代史》,陈垣统一指导,分别由刘乃和、柴德赓负责;《辽史》,冯家昇;《宋史》,聂崇岐、罗继祖、邓广铭;《金史》,傅乐焕;《元史》,翁独健;《明史》,南开大学清史研究室(郑天挺负责)。①

1959 年 7 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史记》;12 月,出版点校本《三国志》。1962 年出版点校本《汉书》,1965 年又出版点校本《后汉书》。这样,“前四史”就在“文革”前全部整理出版。为了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从 1963 年秋开始,一些在北京之外的专家还被借调到中华书局集中工作。但很快“文革”爆发,整理工作被迫停顿。1971 年,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指示恢复点校工作,提出“二十四史”外,再加《清史稿》,都由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由顾颉刚总其成,点校组长为白寿彝,副组长为赵守俨和吴树平。1978 年,“二十四史”、《清史稿》校点,终于圆满完成。②

此前,历史上刊印全套“二十四史”并较为通行的主要有三种版本:清乾隆年间的武英殿本,清朝末年由金陵、淮南、浙江、江苏、湖北五书局刻印的“局本”,以及民国时期由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这次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整理,运用了科学的校勘整理方法。

与点校本《资治通鉴》一样,点校本“二十四史”也尽可能地选择优良底本。在点校过程中,尽量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校勘记,使点校质量远远超过以前各种版本。为了便于使用,还为各史编了人名、地名索引,后来还统一编制了《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这些工作,保证了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学术价值,使这一整理工作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伟业。而经过多年的考验,事实证明,它已经取代旧本,被公认为当前最好的整理本,成为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的标志性项目,被日本学者评为“学术史上旷古未有的事业”。③

不过,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制约,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也留下了不同程度的缺点和遗憾。如《旧唐书》的底本选择被一些学者认为并非优良善本,有

---

① 赵守俨:《雨雨风风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赵守俨文存》,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② 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还可以参见郭志坤等:《修“镜”篇——记〈二十四史〉等古籍的整理出版》,《文汇报》1979 年 9 月 25 日第 3 版。

③ 小仓芳彦语,见赵守俨:《雨雨风风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赵守俨文存》,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待重新整理时进一步改进；整个校勘工作中，有点校错误、注释讹误、水平参差不齐等现象存在，对此，不断有学者发表文章予以指正，由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的四册本《古籍点校疑误汇录》中就收录了很多这类文章，但并非全部收录，而且后来仍有学者继续指陈其各种疏误。2005年以后，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修订工作陆续展开。

在点校本"二十四史"全部出齐之后，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一套《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其中既包括前人所作有关"二十四史"的补表、补志和考证、札记等著作，如清代梁玉绳《史记志疑》、《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等，也包括近现代学者的同类研究成果，如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和《明督抚年表》等。这些书，或可补"二十四史"之缺失，或可订正其讹误，既可以作为工具书使用，也是很重要的资料书。

总之，点校本《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完成，为传统古籍文献的整理积累了丰富经验，建立起现代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标准，带动了其他古籍文献整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推动了中国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培养。

二、《甲骨文合集》的编纂[①]

甲骨文是商代后半期的遗物，是研究商代历史的最可靠、最重要的文字资料，《甲骨文合集》则是经过科学整理、比较全面的大型甲骨文资料汇编，为古代史特别是商代历史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深入开展的有利条件。[②]

（一）《甲骨文合集》的编纂

因社会时代的局限，商朝人有浓厚的天命论思想，遇事每好占卜，占卜所用材料即为甲骨。占卜后，有些甲骨可能归入档案窖藏起来，有些则可能被废弃扔掉。经过武王伐纣的战乱，商都遂成废墟。秦汉之际，殷墟便有古器物出土。清末在河南安阳的田间即有甲骨出现，村人视为药材售予药店。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首先辨认出甲骨文是商代文字，开始搜集购藏。此后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八十年间共出土甲骨154 604片。其中中国大陆收藏有97 000余片，分布在25个省

① 本节参考了胡厚宣：《〈甲骨文合集〉的编辑和内容》，《历史教学》1982年第9期；胡厚宣：《甲骨文合集·序言》，《甲骨文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尹达：《甲骨文合集·前言》，《甲骨文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彭邦炯、马季凡：《〈甲骨文合集〉的回顾与〈甲骨文合集补编〉的编纂》，《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等。

② 胡厚宣：《关于商周史学习问题》，胡厚宣：《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附录，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市自治区、40 个城市、98 个机关单位、40 个私人藏家；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公私收藏约 30 000 余片；其他的则散布在日本、加拿大、英国、美国等 12 个国家。

自甲骨文发现以来，其著录、研究工作也逐渐取得长足进展，八十年间出版了各种专书、参考书等千余部，但是甲骨文材料极为分散，而且已经出版的著作，有的印刷模糊，文字看不清楚；有的摹写失真，字体多有错误；有的因将就类例而分条剪割；有的墨本不全，只拓有文字部分；有的拓本虽全，但却把无字部分剪掉；有的正版与骨臼分开编排；至于前后著录重复，更是屡见不鲜。再加上有些著作出版较早，印数有限，一些书中还混入伪片，一些拓片各单位又常常列为善本，至于甲骨实物更是不便应用。①

为解决这些困难，推进甲骨学研究的发展，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一部材料完备、体例精善的大型甲骨文资料汇编，1956 年，胡厚宣提出编辑《甲骨文合集》，之后被列为历史科学资料整理的重点项目之一。1956 年底，胡厚宣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1959 年，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正式开始编纂。这已不是胡厚宣的个人项目而是集体项目。②但整个编辑工作仍是在胡厚宣的“具体指导下进行”，他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精力”，“作了最大努力”。③

编辑《甲骨文合集》的计划确定之后，研究所首先制定了一份《甲骨文合集》的编辑草稿，征求国内各方的意见，反复修改。经过一两年的筹备工作，然后同国内藏有甲骨图片的单位和个人协商。在胡厚宣的亲自率领和指导下，先后于 1959—1960 年、1963 年和 1965 年、1973—1974 年，多次分赴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的 30 多个城市寻访，从 100 余个单位和私家那里收求墨拓甲骨资料。

编撰者首先将 180 多种著录甲骨文的书刊收集齐全，在收集到的 10 万多片甲骨文的拓版、摹版和照片上标上书名号码，并校对无误。然后将他们从书刊上剪下来贴在专门用来印刷的卡片上。已知的甲骨文收集齐全之后，进行剔除重片的工作，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共校出 1 万多片的重片。在已经校出的重片中还要标明哪一个最清楚最真实，并表明页码和甲骨的正反面，以备之后的缀合工作。缀合工作不仅对编撰者的学术水平要求很高，还要求编撰者要细心和耐心。

① 胡厚宣:《甲骨文和金文》，胡厚宣:《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附录，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② 胡厚宣:《我和甲骨文》，胡厚宣:《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附录，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尹达:《甲骨文合集・前言》，《甲骨文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在完成对全国已经出版的甲骨文研究成果的整理之后，他们还对甲骨实物进行了考察，遍访全国藏有甲骨的博物馆、学校、收藏室，对于国外的甲骨资料则是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或托请外国回来的学者大力协助。对于这些实物史料都采用拓版的方式进行，收集之后将其与之前整理的书刊上的甲骨文进行校对，区分真伪和进行残篇残字完善。

期间，“四清运动”、“文革”等政治运动都使编辑工作一再间断。因而整个《甲骨文合集》的编辑工作，断断续续，花了近 20 年时间才完成，到 1982 年 9 月，才由中华书局将 13 巨册图版全部出齐，成为甲骨学百年来“工程最大，成绩最为卓著的著录书”。[①]

(二)《甲骨文合集》的编纂方法

按照主编郭沫若的要求，《甲骨文合集》在一开始编撰时就立定要“尽可能集中丰富的资料，经过科学地整理和编纂，使之成为一部比较完整的学术资料的汇编”。[②]这一预期目标，基本达到。

全书首先从十几万片已著录、未著录的甲骨实物和拓本(或照片)摹本的纷繁零乱的材料中，经过搜集、综合、剪贴、墨拓、对重、拼合、辨伪、选片等一系列的繁琐而审慎的工作，最后选出了在文字学和历史学上具有一定意义的精华 41 956 片，这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甲骨文著录书，集甲骨文发现以来资料之大全。这在当时，“不仅仅为古代社会研究提供了一部丰富的‘资料汇编’”，而且这些“珍贵的资料集中起来，公诸同好，使之成为学术工作者的共同财富，这对旧的垄断资料的恶习正是一种有力的冲击”。[③]

在《甲骨文合集》编纂过程中，1973 年在小屯南地发现了相当重要的整批甲骨，但发掘报告尚未编出。为了不打乱《甲骨文合集》的程序，考古研究所另行编辑出版了《小屯南地甲骨》一书，收录了 1973 年该地新发现的甲骨 4 589 片，附录中收录 1971—1977 年在小屯一带发现的甲骨 23 片，都经过拼合的工作，出土地层也比较清楚。它与《甲骨文合集》一样，为商代历史研究提供了大批有价值的材料。有了这两部书，甲骨文的材料可以说基本上已经齐备了。[④]

---

① 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历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

② 尹达：《甲骨文合集・前言》，《甲骨文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③ 尹达：《甲骨文合集・前言》，《甲骨文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④ 胡厚宣：《关于商周史学习问题》、《甲骨文和金文》，胡厚宣：《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附录，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其次,《甲骨文合集》对所有材料采取先分期再分类的著录方式,在阅读、使用方面为人们提供了极大方便。

1945年以前出版过几十种甲骨文著录书,但都没有采用分期著录法。自1945年以来,胡厚宣采用分期分类的著录方法编辑了多种甲骨文著录书,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方便。于是《甲骨文合集》也采取了这种办法,将收录的甲骨文先按历史时代分期,然后再对资料进行内容分类。

《甲骨文合集》分期在基本上采取董作宾的五期分法的同时,也采纳了学界的意见予以综合。其中,第一期为武丁及其以前时期(即盘庚、小辛、小乙时期)。董作宾所谓的"文武丁时代之谜"的那部分甲骨,《甲骨文合集》作者认为属于早期,就将这部分甲骨附于第一期之后,成为"附一期"。第二期为祖庚、祖甲时期。第三期为廪辛、康丁时期。第四期为武乙、文丁时期。第五期为帝乙、帝辛时期。在出版的十三册书中,一至七册是第一期,八册为第二期,九至十一为三、四期,十二册为第五期,十三册为摹本。

对于内容的分类,《甲骨文合集》采取的是在分期中按事类进行编排,因此每期中又按卜辞内容分为四大类二十二小类。四大类是阶级和国家、社会生产、科学文化和其他;二十二小类是奴隶和平民,奴隶主贵族,官吏,军队、刑罚、监狱,战争,方域,贡纳(以上属"阶级和国家"类),农业,渔猎、畜牧,手工业,商业、交通(以上属"社会生产"类),天文、历法,气象,建筑,疾病,生育,鬼神崇拜,祭祀,吉凶梦幻(以上属"科学文化"类),卜法,文字,其他(以上属"其他"类)。

由于研究水平的限制,《甲骨文合集》的分期分类法,自然还不能说是绝对准确无误的定论,但它确实比前人的著录方法有了很大的进步,是中国学术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为人们阅读、使用提供了极大方便。

(三)《甲骨文合集》的成就和缺陷

《甲骨文合集》的出版,为此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全面而科学的资料,无论商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包括商代的农业、畜牧、田猎、货币、交通、先公先王、诸妇诸子、家族、宗法、平民、奴隶、方国、地理、刑狱、战争、天文、历法、祭祀、宗教、医药卫生等等,特别是对于商代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如国家起源、社会形态、阶级关系、土地制度等,都可以从中找到有关资料,以利于从各个方面来进行深入研究。因而该书出版后,深受国内外的重视和好评,陆续荣获古籍整理奖、吴玉章奖、国家图书特别奖、中国社科院著作奖等,被学界誉为甲骨学史上的一

部“继往开来”的“里程碑式的著作”,①“不仅为国家赢得了荣誉,也为甲骨学这一世界性学科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②

对《甲骨文合集》的重要贡献,先秦史专家晁福林还从整个学术发展的角度进行了总结。他说:《甲骨文合集》在编撰方法上,为以后甲骨文资料的汇编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例子;对研究者来说,《甲骨文合集》不仅将甲骨文资料系统化和集中化,还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甲骨断片的缀合工作再现了一些甲骨文的面貌,使得甲骨资料进一步充实;通过对甲骨材料的分类和同类甲骨的集中排版,以及补充骨臼和反面卜辞,不仅有利于甲骨卜辞的理解,也有利于个别不明字的识别。③

此外,《甲骨文合集》编撰之前出土的甲骨有15多万片,《甲骨文合集》共收入41 956片,包含了全部能够应用于学术研究的甲骨文资料,这就为学者们的研究工作节省了大量时间。再者,当年参加《甲骨文合集》的编辑者,都是没接触过甲骨的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而且多数未学过古文字,他们在胡厚宣的指导下,边干边学,因为旷日持久,有人戏称参加这一工作是入了“地狱”,经过二十年的磨练,终于为中国甲骨文事业培育了一批人才。而根据有关部门的经验,如果学习得法,持之以恒,两三年即可通过《甲骨文合集》掌握甲骨文字现有的一般知识。则《甲骨文合集》的出版,不但已经培育了一批人才,而且还可以继续培养新一代的古文字学人才。

《甲骨文合集》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大型工具书,整个编辑流程要经过收集材料、剪裁书刊、重新墨拓、恢复原形、校对重出、拼合断片、同文类聚、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然后加以综合整理,最后是分期分类、编辑成书。其工作量是异常庞大的,加上集体编辑,期间又受到政治形势的干扰,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学界在对《甲骨文合集》评点时,都曾指出其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④

彭邦炯、马季凡作为《甲骨文合集》的编纂者,在全书出版17年后,也对《甲骨文合集》的各种问题进行了自检。他们认为,从全书来看,13巨册的图版虽然于

---

① 王宇信:《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5页。

② 赵诚:《〈甲骨文合集〉评介》,《光明日报》1983年1月31日。

③ 晁福林:《评〈甲骨文合集〉》,《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

④ 如严一萍:《评〈甲骨文合集〉》三篇,分别刊于台北出版的《中国文字》1980年新一、二、三期;晁福林:《评〈甲骨文合集〉》,《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黄天树:《〈甲骨文合集〉校重》,《考古与文献》1995年第3期;裘锡圭《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上)》,《书品》1990年第1期;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等等。

1982年出版完成,但它的《释文》、《材料来源表》及有关《索引》没能及时出版,给海内外学者查检利用此书带来了不便。再就图版本身来说,也存在着一些需要注意和弥补的问题,包括:

第一,在选片中有疏忽欠精当之处。既存在该收而未收的情况,也就是已选定要用,但因工作过程中的疏漏或别的原因被漏掉了,也存在不该收而收录的问题;另外至少还有一百多片没能选取同一甲骨中最完整清晰的拓本。

第二,在缀合方面有遗漏。将破碎的甲骨文拼合复原,是甲骨文整理工作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发现新材料。但《甲骨文合集》确实存在一些漏缀、误缀和吸收前人成果不够等问题。

第三,在去重方面有遗漏。在甲骨文著录书中,所收材料彼此重见和自重是比较常见的。《甲骨文合集》在去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仍有遗漏,还有再减免重片的可能。①

第四,在分期方面存在自乱其例的问题。学界对甲骨分期本来就有分歧,《甲骨文合集》采用五期分法,但以此分期方法来衡量其书本身,却发现它把一些同期之骨分在了不同时期,并进而由此造成了自重。②

(四)《甲骨文合集补编》的编纂

由于《甲骨文合集》本身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缺陷与不足,总编辑胡厚宣谦逊地表示"自己并不满意",加以《甲骨文合集》出版后,国内外又有上万片研究价值很高的珍贵甲骨资料和许多缀合成果陆续发表,1993年,以胡厚宣为主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中心成立后,就把编纂《甲骨文合集补编》作为自己的一项主要科研任务。1995年,由彭邦炯代替去世的胡厚宣主持这一工作,并由马季凡协助其工作,同时成立了编纂工作组。经过几年的努力,六巨册《甲骨文合集补编》,1999年由语文出版社出版。

《甲骨文合集补编》是针对《甲骨文合集》的不足与缺陷而作的,其工作包括:第一,增补《甲骨文合集》拟选用而遗漏了的重要资料;第二,整理和抢救了在编辑《甲骨文合集》过程中从海内外收集来的一批尚未来得及整理的甲骨资料;第三,完善了一些原本完整而《甲骨文合集》中缺其一部分的不完整资料;第四,对《甲骨文合集》中一些不理想的拓片予以更换;第五,吸收海内外学者在缀合方面的研究成果,

① 黄天树:《〈甲骨文合集〉校重》也指出《甲骨文合集》中出现的重片尚有八十处,载《考古与文献》1995年第3期。

② 以上据彭邦炯等:《〈甲骨文合集〉的反顾与〈甲骨文合集补编〉的编纂》,《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纠正了一些误缀；第六，附录了在安阳殷墟以外遗址出土的甲骨文资料，打破了从前讲甲骨只讲殷墟甲骨的旧观念，拓宽了甲骨研究的范围，也使《甲骨文合集补编》更完备充实；第七，将《甲骨文合集补编》的《释文》、《来源表》、《缀合表》等索引和附录一并推出，既有利于资料的检索利用与研究，也可以弥补《甲骨文合集补编》图版中的不足与错误。

《甲骨文合集补编》共收录有甲骨 13 450 片，是对甲骨文发现百年来出土的甲骨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科学整理的又一个成果。除了此前国内出版的《小屯南地甲骨》、《英国所藏甲骨集》、《甲骨续存补编》三部著录书没有纳入外，[①]基本上囊括了《甲骨文合集》出版后 20 年来海内外陆续著录的甲骨资料和缀合成果，以及《甲骨文合集》挑选剩下的所有著录书刊上的重要资料。“可以说为甲骨的搜集汇合工作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以后的研究者，除了将来新出土的甲骨外，只要有了《甲骨文合集》和这部《甲骨文合集补编》，加上《小屯南地甲骨》、《英国所藏甲骨集》、《甲骨续存补编》三书，资料也就基本齐备了，这既给研究者节省了许多收集甲骨资料的时间和精力，也必将对甲骨学、考古学、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②]

（五）《甲骨文合集释文》及《甲骨文合集材料来源表》

《甲骨文合集》是对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甲骨资料的第一次大总结，备受学术界的赞誉。但是，《甲骨文合集》所著录的主要是甲骨拓片（含少量摹本），阅读该书必须具有一定的甲骨学知识。所以，学术界都希望《甲骨文合集释文》能早日问世。

自 1980 年起，胡厚宣就开始编纂《甲骨文合集释文》，当年 11 月决定了编纂体例，初稿于 1984 年底完成，总审校工作于 1992 年完成，之后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但很快发现，《甲骨文合集释文》中繁体字、古字、隶定字和画原形字较多，排版印刷十分困难，于是重新将全部释文改为手写影印，至 1994 年底完成，随即进行繁复的校对工作。直到 1999 年，这部由胡厚宣任主编，王宇信、杨升南任总审校，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12 位甲骨学者共同参与编纂的《甲骨文合集释文》四册，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全书以《甲骨文合集》一书内容为基础，按片号顺序，逐片作出释文，并加以标点。释文采用较为公认的说法隶定文字，并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同时，释文还具有严密的科学性，表现在：通过卜辞互校、补残填缺，使卜辞材料更加完整；认真隶

---

① 《甲骨文合集补编》编者认为，这三部书资料比较集中，国内外发行面也较广，很容易得到，无需再收录翻印。
② 以上据彭邦炯等：《〈甲骨文合集〉的反顾与〈甲骨文合集补编〉的编纂》，《历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

释卜辞兆序，将反映卜辞占卜次第的每一个兆序都附释于相关卜辞的后面，尽量不使其遗漏，从而确保了卜辞材料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卜辞次序编排合理，根据卜辞的干支先后和不同事类来确定卜辞的次序，避免了文中卜辞先后次序的错乱和混乱。总之，此书的出版，将甲骨释文提高到一个新水平。[①]

同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胡厚宣任主编的《甲骨文合集材料来源表》一书，共上、下两编三册，上编（二册）依《甲骨文合集》片号顺序，按合集号、著拓号、选定号、重见号、拼合号、现藏及备注等七项，说明其材料来源，并于书后附著录书与拓本简称表及现藏单位简称表；下编将著录书与《甲骨文合集》片号作一对照，按著录书出版先后排列，并附有著录书简称表。

从《甲骨文合集》到《甲骨文合集补编》、《甲骨文合集释文》及《甲骨文合集材料来源表》的一系列巨著的出版，是中国很多学者、特别是该课题组全体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为学术界树立了集体科研攻关的典型范例，很值得向来以单打独斗为主要工作方式的史学界，将这种团结协作的合作精神发扬光大。

三、《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

《中国历史地图集》，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建设史上具有开拓性建树的著作。

（一）《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定稿于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修订并正式出版于 80 年代。1954 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建议吴晗整理《资治通鉴》的同时，谈到读史书最好有一部历史地图集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查阅。吴晗就推荐了清末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提议在标点《资治通鉴》时，改绘“杨图”，然后把两部书一并出版印刷。毛泽东认可并全都交给吴晗办理。10 月，范文澜、吴晗领衔，组成了“改绘杨守敬地图委员会”。1955 年春，吴晗邀请尹达、翦伯赞、侯外庐、侯仁之、金灿然、谭其骧、张思骏、欧阳缨等人商议，组成“重编改绘清末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简称“杨图委员会”，仍由吴晗、范文澜领衔，吴晗推荐好友、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任主编。自此，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正式启动。

---

① 曹定云等：《甲骨学发展史上的丰碑——〈甲骨文合集释文〉读后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 年 7 月 12 日。

起初，吴晗急于求成，想在短时间内完成，于是支持欧阳缨的建议，以“杨图”为主，进行改编，否定了谭其骧重编精确新图的建议。但是在编绘过程中很快发现，“杨图”所用底图与当今地图差异很大，内容也有许多遗漏和谬误，不符合现代制图要求。吴晗为编绘工作尽心尽力，但进展却并不理想。1958 年底，谭其骧与国家测绘局副局长白敏等议定，完全改用新底图。随后征得吴晗同意，彻底抛弃了“杨图”的旧体系，通过了新的设计方案，改用依据最新测绘资料新编的底图，这对于保证这套地图集的精确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编绘工作先由复旦大学一家承担，1960 年以后，又有很多单位陆续参加进来，参与人员也达到六七十人(前后共有一百多人，长期参加者不下二三十人)。但完工仍遥遥无期，吴晗很是着急。因而在速度和质量之间，他宁愿降低质量，但谭其骧则持反对态度，认为虽然标准不能定得太高，但也不能太低，为此二人经常发生争执。

1963 年 5 月 13 日，在北京召开的“杨图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突破“杨图”中原王朝的版图，改用 1840 年前的中国为范围，在此范围内的历代边疆地区的部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辖境全部予以画出；一是对每一个历史时期，不再向“杨图”那样将不同年代的建置混杂在一幅图中，改为选定一个年代为标准，每一时期地图的编绘，先根据这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制定编例，排出政区表，然后根据原始资料重新进行缜密考证，确定每一个点每一条线在今图上的确切位置，并尽量采用考古调查考察成果，不再以“杨图”为依据。这两个决定，意味着改绘“杨图”已经成为历史，将另起炉灶，开始新编反映中国历代疆域政区变化的历史地图集。但出于习惯，“杨图”委员会的名称依然沿用，仍称这项工作为“杨图”工作。

到 1965 年 7 月，这套地图集的绝大部分已经绘制完毕，只剩下西北一部分及青藏还未完成，预计到 1967 年年底可以全部编制完成。吴晗极为高兴，不料“文革”很快爆发，他本人也很快被揪斗并投进监狱，绘图工作不得不停止。尹达、谭其骧和“杨图委员会”全部成员，也都毫无例外地遭受批斗审查。1969 年，周恩来总理指示恢复编制工作，同年 11 月重建工作班子，重启已搁置了 4 年的历史地图编绘工作，而吴晗已被迫害致死。[①]1970 年底，部分样图送交外交部、国务院科教组、

---

① 以上据宋连生：《吴晗的后二十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3—85 页。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其主编谭其骧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最大贡献，关于谭其骧在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具体工作情况及其重大作用，葛剑雄在《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2000 年版)及此二书的修改缩写本《禹贡传人：谭其骧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中，有详细叙述。

历史所等组成专门小组审查。图名改为《中国历史地图集》。1973年编绘工作基本结束。1974年起,《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以中华地图学社的名义陆续出版了内部试行本。由于属突击完成,又值"文革"时期,内部刊行本中出现了一些错误和违背历史事实的内容。于是1981年起,又由谭其骧主持修订,用一年多时间修改增补,全书八册于1982—1987年由地图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历史地图集》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4幅地图。全书共分八册,第一册: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第二册:秦·西汉·东汉时期;第三册:三国·西晋时期;第四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第六册:宋·辽·金时期;第七册:元·明时期;第八册:清时期。地图上的内容包括:已知原始社会遗址和其他时期重要遗址的分布,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建立的政权的疆域政区或活动范围、民族分布,秦以前见于记载的全部可考地名,自秦代开始全部县以上地名、一二级政区的界线,可考的长城、关津、堡寨、谷道、陵墓、庭帐等,主要的河流、湖泊、山岭、海岸线、岛屿等,共收地名7万多个,并全部采用古今对照。各册均有中、英文的编例和地名索引。

鉴于《中国历史地图集》不可能有过多的文字资料,于是编纂者们又把编图所用文字资料按地区汇编成六卷《中国历史地释文汇编》,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原始资料和结论等内容和盘托出,并特别就《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无法表达出来的内容作了如实、详细地说明,既弥补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一些不足之处,也使读者更加清楚地了解了这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原则与方法,对正确认识和使用这部《中国历史地图集》提供了帮助,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历史地图集》本身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特色及成就

《中国历史地图集》,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一项重大成果,集中反映了中国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测绘制图学和其他相关学科至80年代初的研究水平和学术成就,也为此后各种专门历史地图和地区性历史地图的编绘提供了坚实基础。此后的学术著作、工具书中的各种历史地图,基本上都以它为底图,或根据其中有关图幅改编,它的绝大多数的画法和相应的依据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论;各类教学挂图基本都据其中地图改编。因此,它的编成出版,实际上就标志着中国历史地理学从此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①奠定了该学科进一步发

① 王文楚:《谭其骧与〈中国历史地图集〉》,《文史知识》1995年第9期。

展的牢固基石。[①]作为《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的谭其骧认为，这部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等方面也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主要表现在：

1.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但由于封建正统观念和大汉族主义的影响，也由于少数民族的历史大多未得到足够的记载和研究，以往的历史地图集一向只画出中原王朝或汉族政权，抹杀了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如实反映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为目的，确定以1840年以前的清朝版图为历史上中国的基础范围，历史上所有在此范围中活动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包括虽有部分辖境在此范围之外但其政治中心在此范围内的政权，无论是汉族或其他民族，都毫无例外地绘入图中。一些边区民族政权如吐蕃、突厥等还尽量选用了显示他们极盛疆域的年代。[②]

对这一方面的成就，葛剑雄后来又进一步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不但在分裂时期，即使在传统的"统一"时期，也画出了境内同时存在的各个政权，如西汉时的匈奴，东汉时的鲜卑，唐时的突厥、回鹘、吐蕃、渤海、南诏，明时的鞑靼、瓦剌、亦力把里。有些民族还没有明确的疆域或政区，有的虽曾有过却已经无法查考，也在各时期的总图中画出了它们的地点和大致范围，如西汉时的鲜卑、乌桓、夫余、肃慎、唐旄、发羌，东汉时的挹娄、沃沮、高句丽，唐时的室韦、葛逻禄、黠戛斯，明时的叶尔羌、吐鲁番、鞑靼土默特部。对上述第一类政权，同样选择它们历史上稳定的、有代表性的或最大的疆域入图，如吐蕃即以公元820年（唐元和十五年）为标准年代，显示了它北至天山山脉，南至喜马拉雅山南麓，东至陇东、四川盆地西缘，西至帕米尔高原这样广阔的领土。同时对中原王朝的版图也作了完整的描绘，如西汉的郡县东至朝鲜半岛中部，南至今越南南部；唐朝的辖境一度北至贝加尔湖以北，西至咸海；元朝的岭北行省直抵北冰洋，辽阳行省东临鄂霍次克海；都未受现今国界的局限。对于历史上一度归属未定或不明确的地区，《中国历史地图集》采用了不画界，用着色示意这一地区或为两不管地带，或为双方势力交错地带。还有一些地区，尽管一直没有建立地方政权（或者至今没有发现），却是由当地民族自己经营的，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归属于中原或其他的政权，如17世纪以前的台湾，《中国历史地图

---

① 华林甫：《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成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② 谭其骧、葛剑雄：《回顾与展望：中国历史地理学四十年》，载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52—571页。

图集》也如实作了反映。

因此,《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处理历史上的中国的范围以及在此范围内的各个政权、民族的关系时,是充分反映了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为今天的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贡献的过程;既显示了汉族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也证实了少数民族对边疆的扩展和巩固的重要作用;揭示了统一逐步扩大、逐步巩固,开发逐步深入、逐步稳定的基本趋向。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部论著能够如此完满地解决这些问题。它所确立的有关历史上的中国的观念以及中原王朝、边疆政权、非汉族政权、地方政权、自治地区之间关系的原则,对于中国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国历史政区地理等学科的研究都具有指导意义。[①]

2. 以前的历史地图集只能以文献资料为定点上图的依据,加上历史记载极为浩繁,编者精力有限,错漏难免。在历史文献本身记载错误的情况下,地图上的差异更难避免。《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中国历史地理学各方面的成果为基础,并尽量吸收了国内外已经发表的考古、地理、民族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用于核实、校正文献记载,填补文献的空白。如对边区图的编绘,就广泛吸收了少数民族文献资料,参考了国外的论著,所以内容更加完整准确。对大多数只能依靠文献资料确定的点线,也组织人力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纠正了很多前人的错误。另外对河流、湖泊、海岸线等历史上变化较大的自然要素,也进行了一系列专题研究,改正了传统的错误说法,对云梦泽、洞庭湖、鄱阳湖、黄河、长江、海河、辽河等的变迁过程,都采用了新结论。[②]基本上将我国有史以来的海陆水系变迁在图上显示出来,这是以往的历史地图集所没有做到的。[③]

3. 历史上疆域、政区、地名变化很大,大多在同一政权时期内也屡有改易,而各正史《地理志》对时间断限一般都不够重视,往往在一篇之内混淆一朝前后不同年代的建置,以致出现前后相差数十年、百余年的现象。《中国历史地图集》无论总图还是分幅图,都确定标准年代,尽可能显示同一年代的政权疆域和政区建制。个别无法确定标准年代的,则尽可能确定一段较短的标准时期。对历时较长的朝代,则采用多幅总图分别显示不同年代地理变化的状况。

---

① 葛剑雄:《中国历史疆域的再现:评〈中国历史地图集〉》,《读书》1990年第5期。

② 谭其骧、葛剑雄:《回顾与展望:中国历史地理学四十年》,载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52—571页。

③ 葛周:《谭其骧与中国历史地理学》,《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

4. 中国传世的历史地图，一般都以一个朝代为一幅全图，因受到图幅和比例尺的限制，内容只能非常简略，定位也必然很不精确。清末杨守敬《历代舆地图》采用了将全图分解为数十幅图的方法，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但他在各分幅图采取同一比例尺，而历史时期各地区开发程度和文献记载的详略极不均衡，因此中原地区往往地名密布，几乎难以辨认，而边区却显得过于空白。同时这种平均分割法往往使同一政区分见于前后几幅图上，查阅极其不便。《中国历史地图集》采用了按各历史时期大行政区（或监察区、地理区）分幅，各幅按其内容密度采用不同的比例尺，必要时插入比例尺大的局部图，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①]

此外，侯仁之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一方面为中国各地区历史地图集中政区部分的编绘树立了典范；另一方面也为其他重要的历史地理研究的成果在绘图表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例如我国历代人口分布图、民族迁移图、交通变迁图、经济发展图等，都可以根据这部图集的有关图幅进行绘制。因此它的出版，"又是我国历史地理学全面发展的一个预兆"。[②]邹逸麟也认为，这部图集不仅集中反映了以往沿革地理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也为今后历史地理研究的全面展开，提供了可靠基础。[③]而陈桥驿则从学科的角度，高屋建瓴地指出，这部图集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用新方法绘制的历史地图集，不仅保持了详细描绘政区沿革的传统特色，还包括了大量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内容，具备了现代地理学研究的主要要素，是一部现代地理科学范畴的地图集。[④]

除了以上学术价值外，《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纂还有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如邹逸麟 1998 年指出的："目前国内六十岁以上在历史地理学方面比较有成就的学者，大部分在 50 至 80 年代参加过《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工作，由此可见，一个大型科研项目确实是可以培养一批人的。"[⑤]

（三）《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不足之处

由于各种条件所限，《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编谭其骧在

---

① 以上两段见谭其骧、葛剑雄：《回顾与展望——中国历史地理学四十年》，载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52—571 页。

② 侯仁之：《近年来我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地理学报》1983 年第 2 期。

③ 邹逸麟：《回顾建国以来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复旦学报》1984 年第 5 期。

④ 陈桥驿：《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1985 年第 4 期。

⑤ 邹逸麟：《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载《学林春秋》三编下册，朝华出版社 2000 年版。

1982年所写出版“前言”中，坦诚说明了两点主要不足：

1. 历史上每一个政权的疆域都时有伸缩，政区分划时有变革，治所时有迁移，地名时有改易；各图组的每一幅图都按照这个时期中的某一年代画，这样做科学性固然比较强，但凡是这个时期出现过的与这一年代不同的疆界和州县名称、治所，除一小部分用不同符号注记或括注表示外，大部分在这套图上是查不到的，读者如要在图上查找这些地名，那就不免失望。

2. 古代城址有遗址保存到近现代，曾经考古、历史、地理学者调查考察过而写有报告公开发表或见于著作，得据以在今地图上正确定位的，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城邑只能根据文献上“在某州县某方向若干里”一类记载定位，因为既没有现成的调查考察报告，又不可能付出大量时间去做这种工作，因此，图中的点线和历史上的实际位置有误差的，肯定不在少数。特别是古代的水道径流、湖泊形状等，更难做到正确复原。

1987年，谭其骧又在“后记”中补充了两点不足：

1. 在各个历史时期一统政权“地东至某处，西至某处，南至某处，北至某处”的版图之内，事实上往往错居着或多或少朝廷和地方官管不到的、由当地土著君长统治着的部族。不仅秦朝的闽中郡内还有无诸和摇两个东越君长能在秦末率众从诸侯灭秦；西汉设在西南夷地区的牂柯、益州、越嶲等郡内，还有统治着一部分土地、人民的夜郎王、滇王、鉤町王、漏卧侯等君长；并且直到近代，个别地区也还存在这种现象。本图集分幅图的比例尺多数是三、四百万分之一，本来是可以把这些地区大致表示出来的。但内部本却一概未予理会，公开本虽然有所改进，仍未能全部表示出来。有些地方倒不是没有注意到，而是由于想不到合适的可行的表示方法，只得暂时不予表示。

2. 唐、宋时代的羁縻州，元、明时代的土司和明代的羁縻卫、所，从有关文献记载看来，既不能说全部都是，也不能说全部都不是唐、宋、元、明王朝的领土。正确处理的方法应该是仔细认真分析史料，适当予以区别。但本图集未能做到这一点，而是采用了完全作为王朝领土处理的办法。有的羁縻地区和王朝的关系可能还赶不上“属国”，却也被画进版图。当然，由于史料不足，要把所有羁縻地区的具体情况全都搞清楚是很困难的，因而不可能要求都区分得很清楚。但是完全不做区别，应该说是一个缺陷。

显然，谭其骧坦陈的这四项主要缺点，都不是在短时间内所能解决的，只能伴

随着中国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发展而逐步得到修正补充。

除了以上四项主要缺点外，在多年来的使用过程中，学者们也发现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一些具体失误，归纳起来有如下几项：

1. 内容上存在不平衡的现象

陈桥驿指出，这部图集在人文地理方面已经相当成熟，其内容也非常丰富，但民族地理、军事地理、农业地理、交通地理、经济地理等方面仍嫌不足，各分支间不够平衡；与人文地理相比，自然地理各要素的反映也相对不足。当然，这种不平衡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并不决定于编者的意志，而是反映了过去一段时期中，我国历史地理研究在部门和地区间的不平衡状态。[①]

2. 一般只选正史《地理志》或补志所取的年份作为标准年代

葛剑雄指出，由于史料方面的原因，《中国历史地图集》一般只能选正史《地理志》或补志所取的年份作为标准年代，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年份就不一定有代表性，更难反映出该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大事件所造成的影响。而且《地理志》所载往往是一个朝代的极盛疆域，选择这些年代编成的疆域政区图必然会给多数读者造成一个始终强盛广大的错觉，不了解历史上同样存在过的另一面。以东汉为例，《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与《续汉书·郡国志》的断限一致，以永和五年(140年)为标准年代。从总图上看，东汉的疆域与西汉元始二年(2年)相似。但实际上，就在当年西北就发生战乱，西河、上郡、朔方三郡治内迁；次年，安定、北地二郡又内迁；东汉设在西域的长史府也时断时续，远不如初期那样稳固。再以唐代为例，尽管总图已增加至三幅(总章二年，669年；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元和十五年，820年)，大致显示了唐朝的疆域由盛至衰的变化，但分幅图基本是以唐朝极盛时的开元二十九年为标准年代的，因而经历了安史之乱以后这一百五十余年间的政区变革就得不到反映。当然，要用静态的平面地图完整地反映疆域政区的动态发展变化是不可能的，只能选取若干有代表性的片断。但在坚持标准年代的原则的同时，还是可以采取些适当的办法，以弥补静态的不足，减少编绘的可能性与使用需要之间的矛盾。[②]

3. 有定位不准确和遗漏现象

由于历代地理与政区的变化复杂、文献记载的缺漏与歧异，以及对古今方志和

---

① 陈桥驿：《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② 葛剑雄：《中国历史疆域的再现：评〈中国历史地图集〉》，《读书》1990年第5期。

考古发掘报告不能及时吸收借鉴等原因，使该书存在着一定的疏误。如耿占军发现清代陕西图中有两处地名错误；刘纬毅发现，对两汉、西晋、北魏的大阳县，《中国历史地图集》定位在今平陆县西南 1.5 公里处，实际应在今平陆县北 15 公里之古城村，而当时的壶关县即今长治市，也不在《中国历史地图集》所定位的今长治市北 35 公里处。[①]由于一些考古成果没有及时借鉴，遗漏之处颇多。吴良宝根据不断出土的战国文字资料，对《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战国时期"所收录的地名资料进行补正，补充了 120 余个战国时期的县名。[②]

4. 有名实混用的现象

《中国历史地图集》对地名采用古今对照的方法，非常便于读者查阅，一目了然，但也由此开了名实混用的先例。《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元・中书省》图上，首都名称标明："大都路。"这是正确的。而《明・京师》图上，其首都名称则采用名实混用的双轨制："京师：顺天府。"《清・直隶》图亦然："京师：顺天府。"将普通名词与专有名词混在一起并列使用。而如今的许多历史教科书，又对这双轨制加以发挥，以普通名词代替了专有名词，只保留普通名词"京师"，而索性去掉了专有名词"顺天府"。这样，清朝都城的地名，就被改成了无地名的名称。若照此办理，现在的世界地图上，"北京"、"东京"、"莫斯科"、"巴黎"、"伦敦"、"华盛顿"……等地名就都应该消失，而改写成一个同一的普通名词："首都"。[③]这当然是不应该的。虽然这不能直接归咎于《中国历史地图集》本身，但它始作俑者的负面影响还是造成了。

总的来说，《中国历史地图集》，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荣获国家图书的最高荣誉——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等。

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及相关资料编纂[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科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并逐渐形成

---

① 耿占军：《〈中国历史地图集〉校误二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 年第 1 期；刘纬毅：《〈中国历史地图集〉山西部分商榷》，《山西师大学报》2001 年第 1 期。类似问题，还可参见杨森翔：《历史上的灵洲、灵州、灵武谷、灵武城址及其他——订正〈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一个错误》，《宁夏大学学报》2008 年第 1 期。

② 吴良宝：《〈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部分地名校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 年第 3 期。

③ 吴柯等：《谈历史教科书清朝首都地名问题——兼谈〈中国历史地图集〉明清首都双重名称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 年第 3 期。

④ 本节主要参考了下述著作：陈其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科学的盛举：论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重大成就》，《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庄建平：《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资料出版概述》，《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姜义华等：《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多种分支学科，除了历史观、方法论的原因外，其资料基础是整理出版了大量史料。

(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纂

1949 年 7 月，中国新史学会筹备会成立时，范文澜为负责人，将推动近代史研究作为重点工作，开始了大规模的近代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1950 年，该会组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委会，由著名学者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等 11 人组成，确定了各专题和负责各专辑编辑工作的学者。为纪念义和团运动 50 周年，率先由翦伯赞主编了《义和团》资料 4 册，于 1950 年 12 月完稿，1951 年 3 月由神州国光社出版。1951 年 7 月，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继续将整理和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作为主要工作。此后十余年间，这套丛刊由北京等地各大院校及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分工协作，共出版《鸦片战争》6 册（齐思和主编，神州国光社 1954 年版）、《太平天国》8 册（向达主编，神州国光社 1952 年版）、《第二次鸦片战争》6 册（齐思和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回民起义》4 册（白寿彝主编，神州国光社 1952 年版）、《捻军》6 册（范文澜主编，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洋务运动》8 册（聂崇岐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中法战争》7 册（邵循正主编，新知识出版社 1955 年版）、《中日战争》7 册（邵循正主编，新知识出版社 1956 年版）、《戊戌变法》4 册（翦伯赞主编，神州国光社 1953 年版）、《辛亥革命》8 册（柴德赓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连同先前出版的《义和团》4 册，共有专题资料 11 部，共 68 册、2 758 万字。这是第一次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浩繁的近代史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基本上涵盖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最基本和最有价值的研究资料”，[①]为大陆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奠定了比较扎实牢靠的资料基础。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自陆续编成出版以来，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不仅成为国内同行学者案头必备的参考书，而且“国外的一批学者正是靠这批材料，写成了不少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②]执美国汉学界牛耳的费正清等人，也在 1957 年时即对这部丛书给予了高度赞许。[③]

① 陈其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科学的盛举：论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重大成就》，《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

② 夏自强等：《翦老在燕大》，载《翦伯赞纪念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7—88 页；据曾业英主编的《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美国学者利用这部丛书培养了数百名汉学博士，见该书第 686 页，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

③ 费正清等人评论，见朱政惠：《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问题》2003 年第 3 期。

运用科学的整理方法，创立严谨的体例，是《丛刊》各个专题的共同特色。在中国史学会的领导下，各个专题均依照下列程序进行：一、尽可能地广泛搜集史料；二、精心选录，合理分类编排；三、分段标点校勘；四、撰写书目解题，编制与本专题资料相关的多种附录。这些环节中无论其中的哪一项，工作量都是很浩繁的。仅拿分段标点和校正错字来说，《丛刊》全部史料达 2 000 余万字。如向达主编的《太平天国》，收录各种资料 218 种；齐思和主编的《鸦片战争》，搜集到有关鸦片战争的论著、史料共计 200 余种，经选录编入书内的有 150 种；邵循正主编的《中日战争》，收录了中、日、德、英、俄五种文字史料；翦伯赞主编的《捻军》，最初选录的地方志著作就有 230 种，后来剔除了一些重复和价值不大的资料，但保留的仍很多，而且还另外收录有大量个人文集、笔记和日记等资料。对这些已经选录或未选录而较为重要的书籍，丛书编者都将其作者、版本、主要史料价值以及需加考辨的问题撰成《书目解题》，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提供了研究性、指导性的成果。

与此相关，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也于 1954 年创办了《近代史资料》期刊，“文革”以前，基本上每年都出版。“文革”时期，近代史资料的编辑和整理工作被迫停滞。1979 年以后，近代史资料整理和出版工作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迄今累计出版的资料书籍有上千种，《近代史资料》期刊也恢复正常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又出版了第 12 种《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3 种《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而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 11 种专题资料，也已由中华书局等出版单位陆续出版续集。

(二) 其他近代史资料编纂

1. 在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同时，一批经济学家也开始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影响较大的有 4 种丛刊或丛编。一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包括《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二是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包括《中国海关与滇缅问题》、《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中国海关与义和团》等 10 种。三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包括《中国民族火柴工业》、《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上海)永安纺织印染公司》、《上海民族机器工业》、《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

统计资料》、《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等 7 种。四是《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丛书》，包括《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从一个民族企业看中国机器制造工业》、《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中国最早的一家棉纺织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荣家企业史料》（上册：1896—1937 年；下册：1937—1949 年）、《刘鸿生企业史料》等典型企业建立、发展与改造的专题资料集。据粗略统计，迄今编纂出版的经济史资料书已达百余种。

2.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或稍后，时人著述太平天国事迹的书籍很多。太平天国博物馆编辑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共 6 册），汇集了《粤寇起事纪实》等 46 种资料。此外，还有金毓黻等编辑的《太平天国史料》、静吾等编辑的《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太平天国资料》、张守常《太平军北伐史料选辑》等，促进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3. 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的资料出版较多。有关义和团运动的重要资料，有齐鲁出版社出版的《义和团资料丛编》等 5 种，其中包括《山东义和团案卷》、《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辑》、《山东教案史料》，以及《天津义和团调查》。有关辛亥革命的地域资料，较早出版者为戴殷礼编辑《四川保路运动资料》、隗瀛涛主编《四川辛亥革命资料》、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印《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嗣后，湖北、江苏、广东、浙江、上海等地的学术团体也编辑出版了辛亥革命在本地区的综合资料，史料价值较高的有《云南辛亥革命资料》、《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辛亥革命江苏地区资料》、《广东辛亥革命资料》、《辛亥革命在广西》、《华侨与辛亥革命》等等。

4. 1959 年，周恩来倡导政协系统组织编写文史资料，很快建立了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由范文澜任主任委员。1960 年，全国政协主办的《文史资料选辑》创刊。据 1990 年统计，全国县级以上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及其文史办公室，编印文史资料共 2 300 多种，计 13 000 多册，约收文稿 30 多万篇，总字数近 2 亿。

各地文史资料选辑的文稿，大多数是亲历、亲见、亲闻者自撰或口述，部分为调查访问记，少数为历史档案、现代报刊、史志书稿等文献的摘登。这些文稿，从不同角度记录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社会、地理诸方面的情状和重大事件的始末，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动情况。尽管其中部分文稿或因撰稿人记忆有误，或因某种缘故未能秉笔直书，有造成失真的局限性，但从总体上看，仍然不失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是值得史学工作者关注的新史源，可以匡正某些文

献资料的误记，弥补现有文献史料的缺佚，提供生动的微观史料。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明清两朝的档案卷帙浩繁，数量巨大。近些年来，该馆编辑出版了多种史料，其中影响较大的近代史资料有 4 种:《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和《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这些专题资料，均从上谕档、剿捕档、录副奏折以及照会函札中选出，其中有些档案资料，为过去已刊专题资料集所不载。有些资料不仅记事翔实，而且还匡正了已刊资料的谬误。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要收藏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档案资料。该馆编辑的两种规模较大的近代史料，颇受学界推重。其一是《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先出版《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两辑，从第 3 辑开始按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两个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金融、工矿业、农商等分册编辑。其二是《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是根据该馆馆藏历史档案，按照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历史人物及企事业机构，分专题编辑成书，已出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直皖战争》等专题。

7. 各省市地区博物馆、档案馆等单位，也利用藏档汇编了颇有研究价值的资料集。已面世的有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国近代史参考图片集》三集、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下册、上海图书馆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广东省档案馆《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14 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译《中国海关密档》。东北地区档案馆从满铁档案中已选译出版《满铁资料》、《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与中国东北:满铁秘档选编》。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东北地区档案馆合作编辑出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分为“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伪满和汪伪政权、东北历次大惨案、伪满警宪法西斯统治、华北大扫荡、细菌战、经济掠夺等卷，迄今各卷已经陆续出版问世。天津市社会科学院、档案馆、工商联等合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以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苏州市档案馆合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两书，颇具特色。天津、苏州与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重庆的商会组织，号称清末八大商会，然而各地商会的档案，历经朝代更迭和连年战乱，流失几尽，得以侥幸保存下来的仅有天津和苏州两地区，它们一为近代中国新辟的通商口岸，一为中国传统的工商业发达城市，各具代表性。

8. 以介绍档案史料为主的刊物，也纷纷创办。例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先后创办了《历史档案》、《民国档案》。以后各省档案馆也陆续出版了这类刊物，例如《档案与历史》、《北京档案史料》等，共有20多种，每年公布的档案约在百万字以上。

9. 其他个人和集体编纂的近代史资料。私人编纂近代史资料，1949年以前即已出现，如左舜生在1929年编辑出版《中国近百年史资料》二册，1933年又编辑出版《续编》二册；杨松、邓力群在1940年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荣孟源在杨松、邓力群前书基础上，重编了《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于1954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第一编第一、二分册；1961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中国近代史资料》(第三分册)；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翦伯赞等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的近代部分上下两册。1962年，程英《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历史歌谣选》由中华书局出版，是一部非常有特色的近代史资料选编。此外，还有一些专题性近代史资料汇编。这些著作都对当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石，也是历史研究的先导。上述各种资料的编辑出版，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顺利开展。

五、中国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中国传统史学一向以政治史为中心，虽然司马迁的《史记》中早就有了经济史的内容，唐代杜佑《通典》还首创以经济史内容为全书开篇的史书编纂新格局，到元代终于出现专门的经济史之书，明代时各种分门别类的经济史著作更是纷纷出现，但真正独立意义的经济史研究还远未形成。

20世纪初期，梁启超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创立资产阶级新史学，主张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并带头写出了一系列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论文，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开辟了道路。随着唯物史观的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开始从经济的角度认识和研究中国历史，为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到20、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进行，整个史学界都开始重视经济史研究的开展，不但发表了许多论著，而且还出现了专门的经济史研究的刊物，这都表明中国经济史学科已然正式

形成。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大陆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文革”结束以后，各种专门的经济史研究机构纷纷建立，专门的经济史研究刊物和各种专门的经济史研究团体也都相继成立，1986 年还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经济史学会，这都促进了中国经济史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经济史资料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也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下面就从古代经济史资料的汇编、近现代经济史资料的汇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资料的汇编三个方面，对 20 世纪后半期大陆学界对中国经济史资料的整理、编辑、出版的情况，予以综合考察。

(一) 中国古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文革”以前，经济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主要侧重于中国近代经济史部分，古代部分只出版了五部新编资料性书(不含古书校注类书)。直到“文革”以后，这种畸偏畸重的状况才得到迅速改善，取得了中国古代经济史资料汇编的重大进展。

1. 综合性经济史资料汇编的整理出版

梁方仲在 1949 年以前就已发表很多重要经济史研究论著，并早就注意对各种文献和档案史料的搜集。他在 1935 年完成《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之后，又在此基础上，系统整理了中国历代相关经济史材料，于 1962 年完成了《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但因政治原因，迟至 1980 年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上起西汉，下至清末，是作者从正史、政书、方志、文集、笔记和档案等两百多部文献史料中，检索出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的大量数据，分门别类，综合编制成 242 个统计表格和 6 个统计图表，每个图表都经过精心设计和计算，务求翔实准确，每表之后除附有资料来源外，很多附有详细解释，“为统计学与历史学的结合研究做了艰巨的奠基工作，为使用数量统计研究中国户口田赋史及其他有关问题打下了坚实基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①]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明清经济史研究受到广泛重视，因而有关明清经济史

① 李文治:《李文治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01、406—407 页。

资料的汇编工作也取得突出成绩。先是南开大学历史系师生在1958年共同编辑了《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次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是从《清实录》、《宣统政纪》中选出的有关农业、工业、经济、财政等原始资料,共分为12辑,包括总类、农业、畜牧、手工业、近代工业、交通、商业及高利贷、对外贸易(附外国资本的入侵)、财政、赋税、盐务、漕运等。资料按类选录,注明原书卷次、页码,并加标点,很便于利用。循此思路,郭厚安1989年出版《明实录经济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明实录》中重要的经济史资料分为户口、田制、赋役、盐务、农业、工业、商业等八类,以年月为序,资料宏富,编排简明,为明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便利。继之而起,李国祥等1993年出版了《明实录类纂:经济史料卷》(武汉出版社)。

谢国桢则另辟蹊径,1980—1981年,出版《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三册(福建人民出版社),所引史料均来自野史笔记,内容包括农业、手工业、工艺美术、科技、商品经济等诸多方面,对于了解明代社会经济情况有很大作用。

1982年,傅筑夫等出版了《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1990年又出版《先秦编》(均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王永兴在1987年出版了《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中华书局)。

1985年、199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资料》第一辑和第二辑,包括《秦汉货币考古资料辑录》、《宋代盐法资料类辑》、《淳熙三山志》、《清初漕赋资料》等。

从1985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巫宝三编辑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从先秦到明清,共分五卷出版,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提供了通史性的大部头资料。与此同类,赵靖则1985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基础资料即历代官修正史的"食货志",作了很多精审的校补工作,成果陆续问世。如梁方仲的遗稿《〈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4期、1981年第1—2期)、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中华书局1986年版)、谭英华《两唐书食货志校读记》(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潘镛《旧唐书食货志笺证》(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梁太济等《宋史食货志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与上述书同时,王雷鸣出版了《历代食货志注释》1—5册(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王子英等出版了《中国历代食货志汇编简注》上、

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1987 年版),更是全面系统的资料汇编工作。

2. 部门经济史资料汇编的整理出版

(1) 农业史资料

中国古代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产生了很多具有重要价值的农书,目前这些农书已经大部分校释出版。例如关于先秦农业史资料,夏纬瑛出版有《管子地员篇校释》(中华书局 1958 年版)、《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农业出版社 1961 年版)、《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农业出版社 1979 年版)、《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农业出版社 1981 年版)、《夏小正经文校释》(农业出版社 1981 年版)等,为先秦农业史研究提供了基础性资料。王毓瑚则在研读夏著《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 1981 年版),对夏著做了很多校补工作。

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书,石声汉出版《氾胜之书今释》(科学出版社 1956 年版)、《齐民要术今释》四册(科学出版社 1957—1958 年版)、《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缪启愉出版《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 1981 年版)、《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 1982 年版),其中后者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是目前该书最为完善的版本。

对隋唐宋元时期的农书,万国鼎出版《陈旉农书校注》(农业出版社 1965 年版);王毓瑚整理出版《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 1981 年版);缪启愉出版《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 1981 年版)、《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 1988 年版)、《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石声汉出版《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 1983 年版)等。

对明清时期的农书,王毓瑚整理出版《秦晋农言》(中华书局 1957 年版)、《梭山农谱》(农业出版社 1960 年版)、《农桑衣食撮要》(农业出版社 1962 年版)、《郡县农政》(农业出版社 1962 年版),他还整理汇编了历代有关区种法的文献,出版《区种十种》(财政经济出版社 1955 年版);石声汉在 1979 年出版《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这是明清农书整理中的最重要成果。此外,明清时期产生的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等也都有了校注本。中国古代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也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 1991 到 1995 年分四册出齐。至此,中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重要成果。例如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等

《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伊钦恒《群芳谱诠释》(农业出版社 1985 年版)等;缪启愉等《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 1990 年版),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书,进行辑佚和考释,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在畜牧兽医史料方面有,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 1984 年版)、许长乐《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 1988 年版)。在水利书的整理方面有,汪家伦《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 1980 年版)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 1984 年版)、马宗申《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 1984 年版)等。①

除了整理、校释古代农书外,新编有关的资料选辑也是重要方式。如 198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编纂组编辑出版了《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料》(农业出版社)。主要采辑“二十四史”及明清实录等资料,未能使用档案、重要官书、文集、方志、杂著等,因而资料尚不完备,并存在一些重要材料的遗漏,但在当时条件下,这已经是一本较为系统地反映中国古代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的资料汇编。1994 年,张波等人编辑出版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技出版社),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农业灾害演变的历史过程和抗灾传统,是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的基本资料,对于创立中国农业灾害学和农业灾害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②。与此相类,1985 年,河北省旱涝预报课题组编辑出版了《海河流域历代自然灾害史料》(气象出版社);1994 年,蔡克明出版《胶东半岛自然灾害史料》(地震出版社);1999 年,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出版《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广东科技出版社)。

1988 年,何炳棣出版《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两汉以来,特别是从南宋到现代的土地数字作出考释和评价。

1989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陈振汉等编辑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顺治至嘉庆朝:1644—1820)。此前,李文治在 1956 年完成《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其中涉及清代前期农业史资料。

1992 年,彭雨新出版《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清代土地的开垦情况。

有关农业生产技术的资料也得到了整理。1982 年,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

---

① 上述农书整理出版情况,据李根蟠等:《中国农业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古今农业》2003 年第 3 期。
② 张德运:《一部记载中华民族五千年农业灾害历史的巨著》,《陕西林业科技》1995 年第 2 期。

究组出版了《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出版社),从古籍中选录商周到清代有关农具的创造与发展的史料。彭世奖则出版了《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8 年版),其中所收的民间传统要术,采自近四百种古代文献,其中不少是罕见的收藏本,为整理保存中国民间传统农业要术的精华,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专业性农业史资料的编选方面有:王毓瑚《中国畜牧史资料》(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张仲葛等《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章楷主编《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农业出版社 1982 年版)、陈祖椝等《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 1981 年版)、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吴觉农主编《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 1990 年版)。

(2) 林业史资料

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林业附属于农业,因而在古籍中虽不乏林业史资料,却并无林业史的专题研究,并无独立的林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部分农史学者对农林古籍进行了发掘与整理,为林业史研究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

1951 年,陈嵘将其 1934 出版的《历代森林史略及民国林政史料》修订成《中国森林史料》,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比较科学而又系统地研究中国森林发展史的书。1960 年 10 月,由干铎主编完成《中国林业技术史料初步研究》一书,1964 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是中国当代研究中国林业史的较为完整的一本专著。它与《中国森林史料》一样,均以研究为主,但也具有很强的资料性。

1993 年,董智勇主编出版了《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中国林学会林业史学会印),对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全国森林变迁史料进行了梳理考察。

(3) 交通史资料

张星烺在 1930 年曾出版六册本《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系 17 世纪中叶(明末)以前中国与欧、亚、非洲各国和地区往来关系的史料摘编。1977—1979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朱杰勤整理的校订本,对原书进行了一些增补、删削与校正。

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中外交通史资料整理方面,向达起到了重要作用。1958 年,他拟定了一个《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计划,共收录古籍 42 种,准备陆续整理,交中华书局出版。1960 年,此计划被批准实施。1981 年以后,又出版了唐朝释慧立

和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释道宣《释迦方志》,元朝汪大渊《岛夷志略》、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明朝张燮《东西洋考》、李言恭等《日本考》等。为研究亚洲以及东非各国的古代史、研究中西交通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58 年,楼祖诒出版《中国邮驿史料》(人民邮电出版社),收集整理了散见于各种书籍中的中国古代邮驿通信史料。

1999 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仇润喜等主编《中国邮驿史料》。全书共 10 编、45 目、666 个子目。所辑资料,上起夏商、下迄清末。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古代邮驿的发生、发展的演变历程和特点,以及邮驿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深厚积累,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系统的一部邮驿史料书。

(4) 财政史资料

中国传统史学中一直有关于财政问题的内容,从先秦诸子有关财政问题的议论到《史记》、《汉书》等纪传体正史的编纂,再到典志体通史、断代史的编纂,有关财政方面的记载构成了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这些都为 20 世纪中国学者研究财政史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从 20 世纪上半期开始,不少学者利用近代西方的经济学和财政学理论,对中国财政史进行研究,撰写出一些财政史论著,其中程滨遗等《田赋会要》第二篇《田赋史》上册、第三篇《田赋史》下册(正中书局 1934 年版),是一套"铺叙史实,推究因果"的资料性书,上自夏、商、周,下及民国初年,以史料整理为主,就历代田赋沿革为系统叙述,在当时堪称详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古代财政史在中国大陆学界长期遭到冷落。"文革"结束后,古代财政史研究迅速繁荣起来,不但出版了很多有重要价值的研究专著和各种教材,而且财政史资料工作也取得很大进展。

为配合高等院校中国财政史课程的教学,各院校或出版社组织编选了一些参考资料。例如,《中国财政金融年表》三册(上、中册取自吴兆莘遗稿,洪文金补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1、1987 年版;下册根据吴兆莘、洪文金遗稿,刘聚星等续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4 年版),是一套以春秋战国到清朝末年各个朝代所发生的财政金融大事为辑录对象的编年体资料书。此后,孙翊刚等《中国财政史参考资料》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84 年出版;孙翊刚等《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十一册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 1987—1989 年出版,其中前九册由先秦至清代前期,后二册为清代后期和北洋政府时期。国家税务局主持编写的《中国工商税收史资料选编》七辑,取材范围也由三代至清代前期,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

1991—1995 年陆续出版。这些资料选编的出版，对中国财政史研究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1980 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财政史的基础资料即历代官修正史的“食货志”，作了不少精审的校订、笺证、补遗，成果陆续问世。如上面提到的梁方仲的遗稿《〈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都对《明史·食货志》的史料多有注释、纠谬、补遗之功。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谭英华《两唐书食货志校读记》、潘镛《旧唐书食货志笺证》则以注释、笺证等形式，校勘和考释汉、唐财政制度的内容；梁太济等《宋史食货志补正》引用丰富文献，对《宋史·食货志》的大量史料作了溯源、校正和增补。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1—5 册，王子英等《中国历代食货志汇编简注》上、下册，更是全面系统的资料汇编工作。鲁子键《清代四川财政史料》(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是断代区域性专题资料书，从一个地区的角度，比较客观地展示出清朝 260 余年间财政建立、发展的趋势及其特点的大体轮廓。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吴煦档案选编》第六、七辑《清政府财政经济资料》(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清代朱批奏折财政类目录》四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 年版)，都为研究清代财政史提供了新的档案资料。①

(5) 货币史资料

中国是最早使用货币的文明古国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已经出现了用牲畜、谷物等作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实物货币。夏商时期，出现了海贝、青铜贝。春秋战国时，流通着中国特有的由生产工具演变而来的布币、刀币等青铜铸币。秦朝统一货币后，历代因袭采用了方孔圆形的青铜钱币。北宋时则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元明清三代，纸币、银两和铜钱并行。清末，机制银元和铜元取代了银两和方孔铜钱。纵观中国历史，历代不同币材、形制和版别的货币浩如烟海，其数量之多，为世界各国历史上所罕见。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表现东方文化特征的中国货币体系，这是光辉夺目的中华文化中的一簇奇葩。

马飞海总编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十二卷，1988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后历经多个出版社，于 2016 年全部出齐。全书力求联系各个时代的历史背景，

---

① 本部分据陈明光：《20 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评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 年第 12 期。

对历代货币的制度、体系、币材、形制和结构的变化，以及货币的分布、流通规律等进行科学分析。每卷内容包括四部分：一总论，二图录，三专论，四资料。每卷书后还附有该卷索引。可谓中国货币史资料书中的旷世杰作。

此外，白秦川从1989年开始从事中国古代货币史资料的编辑整理工作，1993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选编的《宋代货币史料汇编》，以《宋史》所载资料为主，兼收《宋会要辑稿》、《玉海》、《文献通考》等书中有关钱币部分的资料。缺点是未能收录上述史籍以外的其他大量宋代史籍中的货币史料，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和补充。

3. 区域性经济史资料汇编的整理出版

“文革”结束后，伴随着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大量利用地方志、地方档案、民间文书和社会调查等资料，整理和汇编成区域性经济史资料书的工作也提上日程。其中，徽州文书的整理出版最引人注目，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富。

1949年以后，徽州契约文书在焚毁和清除“封建糟粕”的浪潮中，大量被烧毁和化作纸浆造纸。1956年，李一氓、郑振铎等专家关注徽州古籍的抢救以后，屯溪古籍书店在抢救收购徽州古籍过程中，开始了徽州契约文书的收购。此后，又经过媒体宣传“徽州发现珍贵契约文书”，国内各大图书馆、大学、科研机构纷纷开始收藏徽州文书。徽州契约文书的第一次大量面世被收藏，就有大约十万多份。此后，徽州地区博物馆以及一些私人收藏家、黄山学院、黄山地税局、黄山市档案局、祁门博物馆、安徽大学等，也先后大量收集徽州文书。目前收藏总量已达几十万份。但这些资料大多分藏各处，对查抄和利用都不方便。

1985年8月，黄山书社出版了张海鹏等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这是研究徽商的第一部资料集，主要收入明朝及清朝前期(1368—1840)有关徽商的文献资料，亦涉及明朝以前和公元1840年以后的资料。涉猎各类书籍230余种，其中徽州各姓的族谱、家规近百种，内中所记载的徽商事迹，往往比史籍、方志更翔实更具体，还有不少是史籍、方志所不载的内容。编者从所披阅的族谱中，采摘了不少徽商活动的资料，从而使这部资料集别具特色。

1985、1990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辑出版了《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料丛编》第1、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该所又影印出版了《徽州千年文书契约》上、下各20卷，计40册(花山文艺出版社)。进入21世纪以来，徽州文书的整理出版有了更大的发展。

除徽州文书外，1980 年，齐鲁书社开始出版由曲阜孔府档案史料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文物出版社出版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博物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1981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苏州历史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1985 年，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鄱阳湖研究》编委会《鄱阳湖区自然和社会经济历史资料选》；1987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等《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1988 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光华《中国古代西北历史资料辑录》，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洪焕椿《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1989 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四川大学历史系等《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1993 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孙健《北京市经济史资料·古代部分》；1995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1996 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希曾主编《晋商史料与研究》；1997 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彭泽益《清代工商业碑文集粹》；1998 年，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王国平等《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2000 年，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谭棣华等《广东土地契约文书》(含海南)，等等。这些书，或是专门的地方性经济史资料，或是包含了大量地方经济史资料，为该地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有必要单独提出的是，在中国古代的地方志中，包含有大量的记述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情况的资料，在新修和续修的各种地方志中，记述社会经济状况的篇幅愈来愈多，尤其是在广大内地、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区域的许多地方志中，都记载有一些未经发掘利用的经济史料。有鉴于此，戴鞍钢等组织了 30 余人的课题组，历经数年，从数千种地方志中采择、选编了《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9 年出版。此书编辑录用的资料，全部选自从古代至 20 世纪 80 年代纂修的现存通志、府志、州志、市志、县志、乡镇志等，其中大部分是已刊的刻印、石印或铅印本，也有一些是以往很少在经济史书中得到运用的未刊手稿和油印稿。是汇编地方志经济史料的集大成之作。

(二)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大学和研究院、研究所成立了经济史研究机构。1949 年 11 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其中设立了社会研究所，1953 年，改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并组织一批专家，系统搜集、整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在此之前，中国史学会在筹备之时，就以推动近代

史研究作为工作重点，开始了大规模的近代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这两方面互相配合，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的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到"文革"前，已经编辑出版了七八十种，其中不乏十余册的大型资料丛书，远非同时期的古代经济史资料汇编可比。"文革"结束后，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汇编工作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但大型资料丛书屡屡出版，还出版了更多的部门经济史资料汇编书，体现了资料工作的深入发展。

1. 综合性经济史资料汇编的整理出版

严中平在 1949 年以前就已开始了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写出了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他一向反对轻视资料的倾向，强调搞学术研究先要下硬工夫收集资料，只有把研究建立在大量坚实可靠的资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认为这是谨严学风的最起码条件。因此，他提出在积累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专题研究，在专题研究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的工作程序。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缺乏资料的状况，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资料编辑工作。先是组织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的研究人员编辑了一本《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由科学出版社 1955 年出版。该书时间断限为 1840—1948 年，内容包括鸦片战争前的中英贸易，商埠、租界、租借地，对外贸易，工业，铁路，轮船航运业，农业等七个方面，并附录了清代乾隆至光绪等六朝的人口统计资料，"成了国内外学者经常引用的一部重要参考文献"。[①]

之后，严中平又组织力量编辑了一套《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先后出版了中国近代工业、手工业、外贸、铁路、外债和航运等资料。[②]这套丛书资料有其不足之处，而且多数尚未编到 1949 年，财政、金融、商业、少数民族经济等重要资料也尚付阙如，称不上门类齐全，但在当时条件下，它为近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基本素材。严中平还对编辑资料工作进行了理论性总结，在《经济研究》1956 年第 4 期

---

① 龚缨晏：《关于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的几个数据——读〈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

② 《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包括：《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 年），孙毓棠编，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 年），汪敬虞编，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 年），徐义生编，中华书局 1962 年版；《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四卷（1840—1949 年），彭泽益编，中华书局 1962 年版；《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 年），姚贤镐编，中华书局 1962 年版；《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 年），宓汝成编，中华书局 1963 年版；《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4 年），聂宝璋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1895—1927 年），聂宝璋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发表了《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工作的初步总结》，为后人编辑经济史资料提供了丰富的经验。①

1958—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史教研室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参考资料》三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文革”以后，1984—1990年，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陆续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十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近代经济史资料汇编。

此外有，黄苇等《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等《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居之芬《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华北沦陷区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汪方文《近代厦门经济档案资料》（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董兆祥等《西北开发史料选辑（1930—1947）》（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这些区域性资料书的出版，都为该地的近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

2. 部门经济史资料汇编的整理出版

（1）农业史资料

严中平在主持《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的编辑过程中，李文治、章有义等即专门负责农业史资料的整理。从1954年开始，他们致力于编辑《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于195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三辑，其中第一辑，资料断限为1840—1911年；第二辑、第三辑，资料断限为1912—1927年、1927—1937年。全书内容涉及土地关系、农业经营状况、农民的经济地位和农民的反抗斗争等。缺点是档案资料引用较少，1937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未能编辑出版。而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也再未有学者从事全国性近代农业史资料的整理工作，于是此书遂成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间绝无仅有之作。

（2）工业史资料汇编

近代工业史资料的汇编工作从一开始就强劲有力。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中的一种，孙毓堂《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4）、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① 经君健：《鲜明的立场，严谨的学风：严中平、李文治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4期。

四卷(1840—1949),先后由科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在1957、1962年出版。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四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1961年出齐),其中第一辑为《民族资本创办和经营的工业》,第二辑为《帝国主义对中国工矿事业的侵略和垄断》,第三辑为《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控制官僚资本创办和垄断的工业》,第四辑为《中国工业的特点资本结构等和工业中各行业概况》。这也是一套比较系统的近代工业史资料汇编,其中有少量不完全属于工业范围,但也都是以工业为中心或是与工业有密切联系。全书大部分资料来源于书报刊物,一部分摘自政府档案和有关部门或编者直接调查整理的资料,收入书中时有的是全文登录,有的是摘录,对有些资料还作了考证,并注意到与此前出版的工业史资料书避免内容重复,编纂工作比较严谨。

更多的是某个具体企业的资料汇编。如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从1958年陆续编辑出版了“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五种,包括《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从一个民族企业看中国机器制造工业》、《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中国最早的一家棉纺织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荣家企业史料》上下册(以上均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刘鸿生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华书局则从1963年开始陆续出版《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七种,包括《中国民族火柴工业》(1963年版)、《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1963年版)、《(上海)永安纺织印染公司》(1964年版)、《上海民族机器工业》(1966年版)、《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1966年版)、《上海民族橡胶工业》(1979年版)、《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1987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从1979年开始陆续出版陈旭麓等主编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其中有《辛亥革命前后》(1979年版),《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总局》(1981年版),《汉冶萍公司》一、二、三辑(1984、1986、2004年版),《中国通商银行》(2000年版),《义和团运动》(2001年版),《上海机器织布局》(2001年版)等,将大量的第一手近代经济史资料公之于世。其他还有,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等《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高景岳等《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湖北省档案馆《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等。这些资料,对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提供了极大便利。

（3）商业史资料

相对来说，近代商业经济史料的整理汇编工作起步较晚，目前，全国性近代商业史资料只出版了一部，即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商业档案资料汇编》第一卷（1912—1928）上、下册，由江苏省商业厅组织编纂，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档案中关于商业的档案和有关资料整理汇编而成。内容包括政府商业机构与人事更迭、商会及商业团体、商业法规、公卖和专卖、商情物价及商税、商务纠纷、参加国外博览会和展览会、对外贸易与侨商等。

由于商业在近代中国的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一些商业发达的大城市往往保存有丰富的地方性商业史资料。为此，天津市档案馆等编了《天津商会档案汇编》五辑，1989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至1998年全部出齐，收入范围从1903—1950年。章开沅等编选了《苏州商会档案丛编》四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2009年出版）。

（4）交通运输业史料

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中的一种，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了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辑录了从1863—1911年中国铁路建设及发展的资料，以原始文件或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书为主，以专题形式编排资料。与之同时，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4），却因国内政治形势，当时未能正式出版，直到1983年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聂宝璋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第二辑（1895—1927）。

1992—1994年，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成安玉主编的九卷本《华北解放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包括冀热察区卷、太行区卷、太岳区卷、冀南区卷、华北区卷、军邮卷、晋冀鲁豫边区卷、冀东区卷、邮票史卷。1995年，该社又出版了多卷本《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包括皖江卷、淮北卷、山东卷、苏中卷、浙南卷、浙西南卷等。各卷分为概述、大事记、组织机构、文献资料、专题史料、回忆录、人物等部分。所记内容以战时党的通信联络，报刊、情报、物资的传递，人员的护送等为主。

1988年是中国近代邮政创办110周年。为此，天津市邮政局组编了《天津邮政史料》五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8—1993年出版）。

（5）财政史资料

关于近代财政史资料，1955年，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

资料》(1894—1949)。1962年,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中的一种,中华书局出版了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此书从《清实录》、《筹办夷务始末》、《清季外交史料》、《北华捷报》、北洋政府公报、日本使馆公报、英国《蓝皮书》、美国外交文书等以及报刊中辑录出1853—1927年的中国外债统计资料,以表格的形式逐年编排,包括借款年月、名称、承借者、经手人、贷款者、款额、利息率、期限、担保、条件、用途等项内容。此后,1991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辑出版《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中国金融出版社)。这三部书,是了解和研究近代以来中国财政史的重要资料。

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三册,这也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中的一种,收集了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有关中国对外贸易的大量资料,其中有较详的关税资料。

1985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第一卷,1991年又出版了第二、三、四卷(南开大学出版社)。这是第一部系统的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

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吴天颖等主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上、下册,收录从清朝雍正年间以来到1949年,自贡地区各类契约、资料850件,绝大部分均系第一次公开发表。

1989、1990年,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料编写组出版了《中国会计史料选编》两种四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为东北根据地和东北大行政区时期;一为中华民国时期(三册)。

1994、199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财政金融卷》第一编、第二编(江苏古籍出版社),汇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京国民政府、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档案,为民国史研究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第一手材料。

199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也出版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等《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1927—1937)。

(6) 金融、货币史等资料

关于近代金融史方面的资料,首先出现的是物价方面的资料汇编。195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书中的"旧中国",是指从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开始,迄于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为止

的旧中国。其中比较有分量的是统计资料，一部分从未发表过，是编者多年来零星收集，加以整理的。

1958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汇集了解放前后上海一地的物价资料。与此书性质相类，1998 年，周春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出版(四川大学出版社)，这是从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近 8 000 万物价史资料中筛选编辑而成。

1989 年，档案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所选资料从 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起，中经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到 1949 年南京国民政府垮台止，这一历史时期各个政权所制订和颁布的有关金融方面的法规。

此外，前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财政金融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等《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1927—1937)，也都有很多金融方面的资料。

关于银行资料方面，1960 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出版了《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以后，更多珍贵的银行史资料得到搜集、整理和出版，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0 年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吉林省金融研究所《伪满洲中央银行史料》(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等《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等《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0 年初版、2002 年增订版)、中国银行总行等《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档案出版社 1991 年版)、交通银行总行等《交通银行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5 年版)、重庆市档案馆等《四联总处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3 年版)。此外，已出版的金融史和货币史资料专书中，也大都包括有很多银行史资料。①

《山西票号史料》最初的编辑工作从 1960 年开始，倾注了众多专家 40 余年的研究心血，汇集公私档案 190 万字。2002 年增订版分上、下两部，上部是 1990 年版

① 本段据易棉阳等：《1980 年以来的中国近代银行史研究综述》，《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

《山西票号史料》的修订本，下部是一直参与其事的黄鉴晖在 1990 年以后收集整理的《山西票号史料续编》，主要是其个人新发现和收集整理的成果。

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自办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第一家银行，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中的《中国通商银行》，从通商银行的创办人盛宣怀遗存档案中，辑录了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九月至民国二年（1913 年）有关通商银行的函稿 565 件，附录中还收有银行往来电报钞存八本。这些资料绝大部分是首次披露。

关于货币史资料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在 1964 年出版了《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书局），对近代货币资料的搜集堪称完备，特别是汇辑了 1840—1911 年间的大量珍贵档案文献。但其中有些资料是转引自晚清官修文献及部分杂志、报刊，并非原始文献资料，而且还有一些文字及史实讹误。①

1986、1991 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1912—1927）、第二辑（1924—1949），辑录了大量有关档案文献、报刊资料。

（7）经济思想史资料

关于近代经济思想史资料的整理汇编，20 世纪后半期出版了两部书。一是 1959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巫宝三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收录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王茂荫、包世臣等人的经济思想、财政思想、货币思想等资料，并收录了嘉庆、道光、咸丰时期有关农业政策、工矿政策、商业政策、对外贸易政策、财政与货币政策等资料。二是赵靖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三册（中华书局 1982 年版），收录资料比较完备。

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史资料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史资料的整理汇编工作，是“文革”结束以后才开始的。1981 年有数种资料书出版，如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中央档案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辑》，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等《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这是一部全面反映抗日战争时期边区经济建设的大型

① 丁进军：《〈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勘误二则》，《中国钱币》1997 年第 1 期。

资料，共400余万字，由总论、农业、工业交通、商业贸易、金融、财政、互助合作、生产自给、人民生活等九个部分构成。作为该书的续编，1989年，张杨主编的《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资料选编》也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1981—1985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四辑。1986—1991年，陕西省档案馆等《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出版(档案出版社)。这是一部大型的综合性的资料，全书共14辑，主要收录了从1937年9月至1950年1月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形成的重要文件和电报等，其中有很多经济方面的内容，而且所选材料绝大部分来源于陕西省档案馆馆藏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1985—1986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编写组等《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十册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主要收录1935年10月至1950年陕甘宁边区工商税收方针政策、法令、条例、规章、制度、办法、工作总结、调查报告、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与工商税收密切相关的财经方面的史料。

1989—1994年，中央档案馆等编辑了一套大型资料，包括《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等(陕西省档案馆内部资料)。这套资料是边区党的系统的资料，时间从1924年中共在陕西建立组织，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除了党务外，还涉及边区的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其中绝大多数是从未面世的档案资料，特别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中有许多当时西北局的调查研究材料。①

1984年和1990年，魏宏运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分为总论编、金融编、工商合作编三编四册)、《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两册)先后由南开大学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其中除了对浩如烟海的各种抗日根据地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外，还有大量的访问资料，书中的部分军工资料、商业资料都是从来没有文字记载的，全靠采访的口述资料汇编而成。②

此外，1985年还有两种：河南省财政厅等《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档案出版社)，山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等《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

① 上述陕甘宁边区资料，据黄正林：《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陕甘宁边区史研究综述》，《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1期。

② 魏宏运：《中国现代史研究大有可为》，载肖黎主编：《我的史学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 年有四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三册(江西人民出版社),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等《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分为总论编、金融贸易编、农业编和工业编四编,湖南省财政厅《湘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摘编》(湖南人民出版社),江苏省财政厅等组则完成了从 1984 年即已陆续出版的四卷本《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江苏部分)》(档案出版社)。1987 年有:杜中《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员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六《财政经济建设》(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有:江西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等《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厦门大学出版社),辽宁省档案馆等《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四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有:刘仁荣《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摘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有: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山西经济出版社),李长远《太岳革命根据地农业资料选编》(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95 年有:王礼琦《中原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年有: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编辑组等《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两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这些资料,对于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财政经济史,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20 世纪 50 年代即已开始。

1. 综合性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

1956 年有:上海财经学院统计系资料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1949—1956)》(上海财经学院研究处印),国家地方工业部办公厅《经济改组工作参考资料》(财政经济出版社)。这是“文革”前出版的两部仅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综合性经济史资料书,内容都是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七年经济发展建设的资料。

1980 年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八册(人民出版社),分别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其中包含有很多经济史资料。

1998 年有: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摘

要)》(中国统计出版社),时间断限为1952—1996年。1999年有: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有:苏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资料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这些都是综合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资料书。其中,苏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资料选编》,大部分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杂志社约人撰写或者编印的,属于内部资料,编写这些资料的人,多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亲历者,所说情况翔实具体,是一部难得的经济史料。①

当然,成就最突出的,还要数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从1989年开始出版,到2000年共出版21卷(中国物资出版社、中国物价出版社等)。其中,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12卷;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9卷。具体分卷包括综合卷、工业卷、农业卷、商业卷、外贸卷、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劳动工资和职工福利卷(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财政卷、金融卷、交通通讯卷等。②

作为续编,1958—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2001年4月正式列入"十五"期间国家重点科研课题,至2011年已出版10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等)。这意味着中国"文革"前17年的经济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圆满完成。

2. 部门经济史资料汇编的整理出版

(1) 农业、畜牧业经济资料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经济资料的整理出版,最早是1954年由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局编辑出版的《东北地区农业生产统计资料汇编》(1949—1953)。1958年,农业部计划局编写出版了《农业统计资料手册》(农业出版社),是一部全国性的农业经济资料汇编。196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编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经所整理分析全国分县农业统计资料提纲》。

1989年,为了帮助各级领导和广大农业工作者系统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农业的发展情况,进一步加强对农业工作的领导,农业部计划司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农业出版社),这是第一部通贯性的农村经济统计资料书,从

① 王梦奎:《苏星和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北京日报》2008年7月14日。

② 刘国光:《没有经济史的基础研究,就没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评〈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7期;董志凯:《从史料发掘到认识深化——〈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评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统计到1986年。分为行政区划和人口情况、农业自然资源、国民经济概况、农业综合经济、农作物种植业、畜牧水产业、乡镇企业、农业装备和生产条件、财政收支和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商品经济和物价、进出口贸易、农村经济收支和消费水平、农业教育、农业自然区划、农业经济同国外经济比较等15个专题。其中有些统计数字，运用时需要注意核对。

1989年，还出版了由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司编辑、何焕炎主编的《中国分县农村经济统计概要》(1980—1987)(中国统计出版社)。提供了中国每个县和各类型地区、各经济区划的统计资料。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分县农村经济发展情况；二是区域性农村经济发展情况和贫困地区、商品粮基地、沿海地区等类型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情况；三是主要农业经济指标排序。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市场信息司编辑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统计资料》(1949—1996)(中国农业出版社)，是第二部通贯性的农村经济统计资料书，也是相关资料书中最好的一部。2000年，国家统计局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农业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在全部已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经济资料书中，有关农业生产合作化专题的资料汇编种类最多。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合作资料汇编》(1949—1952)上、下册，首先汇集了中共中央发布的有关农业生产合作化的有关决议和文件，然后按地区汇集了华北区、东北区、西北区等各大区、区下各省、省下各专区或市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典型事例及经验教训等资料，系统反映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个地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

1957、1959年，史敬棠等编辑出版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下册(北京三联书店)。其中上册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中国各地农村民间的劳动互助形式的材料。从第二部分起，按民主革命时期的几个阶段排列，每个阶段内基本上包含两方面材料：一是反映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和政策，二是反映当时农业合作化发展的情况、实践中所发生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经验。由于各阶段具体情况不一，所以各阶段所收资料也有多有少，但所选的都是具有概括性和有代表性的资料。下册汇集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资料。本书下册所收资料可与其他同类书相互补充，上册内容则是其他同类书所没有的。

此外,1957年,国家统计局农业统计司出版了《农业合作化和1955年农业生产合作社收益分配的统计资料》(统计出版社)。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各地区农业合作化的史料纷纷出版,如1985年,湖北省农业合作经济史料编写组出版了《湖北省农业合作经济史料》上、下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1989年,贵州农业合作化史料编写委员会出版了四辑《贵州农村合作经济史料》(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有:蔡和睦《福建省农业合作经济史料》(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厅《宁夏农业合作经济史料》(宁夏人民出版社),王祝光《广西农村合作经济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又出版《广西农村合作经济史料续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张永森等出版《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上、下册,1991年又出版《续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陈锡根等出版《上海农业合作经济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等等。在这些地区性史料出版之后,1992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黄道霞等主编的《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堪称相关资料的集大成之作。而此前的1981、1982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还出版了《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下册;此后的2002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当代中国典型农业合作社史选编》,都是重要的资料书。

除以上诸书外,中国粮食经济学会《丛书》编辑部在1992年出版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1988—1992年改革文件和资料选编》(中国商业出版社),也是有关农业经济发展的一部专门资料汇编。

农业部还每年编写《中国农业统计资料》。这是一部反映中国农业、农村经济的综合性统计资料工具书。但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数据。此外,《中国农业综合开发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资料,也都是全面反映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农村改革成果的资料性年刊。

1987年,农业出版社出版了由农牧渔业部编辑的《中国农牧渔业统计资料》,全书包括综合、农业、畜牧业、水产、农垦、乡镇企业、农村经济收益分配、农机、农业现代化水平、农业教育等十个方面的内容。与此相关,1993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牛宏瑞主编的《青海农牧区合作经济史料》,1996年和2000年,农业部渔业局编辑出版了《中国渔业统计汇编:1989—1993》和《中国渔业统计汇编:1994—1998》(海洋出版社)。

(2)林业经济资料

1990年,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了由林业部编辑的《全国林业统计资料汇编》,

内容包括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直到 1987 年的有关林业的各项资料。

更为详细的林业资料是从 1978 年开始每年编辑出版的《全国林业统计资料》(中国林业出版社)。

(3) 工业、商业、外贸等经济资料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商业、外贸及交通运输业经济资料的整理出版，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进行的。1981 年，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编著了《机械工业统计资料汇编(1949—1979)》；1987 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机械电子工业计划局出版了《全国机械电子工业三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4)》(机械工业出版社)；1993 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机电司等出版了《中国机械电子工业统计信息资料汇编(1949—1991)》(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 年，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出版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五十年历史资料汇编(1949—1998)》(中央文献出版社)。此外，国家统计局还编著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统计资料》。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年鉴》则是目前全面反映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情况的资料性图书，全面系统地收录了国家有关工业经济方面的重大政策、法律法规以及工业经济运行状况数据，介绍中国工业经济领域各个行业工业经济发展状况，收录有全国各类工业行业和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工业经济各个方面大量的统计数据。

1986—1994 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杨德寿主编的《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四辑；1989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了由国家统计局贸易物资统计司等《中国供销合作社统计资料(1949—1988)》，这两部书，为研究供销合作社问题，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在商业、外贸方面，国家统计局贸易物资统计司等在 1989 年出版了《中国供销合作社统计资料(1949—1988)》，1990 年该司又出版了《中国商业外经统计资料(1952—1988)》(均为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1991 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出版了孟宪章主编的《中苏贸易史资料》。

(4) 交通运输业经济资料

在交通运输业方面，1991 年，上海市交通运输局出版了《上海市地方交通 40 年统计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年，交通部综合规划司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人民交通出版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交通基础设施、运输装备、客货运输、交通投资、交通教育、交通科研、海事工作、发展规划等领域的统计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同年，国

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出版的《中国工业交通能源50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则涵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多个方面的大量资料。

(5) 财政、金融业经济资料

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金融史料的编辑出版,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首先是1982—1988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由财政部组织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七辑,分为财政管理体制、国家预算决算、工商税收、国营企业财务、基本建设财务拨款与信用、农业财务等,内容从1949—1985年,是一部通贯性的大型资料丛书。1990年,《当代中国财政》编辑部编辑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财政史参考资料》(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资料可与上书互为补充。2000年,楼继伟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财政统计》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收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间有关财政收支的统计资料,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国家财政的发展历程。

1987、1989年,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分别出版了《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78—1987)》(中国统计出版社)。卢汉川则在1987年主编出版了《中国农村金融历史资料(1949—1985)》(湖南农村金融出版社)。1990年,财政部农财司编辑出版了《财政支农专项资金史料》(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来财政支援农业的各种专项资金情况。1991年,中国农业银行编辑出版了《中国农村金融统计(197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此外,《广西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等在1987年出齐《建国以来广西金融史料》三集(广西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印)。1991年,海南省财政税务志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出版了《海南财税40年史料选编(1950—1990)》上、下册(三环出版社)。这些专门性和地方性财政、金融史料的出版,对学术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金融史有着重要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资料的整理汇编,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外,中央和地方还编辑出版了大量经济史方面的文献资料,比较重要的有《中国经济年鉴》、《中国审计年鉴》、《中国投资年鉴》、《中国人口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港口年鉴》、《中国民航统计年鉴》、《长江航运年鉴》等,许多省市还出版了各地的经济年鉴,这些都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六、中国民族史资料的征集和整理[①]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无论是官方还是史学家个人，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来征集和整理民族史资料。

（一）对历史文献中有关民族史资料的整理

1. 对汉文文献中有关民族史资料的整理

中国历代汉文文献中有关中国民族史的资料非常丰富，对这些史料进行集中编辑出版，是民族史研究的基础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民族史资料汇编是中华书局1958年5月开始出版的《历代各族传记汇编》。此书由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发起和领导编纂，该校还为此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史料丛刊”编委会，由翦伯赞任主任委员。此书的编纂计划是，以“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各族传记或载记、外记为主，同时吸收前人对各传记的注释、校订和补充，目的在于收集现今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资料。但后来因种种原因，到1959年3月出版3册后未再出版，仅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等十三部正史上的民族史资料。这些选取的资料，一般采用旧史原标题，原文照录，因当时尚无各史点校本，本书编者对原文材料分段、标点。各史的注释，除公元夹注外，其他有关音义和史实的，一律用号码标注，附排于正文之后。本书虽属未完成之作，但对当时的民族史研究还是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1962年开始，潘光旦对综合性民族史资料进行有系统地摘录，并形成四套卡片：第一套是《史记》中有关民族史料的卡片，计425张。第二套包括五种文献：《春秋左传》及顾栋高著《春秋大事表》、《国语》、《战国策》、《汲冢周书》、《竹书纪年》，计796张。第三套为《资治通鉴》民族史料，计201张。第四套为《明史》，计839张。[②]这四套卡片经潘光旦的女儿潘乃穆和潘乃和等录入、整理、核查、校对，已编成《中国民族史料汇编·汉代以前》和《中国民族史料汇编·明史之部》书稿两部，先后于2005年、2007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与此相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82—1986年出版了由芮逸夫主编的《廿三种正史及清史中各族史料汇编及引得·汇编之部》，共五册。

---

① 本节除注明出处者外，1966年以前的资料主要参考了谢保成等：《中国史书目提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② 潘乃谷：《潘光旦先生的民族史研究和他的〈民族史料汇编〉》，《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另外有:谷德明《中国少数民族神话选》(西北民族学院研究所1984年印)、陶立璠等《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传说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等,也都属于综合性民族史资料汇编。

相对来说,对单个民族的历史资料的整理汇编工作要明显早于和多于上述综合性民族史资料的整理。如中国史学会在1952年即组织编辑出版了有关中国近代回族穆斯林反清起义的史料汇编《回民起义》四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四种)(神州国光社)。这是中国近代回族历史的重要资料。

1953年春,冯家昇等人开始编辑《维吾尔族史料简编》,次年底基本完成,此后又进一步修改和补充,于1958年出版上册,1981年出版下册(民族出版社)。所收材料绝大多数是汉文,少量由外文临时译成汉文。每册之后都有相应时期的维吾尔族大事年表和引用书目。被认为是研究维吾尔族史乃至新疆地区史的一本很好的历史入门书。

关于突厥民族史,岑仲勉在1958年4月出版《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是专为补正冯承钧所译法国学者沙畹《西突厥史料》一书中关于中文材料部分的缺略所作。同年10月,他又出版《突厥集史》(中华书局),是一部搜集、校订、考证中国史书、杂著以及碑志中有关突厥历史资料的专著,资料相当丰富,并取舍有据。1991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学者克利亚什托尔内著、李佩娟翻译的汉文本《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中亚细亚史原始文献》,为国内学界补充了国外有关突厥史研究的资料。

关于柔然民族史,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料编纂组在1962年出版了《柔然资料辑录》(中华书局),起自西晋,断于唐代,以有关历代正史中材料为主,旁及当时人的文集碑传,书后还附有柔然世系表和引用书目,颇便查考。

1958年,江应樑《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和土司》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对明代土司制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论述,并对其基本资料进行排列,每条资料均注明出处,并附有作者的说明。1959年,谢华《湘西土司辑略》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前三章为作者的叙述,后三章为资料汇编,汇集了湘西永顺、保靖、桑植等土司以及所属各土司的资料,偏重于土司世系及事迹。

1962—1965年,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印了《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19辑,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等编辑出版了《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史料摘抄(清实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1982 年，顾祖成等《明实录藏族史料》二集、《清实录藏族史料》都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陈燮章等《藏族史料集》四册，1982—1993 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为藏族史的研究集中提供了一批原始资料。

彝族史资料有：蒙默《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 1978 年版），徐铭《清实录彝族史料辑要》（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1983 年印），魏治臻《〈清实录〉彝族史料辑要》（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6 年版）、《彝族史料集》（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9 年版）。这些都为研究彝族历史提供了方便。

其他少数民族史资料有：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云南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等编印《云南省傣族社会历史调查材料》九册（1963 年），刀永明等《中国傣族史料辑要》（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9 年版），青海民族学院政治教育系民族史编写组《明实录、清实录撒拉族史料摘抄》（青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清）佚名编、吴丰培整理《乾嘉道三朝哈萨克史料》（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 1982 年印），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百越民族史资料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另有一些按地区辑录的民族史资料汇编。例如，北京大学历史系等在 1963 年出版《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三联书店）；1992 年，王尧出版了《西藏文史考信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88 年，程贤敏出版《清〈圣训〉西南民族史料》（四川大学出版社）。此外，尚有四川黔江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川东南少数民族史料辑》（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6 年），喇秉德、马小琴编《青海回族史料集》（青海人民出版社），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等，以及大量地方政府或者个人所编的地方文史资料选辑中的民族史资料部分，如《丰宁文史资料第一辑・丰宁满族史料》（丰宁满族自治县民族文史研究会 1986 年印）、《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民族史料专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印）、《阜新文史资料第一辑・少数民族史料专辑》、《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民族史料专辑》（政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8 年印）、《平坝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少数民族史料专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平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0 年印）、《湖北文史资料第三十辑・鄂西南少数民族史料专辑》（政协湖北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0 年印）、《湖南地方志少数民族史料》上下册（岳麓书社 1991 年版）、《富川文史资料第六辑・民族史料专辑》（富川瑶族自治县委员会 1991 年印）、《玛纳斯文史资料第五辑・少数民族史料

专辑》(政协玛纳斯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2年印)、《版纳文史资料选辑八·西双版纳哈尼族史略》(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海南文史资料第七辑·黎族史料专辑》及其续编(南海出版公司1993年版)、《德宏史志资料第十六、十七集·傣族史料专集》(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武汉文史资料第五十九辑·武汉少数民族史料专辑》(政协武汉市文史资料委员会1995年印)、《黔江文史资料第九辑·民族史料专辑》(政协黔江县文史资料委员会1996年印)、《怀集文史第十三辑·下帅民族史料专辑》(政协怀集县文史资料委员会、下帅壮族瑶族乡人民政府1996年印)、《咸丰文史资料第五辑·民族史料专辑》(咸丰县民族事务委员会1996年印)、《木里文史第五辑·民族史料专辑》(政协木里藏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组1996年印)、《汝城文史第五辑·少数民族史料专辑》(政协汝城县委员会2000年印),等等。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地区民族史研究中,西藏地方史研究的成绩最为引人注目,其中资料工作包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中国藏学出版社满藏文1999年版、汉文2000年版)、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和西藏档案馆编辑《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译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版)、《清代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与活佛转世制度资料汇编》(华文出版社1996年版)等档案资料,还出版了有关西藏古代史的研究著作,其中也含有大量资料。这些成果的出版和发表,表明西藏地方史研究备受中国民族史学界的重视。

中国的边疆地区历来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因此边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民族史学的范畴。中国边疆史研究在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30—40年代曾掀起过两次高潮,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整理出许多著述。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后,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988年以来,先后组织出版了五套丛书和丛刊,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边疆史地丛书”、“中国边疆史地文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丛书”、“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边疆史研究。

中国近现代民族史资料的收集整理的成绩还有:中共中央统战部编辑《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藏学中心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合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中国藏学出版

社 2000 年版)、《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康藏纠纷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0 年版)、《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3 年版)、《民国治藏行政法规》(五洲传播出版社 1999 年版)等相继出版。[①]

中国古代民族史资料的收集整理的成绩还有:王忠在 1958 年出版《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63 年出版《新唐书南诏传笺证》(中华书局),为研究西藏吐蕃王朝史和南诏史提供了比较完整、真实的材料。向达在 1962 年校注出版《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82 年,苏晋仁出版《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年,刘美崧出版《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等等。还有:李之珂《炉霍屯志略》(中央民族学院 1979 年版)、《西藏研究》编辑部《藏乱始末见闻记》(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吴丰培辑《松筠新疆奏稿》(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 1980 年印)等等。

2. 对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文献的整理

少数民族文字的古籍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是民族史研究的基础工程之一,直接关系到民族史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1956 年,翁独健就提出,把历代关于少数民族历史资料的专书全部收集起来,加以分类,编成中国民族资料丛书,分集出版。但由于各种原因,这项工作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面拨乱反正,少数民族古籍的搜集、整理、译注、出版工作才真正开展起来,出版了数量可观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②]主要包括: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民族出版社 1988 年版),罗国义修订、陈英编注《彝族历史文献选集》(二集,彝文)(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1983 年印)、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夷僰榷濮:六祖史诗》(彝文)(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6 年版)、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创世纪:纳西族史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嘉木样协巴·久美旺布《卓尼政教史卓尼版(丹珠尔)目录中有关卓尼历史史料》(西北民族学院研究室 1985 年印)、《景颇族史传经典古歌》(景颇文)、《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达斡尔资料集第 6 集》(达斡尔文)等等,藏族大型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120 卷)也以藏文原本和

---

① 以上三段均据方素梅:《最近十余年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民族研究》2005 年第 2 期。

② 罗贤佑:《中国民族史研究二十年》,《民族研究》1998 年第 5 期。

汉文译本的形式陆续整理出版。到 21 世纪初，更有徐丽华主编的 100 册《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出版(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 年版)。

(二) 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所搜集整理的资料

同其他历史学科相比，民族史学有自己的特点——记载少数民族历史的文献较少并且较简略，历史上少数民族多数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其历史主要是通过口耳相传代代传承。因此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来搜集相关资料，就成为研究少数民族历史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对此，中国民族学专家宋蜀华和满都尔图主编的《中国民族学五十年》(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已经做出了很好的研究总结，①根据他们的研究可知：

1. 1949—1976 年的中国少数民族调查研究情况

从 1950 年开始，中央政府多次组织中央访问团访问少数民族地区，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了解掌握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各访问团都有民族学家和民族学工作者参加，例如费孝通、吴泽霖、曾昭璇、戴裔煊、梁剑韬等都曾参加。他们密切结合访问团的工作重点，运用民族学田野工作方法，对相关民族及村落的人口分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经济、生产等基本状况，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

中央西南访问团第二分团根据调查材料，整理出原丽江专区、保山专区、大理专区、楚雄专区、武丁专区、宜良专区、普洱专区、蒙自专区、文山专区的一批调查报告，汇编成《中央访问团第二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因文山调查资料佚失，故缺)，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之一种，1986 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其中当时撰写的调查资料有 93 篇，在内容上涵盖了云南大多数少数民族。与此相关，在 1963 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编辑出版了《云南省傣族社会历史调查材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 1963 年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编辑出版了《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 1963 年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羌族地区近代经济资料汇辑初稿》(中国科学

① 以下主要参考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中国民族学五十年》，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1963 年印)。

中央中南访问团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写成《广西少数民族历史资料提要》(中央访问团(中南区)第一分团联络组 1951 年印),对壮、瑶、苗、彝等族的名称、支系、族姓、分布、历史沿革作了较详细的描述。与此相关,在 1963 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出版了《上林县高贤乡僮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1963 年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甘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出版了《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什玲等五个乡黎族社会经济调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甘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 1963 年印)。

除中央政府组织访问团之外,许多地方政府也组织了地方性的民族访问团。如 1950 年,中南军政委员会组成湘西访问团,访问湘西的少数民族;四川川西公署组织民族访问团,到少数民族聚居区调查访问。

从 1956 年 8 月至 1964 年 4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田野调查活动,在史料搜集和整理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一,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八年间对当时已确认的 50 个少数民族开展普遍调查、整理付印的调查资料共计 4 000 余万字。1980—1986 年由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主持,将这些资料重新编辑出版,共计 158 册、5 000 万字。

第二,摄制了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自 1957 年起按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规划的要求,拍摄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至 1964 年 4 月摄制完成《黎族》、《凉山彝族》、《佤族》、《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苦聪人》、《独龙族》、《西藏的农奴制度》等 12 部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用形象化的手段记录了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和文化,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积累了可贵的影视资料。

第三,征集了大量民族文物。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内蒙古、黑龙江、新疆、四川、西藏和广东等调查组收集鄂伦春、赫哲、维吾尔、彝、藏和李族文物近 3 000 件,其中有一部分是正在被毁坏或消失中的珍贵实物,得以"抢救"下来。

2. 1977 年以来对少数民族进行田野调查的概况与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研究人员在此前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新时

期的发展要求，进行了多种类型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

（1）全国性的民族学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性的民族学调查主要有三个课题：一是围绕撰写“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而展开的民族学调查，二是围绕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的民族学调查，三是围绕民族地区现状和发展的民族学调查。

改革开放以后，经中央批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被列入全国民族研究计划。丛书涉及 55 个少数民族，以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的调查研究为基础，由各省区的民族研究人员分工编写，并为此还专门组织了补充调查。编写人员大多都或长或短地进行了补充调查，尤其是对资料缺乏或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没有调查过的一些民族，做了较长时间的调查。

1991—1993 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联合主持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的主要问题及对策调查”的课题研究，分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八个分课题组。

199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实施“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重点科研项目，由民族研究所主持，这是继 50 年代、60 年代民族调查以来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一次调查研究。很快受到国家民委、中央统战部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的高度重视，1997 年列为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各调查组成员克服边疆地区交通不便、环境艰苦等多方面的困难，深入村寨，与农牧民同吃同住，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2）区域性的民族学调查

除了全国性的民族调查之外，中央和地区政府还组织了区域性的民族学调查，主要包括：“六江流域”的民族学调查，贵州省“六山六水”民族学调查，“五沿”地区的民族学调查，西藏地区的民族学调查，云南、四川地区的民族学调查，中东南地区的民族学调查，内蒙古、东北地区的民族学调查，西北地区的民族学调查等。

① “六江流域”的民族学调查

“六江流域”是指川、藏、滇边境横断山脉区的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六条由北向南流的大江及主要支流分布地区。这一地区的民族文化多样，积累丰厚，对于研究西南民族的起源、迁徙和文化变迁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国西南民族学会于 1981 年便确定对“六江流域”进行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并于 1982 年开始，进行了三次综合考察。第一次是 1982 年 5 月对雅砻江下游的民

族考察。考察内容包括经济、文化、历史、语言、文物、宗教、人口、体质、血型等，重点考察凉山彝族自治州及渡口市境内的八县，为时一个半月。考察报告由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编成《雅砻江下游民族综合科学考察报告》。

第二次是1982年5—9月对怒江中游民族的综合考察。重点考察云南贡山县杜龙江沿岸的独龙族、傈僳族、怒族、藏族、纳西族、白族等民族和西藏自治区察隅县境内的各族情况，尤其是对独龙族的社会、文化、经济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部分考察报告已印成《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云南省民族研究所1983年印)和《滇族高原考察报告》(云南省民族研究所1983年印)等。

第三次是1984年夏天对雅砻江上游地区民族的综合考察。这次考察收集了大量的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第一手资料，考察成果编辑成《雅砻江上游考察报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1985年印)。

② 贵州省"六山六水"民族学调查

所谓"六山"系指贵州省境内的乌蒙山、雷公山、月亮山、大麻山、小麻山、武陵山；所谓"六水"，即贵州境内的乌江、都柳江、清水江、南盘江、北盘江、舞阳河。这些地区分布着苗、布衣、侗、土家、彝、仡佬、水、瑶、壮、回、白、羌、满等少数民族1 000余万人。

贵州"六山六水"调查为民族学积累了极为丰富、珍贵的第一手调查资料，出版了《贵州民族调查》20集，共计约1 300万字的资料。此外，还为编写《贵州省志·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收集了大量资料，集中编入《民族志资料汇编》1—11集，其中苗族资料2集，布依族资料2集，侗族资料2集，土家族、彝族、水族、壮族、仡佬族各1集，共计600万字。此外，在《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的30多集中，也有不少民族田野调查资料。总计全部调查资料，达2 000余万字。

③ "五沿"地区的民族学调查

从1995年起，中国西南地区实施"五沿"(沿山、沿江、沿道、沿边境线、沿湖等)地区民族经济与社会发展调查研究。主要有：贵州草海周边民族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云南泸沽湖等湖泊周边民族的经济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南昆铁路建设与其沿线社会文化变迁调查。在此基础上，撰写出《南昆八村——南昆铁路建设与沿线村落的社会文化变迁》(民主出版社2001年版)等书。

④ 西藏地区的民族学调查

1956—1962年，西藏社会历史调查组对藏族的历史、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婚

姻家庭等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但对珞巴族、门巴族和僜人等未进行调查。1976年5—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派出西藏民族考察队，对西藏东南部的珞巴族、门巴族和僜人进行综合考察，收集了大量社会、文化和语言资料，还拍摄了僜人、珞巴族两部民族学科教片。之后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科学研究。完成了《珞巴族社会历史调查》2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珞巴族的社会和文化》（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门巴族社会历史调查》2册（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门巴族封建农奴社会》（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西藏门巴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僜人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78年印）、《西藏察隅僜人的社会与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

⑤ 其他地区的民族学调查

对云南、四川地区的田野调查，形成《四川"西番"识别调查小结》、《川东南部分群众要求更正民族成分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调查》、《川滇边境纳日人的族别问题》、《永春乡白帕村纳西族的风俗习惯》等调研报告和研究性论著《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80年印）等；对东南地区的田野调查，形成《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报告》（广西民族研究所1985年印）、《广西西林县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小泉畲族的文化习俗》、《海南省苗族的习俗与文化》等调查报告；对内蒙古、东北地区的田野调查，形成《鄂伦春族萨满教调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蒙古（陈巴尔虎）族萨满教调查》；对西北地区的民族学调查，形成《关于阿勒泰地区民族学调查报告》、《解放前阿尔泰哈萨克社会历史调查报告》、《金山脚下的乌梁海人》等多篇调研报告。

第四章　考古新成就

一、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中国考古学大致可以分为传统金石学和近代考古学两个大的阶段，其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金石学只是古代考古学萌芽的主要表现形式，还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因为"金石学缺乏近代考古学所具备的以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器物形制学）为基础的一套科学的发掘和研究方法"。[①]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传统金石学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吸收和借鉴西方近代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始了对周口店、殷墟等古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从而产生了中国近代考古学。并在随后的大量考古工作中，发掘或发现了许多重大文化遗址，撰写了大量的考古报告和研究性论著。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考古工作得到全面发展。国家设立了文物局，颁发了保护古代文物的法令；在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考古研究所，在北京大学设置考古专业；各省区市也相继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当地的文物保护和清理发掘工作；大力引进先进技术，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即已引进碳十四断定年代法，"这使中国的史前考古学的编年获得了一个新的框架"。而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实践中，各地考古队伍也日益健全起来。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工作更加繁荣，不但田野考古达到很高的科学水平，而且还开拓了水下考古和航空摄影考古等领域。[②]以下简要记述20世纪后半期中国学者有关中国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情况。

（一）旧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发现与研究

1.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现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的一项重大成果。周口

---

① 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页。

② 本段引文为夏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所作《前言》，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该书卷首。

店位于北京市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骨山北部,1927年起开始大规模发掘,发现了一个保存极好的中国猿人的下臼齿。1929年又发现了保存完整的第一个头盖骨,成为闻名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即组织力量对周口店进行发掘,此后十年间多次发掘,发现了北京人的5枚牙齿、2段肢骨、一具相当完整的下颌骨以及大量的动物化石和石器。牙齿和头骨具有明显的两种类型:硕大的牙齿、粗壮的上下颌骨和极厚的头骨可能属于男性;小的牙齿、细致的上下颌骨和薄的头骨可能属于女性。北京猿人已能和现代人一样地直立行走,四肢和躯干已基本上和现代人一样,但头部还有许多很原始的猿类的性质。就四肢来说,上肢与现代人已非常相似,而下肢还带有一些原始性。吴汝康等则认为,北京猿人的体质形态显示了人体各部分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两足直立行走的姿势应首先确立,手从原来的支持作用中解放出来,可以制作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于是它的发展速度最快;由于手的使用而使手足发生了分化,下肢发展的速度较慢;脑及脑的外壳的头骨,是因为手的劳动、四肢的分化而随着发展起来的,因此头部的许多结构还保留着很多原始的性质。①

2. 山西芮城匼河遗址

1957年及1959年,在山西芮城县匼河村及其附近发现了旧石器和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1960年又做了进一步调查和发掘,发现13种动物化石,其中12种为哺乳动物,包括诞生于上新世而灭于更新世中期的师氏剑齿象、诞生于更新世初期而灭于更新世晚期的披毛犀和纳玛象以及更新世中期的典型动物,特别是其中的扁角鹿,一般只限于更新世中期的早期。因此,产此项化石及旧石器地层的时代系属于更新世中期的最初阶段。

出土的石器、石片一般都十分原始。所发现的石器具有第二步加工的很少,但却代表五种不同用途的类型,即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小型尖状器和石球,这表明当时人进行着既采集又狩猎的经济生活。②

3. 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

西侯度遗址位于山西省芮城县西侯度村。1961—1962年发掘,出土了一些简

---

① 吴汝康:《中国猿人体质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对"劳动创造人类"理论的意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0年第1期。

② 贾兰坡等:《山西芮城匼河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考古》1961年第8期。

单而粗糙的、被认为是人工打制的石器、石核和石片，以及一批与石器共出的步氏大角鹿、粗面轴鹿、长鼻三趾马、板齿犀、三门马等第四纪初期典型动物化石，其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早期。但学界对出土的所谓“人工制品”和“用火遗迹”等问题尚有不同意见。①

4. 山东沂水南洼洞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

南洼洞位于山东省沂水县诸葛公社范家旺村西南山山顶。1958年，在洞内发现有动物化石，1983年5月又在洞中发现一些鹿角化石。1983年6月和1984年3月进行了两次调查，采集到石制品七件，主要是石核和石片，石器仅一件砍斫器，其部分边缘有明显的修理和使用痕迹；同出的动物化石为葛氏斑鹿，这是华北中更新世的典型动物，因此南洼洞的石制品时代也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斑鹿角角柄和表面都有明显的砍砸痕迹，表明与当时的人类活动有关。这是山东省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它的发现，为了解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分布，以及它和沂源猿人的关系（南洼洞与沂源猿人化石地点相距45千米，同处于沂河流域上游），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②

5. 陕西蓝田猿人文化

1963年夏，在陕西蓝田县陈家窝村附近发现一个完好的猿人下颌骨化石，研究后定名为蓝田中国猿人。1964年，又在该县公王岭挖出一个猿人牙齿化石和一个猿人头骨化石。这个头骨有完整的额骨、顶骨的大部分、右侧颞骨的大部分、左鼻骨的大部分和右鼻骨的鼻根部、右上颌骨的体部和额突部，以及右上第二、三臼齿和左上第二臼齿。从各种情况看，这两地发现的猿人都是女性个体，后者年龄大约是三十多岁。从时间上说，前者可能比后者稍晚，但均属中更新世，都属蓝田猿人一类。研究证明，蓝田猿人的形态比北京猿人和爪哇直立猿人为原始，而与最早的爪哇粗健猿人相近，是最早的一种猿人类型的人类。③

1966年，在公王岭又进行了发掘、调查，获得了与蓝田猿人同时代的许多哺乳动物化石和一些旧石器。这些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片、石核等。已发现的具有第二步加工痕迹的石器工具还很少，以单面加工为主，缺乏较规整的器

---

① 贾兰坡等：《山西旧石器的研究现状及其展望》，《文物》1962年第4、5期；张森水：《关于西侯度的问题》，《人类学学报》1998年第2期。

② 徐淑彬等：《山东省沂水县南洼洞发现旧石器》，《考古》1985年第8期。

③ 吴汝康：《陕西蓝田发现的猿人头骨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6年第1期。

形。这些石器显然具有较多的原始性，但也呈现了一定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石器工具已有相当程度的分化，打制和修制已有某种程序和方法的迹象。由于爪哇猿人制作的旧石器一直没有发现，因此蓝田猿人的石器应为亚洲地区与猿人化石伴出的最早的石器，它们所代表的文化，就是目前世界上更新世地层中所见到的最早的石器文化之一。①

6. 贵州黔西观音洞遗址

观音洞遗址位于贵州省黔西县沙井乡井山村。1964年冬，在这里找到了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和旧石器。经先后四次较为系统的发掘，共出土石制品3 000余件，其中石器包括刮削器、端刮器、凹缺刮器、尖状器、石锥、雕刻器及砍砸器等。还出土哺乳动物化石23种。

此遗址的发现，是贵州史前考古零的突破，也是在中国南方找到的旧石器时代大型遗址的首例。但其年代尚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地质年代属于更新世中期或晚期，有人认为其地层下部应属中更新世的晚期，整体文化则可能成为中国南方跨越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的代表。②

7. 云南元谋人化石

1965年5月1日，钱方等人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发现了猿人化石，为一成年个体一左一右的两枚上内侧门齿。此后又经过几年发掘，发现了旧石器和用火的炭屑层，在同一层位还找到了烧骨，进一步证实了元谋人的活动。经古地磁法测定，云南元谋人的年代为距今170万年左右，地质年代上属于更新世早期，比蓝田人和北京人的年代要早，是中国南方早期直立人的代表，其形态与北京人基本接近，但有一定差异，其不同处，反映了他们的原始性和具有从纤细种南猿向直立人过渡的特点。③

8. 湖北大冶石龙头遗址

1971年冬，在湖北大冶县章山公社石龙头的一个石灰岩洞穴堆积里，发现了不少哺乳动物化石。随后进行了清理和发掘，又发现88件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特点是打片以锤击法为主，有时也用砸击法；第二步加工用的

---

① 戴尔俭等：《蓝田旧石器的新材料和蓝田猿人文化》，《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② 李炎贤等：《贵州黔西观音洞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古人类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77—93页；沈冠军等：《贵州黔西观音洞钟乳石样的铀系年龄》，《人类学学报》1992年第1期。

③ 胡承志：《云南元谋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地质学报》1973年第1期；李普等：《用古地磁方法对元谋人化石年代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A辑)1976年第6期。

是直接打击法，没有采用压制法或用其他较软的材料进行修整。但也有较为进步的技术，如修理把手的措施，北京人遗址已开始有所发现，而此遗址则似较清楚。

与之共存的动物化石属于典型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代表这一动物群的种类，如豪猪、大熊猫、剑齿象、中国犀等，在化石名单中占主要地位，其地质时代为更新世中期。

此遗址的发现，使人们对南方旧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增加了新的知识，为了解和研究远古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对研究第四纪地质和地层，对研究哺乳动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有益的。①

9. 辽宁营口金牛山人遗址

金牛山人遗址位于辽宁省营口市营口县。1942 年，日本人田野光雄在这里发现一哺乳动物化石。1950 年，日本地质学家鹿间时夫研究并报导了这批材料。1974—1994 年，对金牛山遗址先后进行了十次发掘。其中，1984 年的第五次发掘，发现了包括头骨、手骨、足骨、肋骨、脊椎骨等在内的人类化石，经初步研究，该化石属于成年男性个体，被考古学界称为“金牛山人”，大致处在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阶段，距今 20 万年左右。这对研究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阶段的人体体质特征是一批珍贵材料。

1993—1994 年进行的第九、第十次发掘，发现了“金牛山人”生活的居住面和以九个形制特殊的灰堆为代表的用火痕迹，研究表明，金牛山人在这里有较长时间的稳定和洞穴生活，已经完全具备长期保留和控制火种的能力。②

关于金牛山人发现的重大意义，苏秉琦指出：“金牛山人是世界上罕见的保存了头骨、肢骨和大量体骨的古化石人类”，“与北京人晚期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共存的，但金牛山人的体质特征远较北京人为进化，头骨比北京人进步，上肢骨比北京人更为进步，由于金牛山人的进化比北京人早一步，使渤海湾成为连接亚洲与美洲的锁链，美洲人应来源于此”。他还进一步引申说：“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在金牛山附近海城小孤山洞穴遗址发现了以有孔骨针为代表的缝纫技术。骨针虽小，却意义重大，有了骨针解决了缝制皮衣问题，人们就可以进一步离开洞穴，走向平原，走向寒冷的北方，越过白令海峡走向新大陆。”③

---

① 李炎贤等：《湖北大冶石龙头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4 年第 2 期。

② 傅仁义：《金牛山遗址的十次发掘及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大连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 期。

③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172 页。

10. 湖北郧县猿人化石

1975 年，在湖北郧县龙骨洞获得四枚左侧人类牙齿化石，分别是上内侧门齿、下外侧门齿、上第二前臼齿和上第一臼齿，同时还发现了一件人工打击痕迹清楚的石核及 20 多种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这四枚牙齿和晚期猿人中的北京猿人、爪哇猿人的同类牙齿很相似，分类上当归属直立人之列，是晚期猿人阶段的猿人之一。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人类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新资料。

另外，在郧西神雾岭白龙洞也发现了猿人洞穴遗址，获得猿人牙齿化石六枚，共存动物的化石与龙骨洞大致相同。经初步研究，这两处猿人的相对年代晚于“元谋猿人”，而早于或相当于“蓝田猿人”。①

11. 甘肃泾川大岭上遗址

大岭上遗址位于甘肃泾川县太平乡梅家洼岭背后村。自 1976 年发现后，经过多次发掘，发现一批石制品。石制品分早晚两期，早期石器类型有砍砸器、大尖状器和刮削器，地质时代属中更新世早期，距今 115 万—65 万年，是迄今为止整个北方地区已发现的地理位置最靠西的早期地点；晚期石器类型包括砍砸器、小尖状器和刮削器，地质时代属更新世中期，距今 70 万—23 万年。②

12. 陕西大荔人化石

1978 年 3 月，在陕西大荔县段家公社解放三队甜水沟，发现一个近乎完整的人头骨化石及象、马等牙化石。对头骨化石的研究表明，其特征与北京猿人接近，基本上介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属于早期智人的古老类型，时代属于中更新世晚期。③

1980 年秋，对大荔人化石地点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主要收获是：第一，新发现了两个含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层位，在一个地点内发现三个含文化遗物的层位尚无先例；第二，在含大荔人化石层中，发现了丰富的、完整的河蚌科化石和一些新的哺乳动物化石；第三，在含大荔人化石层中，找到了 384 件石器。石器中约有 1/3 的标本可见不同程度的水磨痕迹。在工具中，有少数标本曾做过两度加工，可能意味着比“大荔人”稍早的时代此间尚有古人类劳动、生息着。④

---

① 吴汝康等：《湖北郧县猿人牙齿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 年第 2 期；许春华：《湖北郧县猿人化石地点的发掘》，《古人类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75—179 页。

② 《大岭上遗址》，http://baike.baidu.com/view/5324210.htm。

③ 王永炎等：《陕西大荔人化石的发现及其初步研究》，《科学通报》1979 年第 7 期。

④ 张森水等：《大荔人化石地点第二次发掘简报》，《人类学学报》1984 年第 1 期。

13. 河南南召猿人遗址

南召猿人遗址位于河南省南召县云阳镇北 3 公里处的杏花山。1978 年 9 月，在此发现了一批古脊椎动物化石和一枚古人类牙齿化石，经吴汝康等鉴定，这枚牙齿为早期人类的右下第二前臼齿。同年 10 月发掘，又发现了一批古脊椎动物化石，计有剑齿虎、剑齿象、肿骨鹿等 20 余种。根据伴生动物化石及地层等综合分析，认定这里发现的古人类与“北京猿人”所处的时代大体相当，距今约五六十万年，并正式把这种古人类定名为“南召猿人”。①

14. 辽宁本溪庙后山遗址

庙后山遗址位于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山城子乡山城子村村东的庙后山南坡，系一洞穴堆积。发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1978—1980 年进行了三次发掘，1982 年又作了一次补充发掘。

遗址分为上洞与下洞，相互连通。上部的时代为晚更新世，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不足 10 万年，出土少量的石制品。下部属旧石器时代初期，发现有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包括脊椎动物化石 76 种；人化石 3 件，其中 1 枚上犬齿、1 枚下臼齿、1 小孩左股骨残段；文化遗物主要是石制品，共 76 件，并发现有骨器、烧骨、灰烬、炭粒等遗物。各类石器中，刮削器一般显得粗糙、简单，砍斫器和薄刃斧不仅数量较多，加工也比较好。庙后山石制品是一个兼有华北两大系统旧石器文化特点的地区性文化，是辽东半岛旧石器时代初期的代表。对人类化石的铀系法测年表明，臼齿应至少距今 20 万年，少儿股骨残段很可能为距今 30 万～40 万年，犬齿应至少为距今 50 万年。2008 年，又发现一些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年代至少应该要大于距今 50 万年。②

15. 山东沂源猿人化石

1981 年 9 月，在山东省沂源县土门乡骑子鞍山石灰岩的一个裂隙中，发现了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后经两次发掘，发现的人类化石计有头盖骨 1 块、眉骨 2 块、肱骨 1 块、肋骨 1 块、牙齿 7 颗。同出的动物化石中有肿骨鹿、李氏野猪、梅氏犀、三门马、洞熊、居氏巨河狸等。研究表明，这些古人类化石至少分属两个成年直立猿人个体，其眉骨的粗壮程度和牙齿的原始性，与北京猿人近似，哺乳类动物化石也与北京周口店动物群十分相似，地质时代为中

---

① 《南召猿人》，http://baike.baidu.com/view/934535.htm。

② 魏海波：《辽宁庙后山遗址研究的新进展》，《人类学学报》2009 年第 2 期。

更新世。①

16. 陕西梁山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对陕西梁山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中，发现其石器中既有“匼河—丁村系”的特征，又有华南一些文化的特征，梁山文化这种南北混合的特点，使人们第一次对地处南北自然地理交汇地带的远古文化有了认识。②

17. 重庆巫山猿人遗址

巫山猿人遗址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龙坪村龙骨坡，系洞穴堆积，1984 年发现，1985—1988 年进行了四次发掘。重要的发现是一块人的左侧下颌骨和一枚人的上门齿，被定名为直立人巫山亚种。用古地磁法和氨基酸外消旋法测定的出土人化石的地层年代距今 201—204 万年，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1997 年秋，遗址再次发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石制品，表现出相当的原始性。③

18. 贵州盘县大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盘县大洞在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特区珠东乡十里坪村，地处贵州高原西部喀斯特丛沟谷地带，是一石灰岩洞穴。洞大，内建寺庙三间。1970 年代初，地质部门在洞内采到动物化石，经鉴定，属中更新世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1990 年 6 月，再次采到化石，并发现了几件石制品。1991 年 11 月，进一步确认这是一处具有发掘和研究价值的旧石器时代遗址。1992 年 4—5 月，考察组开掘了洞内 80 平方米工作面，获石制品 1 300 多件和约 40 种动物化石。其中的东方剑齿象、中国犀、巨貘和鬣狗为绝灭种。根据与本地区其他地点出土的化石材料对比，此洞的动物群的生存时代可能是中更新世后期至晚更新世。④

19. 北京密云黄土梁遗址

黄土梁遗址位于北京市密云县北部山区上甸子乡的黄土梁。1991 年发现，出土石制品 50 件，器类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和具有人工痕迹的石块。打片采用锤击法，偶尔可能采用碰砧法，产生石片形制规整的多。石核的利用率较低。石器修整采用锤击法，加工方式以向背面为主，比较粗糙、简单。石制品比较粗大，大多数标本长度在 60 毫米以上，在 40 毫米以下者数量极少，以大中型为主，这与

① 徐淑彬：《山东沂源县骑子鞍山发现人类化石》，《人类学学报》1986 年第 4 期；吕遵谔等：《山东沂源猿人化石》，《人类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

② 文物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29 页。

③ 徐自强：《巫山龙骨坡遗址发掘研究综述》，《中国文物报》1998 年 4 月 15 日。

④ 斯信强等：《盘县大洞发掘简报》，《人类学学报》1993 年第 2 期。

北京猿人文化早期者更接近些。研究者将此遗址地质时代定为中更新世，考古时代定为旧石器时代早期。①

20. 江苏“南京人”化石

1993年，在江苏南京的汤山葫芦洞中，发现一件古人类颅骨化石，同时还出土了许多古脊椎动物化石。随后，南京市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系联合组成汤山考古队，进行发掘。最重要的发现是三件古人类化石的出土，包括颅骨化石两件和牙齿化石一件。研究表明，其基本方面与北京周口店出土的直立人化石特征十分相似，应属于北京人阶段的直立人，但在某些部位又具有自身的特征，显示出与北京人化石在体质形态上存在重要差异。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将这种“猿人”命名为“南京猿人”。它的发现，填补了直立人化石地点在江南地区的空白，对于研究中国境内直立人的分布及其演化模式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②

21. 黑龙江阿城交界镇洞穴遗址

交界镇洞穴遗址位于黑龙江省阿城市交界镇石灰场。1996—1997年清理发掘，出土了动物化石1 300余件、石制品100余件。动物化石包括有梅氏犀、鹿、狍子、獾、兔、鼬鼠等十几个种属的哺乳动物，有的骨片上带有明显的人工砍砸痕迹。石制品主要有刮削器、砍砸器、石片、石核、石块等。另外还有少量人类用火痕迹和骨器。经对该洞穴出土的梅氏犀牙齿化石进行铀系法断代测定，初步得出绝对年代数据为距今17.5万年。这一发现，拓展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向北分布的空间，证明中国北纬45度以北在17.5万年以前就已有人类生存。③

22. 安徽宁国毛竹山遗址

毛竹山遗址位于安徽省宁国市河沥溪镇罗溪行政村的桥门村。1996年底发现，1997年发掘，1998年再次对遗址进行补充勘探和统计测量。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一处人类生活遗迹，为东西长10米、南北宽6米的半圆形砾石环带。环带砾石绝大部分为单层，少数为两层或三层。排列、间隔、厚度等都显示出经过人类堆积的作用。根据地层判断，砾石环带的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60万年。遗址的性质，除作为储料场和石器制造场外，砾石环带还可能有其他用途，可能是

① 李超荣等：《北京地区旧石器考古新进展》，《人类学学报》1998年第2期。

② 魏正瑾（执笔）：《南京汤山葫芦洞直立人化石地点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96年第10期；华国荣等：《“南京猿人”：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中外文化交流》1995年第4期。

③ 于汇历：《阿城市交界镇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现的意义》，《中国文物报》1997年6月1日。

当地旧石器地点群的又一处中心营地。它的发现,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露天生活的珍贵材料和重要信息。①

23. 福建三明灵峰洞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1999年9月至2000年1月,福建省博物馆等对三明市市西约17千米处万寿岩中、下部的灵峰洞和位于岩脚的船帆洞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灵峰洞俗称"观音洞",位于万寿岩西南坡,原洞口于20世纪80年代在开山采石中被毁。现洞宽20米、进深16米,洞顶最高处距堆积物表面约15米,南部洞顶渐低,高约4—8米。其第1层为明清至近现代堆积,第2层为宋代堆积,第4层未做清理,第3层(钙板层)则为旧石器时代堆积,出土了一批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制品75件。灵峰洞石制品显得粗糙、原始,似与所处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发展水平不太相称,这可能与遗址并非是古人类久居之地有关。

从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中发现中国犀和巨貘化石以及地层堆积两方面看,灵峰洞第3层时代应属于中或中、晚更新世。据铀系法测年研究,第3层钙板年代距今17.4—19.8万年;第3层下部钟乳石钙板样品采自钙板上、下部,上部年代距今22.4—27.4万年,下部年代距今23.8—29.3万年;第4层钙板年代距今20.4—24.3万年。测试者认为,第4层所送样品因含骨化石碎片,铀系法测定年代可能偏年轻,所以其真实年代距今应大于22万年。

灵峰洞是福建及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早期洞穴文化遗址,把古人类在福建境内生存的历史提前了10多万年,为探讨中更新世闽台区域的生态环境并为台湾史前文化追根溯源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②

(二) 旧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发现与研究

1. 山西襄汾丁村遗址

丁村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丁村附近。1953年发现,1954年9月进行了首次发掘,采集石制品2 005件,哺乳动物化石27种,发现3枚"丁村人"牙齿化石。3枚丁村人的牙齿化石表明,丁村人是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在人类发展史上属于早期智人阶段的一种人类。其上门齿的齿面和北京猿人的一样,都呈明显的铲形,这是现代黄种人上门齿常具有的性质,表明他们与白种人的关系较远,而接近于现代黄种人。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化

---

① 房迎三等:《安徽宁国毛竹山发现的旧石器早期遗存》,《人类学学报》2001年第2期。
② 李建军等:《灵峰洞——福建省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人类学学报》2001年第4期。

石和文化的空白，为了解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976年，在此又发现了一件幼儿的顶骨化石和一些动物化石。1977、1978年的两度发掘所得标本，清楚地表明这个地点是一处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细石器遗址，据碳十四断代，年代为距今26 400±800年。而1979年的调查，又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段的石器文化遗存。这些新发现表明，整个丁村遗址是一个时代包括旧石器早、中、晚三期的遗址群。这扩大了人们对汾河流域旧石器文化的认识，同时也为探索华北古文化的来龙去脉和建立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①

2. 辽宁鸽子洞遗址

鸽子洞遗址位于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水泉乡瓦房村的西汤山南侧、大凌河右岸。1956年发现，1973年发掘。获得68件石制品，并发现了用火遗迹和22种哺乳类动物化石。在文化上与北京猿人文化关系最为密切，是北京猿人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从而扩大了北京猿人文化分布和传播的范围。哺乳动物群中有东北区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的一些成员，但主要是华北区更新世动物群的成分。这是至今所知华北动物群向东北地区扩散的比较完整的资料，是探讨华北区动物群与东北区动物群关系的环节。②

3. 广东马坝人化石

马坝人化石是1958年在广东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的狮子山石灰岩溶洞内发现的。化石为一头骨的上部，在发现时已遭到人为破坏，若干部位残缺，但总的说来尚算完整，采集到的标本有部分顶骨及枕骨、额骨及鼻骨一块，可以互相粘结起来，经修复后成为一个头骨。初步推测马坝人应该是第四纪更新世中期的人类，可能在猿人阶段的晚期与古人阶段的早期之间，是直立人转变为早期智人的重要环节。马坝人头骨的发现，扩大了中国远古人类分布范围，填补了中国华南人类进化系统上的空白，更完善了中国原始人类发展序列。③

---

① 王建等：《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4年第3期；《丁村遗址——丁村文化》，http://www.xiangfen.gov.cn/news/rwxf/qywh/2008/511/08511124354A5CI5E283C253565EACG.html；http://www.xiangfen.gov.cn/news/rwxf/qywh/2008/511/08511124354A5CI5E283C253565EACG.html；《飘扬在汾渭间的文化纽带——山西襄汾丁村遗址》，http://www.cun365.com/Main/Cun,d4616e6a—32a2—4b32—9ab8—42c91f43cb23/NewsView,78975。据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丁村遗址出土的细石器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细石器，见该书第6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② 鸽子洞发掘队：《辽宁鸽子洞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2期。

③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马坝人类及其他动物化石地点调查简报》，《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2期；《马坝人》，http://baike.baidu.com/view/21353.htm。

4. 内蒙古"扎赉诺尔人"化石

内蒙古满洲里市的扎赉诺尔地区，因早年发现3件"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及某些文化遗物，长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1973年以来，这里又相继发现6件人头骨化石，分属6个个体，为蒙古人种。同时出土的还有骨锥、骨刀梗、骨鱼镖和人工磨过的肩胛骨残块，压制石器有石镞、圆头刮削器、石叶以及石核和石片等，另有很多动物化石，其年代约在一万年左右。①

5. 山西阳高许家窑遗址

许家窑遗址是1974年发现于山西省阳高县古城公社许家窑村东南1千米的梨益沟西岸的断崖上，是一个分布面积相当大而内含遗物又很丰富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后经多次发掘，出土了代表10余个个体的人类化石20件、数万件石制品、部分骨角器及大量动物化石。许家窑文化在细石器技术传统上是北京人文化和峙峪文化之间的重要环节，也可以说是过渡的桥梁。因此，把这一性质的文化称为"许家窑文化"，把文化的时代称为"许家窑文化期"。这个遗址发现的石器，不仅很细小，而且从类型上也应归到东亚、北亚和北美的细石器传统范畴之内。这在中国华北地带发现的这个传统的细石器中，可能是最早的。②其地质年代为晚更新世早期。绝对年代距今12.5万—10.4万年。③

6. 广东封开垌中岩遗址

封开垌中岩遗址位于广东肇庆市封开县渔涝镇河儿口村北面。1978年发现，1989年发掘，在洞内左支洞胶结堆积中出土两枚人牙齿化石，属早期智人。伴生动物群有20多个种属，其性质与马坝人化石地点的动物群基本相同。铀系法测定年代为距今14.8万±1.3万年。这是目前岭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人类，被专家称为岭南历史的揭幕人。④

7. 广东英德宝晶宫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

宝晶宫位于广东英德市城区南面7千米处、北江西岸的燕子山东面。该洞为

---

① 魏正一：《扎赉诺尔第四纪地质新知》，《东北地质》1976年第1期；石彦莳：《扎赉诺尔附近木质标本的C14年代测定及其地质意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第2期。

② 贾兰坡等：《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贾兰坡等：《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76年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年第4期；吴茂霖：《许家窑遗址1977年出土的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年第3期；吴茂霖：《许家窑人颞骨研究》，《人类学学报》1986年第3期。

③ 陈铁梅等：《铀子系法测定骨化石年龄的可靠性研究及华北地区主要旧石器地点的铀子系年代序列》，《人类学学报》1984年第3期。

④ 《封开垌中岩人》，http://baike.baidu.com/view/476558.htm。

1981年发现，以洞内景观奇异而命名为“宝晶宫”。1996年，在第二层溶洞的古河道堆积中发现14件砾石打制石器。这些打制石器的总体面貌与马坝人化石地区的打制石器更为接近，目前把其年代暂定为距今约10万年前，大致与马坝人化石地点的打制石器的年代相当，也可能更早一些，属旧石器时代中期。[①]

8. 湖北荆州鸡公山遗址

鸡公山遗址位于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郢北村，发现于1984年，1992年进行抢救性发掘，从1993年初起，由抢救性发掘转入全面保护阶段。之后在1999年夏季起，又进行了发掘工作。鸡公山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在下文化层揭露了一个面积近500平方米的生活面，东西长20余米，南北宽近20米，平面上布满砾石、石核、石片和各类石器。上文化层石制品也较丰富，可惜其主体部分在发掘前已被破坏掉，仅残存的边缘部分，已不能提供关于当时人类活动的更详细资料。

鸡公山下文化层可能属于中、晚更新世之交或稍晚，即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上文化层的小型石片石器工业，则应为晚更新世的晚期，即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鸡公山遗址直接提供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石器的地层，清楚地反映了中国南方从砾石石器向石片石器的过渡历程，为认识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料。更重要的是，中、晚更新世之交到晚更新世是认识现代人类起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鸡公山遗址的发现，正好属于这个关键时期，其发掘结果也已充分显示该遗址对研究中国南方早期人类发展史的重要意义与潜力。[②]

9. 河南荥阳织机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织机洞遗址在郑州市西南约50公里处，地属荥阳市，在荥阳城南崔庙镇土宗店村北，地处嵩山北侧的低山丘陵区边缘。1985年发现，从1990—1995年，先后进行了三次发掘，其地层堆积之厚，文化遗迹、遗物之丰富程度，仅次于北京猿人遗址，是继北京周口店之后旧石器洞穴遗址的最重大的发现（至少在北方）。

从目前发掘情况看，该遗址最厚处地层堆积达24米以上，可分23层。经对发掘资料的整理，其旧石器遗存可分为两个较大阶段，1—12层为旧石器时代早期，13—18层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第19—23层则为全新世遗存，其中19—21层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层。在一个洞穴遗址内既有旧石器时代文化，又有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这在中国还是首次发现。

---

① 邱立诚等宝：《广东英德宝晶宫的旧石器》，《江汉考古》1998年第1期。

② 刘德银等：《鸡公山遗址发掘初步报告》，《人类学学报》2011年第2期。

织机洞旧石器组合从石制品的诸特点看，都可从北京猿人石器中找到，故有理由认为受到了北京猿人技术影响。从现代人起源来看，中国距今 10 万—5 万年的材料还十分缺乏，因此织机洞的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织机洞地理位置处于中国的中部，显示出它具有旧石器文化南北交流甚至于哺乳类动物的南、北迁徙的“驿站”作用，进一步研究会对旧石器文化交流问题做出重要的贡献，故织机洞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其重要性一目了然。①

10. 江西安义、新余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

1989 年，在江西安义县和新余市发现了五处旧石器地点，获取石制品标本 80 余件。目前对安义、新余旧石器的时代，学术界尚存在一定分歧。最初发现者李超荣认为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即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新余旧石器的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晚期，即旧石器时代晚期；曹柯平则认为应相当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也即旧石器中期；彭适凡也认为应属于旧石器中期。但无论如何，安义、新余旧石器的发现，填补了江西长期以来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为研究江西的史前史和中国南方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②

11. 北京平谷马家坟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

马家坟位于北京平谷县东部约 21 公里处红石坎泉水河的右岸，1990—1991 年调查时发现旧石器文化遗存。发现石制品 26 件。初步确定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即旧石器时代中晚期。③

12. 吉林桦甸寿山仙人洞遗址

寿山仙人洞遗址位于吉林省桦甸市哈达岭山脉东坡的上部。1991 年试掘。出土 47 件石制品和打制石器，此外还有骨制的刮削器和尖刃器及动物化石。当时推测遗址年代为晚更新世后期，考古学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④但 1993 年发掘时，在第 2—4 层堆积中出土打制石器 200 余件，经铀系法测定，距今 2 万—16 万年；人类活动遗迹集中在第 2 层，距今 2 万—10 万年，应属旧石器时代中晚期。⑤

---

① 张松林等：《织机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2003 年第 1 期。

② 彭适凡：《江西历史从何写起——江西旧石器文化遗存述评》，《南方文物》2004 年第 4 期；李超荣：《江西安义县旧石器的研究》，《江西文物》1991 年第 3 期。

③ 李超荣等：《北京平谷首次发现旧石器》，《文物春秋》1994 年第 4 期。

④ 陈全家等：《吉林桦甸寿山仙人洞旧石器遗址试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94 年第 1 期。

⑤ 文物出版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9 页。

13. 吉林蛟河新乡砖场遗址

新乡砖场遗址位于吉林省蛟河市蛟河盆地北缘拉法河的二级台地上。1991年发现。石器以大砾石为原料，形体较大、制作粗糙，采用锤击法和碰砧法打制石片，器形有石核、手斧等，不见刮削器。同时发现有松花江猛犸象等3个种属的哺乳动物化石。经铀系法测定年代，其绝对年代距今6.2万±0.6万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段。①

14. 重庆丰都烟墩堡遗址

烟墩堡遗址发现于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区的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在长江南岸山梁上。1994年首次试掘，此后多次发掘，出土标本11 000余件、石制品1 300余件。石制品以石片石器为主，大、中、小型并存。打制方法主要用锤击法，亦有锐棱砸击法。烟墩堡以石片石器为主的特点及复杂的石器类型，与中国南方石器以砾石石器为主的文化不同，可能代表一种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据推测，遗址的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中期。②

15. 内蒙古金斯太洞穴遗址

金斯太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乌珠穆沁旗阿拉坦合力苏木以西25公里的东海尔汗山的丘陵山地中，北距中蒙边界约20公里。洞口最阔处宽16米、进深24米、最窄处4米。2000、2001年，先后对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出土石制品4 000余件和大量动物化石。经过对发掘资料的初步整理，金斯太洞穴遗址内第1—2层年代为商周时期，第3—8B层为旧石器时代，其最晚已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旧石器遗存可分为三个阶段：第7A—8B层为下文化层，出土的化石石化程度较高；第5A—6层为中文化层；第3A—4层为上文化层，出土的化石石化程度较轻。

遗址内出土的动物化石相当丰富，获得标本2 373件。动物遗存包括鸟纲和哺乳动物纲两大类。经对出土动物骨骼化石采样测定，金斯太遗址上文化层中的第3B层碳十四测年为距今14 745±60年，树轮年代校正年龄为公元前16 080—15 820年，即距今18 088—17 828年；中文化层的第5A层的碳十四测年为距今23 070±180年，下文化层的第7C层碳十四测年为距今36 285±230年。从碳十四测年数据可以看出，该遗址主要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阶段至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另外，根据上文化层中的第3A层中出有大量的锥形细石叶石核，与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

① 文物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② 林圣龙：《丰都烟墩堡旧石器遗址发掘成果丰硕》，《中国文物报》1997年2月2日。

的同类器物较为类似，故推测上文化层上限已进入到新石器时代。

从文化交流角度看，该遗址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遗址中文化层阶段出现的勒瓦娄哇技术制品，表明其与外来文化有所交流。到目前为止，勒瓦娄哇技术在国内除在宁夏水洞沟、贵州盘县大洞遗址的出土材料中有发现外，还未在其他遗址有发现。这种技术在该遗址的出现，对于探讨勒瓦娄哇技术在中国境内的起源、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①

(三) 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发现与研究

1. 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

水洞沟遗址位于宁夏灵武县城以北46千米，1923年发现和发掘，出土一些石制品，是中国最早进行系统研究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20世纪50和60年代，先后两次组织发掘，出土一些石制品、哺乳类动物化石、骨器和装饰品等。1980年9月，宁夏博物馆等再次发掘，获得哺乳类动物化石15种、63件，石制品6700余件。文化遗物以石器和用火遗迹——灰烬和炭粒为代表。这次发掘有两项新的发现：第一，在旧石器层位中，发现了人工磨石；第二，认识了占石制品较大比重的断片中，有相当部分是有意识打制的“刀片”。这种情况，在国内的旧石器报告中(包括过去发表的水洞沟遗址的文章)似乎未见报导。

关于水洞沟遗址的时代，目前多种方法的测定结果尽管互有出入，但基本上处在距今40000—15000年的范围内。至于文化性质，贾兰坡等曾提出，水洞沟石器在类型上既有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性质，同时也具有后期的特征，而后期的性质更为明显。邱中郎和李炎贤也赞成将水洞沟文化的时代归入旧石器时代晚期。②

2. 江苏泗洪下草湾古人类化石

1954年，杨钟健等人在江苏泗洪县下草湾引河时，发现“巨河狸”化石地层，并在河岸上采集到一段人的股骨化石。经吴汝康、贾兰坡研究，定为晚更新世的人类，距今四五万年。这是江苏省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表明当时这一带已经有人类活动。③

3. 广西“柳江人”化石

1958年，在广西柳江县新星农场通天岩发现了“柳江人”化石。有头骨、最下

---

① 王晓琨等：《内蒙古金斯太洞穴遗址发掘简报》，《人类学学报》2010年第1期。

② 宁夏博物馆等：《1980年水洞沟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

③ 吴汝康等：《下草湾的人类股骨化石》，《古生物学报》1955年第1期。

四个胸椎、肋骨、全部五个腰椎和骶骨、右髋骨各一段，系中年男性个体；另有两段股骨，可能属于一个女性。从体质特征判断，“柳江人”晚于“马坝人”和“丁村人”，但早于“山顶洞人”和“资阳人”，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种中的一种早期类型。同时还出土有大熊猫、箭猪、中国犀、剑齿象、巨貘等化石。“柳江人”同这个动物群的地质年代都属于更新纪晚期，即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①

4. 河南安阳小南海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

1960 年，在安阳小南海北楼顶山东麓的洞穴中，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动物化石、人工打制的石片和石器，并有清楚的文化层。这些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的器形都比较细小，还有带孔石饰。从制法和器形上看，似乎和细石器有某些联系。②

5. 山西朔州峙峪遗址

峙峪遗址位于山西朔州市朔城区峙峪村，发现于 1963 年夏初，随后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工作，获得人类枕骨一块，石器、石片 15 000 多件，烧石、烧骨等多块，装饰品一件，各类动物牙齿 5 000 余枚，大量被人工击碎的兽骨等。根据对哺乳动物群的分析，峙峪遗址的地质时代应属于更新世晚期，绝对年代距今约 2.8 万年。在文化遗物中，细石器和小石片占主要成分，是这个遗址的石器文化的主要特征，这表明它是华北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的先驱，是北京人文化与细石器文化的联系环节之一。③

6. 河南许昌灵井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

1965 年秋，在河南许昌西北约十五公里处的灵井砦砦外西侧的贮水池塘距地表 10 米深的沙土层中，挖出石片和石器 1 353 件，选出标本 283 件，其中以细石器较多。不少器物都具有发达的细石器文化的特点。再加上灵井文化遗物与更新世晚期较晚阶段的动物化石共生，因此，灵井的旧石器文化遗存很可能是由旧石器晚期向中石器过渡的阶段。④

7. 台湾长滨文化

长滨文化因最早发现在台湾省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而得名，1968 年发现并进

---

① 吴汝康：《广西柳江发现的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 年第 3 期。
② 安志敏：《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堆积的试掘》，《考古学报》1965 年第 1 期。
③ 贾兰坡等：《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
④ 周国兴：《河南许昌灵井的石器时代遗存》，《考古》1974 年第 2 期。

行了初步发掘，此后又进行了 4 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出土打制石器 6 000 多件。根据对地层中所含炭样测定，最早的数据为距今约 15 000 年，另外 4 个数据为距今 6 000—5 000 年，年代跨度较大，可能长滨文化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①

8. 山西下川遗址

下川遗址是山西乃至华北地区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遗存。1970 年发现，1973、1974 年山西省文物考古工作者进行了两度发掘；1975 年又进行了下川遗址范围的调查，从而得知下川文化分布在沁水、阳城、垣曲三县相毗邻的 16 处地点，其中以沁水下川盆地中的文化遗存为最丰富，地层保存亦较好，故统称为“下川文化遗址”。②

下川遗址有丰富的石器遗存，主体是以黑燧石为主要原料间接打制的细石器。这些细石器比晚期细石器为原始，但制作技术基本成熟，且有中国典型细石器中的共同性器物。从它的代表性器物和制作方面的许多特点来看，又与其他细石器遗址有着显著的区别，并由石器内涵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且时代较早，并有明确的地层，所以，被看作一个单独的文化类型，称为“下川文化”，它所代表的时代或阶段，被称为“下川文化期”。其文化的时代，当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后一阶段。此前，中国旧石器时代末期由山顶洞人文化来代表。山顶洞人文化虽有一些艺术品，但其石器太少，性质不明，脉络并不十分清楚。下川文化与山顶洞人文化，时代大致相当，但下川石器不仅非常丰富，而且相当典型。因此，下川文化正填补了山顶洞人文化所缺的空白，从而可作为中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后一阶段的石器文化的代表。③

9. 浙江“建德人”化石

1974 年，在浙江省建德县李家乡新桥村村后山坡的乌龟洞内，出土 1 枚人类右上犬齿化石，其形态与柳江人犬齿接近，命名为“建德人”，这是浙江省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在洞内堆积上层，出土伴生动物化石有猕猴、猪獾、大熊猫、中国犀、剑齿象等 12 种，时代被划定为晚更新世晚期；下层出土 17 种动物化石，比上层

① 戴国华：《简论长滨文化的年代》，《考古与文物》1990 年第 2 期。

② 陈哲英：《下川遗址的新材料》，《中原文物》1996 年第 4 期。

③ 王建等：《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78 年第 3 期。1990 年以来，陈哲英又三次去采集标本，发表《下川遗址的新材料》（《中原文物》1996 年第 4 期），指出下川遗址各地点石制品分布不均匀，下川文化不是细石器的起始阶段，而是细石器发展的成熟阶段，其绝对年代有可能比现在通用的年代要晚。

增加了巨貘和纳玛象等，时代被划定为晚更新世早期，距今约 5 万年。①

10. 贵州兴义猫猫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猫猫洞旧石器文化遗址，位于贵州西南的兴义县顶效公社。1974 年冬发现，次年冬进行首次发掘，出土石制品 4 000 余件，骨角器 14 件、古人类化石 7 件和 9 种哺乳动物化石。此外还有大量石料、碎片，即数以千计的次品，以及其他文化遗物、用火遗迹的发现，清楚地反映出这里既是居住遗址，也是制造石器的场所。

从猫猫洞出土的旧石器来看，它的加工技术相当进步，已形成相当固定的加工方式，石器类型稳定，造型精美，更兼有精致的磨制骨、角器出土，其文化上的进步性是十分清楚的，既非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能与其相比，即使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早一阶段的遗物也逊其一筹，初步认为，猫猫洞旧石器文化的时代应归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其地质时代是临近更新世的结束时期。②

猫猫洞遗址发掘的另一重要成果，是在文化层中出土骨器 6 件、角器 8 件，这是第一次在一个遗址中出土如此多的骨、角器，比以往全国发现的同类工具的总数还要多。

角器类型简单，只有角铲一种，其加工方式，一类是单面加工成的，一类是两面加工成的。从考古资料来看，将鹿角加工成器物，最早见于山顶洞人遗址，但一直未见制成工具的记录，因之，猫猫洞出土的角铲系首次在国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角制工具，从而为中国旧石器时代骨、角器增加了新类型，极为珍贵。③

11. 黑龙江呼玛十八站遗址

十八站遗址位于黑龙江呼玛县十八站附近的呼玛河左岸第二阶地上。1975、1976 年发掘，出土石器 1 070 余件。细石器的数量虽不多，但形态、类型以及制作工艺都很典型。与华北的下川文化等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比较接近。其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 1 万余年。④

12. 重庆铜梁遗址

铜梁遗址位于重庆市西北 110 公里，在铜梁城西 1 公里的张二圹，是重庆地区

---

① 韩德芬等:《建德发现的一枚人的犬齿化石及浙江第四纪哺乳动物新资料》,《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 年第 4 期。

② 曹泽田:《猫猫洞石器之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2 年第 2 期。

③ 曹泽田:《猫猫洞的骨器和角器研究》,《人类学学报》1982 年第 1 期。

④ 《呼玛十八站旧石器地点》,http://baike.baidu.com/view/805051.htm;《黑龙江右岸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黑龙江日报》1977 年 1 月 22 日。

广为分布的一种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1976 年发现，1978 年发掘。遗址出土大量动、植物化石和 300 多件石制品。碳十四测年距今 25 000 年左右。这些丰富的植物和哺乳动物化石都是在文化层中发现的，在其上覆的地层中，还发现一些新石器时代遗物，这就为四川盆地内第四纪地层的划分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资料，对四川盆地内从晚更新世到全新世的地层划分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①

13. 贵州普定穿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穿洞因洞南北对穿而得名，位于贵州省普定县城西约 4 公里的穿洞村一孤山上。穿洞遗址发现于 1976 年，1979 年进行了试掘。1981 年 5—6 月首次发掘，发现了石制品 3 000 多件、骨器 500 余件、大量的灰烬、几个火堆余烬和 7 000 多件烧骨以及与生活有关的碎骨 10 000 多件和 13 种哺乳动物化石。

已发掘的含文化遗物的堆积厚达 3 米以上，表明史前穿洞人在此生活了相当长时期；从文化遗物看，可分为早、晚二期。从较大时间段考虑，可把晚期文化归于地质时代全新世的早期、考古时代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或中石器时代，因其文化面貌不具新、中石器时代的特点，却有旧石器时代文化性质，故称它为后(类)旧石器时代文化，其所属的时代亦称后旧石器时代。但类比于猫猫洞文化，穿洞晚期文化虽稍晚于猫猫洞文化，可能仍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穿洞晚期文化与邻近的白岩脚洞和兴义的猫猫洞文化应属于同一文化，因其主要特点相同。按命名优先原则，均应归于猫猫洞文化，可以称之为猫猫洞文化的穿洞类型。这使中国首次有了同一遗址存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②

14. 江苏溧水神仙洞遗址

1977 年，考古工作者对江苏溧水县白马公社回峰山神仙洞进行了发掘，发现一块人颞骨，从形态上看，与现代人无显著差别，应属于智人。另外发现动物群化石，是中国南方晚更新世动物群向现代动物群过渡的类型。碳十四测定的年代为距今 11 200±1 000 年(前 9 250±1 000 年)。③

在西支洞靠近东北方向的堆积物中，发现一块不规则的长方形泥质红陶片。一般认为陶器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标志，又从它的原始性和古老性分析，应是

---

① 张森水等：《铜梁旧石器遗址自然环境的探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2 年第 2 期；李宣民等：《铜梁旧石器文化之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1 年第 4 期。

② 张森水：《穿洞史前遗址(1981 年发掘)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1995 年第 2 期。据此文可知，1983 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取得更丰硕成果。

③ 李炎贤等：《江苏溧水神仙洞发现的动物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 年第 1 期。

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期的产物。因此，它的地质时代应属全新世早期。而这块作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重要标志的陶片，竟然与以往被认为属晚更新世的典型动物——最后鬣狗共生，这对划分中国第四纪地质时代，或新、旧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另外，到目前为止，考古发掘出土的陶片仍以神仙洞发现的陶片最为古老和有着完整地层层位记录。因此它的发现，就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推前到1.1万年前，不仅为研究陶器的发展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也证明了中国有着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均为中国古文化的摇篮。①

15. 江苏东海大贤庄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

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东海县大贤庄南面的沙砾石层形成的河流阶地上，采集到打制石器近200件。其中一件"船底形石核"，与山西省沁水县发现的一件同类型石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船底形石核"最早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因此，大贤庄的这批石器也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这次发掘，填补了江苏省长期未发现旧石器的空白。②

16. 贵州普定白岩脚洞遗址

白岩脚洞遗址位于贵州省普定县西南约9公里的白岩脚寨。1978年发现，1979年4月底至5月初由贵州省博物馆进行试掘，1982年4—5月再次发掘。两次共获得石制品1 000多件、动物化石22种、骨器2件，另有烧骨和灰烬等文化遗物。含有丰富文化遗物的上部堆积中，共有5个文化层，反映出当时人类曾较长时间在此居住。据碳十四年代测定，上部堆积的年代为距今12 000—15 000年之间。③

17. 广东封开罗沙岩遗址

罗沙岩洞穴遗址位于广东封开县渔涝镇河儿口庙边村后山脚下。此遗址是河儿口团结中学师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课外活动中发现的，是广东地区第一个有明确层位和绝对年代数据的旧石器文化地点。

1991—1992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封开县博物馆联合进行了第一期发掘。共出土石制品31件，其中第三层出土砾石打制石器7件，同层位出土的共存动物

① 鞠魁祥：《江苏溧水神仙洞的发掘和研究——中华文明史应追溯到万年前》，《火山地质与矿产》2001年第3期。

② 《江苏省首次发现旧石器》，《地质战线》1978年12月31日；《东海县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制品》，《新华日报》1979年4月13日。

③ 李炎贤等：《贵州普定白岩脚洞旧石器遗址》，《人类学学报》1986年第2期。

群化石的绝对年代为距今 4.8 万±0.5 万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另外出土 4 颗人牙化石，根据其同层位出土的动物化石牙齿用铀系法测定的年代为距今 7.9 万±1.5 万年(第四层)和 2.24 万±0.16 万年前(第二层)。此外还发现有 44 种哺乳类动物化石，其中毕氏菊蝠、库氏小鼠、卞氏小鼠、爱氏巨鼠等 11 种在以往报道的华南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中属第一次发现。

罗沙岩遗址的发现，证实了广东地区存在旧石器文化，填补了广东距今 2 万—10 万年这段时期史前文化的空白，进而充实了以下进化序列：峒中岩遗址(距今 14.8 万±1.8 万年)、马坝人遗址(距今 12.9 万±1.5 万年)、罗沙岩遗址(距今 7.9 万±1.5 万年至 2.24 万±0.16 万年)、黄岩洞遗址上层文化(距今 1.93 万±0.2 万年)。①

18. 河南南召小空山旧石器遗址

小空山位于南召县小店乡杜庄东南约 500 米处。1980 年，在小空山下洞发现了旧石器。同年试掘中，出土石器和石料 122 件。1987 年 9—10 月，对相距垂直距离 7 米、水平距离 4.8 米的小空山上洞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石制品 153 件，出土一批动物化石。同时又对小空山下洞旧石器遗址的残余堆积进行了清理，获得石制品 55 件。上洞的时代不超过更新世晚期，在考古分期上属旧石器时代晚期。下洞的石器工艺则比较先进。②

19. 黑龙江昂昂溪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

1981 年，考古工作者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昂昂溪东南 18 公里处的大兴屯，找到一些动物化石和石制品，1982 年进一步调查后进行了发掘。文化遗物除烧骨和灰烬外，主要是石制品，共出土石制品 128 件。石器分砍斫器、刮削器和雕刻器，刮削器和雕刻器形式多样，反映了工具的“专业化”程度很高。与文化遗物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有 11 种，主要有普氏野马、东北野牛等。根据动物的灭绝种属和碳十四测定结果为距今 11 800±150 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从种种情况看，昂昂溪旧石器和以北京人文化为代表的华北细小石器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它是这个传统向北的延续。它的发现，不仅为研究华北与东北旧石器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而且对研究中国与亚洲东北部(包括日本列岛)、北美远古文化的交流同样是很有意义的。③

---

① 张镇洪等:《广东封开县罗沙岩洞穴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人类学学报》1994 年第 4 期。

② 小空山联合发掘队:《1987 年河南南召小空山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 年第 4 期。

③ 黄慰文等:《黑龙江昂昂溪的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84 年第 3 期。

20. 黑龙江哈尔滨阎家岗遗址

阎家岗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西南 25 公里处的松花江与运粮河之间的一个残留的二级阶地。1982 年，哈尔滨市文物管理站在此地试掘，采集到石制品 2 件、人类头骨化石 1 块。随后，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等也陆续参加了该遗址的发掘和资料整理工作。经过 4 年的发掘，共出土各类石器和化石标本 3 000 余件，其中头骨残片 1 件、有清晰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制品 7 件；脊椎动物化石 3 000 余件。最具特色的是发现了两处用动物骨骼垒筑成的半圆形遗迹，系古代人类的临时居住址。经碳十四年代测定为距今 22 370±300 年。①

21. 黑龙江五常学田遗址

学田遗址位于黑龙江省五常县龙凤山乡学田村，1986 年发现并发掘，出土了人类顶骨化石残片 3 件（可拼成一个不完整的头盖骨），人类左侧胫骨一段，猛玛象臼齿 5 枚、门齿 3 段，石制品 3 件，哺乳动物猛犸象、披毛犀等化石 925 余件。经鉴定，人类化石属晚期智人。动物碎骨化石很多，可能与敲骨吸髓有关。学田遗址的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晚期，在考古学上应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前一阶段，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 24 500±400 年。

学田人胫骨化石在黑龙江省是首次发现，为该省古人类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而学田遗址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和丰富的植物孢子粉资料，则对研究当地的古地理、古气候、古人类的生态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②

22. 海南三亚落笔洞遗址

落笔洞遗址位于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市东北约 15 公里的一座石灰岩孤峰南壁下的落笔洞内。20 世纪 80 年代初，广东省考古工作者在洞内发现含有螺壳、蚌壳及小哺乳动物化石的灰色胶结层堆积。1992 年 3 月，又于洞穴中发现 5 枚人牙化石、数件打制石器及一些脊椎动物化石。随后的两年间，对遗址进行了全面考察和两次清理发掘。除发现 8 枚人牙化石及十分丰富的包括哺乳动物在内的动物化石外，还出土了一批石制品、骨角制品等文化遗物及很多用火遗迹，经碳十四年代测定距今约 1 万年左右。出土的人类化石均属晚期智人。

落笔洞遗址的发现，是海南石器时代文化中最早的一处古遗址，也是中国目前

---

① 魏正一等：《哈尔滨阎家岗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1982—1983 年发掘报告）》，《北方文物》1986 年第 4 期；黄可佳：《哈尔滨阎家岗遗址动物骨骼圈状堆积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8 年第 1 期。

② 于汇历：《黑龙江五常学田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1988 年第 3 期。

已知较南端的一处人类活动遗存。不仅丰富了对中国石器时代文化内涵和分布范围的认识，而且把海南人类活动的历史提早到 1 万年前。①

23. 广东罗定饭甑山岩洞遗址和下山洞洞穴遗址

1984 年冬，广东罗定县文物普查队在该县金鸡区的饭甑山岩洞、苹塘区的下山洞发现一批哺乳动物化石与一些螺蚌壳。1985 年进行了试掘，1986 年进行了发掘，获得一些打制石器、哺乳动物化石、以及桡骨、炭屑、螺、蚌壳等遗物。其中饭甑山洞穴出土 5 件石制品，属旧石器时代晚期。下山洞遗址出土有一段人的桡骨，但其远中端、近中端均缺失，骨体表面一端有豪猪啃咬痕迹。②

24. 福建清流狐狸洞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

狐狸洞位于福建省清流县沙芜乡洞口村安砂水库东北岸半山腰上。1988 年，在该洞采集到一枚人类牙齿化石，经研究，确定它是距今 1 万年以前的晚期智人的一位少年个体的左下第一臼齿。此外还发现残存有全新世与晚更新世的堆积物。1989 年进行了系统发掘，发现了 5 枚人类牙齿化石和众多的哺乳动物牙齿化石。这 5 枚牙齿代表了若干个成年个体，也属于晚期智人。

清流狐狸洞发现的人牙化石，是福建省首次发现的有确切定点和层位的人类化石。这一发现对探讨闽台史前人类的关系起到促进作用。福建与台湾，末次冰期时，两地曾多次联接在一起。海峡两岸学者普遍认为台湾的史前人类来源于大陆，但对台湾史前人类何时何地、走什么路线迁往台湾，却因材料不足而难做出可靠的论断，清流人类牙齿化石的发现为这方面的探讨增加了一个线索。③

25. 福建漳州市北郊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

1990 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漳州市北郊莲花池山遗址及竹林山遗址。遗址堆积分上、下两层。下层发现的打制石器，粗糙、简单而略大，年代推测为晚更新世早、中期；上层以细小石器为特征，精细且类型繁多，推测为晚更新世末期，即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些发现填补了福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为探索华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料。④

---

① 郝思德：《三亚落笔洞洞穴遗址文化初探》，《南方文物》1997 年第 1 期。

② 宋方义等：《广东罗定饭甑山岩、下山洞洞穴遗址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89 年第 2 期。

③ 尤玉柱等：《福建清流发现的人类牙齿化石》，《人类学学报》1989 年第 8 期；董兴仁等：《清流狐狸洞人类牙齿化石记述》，《人类学学报》1996 年第 4 期。

④ 曾五岳等：《福建首次发现旧石器》，《人类学学报》1990 年第 3 期。

26. 湖南石门燕儿洞遗址

燕儿洞遗址位于湖南石门县阳泉乡燕儿洞，于1990年和1993年先后两次发掘。该遗址出土人类化石有左股骨残段、下颌骨残段、趾骨各1件，右下臼齿、右上臼齿、前臼齿各1枚，这是湖南境内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洞穴中出土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20余种，其中东方剑齿象、巨貘、中国犀为绝灭种，现生种比例达77%。根据动物化石组合，可判定燕儿洞遗存的时代为晚更新世晚期。①

27. 黑龙江讷河清河屯遗址

清河屯遗址位于黑龙江省讷河市清和乡光明村清河屯北的山坡上，是一处面积较大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类居住地。1993年发掘，在原生黄土层中出土一批石器，据分析，距今约11 800年。此遗址保存完好，层位明确，石制品丰富，面积较大，特征明显，为研究黑龙江省和中国北方乃至东北亚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②

28. 重庆奉节鱼腹浦遗址

鱼腹浦位于重庆市奉节县城东1公里的长江北岸第一级阶地上，是一块长2 500米、宽800米的碛石沙滩，呈鱼腹状。遗址发现于1993年，1997年正式发掘。发现石、骨标本1 000余件。此外，还发现有规律排列的12个烧土堆及烧石、烧骨，已经发现的石、骨标本亦多呈条带状分布在烧土堆周围。根据地貌、地层及过去采集炭标本的年代测定分析，遗址年代在距今8 000—7 000年之间。这在研究旧石器时代末期及其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问题上极具价值。③

29. 江西万年吊桶环下层遗址

吊桶环遗址位于江西万年县大源镇境内红壤高山的条形山坡上，是一处有着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经中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再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典型洞穴遗存。1995年前后进行了两次发掘，其下层文化遗物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约23 000年，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出土的打制石器和少量骨角器中有一件角斧，是利用带基部的鹿角进行加工制作的，即在下端刮削出双面刃，削磨较细，是旧石器晚期制造精美的骨角器之一。

① 文物出版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
② 《清河屯遗址》，http://www.nehe.gov.cn/E_ReadNews.asp? NewsID=229; http://baike.baidu.com/view/4356765.htm。
③ 文物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361页。

表明当时的原始先民已掌握骨、角材料的特性，使用了一种不同于石器制造方法的特殊工艺。同时，也说明当时的人们使用的工具已更多样化，其从事的狩猎经济活动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从数量很少的野生稻形态植硅石来看，当时的原始居民除采掘野果、根茎充饥外，野生稻也有可能是采集活动的不稳定对象。①

30. 青海小柴达木湖遗址

小柴达木湖遗址是目前青海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察、发掘，《中国文物报》1998年11月8日作了报道。这次发掘共采集人工石制品700余件，还发现了以往未曾发现过的细石器和细小石器的新材料。根据小柴达木湖遗址附近地点采样所做碳十四年代测定及对所发现的古人类遗址性质的分析，可以确定这是一处距今3万年左右的古人类的石器制造场。当时的石器制造工艺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这说明小柴达木湖遗址的石器是由比它更早的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的。②

31. 福建三明船帆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1999年9月至2000年1月，福建省博物馆等对位于三明市西万寿岩中、下部的灵峰洞和位于岩脚的船帆洞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船帆洞的史前文化堆积曾遭受大面积破坏，此次发掘区地层从上到下可分为10层。

下文化层的重要考古遗存是一处石铺地面，它位于洞口内侧第7层底部，铺石材料均为灰岩角砾。动物化石较为零星。出土石制品303件，形制多样。上文化层主要分布于洞口内侧的南部以及洞口岩檐地段，出土遗物包括石制品和骨、角制品两部分，还有一些哺乳动物化石和龟鳖类化石。石器加工与下文化层相比，明显呈现退化的现象。

船帆洞上文化层以打制石器与磨制骨、角器共存为特征，与贵州兴义的猫猫洞和普定的穿洞遗址有些相似，其年代可能与之相当或相近。下层文化的时代可暂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

船帆洞下层文化中所发现的石铺地面，在全国尚属首次，它反映了当时人们已经有了改造环境的意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船帆洞上层文化发现的磨制骨、角

---

① 彭适凡：《江西历史从何写起——江西旧石器文化遗存述评》，《南方文物》2004年第4期。本文还提到，除吊桶环下层外，江西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尚有此前发现的乐平涌山岩洞和萍乡竹园山洞遗存，它们也都属于洞穴类型，但出土石制品太少，只能暂且划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② 刘景芝等：《青海小柴达木湖遗址的新发现》，《中国文物报》1998年11月8日。

器与粗糙的打制石器共存，可能显示出当时工业重心的转移，这个石制品组合的发现，为研究旧石器时代向更高阶段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为在福建乃至华东地区寻找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提供了重要线索。灵峰洞与船帆洞遗址都发现有少量的锐棱砸击石核和石片，这类石核和石片在贵州和台湾两地的史前遗址中都有较多的发现，因此，它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传播以及研究闽台史前文化渊源关系提供了新证据。①

以上所述，是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学者有关中国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情况的大概，并没有全面、详尽罗列。这些考古研究成果，大半部分已经在历史研究领域发挥了应有的重要作用，有的则因为存在认识分歧，尚处于进一步研究阶段。随着 21 世纪的考古实践和考古研究工作的继续拓展，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文明的认识将越来越清晰，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清晰。

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926 年，李济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这是中国学者首次正式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李济将发掘收获编为《西阴村史前遗存》(1927 年)，这是中国学者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考古学著作。其后，梁思永、吴金鼎、刘耀(尹达)、郭宝钧、夏鼐、苏秉琦、施昕等都相继在各地发掘或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并撰写了大量的考古报告和研究性论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石器时代考古取得了很大成就：田野考古蓬勃开展，基本搞清了全国主要新石器文化的序列与编年，特别对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辽河流域和燕山南北地区的诸文化谱系有较深入的认识，较好地建立起了全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基础工程；日益重视从考古遗存中提炼多种与人类社会行为有关的信息，努力实行多学科的合作和渗透；自然科学技术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中得到有力应用，尤其是史前环境、碳十四测年、物质鉴定分析、动物和体质人类等领域的大量成果，大大丰富了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学术内容；不断加强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和总结，建立并不断完善着本学科的学术体系，使中国的史前社会历史得以翔实系统地逐步展现出来。②下面以时间为序，对 20 世纪后半期

① 李建军等:《福建三明船帆洞旧石器遗址》,《人类学学报》2001 年第 4 期。
② 任式楠等:《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五十年》,《考古》1999 年第 9 期。

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大致情况进行概述。

(一) 裴李岗文化

裴李岗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首先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村发现，此后又在沙窝李、新密、登封、巩义、郑州、中牟、长葛、项城、潢川、灵宝等地发现了此类型的古文化遗址，它们有共同的文化面貌，因而被学术界命名为“裴李岗文化”。

从 1977 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裴李岗等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清理墓葬 114 座、陶窑 1 座、灰坑 10 多个，还有穴居房基。出土器物 400 多件，陶器中有夹砂棕红陶、泥质红陶和一些灰陶，包括陶壶、陶碗、陶纺轮等，制法均为手制；骨针、骨锥以及猪、羊的骨骼等，且发现了用绿松石制作的饰物。这些器物为其他新石器文化遗址所少见。遗址西半部是墓地，埋葬密集，有一定规律，死者头向南偏西，单人仰身直肢葬。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放射性实验室对该遗址出土的木炭标本进行碳十四测定的年代为：距今 7 145±300 年、7 885±480 年、9 300±1 000 年。据此分析，距今约 8 000 年，绝对年代早于仰韶文化 1 000 年，是中原地区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最早的一处遗址。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仰韶文化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段历史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裴李岗文化的“裴李岗类型”在河南密县、登封、长葛、郏县等地都有发现，其分布区域主要在河南省中部偏北一带。“贾湖类型”则分布在河南省中部偏南地区，舞阳贾湖遗址在 1980 年代多次发掘，发现房基 30 多座、灰坑 300 余座、陶窑 10 余座、墓葬 300 多座，出土遗物数千件，最引人注目的是成组的龟甲和骨笛，龟甲上有与原始文字有关的契刻符号。[①]这可进一步丰富对贾湖音乐文化的认识。[②]

(二) 兴隆洼文化

兴隆洼文化是燕山南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是整个中国北方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的一个代表。[③]兴隆洼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林西县白音长汗。自 1983—1993 年，先后经过 7 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清理出不同期别的兴隆洼文化半地穴式房址 170 余座、窖穴 400 余座、居室墓葬 30 余

---

① 以上据开封地区文管会等：《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 年第 2 期；李友谋：《裴李岗文化》，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71 页。

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等：《河南舞阳贾湖遗址 2001 年春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 年第 2 期。

③ 赵宾福：《兴隆洼文化的类型、分期与聚落结构研究》，《考古与文物》2006 年第 1 期。

座。同时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蚌器及动植物遗骸资料，由此提出了“兴隆洼文化”的命名。它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为中心，大致分布在南起渤海北岸，北至大兴安岭南缘，西自潮白河上游，东抵医巫板山一线的范围内。

兴隆佳文化先民经常利用兽骨制成骨质工具，除各种式样的骨锥等一般骨器外，独具特色的要算是鱼镖。此外，还能将小石片嵌粘在骨器的边槽内，做成各种骨梗石刃式的复合工具。这种工具的制作工序比较复杂，特别是需用胶状物质将石片粘牢在骨梗的边槽中，这说明其时人们已掌握了获取和使用天然胶的技能。作为兴隆洼文化主要特征的陶器群包括罐和钵两类陶器，制陶术虽然还停留在手制和露天堆烧的阶段，但已懂得在陶土中掺砂的用途和施于陶器上的各种纹饰，这都反映出当时的制陶业已非最初发生的阶段。①

兴隆洼一期聚落内的房址均成排分布，井然有序，最大的两座房址面积各达140余平方米，并排位于聚落的中心部位。居住区的外围环绕一道椭圆形的围壕。通过对房址内出土的木炭标本进行碳十四测定，距今约8 000年。这是目前国内唯一经过全面考古发掘、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的原始村落。②

最为特别的是，在兴隆洼遗址中发现了精致的玉器，它绝非氏族成员人人可以佩戴的一般饰物，说明社会大分化已经开始，社会发展已到了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③

（三）彭头山文化

彭头山遗址位于湖南澧县，1988年发掘，是长江中游洞庭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当地澧水下游集中分布着与彭头山遗址同类的遗存，目前已被学术界命名为彭头山文化。从聚落方面看，彭头山文化时期已是比较成熟的定居性农业聚落。④此外，还发现方形地面式和不规则圆形半地穴式房屋残迹，以及以二次葬为主的墓葬。在该遗址出土的石器包括细小燧石器、大型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三类。⑤从出土的陶器较为古朴粗犷，整体特征显得较为原始。此外，还首次发现了8 000年前的稻作实物，并在文化层中发现了直径超过40微米的大粒禾本科花粉，

---

① 以上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1期。

② 华泉：《兴隆洼文化——七千多年前人类遗存》，《瞭望》1990年第23期。

③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33、135页。

④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和八十垱》，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47页。

⑤ 《湖南对彭头山遗址进行正式发掘》，《中国文物报》1989年2月24日。

因而完全有理由把彭头山遗址的稻作遗迹作为我国 8 000 年前即已存在稻作农业的标志。①

(四) 后李文化

后李文化遗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街道后李官村西北约 500 米处、淄河东岸的二级台阶上，1988 年开始发掘。已发现的 8 处后李文化遗址，均分布于泰沂山系北麓的前平原地带，共出土房址 8 座、灰坑 22 个，且多残破，可辨形状者 17 个。出土遗物十分丰富，以陶器为主，另外还有石器、骨器、蚌器、牙器和玉器。

在后李官村的后李文化遗址上，已经建成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这是当代中国首家最系统、最完整、以车马遗址与文物陈列融为一体的古车博物馆。②

(五) 大地湾文化

大地湾遗址是中国西北地区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位于甘肃省秦安县东北五营乡邵店村东南以及冯家湾村西。发掘始于 1978 年，1995 年又进行了补充发掘，并进一步核实了部分地层关系。③

在该遗址共清理新石器时代房址 240 座、灶址 98 个、柱基 2 处、灰坑和窖穴 352 个、墓葬 69 座、窑址 35 座以及沟渠 12 段。出土陶器 4 147 件、石器(包括玉器)1 931 件、骨角牙蚌器 2 227 件、兽骨 17 000 多件以及数十万件残陶片。

学术界把大地湾遗存划分为五个文化期。一期文化遗存是迄今为止渭河流域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距今 7 800—7 300 年。此项发现为西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生、发展提供了一批前所未有的新鲜资料，它同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岗、山东北辛等发现一起被学术界认为是我国黄河流域考古的重大突破。第二、三、四期文化分别为仰韶文化的早、中、晚期。④

大地湾遗址约 1 平方千米，临河靠山，两侧以沟为天堑，是距今 5 000 年前有天然屏障的“坞壁”，中心大房子面积超过 100 平方米，前堂后室，有左右侧室，已具有

---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头山和八十垱》，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46 页。

②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市小荆山遗址调查、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6 年第 2 期；章丘县博物馆:《山东章丘县小荆山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6 年第 6 期；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等:《山东章丘小荆山遗址第一次发掘》，《东方考古》第 1 集，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章丘市小荆山后李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0 年》。

③ 甘肃省考古文物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 页。

④ 以上据甘肃省考古文物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第 686—694 页。

早期宫殿性质,是与红山文化坛庙冢时间相近、规格相似的聚落中心。①

(六) 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遗址位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1973 年发现,在 1973—1974、1977—1978 年两次发掘。遗址有四个相叠压的文化层,各文化层的土色、土质清晰可辨,出土遗物也明显有别。

出土的遗迹中,石器数量不多,陶片数量极多,复原率也很高。在出土的 40 万件陶片中,完整的和可复原的陶器占总出土器物的 1/6 左右,已获得完整器和复原器 1 221 件。出土陶器中最具特色的是早期的夹炭黑陶,这是河姆渡先民有意识地在陶土中掺和了炭末,主要是为了减少陶土黏性,提高成品率。骨器制作比较进步,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图案,就像是精美绝伦的实用工艺品。

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这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上发现的最古老、最丰富的稻作文化遗址。它的发现,不但改变了中国栽培水稻从印度引进的传统说法,许多考古学者还依此认为河姆渡可能是中国乃至世界稻作文化的最早发源地。

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揭露的大片木构建筑,是迄今已知的最早的"干栏式"木构建筑。它不同于黄河流域"穴居—半穴居—地面建筑"这一发展过程,而是"巢居—半巢居(干栏式建筑)—地面建筑"。这种"干栏式"建筑,反映了木结构技术已经有了相当久长的发展历史。②

(七) 磁山文化

磁山文化遗址位于河北省武安市磁山村东约 1 千米处的南洺河北岸台地上,是中国最初发现的一种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距今 7 000 多年,突破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考古的年代,考古学上定名为"磁山文化"。1976—1978 年进行发掘,主要遗迹有房址两座、灰坑 474 个。文化层厚 1—2 米,最深的窖穴达 6—7 米。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角器、蚌器、动物骨骸、植物标本等 6 000 余种。

两座房基址,均为半地穴式。在房基遗址器物中,有一烧土块,沾有清晰可辨的席纹,说明在 7 000 年前这一带即编制苇席,考古学家称此器物为全国之最。房子为椭圆形和圆形两种。半地穴,深约 1.2 米,长 3 米,宽 2 米。前有一坡道或台

①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115 页。

② 以上据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 年第 1 期。

阶。房内堆积很多,芦苇压印的烧土块当是房子墙壁或屋顶的遗存。

在发现的88个窖穴(灰坑)内有堆积的粟灰,一般堆积厚度为0.2—2米,有10个窖穴的粮食堆积厚达2米以上,数量之多是惊人的。这些粮食刚出土时,尚有部分颗粒清晰可见。以往认为粟起源于埃及、印度,磁山遗址中粟的出土,提供了中国粟出土年代最早的证据。这一发现,把中国黄河流域植粟的记录提前到距今7 000多年前,填补了前仰韶文化的空白,也修正了目前世界农业史中对植粟年代的认识。

农业的发展,为饲养家畜提供了物质条件,而遗址内出土的狗、猪、羊、鸡等家畜骨骼,又是当时人们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佐证。这里发现的鸡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家鸡,也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家鸡。

研究数据表明,磁山文化早于仰韶文化。这对研究和探索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链环。而且,这一文化类型的发现范围还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①

(八) 赵宝沟文化

1982年,内蒙古赤峰市(原昭乌达盟)敖汉旗文物普查时,在旗东南部一些地点采集到以压印几何纹为主要特征的夹砂陶片。其复原器物和其他实物标本,均有别于这一地区已知的考古学文化。赵宝沟村1号遗址(发掘时的编号)是这类遗存中性质单一、面积较大的遗址之一。苏秉琦在观察研究这类遗存的标本后,称这种遗存为"赵宝沟类型"。1986年夏季对赵宝沟1号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面积约2 000余平方米。发掘房址17座,获得较丰富的陶、石、骨、蚌等质料的遗物,还出土很多兽骨、兽角。

发掘的17座房址都是半地穴式建筑。房址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有的呈梯形。地穴保存深度在0.3—1米左右,面积一般约20平方米。

所出石器可分磨制石器、琢制石器、细石器等,以磨制石器数量居多。磨制石器中较有特色的为石耜、石斧。

经对房址内三个木炭标本作碳十四年代测定,有三个数据,但相差不大。其中F6距今6 220±85年(公元前4 270±85年),树轮校正年代距今6 870±120年(前4 890±120年),早于小山遗址的年代测定。这表明,赵宝沟文化是这一地区新石器

① 以上据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时代较早的文化之一。它的发掘，为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也使人们认识到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是很复杂的。①

（九）大溪文化

大溪文化主要分布在四川东部、湖北的长江两岸，以及湖南北部的洞庭湖周围，得名于四川巫山大溪遗址。1959—1975 年，四川博物馆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察队进行了三次发掘，清理墓葬 208 座，出土文物 1 250 余件。遗址堆积主要分布在高约 2 米的台地上，堆积最厚处达 1.2 米，还可细分层次。

大溪文化的陶器，早期以红陶最多，以后黑陶、灰陶、彩陶等不断增加。

此文化遗址的墓葬除直肢葬式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屈肢葬，其中以仰身屈肢葬最为普遍，有的膝盖弯曲直到腹部，这在新石器时代的葬俗中是颇具特色的。②

（十）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最早于 1921 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后将同类文化称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距今 5 000—7 000 年，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包括西阴文化、半坡文化、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等。以下略介绍几处。

1958—1959 年发掘了元君庙仰韶墓地，共发掘墓葬 57 座。出土的随葬器物，可按用途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玩具和食物遗存。生产工具有蚌刀、骨针、纺轮和骨镞。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装饰品有骨珠、蚌饰、牙饰等，玩具有陶球和石球等，这是其他遗址所少有的。元君庙仰韶居住地和墓地是分开的。墓地布局规整有序，分为两个墓区，流行二次葬。男女使用不同的劳动工具随葬，反映了当时的性别分工状况。③

20 世纪 70 年代发掘了姜寨遗址。其前期文化现象是，村落布局完整，三块墓地都在村外，男女有别，长幼有别，不到成年不能成为社会成员，只有成年男女才能埋在氏族墓地，这是母系氏族结构的典型标本。经过 1 000 年的发展，其墓地已经由村外转移到中心广场，墓地下层尚保持单人葬传统，但已不如村外墓地整齐，上层压有男女老幼合葬墓，这就突破了原来氏族制男女有别、长幼有别的界限，甚至没有了氏族成员与非成员的界限，这违背了氏族公社的基本原理，已是突破血缘关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 年第 1 期。

② 以上据湖南省文物普查办公室等：《湖南临澄古遗址普查报告》，《考古》1988 年第 3 期。

③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51 页。

系的氏族分裂，原始公社制遭到了破坏，这就意味着文明因素的产生。①

1987—1988年，又发掘了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其中除少量龙山时期、东周、汉代等文化遗存外，主要是仰韶文化的遗存。仰韶时期的遗迹，发现有房子、窖穴、墓葬和蚌壳摆塑的动物图案。

墓葬有土坑墓、瓮棺葬和利用灰坑埋葬三种形式。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形制较大、葬法特殊的第45号墓。第45号墓为竖穴土坑，东西宽3.1米，南北长4.1米，深0.5米，墓底平坦，周壁修筑规整，墓室的东、西、北三面各有一个小龛。墓内共埋葬四人。墓主是一壮年男性，头南足北，仰身直肢，可能是正常死亡的。另外三人，年龄较小，分别埋于墓室东、西、北三面向外突出的小龛内。西面龛内的人骨，年龄在12岁左右，身长1.15米，葬式为仰身直肢，面向上，两手压于盆骨下，性别为女性，头部有刀砍的痕迹，显然是非正常死亡的。这三个人骨架，不可能是墓主人的小孩，更不可能是与墓主人同时死亡的，可能是人殉。仰韶文化中发现人殉，还是首次。在墓主骨架的左右两侧，用蚌壳摆着龙虎图案，其龙图案，摆在人骨架的右侧，其虎图案，摆在人骨架的左侧。此墓主人死后不仅殉葬三人，而且还在人骨架的左右两侧精心地摆着龙虎图案，这在仰韶文化时期还是首次发现，充分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地位之高、权力之大，具有降龙伏虎的神威。它无可争辩地说明，在中国的仰韶文化时期，真正主宰世界的是男子而不是女子。而用蚌壳摆塑的龙、虎等图案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其造型方法也是远古时期的首创，它的发现，在中国艺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因此，此墓的发掘，对研究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龙的起源、美术史和中国文明的起源都具有重要意义。②

（十一）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是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因1935年首先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郊红山后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辽西及其附近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断有新发现。

1979年5月，在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村发现了一座大型石砌祭坛遗址，几年后，在邻近的凌源县和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相继发现了一座“女神

---

①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19—120页。

② 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濮阳西水坡遗址试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蹼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2期。李学勤“大胆猜想”，认为此墓“墓室内龙、虎图形是象征死者魂升天上，而墓室外人骑龙图形则表示其升天的过程”。见其《西水坡“龙虎墓”与四象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2期。

庙”,多处积石冢群,一座类似城堡的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一个如真人一般大的彩色女神头塑和大小不等、年龄不同的成批女性裸体泥塑残块及多种动物形玉、石雕刻,特别是几种形体不同的“玉雕龙”。苏秉琦认为,这些考古发现已有突破氏族制度的新概念出现,说明中国早在5 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经产生。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 000年。在他看来,“女神庙”塑像是按真人塑造的,是有名有姓的具体人物,“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①

1982年5月,辽宁阜新市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了以查海遗存为代表的三处遗址。它们所出的石器、陶器和居住址具有突出特征。1983年初,孙守道等对遗址又进行了复查,提出这处遗址是距今8 000—7 000年前的聚落遗址。1985年9月,苏秉琦在考察遗址出土遗物之后指出,查海文化当是红山文化主源之一。由此提出了前红山文化。②他还指出,此遗址出土的玉器距今8 000年左右,全是真玉(软玉),对玉料的鉴别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玉器的社会功能已超越一般装饰品,已成为统治者或上层人物“德”的象征。没有社会分工,生产不出玉器;没有社会分化,也不需要礼器性的玉器。因此,这些选用真玉精致的玉器,就说明了社会大分工已经形成,社会大分化已经开始,社会发展已到了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③

(十二)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山东省泰安县和宁阳县交界处,1959年发现,其后于1974、1977、1978年,进行过多次发掘。

在墓葬中,发现了结构清楚的原始木构葬具的遗迹。葬具规格大小与结构繁简,因墓葬规格的大小而有所区别。在埋葬习俗上,是男女分别单独埋葬,或成对成年男女合葬。少年儿童葬法也与成人相同。仰身直葬最为普遍,其他还有侧身葬、俯身葬、屈肢葬。随葬最为普遍的是陶器,有一小部分较小的类似玩具,大部分是日常使用过的生活器皿。用龟甲和猪头随葬也较普遍。各墓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极不平衡,多寡悬殊,质料优劣差别相当突出,少的只有一两件简陋的器物,多的则达到100多件。这似乎表明当时氏族成员内部,已开始贫富分化,并出现了一些社会分工的迹象。

---

①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08—112、138页。

② 旬村等:《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1987—1990年三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1期。

③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33—135页。

出土的石器全部为磨制，大多硬度很高，刃口锋利。石器的穿孔，大都采用了管穿的方法，并且有的一件穿有数孔。这些都说明，当时大汶口的人们已经掌握了比较成熟的石器制造技术。①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也为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②

（十三）凌家滩遗址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村，1985 年发现，遗址总面积约 160 万平方米，是长江下游巢湖流域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距今 5 600—5 300 年。

凌家滩遗址第一次和第二次发掘的主要遗物有玉人、玉版、玉龟、玉冠、玉勺等精美玉器。其中仅是玉璜就达 20 多种，集中国新石器时代玉璜之大成。出土的龙凤璜、双虎首璜最具考古价值。还发掘出达 4 250 克重的石铲，是迄今我国新石器遗址发掘中最大的一把石铲，堪称中国最古老的铲。③

1998 年对凌家滩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祭坛 1 座、红烧土遗迹 1 处、墓葬 29 座、出土文物约 600 件、玉器 200 多件。玉人前后共出土 6 件，以浅浮雕技法制成，是我国发现时代早的新石器时代完整的人体玉雕像。玉人的出现，表明由以前人们对物的崇拜转变为对人的崇拜，也就是由神权向王权转变的特征。表明由人代表神意权力观念的确立，反映了玉器文明的突出特征。玉龙雕刻的刀法简练，栩栩如生，颇具神韵。商周时期青铜器上雕刻龙的形态，应该是此处出土的玉龙演变而来。

凌家滩玉器表明，凌家滩遗存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又一制玉中心，不仅反映了 5 000 年前的玉器文明，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原始哲学思想，如出土的玉片上刻划的原始八卦图、玉龟、玉鹰腹部上的神秘图案等，为探讨我国史前哲学思想和天文学理论无疑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信息。

石钻是发掘中的一项重要发现，出土时与砺石放在一起，砾石面上已磨成凹

---

① 以上据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5—68 页。

② 以上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05—207 页。

③ 以上据张敬国：《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 年第 4 期）和《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研究》第七辑，黄山书社 1991 年版），转引自张其才：《凌家滩遗址发现、发掘记》，《安徽日报》2001 年 4 月 27 日。

形，这应是一组石质加工工具。这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为首次发现，表现了凌家滩钻孔技术十分发达，也反映出半机械工具在制玉业中的应用。对于研究新石器时代制玉工艺和钻孔技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最重要的收获，是发现了凌家滩祭坛，这是安徽境内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大型祭祀遗存。祭坛位于凌家滩墓地中心的最高处，面积约 600 多平方米。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发现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有祭坛建筑，现在又增加了凌家滩文化的祭坛遗存，这三处祭坛建筑风格各不相同，也代表了中国原始社会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凌家滩遗存在年代上晚于红山文化，早于良渚文化，正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为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信息。①

(十四)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最早发现于 1936 年。1959 年，夏鼐根据建国以来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镇湖州钱山漾、杭州水田阪等遗址的发掘，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1986、1987、1994 年进行了大规模发掘。目前已经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有 100 多处，经过考古发掘的有 50 多处。地理分布以江苏、浙江的太湖流域为中心，远及赣南、粤北；北跨长江直达苏北；西起皖东；东到海滨。②目前所说的良渚文化遗址，是分布在瓶窑、安溪、良渚三镇地域内的良渚文化遗址的总称，一般称为良渚遗址群。③

良渚遗址群墓葬出土的器物主要为陶器、石器、玉器。良渚文化以黑陶著称。而良渚文化玉器，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高峰，其数量之众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同时期中国乃至环太平洋拥有玉传统的部族中，独占鳌头。良渚文化的玉器主题是神人兽面纹。④

在良渚文化的一些陶器、玉器上已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单个或成组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划符号，学者们称之为“原始文字”。

良渚文化时期，稻作生产已相当发达，从出土的大量三角形石犁等农具看，良渚人已摆脱一铲一锹的耜耕而率先迈入了连续耕作的犁耕阶段，从而为当时社会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发掘，关系到国家的起源。城墙的发现让人更加确信中

---

① 张敬国：《含山凌家滩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主要收获》，《东南文化》1999 年第 5 期。

② 安志敏：《良渚文化及其文明诸因素的剖析》，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 页。

④ 以上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01—207 页。

华文明至少诞生于距今 5 300—4 300 年之前。在中国史前文明的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①

(十五) 屈家岭文化

屈家岭文化分布范围很广，北到河南省西南部，南到湖南省北部，西到汉水上游，东到武汉市东部。在这一范围内发现的屈家岭文化遗址，大概已超过 500 处，经过发掘或重点调查的遗址也有四五十处。因 1955—1957 年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而得名。屈家岭遗址是长江中游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

屈家岭文化的特点是：陶器黑陶多，灰陶次之，黄陶和红陶较少，发现少量蛋壳彩陶。还出现了彩陶纺轮。

屈家岭文化以种植水稻为主，家畜以猪和狗为主。出现了大型分间房屋建筑。这种建筑一般呈长方形，里面隔成几间，有的呈里外套间式，有的各间分别开门通向户外。大者长 14 米、宽 5 米余，室内面积达 70 平方米。地面用红烧土或黄砂土铺垫，以便隔潮，表面再涂白灰面或细泥，并用火加以烘烤使之坚硬。值得注意的是 7 处城址，其中石家河是一处以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城头山城从大溪文化早期到屈家岭文化时期经过多次筑造，为中国目前所知使用年代最长的史前城址。这些城址的发现，成为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起源的宝贵资料。②

(十六) 石峡文化

石峡遗址位于广东曲江县城西南 1.5 千米“马坝人”洞穴遗址所在的狮头与狮尾两山之间的峡地，1972 年发现，1973 年冬开始发掘，至 1976 年底，已发掘 1 660 平方米，发现了柱洞、灰坑、灶坑、陶窑等遗存，清理墓葬 108 座，共出土遗物约 2 000 多件，为研究广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与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诸文化的关系、探索我国原始社会的解体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根据目前已发掘的墓葬的层位及 29 组墓的叠压、打破关系和主要随葬器物的组合及其变化关系，暂分为 4 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二次葬墓中有两套随葬品，一套是原一次葬墓中迁来的，另一套是第二次葬时放置的。石峡二次葬墓的这些葬俗和葬式，在目前已知的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是罕见的。

石峡墓地中的那些朱砂铺地，分别随葬石钺、玉琮、陶制礼器和大小系列配

---

① 以上据陈剩勇：《良渚文化的礼制和中华文化的起源》，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以上据张旭球：《屈家岭文化》，文物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6—93 页。

套工具的墓葬，显然是属于军事首领、祭司和工匠的墓，说明社会分工引起的社会分化已经形成，“士”、“庶”之分已经确立，氏族制度已遭破坏，已进入文明发展的历程。①

石峡文化和长江中下游、特别是与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石峡墓葬中出土的玉璧、玉琮、玉瑗、玉玦、玉笄等装饰品以及有肩穿孔石钺和江浙一带良渚文化出土的大同小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石峡 M105 出土的大玉琮和江苏吴县草鞋山上层墓葬出土的大玉琮，从玉料的选择、内圆孔的对钻到浅雕花纹几乎一模一样，两地相距 2 000 千米，却如此雷同，值得注意。这说明石峡文化和上述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和不同程度的影响。②

(十七) 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以 1928 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的城子崖而得名，它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有影响的典型文化。1965 年，北京大学考古队对其进行了系统发掘。考古资料表明，龙山文化已经遍布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区域，可以划分为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

山东寿光县边线王村北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堡遗址，面积达 5.7 万平方米，为迄今所见龙山文化城堡中最大者。山东龙山文化的房屋建筑普遍采用挖槽筑墙和原始夯筑的技术，多有长方形土台式建筑，居室地面往往分层筑成。③

龙山文化在江苏地区的代表是连云港的藤花落遗址。1989 年发现，1996 年试掘，1998 年第一次大规模发掘和钻探，发现了外城墙，确定其为一处龙山文化古城址。1999 年冬至 2000 年春，在大面积揭露和钻探的同时，对城墙进行局部解剖，发现了内城墙。不仅确定了藤花落古城具有内外两重城垣的框架结构，并对藤花落古城址内部的平面布局作了初步揭示。发现龙山文化的城址、台基、房址、灰坑、灰沟、水沟、水稻田及环壕、灰坑等遗迹 200 多处，出土玉器、石器、陶器 2 000 多件及发现炭化水稻数百粒。

藤花落古城的发现是目前我国聚落考古和史前城址考古的重大收获之一，在中国已经发现的 50 余座史前城址中，它不仅具有一般性，还具有特殊性，特别是城

---

①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103—104、117 页。

② 以上据广东省博物馆石峡发掘小组等：《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第 7 期。

③ 以上据王守功：《山东龙山文化》，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70 页。

内道路、台基和大房址的发现，为最终揭示城址的总体平面布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对整个龙山时代城址的研究以及国家、文明和城市起源等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实物资料。①

（十八）石家河文化

石家河文化发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因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湖北及豫西南和湘北一带，为承袭屈家岭文化演变而来。这一遗址群由邓家湾、土城、肖家屋脊等数十处遗址组成。

在邓家湾发现的石家河文化的遗迹有墓葬、宗教遗迹、灰坑、灰沟和城址等。出土的陶器上发现刻划符号 14 个。

石家河文化墓葬有土坑墓和瓮棺葬两种。在土坑墓中均未发现明显的葬具，瓮棺葬葬具为陶器。土坑墓中，14 座墓未见人骨架，7 座墓仅存零星人骨或仅见骨痕，10 座墓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式，10 座墓为单人二次葬，1 座墓为单人侧身直肢葬，1 座墓为单人微屈肢葬。瓮棺葬中均不见骨架，只有少量葬具中有骨灰。

石家河古城是建筑在聚落群基础之上的。该地聚落群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城背溪阶段，就在石家河古城范围内，城东北角的土城下层见到城背溪文化陶片，邓家湾也有早于城墙的文化遗存。经过较大面积发掘的遗址，除城内邓家湾、谭家岭以外，还有城外的肖家屋脊、罗家柏岭，无论城内还是城外的遗址都存在早于石家河古城的遗存，石家河古城建筑之前与建筑之后的遗存都具有连续的承袭关系。据城内外的勘察调查，大部分遗址上层属石家河文化，下层多为屈家岭文化遗存。这些情况表明该地是一支原始部落长达数千年之久的聚居地，经过城背溪—大溪阶段的发展，最迟在屈家岭阶段，这里的聚落群形态已经形成。一般认为江汉一带是苗蛮族团的活动范围，汉水东部地区最大的史前石家河遗址群可能是苗蛮族团的中心聚集地。②

（十九）西藏林芝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1974 年 11 月至 1975 年 2 月，先后在林芝县的云星、红光、居木、加拉马和拉萨市郊的纳金等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墓葬和文化遗物。

---

①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连云港藤花落遗址考古发掘纪要》，《东南文化》2001 年第 1 期。在此遗址的岳石文化遗迹中，除环壕、灰坑等遗迹外，也出土了大量遗物，其中 H57 出土有一件青铜削，H81 发现了数粒炭化稻米。石器有半月形石刀、石锛等。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另有夹砂黑陶、泥质灰陶、泥质黑陶等，器形有夹砂褐中口罐、凸棱尊、盆、蘑菇状捉手器盖等。有关岳石文化的整体情况，后文有专题介绍。

② 以上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邓家湾》，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7—291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西藏自治区在考古学上是个空白，对于这里有没有原始社会遗存以及它们的文化面貌如何，几乎是一无所知。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在那曲(黑河)、聂拉木等地发现了细石器，但多限于地面采集，一般缺乏地层关系。而在林芝等地的发现，有明确的文化层，除打制和磨制石器外，还有陶器伴存，当系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这就再一次证实，西藏自治区和中国各地一样，从很早的古代起，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发现的石制工具中像打制的盘状器、敲砸器和磨制的刀、凿等，在甘肃、青海一带齐家文化遗址中都是比较常见的器物。而陶器的质料、纹饰和器形也都和齐家文化近似，特别是发现的磨光黑陶选择的残片也见于齐家文化，它们又同中原的龙山文化关系密切。这证明了，从远古以来，西藏地区就和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同时也证明，直到今天在西藏和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藏族中，还保留着的大量关于汉、藏两族本出于一家、是一家的两兄弟的传说，是反映一定史实的。①

(二十) 卡若遗址

卡若遗址位于西藏昌都城东南约12公里的加卡区卡若村，地处澜沧江西岸第二、三台地上，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977年夏发现，采集到石器、骨器、蚌器和陶片等。1978年5—8月，对遗址进行了试掘，这是西藏地区首次进行的考古发掘。共揭露面积230平方米，发现五座房屋基址和一条面铺石块的路。出土遗物有陶、石、骨器等。初步钻探了遗址的范围，得知遗址总面积为10 000平方米，一半已被破坏，还有5 000平方米保存较好。经测定，卡若遗址的绝对年代距今约4 000年以上。

遗址中发现的房屋建筑遗址分为半地穴式、地面建筑和石砌建筑三种形式。更有特点的是遗址中发现的5号房址为卵石砌墙，是我国以前没有发现的原始社会建筑中一种新型的建筑结构。

文化特征显著的是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共存。出土的骨器大多磨制精细，小巧美观，尤以骨针为最佳。遗址中出土的细石器的基本特征和华北地区、北方草原地区的细石器属于同一系统；房屋建筑形式也与中原原始文化相似。陶器的形制、纹饰与澜沧江中游的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接近。由此可

---

① 以上据王恒杰:《西藏自治区林芝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5年第5期。

见,西藏虽然地处边陲,交通不便,但早在 4 000 年前,这里的人们就和祖国内地有着密切的联系,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古代文化。①

(二十一) 小恩达遗址

小恩达遗址位于西藏昌都县北 5 公里的昂曲河东岸,东距小恩达乡 800 米,面积约 8 000 平方米。遗址发现于 1980 年 5 月,1986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7 日,进行了调查和试掘工作,发掘面积 60 平方米。

小恩达遗址是西藏东部继卡若遗址之后,经科学调查和发掘的第二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但从遗址中出土的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三者并存,且以打制石器占大多数,呈现出新石器时代的特征,又显示出自身的特征和典型性。遗址出土的陶片,陶质均系夹砂陶,陶色以灰陶为主。

小恩达遗址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与西藏高原上昌都卡若、拉萨北郊曲贡村几处遗址的原始文化,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原始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但陶器纹饰未发现卡若遗址中早期较繁缛的刻划纹和彩绘,却发现麦穗形剔刺纹、鸟纹、圈足碗、陶质细密的磨光黑皮陶等,别具特色,反映出强烈的地方性。

小恩达遗址虽同属卡若文化范畴,但从遗址文化内涵来看,比之卡若文化具有明显程度的进步性,遗址中出土的铲状器、锄状器、石刀、石斧,反映出农业经济的高度发展,证明了小恩达的原始居民已进入了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在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方面已体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其年代应晚于卡若遗址,经炭灰标本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为 3 775±80 年,树轮校正 4 125±100 年。

小恩达遗址的发现,扩大了西藏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范围,对研究西藏早期和黄河流域等地的文化联合,对探讨藏族的起源,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②

(二十二) 都普遗址

都普遗址位于西藏林芝县八一镇都普村南 150 米的果园内,1988 年 10 月,在遗址及周围进行了调查和试掘工作,试掘面积 25 平方米,发掘石棺墓葬 7 座。收集石锛 1 件,出土陶器 3 件。

都普遗址出土的陶片和征集的石锛与 1974—1975 年在林芝县云星、居木等地采集的同类遗物较相似,属同一文化类型,其年代早于曲贡村文化,晚于卡若文化。其上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为吐蕃早期。

---

① 以上据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昌都卡若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79 年第 9 期。

② 以上据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 年第 1 期。

都普石棺葬的考古发掘，在林芝地区当属首次。墓葬形制与林芝云星、红光土圹竖穴式墓差异迥然，但与贡觉相贝石棺葬等古墓形制相似，墓圹砌筑方法一致，为方形封土石棺墓，均无底板。

关于都普石棺葬的族属问题，目前尚难确定。但从石棺葬所出土的器物看，具有显明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因而对于西藏石棺葬的分期、族属、年代、葬俗及文化内涵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①

(二十三) 曲贡村石室墓

曲贡村石室墓地位于西藏拉萨市北郊，南距市中心大约 5 千米，墓葬大部分分布在今天的西藏军区总医院院内。墓地面积在 1 万平方米以上，但被破坏较严重。1990 年 9 月进行正式发掘。共发现清理了 20 余座墓和 6 处祭祀石台。

从发掘情况看，此墓葬的文化内涵比较单纯。墓葬分布无明显规律且密度稀疏。其形制基本特征是砾石块作墓室四壁，墓上有砾石封顶，个别墓已具有中原穹窿顶式墓的风格，无葬具，随葬品很少，仅甲种墓随葬有一、二件夹砂红褐陶的圜底器。葬式是侧身屈肢和二次葬并存。

囿于发掘材料所限，关于墓地年代、族属只能作一初步推测，墓地年代的上限相对晚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在吐蕃时期，约公元 6、7 世纪。②

(二十四) 昌果沟遗址

昌果沟位于西藏贡嘎县东北雅鲁藏布江北岸，东、西、北三面环山，向南为越来越宽阔的谷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沟谷中段东部山脚下的一级阶地上。1991 年发现并进行过复查，1994 年夏再次调查和发掘，采集遗物共计 1 012 余件，包括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和陶片。

细石器集中分布于 20 多平方米范围内，品类齐全，估计这里可能曾是一处制造场所。陶片 152 件，陶质为夹砂粗陶、夹砂细陶和泥质陶三种。陶片中还发现一些作为刮削之用的圆形、椭圆形、方形和不规则形的陶刮器。它们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陶刮器相比，显得简单粗糙。还曾发现过制作精美的通体磨光玉斧。

遗址文化层出土动物骨骼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 2 896±99 年，出土木炭

---

① 丹扎:《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西藏研究》1990 年第 4 期。

② 以上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等:《西藏拉萨市曲贡村石室墓发掘简报》,《考古》1991 年第 10 期。

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 3 044±102 年。据此推测，遗址的年代当在距今 3 000 年左右。

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址与这一地区其他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样，处于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由于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有关昌果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①

(二十五) 邦嘎遗址

邦嘎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西藏山南地区琼结县久河区札林乡邦嘎村，分布于邦嘎村之北，毗邻一条东西流向的冲沟。该遗址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由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并对该遗址进行过小面积试掘。2000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博物馆等对遗址进行了考察及考古发掘。

遗址现存面积约 3 000 平方米，出土物主要是陶器残片、石器和各种动物遗骸。遗址中出土的羊距骨是发掘中的重要收获。这件经打磨加工较为精致的羊距骨，可能与西藏地区至今还广为流传、男女老少都喜欢玩耍的游戏——“阿久”游戏有关，也可能与当地的占卜、卦算等涵义更为深刻的社会活动有关。

建筑遗迹很可能是一处房屋遗址。邦嘎遗址出土的建筑遗迹，是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考古发掘的首次发现，填补了这一区域此项研究的空白。它与西藏东部昌都卡若遗址建筑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也许是因为两个不同区域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人们生活方式的不同所致。所以，邦嘎遗址的建筑遗迹对于藏族建筑历史的研究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邦嘎遗址的年代被大致推断为距今 3 000 年左右的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它再一次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西藏腹心地区(或雅江中游流域)，藏族先民就生息、繁衍于此，并具有较高的物质文明程度。②

通过以上对 20 世纪后半期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状况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到，在这几十年中，新石器时代考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考古学与历史学的配合，使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不再是朦胧一片，而是全景式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

① 以上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等：《西藏贡嘎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9 年第 4 期。

② 夏格旺堆：《邦噶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察及考古发掘》，《中国西藏(中文版)》2001 年第 4 期。

三、夏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存在于公元前21世纪到前16世纪的夏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不断有学者根据新兴考古学初期的一些发掘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对夏文化做出种种推断。1957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被发现，1959年秋进行了试掘，为探索夏文化迈出了重要一步。此后，关于夏代文化的考古发现相继不断。以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夏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作一概述。

(一) 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是指以河南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王朝文化。二里头类型遗址的相对年代，上限晚于河南龙山文化，下限早于郑州二里岗时期的商文化，这种类型的遗址，最早可能是在1953年登封县玉村发现的，当时人们对这种文化的性质还认识不清楚。嗣后，1954年在洛阳东干沟、1956年在郑州洛达庙，都发现这种类型遗址。1958年发掘的遗址有荥阳上街、偃师灰咀，1959年发掘的遗址有陕县七里铺等。但发掘规模最大和对这种文化面貌了解最清楚的应该是二里头遗址。因此，学术界把这种类型的遗址称为二里头类型，后改称为二里头文化。①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平原的东部，堰师县西南9公里的二里头村南。东西约有2.5公里，南北约有1.5公里。遗址是1957年冬季发现的，1959年秋，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都分别在此进行过试掘。此后，对二里头文化的发掘和研究一直没有中断。②

二里头文化按地层划分共分为一、二、三、四期③，每期的文化特征虽有所差异，但呈现出明显的连续关系。在不同时期，出土陶器的陶质、陶色、纹饰、器形等都会有所变化。

二里头文化的玉器有绿松石饰、玉柄形器、玉璋、玉刀、玉圭、玉璧戚、玉戈、兽面铜牌、玉管、玉铲、玉镯、玉尖状器、月牙形玉器、玉板和玉铃舌等。④

铜器有爵、铜牌、刀、铃、棍、镞、铜渣、削、锥、铸、凿、钻、锯和鱼钩、戈、钺、爵、盉、斝等。成分分析表明，二里头遗址在青铜器铸造中，已有人为使用锡、铅的可能。二里头遗址铜器的铸造技术都是范铸法，而且已从单范铸造发展到多范铸造，

---

① 方酉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报告》，《考古》1961年第2期。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

④ 陈雪香：《二里头遗址墓葬出土玉器探析》，《中原文物》2003年第3期。

并采用了复合陶范法。①

二里头文化的遗迹主要分为房址、灰坑、宫殿遗址、墓葬几类。②宫殿遗址的发掘最早始于 1960 年，随着此后挖掘的不断进行，又发现了多处宫殿基址。以 1960 年发掘的宫殿基址为例，宫殿坐落在二里头遗址的中部，面积约 10 000 平方米，占地 15 市亩以上。台基中部是一座面阔 8 间、进深 3 间、四坡出檐的殿堂，堂前是平坦的庭院，南面有敞阔的大门，四周有彼此相连的廊房，围绕中心的殿堂，从而组成了一座十分壮观的宫殿建筑，开创了我国宫殿建筑的先河。宫殿遗址的发现表明，在夏王朝时期，中国已经有了比较高超的建筑技术和设计思想，为研究古代中国王国的形成和建筑史的研究提供了材料。③

从出土的大量刀、镰、铲等农业生产工具来看，当以农业经济为主，这时使用的虽然仍是石、骨、蚌、木的工具，但与河南龙山文化相比有明显的进步，如木耒、石铲和石镰更加普遍地使用。遗址中酒器的大量存在，也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标志。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牛、羊、马、猪等家畜饲养业也很繁盛。同时，手工业生产相应的也有了发展和分工，如铸铜手工业、制骨手工业、纺织手工业、编织手工业和制陶手工业等。交通和贸易方面，这时也有了发展，如遗址中出土的玉、贝和绿松石等物，非本地所产，应该是通过交换和置易得来的。发现的墓葬中，随葬品多寡不一，也有绑着双手被活埋的人。以上事实说明当时有了贫富分化，出现了阶级，历史已进入奴隶制的时代了。④

(二) 其他夏代文化

1. 齐家文化

齐家文化是广泛分布在甘肃、青海、宁夏地区的一支铜(红铜)石并用文化，其年代与中原夏代相当，晚于仰韶文化。最早是由瑞典人安特生于 1924 年发现，因最早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而称为齐家文化。齐家文化虽然是外国人先发现的，但它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学者奠定的，这方面工作做得最多的是夏鼐和裴文中。齐家文化遗址中，比较重要的有齐家坪遗址、大何庄遗址、秦魏家遗

① 梁宏刚等：《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研究综述》，《中原文物》2004 年第 1 期。

② 以上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 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 年第 3 期。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 年第 4 期。

④ 方酉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 年第 5 期。关于探索二里头文化的渊源问题，苏秉琦认为，最有希望的途径应该是沿着淮河主要支流，例如汝河(包括南北两支)走向去找。见其《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76 页。

址、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等，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发掘的。

齐家文化的制陶业是当时比较发达的一种工艺。生产工具有石制、骨制和红铜制，以石制最多。铜制工具有锥、斧、刀、匕、凿等。铜制工具的出现，说明齐家文化在冶金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这些铜器经鉴定均系红铜制造，有冷锻，也有冶铸。这表明当时的人们已认识金属的性能，这不仅提高了生产力，而且为以后的青铜时代开辟了道路。

农业仍然是齐家文化的主要经济。粟大概是当时的一种主要粮食，在房屋、窖穴和墓葬中都有发现。齐家文化还发现了大量储藏粮食或饲料的窖穴，窖穴形状规整，穴壁平齐，容积一般也比较大，这说明当时人们已过着长期的定居生活。畜牧业有了显著的进步。饲养的动物种类增多了，除了饲养较多的猪群外，还有羊、狗、牛、马和驴等。

纺织业生产已有较高的水平，这不仅从出土的石、陶纺轮和骨针等方面可以得到说明，更重要的是在墓葬里发现了布纹的痕迹。

氏族的墓地与住地相毗连，墓葬一般都有固定的方向，排列也较整齐。墓葬形式有单人葬和合葬两种。合葬墓有成人合葬、成人与儿童合葬、成人与婴儿合葬等三种。成人合葬墓中最普遍的一种葬式是：一具为仰身直肢葬，另一具为侧身屈肢葬，而且屈肢者位于前者的左边，人骨经鉴定，仰身直肢者为男性，屈肢者系女性。这是女子屈从、依附男子的真实写照。这些墓葬的尸体都是一次埋葬的，在通常情况下男女不可能都是同时死去，这应是以男子为主体，而把女子作为殉葬者处理的，其身份应为墓主人的妻或妾(奴)。齐家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种类、数量均有所差别，反映出当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氏族内部已产生私有制。①

2. 岳石文化

岳石文化是分布于黄河下游地区的约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因 1960 年首先在山东省平度县东岳石村发现而命名，主要代表性遗址有泗水尹家城、牟平照格庄、青州郝家庄、菏泽安丘堌堆、杞县鹿台岗和连云港藤花落等。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及其邻近地区，东达黄海之滨，北抵渤海南岸，西到河南东部，南及江苏和安徽淮北一带。据碳十四断代并校正，年代约始自公元前 1900 年或稍晚，到公元前 1650

① 以上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 年第 2 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 年第 2 期；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 年第 2 期；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 年第 4 期。

年前后被商文化所取代。①

岳石遗址 1960 年 4 月 12 日开始发掘，至 5 月 24 日结束，清理灰坑 2 座，出土数量不等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铜器等。②

3. 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以内蒙古赤峰市夏家店下层遗址命名的一种青铜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明，遗址广泛分布在燕山南北暨西辽河流域，即今辽宁、河北京津唐地区和内蒙古东南部。除夏家店下层遗址外，已发掘的遗址还有赤峰红山后、药王庙、蜘蛛山，松山区新店、香炉山、西山根、四分地东山嘴遗址，宁城南山根、三座店、小榆树林子，敖汉大甸子、范仗子、白斯朗营子南台地、小河沿，北票丰下，喀左小转山子，阜新平顶山，建平水泉、喀喇沁河东等。③

1960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考古队在夏家店三个山冈上试掘了四个地点，共揭开面积 270 平方米，发现了两种不同文化性质的堆积，按堆积的层次和文化特点，将堆积层的下层称为夏家店下层文化。④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迹主要为房址、灰坑、墓葬和石城城址四类。

三座店石城城址，可以作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遗迹的范例。这类遗址普遍存在着大、小两座城相互配置的建制。从出土遗物和城内建筑形制等分析，也可以肯定它们是一种共存关系，而非早晚关系。这种现象应该是当初的先民在规划建设聚落时，出于某种特殊考虑而作出的选择，它反映的应是一种文化观念，这一点对解释夏家店下层文化山城类遗址的功能和性质至关重要。⑤

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有大量陶器、石器、骨角器、铜器等。骨角器有笄、镞、匕、匙、角牌、角器、管、蚌器、锥、针、簪、卜骨等。卜骨是用肩胛骨略加修整，经钻孔灼烧而成。其他器物有玉牌、玛瑙珠、绿松石珠等。⑥

---

① 方辉：《岳石文化》，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 页。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平度东岳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战国墓》，《考古》1962 年第 10 期；徐基：《夏时期岳石文化的青铜补遗》，《中原文物》2007 年第 5 期。

③ 席永杰等：《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述论》，《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 期。

④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 年第 1 期。

⑤ 郭治中等：《内蒙古赤峰市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遗址》，《考古》2007 年第 7 期。

⑥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 年第 1 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 年第 1 期；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辽宁北票县丰下遗址 1972 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76 年第 3 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阜新平顶山石城址发掘报告》，《考古》1992 年第 5 期；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队：《敖汉旗范杖子古墓群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 年第 3 期。

4. 四坝文化

四坝文化是以甘肃四坝滩遗址为代表的一类古文化遗存，处于夏代纪年范围之内。除了四坝滩遗址以外，比较重要的遗址还有民乐东灰山、西灰山，张掖黑水国南城城北，酒泉干骨崖，玉门火烧沟、沙锅梁，安西鹰窝树等。①

四坝滩遗址位于山丹城南、石沟河的东岸。1948 年，甘肃山丹培黎学校在四坝滩农场开水渠时，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墓葬，出土了大批文物。1956 年，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又对其进行了发掘，又收获一批材料。②

民乐县东灰山遗址位于河西走廊的中部，属民乐县六坝乡，东南距县城约 27 公里。遗址坐落在六坝乡东北约 2.5 公里处的荒漠沙滩中，是由灰土与沙土堆积而成的一座沙土丘。1958 年 9 月，甘肃省博物馆在民乐县的文物普查中，于六坝乡同时发现东灰山与西灰山两处古代文化遗址。1987 年 4—5 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对东灰山遗址进行了保护性发掘，清理墓葬 249 座，发现夯土墙一段，发掘及采集遗物近千件。③

在东灰山遗址发现了炭化的小麦籽粒、大麦籽粒、黑麦籽粒、高粱籽粒、稷与粟的炭化籽粒、胡桃壳等，在其灰炭土中还发现有猪、羊、牛、鹿的齿骨和一些烧焦的碎骨，可知当时东灰人已经能够种植各种作物和果木，以农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已经能够对经济植物进行有计划的选择和培育良种，并饲养部分家畜。根据东灰山遗址黑炭土标本碳 14 年代测定结果，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 5 000±159 年，就是说，在距今 5 000 年以前，我国黄河上游西北地区已经种植同现在黄河以北广大地区一样的主要农作物：大麦、小麦、高粱、粟、稷等优良栽培品种。这个事实对于阐明我国黄河流域主要农作物起源具有重要意义。④

5. 晋中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夏代文化

晋中地区是指山西省中部的太原盆地和忻定盆地；内蒙古中南部则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中心，西以磴口一线黄河为界，北达阴山脚下，东至岱海地区，南面大体以长城为界，晋、陕两省北部的部分地区也可以归入这一地区。早在龙山时代，包括晋中地区、内蒙古中南部与晋陕高原在内的广大范围内，文化面貌即有很多相同之

① 李水城：《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报》2010 年第 2 期。
② 安志敏：《甘肃山丹四坝滩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59 年第 3 期。
③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民乐县东灰山遗址发掘纪要》，《考古》1995 年第 12 期。
④ 李璠等：《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新石器遗址古农业遗存新发现》，《农业考古》1989 年第 1 期。

处，以至有研究者将其归纳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至夏商时期，这一地区之内各小区的文化内涵仍有比较明显的一致性，比较突出的有：陶器均以绳纹灰陶为主；炊器以鬲为主，兼用斝、甗、圆腹罐等；贮藏器以蛋形瓮为主，兼用小口瓮等。其中鬲和蛋形瓮是该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器物。

20世纪50年代，在太原附近发现了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此后40多年来，先后在晋中地区的太原光社、许坦、狄村、东太堡，太谷白燕，忻州游邀，汾阳杏花村、峪道河、北垣底和孝义薛家会，娄烦河家庄和庙湾、罗家曲等地点，以及榆社台曲、原平庙昌、汾阳宏寺、太原金胜村、忻州连寺湾和尹村等地，均发现有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大多数人认为，这些遗存应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称之为“光社文化”、“白燕文化”、“东太堡文化”、“尹村类遗存”等，但也有人将其中相当于二里头时期的文化归入二里头文化，称之为“晋中类型”、“东下冯类型”、“东太堡类型”等。[①]

内蒙古朱开沟文化是指以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遗址为代表的夏代遗存，该类遗存分布相当广泛，但主要集中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东部至凉城县岱海地区，发现的地点有：准格尔旗大口、张家塔、陈家梁、张家梁、黑岱沟，清水河县的白泥窑子、沙峁圪旦、吕家坡、秦明圪台，包头市阿善，呼和浩特市郊区黄土坡和凉城县毛庆沟、板城、杏树背、双古城等。朱开沟遗址是1974年发现的，1977年首次发掘，1980、1983和1984年又进行了三次发掘。先后共揭露面积约4 000平方米，发现居住房址87座、灰坑207个、墓葬329座、瓮棺葬19座，出土陶器（可复原）500余件，石器、骨器和铜器约800余件。遗址堆积保存较好的地方，依地形划分为7个区。

朱开沟文化虽然在各分期上的特征有所差异，但基本点都保持一致。如房址分为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两部分，大都为半地穴式建筑。墓葬形式多为仰身直肢葬，也有单人葬和双人葬。双人葬中男性为仰身直肢，女性为侧身屈肢，面向男性。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镰、石铲、石钻头、石刮削器、骨铲、骨匕、铜针、铜耳环等。有宗教信仰，出土了用动物肩胛骨所做的卜骨。[②]

6. 马桥文化

马桥文化是指以上海闵行区马桥遗址第四层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它分布的中

---

① 以上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66—575页。

② 以上据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心区域在杭州湾以北的环太湖地区，这里的大部分区域都发现了马桥文化遗存。比较重要的遗址还有嘉兴雀幕桥、吴兴钱山漾和长兴上莘桥、无锡许巷和苏州横塘星火，浙江德清也发现了马桥文化遗址。

马桥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进行了两次发掘，1993—1995年又进行了两次发掘。整个遗址坐落在一道贝壳砂堤之上，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遗址北部原来是村民住宅区和农田，古代文化遗存保存完好。因马桥遗址发现较早，文化遗存最丰富，具有典型性，因此1978年夏，在庐山召开的“南方印纹陶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一致同意将夏商周时期的太湖地区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区，称为马桥文化(会上还有学者提出“后良渚文化”、“马桥—肩头弄文化”、“高祭台类型”等命名)。

马桥文化的陶器分夹砂和泥质陶两大类。马桥文化陶器与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文化有近似之处，如器形方面的觚、簋、盆，纹饰方面的压印云雷纹等。少数陶器的器形与装饰风格与岳石文化近似，如之字形折线纹和凸脊风格。

马桥文化中的生产工具和武器以磨制石器为主。石戚是马桥文化中新确认定名的一类器物，长条形，长内，窄肩，弧刃，形制与斧、钺、戈相比，皆有区别。[①]

7. 点将台下层文化

点将台下层文化是指以南京点将台遗址下文化层为代表的遗存类型，处于夏代纪年范围之内。点将台遗址属江宁县汤山乡桦墅村。该遗址1972年秋被发现，经调查确定为一处湖熟文化遗址，1973年11月发掘。经调查发掘，该遗址的文化层可分为上、中、下三层，上、中层文化属于比较典型的湖熟文化，下层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文化与湖熟文化的过渡。

点将台下层文化陶器可分为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从出土器物看，点将台下层文化中出现了其他文化的因素，如薄胎磨光黑陶的出现，篮纹、方格纹的盛行，都属龙山文化的某些因素，出土的划纹扁鼎足接近良渚文化，还出土了与偃师二里头相似的环足盘。但是，点将台下层文化，缺乏龙山文化所独有的鼎、鬶、罐等一群典型器物，含有良渚文化因素的器具也并不多见。因此，还不能将点将台下文化层笼统冠以龙山文化或良渚文化的名称，从文化内涵来看，只能说明它的时代早于湖熟

---

① 以上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遗址1993—1995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2期。

文化，并且受到龙山、良渚等文化因素的影响。[①]

8. 马岭遗存

马岭遗存是指以福建马岭遗址为代表的一类古文化遗迹，其年代处于夏、商之际。马岭遗址位于福建省崇仁乡池湖村东部、大乾河东岸。1981—1983年，进行了调查发掘。遗址北部地表出土石锛、陶纺轮、石镞各1件。南部坡地清理出二处墓葬，出土陶器共45件，陶器胎骨多数是经过淘洗的细腻泥土，少数羼以细砂或炭粒。还采集到石锛、石斧、石镞等。[②]

9. 池尾后山类文化遗存

池尾后山类遗存是指以广东普宁市池尾后山遗址为代表的一类史前文化遗存，它主要分布在粤东、闽南地区，同类遗存主要有福建漳浦眉力水库遗址，广东和平县子顶山遗址、五华仰天狮山早期遗存等，时间跨度接近夏代纪年范围。

后山遗址是普宁市文物普查队于1983年10月发现，同年11月再次对后山遗址进行调查，采集到部分村民取土时挖出的陶罐、陶壶、陶豆、陶杯、石锛、石镞、锉磨器、砺石以及大量印纹陶片、素面夹砂陶片等，并清理了4座残存土坑墓，12月中旬至年底，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开探沟9个，总面积为179平方米，发现并清理墓葬6座。[③]

后山类文化遗存的陶器主要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种，以泥质陶为大宗。其中鸡型壶为该类遗存的特色器物，往往与折肩凹底罐共存。石器有锛、锉磨器、锤、砺石、戈等。[④]

10. 以珠海东澳湾为代表的沙丘遗址

沙丘类遗址主要指分布在沿海地区的海沙堆积层中出土的史前文明遗址，多分布在沿海的沙滩或沙堤上。从调查发掘的情况来看，沙丘遗址集中于深圳、珠海、中山、香港和澳门等珠江三角洲南部沿珠江口两岸及附近岛屿的沙滩、沙提、沙洲之上。[⑤]

沙丘类遗址以广东珠海淇澳岛东澳湾遗址为典型，不同遗址虽在细节上存在

---

① 以上据钟民：《江宁汤山点将台遗址》，《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

② 福建省博物馆等：《福建省光泽县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和清理》，《考古》1985年第12期。

③ 以上据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普宁市池尾后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7期。

④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普宁市池尾后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7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五华县仰天狮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7期。

⑤ 邝桂荣：《珠江三角洲的沙丘和贝丘遗址》，《岭南文史》1998年第3期。

一定的差距，但典型特征都与东澳湾遗址相同。其中陶器都以夹砂陶为大宗，泥质陶所占比例较少。石器种类较多，大都磨光，常见的有不同造型的斧、石锛、凿、网坠、石矛、石环、石球、石镞、石范、玦、敲砸器和坠饰等，其中又以锛和斧最为广泛。从出土的大量狩猎用石器和网坠，以及沙丘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可以推断这一类型的文明仍处于渔猎和采集阶段。①

在东澳湾遗址，发现了三处由烧土和石块组成的建筑遗迹。从这三处遗迹的烧土和形状来判断，东澳湾人已经有使用灶台的习惯。②

在华南沿河地区的沙丘类遗址中，已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墓葬是香港马湾东湾仔北遗址二期遗存的墓葬。这一期共发现和清理了19座墓葬，分布在沙堤内侧和沙堤与山脚之间的狭长地带上。其中沙堤堆积中的墓葬中有7具骨骼保存较为完整，包括仰身直肢葬6座、侧身屈肢葬1座。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家韩康信鉴定，墓葬中的人骨有亚洲蒙古人种的一般特征，如眉间宽度不特别强烈，具有明显铲形门齿等；同时，呈现出一些热带地区种族的特征，如头骨明显狭长，眶形和面型比较低矮，鼻形趋阔，其男性身高测定比较低矮（约163厘米）等。他们与华南地区特别是珠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人骨的体质特征有明显共性，说明香港和珠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先民是同一种属。③

11. 黄瓜山文化遗址

黄瓜山文化主要分布于闽江下游及闽东沿海地区，以黄瓜山遗址而得名。该遗址位于福建霞浦县沙江镇小马、水潮两村西北的一座相对孤立的山丘上，是一处在接近山丘顶部的东南、西和北三面坡地上可见的成层的贝壳堆积遗址，总面积约6 000平方米。1987年，福建省在文物普查过程中发现该遗址，采集到较多的石器、陶器标本。1989年对该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

在黄瓜山遗址发掘之前，已经发掘的同类文化遗址有闽侯庄边山遗址上层和福清东张遗址中层，因此该文化曾有过不同的命名，如“庄边山上层类型”、“东张中层类型”等。在上述三个遗址中，以黄瓜山遗址的文化内涵最为单纯且遗存典型丰富，遂将其统名为“黄瓜山文化”。

---

① 李岩等：《广东珠海市淇澳岛东澳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9期；深圳市文管会办公室等：《深圳市南山区向南村遗址的发掘》，《考古》1997年第6期；古运泉等：《珠海平沙棠下环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7期。

② 李岩等：《广东珠海市淇澳岛东澳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9期。

③ 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等：《香港马湾东湾仔北史前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6期。

黄瓜山文化的年代约距今4 000—3 500年间。该类文化遗存过去曾被认为属于新石器时代,但从部分陶器的特征观察,不排除其晚期已进入青铜器时代的可能性,只是该文化遗存中尚未发现青铜器。

黄瓜山文化的陶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而以泥质陶为主。其中极具特色的是彩绘硬质陶纺轮。石器与以昙石山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差别不大,仍以磨制的小型石器为主,新出现了石戈。骨器种类较少,有锥、匕、镞、矛等。蚌器有铲和刀。

在黄瓜山遗址还发现水沟2条、灶坑4个和房址2座。

根据发掘的材料,黄瓜山文化遗址均为贝丘遗址,出土小型木作工具较多,而少见农业生产工具,说明采集和渔猎是当时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①

以上所述,只是有关夏代考古发掘的一些重要成果。随着新成果的不断面世,夏代的历史面貌将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四、安阳殷墟考古的新进展

自盘庚迁殷到商朝灭亡,经历了八代十二王,共273年,这期间,殷一直是其都城所在地,因此盘庚迁殷后的商朝又叫殷朝或殷商。商朝灭亡后,殷渐成废墟,到司马迁写《史记》时,则明确使用了"殷虚"一词,不过其具体所在地还是有迹可寻的,《项羽本纪》中就记载为"洹水南"。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替,岁月的风沙掩盖了一切可以作为证据的遗迹,殷墟之词遂成专有名词而见于古籍之中,至于其具体地址,却已经无人知晓。直到1899年,王懿荣首先在龟甲、牛骨上发现了被后人称为甲骨文的文字,其后又有学者从中考释出殷王名谥,经罗振玉细心查访,到1908年才确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这是殷墟遗址第一次被学界所知。②

为了抢救民族文化珍品,从1928年10月开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进行了大规模科学发掘工作。至1937年,先后在小屯村附近及侯家庄等地进行了15次发掘,不仅获得了2.4万片甲骨,还发现了宫殿宗庙遗址区和大规

① 以上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35—638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页。

模王陵区，并出土了大批精美的青铜器、白陶、玉器、骨器等遗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殷商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殷墟考古发掘工作并不断取得新成就。以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殷墟考古的新进展作一简要概述。

（一）1950—1957 年：殷墟考古恢复时期

1950 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重新开始殷墟发掘。此后到 1957 年，是殷墟考古工作的恢复时期。其中较重要的是 1950 年发掘了著名的武官村大墓。该墓埋人牲与殉人共有 79 个个体，这一发现，引发了学术界对人殉、人牲的研究，并推动了当时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②此外，在墓的南面还发现了两排祭祀坑。大墓与祭祀坑的发掘，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③

（二）1958—1966 年：殷墟考古发展时期④

1958 年，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了安阳考古工作队。1959 年又建立了工作站，常年在殷墟进行考古工作。这一建制为有计划、有目的地发掘殷墟，进而加强殷墟文化的研究，起了组织保证作用，并一直延续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殷墟考古工作的重点在小屯、侯家庄、后冈等地，对殷墟只有一个点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50 年代后期，安阳考古队提出了探索殷墟范围与布局的课题。1961 年，国务院将殷墟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出了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和殷墟外围，面积约 24 平方千米，并制定了具体的保护措施。

这一阶段，发掘的大量工作主要是配合基本建设，在一般保护区和殷墟外围进行，在重点保护区内发掘甚少。

通过大量的勘查发掘，不少新的遗址被发现。其中在苗圃北地，发现一处以铸造礼器为主的大型铸铜作坊遗址；在孝民屯西地，发现一处规模不大、以铸造工具为主的铸铜作坊遗址；在北辛庄南地，发现了制骨作坊遗址，出土骨器、骨料、制骨工具等；在白家坟一带，发现分布较为集中的平民墓地。在高楼庄后岗还发现一座圆形祭祀坑，内埋砍头人架和人头，分 3 层，共埋入 73 个个体；坑内所出土的戍嗣

---

① 王宇信：《甲骨文与殷墟》，《文史知识》1999 年第 7 期。

② 刘一曼：《殷墟考古 78 年》，《中国文化遗产》2006 年第 3 期。

③ 林华东等：《20 世纪中国考古十大发现》，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2 页。

④ 本部分据刘一曼：《殷墟考古 78 年》，《中国文化遗产》2006 年第 3 期。

子鼎，有铭文 30 字，是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

1966 年 6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殷墟发掘工作被迫停止。直到 1969 年春，才得到恢复。

（三）1969—2000 年：殷墟考古大发展时期

1969 年以来，除继续配合基本建设，在殷墟一般保护区和外围进行发掘外，安阳工作队先后在高楼庄后岗、小屯、侯家庄西北冈等三处重点保护区内外展开工作。[①]此后，随着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考古学界的往来交流，中国考古也采用了许多外国先进的技术手段，使殷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不断取得了新的发展。

1. 后冈墓地的发掘

后冈遗址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 1.5 公里的洹河南岸，沿河再上行 1.5 公里就是有名的殷墟所在地小屯。1971 年，为了配合建设工程，对后冈遗址进行又一次的发掘。清理了 35 座殷代墓葬和 14 座东周墓葬。这些墓保存都很完整。比起同类的殷代墓，东周墓的墓室都比较大，也比较深。[②]

1972 年春，为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在殷墟后冈地区再一次作了考古发掘，地点就在 1959 年发现的殷代圆坑墓（杀殉坑）的东南、高楼庄村内。共开探方 9 个，揭露面积达 186 平方米；另外还清理了一批古墓葬。发现的大司空村式彩陶，在后冈尚系首次发现，说明这里可能有两种不同的仰韶文化遗存。另外，后冈的殷代遗存虽然是殷墟中常见的器物，但对殷墟的分期上也可提供一定的线索。[③]

1991 年下半年，为配合基本建设，又在后冈遗址的西部（冈顶西部），靠近 1971 年发掘地的北部，进行了铲探和发掘，面积为 9 700 平方米，共发掘了 41 座墓葬，除 3 座是隋、唐墓外，其余都是殷墓。在这批殷墓中，有 2 座带两个墓道的大墓和 36 座长方形竖穴小墓。2 座大墓的墓主应该是地位显赫的大贵族。[④]

2. 甲骨文发掘的新收获

1973 年，由戴忠贤主持，在小屯南地发掘出土甲骨 5 041 片。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这批甲骨的内容相当丰富，为甲骨文与商史研究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其中对卜辞断代尤有重要意义，不仅从地层上证明学术界

---

① 林华东等：《20 世纪中国考古十大发现》，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3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 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 年第 3 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2 年春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 年第 5 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91 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 年第 10 期。

有争议的“午组卜辞”等应属武丁时代，使学术界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同时“通过对小屯南地中期地层、灰坑及其出土甲骨的分析，为解决第四期武乙、文丁卜辞的细区分，提供了较为切实的线索”①。

1991年10月，在花园庄东100多米、殷墟博物苑南400余米处，发掘了一个长方形甲骨坑，共发现甲骨1 583片。其中卜甲1 558片，上有刻辞的574片；卜骨25片，上有刻辞的5片。此坑甲骨，每版上的刻辞，少者一、二字，多者200多字，一般数十字。大多数刻辞的字体细小、工整、秀丽。据初步观察，这批甲骨刻辞内容，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天气、疾病等方面，以祭祀卜辞最多。此坑甲骨的刻辞内容与武丁时的“宾组卜辞”有明显的区别，相当多的卜辞问疑者不是王而是“子”，这个“子”又不是“子组卜辞”的“子”，而是属另一类“子”卜辞。一些常用字的写法和字体风格亦与“宾组卜辞”有较大区别，而与武丁时代的卜辞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又具有独特的风格。这个甲骨坑的发现，对研究甲骨文的分期断代及研究殷代的历史、社会结构等都有重要的意义。②因此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③

3. 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

1975年以后，在侯家庄西北冈对殷王陵进行了大面积钻探和数次发掘。在王陵东区探出祭祀坑250座，发掘了191座；在西区探出120座祭祀坑，发掘了40座，其中马坑30座；还在东西两区各发掘了一座带一条墓道的大墓。通过钻探和发掘，基本弄清了王陵区的大体范围，对大墓的分布状况、大墓与祭祀坑的关系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殷王陵是目前所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王陵，因而其考古意义重大。被学术界列为“20世纪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④

4. 妇好墓的发现

1976年，在小屯村北100米处发现了妇好墓。墓的规模虽然不算太大，但随葬的器物有1 928件之多。其中铜器468件、玉器755件、石器63件、宝石制品47件、骨器564件、象牙器3件(另外还有2块雕花残片)、陶器11件。还有红螺2件、阿拉伯绶贝11件、海贝6 820多个。在468件铜器中，礼器有210件，另有炊煮器、食器、酒器和水器等，个个铸造精良。尤其是大方鼎、偶方彝等，更是其中的上

---

① 刘一曼：《殷墟考古78年》，《中国文化遗产》2006年第3期；王宇信：《甲骨文与殷墟》，《文史知识》1999年第7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补记》，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5—477页。

③ 苏湲：《中原考古大发现：殷墟之谜》，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④ 林华东等：《20世纪中国考古十大发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

品。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210件青铜礼器中，有190件铸有铭文，其中二分之一为“妇好”。在755件玉器中，造型多样，品种齐全，尤其是雕琢成人物和各种动物形象的装饰品，线条流畅，姿态优美，栩栩如生，虽然在地下埋藏了3 000多年之久，仍光泽莹润，显示出商代后期琢玉工艺和抛光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些珍贵的文物，其数量之多、制作之精，都是殷墟发掘以来所罕见的，可谓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①

1977年，李学勤根据此墓出土青铜器的总体特征、器物铭文，提出此墓是武丁晚期的王室墓葬，“历组卜辞”和“宾组卜辞”中提到的妇好是同一个人，“历组卜辞”不属于武乙、文丁时的第四期，而应提前为“武丁晚年到祖庚时期的卜辞”。这就解释了卜辞分期断代的一个“谜团”。②自此，甲骨学又展开了长期热烈的讨论，推动了甲骨断代研究的深入。

5. 车马坑的发掘

20世纪30年代，在小屯与西北冈发现过6座车马坑。50年代、60年代，在孝民屯与大司空村亦发现过4座。从70年代以来，车马坑发现的数量与地点不断增多。西区、郭家庄、梅园庄、刘家庄北地发现了30多座车马坑。③从保存比较完整的车马坑来看，殷墟车马坑内，每坑所埋的车马数量不等，不少车马坑内同时埋有1—3个人骨架。有些车马坑内有兵器和工具。有兵器的车可能是战车，无兵器的车可能为交通车。殷墟车马坑的发现，充分说明商代后期已使用马车。从这批资料来看，殷代马车的结构已经相当完善，与西周的马车已无多大差别。④

197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为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在孝民屯南地发掘清理了一座车马坑。这是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好的殷代车马坑。这座车马坑是当时奴隶主墓葬的一个陪葬坑，车马坑中，被当作牲畜同马一起被用来殉葬的奴隶，是关于殷代奴隶制社会的又一例证，有重要的历史价值。⑤

6. 族墓地的发掘

1969—1977年，在殷墟西区发掘了近千座墓葬，参与发掘的杨锡璋、杨宝成发现，这些墓葬有规律地成片分布，可分为8个墓区，每个墓区又可分为若干组。不

---

① 张自成等主编：《复活的文明：一百年中国伟大考古报告》，团结出版社2000年版，第82—83页。

② 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1977年第11期。

③ 刘一曼：《殷墟考古78年》，《中国文化遗产》2006年第3期。

④ 陈旭：《夏商考古》，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201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新发现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72年第4期。

同墓区有明显界限，葬俗上各有特点，所出铜器上的族徽铭文及随葬陶器的组合等也存在差别。他们提出西区墓地应是族墓地，各个墓区代表着不同的族，墓区下的墓组可能属于分族或家族。此后，族墓地的观点逐渐为学术界认同。此外，在后冈、郭家庄、梅园庄、刘家庄、大司空村、新安庄、戚家庄等多处地点，也都发掘了许多商代墓葬。这些资料表明，殷墟族墓地的分布是随着殷墟范围的不断扩大而扩展的。①

在族墓地的发掘中，郭家庄 160 号墓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座。该墓位于河南安阳市西郊洹河畔郭家庄墓地北部，是一座商代晚期的高级武将墓，属殷墟文化第三期。1990 年 10 月发掘。出土有铜、陶、玉、石、骨、牙、竹、漆等各种器物共 353 件。其中，青铜器 291 件，38 件铸有铭文，种类比较齐全，有礼器、乐器、工具、兵器、杂器等，以兵器为主，有钺、刀、戈、矛等，计 200 多件，镞 9 堆，计 906 枚。该墓发现，填补了殷墟研究中缺乏第三期较大铜器资料的空白；该墓铜器的形制复杂，组合、相配别具特色，对了解商代贵族生活与葬俗和研究殷墟礼器的形制、分期、组合等均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被评为 1990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②

7. 洹北花园庄遗址的发掘

1980 年，为配合安阳市果品仓库基建，在洹北花园庄北做过小规模钻探和发掘，清理了 8 座年代早于殷墟大司空村一期的商代墓葬。

1997 年 9—10 月，为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科研工作，再次对洹北花园庄遗址进行发掘。发掘地点选择在花园庄村西，北距 1980 年清理商代墓葬的地点约 100 米。共发现商代灰坑 15 个、灰沟 4 条。个别灰坑壁可见人工加工的痕迹。出土遗物包括陶器、骨器、石器、铜器及动物骨骼等。

由于历史的原因，学术界长期以来将商代考古的注意力集中在殷墟时期和郑州二里岗时期。洹北花园庄遗址的发现，再次提出了郑州二里岗时期商文化与殷墟时期商文化之间的缺环和过渡问题，并补充了上述两阶段间的考古资料。这对于商朝历史纪年的推算以及其他相关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③

① 刘一曼：《殷墟考古 78 年》，《中国文化遗产》2006 年第 3 期。

② 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中国文物大辞典》（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04 页。

③ 以上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花园庄遗址 1997 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 年第 10 期。

8. 宫殿区一带的钻探与发掘

1986 年，为配合花园庄村民建房，探出了 20 世纪 50 年代发现的灰沟的全貌。此沟南北长约 1 100 米、东西长约 650 米，恰好环绕小屯宫殿宗庙区的西、南两面，而其北、东两端与洹河相接。据推测，这条巨大的围沟，应当是人工挖成的护卫殷王宫宫殿宗庙的防御性城濠。①

9. 白家坟东南建筑基址的发掘

1997 年，由唐际根、徐广德主持，在白家坟东南地发现 51 座建筑基址，在基址的“前堂”沿墙基一带的夯土中，还发现有 18 座儿童瓷棺葬。基址最大的一座，面积达 187 平方米，门向朝东，基址上有排列整齐的础石。由于该基址面积较大，但中部无隔墙，与一般住房不同，发掘者推测可能是宗族或家族举行活动的场所，或许是族宗庙之所在，似后世的“祠堂”，为了解当时都城内的族邑布局提供了重要资料。②

10. 最早的肖形玺印——“铜玺”的发现

关于商朝的玺印，在民国时期黄浚撰集的《邺中片羽》等书中曾著录有三钮铜玺，说是出于殷墟，但因不是科学发掘出土，常受到学者质疑。1998 年秋，在安阳市西郊水利局院内的商代晚期地层中，发掘得一钮铜玺，有明确的地层关系，时代无可怀疑。

这钮铜玺为方形板状，厚仅 0.3 厘米。玺面长 1.6 厘米、宽 1.5 厘米。玺背有半环形钮，钮高 0.5 厘米。就形制而言，这钮铜玺与上面提到的三钮基本是一样的。不同于旧出三钮铜玺的是，新出的这一钮较小，不像前者玺面边长都在 2.5 厘米以上。更重要的区别是，那三钮玺面都是文字，这一钮玺面有边，中间则是由阳线构成的图案，并非文字，从而应列入肖形玺印的范畴。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肖形玺印。早在商代晚期，铜玺已有文字玺、肖形玺等种类，这比过去想象的要成熟发达得多了。③

11. 洹北商城的发现

1999 年，在传统殷墟遗址东部边缘发现规模宏大的城址，面积达 4.7 平方公里，超过了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面积，被专家们称为“安阳洹北商城”，在学术界

① 林华东等:《20 世纪中国考古十大发现》，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33—134 页。
② 刘一曼:《殷墟考古 78 年》，《中国文化遗产》2006 年第 3 期。
③ 李学勤:《试说殷墟新出土的铜玺》，《中国书画》2004 年第 2 期。

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经过对多种因素的分析，专家们断定，洹北商城的建筑年代为殷墟之前、郑州二里岗商城之后，这一时期即应该属于中商时期。洹北商城的发现丰富了人们对殷墟认识，一方面它填补了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的缺环，另一方面，洹北商城的发现，结束了以往众多的争论，有力地说明了夏、商、周三代都邑遗址，不是没有城洹，只是尚未发现而已。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怀疑，“殷墟”不是“殷都”之墟，近百年来人们习以为常的“殷墟”一词，不过是指殷商时代的一个遗址而已，而洹北商城有可能就是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努力寻找的晚商城址。①

殷墟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 3 300 多年历史，堪称中国最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宝库之一。这里出土了 15 万片甲骨、上万件青铜器、54 座宫殿遗址，并发现有宫殿区、王陵区、平民区、铸铜遗址、手工作坊以及大量祭祀场所等。被评为 20 世纪中国 100 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第 30 届世界遗产大会也在 2006 年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随着新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深入，殷墟的文化内涵将进一步得到丰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也将随之得到进一步深入。在中国学术史上，殷墟的发现和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也是中国新史学的开端。

五、西周考古的新发现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考古学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田野考古学发展成为考古学的主流，调查发掘工作遍及全国各地。西周考古的重点是对周人的早期都邑周原岐邑和文王、武王迁都后的丰、镐二京进行发掘。70 年代以来，在陕西岐山、扶风的周原遗址，先后发掘出西周早期和中期的两处大型建筑基址，并且出土一批西周初期的甲骨和窑藏铜器。其他地区的重要考古发现，包括洛阳东郊西周王室铸铜遗址、北京琉璃河西周早期燕国贵族墓地、山西曲沃天马—曲村遗址等，都有重大收获。各地出土的众多带铭文铜器，有不少有长篇铭文，为断代研究提供了比较可靠的资料，也为研究西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组织、

① 2000 年 2 月 20 日，唐际根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安阳殷墟保护区外缘发现大型商代城址》一文。对此，2001 年 1 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杨鸿勋在该报发表《小屯“殷墟”非殷都之墟》，认为应该重新审视小屯“殷墟”这一观念的界定，认为“殷墟”充其量不过是殷商晚期都城附近的一座园囿离宫的遗址。

礼仪制度等重大历史问题,提供了许多难得的第一手文字资料。以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关西周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作一概述。

(一) 周原遗址

周原是周人早期活动的根据地和文化的发祥地,其中心在今陕西扶风、岐山一带,北靠岐山,南临渭水,东到今武功,西到今凤翔、宝鸡一带。公元前 12 世纪末至前 11 世纪初,周人在首领古公亶父率领下,迁居到周原,建立了作为都邑的岐邑。周文王迁都丰都后,周原仍是周人的重要政治中心。到西周末年,由于外族入侵,遂成废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多次对周原遗址进行调查发掘。20 世纪 50 年代,不断有西周遗物遗迹出土,1960 年的调查表明,当地遗址和墓葬连成一片,既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遗物有彩陶、红陶及石器,也有周代早期遗址,遗物以大量的扁平石器为代表。另外发现铜镞 1 件和制作精美的铜刀 1 件,发现有不少瓦,板瓦、筒瓦及瓦当的形制有多种多样,尤其是瓦里有突起的小圆柱,这类瓦和一般常用的瓦在用途上是有区别的,这一类瓦可能作蒙脊之用。就墓葬分布情况看,凡有遗址的地方都有墓葬,未发现密集的专属墓葬区。随葬品有铜器、陶器、骨器和用玉类、介壳类制作的饰品。从出土物的形制上看,这些墓都是西周的,分属于早、中、晚不同时期。①

1976—1977 年,周原考古获得重大发现。在岐山县凤雏村发现了西周早中期大型宫殿或宗庙遗址,在扶风县召陈村发现西周中晚期多座大型建筑群落,这些基址按照礼制布局,基址中有陶管套接或卵石砌筑的排水管道。这些情况显示了西周殿堂建筑的一般面貌和技术水平。在基址内还发现有内涵丰富的骨器作坊和储藏大量青铜器的窖穴。而最突出的,则是在凤雏建筑基址的一处地下窖穴中,发现了 17 000 多片卜甲和卜骨,绝大部分是龟甲。其中有字甲骨 293 片,字数最多的达 30 字,共有文字 600 多个。内容也很丰富,既记载了祀商王的情况,也有反映商王田猎的情况的,有的还记有一些楚、蜀、巢等地名,反映了周人对殷商的隶属关系及与其他方国的关系。此前,西周甲骨只有零星发现,这次大批出土,为西周历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②

---

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扶风、岐山周代遗址和墓葬调查发掘报告》,《考古》1963 年第 12 期。

②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 年第 10 期;尹盛平:《扶风召陈西周建筑群基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 3 期;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 年第 10 期。

在周原遗址的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是大量的窖藏青铜器。迄今为止，周原遗址发现的西周铜器窖藏，有据可查的就有 60 多处，加上墓葬铜器，已出土西周青铜礼器 1 000 多件，有铭文的近 400 件。周原遗址的铜器窖藏，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特别是铜器铭文的重要性，都远远超过了丰镐地区的宗周遗址和洛阳的成周遗址，为研究西周政治、军事、法律、土地制度、册命制度及世家大族历史，提供了第一手可靠资料。[①]如 1976 年冬，在距离召陈村不远的庄白村的一个窖藏中，发现了铜器 103 件，其中有铭文的 74 件，最多者是周恭王时期的史墙盘，有铭文 284 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出土铜器中铭文最长的，内容是历颂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的业绩，历述世代为周朝史官的微氏家世，是研究西周初期历史及微氏家族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为西周青铜器的断代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可靠的标尺。[②]

（二）丰镐遗址

丰镐是西周文王所建丰京和武王所建镐京的合称，位于陕西长安县马王镇、斗门镇一带的沣河两岸，丰在河西，镐在河东。武王灭商后都镐，从此镐为西周都城，直到周平王东迁洛邑后才被废弃。

丰镐遗址发现一定数量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应是当时的宫室建筑。沣西发现 14 座大型基址。沣东发现 10 余处夯土基址及大量建筑用材。5 号夯土基址最大，台基高 1.5—1.8 米，中心部位高 5 米，面积约 3 393 平方米。坐落其上的五号宫室建筑坐北朝南，长 59 米，宽 23 米，面积 1 357 平方米，由主体建筑和左右两翼的附属建筑组成，整体布局呈工字形。根据其规模及营建方式来看，当为天子宫寝类的建筑。[③]

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自 1956 年起，就开始在沣河西岸马王镇西约 500 米处的张家坡一带，进行长期的发掘工作。其中，1956—1957 年，揭露西周早、晚两个时期的居住遗址和 182 座墓葬、4 座车马坑。墓葬中有用狗殉葬的，也有用人殉葬的。在 4 座殉葬车马坑中，每一个车马坑中都有一名殉葬人，车和马都放置得整整齐齐，其中有一座保存比较完整，对于了解西周车制和各种马具是很重要的资料。[④]

---

① 尹盛平：《周原遗址与西周青铜器》，《上海文博论丛》2004 年第 4 期。

②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第 3 期。

③ 本段据赵丛苍等：《两周考古》，文物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9—30 页。

④ 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55—1957 年陕西长安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59 年第 10 期。

1961年，在张家坡又发现一个西周青铜器窖藏坑，出土53件铜器，其中有铭文者32件。这些青铜礼器并非一家所作，有些是姬姓的媵器。其年代也不同，既有西周早期，也有西周中、晚期的。①

1973年5月，在长安县滓西公社的新旺村和马王村，出土一批西周铜器。新旺器无铭文，马王器物中10件有铭文，从其铭文和器形看，大部分是西周中期的，个别可能较早。②

(三) 西周洛邑

洛邑是西周的东都。西周王朝定都镐京后，武王为了有效控制原殷商势力集中的东方地区，灭商不久即有营建洛邑的谋划。成王五年，即在涧水东至瀍水两岸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此后百年内，对黄河下游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的统一起到了很大作用。自周平王迁都于此，改称王城后，洛邑更成了政治文化的中心。公元前519年，因避王子朝之乱，周王迁居到下都，王城从此衰替。汉时洛邑降为县，属河南郡，后汉仍为河南县，历魏、晋、后魏不变。到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始移河南县治于故洛城西，此城遂废，一直湮没到现代无人能知城址的确切所在。

195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组成工作队，负责勘察王城所在。结果在涧河东岸，发现了汉河南县城。而据文献记载，汉之河南县城与周之王城有前后因果的关系，因此东周王城的所在位置，当与此相去不远。③很快，考古工作者在汉河南县城外围找到了一座春秋时期的古城，从其年代、方位、规模等情况综合分析，应该就是东周王城。在其南面，发现大型建筑残迹，当为东周宫殿宗庙之类。④

1964年，在洛阳庞家沟发现一处西周墓地，发掘西周墓葬370多座，还发现有不少车马坑，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显示这处墓地是西周奴隶主高级贵族墓地。⑤

1971年5月，洛阳博物馆清理了一座西周长方形土圹竖穴墓。该墓位于洛阳旧城东北二里许，北窑村南、瀍河西岸的陇海线上，与1964年开始发掘的庞家沟西周墓群相隔仅三四百米。⑥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56页。
② 西安市文物管理处：《陕西长安新旺村、马王村出土的西周铜器》，《考古》1974年第1期。
③ 以上据郭宝钧：《洛阳古城勘察简报》，《考古通讯》创刊号，1955年。
④ 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⑤ 洛阳博物馆：《洛阳庞家沟五座西周墓的清理》，《文物》1972年第10期。
⑥ 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窑西周墓清理记》，《考古》1972年第2期。

1973年秋，在洛阳北窑村西周遗址清理了一批西周墓葬。包括房址、窖穴（灰坑）、墓葬和祭祀坑等。①

1975—1979年，又在洛阳北窑村发掘了一处西周铸铜遗址。出土遗物丰富，很可能是当时西周宗室的铸造作坊。该遗址的发现，是继郑州南关外商代铸铜遗址、安阳北地殷代铸铜遗址和山西侯马东周铸铜遗址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为研究西周前期青铜铸造工艺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丰富了对我国古代青铜铸造业的认识。②

1985年，在洛阳老城发现4座西周早期车马坑，出土遗物主要是青铜马佩饰和车饰，另有青铜兵器7件，这为研究西周早期的车制以及车马具的形制增添了一批新资料。③

以上这些考古发掘成果，都为寻找西周洛邑提供了线索。

(四) 虢国西周墓地

虢国西周墓地位于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包括车马坑和祭祀坑在内，墓葬总数达500座以上。整个墓葬排列有序，等级齐全，独具特色且保存完好。

根据墓葬的排列情况，所有墓葬分为八组、南北两区。第一、二、三组位于南区，是1956—1957年的发掘区，清理大、中、小型墓234座，车马坑3座和马坑1座。北区包括第四至第八组，20世纪90年代的发掘区共清理墓葬十余座，车马坑和乱马坑各数座。

北区应为虢国国君的区域，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有随葬九鼎、七鼎或五鼎、三鼎者，墓旁均有车马坑随葬，出土有大量精美随葬品。其中第七、八组位于最北端，是整个墓地中最为重要的墓葬区，埋葬着数位国君、众多的高级贵族。

北区西部为第七组墓葬，内中以M2001最重要，重棺单椁，出土各类随葬器物3 200多件，包括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玉礼器和装饰玉器、金饰器、象牙器、棺饰及铁、陶、竹木、皮革、丝麻织物等类。玉茎铜芯柄铁剑系人工冶铁制品，是目前考古发现中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玉瞑目是以分片玉织成人体面部各器官的形象，用丝线通过穿孔连缀于丝织物衬底上，穿孔处都附有一颗细小的玛瑙珠以防止滑脱，显然是汉代盛行的“玉衣”的雏形。此墓东侧有一大型车马坑，内埋战车

① 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窑村西周遗址1974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7期。

② 叶万松等：《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5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老城发现四座西周车马坑》，《考古》1988年第1期。

16辆和70多匹马，是其袝葬坑。根据铭文可知，此墓墓主虢季为虢国一代国君，入葬年代为西周晚期①。

北区东部为第八组，是整个墓地中级别最高的一组墓葬，以M2009最重要，在它的东、北、西三面，车马坑和祭祀坑排列密集而有序，多数与它有关。此墓也是重棺单椁，但外加大型棺罩。随葬品的数量、种类等也都超过M2001。众多的青铜礼器上大多刻有铭文，可知大多为墓主虢仲自作器。其中青铜鼎有30多件、乐器4套、各类玉器800多件(套)。一些玉器上刻写或墨书文字，其中毛笔书写的"南仲"等字样，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毛笔字。此外还有年代属西周晚期的4件比较罕见的铁刃铜器，其中一件为人工冶铁，三件为陨铁制品，是考古学和冶金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材料。另有一套完整的麻织品衣物，在同时期考古遗存中尤为少见。此墓青铜礼器的配置是九鼎、八簋、八鬲，说明墓主虢仲为虢国一代国君，入葬年代为西周晚期宣王之世。邻近的M2010为五鼎墓，墓主应为大夫一级，年代在西周末年。②

虢国墓葬群的发掘及大批珍贵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的出土，为两周之交文物的断代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尺。而M2001墓主虢季胸前佩戴的七璜联珠组玉佩，更是精美无比。该组玉佩由玉、玛瑙、料器等374件(颗)不同质地、不同形状的饰件相间连缀而成，总长达87厘米，显然不是普通的装饰品，而应是虢季身为国君身份地位的标志与象征。这组佩饰以青白色玉璜为主体，复以红、蓝二色珠、管点缀其间，真可谓璀璨夺目。七璜联珠组玉佩的发现，为研究西周的玉器工艺及礼仪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③

(五) 李家窑虢国遗址

李家窑遗址位于河南三门峡市区南部、李家窑村北，南临青龙涧河，北依绵延的上村岭，地势平坦开阔。早在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便确定上村岭春秋墓是虢国的"公墓"，李家窑遗址是虢国的都城"上阳"。④1992年春，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在对其考古发掘中，发现一些唐代遗迹和一批周代陶窑。⑤

---

① 李学勤不同意此说，认为虢季"应生活于东周初"。见其《三门峡虢墓新发现与虢国史》，《中国文物报》1991年2月3日。

② 以上据赵丛苍等：《两周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92—97页。

③ 李秀萍：《西周虢国君王七璜联珠组玉佩》，《收藏家》2000年第2期。

④ 张怀通：《试论李家窑M44墓主身份及西虢东迁问题》，《齐鲁学刊》2004年第4期。

⑤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市李家窑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3年第4期。

在1995年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又清理西周时期墓葬14座，其中M44是遗址中所发现的西周文化层100多座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截至1995年考古发掘材料）。该墓共随葬器物23件，分陶、铜、石三大类。从墓内出土一鼎二簋的铜礼器，仿铜陶礼器以鬲、豆、盂、罐为组合，兵器有铜戈这个规格可以看出，墓主非一般庶人，但也并非级别较高的贵族，应属士大夫一级。[①]在出土的一件铜簋上有铭文52个，记述了作器原由与祭祀对象，从中可知，墓主名叫“追夷”，以“宫”为氏，子男一级贵族。结合其他铜器铭文可知，宫氏为姬姓，是西虢小宗。追夷大约在西周末年随其宗子由西虢迁居今三门峡一带。平王东迁，西虢随之东来，因为有了“宫”氏经营的基础，便以“宫”氏居地为基础建立了虢国。[②]

在李家窑发现的城由城址、城壕、宫城、宫殿以及制骨、制陶、冶铜作坊和粮库组成。南墙已被河水冲毁，现存城垣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 000—1 050米，南北残宽56—610米，周长约3 200米。

历史上曾有东虢、西虢、南虢、北虢、小虢五个虢国。据史料记载，南虢始建于西周末年，都城为上阳。公元前665年，晋假道虞以灭虢。关于南虢的都城上阳，在史书中也有多处记载，与李家窑古城址的位置相吻合。可以断定，李家窑古城就是考古界寻觅多年的南虢都城上阳城，它的发现填补了河南省没有发现西周晚期都城的考古学空白，对了解和研究古代都城的发展与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③]

（六）琉璃河西周燕国遗址

琉璃河西周燕国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面积为5.25平方公里。遗址包括古城址和墓葬区。据考证，古城址为西周初周王所封燕国的都城。[④]

1962年，考古工作者在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镇东的董家林村，发现了一处西周遗址，出土有陶器、骨器、角器、蚌器和石器。[⑤]该遗址面积很大，范围包括琉璃河北部的刘李店、董家林、黄土坡、立教、庄头和洄成等村，东西长约3.5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1964年，黄土坡农民在挖菜窖时发现了2件有铭文的铜器。1972年，考古队工作者对刘李店、董家林再次试掘和广泛勘查，进一步明确了遗址范围。从1973年开始，对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清理了7座西周奴隶主墓，其中

①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市李家窑四十四号墓的发掘》，《华夏考古》2000年第3期。
② 张怀通：《试论李家窑M44墓主身份及西虢东迁问题》，《齐鲁学刊》2004年第4期。
③ 本刊记者：《南虢都城上阳重见天日》，《中原文物》2001年第1期。
④ 张利洁等：《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铜器的成分和金相研究》，《文物》2005年第6期。
⑤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3年第3期。

有奴隶殉葬的6座,发掘了3座车马坑,出土了带有铭文的铜器。

琉璃河西周墓地的发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北京地区考古工作的一项重要的新收获。因为经科学发掘的西周墓地,在北京地区还是前所未有的。根据这次发掘出土器物可以判定,7座墓葬和车马坑基本上都属于西周早期,其中除51号墓的年代有可能稍晚外,大概基本上都是成康时期的。

1973—1977年,又发掘西周墓葬61座、车马坑83座。出土铜器有礼器70件、兵器79件、工具9件、杂器59件、车马器300余件。此外有3座墓还出土了铅器。对琉璃河古城址进行了钻探和小规模发掘,推知古城的始建年代应不晚于西周初期。

1981—1986年,在黄上坡村西北、京广铁路东西两侧进行的考古发掘,共清理西周时期墓葬121座、车马坑21座。此外还发掘了城墙。其中大、中型墓葬中出土了不少青铜器。M1193是一座带四条墓道的大型墓葬,出土的铜器铭文记载了周王褒扬太保、册封燕侯和授民授疆上的史迹,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该墓中还出土铜兵器等,其中1件戈上有"成周"等铭文。此墓的随葬器物均不晚于康王时期,故墓葬的年代推定为西周早期的成康时期,经碳十四测年为公元前1015—前985年。

1995年8—11月的发掘工作,在早期居址发现了陶范,其中包括青铜容器范,表明遗址中曾有铸铜作坊。推测以往墓葬所出的铜器,有一部分可能是本地铸造。

1996年春、秋季,为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代学研究,对琉璃河遗址又进行了发掘,包括西周城墙2处、灰坑116座、墓葬1座。重要收获之一是在出土的卜甲中有3片带有文字,其中刻有"成周"2字。这里地层关系明确,是琉璃河遗址中年代最早的西周遗存之一,木炭的加速器质谱测年方法测年结果为公元前1053—前954年。有字卜甲的钻凿和文字继承周人传统,但又有独到之处。

琉璃河遗址是目前唯一的一个既有城址又发现诸侯墓葬的周初封国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也为研究燕国早期青铜铸造技术及其在中国青铜文化进程中的地位,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因而在冶金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①]

(七)白浮西周墓地

1975年3月和6月,先后在北京北郊的昌平县东南的白浮村附近,发掘了3座

① 以上据张利洁等:《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铜器的成分和金相研究》,《文物》2005年第6期。

保存基本完好的西周木椁墓。

这三座墓的形制、葬俗以及随葬器物种类及器型，与此前发现的北京房山琉璃河商周墓基本相同。从随葬品看，应属西周早期。据北京大学历史系碳十四测定木椁年代是距今 3 070±90 年(公元前 1120±90 年)。这进一步证明该墓的年代应为西周早期。

昌平西周墓出土的器物十分丰富，其中铜兵器尤为重要。大约 60 余件兵器中有些器型是罕见的，有的是首次发现。如宽胡斜刃戈、双钩戟、异型铜盔、护腿甲、青铜短剑、鹰首短剑、马首短剑等。从出土的大量铜兵器看到，西周时代的武器种类比以前显然增多了，而且有很大改进，为研究西周兵器演变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带文字甲骨的出土，在西周墓葬中还是第一次。M2 与 M3 都随葬一批数量不少的卜甲、卜骨，有的上面刻有文字。这些甲骨，不仅对西周时代甲骨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同时对研究奴隶社会的占卜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实物例证。

至于白浮西周墓墓主人的社会地位，虽无文字材料可查，但就其建造如此坚固的椁室，随葬大批的器物，有铜兵器、玉器，及大量的象征车马的车马饰件等现象来看，无疑死者生前是有出征打仗的战车战马和全套武器装备的奴隶主阶级中的武将。

白浮西周墓地的发现，为研究西周社会的历史和北京地区的历史地理，以及了解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交流等方面，都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此外，昌平与琉璃河两地，一在北京北郊，一在北京南郊，均属周初燕国封地，随葬器物的特征也基本一致，琉璃河墓地已证明是西周时期的燕国墓地，因此，昌平西周墓无疑也是燕国墓。所以，这次的重要发现也为周初燕都在北京的说法提供了新的实物例证。①

(八) 天马—曲村西周晋国遗址

天马—曲村遗址是西周时期晋国始封之唐地，位于山西翼城、曲沃两县交界处，包括天马、曲村、北赵、毛张等村。西南距侯马晋国故城遗址约 25 千米。

1962 年，国家文物局谢元璐首次发现了天马—曲村遗址。1963 年秋，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进行了首次发掘。1979 年秋，考古人员又进行了第二次试发掘。此后几十年间，对天马—曲村遗址进行了连续 12 次大规模发掘。结果显示，这里

① 以上据北京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 年第 4 期。

的文化遗址十分丰富，不但规模宏大，而且延续时间较长，从西周初期兴起，一直到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才突然衰落，这给曲沃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宝藏，素有“地下博物馆”之美誉。

天马—曲村遗址堆积丰厚，共有2万座墓葬，目前发掘的尚不足十分之一，特别是晋国600年历史，36代晋侯晋公，发现的仅有9代，尚有27代晋公大墓有待探寻。天马—曲村遗址已发掘出周代墓600多座，出土了280余件青铜礼器，大量青铜兵器、车马器、完整陶器1 000余件，以及数万件玉、石、骨、贝、蚌、铅器等。虽说晋南地区早就被公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晋文化遗址所在地，但西周时期晋国的始封地却一直不详。直到曲沃县曲村9代19座早期晋侯及夫人墓群的成功发掘，方使人们恍然大悟，曲沃就是晋国始封地所在，此处就是早期晋都，即史学家所称的“故绛”。①

(九) 白草坡西周墓地

白草坡在甘肃灵台县城西北。1967年9月，白草坡村在平田整地时，发现一座崩塌了的西周墓，甘肃省博物馆接到报告后前往清理。1972年10月，在该墓附近继续发掘西周墓8座，车马坑1座。

这批墓葬，既有西周早期成康时期的，也有穆王以后的西周中期的。其中M2墓，随葬器物分四层，每层之间均隔衬白色苇席数重，分别放置有青铜礼器、瓷器、兵器、车马器、玉器饰物等。这种随葬器物分层的葬俗，为剖析西周礼制提供了一个实例。

出土的青铜器中，有铭刻的铜器24件，其中有铭文14种。M1墓铜尊、卣上有“潶伯作宝尊彝”的铭记。潶是水名，从来注释《禹贡》雍州黑水的，众说纷纭，都不清楚其位置，这次潶伯诸器的发现，解决了这一历史悬案，而且确证黑水必在灵台或泾水流域，黑水的称呼早在周初就已存在。潶伯是周王封在潶的伯爵，即M1墓的死者。潶在这里是地名(或封国名)，因黑水而得名。潶伯既封于黑水，按以地为姓的习惯，其邦族应姓黑。黑姓，《潜夫论》列为殷王族子姓微子之后。那么潶伯一族也是殷的权贵，或早就定居径水，或从内地迁徙而来。潶伯在周康王时期被封到

① 以上据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组等：《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报告》，《文物》1982年第7期；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山西实习组等：《翼城曲沃考古勘察记》，载《考古学研究(一)》(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邹衡：《晋始封地考略》，载《尽心集：庆祝张政烺先生八十寿辰》，吉林出版社1993年版。

这里，显然是为了加强对殷商遗民及异族方国的镇抚。[①]但李学勤认为，此墓地大概属于周王的同姓封国密国，㵒伯应为密的卿大夫。[②]

(十) 黄县归城遗址

山东黄县位于胶东半岛北部，归城在黄县县城东南莱山之阴。城址范围内包括姜家、和平、北山、大于家、董家、东迟家、南埠、曹家(含小刘家)8个自然村。这里是丘陵中的河谷盆地，在农田生产与建筑破土中曾发现过很多古代遗迹、遗物。

1973年，烟台地区文管会组织文物考古工作队，对归城城址进行了调查探测，发现的城址分为内外二城。内城在盆地中部的河旁台地上，地势较四周略高。略呈刀把形。南北长780米，东西宽约450米。外城位于盆地四周，沿山岭筑建，环周总长约10公里，但大部分墙段已毁损无存。由城墙看，归城古城址的年代主要是西周至春秋时期。在胶东，这是目前所知唯一的一处具有二重城郭的先秦城址。

归城范围内，多年以来曾多次有墓葬发现，经清理的有3处，出土不少器物。

可以看出，归城出土器物的风格与关中、中原地区是基本一致的。这说明，在胶东地区，自青铜文化发祥之初，便与关中、中原地区关系密切，基本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小刘家出土的启尊铭文中有"启从王南征"，说明归城的这个启(族)曾经是周王南征队伍中的一支。很有可能，归城在西周时期就是周王室的一个东方与国，到春秋时期，仍然也是保有强大的独立地位的一个古国。至于归城的古国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古代史书记载是莱国，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考古材料，既有学者反对这一说法，也有学者认为归城仍有较大可能是莱国之都。[③]

(十一) 强国西周墓地

1974—1981年，在陕西宝鸡市渭水两岸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发现一批西周时期强国墓地，共发掘墓葬27座、车马坑2座、马坑4座。墓地布局完整，保存完好，早晚序列明确，具有独特的考古学文化特征。

墓葬中出土有比较丰富的随葬品，且都有刻有铭文的随葬品出土，通过铭文，可以排列出墓主强伯的世系，是由周文王晚年到穆王时，也就是说，此墓地存续于

①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② 李学勤:《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文物》1981年第9期。

③ 以上据李步青等:《山东黄县归城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考古》1991年第10期。

西周早中期,中期以后墓尚未发现。

强国地望,大体中心区域在宝鸡渭水以南、清姜河西岸。在其兴盛阶段,曾北逾渭水、南越秦岭至嘉陵江上游各地,主要区域在今陕西凤县、甘肃两当一带。強国墓地的发现,反映出该地在西周早中期文化因素、早期巴蜀文化因素与周文化因素共存的情况,反映了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融合的历史。

关于強国墓地的族源,发掘者认为是古代氐人一支,属于古文献中失载的古強国文化,后迁到四川,与早期蜀文化关系密切。也有人认为強国是早期巴族的一支,经陕南进抵宝鸡渭河两岸,并认为太伯奔荆蛮就是投奔古強国。还有人认为,该墓地是位于古散国的一个大夫家族墓地,并非強国,其来源于早期蜀文化,西周中期衰落,并不一定迁入四川。①

(十二) 应国西周墓地

应国是西周时期中原地区的一个小诸侯国。应国墓地位于今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薛庄镇北滍村西,该地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黄土岭,南北长 2 400 米,东西宽 100 米,高出周围地面 10 米左右。1977 年,平顶山市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成立后,对这条土岭上所出土的一些青铜器、玉器、陶器进行研究考证,确认这条土岗是古墓群。1979 年 12 月,北滍村砖窑场在土岗北段南部取土时,发现一件铜簋,器内底部有铭文 12 字,可知是邓国国君之女嫁到应国所带来的陪嫁品。因铜簋上有铭文"邓公"一字,被命名为"邓公簋"。在以后的几年里,滍阳岭上不断有文物出土。其中又发现 3 件邓公簋和 4 件带铭文的应国铜器,即应事鼎、应事簋、应事爵、应事觯。经过不断对现场进行实地考察、复核、论证,最后确认滍阳岭就是《水经注 · 滍水》所记载的西周时期应国的贵族墓地。

从 1986—1997 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平顶山市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联合对应国墓地进行了连续性考古发掘,共发掘古墓 300 多座,出土文物上万件。整个墓地面积达 20 万平方米,按类别可划分为:应国贵族墓、楚国贵族墓、汉代平民墓三部分,时间是从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为应国贵族墓,楚国贵族墓紧接其后,即从春秋中晚期及战国早中期,而从战国晚期开始,经西汉到东汉时期的墓葬都是平民墓,衔接较紧,具有连续性。

应国墓地的发掘,对探讨当时的礼制及应国的世系等有重要价值,为建立平顶

① 以上据赵丛苍等:《两周考古》,文物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7—102 页。

山地区两周时期的考古学编年序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标尺，对研究当时青铜器、玉器工艺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同时也有助于对西周贵族丧葬礼俗、应国史等方面的研究。①

(十三) 南小汪西周遗存

南小汪遗址位于河北邢台市市区西北部。这是一处范围很大、埋藏丰富的周代遗址，经初步调查，大致在今京广铁路以西、小黄河以北、达活泉以南，因南小汪村位于遗址北部而得名。

南小汪遗址南与曹演庄、南大郭等殷商遗址相连，西北与南大汪战国墓区相望。1991 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组成考古队，会同邢台市文管处，对邢台市工商局等单位计划建楼的两个楼基区进行了钻探和正式发掘。发现了包括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的遗存，出土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

其中有一片刻辞卜骨残片，系牛肩胛骨制成，修磨光滑。正面现存两组卜辞，一组完整有 10 个字，另一组已残缺，仅存一个"其"字。字体小而纤细，与周原等地出土的西周甲骨文刻辞风格完全相同。同时出土的有不少典型的西周陶器，因此，这片卜骨的时代属西周时期当无疑。这是河北省首次发现的西周有字卜骨，也是继山西洪洞坊堆村、北京白浮西周墓地和陕西周原、张家坡等西周遗址发现西周甲骨文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发现，进一步扩大了人们对西周甲骨文的认识视野。

南小汪遗址位于邢台市区，据记载这里是故邢国所在地。邢国是周公之子的封国，周公庶子是第一代邢候。但是关于邢国的初封地，历来有不同的意见。南小汪西周遗址虽因发掘面积有限，未发现重要的青铜礼器和建筑遗迹等，但今邢台市西部是一处规模很大的西周遗址已得到考古证实，因此，发掘者认为邢国的初封地就在今天的邢台。②

李学勤对此地发现的卜骨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与陕西周原扶风齐家村出土的卜骨基本一致；两条卜辞的文字都同胛骨成 90 度，其方向彼此相反，这是西周甲骨的特征，是殷墟的商代甲骨所没有的。特别是，此前商朝和西周甲骨文的出土地点，或是都城（商周京城、诸侯国都邑），或是大规模城邑，所以此地卜骨的出现，说明当地的历史地位不同寻常。"而其种种性质又与周原甲骨如此接近。这和邢

① 娄金山等:《应国墓地考古发掘综述》,《平顶山师专学报》2000 年第 1 期。

②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邢台南小汪周代遗址西周遗存的发掘》,《文物春秋》1992 年增刊《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参加第三届环渤海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报告集》。

国为周公之子所封，是完全符合的。西周邢国在今邢台，看来是可以定论了”。①

(十四) 仙人台周代墓地

仙人台遗址位于山东长清县城东南五峰镇北黄崖村南，是一处包含从岳石文化到汉代遗存的重要文化遗址，其主要遗存集中于西周与春秋时期。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里就曾出土过青铜礼器。1995年3—5月中旬，山东大学考古系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包括居住遗址与墓地在内的一批重要遗存。特别是周代墓葬部分学术价值很大，被评为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仙人台墓地的墓葬虽然数量不多，但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在时代上也能拉开一定的距离，是研究东夷古国史的重要资料。经初步研究，仙人台的6座墓葬以M3时代最早，约为西周晚期；M1和M2为两周之际；M4和M6为春秋早期偏晚阶段；M5年代较晚，约为春秋晚期偏早阶段。在7件有铭铜器中，有4件铭文中有“郜”字，应是郜器，可见这是一处与郜国有密切关系的高规格的贵族墓地。关于郜国的文献记载只有二三处，且字数极少。文献中关于郜国地望的记载也多有歧义，其地理位置尚无定论。仙人台郜国贵族墓地的发现，无疑对进一步探讨郜国的历史和地望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②

(十五) 太清宫西周长子口墓

该墓葬位于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1997年，太清宫考古队对太清宫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除发掘了大面积的唐宋建筑基址外，还发现了春秋时期的马坑和西周初年的大型墓葬——长子口墓。这次发掘，确认该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的古文化遗址，其中以龙山文化和商周遗存最为丰富。长子口墓位于遗址的东南部，在其周围有商代夯土、陶窑以及春秋时期的马坑等。

长子口墓共出土有铭文器物50件，绝大部分为长子口自铭，说明墓主是长子口。墓主长子口的骨骼保存较完整，经鉴定为男性，死时约60岁。长子口应为与商王朝关系密切的长国诸侯，周灭商后又臣服于周，死后按商代葬俗埋葬。

此墓的发掘，其意义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已发现为数不少的商遗民墓和西周早期墓，海内外所见此时期的传世文物也不少，但都因缺乏可靠的断代标准而莫衷一是。长子口墓的时代较为准确，且出土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种类齐全，为研究商末周初的青铜器断代提供了可

① 李学勤：《邢台新发现的西周甲骨文》，《中国文物报》1993年3月7日。

② 以上据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长清县仙人台周代墓地》，《考古》1998年第9期。

靠的标尺。

第二，长子口墓保存完好，人殉人祭资料完整。从墓室结构看，为中字形大墓，南北两条墓道，亚字形墓室，器物放置较有规律。14 个人祭人殉与墓主一样，人骨保存完好，这些在商末和周初的墓葬中都极为少见，为研究商周埋葬制度以及社会生活制度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第三，长子口墓出土遗物丰富，种类齐全，为同时期墓葬所仅见。

第四，各种质地的乐器，数量多，种类全。出土铜铙 2 套 6 件、石磬 1 件，禽骨排箫至少 5 组。为研究商周乐器和上古音乐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第五，豫东一带属黄淮平原，从远古至西周，这里一直是中原华夏文化与东夷、淮夷文化的交汇处，尤其是商晚周初，更是中原与东方战争的要冲。长子口墓的发现，对研究商末帝辛征人方、周初武王和成王东征等都有一定意义。①

以上是 20 世纪后半期有关西周时期的主要考古发现。从目前情况看，西周时期的都城大部分都已被发现，对其布局、形制与功能也有了相当多的了解和认识，并能够更进一步了解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脉络以及在中国古代城市中的地位和作用。考古发现的西周墓葬材料也十分丰富，对研究当时的墓葬制度、丧葬习俗及其所反映出的社会背景、礼仪制度等内容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对考古发现的西周青铜器的研究，也使学术界对其发展阶段、区域划分、本质特点有了总结性认识，逐步勾勒出中国青铜器的轮廓。特别是，西周考古的分期序列已经逐步建立起来。这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西周考古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突破。

六、春秋考古的新突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有关春秋时期的科学考古工作已经展开，但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关春秋时期的考古工作不断取得重大突破。以下主要记述一些对春秋历史研究有重要价值的考古发掘成果。

(一) 楚都纪南城

湖北省江陵县境内的楚都纪南城，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已发现的南方最大

① 以上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鹿邑县太清宫西周墓的发掘》，《考古》2000 年第 9 期。

的一座古城。楚都纪南城即楚郢都故城,因在纪山之南,后人称之为纪南城。土筑城垣至今仍大部分保存在地面上,一般高出平地 3.9—8 米,底部宽 30—40 米,上部宽 10—20 米。按自然地理的区分,把整个城内分编为徐岗、纪城、新桥、松柏四个考古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对纪南城进行过地面调查与勘查,于 1956 年定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 年国务院将它列入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65 年夏,对城址开始普探、试掘,测绘现存地形图,同时在城外发掘楚墓。1973 年发掘纪南城垣水门。

1. 城址的勘查

1975—1979 年,对纪南城开展普查钻探,结合小型试掘,基本上搞清了城垣、城门、城内建筑遗址以及护城河、古河道的原貌。

纪南城城垣为泥土夯筑。整个城垣的平面呈长方形,只南垣中部偏东处有一段曲折。城址面积约 16 平方公里,城垣周长 15 506 米(包括缺口、城门在内)。现存城垣上可以见到的缺口共有 28 处,多数是后来遭受人为破坏或被水冲毁的,仅有 7 处可以确定为城门遗址,其中水上城门建筑 2 座。城垣外有绕城一周的低洼地带,即当年护城河的遗迹,经勘探,护城河距离城垣外坡一般在 20—40 米之间。城内东南部,分布着密集的夯土台基建筑遗址,规模宏大,应是当时城内的宫殿建筑群。

2. 西垣北门的发掘

西垣北门遗址于 1975 年 3 月 20 日至 7 月 13 日发掘。发掘结果表明,西垣北门遗迹之下,叠压着相当数量的灰坑、水井和大量的陶片、瓦片,这说明此城门建造之前,那里是一处重要的居民点。由于自然条件的关系,城门遗迹保存并不太好,但基本形制还是清楚的,即一门设三个门道,中间门道比两边门道宽一倍,在门道两边内侧各建门房。由此说明,我国古代都城一门三道的建筑形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

3. 南垣水门遗址的发掘

1972 年冬至 1973 年春,对南垣西边水门遗址进行了发掘,先后开探沟 14 条,发掘面积 342 平方米。发现一段古河道,在古河道中,又发现了一座木构建筑遗迹。

根据木构建筑一门三道的结构,它很可能是一座水上城门。门道宽约 3.3—3.4 米,而春秋战国时期的木船,在江苏淹城的古河道中曾发现过,其中一只长 11

米、口宽 0.9 米、底宽 0.59 米、深 0.42 米，因而从这门道过船是宽敞的，因而作为水门是可以成立的。

4. 松柏区 30 号建筑遗址的发掘

松柏区 30 号建筑遗址在纪南城内东南部，有汉代夯筑土堤，今俗称“火龙堤”。发掘工作从 1975 年 3 月开始，至 1976 年 12 月结束。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地层所出遗物，建筑遗迹与遗物均可分为早、晚两期。

建筑遗址的年代为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始建年代也可能是在春秋中期。

建筑基址的规模都很大，特别是上层建筑 F1 的规模很大，中有主体厅堂，外有檐柱、散水等排水设施，这样的建筑规模与秦都咸阳宫殿建筑有类似之处。中部的主体房子东西面阔 63 米、南北墙跨度 14 米，整座建筑物定当雄伟壮观。它所处的位置正位于宫殿区范围内的东侧。因此，它应是属于宫殿区内的一处较为重要的建筑。

5. 陈家台遗址的发掘

陈家台位于纪南城内新桥区的陈家湾西侧。根据陈家台出土的遗物和碳十四测定的炭化米的年代，这个台基的时代可定为战国时期。

从台基附近发现的炼炉遗迹以及与铸造有关的遗物看，这里应是当时一个铸造作坊遗址。台基西部发现炭化米，可能是当时作坊存放粮食的地方，后因火而毁。这说明纪南城西南部有可能为郢都的冶炼作坊区，这为今后在这个区寻找冶炼作坊遗址提供了重要线索。

6. 水井、窑址的勘查与发掘

纪南城内的古井很多。西垣北门、松柏 30 号建筑遗址、龙桥河西段、松柏周家潜、范家垸、余家湾、新桥陶家湾、余家垱、纪城文家湾等处也有发现。窑址发现于龙桥河西段、纪城广宗寺、松柏范家垸、东垣外毛家山等地。

纪南城内经过发掘的水井、窑址，它们的年代上限都不早于春秋中期。

水井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密集于窑址附近的水井，井坑较浅，似是供制陶作坊用水的；第二类是建筑台基周围的水井，井较深，应是生活用水井；第三类是井内遗物甚少，不见汲水罐，有的井内出土大型陶瓮，这类井可能是冷藏井。

7. 楚墓的勘查与发掘

纪南城四周约三四十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密集的楚墓。这些楚墓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至今地面上仍保留封土堆的大墓。这类大墓的数量初步调查有

800 多座，其中封土堆直径在 40 米、高 6 米以上的约有 40 座。已发掘的不到 10 座。第二类是地面上看不到封土堆的较小的墓。目前已发现 25 处，共约 2 000 座，已发掘 800 余座。

这些墓地的墓葬的年代早于西垣北门、南垣水门木构建筑和松柏 30 号建筑遗址的 F1，应是筑造纪南城城垣以前的楚国墓地。

8. 根据以上考古发掘成果，可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左传》、《史记》、《汉书》、《水经注》等都以楚之郢都在江陵。可是，后来出现了异议，学术界对今江陵县境之纪南城是否为楚郢都，持有不同意见。现在，根据已经获得的考古资料，可以肯定纪南城就是楚之郢都。而且，早期郢都亦在今存纪南城范围之内，也是有可能的。

至于城址的废弃年代，据《史记》、《汉书》记载，公元前 278 年秦将白起拔郢，楚即迁都于陈。前述考古资料中，未见战国晚期的楚文化遗存，在纪南城东南边的凤凰山发现了大批秦汉墓葬，其中不少是战国晚期的秦墓。有的墓葬还直接打破东周夯土台基。至于东汉时期的墓葬，则遍及全城，有的东汉墓还直接建在纪南城的城垣上，城内找不到秦汉时代的文化堆积。这就说明楚都东迁以后，纪南城也逐渐废弃了。

第二，关于郢都的城市布局，可作出如下判断：

城内东南部的松柏区，有密集的夯土台基，这里应是楚都的主要宫殿区。

城内东北部的纪城区夯土台基也不少，规模也较宏大，当为楚都城内另一重要建筑群所在。

纪城区和松柏区靠近龙桥河两岸，有分布密集的水井，且已发现窑址多处，这一带是城内制瓦和制陶器的主要手工业作坊区。西南部新桥区存在夯土台基较少，且相距甚远。在这个地区发现有铸炉、炼渣、锡块和房屋建筑，以及与冶铸有关的鼓风管、耐火泥等，这一带应是以金属冶铸为主的手工业作坊区。

城垣四周附近已发现的考古资料表明：城南的许多夯土台基有可能为祭祀或守卫都城的遗址；城西、城北有密集的居民区。城周附近（如雨台山墓地）有许多大小贵族的墓葬区，有可能是《周礼 · 地官》中所谓的邦墓之地；而离城稍远的八岭山、纪山一带，大型的土冢林立，很有可能为楚国国君、王室墓地所在，亦即《周礼 · 地官》中所谓“公墓”之地。①

---

① 以上据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上、下），《考古学报》1982 年第 3、4 期。

（二）龙湾楚国大型宫殿基址

龙湾镇位于湖北潜江县西南部，西距故楚都纪南城约50公里。1984年春，由地县博物馆组成的文物普查队，在龙湾镇东约3公里处的章家台、华家台等地约200余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大量东周时期和汉代的陶片，以及成组的台基。1986年1月，地县考古工作者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经踏勘和局部钻探，确认大部分土台系夯土台基。据谭其骧考证，古章华台遗址在潜江龙湾。因此，当地政府就将以章家台、华家台为中心的东周遗址群命名为章华台遗址，以与文献记载和专家考证相一致。

章华台遗址约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 000米，南北宽约1 000米，夯土台基建在高出周围地面3—5米的土岗上。台基的大部分处在遗址东南部，已调查发现的有放鹰台、荷花台、打鼓台、陈马台、无名台、章家台、郑家台、小黄家台、华家台等10余个台基。这些台基的时代，有东周的，也有汉代的。

1987年4—6月，地县博物馆考古人员先后在郑家湖和放鹰台两处东周遗址上进行了小型试掘。在郑家湖湖底，探掘到0.5—1米厚的淤泥层下，发掘出土了大量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时期的陶扁、盂、豆、罐等生活器具及铁斧、铁锛等铁制工具；在放鹰台遗址1号台基上发现宫殿基址一座。

宫殿原始红砖规整的红砖墙、曲形垛侧门、贝壳路、大型方形半明柱的柱穴，均系国内同时期遗址中首次发现。其宫殿规模之大、保存之完好，亦为国内已发掘的东周遗址所罕见。此外，它的建筑风格奇特，突破了中国古建筑的传统模式，即以南北为中轴线，东西对称，前堂后室等，而是东西高低错落，北高南低，用贝壳铺路及长廊环绕呈回廊，庭院交错，呈现出一派离宫别馆的风貌。该宫殿的建筑时间，可能在春秋中晚期。宫殿基址废弃堆积中出土的瓦均为红色且火候相当高，所出的砖多为烧结块，所有的柱子洞内均有木炭（被烧的柱子），大部分居住面上留有一层灰烬。以上迹象表明，该宫殿毁于一次性的火灾。

这些发现，为考古学者、历史地理学家、古建筑学家等进行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①

（三）雨台山楚墓

江陵雨台山楚墓位于湖北省江陵县纪南乡雨台村，雨台山是一座海拔60余米

---

① 以上据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湖北潜江龙湾发现楚国大型宫殿基址》，《江汉考古》1987年第3期。最后一段对“建筑风格奇特”的说明，据方酉生：《试论湖北潜江龙湾发现的东周楚国大型宫殿遗址》，《孝感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的小土丘。1987年5—6月,为配合荆(门)沙(市)铁路工程,湖北省博物馆在龙会河北岸至关坪2公里余的铁路上共发掘楚墓73座。

73座墓中有72座墓出土器物1 300余件,种类有陶器、铜器、漆木器、金石器和竹律管等。21号墓出土的4支有音律名称的竹律管,是音乐考古方面一个重要发现。在10号小型墓中出土了11件小型金饰品,这在小型楚墓中尚属先例。在墓坑形制方面发现了三种新的形制:在长边设斜坡斜向墓道,在长边设台阶状似横墓道,在长边两侧设台阶。这些新发现为研究和探讨葬制提供了新的资料。

这批墓葬形制清楚,葬具基本完整,随葬器物比较丰富,为进一步研究楚国的文化提供了实物资料。①

(四) 曹家岗5号楚墓

曹家岗地处湖北当阳县河溶镇东南,是一处地势略呈十字形的岗坡,岗上密布墓葬群。环绕四周的磨盘山、赵家湖等十多处岗地,分布着内涵丰富的周代文化遗存。

5号墓坐落在岗脊西侧偏北。1975年夏,群众在紧靠5号墓东1—2米处的堰塘边拾到"王孙雹作蔡姬食簠"等一组铜器之后,经钻探发现此墓。1984年10—11月,宜昌地区博物馆和当阳县博物馆对5号墓进行了发掘。

此墓的墓葬形制、随葬品的纹饰和造型等,都具有鲜明的楚墓特征和典型的春秋晚期的特点。从出土的铜簠铭文分析,作簠者"王孙雹"似即春秋晚期的楚国上等贵族申包胥,作器时间疑为楚平王尸受辱,他告急于秦的前后几年(即公元前510—501年)。这一铭文,更确证其年代为春秋晚期。

至于墓主身份应是大夫阶层中地位较高者。随葬品虽被盗,其残存遗物,足能证明其豪富。如造型、装饰、精工技巧堪称上乘的漆瑟,大量的印纹金属装饰,为数较多的大中小形皮甲,以及翡翠晶体物组成的骨贝等等,都是大夫以下所难以享用的。

在以往楚国郢都附近及两湖的长江中游地区已挖掘的春秋楚墓中,以此次发掘的曹家岗5号墓规模最大。附葬两具陪棺并设有附葬坑的楚墓,在这一地区属首次发现。因而它的发掘,首先就对春秋楚国的中级贵族的埋葬制度有了新的、进一步的了解,是楚文化研究工作的重大收获。

---

① 以上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雨台山楚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5期。

其次，这座墓在主外棺的用料及其结构上，也提出了一个新课题。一般庶族平民就能享用的棺木用材，为何墓主人的外棺用20块大小不均的节木兼施多种方式凑合而成？木材在当时楚国的疆域内并不贫乏，这种现象可能反映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第三，瑟、皮甲及金属装饰的出土，为研究我国古代音乐、军事、手工业史等方面提供了新材料。

第四，从出土物的纹饰及部分装饰物来看，楚人特别崇拜超自然的“龙”。皮甲的金属装饰、瑟面上的雕刻和彩绘、龙饰片和雕花木片以及铜器纹饰，几乎都为“龙”纹所垄断。这些龙的造型和龙的图案，充分反映出楚人的思想意识。

第五，此墓出土物的作风和铜器铭文，也反映出楚、蔡两国的关系。器物的造型和作风，如鼎、簠、缶与蔡侯墓出土器基本相同，有些纹饰酷似一个范模所铸。铭文中“作蔡姬食簠”也反映出楚、蔡的密切联系。①

(五) 赵巷4号春秋楚墓

赵巷位于湖北当阳县河溶镇以东，是一座东西长约500余米、南北宽约400余米的土岗，地势高出四周面约2—4米。1988年6月，河溶镇陈场砖瓦厂在赵巷取土工程中发现10座古墓，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宜昌地区博物馆主持，对已遭破坏的4号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4号墓因遭盗掘，随葬器物大多被盗，仅残存铜器、陶器、玉器等70余件。

此墓为无墓道的竖穴木椁墓，墓壁较直，长方形悬底木棺，具有江汉地区早期楚墓特点。从出土器物等看来，此墓时代当为春秋中期偏晚，墓主身份为大夫。墓主的足下及南侧有5个陪葬棺，陪葬者均为青少年女性，推测其身份为墓主生前的侍妾或奴婢。从目前考古发掘材料来看，凡有殉人的楚墓，基本都是一椁二棺(即大夫级)以上的墓。这种殉人现象，当是商周以人殉葬的遗风。

赵巷4号墓西南角还随葬16只家畜，有黄牛、猪、狗、羊等。这种以牲随葬的现象，在此前已发掘的楚墓中尚属首见。是祭祀的遗留，还是一种特殊的随葬习俗，因目前尚为孤例，还难以判断。

赵巷4号墓还随葬了许多厚木胎漆器，且保存较好，这些漆器多以整块木料刳成，髹黑漆地，绘红色花纹，并间以金、银、黄色勾画点染，色彩艳丽，层次感强。特

① 以上据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当阳曹家岗5号楚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别是3件漆俎，所描绘的珍禽神兽体态多变，灵活生动。神兽酷似鹿，联系楚墓中常有木鹿出土，其他一些器物上也常雕饰鹿的图形，后代文献中又有群鹿救楚王的故事，或许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崇鹿的习俗。①

（六）赵巷12号春秋楚墓

1996年3月，湖北当阳县河溶镇陈场砖瓦厂在赵巷取土时，发现两座古墓。1997年1月，对这两座古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

两座墓葬中的第13号墓，因早期被盗，墓室内已空无一物。第12号墓虽早年被盗，但仍清理出300余件文物。器物质地可分为陶、金、铜、竹、木、皮等几类，以青铜器和漆木器最多。此外，还发现竹笥、盾、竹席、金属和皮质铠甲片，其中金属甲片上贴饰有金片。这些文物中，乐器和车马器数量最多，乐器最具特色。根据墓葬的形制、棺椁结构、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可推断墓葬的年代为春秋末期，墓主人可能属楚国中下等贵族，其级别大体相当于"大夫"。

该墓葬的发掘，对楚国葬制、音乐、军事乃至整个楚文化史研究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②

（七）肖家河春秋楚墓

该墓葬位于湖北郧县五峰乡肖家河村境内的乔家院墓地。1990年4月上旬，湖北省郧阳地区博物馆组织考古干部沿郧县区域内汉水两岸进行化石点专题调查工作，途中得知当月6日郧县五峰乡肖家河村民在淘金时挖出一座古墓，出土了一些文物。调查者随即赶到肖家河村淘金现场，但墓圹已经挖毁，仅存东南部一角。经过现场调查，对残存的部分墓圹进行了清理，追回了散存在各淘金户的出土文物，初步认为这是一座春秋晚期的楚墓。

随葬品共14件。其中铜器12件、玉器2件。铜器中又以礼器为多，有8件，其余为4件兵器。墓中出土的玉剑被认为是迄今湖北省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把玉剑。这把玉剑为玉石和木头连接而成，全长37厘米，上面有雕工精细的花纹。③

（八）浏城桥1号楚墓

1971年2月，湖南省博物馆配合长沙市东区某工程，在浏城桥清理了一座较

---

① 以上据宜昌地区博物馆：《湖北当阳赵巷4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0期。

② 以上据宜昌博物馆：《湖北当阳发现春秋时期人殉楚墓》，《江汉考古》1997年第3期。

③ 以上据郧阳地区博物馆：《湖北郧县肖家河春秋楚墓》，《考古》1998年第4期；宋效忠：《郧县乔家院春秋楚墓出土"楚国第一玉剑"》，《楚天都市报》2007年1月1日。

大而完整的楚墓。其墓室为长方形土坑,木椁四周上下填塞有“白膏泥”。这种“白膏泥”是含有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灼碱及少量铁、钙、镁、钠的氧化物的白色或黄色瓷土,具有防腐作用。所以棺椁得以保存完好。

墓有两椁一棺。在外椁与内椁之间的东、南、西三面均留有空间,构成三个边箱。西边箱通南边箱处还横放一“小棺”,棺内空无一物,棺盖上放置车伞盖弓和漆绘木鹿、木鼓、瑟、剑椟等。这种情况,尚属初见。

随葬器物共 262 件。计有陶器、铜器、漆器、木器、竹器、玉器以及丝织品等。

乐器中有 1 件长方形瑟,是用整木雕成的,两端各有弦孔 24 个,弦孔间的距离很不一致,最近的为 1.2 厘米,最远的为 2.4 厘米。这种 24 弦的瑟,不见于文献记载。这为研究楚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

此墓出土的兵器种类繁多,有剑、戈、戟、矛、弓、矢等 10 余种,共 80 多件,约占全部出土遗物的三分之一。可以推测死者是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掌握兵权的人物。其中,出土的戈、戟、矛的柄部的长度相差很大,柄长在 3 米以上的,可能是用于车战。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戈、戟、矛带有积竹柄。这证明古代《考工记》等书的相关记载和注释是可信的,也证明郭沫若在《说戟》一文中的考证是准确的。①

(九) 黄土山楚墓

黄土山楚墓群位于湖南省常德县灌溪镇黄土山村黄土山。1985 年常德市文物工作队、常德县文物管理所在此勘探出春秋战国楚墓 100 余座。已发掘墓葬 49 座。

49 座楚墓共出土器物 294 件,其中陶器 236 件、铜器 47 件、铁器 2 件、木器 6 件、竹器 1 件、料器 1 件、石器 1 件。铜器中兵器 42 件,占铜器总数的 90%以上。竹木器共 7 件,其中木梳整体近正方形,顶部呈圆角形,两边齿稍长,中间有齿 19 根。

黄土山这批墓葬,推测为春秋至战国晚期的墓葬。②

(十) 下寺春秋楚墓

下寺位于河南省淅川县东南 60 公里的丹江水库西岸。1976 年冬,在下寺北部的土岭(又名龙山)上发现古墓一座,接着进行调查和钻探,发现古墓数十座,从而得知此地是一处古墓群。1978 年夏秋之间,淅川县文管会先后进行了两次发

---

① 以上据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

② 以上据常德市文物管理处:《湖南常德县黄土山楚墓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95 年第 1 期。

掘，清理大型春秋墓3座，发现了大批珍贵的楚国文物。1979年，省文化局组成了丹江库区文物抢救发掘队，对下寺古墓群进行了发掘。从3—5月，先后发掘春秋楚墓25座，东汉墓3座。

所有随葬品都出于9座大型墓，主要是大型青铜器，还有大量小型玉饰、玛瑙、料珠、石、骨、贝等装饰品，共约7 000余件。青铜礼器共出土160余件。另外出土铜带钩1件、金箔749克、贝4 000余枚。

下寺楚墓铜器多有铭文，这对确定墓葬的年代和墓主人，是可靠的依据。从2号墓的规模和随葬品及其升鼎铭文所显示出墓主人的身份看来，该墓墓主人可能即令尹子庚。子庚死于楚康王七年夏（公元前552年），那么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这一年间。其他墓葬的形制和出土遗物，与2号墓比较，基本相似。其时间虽有早晚，但不会相距太远，都是属于春秋中晚期，或者说公元前6世纪时更为恰当。这一墓群地处丹江西岸，从出土青铜器的铭文和形制来看，它是一处楚国王族墓地。

下寺春秋楚墓出土了大批乐器，制作精致，保存完好，总计在90件以上。其数量之多，器形之大，是继湖北曾侯乙墓之后，又一重大发现。2号墓出土的铜禁以及1、3号墓出土的铜盏盖钮和器足，都是用失蜡法所铸造。我国以前发现最早的失蜡法铸件，是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所出的铜盘尊，下寺春秋墓铜禁和铜盏的发现，把我国使用失蜡法的历史又提早了120多年。[①]

(十一) 春秋时期的秦国都城——雍城

秦都雍城位于今陕西凤翔县城之南、雍水河之北。从秦德公元年（前677年）至献公二年（前383年）的294年间，这里一直是秦国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经过19位国君的经营，秦国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作为国都，雍城建立了大批壮丽的宫殿，成为当时全国发达的大城市之一。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考古工作者在此地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初步搞清了雍城的位置、布局；城内的三大宫殿区；城南郊的墓葬区和宏大的秦公陵区，为研究秦国早期历史提供了大批珍贵资料。

1. 城垣

1959—1983年，探明城垣平面呈不规则的方形，东西长3 300米（以南垣计算），南北长3 200米（以西垣计算），面积约1 056万平方米。在西垣外建有城

① 以上据河南省丹江库区文物发掘队：《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文物》1980年第10期。

壕，长约 1 000 米，宽 12.6—25 米，上口宽 18 米，壕底宽 12.5 米，深 5.2 米。

2. 三大宫殿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先后发掘了姚家岗春秋秦宫殿遗址、春秋秦凌阴遗址及马家庄春秋秦 1 号建筑遗址，1983 年底又钻探发现了马家庄 2 号和 3 号建筑遗址，同时对铁沟、高王寺一带的战国秦遗址进行了调查。大致搞清了雍城城内三大宫殿区的分布情况，即：姚家岗一带的春秋秦宫殿遗址可能就是《史记・秦本纪》中所说的"雍太寝"，马家庄一带的春秋中晚期建筑可能就是"雍高寝"，而铁沟、高王寺一带众多的建筑遗址则应是战国时期的"雍受寝"。另外，1982 年对雍城及其附近的秦汉遗址调查时，还发现雍水河之南、千河之东也有宫殿分布。

3. 城南郊的墓葬区和秦公陵园

在雍水河南岸的高庄、东社、八旗屯等地分布着绵延 10 多千米的秦国小墓群。八旗屯之南，有规模宏大的秦公陵园。

1976—1977 年，在八旗屯和高庄两地发掘秦墓 86 座、车马坑 4 座。

这批秦墓的时代从春秋早期一直延续到秦统一。根据随葬器物组合和器形演变，可分为七期。

第一期相当于春秋早期，以铜礼器为主，兼有陶、漆等器物。

第二期相当于春秋中期，以彩绘的仿铜陶礼器为主。

第三期相当于春秋晚期，以仿铜陶礼器为主，陶困、铜舟等是此时期新出现的器物。

第四期相当于战国早期，铜器微型化，成套的礼器竟可握于一掌之中。陶器中仿铜礼器居多，均无彩绘，新出现牛车模型。

第五期相当于战国中期，出现洞室墓，器物组合趋向简单。

第六期相当于战国晚期，陶缶、灶、锼、钫为此期的新品。

第七期相当于秦统一，陶礼器少见，实用器大量出现。

八旗屯、高庄这样大规模的秦墓发掘，在全国尚属首次。墓葬时代延续时间长，随葬品种类多，数量丰富，各类墓葬有一定差别，又有明显关系。它的发掘，对探讨先秦及秦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1977—1980 年 5 月，对秦公陵园进行了钻探，发现了 13 座陵园，共 33 座大墓；在整个秦公陵园的外围和 X 号陵园、Ⅲ号陵园都发现了具有保护作用的隍壕设施。

钻探各类大墓时，多发现填泥用炭的情况。过去认为积石、积炭、屯沙、填泥是战国墓葬的特点，现已证明，为防盗、防潮而填泥用炭的作法，大约在春秋时秦国已采用了。

雍城众多的宫殿、精美的铜质建筑构件、规模宏大的秦公陵园，反映了秦统治阶级生活的奢侈，也表明了当时秦国建筑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发达。①

(十二) 福临堡春秋秦墓

该墓位于陕西宝鸡福临堡的东北角。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1 月进行了发掘，共探测出 12 座墓，发掘了其中 10 座。

有随葬品的墓 7 座，墓中随葬的物品多的 12 件、少的 3 件。共出土陶器 39 件、铜器 11 件，还有装饰品如金扣、石珠、铜扣及玉鱼等。另有不少石圭，凡有陶、铜器随葬的墓都有石圭。

从葬俗和出土的器物分析，这批墓葬很可能是春秋时秦国的墓葬，这对研究春秋初叶秦国的物质文化有一定的学术价值。②

(十三) 宋村春秋秦墓

宋村坐落在陕西省户县东南的秦岭脚下，北距沣西西周遗址 15 公里。这里是一个面积很大的仰韶文化、客省庄第二期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和东周相叠压的遗址。范围包括宋村公社的宋村、大良、黄堆等村。东周墓葬多分布在宋村东北一带，1965、1966 年曾发现一批马器和一批春秋前期的青铜器。1974 年对宋村遗址进行了勘查试掘，并发掘了一部分春秋前期秦国墓葬，发现随葬青铜"礼器"和奴隶殉葬。

宋村墓葬的发掘，为研究春秋时期秦国的社会制度和物质文化增加了新的资料。根据出土器物判定，这座墓葬和附葬坑的时代，应在春秋早期。铜礼器的形制和花纹，具有明显的春秋早期特征，有的甚至与西周晚期没什么区别。最能表现墓主人身份地位的是随葬品中的用鼎制度。这座墓出土的五鼎、四簋、二壶、一盘、一匜的铜礼器组合，是卿大夫所享受的礼制。因此，这座墓葬的死者，应是秦国的一个卿大夫。

用人殉葬是奴隶社会中较为流行的一种葬俗，春秋时代仍盛行人殉，宋村秦墓共殉 5 人(主墓 4 人，附葬坑 1 人)，是此前春秋时期已发掘的墓葬中人殉最多的一

① 以上据陕西省雍城考古队:《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2 期。

② 以上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发掘队:《陕西宝鸡福临堡东周墓葬发掘记》,《考古》1963 年第 10 期。

座。殉葬的奴隶有老年、青年和少年，而且是杀殉的。这是对奴隶社会制度的血泪控诉。①

（十四）西高泉村春秋秦墓

陕西宝鸡县杨家沟公社西高泉村南距太公庙村春秋遗址一公里，背临凤翔塬，在渭河以北第二阶台地上。这一带是春秋时期墓葬较为密集的地区。1978 年初，曾在那里发现一座小墓，出土 22 件铜器。随后，又在小墓附近土场上清理了 2 座残墓，出土 33 件陶器。这批文物与同年春天在太公庙村出土的 3 件秦公镈和 5 件秦公钟，同属于春秋早期的遗物。

M2、M3 两墓所出陶器，均系明器。制作精细，纹饰规正，说明，春秋早期秦人对葬礼是比较重视的。②

（十五）景家庄春秋秦墓

该墓葬位于甘肃省灵台县城西北的景家庄，地名叫周家坪。此坪东西约 300 米、南北约 360 米，有多处很丰富的齐家文化和周代文化相叠压的遗址。1977 年 11 月，梁原公社景家庄大队社员在周家坪整修农田时，距地表 1 米深处挖出一堆马骨，并出土有车饰、兵器等铜器，当即报县文化馆，普查发现，这里是一古墓葬区。1978 年 3 月，县文化馆工作人员试掘性的清理了 4 座墓。

此墓葬的发掘，填补了灵台县春秋时期先秦文物的空白，出土礼器的形制、纹饰具有明显的早期特点，有的甚至同西周晚期的差别不大，应为春秋早期秦墓。出土的铜柄铁剑在甘肃省首次发现，铁剑叶焊接于铜格上。叶虽已残缺，但也能反映出当时铁的冶炼和铸造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为进一步研究我国铁器使用的历史提供了实物证据。③

（十六）圆顶山春秋秦墓

圆顶山位于甘肃礼县永兴乡赵坪村西北侧西汉水南岸。其北坡是一片较为平缓、宽广的河谷阶地，这一带往昔即曾多次出土过品位甚高的先秦文物，20 世纪 90 年代，许多古墓惨遭洗劫。1998 年春，又有几座古墓被盗。鉴于这些情况，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指导下，由礼县博物馆进行了两次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 4 座、车马坑 1 座，出土金器、玉器、青铜器、陶器、石器、骨器、贝器等数百件，而以青

---

① 以上据陕西省文管会秦墓发掘组：《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 年第 10 期。

② 以上据宝鸡市博物馆等：《宝鸡县西高泉村春秋秦墓发掘记》，《文物》1980 年第 9 期。

③ 以上据刘得祯等：《甘肃灵台县景家庄春秋墓》，《考古》1981 年第 4 期。

铜器数量最多。

礼县圆顶山秦墓所出土的文物在形饰上有两大特征最引人瞩目。第一是喜欢并擅长在器表上附饰虎、熊、鸟等动物，特别是在盨、方壶、扁体盉以及微型挽车等器物上，显眼部位几乎都有动物在守据，数量之多，令人惊叹。第二是蟠虺纹已在装饰纹样中完全确立了主导地位。蟠虺纹已成为部分鼎的主饰，并与瓦棱纹组合成为篡饰的定式，而且各类器物包括车軎、衡帽、马镳、剑柄等，全是蟠虺纹的天下，许多器物还是通体布饰蟠虺纹，如盏、盘、尊、匜等。从这些较为明显的特征可以推断出该墓属于春秋中期。此墓的发掘，有利于研究春秋时期的墓葬形制及春秋时期青铜器的类型和纹饰。①

（十七）侯马牛村晋国古城东周遗址

山西侯马市位于晋南曲沃盆地，汾、浍二水之间分布着连绵而丰富的东周文化遗址，在侯马镇一带更为密集。据历史文献记载，晋国后期都城"新田"故址就在这里。

自 1956 年侯马建市以后，山西省文管会即设立了侯马工作站。1960 年 4 月省、专区、市联合成立侯马市考古发掘委员会。同年 10 月成立了一支规模较大的考古发掘队。此后到 1961 年 6 月，考古发掘队在牛村古城的南面，发掘东周遗址共 2 300 余平方米，发现了不少遗迹和遗物。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发现的遗物、遗迹，发掘人员将本遗址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相当于春秋后期，晚期相当于战国前期。

在遗址内发现有房屋 17 座，按形制大致分成两类。一种是竖穴式，分为长方形和圆形。面积大小不等，通常在六七平方米。另一种是窑洞式，共发现 3 座。在房子的周围还发现密集的窖穴以及水井、道路、车辙等遗迹，且发现了陶范、铜锭。据此推断，这可能就是当时铜器手工业作坊的一部分。

发掘所获铸造铜器的陶范和其他大批的有关铸铜遗物极为重要，陶范不仅数量多，更主要的是其中有一部分保存得非常完整，成套出现（内外范合在一起），这是研究春秋、战国时代青铜铸造的宝贵资料。同时，这次发掘的遗址正处在牛村古城的南面，这对了解晋国晚期都城"新田"，也是很重要的资料。②

（十八）牛村晋国古城祭祀建筑遗址

1962 年，在山西侯马市牛村的晋国古城南端正中方位南去约 250 米处，发现

---

① 以上据祝中熹：《试论礼县圆顶山秦墓的时代与性质》，《考古与文物》2008 年第 1 期。

② 以上据侯马市考古发掘委员会：《侯马牛村古城南东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2 年第 2 期。

一处晋国祭祀建筑遗址,北距晋国石圭作坊遗址约 100 米。山西省文管会于 1963、1964 年对基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了建筑基址、房基 5 座、墓葬 12 座、祭祀坑 59 座及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

祭祀坑中少数为人、牛、马、羊、猪坑,多数为空坑。空坑估计可能属于肉祭、血祭性质的祭坑。这些祭祀坑绝大多数分布在中心建筑基址南,东、西垣墙基址之间的空地上。

从整个建筑基址的文化层叠压关系可知,建筑基址始建于侯马晋国遗址的中期晚段,而废弃于其晚期早段之前,前后使用约 30—40 年,亦即公元前 450—前 420 年。而侯马晋国遗址牛村古城始建于公元前 6 世纪下半叶,废弃于前 5 世纪下半叶。因此这一建筑基址建废时代相当于牛村古城晚期,是属牛村古城晚期的一处祭祀建筑基址。

1984—1986 年,在西距晋国遗址呈王古城约 1 200 米处,勘探发现并局部发掘一处宗庙建筑基址,其时代为公元前 550—前 480 年。它是属于晋国新田绛都早期的宗庙建筑遗址,而牛村古城南的这处建筑基址可能是属于新田绛都牛村古城晚期的宗庙建筑基址。晋国新田绛都走着一条从初建到发展、消亡的道路。随着新宫寝的造就,宗庙、社稷必然转移,以适应礼制规定城市布局的要求。在这些基址中,既没有发现被火烧、水冲的痕迹,也没有留下任何的木柱、石础等建筑材料。估计这种转移是有计划进行的。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在这种转移和变迁中,看不出严格遵守左祖右社制度的迹象。这也可能是晋国在礼仪制度上的一个特点。①

(十九) 山西侯马晋国盟誓遗址

1965—1966 年,在距侯马牛村晋国古城遗址约 2.5 公里处的秦村西北,发现了一片盟誓遗址。里面有“坎”401 个,绝大多数为长方形竖坑。发掘了其中的 326 个,可知“坎”的大小深浅不一,大者埋牛、马,小者埋羊或盟书。出盟书的坑 40 个,共出土盟书 5 000 余件,其中字迹比较完整清晰的 656 件,每件最少 10 余字,最多达 200 余字,均用毛笔书写,绝大多数为朱色,仅五六片用墨色。书写盟书的玉石片,绝大多数为圭形,少数为璜形、圆形,还有的呈不规则的块状或片状,大概是利用制作玉石器的剩余材料。

盟书的内容可分为五类:宗盟类、委质类、纳室类、诅咒类、卜筮类。

---

① 以上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牛村古城晋国祭祀建筑遗址》,《考古》1988 年第 10 期。

关于盟书所涉及的历史事件，目前学界有不同意见。一般认为，盟书的主盟人“子赵孟”是晋国正卿赵鞅，诛讨的政敌赵尼是邯郸赵午之子赵稷。据《左传》、《史记》记载，公元前 497 年，赵鞅为索取“卫贡五百家”而杀死赵午，赵午族人与范氏、中行氏联合攻打赵鞅，赵鞅失利，避居晋阳，后来得到智、韩、魏三家支持，重返晋都，“盟于公宫”，经过数年讨伐，最后消灭范氏、中行氏。侯马盟书反映的就是这一历史事件，盟誓的时间在公元前 496—489 年之间。[①]

这批重要文物的发现，证明这里正是“晋邦”的宗庙“上宫”所在。文字中“定宫”一词的出现，也进一步证明侯马东周遗址与晋国晚期都城“新田”有着密切的关系。[②]

(二十) 呈王路建筑群遗址

呈王路建筑群遗址，地处山西侯马市铁路以东呈王路中段。西距晋国新田故城遗址中的呈王古城约 1 200 米，南距侯马盟书遗址 1 000 米。遗址中部地势稍高，地形较为平坦。由于城市建设使遗址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遗址现存南北长 400 米、东西宽 300 余米，面积 120 000 平方米。1984 年春至 1986 年 4 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在配合基建工程中，对遗址进行了勘察，先后发现夯土建筑基址 78 处，对其中的 3 处基址进行了发掘。

侯马呈王路建筑群遗址，是一处面积大并由多座建筑组成的建筑群。3 个地点基址的始建与废弃时代大体是一致的。是晋景公迁都新田以后不久始建，延续使用 50—60 年。

综观遗迹布局，与古籍上记述宗庙建筑的形制大体是一致的，这组建筑群应属宗庙性质。

呈王路建筑群遗址西距新田古城遗址中的呈王古城 1 200 米，南距侯马盟誓遗址 1 000 米，西南与 1971 年东距侯马盟誓遗址 500 米发现的煤灰厂祭祀遗址相距 800 米，东南与 1972 年发现的排葬墓地及 1985 年春发现的省建一公司加工厂祭祀遗址相距不到 1 000 米，东与 1957 年发现的北西庄祭祀遗址相距 800 米。以上这些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遗址，共同组成了一个以呈王路建筑群遗址为中心、半径不超过 1 000 米的半圆形的平面布局。根据已掌握的资料得知，这些遗址均与呈

---

① 以上据陶正刚等:《侯马东周盟誓遗址》,《文物》1972 年第 4 期;长甘:《“侯马盟书”丛考》,《文物》1975 年第 5 期。

② 张颔:《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文物》1966 年第 2 期。

王路建筑群遗址的时代相当或相近。可以说它就是这些祭祀活动的中心，也就是祭祀的对象。从建筑群遗址的面积之广、建筑物基址之宏伟壮观程度来看，都较有力地说明呈王路建筑群遗址是属于晋国建都新田时期始建的一处宗庙建筑遗址。它的发现，为证实侯马新田古城为晋国后期都城址提供了新颖的实物资料。它颇具地方特色的建筑技术，也对研究中国建筑史、先秦宫室宗庙制度具有重要意义。①

(二十一) 上马村东周墓葬

上马村位于山西侯马南边。墓葬分布在该村的东、北两面，背水面山，其南 1.5 公里为紫金山，隔浍河距东周“牛村古城”遗址 2 公里。1959 年 4 月，农民在上马村东面偶然发现了十多件铜器。1960 年 4 月，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调查，发现在断崖上暴露出不少墓葬，分布十分稠密，估计墓区面积在 50 万平方米以上。1961 年 12 月，为了解“牛村古城”与上马村墓地的关系，在此进行了历时两个月的发掘工作。

在这些墓中，墓 13 是侯马地区历年来发掘的东周墓葬中规模较大的一个，出土器物也最为丰富。特别是在墓中两件铜鼎上发现有铭文，更是研究这批墓葬年代的重要材料。墓中出土的遗物 360 多件，有大小铜器 180 多件，还有包金器、玉器、骨器、装饰品等与一个陶鬲。还有铜贝、包金贝 1 600 多枚。

据铜鼎上的铭文可知，两件鼎为徐国之器，作器者为徐王之子庚儿，故可名庚儿鼎。作器时代当在春秋中叶前后，它辗转到晋国来的时间约在春秋中叶以后，所以这两件“庚儿鼎”提供了推断墓 13 时代的材料。从伴随这两件“庚儿鼎”同时出土的铜器、陶器来看，墓 13 的时代当在春秋中叶与春秋晚期之际。②

1963 年以后又进行了多次发掘。至 1986 年末，发掘面积已达到 15 万平方米，占墓地总面积的 80%左右。共清理周代墓葬 1 390 余座。③

(二十二) 永乐宫新址春秋晋墓

永乐宫新址墓葬位于山西省芮城城北 2.5 公里龙泉村的东边。新的永乐宫设计在古城南端的中央，全部范围南北长达 400 米、东西宽 200 米。1959 年春，曾于要复建的五大建筑基础下面做了全面的文物钻探，探出古墓、古井、灰坑等 17 处。

---

① 以上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呈王路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 年第 12 期。
② 以上据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墓葬》，《考古》1963 年第 5 期。
③ 以上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侯马上马墓地发掘简报(1963—1986)》，《文物》1989 年第 6 期。

根据钻探结果，先后在重阳殿、纯阳殿、三清殿3座建筑的下面清理了春秋中、晚期墓10座、明代墓1座、古井3眼、灰坑3处。

这批墓葬的墓室不大，随葬物也不多。除4、9两座没有随葬物外，其余多者出13件，少者1件，总共42件。其中，陶器共17件，石、骨器共25件。灰坑中圆形坑1个、长方形坑2个。1号坑内埋置人骨7具，死者都是被砍掉头后推入的。

该墓葬的发掘对于研究春秋中、晚期的墓葬形制及社会生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①

（二十三）山西芮城春秋战国墓

1962年秋，芮城县岭底乡坛道村村民在挖掘窑洞时，掘出一批铜器和一具人体骨架。坛道村位于芮城县东北，距县城约30公里，地处中条山阳坡，村西有一条深沟，铜器即出于深沟东沿的一座古墓（编为1号墓）。在距沟边百米许的梯形台地上，有一座竖穴墓，当地农民挖土垫厩时已将墓穴填土挖掉一半。考古人员也发掘清理了这座墓（编为2号墓）。

从出土铜器看，1号墓的时代应在春秋早期、中期。从随葬有三鼎、五簋、二壶、一盘等看，墓主身份当属士大夫阶层。

2号墓的时代应为战国早期，当时芮城属魏地，故此墓当为魏国墓。②

（二十四）金胜村251号春秋晋墓

1987年7月，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南15公里的太原第一热电厂进行第五期扩建工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组成电厂考古队，在扩建区内配合扩建工程进行考古发掘。11月发现了251号春秋大墓及车马坑。1988年3月20日至6月5日进行了墓葬发掘，6月20日至9月25日清理了车马坑。

251号春秋大墓东距金胜村300米，东南距东周晋阳古城3公里（晋阳古城的中心即古城营村）。在以此墓为中心的南北长10余公里、东西宽2—3公里的范围内，是一处时间延续很长的古墓地。从目前已掌握的考古资料看，最早的墓葬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晚的至北宋初年。结合史籍记载来看，这处墓地的使用时间早于晋阳城的始建年代，其后同晋阳古城的发展、兴盛与毁灭时间相一致。

251号大墓的随葬品相当丰富，据初步统计共有3 134件，按其质地可分为青铜、黄金、玉石、骨器、陶器和蚌贝6大类。

---

① 以上据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西芮城永乐宫新址墓葬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8期。

② 以上据邓林秀：《山西芮城东周墓》，《文物》1987年第12期。

车马坑位于251号大墓的东北侧，坑西南角与大墓东北角直线距离仅7.5米，是为大墓的陪葬无疑。总计葬马44匹。车坑中现存13辆木车分南北两列，排列整齐。鉴于大墓未发现文字材料，从车马坑的规模可知墓主的身份至少应为卿或上大夫。曲尺形的车马坑，似乎是晋文化的一种独特的制度。这批车辆数量可观，形制多样而且保存较好，为考察东周车制和制造技术提供了珍贵的标本。

从出土青铜礼器的组合、形制、纹饰等方面来看，此墓的年代应在春秋晚期，车马坑的形制和车的形态也属同一时代。从文化属性上说，主要是周文化，但也明显受到了北方青铜文化的影响和渗透。①

(二十五) 碧沙岗春秋遗址

碧沙岗在河南郑州西十里铺村的西南，是一个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400米、高约5米的土岗。1954年冬，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派人前往勘探，1955年2月1日至4月8日、5月25日至6月8日，两次进行勘探和发掘，清理灰坑45个、墓葬149座，其余尚有已探出未清理的墓25座。在已清理的149座墓中，除4座为唐、宋墓以外，其余145座墓葬与遗址都属春秋时代。

灰层和灰坑出土的遗物中，有石器、骨器、铜器、陶器、兽骨等。各墓出土的随葬器物中，有陶器、铜器、骨贝器、玉石器等。

从各种情况综合考察，碧沙岗的甲组陶器墓可以初步认为是从战国早期一直上溯到春秋时代。当时的生产活动以农业为主，畜牧次之，渔猎又次之。石器、蚌制的镰、锯发现不少，这种从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中就被广泛采用的农业生产工具，这时还被沿用着，可见当时当地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迟缓的。

碧沙岗89座用陶器随葬的墓中，甲组、丙组占87座，这些墓都是用一件或数件日常使用的器物来随葬的，不论从数量上、质量上都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悬殊，这些墓的主人生前可能是一些"庶民"。乙组陶器是仿青铜礼器制成的，不是日常生活上必需的实用器物，用这组陶器随葬的两座墓的主人，生前可能是属于曾经享用或希望享用这类铜器的贵族。至于40座无随葬物的墓葬，这些墓主人大概是最下等的人或者是奴隶。②

---

① 以上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大墓及车马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9期。本文执笔人之一渠川福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将251号大墓年代定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即公元前550—前380年之间比较合适。见其《太原金胜村大墓年代的推定》,《文物》1989年第9期。

② 以上据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碧沙岗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3期。

(二十六) 蔡侯墓

蔡侯墓位于安徽寿县西门内偏北处。1955年5月对其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青铜器。如鼎就有三种形式。若干种铜器都有附属之件，如鼎、鬲之有匕，刀之有砺。若干种铜器的铭文都有器物的自名。若干铜器铭文中涉及蔡国与吴、楚两国的关涉。若干种铜器铭文表明，器物都是同一个蔡侯所作，可以确定为同一时代所铸的。

从铭文、地理、历史、器物的形制花纹和功用组合等方面分析，此墓所出铜器群的年代，大部分是公元前518—前491年间蔡昭侯所作之器。它们的出土，使铜器断代学增加了两大群分划东周的春秋与战国的标准铜器。把它们和同时的、或较早的、或较后的其他各地各国出土铜器相比较，可见凡时代相近的铜器，其形制、花纹、字体、制作技术有其共同性或互相影响之处，地方性的差别是不大的。①

(二十七) 戚家墩遗址

戚家墩遗址最初发现于1935年，是上海地区最早发现的一处古代遗址。它位于市区西南金山县山阳公社的海滨。这里有一道防御潮汛的海塘，上面是沪杭公路，遗址则分布于海塘的内外两侧。为进一步了解该遗址的内涵以及采取保护措施，1963年2月8—28日和1964年5月15—30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曾两次对它进行了发掘。结果表明，这一地区的上层文化遗存是西汉时期的，下层文化遗存大致在春秋战国时期。

在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层，发现圆形和椭圆形两种灰坑4座、墓葬5座，都已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遗物有陶器、釉陶、青铜器三类。陶器和釉陶以几何印纹硬陶的数量较多。

在整个遗址中，所出土的几何印纹硬陶都叠压在西汉文化层下面，而西汉文化层中未见这类陶器。这一发现，对研究杭州湾地区几何印纹硬陶的发展序列及其下限年代，又增添了一批新材料。②

(二十八) 春秋齐故城5号墓

齐故城大型殉马墓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国故城大城的东北部，河崖头村西头。在村内及村西，初步探出了20余座大中型墓，表明这里是齐故城内的一

---

① 以上据宋曼：《蔡侯墓出土青铜器的保护》，《中国博物馆》1984年第1期；陈梦家：《寿县蔡侯墓铜器》，《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② 以上据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金山县戚家墩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1期。

处贵族墓地。自1964年冬至1976年，在墓地的西部先后发掘了5座大墓，其中5号墓虽然已遭盗掘，随葬品荡然无存，但由于它具有独特的结构和特大规模的殉马坑，仍不失为一座有重要考古价值的墓葬。

5号墓的规模在此前已发掘的春秋大墓中是罕见的。此墓现存墓室的面积达614平方米，估计原墓室面积比现在还要大。夯筑墓室的夯土范围加上殉坑，占地面积可达三四千平方米。曲尺形的殉马坑全长215米，从已揭露部分的殉马密度看，平均一米地段2.8匹左右，全部殉马可达600匹以上。600匹马可以装备兵车150乘。如此罕见的墓葬，推想只有国君才可以办到。从春秋晚期的齐侯情况看，客观条件和统治者个人的好尚都表明，5号墓及大型殉马坑最可能是属于齐景公的。①

（二十九）春秋哀成叔墓

1966年5月，洛阳博物馆配合洛阳玻璃厂的基建工程，发掘清理了10余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葬，其中439号墓出土一套青铜器较为重要。

439号墓位于洛阳玻璃厂的东南部，西距东周王城约1公里。随葬青铜器物都在棺椁之间，计有鼎、豆等各一件，其中铜鼎腹内壁有铭文8行54字，铜豆盘内底部有铭文5字。从这些出土器物及铭文看，此墓应属于春秋晚期，墓主为哀成叔。②

（三十）春秋疃伯墓

1975年5月，在河南洛阳的汉代河南县城的东北角、北距洛阳东周王城遗址的北城墙约1公里的地方，清理了一座春秋墓葬，出土器物十分丰富，计有铜器、玉器、铅器及海贝等共60余件。其中铜方簋，造型新颖，制作精致，是以往青铜器中还未曾见的佳品。

从随葬器物情况看，此墓应为春秋晚期。根据埋鼎数字和墓葬埋葬规模与出土的铜壶铭文，可知此墓的墓主为"疃伯"，其身份是地位比较高的贵族。③

（三十一）东周王城第5239号大墓

该墓位于东周王城的东南部。1995年12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为配合洛阳市公安局第5号宿舍楼的基建工程，清理了这座墓葬。

---

① 以上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齐故城五号东周墓及大型殉马坑的发掘》，《文物》1984年第9期。

② 以上据洛阳博物馆：《洛阳哀成叔墓清理简报》，《文物》1981年第7期。

③ 以上据洛阳博物馆：《河南洛阳春秋墓》，《考古》1981年第1期。

清理时，共发现6个盗洞穿入墓内，墓底已遭严重盗劫。共清理出土随葬品126件。

此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区发掘的较大的一座东周墓葬，且形制特殊。从随葬器物看来，其年代约当春秋晚期。据其形制规模和随葬铜贝、车马器、镂空铜器、金箔残片等推定，应属王室贵族的墓地。

这也说明，东周王城东南部也是东周王城内王陵的一个分布区。①

(三十二) 大店春秋莒国殉人墓

大店镇位于山东莒南县城南。1975年春，大店公社老龙腰大队和花园大队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发现了这两座莒国殉人墓，同年6、7月间发掘。

1号墓葬10个殉人放置于墓主人椁外的东、北、西三侧，都有简单的木棺，但均腐朽塌毁。这些殉人可能是墓主人生前较为接近的侍从或家内奴婢。因早年被盗，现出土陶器37件、铜器107件、骨贝117枚。

2号墓殉葬10人，也有简单木棺，分置于墓主人周围，并在一个水平面上。因早年被盗，现存陶器58件、铜器及其他共32件、玛瑙珠15颗、绿松石珠271颗。

1号墓的墓葬形制与2号墓基本相似，但未见腰坑，表明1号墓晚于2号墓。

莒国殉人墓的发掘，为研究春秋时期的阶级关系及古代莒国的历史文化，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②

(三十三) 刘家店子春秋莒国墓

刘家店子位于山东沂水县城西南。1977年冬，沂水县院东头公社刘家店子大队在村西一块高地取土时，发现一南一北两座墓葬和一座车马坑，出土了一批青铜器、乐器和车马器。翌年2月，山东省博物馆会同沂水县图书馆对墓葬和车马坑进行了清理。

1号墓葬具为两椁一棺。墓内发现有数量较多的殉人。其中有薄棺作葬具者1人。在南器物库盖之上的填土中，发现三层殉人，大约有35—39个，皆东西排放，相互叠压，无一定葬式。墓内出土铜器、陶器、金器、玉石器等470余件。金器4件，其中金剑柄1件。

2号墓在1号墓南8.7米处，其东壁同在一条直线上。随葬器物全被群众

① 以上据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周王城第5239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4期。
② 以上据山东省博物馆等：《莒南大店春秋时期莒国殉人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挖出。

车马坑位于1号墓西侧20米处，大部分被破坏。坑内殉马4匹。并出土一大批车马器。车马坑出土的鬲，形制与1号墓的鬲相同。车马坑位置偏向1号墓，故车马当是1号墓主的殉葬物。

1号墓出土的一对黄大(太)子伯克盆，与传世的黄太子伯克盘当为一人所作。从盆的形制看来，这里提到的"黄"当系河南、潢川之黄国。该国于公元前648年为楚所灭。1号墓的平盖鼎、盘、舟、剑、戈多饰垂鳞纹、蟠螭纹，这些纹饰盛行于春秋中期。

2号墓从出土器物的形制、纹饰看，年代略晚于1号墓，但相去不远，估计亦属春秋中期或春秋中期后段。

1975年，山东省博物馆在莒南大店清理了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墓葬各一座，大店2号墓出土"莒平钟"一组，该墓当是莒墓无疑。刘家店子1、2号墓与莒南大店两座墓葬的形制、葬俗都较近似。刘家店子1号墓中还出土了莒公戈。由此可见，刘家店子墓葬可能是莒国墓。从用鼎制度分析，1号墓的墓主似应是莒国国君，2号墓主应是1号墓主的妻子，即莒国国君的夫人。但从地望看，莒侯死后埋葬到远离国都的边鄙，令人很难理解。因此，墓主也可能是密邑的封君。春秋时期，礼制受到破坏，大夫僭用诸侯之礼已不鲜见。

刘家店子1号墓内同时出土了黄大(太)子伯克盆、陈大丧史铃钟。黄、陈两国远在河南，国小力弱，与莒国间隔其他诸侯国，势力难于到达此地。故陈、黄两器可能是通过战争、盟会、婚姻或馈赠的途径而来的。①

(三十四) 春秋薛国故城

薛国故城位于山东省滕州市城南。滕州东部为沂蒙山余脉，中部为丘陵地带，西部为平原。薛国故城即位于平原地区的东南边缘，东去2公里即为山冈。1978年10—12月，对薛国故城址进行了调查钻探，测绘出城址平面图，并在尤楼村东的2号墓地发掘9座周代墓葬。

薛国故城四面墙体完整，据实测，城墙总周长10 610米，四面城墙长度分别为：东墙2 280米，南墙3 050米，西墙2 030米，北墙3 250米。城墙外四面有城壕。城壕距城墙30米左右，一般宽25—30米。关于薛城城墙的构筑年代，通过在

① 以上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9期。

东墙南段的8号豁口处试掘,可以确定该段城墙可早到东周。结合文献记载,该城当即《春秋》鲁定公三年(公元前507年)所记薛国都城之一。

在故城内发现有3处墓地(编号M1—3),集中于城东部。

M3出土的薛侯行壶的时代为春秋早期,这和春秋早期文献所载薛称侯相合。至于薛在春秋后期称伯,这次发掘亦获佐证。M2出土之铜戈铭文"薛"字下疑为"比"字,虽无爵位,但文献记载中曾见有"薛伯比"。如果说M2的墓主人就是当时那个为国人所弑的薛比,那么也就证明春秋后期薛曾称"伯"。结合文献记载,可以认为,薛国初封应为"侯",春秋庄公后被黜为"伯",有时又称"子"。春秋晚期,王室衰微,列国纷纷僭号,薛又偶称"公"。

M1出土的一件铜簠内排放着满满一盒三角形食物,状似水饺。食物虽已炭化,但当用竹签轻轻拨动时,发现三角形食物内包有屑状馅。经观察,发掘者认为这些三角形食物,当即中国传统的美食水饺或早期馄饨。这要比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唐代墓中出土的水饺实物早近1 500年。春秋时期的水饺在东夷地区薛国墓葬中的发现,说明这种作为中国饮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美食,很可能最早源于我国古代的东夷地区。

M2出土了一套最为齐全的春秋时期的书刻工具,这是以前没有发现的。这套书刻工具计30件,其中有铜斧1件、锛2件、削刀7件、刻刀4件、凿4件、刻针4件、锯2件、钻2件以及磨石4件。估计原有毛笔,可能已朽毁。这套书刻工具,包括了从破竹、修正到刻字、改错组装以及磨砺利器的所有工具,为研究春秋时代的书刻用具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实物资料。而据观察可知,刻刀、刻针等为锻制,且刻针的尖部呈蓝灰色,似经淬火工艺处理,这又为研究春秋时代的铜器加工工艺提供了重要资料。①

(三十五)柳格庄墓群

柳格庄位于山东省蓬莱县南45公里。这里处于河谷黄土台地,墓群在村西北。20世纪60年代以来,因农田水利建设,连续发现古墓葬,烟台市文管会曾于1976、1977、1984年进行过清理。发现的春秋墓共有6座(M2、M4、M6、M7、M8、M9)、车马坑1座。

墓葬中随葬器物主要有铜器、陶器、石器、玉器。在这些随葬器物中,铜器和大

---

① 以上据山东省济宁市文物管理局:《薛国故城勘查和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1年第4期。

部分陶器的风格都与中原地区基本一致，但是 M4、M6 中的陶鼎等则又明显属于胶东地方特征，可以认为，这是西部地区外来文化与胶东土著文化相融合的表现。墓群的时代，自西周晚期始，延至战国，以春秋早、中期的墓葬数量最多、规格最高。一些大墓不但有数量较多的礼乐器，而且还有殉人，标志着这里的先秦文化，此时已达到繁盛阶段，同时也说明，胶东作为远离周代文明中心的海角之地，在政治文化上有一定的落后性。

柳格庄墓葬，是黄水河上游河谷地带众多古墓群的一处。考古发掘表明，柳格庄一带南北约 10 公里的黄水河谷，广泛分布着西周至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且其规格较高，可能代表着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胶东古国。柳格庄墓群的清理为揭开这个历史之谜提供了可靠的线索。①

(三十六) 春秋樊君墓

1978 年 2 月，在河南信阳市五星公社平西大队南山咀台地顶部出土铜盘、铜匜各一件。经有关部门调查，发现两座古代墓葬，并进行了发掘清理。

这两座墓出土的铜器与上村岭虢国墓地的铜器颇为相似。但是，出土的高裆陶鬲、卷尾鋬式陶盉和三系陶瓿等，却具有浓厚的南方特色，为北方周墓中所罕见。

M1 随葬铜器的铭文中皆有“樊夫人”，一处铭文中有“樊君夔”。M2 随葬的 15 件铜器全无铭文，其中铜锛、铜削和铜刻刀器是男子通常使用的工具。因此，M2 可能是樊君墓。由于 M2 的南壁破坏了 M1 的北壁，证明 M1 埋葬的年代早于 M2。

据史料记载，有宗周之樊，成周之阳樊，湖北之樊。宗周之樊应在今陕西境内，与此二墓无关。成周之阳樊，地近洛阳。樊君夔夫妇墓在今信阳市，地近湖北襄阳之樊，从出土器物推断樊君夔，当属襄阳之樊。樊灭于楚，在春秋之前。楚国的势力到达信阳一带，是春秋早期的事。所以，樊君夔夫妇的墓葬年代也应为春秋早期至中期。②

(三十七) 河南温县晋国盟誓遗址

1979 年，在河南温县武德镇西张计村发现春秋后期晋国盟誓遗址，具体位置在温县城东北 12.5 公里的沁河南岸，春秋州城遗址东墙、北墙的外侧，原来是一处面积约 7 000 平方米的土台。在调查中得知，1950 年以前曾多次出土而已流散的

① 以上据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蓬莱县柳格庄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90 年第 9 期。
② 以上据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信阳市平桥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 1 期。

沁阳盟书,就是这处遗址出土的(武德镇原属沁阳县)。

1980—1982 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发掘区共发现坎 124 个,有 16 个坎出土书写盟辞的石片,共约万余片,有的坎仅见玉璧、玉兽等玉器,有 35 个坎出土羊骨架。

盟书文字系用毛笔墨书,字体风格迥异,显系出自多人之手。盟辞的内容大体相近,都是要求参加盟誓的人效忠主君,不得参与乱臣一伙,否则晋国先公在天之灵就会灭其氏族。

在这些盟书中,有许多盟辞首句记有明确的同一年、月、日时间,经考证,为晋定公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公元前 497 年 1 月 16 日,主盟者为州城所属的晋国卿大夫韩简子。

温县盟誓遗址的发掘,丰富了人们对春秋时期盛行的盟誓制度的认识,为研究春秋时期的历史以及古文字、书法艺术提供了新的重要的实物资料。另外,温县盟书的内容和体例与侯马盟书有许多相似之处,并记有相同的人名,两者时间也大体一致。因此,温县盟书的发现,也为侯马盟书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①

(三十八) 程桥吴国墓

程桥镇在江苏六合县西南约 10 公里。墓地在程桥镇东 1 公里的程桥中学内,南距滁河 100 米,附近有薛山、羊角山、郁云乌龟山等湖熟文化遗址。1964 年 6 月 24 日,该校师生在学校东北隅开塘时挖出马衔、管状车饰、剑、锛等青铜器。7 月 18—28 日,考古人员进行了发掘工作。

此前,江苏地区东周时期的墓葬,发现还是不多的。六合程桥的东周墓,出土遗物达 60 余件,尤其是有铭编钟的出土,是江苏境内的一次比较重要的发现,为研究江苏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查料。根据编钟铭文和其他器物的总貌可知,此墓的时代大体相当于春秋末期,约公元前 500 年;不但编钟为吴国人所制造,此墓也是在当时吴国境内,为吴国一位贵族的墓葬。而铜器浅刻画纹则表明,在青铜器上刻画图案至少是在春秋末期就开始出现了,而且在地区上、国别间也反映出某些差异。②

(三十九) 和仁东周墓

和仁在江苏六合县东北的丘陵山区。1973 年 8 月,当地社员在一座名叫老虎

---

① 以上据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一号坎发掘简报》,《文物》1983 年第 3 期。

② 以上据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考古》1965 年第 3 期。

洼的土岗的东南斜坡上，发现一些青铜器。9月3—7日进行了发掘，又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和陶器。

出土文物可分为铜器和陶器两类，其形制与六合县境内已发现的两座东周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形制基本一致。因此，它们的时代应该相同，大体处于春秋晚期到战国初期。而这批文物既有吴越风格，又具楚国特征，证明这里当时所处环境是与历史记载相符合的，丰富了对这个地区春秋战国之际文物的认识。①

（四十）何山春秋吴国墓

1980年7月6日，江苏吴县枫桥公社水泥厂职工在何山取土时，挖出了一批青铜器和陶器。枫桥何山位于苏州城西，是古墓葬较多的地方。后进行了发掘。

出土遗物有青铜器、陶器和原始瓷器，共35件。其中，青铜盉肩部有篆书铭文一行八字："楚叔之孙途为之盉"。

枫桥何山古墓出土的铜器明显地包括两种不同风格。其中一部分器物，制作精细，应该是春秋晚期的楚器；另一部分器物，制作简单而朴质，具有明显的吴越地区风格。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伍员率兵攻入楚之郢都。因此，此墓出土的楚国铜器，很可能是吴人掠回的战利品，赐给攻楚的功臣，死后随葬的。墓主人可能是这次攻楚有功之人。墓葬的年代，估计应在周敬王十四年吴楚战争结束后或稍晚。

盉上铭文"楚叔之孙途"，"途"当为人名，文献中未见记载，但根据李零等对"楚叔之孙倗"的考证，认为倗应该是薳子冯。"楚叔之孙途"也应该是与楚王族同出，并可能与薳子冯有亲属关系。②

（四十一）北山顶春秋吴国墓

该墓葬位于江苏省丹徒县北山的顶部，海拔81.6米。1984年5月，南京博物院负责发掘此墓。

整个墓葬，主要有四个特点：第一，该墓葬不仅模仿中原的大型墓葬，又保留了长江下游土墩墓的一些特征。第二，随葬品全部为实用器，而放置的位置则是象征性的，最明显的是墓道中随葬有车马器，表明死者生前是拥有车马的。从数量上来看，应为3车7马。并有兵器、乐器。表示死者生前拥有武装和钟磬。第三，从墓

---

① 以上据吴山菁：《江苏六合县和仁东周墓》，《考古》1977年第5期。
② 以上据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县何山东周墓》，《文物》1984年第5期。

葬的整个布局来看，有的合乎周礼，有的亦有僭越。第四，墓葬中用人殉和人祭。在中原地区，商代至西周早期的大型墓葬中用人殉和人祭是屡见不鲜的，然西周以后，则很少用生人殉葬。但吴国直至吴王阖闾，仍用生人为殉。用生人殉葬是春秋时期吴国大型墓葬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随葬器物中，此墓出土的3件青铜錞于在吴国墓葬中是第一次出土，也为中国最早的有盘虎钮錞于。而且一墓中随葬3件，在春秋时期的大型墓葬中亦不多见，与之时代相近的蔡侯墓，随葬青铜鼎19件，但錞于仅1件。由于这套錞于和丁宁、悬鼓、桴以及钮钟、镈钟等同时出土，与《国语》所载吴王所用的一套军乐器基本相符，使历史文献得到印证。

鸠杖在吴国墓葬中也是第一次出土。鸠杖应为权力杖，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它的出土，表明墓主生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关于吴人断发文身的形象有了实物呈现。出土的青铜鸠杖镦和悬鼓环上5个跪坐的人，是第一次呈现吴人"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和"以椎髻为俗"的实物形象。即裸体，髡顶，前有短发，散披于额前和耳上，脑后盘有双髻，中有发辫，脑部、背部、臀部、股部皆文图案花纹，文身而不文面，亦不文臂部、胫部及手足。《左传》和《史记》等所云吴人断发文身，实指吴人的正面形象，而断发文身，脑后有椎髻，才是吴人的完整形象。

随葬的青铜器中，除徐国向吴国馈赠的徐国器物外，余皆为吴器。此墓出土的带有铭文的尸祭缶盖和余昧矛，是在吴国疆域内出土的人名确凿的吴王之器。尸祭即夷祭，有些资料或作余祭、余蔡；余昧，或作夷末、夷昧。夷亦作余，可证夷祭即余祭。余祭为吴王寿梦次子，余昧为寿梦三子，先后为吴王。余祭器和余昧器皆属首次发现，从而补齐了春秋时期铜器铭文中从去齐至夫差这一段吴王世系。

但缶盖上"尸祭"二字被铲，说明此器已经易主，由此可知此墓墓主不可能为余祭。综合其他各种资料，推断此墓主可能为吴王余昧。根据碳十四测定，此墓的相对年代可定为春秋晚期。根据史书记载，吴王余昧卒年是鲁昭公十五年，即公元前527年。如墓主推断为吴王余昧可以得到确认的话，墓葬的绝对年代应为公元前527年或稍后。①

① 以上据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

(四十二) 侯古堆1号吴国墓

侯古堆一号墓位于河南省固始县城东南2公里的土岗上。1978年3月,河南固始城关镇砖瓦厂发现一座陪葬坑,出土一大批精美的青铜器和漆木器,其中青铜礼器有九鼎、九钟、八镈、二黄、二壶、二方豆及铜垂、铜禿、铜三足壶各1件。漆雕木瑟、木鼓、鼗鼓、彩绘盘龙色彩鲜艳,其中三架肩舆为首次发现。编钟的纽钟和镈钟上铸有"鄱子成周"铭文。1979年5月,发掘了1号主墓,根据棺内头骨和盆骨鉴定,系30岁左右的女性。四周陪葬17具男女奴婢棺木。主墓除出土部分铜器和玉器外,头厢放置的31件陶瓷器具有浓厚的吴文化特色。根据所发掘的青铜器铭文,考证出墓主人为吴王夫差做太子时的夫人,宋景公的妹妹。

侯古堆大墓中至少糅合了吴、楚、宋三国的文化因素,表现出墓葬文化内涵的复杂性,这正是春秋晚期各诸侯国之间关系复杂性的表现。这些出土器物,对于全面了解吴文化的面貌,探讨吴国建立和发展的历史,探讨当时各诸侯国之间关系,都是十分重要的。①

(四十三) 春秋曾国墓

1979年4月,湖北随县城郊公社八一大队第一生产队社员,在挖水沟时挖出了鼎、簠、甗、编钟、戈、马衔等铜器37件。经调查,断定该处是一座古代墓葬。墓葬位于义地岗南部的一个小土包——季氏梁,西距县城约1.5千米。随后进行了发掘,出土随葬器物44件:铜器有鼎1件、簠2件,其中一件器底内有铭文6行23字,可知为陈国之物;甗1件、编钟5件、戈2件,内部均有铭文,知为周王之孙、曾国季怠所用。

1980年5月,在距季氏梁约500米处的八角楼又出土了青铜器十多件,从其形制、纹饰风格来看,应为春秋早期器物。季氏梁墓出土器物,其形制风格与八角楼相比较,除钮钟相似外,其余皆偏晚,与确切年代可考的战国早期墓葬——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所出同类器物相比,又偏早,大多具有春秋中期的特点,未见春秋晚期及其以后的器物。因此,季氏梁墓葬的年代应为春秋中期。②

(四十四) 江西贵溪崖墓

贵溪崖墓群是1978年在文物调查过程中发现的,1979年秋冬进行了发掘工作。共清理墓葬14座。

① 以上据欧潭生:《固始侯古堆吴太子夫差夫人墓的吴文化因素》,《中原文物》1991年第4期。

② 以上据随县博物馆:《湖北随县城郊发现春秋墓葬和铜器》,《文物》1980年第1期。

出土遗物不甚丰富，共 220 件，计陶器 75 件、原始青瓷器 49 件、竹木器 56 件、纺织器材 36 件、其他 4 件。陶瓷器肩部、上腹部和底部的符号和文字，是在胎上刻划的。共发现 6 种文字或符号。这些符号代表何种意思，尚待进一步探讨。但为分析这批墓葬的时代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根据上述特点及对出土木材的碳十四测定，贵溪崖墓的年代当属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贵溪县在唐代以前属于余干县所辖，在"干越"族活动的范围之内，因此，贵溪崖墓所反映的文化特征、生活习俗等，与"干越"族有着密切的关系，或是它的组成部分，或为同一祖先的民族。

已发掘的 14 座崖墓，4 座为单葬，2 座不明，其余 8 座均为双葬或群葬。骨骼鉴定的资料表明，这些墓葬混杂，既有同性，也有异性共葬，既有中年、青年，也有老人和儿童共葬一穴。这表明，氏族社会同族同葬的习俗，在这个地区（或民族）仍留存下来。

出土纺织器材多，足以证明这支民族主要从事家庭手工业活动。这次发掘的 14 座墓，有 8 座墓出土了纺织器材，据 6 座墓的骨骼鉴定，M2、M10、M11、M13 4 座墓全为不同年龄的男性，由此证明，当时不仅仅是妇女，而且更多的男人也从事家庭纺织劳动。

目前，中国出土的纺织器材，最早的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或墓葬中的各式陶纺轮；随后又有木拈杆、铜拈杆以至铁拈杆与纺轮一并出土。云南晋宁石寨山遗址出土的一件器盖上，雕塑着原始织机图像。东汉画像石上，亦曾刻有织机的图案，这些，都仅是织机的一副雏形，而机内部件则模糊不清。贵溪崖墓出土的纺织器材，不仅数量较多、品种较全，而且都是实用原物，其中有目前最早的印花织物。这是不可多得的收获，为中国古代纺织科学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见于实物的古琴，有长沙马王墓堆 3 号墓出土的七弦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两件木琴，一为五弦，一为十弦，琴身都比较短小。而贵溪崖墓出土的两件木琴，不仅时代比较早，而且琴身长，琴弦也多（13 根）。无疑，它对中国古代弦乐器的研究，也是可贵的实物资料。

总之，贵溪崖墓所获得的资料揭示了春秋战国之际武夷山地区古越族的历史侧面，这是值得历史研究者注意的。①

---

① 以上据江西省历史博物馆等：《江西贵溪崖墓发掘报告》，《文物》1980 年第 11 期。

(四十五) 春秋徐国铜器

1979 年 4 月,江西省靖安县水口公社水口大队李家生产队的兴山南坡旁,出土青铜器 3 件。经调查和清理现场,证实 3 件铜器出于一处窖藏,为春秋晚期的徐国遗物。

其中,盥盘盘内底部正中央有两行铭文,证明了此乃徐王义(仪)楚自作盥盘。

卢(炉)盘盘内底部中央,铭文 18 字。就铭文字体和含义考察,其年代还可能稍早于义楚盥盘。

料,大概与炉盘同时所造。

以上 3 器同属徐器,其中 2 件带铭文,提到了徐国和徐王义楚。江西是出土徐国铜器的省份之一,郭沫若曾推定徐人是被周人逼迫而迁来江西西北部的。靖安这批徐器的出土,进一步证实了郭沫若的推论,也使徐国及春秋诸国的历史得到更为翔实的补充。①

(四十六) 檀树咀春秋遗址

檀树咀遗址位于江西瑞昌市西北夏畈乡檀树咀村西南部山坡上。1992 年底发现,1999 年 3—5 月正式发掘。

属于春秋的遗迹有 2 座灰坑、1 座墓葬。出土含米字纹、回字对角填线纹等陶片,少量石器。

檀树咀春秋遗址所出罐类器中的束颈、广肩罐为江西春秋时期罐的一大特色,米字纹、蕉叶纹、回字对角填线纹都是江西地区春秋时期的典型纹饰。②

(四十七) 九里墩春秋舒国墓

九里墩春秋墓位于安徽省舒城县城东 4 公里。1980 年 9 月,舒城县孔集公社九里墩大队窑厂在烧砖瓦取土时发现一座古墓。安徽省文物工作队与舒城县文物组清理了这座墓葬。

出土青铜器有 170 余件、其他器 75 件和绿松石串珠 500 余颗。在出土的乐器中,鼓座 1 件,造型奇特,安徽过去出土的楚器和蔡器中都不曾见过。根据器物上的铭文,自铭“建鼓”,故定名为“建鼓座”。

此墓曾经过两次盗掘,但仍清理出大型甬钟、鼓座等青铜器百余件,说明当时随葬品极为丰富,从清理出的残器看来,墓主人的身份至少属于侯王一类的贵族阶

---

① 以上据江西省历史博物馆等:《江西靖安出土春秋徐国铜器》,《文物》1980 年第 8 期。

② 以上据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瑞昌市檀树咀商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 年第 12 期。

层。此墓葬的形制和出土器物的特征都与安徽寿县蔡侯墓基本相似，尤其是墓中出土的一件蔡戟，戈体上的铭文与蔡侯墓出土器物上的铭文字体完全一样，蔡字的写法也完全相同。多数学者认为，蔡侯墓是蔡昭侯之墓，属春秋晚期，因此，此墓的时代也应是春秋晚期。

在建鼓座的外围上下的铭文，由于字迹浮浅、锈蚀严重，大部分模糊不清，全铭难以通读，只能知道此墓为春秋时期舒国所属，墓主很可能是舒国中某一君主。

此墓出土的青铜器造型优美，制作精细，是继寿县蔡侯墓之后又一次重要发现。而两地出土器物的特征又基本相似，反映了春秋末期舒、蔡两国之间在文化上的互相影响，为研究这一时期舒国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①

（四十八）春秋黄国黄君孟夫妇墓

该墓位于河南光山县城西北宝相寺北侧。春秋黄国故城就在这座墓东北 20 公里处。1983 年 4 月，宝相寺上官岗砖瓦厂在动土中发现该墓，附近农民将该墓葬靠北的一座木椁（编号 G1）破坏，并将随葬器物取出。后在主管部门调查下，发现 G1 的南边还有一个椁室（编号 G2）。当月 28 日，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G2 包含二椁一棺。墓主人和棺内殉葬品都被淤泥覆盖。墓主人骨骼完整，系 40 岁左右的女性。墓主人的头发保存完好，梳偏左高髻，发髻上插着两个木笄，其中一个木笄有玉堵。

G1 出土的铜器中，有 11 件铸有“黄君孟”铭文，因此，可以确定死者为黄君孟。

G2 出土的铜器中，有 14 件铸有“黄子作黄夫人孟姬”铭文，因此，可确定死者为黄夫人孟姬。由此可知，这是一座黄君及其夫人的合墓葬。

黄国是周代嬴姓国，楚人灭黄在公元前 648 年。因此，黄君孟夫妇合葬墓的年代下限是公元前 648 年。

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青铜器，全部是紫铜色，与过去发现的春秋早期青绿色铜器截然不同。而且，器壁较薄，轻巧美观，特别是黄夫人孟姬墓的薄铜刀和薄如纸片的铜盒，更是以前所没有的。可以说，春秋中叶以后，铜器铸造的实用作风，已经在黄君孟夫妇墓中有所表现。

发掘者认为，黄君孟夫妇墓的年代上限距离下限（公元前 648 年）不会太远。这样，作为春秋早期晚段的标准器群，黄君孟夫妇墓为我们提供了大批铜器、玉器、

---

① 以上据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考古学报》1982 年第 2 期。

漆木器和丝织品等珍贵的实物资料。

黄夫人孟姬墓出土的紫色绣绢和“绢纺”织物，是中国纺织史研究中极为珍贵的标本。紫绢，史称“齐紫”，“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而且“齐冠带衣履天下”。当时，黄国依靠齐国对抗楚国，因此，黄夫人孟姬身穿的紫绢有可能是从齐国来的。但是，也不能排除当地产的可能性。特别是双根经线又加捻的“绢纺”技术，其他地方尚未见到。

总之，这座墓的年代明确，在墓葬形制、随葬器物方面都有许多特点，为研究春秋早期淮汉地区国君墓的棺椁制度、服饰、随葬器物等方面，提供了第一手资料。①

（四十九）春秋黄国黄季佗父墓

该墓葬位于河南省光山县城西北宝相寺北侧，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西北165米，俗称“天鹅墩”大冢。1988年6月发现，随即进行了发掘。

该墓是一座木椁墓，坑内北部为主棺椁，南部为陪葬箱。陪葬箱内无人骨痕迹，因此定为主棺椁的陪葬箱。这种专设陪葬箱且椁、箱同坑异处的陪葬形式在先秦考古中很少见到。

出土的器物有铜器、玉器、陶器等190余件。其中铜戈长25.4厘米，边沿旋铸铭文一行6字“黄季佗父之戈”。

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黄季佗父墓的发现，证实了河南光山城郊宝相寺、天鹅墩一带是春秋早期的黄国墓地。该墓地位于春秋黄国故城（今潢川隆古）西南20公里处，横跨潢川、光山两县。黄国是周王朝分封在豫南地区的诸侯国中实力较雄厚、军力也较强的国家。这次黄季佗父墓中出土的铜剑、铜戈、铜箭等兵器，制作工艺精美，并且十分锋利，在春秋早期兵器中均属上乘。证明了文献中有关黄国对抗楚国、有恃无恐的记载是确有所本的。

从出土器物基本相同和墓葬头向判断，黄季佗父与黄君孟是同一族氏。黄季佗父墓出土的陶鬲和4种型式的陶罐弥补了黄君孟夫妇墓的不足，为春秋早期晚段增加了一批重要的陶器标准器群。②

以上所述，就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学者有关春秋时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主要成果。显然，这些成果对于补充、修正各种传世文献，对于更好地认识春秋时

① 以上据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4期。

② 以上据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河南光山春秋黄季佗父墓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期。

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俗与思想文化等发展面貌，都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

七、战国文物的大量出土

早在中国古代，就已经有战国文物的出土。20 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逐步发展，战国时期文物的出土不断增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战国时期文物的出土数量更是蔚为大观。以下主要记述对战国历史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出土文物，其他从略。

(一) 辉县魏国墓

1950—1952 年，在河南辉县琉璃阁、赵固和固围村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战国中期魏国贵族墓葬和车马坑，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铜器。其中有宴乐射猎纹铜鉴、云雷纹铜壶和马鞍形的错金车挽饰。最令人惊叹的莫过于一件包金嵌玉银带钩，纹饰繁缛、剔透玲珑、包金嵌玉、五色相宜，代表了当时工艺精巧的最高水平。①

(二) 贾各庄燕国墓

该群墓位于河北省唐山市贾各庄的西面。1952 年 5 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人到贾各庄调查。发掘地点分两处，一处是贾各庄西面的砂子坑附近，共发掘 36 座墓葬，其中战国墓 22 座、西汉墓 9 座、东汉墓 2 座、时代不明的墓 3 座。另一处是贾各庄东面的东大沟，发掘了 6 座瓮棺葬墓葬，是早于砂子坑附近的战国墓。

这里战国墓葬的形制，和其他地区的战国墓大体相同。这些墓葬大小不同，随葬的器物也多少不等，从一件陶器以至于十几件，主要是鼎、豆、壶。比较大的墓葬还随葬铜器。陶器在形式上有特殊性，也就是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没有发现玉器，仅有一个带花纹的石灰岩石环，另外有三个玛瑙环。不像其他地区的战国墓中往往有玉器出土。但是这里出土了相当多的长方形小石片，原来可能是镶嵌在木椁上面的，也可以算是这里战国墓的特征了。

一些文献记载，北燕原是北方民族，到了战国时强大以后，就冒称是西周灭商后封于北燕的燕召公之后。此次发掘的遗物可以证实这一点，就是地方性非常显著，与中原各国的区别很大。很可能是燕民族除了接受中原传来的文化外，并保有他们一部分原来的传统。②

---

① 文物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58 页。

② 以上据安志敏:《唐山市贾各庄发掘记略》，《科学通报》1953 年第 4 期。

(三) 燕国铁质铸范

1953年,在今河北省兴隆县(当时属热河省)发现了一批战国时代的生产工具铸范。1954年8月,做了初步调查。另外在附近发现新的遗迹两处。出土遗物除原来87件铁范外,又获残陶器2件,陶片20余块,土坯、烧土等若干。

87件铁质铸范中主要为农业生产工具铸范,如锄、镰、镢、斧。并有字铭。说明铁质生产工具的使用在战国时代已极为普遍。

这批铁范当为战国时代北方燕国的遗物,数量之多为国内少见,为研究战国时期的手工业生产、冶铸技术、农业生产工具的制作和农业生产的发展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原始资料。①

(四) 燕下都16号墓

河北易县燕下都16号墓是1961—1962年在勘察燕下都故城址时发现的28座古墓中的一座,编号M16。它位于燕下都东城的西北隅,这里曾是燕国高级贵族的墓地。

此墓因早期被盗,随葬品仅有大量陶器和石器、蚌器、骨器,并石璜、骨角佩饰、珠、贝饰等以及小件铜饰。另有铁器10件,有镢、锤、铲、削等。

从出土陶器的形制和类别看,此墓应是战国初期墓葬。出土的陶器,不仅器形完全仿于铜器,而且纹饰也都是仿铜器的制作,这是罕见的。这些发现,丰富了战国时代燕文化的考古资料。②

(五) 燕下都44号墓

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位于武阳台村西约200米处。1965年,由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燕下都工作组发掘。出土遗物1 480余件,内除货币1 360余枚外,主要为铁器和铜器。

此墓埋葬有大批断首离肢的尸体,多有残断的兵器,分散成小批而数量不等的货币,可见埋葬时对尸体和遗物的处理简单草率。这当是一座武士丛葬坑,墓内的兵器和货币为死者生前使用过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财物。

出土的货币以燕、赵的刀、布为主,其中燕国折背明刀、赵国“甘丹”直刀和三晋方足布都是战国后期常见的货币。同时,墓中并没有战国时代最晚期的货币。因

① 以上据郑绍宗:《热河兴隆发现的战国生产工具铸范》,《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② 以上据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第十六号墓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河北文物研究所:《河北易县燕下都第16号墓车马坑》,《考古》1985年第11期。

此，此墓的年代应为战国后期，但不会晚到战国末年。

燕下都44号墓最引人注目的是生产工具和兵器几乎全都为铁器，表明当时燕国的冶铁技术和工艺水平是相当高的，达到了目前从考古资料中所知的战国时期的先进水平。为研究中国古代铁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线索。①

(六) 战国金矿遗址

该金矿遗址位于河北兴隆县兴隆镇东北60公里深山区的西沟庄东南500米处。1984年6月，兴隆县车河堡乡车河氓村西沟庄农民在本庄山坡上开采金矿时，意外地发现了这处采金遗址。矿坑内出土的遗物包括铁锄1件、铁斧1件以及苇席、木条簸箕等。苇席和木条簸箕未能保存下来。此前，先秦时期的采铜矿冶遗址已有多处发现，但战国时代的采金矿遗址还是首次发现。②

(七) 岗杜古墓葬

岗杜位于原河南郑州市区的西北郊，连同附近的任寨、六里屯、寺坡等村，统划为第16文物区。自1954年底至1955年4月，先后在此区清理发掘47座墓葬。

墓葬的形制可以分成二类。第一类竖穴墓共31座，没有墓道，墓室是一个自地面直下的竖穴。第二类洞室墓共16座，由一个墓道和一个墓室组成，墓的主体设在一个洞中。

除4座墓不用陶器随葬外，在43座墓中共出土陶器150件。出土铜质的随葬品有带钩、镜、洗、璜形饰、勺和空首布、方足布、刀布、五铢钱等9种、59件。出土铁器有带钩、锛、铲、刀、环等5种、22件。其他器形不明者4件。出土玉石片16件。

根据各种墓的形制、随葬品的组合变化，并与各地发掘材料比较，推断第一类墓中出第1组陶器(鬲、盂、豆、罐)的墓，可能是战国初期或春秋末年；第2组(鼎、壶、敦)墓时代比第1组晚，可能是战国晚年；第3组(合碗等)墓可能约当战国末年到西汉初年；第4组(罐、釜、碗)墓及第二类(洞室墓)第Ⅰ式墓，可能是西汉早期，Ⅱ式墓可能是西汉后期。③

(八) 市庄村赵国遗址

河北石家庄市市庄村战国遗址，在市庄村南端约250米处，这里是华北平原通

① 以上据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第4期。
② 王锋：《河北兴隆县发现战国金矿遗址》，《考古》1995年第7期。
③ 以上据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岗杜附近古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

往山西的交通要道。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于 1955 年对此遗址进行了挖掘。

遗址中没有发现房屋遗迹。出土完整和残损铁器 47 件,铁质松脆,器形完整者有镬、削等;石器 23 件;陶器以陶片为最多;铜器 12 件。出土货币有方足布 3 枚,有“平阳”、“安阳”等字样;尖足布 1 枚;刀币 1 枚,字样不清。

钱币为有“平阳”、“安阳”等字样的赵国钱币,因此这个遗址大体是属于战国时期赵国时代的遗址,而且很可能属中期或晚期。在这个遗址中发现的釉陶,可以起着联系殷、周与汉代釉陶的作用,为研究中国釉陶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材料。①

(九) 百家村战国墓

百家村位于河北邯郸市西约 4 公里。墓群分布在村西一片高低起伏的岗地上,发掘工作是在 1957 和 1969 年分两次进行的。前一次清理了 8 座战国墓;第二次清理了战国墓 41 座、汉墓 10 座。

获随葬品 2 629 件。可分陶器、铜器、铁器、玉石器、玛瑙器、水晶器、蚌器、骨器等类。根据葬墓出土遗物推测,铜器、玉器是随着墓主人身份的高低而有无。代表早晚特征的鬲与盒一无发现,因此这些战国墓的时代不会过早或过晚,应为战国中期较为恰当。②

(十) 长台关 1 号、2 号、4 号楚墓

长台关是河南省信阳县的一个小镇,在镇的西北约 4 公里有一条小土岗,岗上散布着 6 个大的土冢,传说的楚王城和太子城就在这条岗的东北部。1956 年 3 月间,在第 4 座土冢(由东北端数起)的西北边挖井时发现 1 号墓。1957 年 3—5 月进行了发掘。

从此墓的所在地、墓的构造、出土器物等来看,应属战国后期楚国墓葬,墓主可能是诸侯或地位仅次于诸侯的贵族人物。虽然前室和主室遭到了严重破坏,但还是发现了不少精美的珍贵文物,如编钟 1 套,木雕镇墓兽 1 只,彩绘大漆案 1 张,贮有铜刮刀、削、小锛、锯、毛笔及笔筒等物的小木箱一个(可能是制作竹简的全套工具)。发现的竹简上古文字之多,为前所未见,对研究楚国的历史、文化、艺术以至文字、方言等,有重要补充。③

---

① 以上据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石家庄市市庄村战国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 年第 1 期。

② 以上据河北省文化局文化工作队:《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考古》1962 年第 12 期。

③ 以上据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我国考古史上的空前发现——信阳长台关发掘一座战国大墓》,《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9 期。

1958 年 5—9 月又在 1 号墓东 9.4 米处发掘一大墓，并命名为长台关 2 号墓。这座墓虽然被盗，但出土文物还是相当丰富，在器物的质地、形态、图案花纹等方面别有风格，可补足 1 号墓器物之不足。①

长台关 4 号墓位于长台关乡西北陈庄村西南土丘上，楚墓保护区西南角外 150 米处。1991 年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该墓被盗，出土物极少。根据出土物推测，此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墓葬。②

（十一）盆景园 8 号战国墓

1993 年 2 月，河南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为配合市盆景园的基建工程，发掘清理了一批古代墓葬。8 号战国墓在该工地的中部偏北，时代应在战国早期偏晚或战国中期偏早。

棺木为内外双重棺。出土的随葬器物，铜器有鼎 1 件、豆 2 件、壶 2 件、匜 1 件、带钩 2 件，玉石器 10 片，骨器 2 件。

此墓发掘，为进一步研究三门峡地区战国时期的墓葬制度提供了翔实的史料。③

（十二）江陵望山 1 号、2 号和沙冢 1 号楚墓

湖北省江陵县境内的纪南城，是春秋战国时代楚国郢都故址。城的四周有大量的楚墓群。1965 年 10 月至 1966 年 1 月，清理了部分小型墓葬外，并对望山 1 号、2 号和沙冢 1 号三座大型墓葬进行了清理发掘。这三座墓东南距纪南城约 7 公里。均为有封土堆的长方形土坑木椁墓。

三座墓的随葬器物都相当丰富，共约 700 多件。按其质料可分为竹、铜、铅、锡、陶、玉、石、漆木、角、骨、皮和丝帛等。其中以铜、陶和漆木器最多。

望山 1 号墓出土竹简约二十三四简，从文字内容初步观察，似属几篇论述“祭仪”的文稿。珍贵品有越王勾践剑 1 把，靠近格处有“越王鸠浅自作用鐱”八字鸟篆铭文，保存完好，刃薄而锋利。错金大型铜带钩 1 件。镂孔龙纹杯状器 1 件。彩绘

① 以上据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信阳长台关 2 号楚墓的发掘》，《考古通讯》，1958 年第 11 期。

② 以上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信阳长台关 4 号楚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7 年第 3 期。2002 年 10 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信阳市文物部门的配合下，又对长台关 7 号楚墓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具体情况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信阳长台关 7 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 年第 3 期。

③ 以上据胡小龙等：《三门峡市盆景园 8 号战国墓》，《中原文物》2002 年第 1 期。2002 年秋，又在三门峡市区西北部的原陕州城东、原后川村西侧发掘清理出一座战国早、中期车马坑，详见史治民等：《河南三门峡市后川战国车马坑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3 年第 4 期。

木雕小屏1座，整座小屏共雕刻有大蟒等51个动物，雕刻的动物相互角斗，画面生动，形态逼真，堪称艺术杰作。

望山2号墓出土文物数量略少于望山1号墓，珍贵品有竹简，初步统计共在13简以上，900余字，系记述随葬器物的《遣册》。人骑驼铜灯台1件。错金银铜夋尊1件。两对透雕龙纹玉佩等。

沙冢1号墓已被盗，仍有一些珍贵品，如漆耳杯18个，制作精巧。彩漆编花竹席1床，篾上漆红漆和黑漆，并编制出工整优美的几何形图案。

这三座墓葬与过去在江陵发掘的楚墓及邻省见到的楚墓的形制与出土文物大体相同，因此这三座墓都是楚墓。出土的大量精美的器物，为研究楚国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①

（十三）湖北江陵首次发现郢爰

1971年3月，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公社郢南大队的社员，在楚故都纪南城东南的郎城南城墙内修水渠时，发现一枚楚国金币——郢爰。重17.53克，含金量达97.5%。战国时期，唯有楚国将黄金铸成特定的货币形态。过去，在安徽、江苏、山东南部和河南中部都发现过大批郢爰，湖南西汉初期墓中还出土过郢爰泥版（仿制的冥币）。这说明，南起湘、沅，北至河南中部，西至湖北西部，东临海滨，东北到山东南部，都是楚国郢爰的通行区域。②

（十四）拍马山楚墓

拍马山位于湖北荆州城西北郊约4公里，此地楚墓分布较密，早在1963年即已发现并进行过发掘，1971年底，当地人民公社在土岗西南修筑水渠，在长300米的地段内即露出古墓近70座。后进行了清理。

随葬器物中，陶器大部分为明器，出土的铜器以兵器居多，还有石、玉器、漆木器等，瑟2件。其中很多制作精巧。从这批墓葬出土器物的组合关系来看，墓葬的时代约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③

（十五）藤店1号楚墓

藤店1号墓位于湖北江陵藤店公社藤店大队，东南距楚故都纪南城约9公里，墓葬在一块较高的岗地上。1973年3月被发现并发掘。发掘前，墓口已露出，墓

---

① 以上据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

② 荆州博物馆：《湖北江陵首次发现郢爰》，《考古》1972年第2期。

③ 以上据湖北省博物馆发掘小组等：《湖北江陵拍马山楚墓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3期。

口以下第一层土阶部分被破坏。

墓葬出土器物共300余件，按质地可分成铜、陶、竹、木、皮、玉、石、骨等类。按用途可分成竹简、兵器、车马器、生活用具、乐器和其他等类。珍贵品有铜剑2件，1件为越王州句剑，上面有2行错金鸟书铭文8字。刃部十分锋利，保存完好。生活用具中有皮手套1双，五指分开，用线缝合，皮质柔软。

从墓葬形制等特点来看，当为楚墓。墓中出土有越王州句剑，可知此墓的埋葬年代，最早不会超过州句(越王翁)在位之年，即公元前448—前412年。这座墓葬有许多地方类似江陵望山1号墓和长沙浏城桥1号墓。如果推测这件青铜剑连同望山1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都是楚威王灭越之役的战利品，那么，楚墓随葬品的组合的年代可延续到公元前334年以后。①

(十六) 天星观1号、2号楚墓

天星观1号墓位于湖北江陵县观音垱公社五山大队境内。发掘于1978年1月。江陵为楚国郢都所在，这里分布着大量楚墓，其中包括大型的墓葬。

1号墓严重被盗，残存的有：葬具一椁三棺及青铜器、兵器、乐器、玉石器、漆器等2 440余件。还有一大批竹简。

关于此墓的年代及墓主。在竹简的“卜筮记录”中，有对商鞅的记载，但仅称“秦客公孙鞅”，因此，简文年代应是商鞅在秦受封于商之前的年代，即公元前361—前340年。由此可知，下葬年代应晚于公元前361年，而在前340年前后，即楚宣王或威王时期。卜筮中还多次记录是为“番勅”占卜，而且全部简文内容没有出现一处是为他人占卜的，所以“番勅”为墓主是无疑的。简文中有一类是专为“番勅”问“侍王”是否顺利的卜辞，说明“番勅”与楚王关系密切，可惜其爵位与官职在简文中没有记载。②

2000年，在天星村又发掘了2号墓。共出土文物共209套，计1 000余件，不少文物填补了楚文化研究空白。其中，器型硕大、制作华美的虎座鸟架鼓、形态生动的浮雕凤鸟漆豆、猪形酒具盒、蚌座凤鸟以及特大龙形银带钩等，在中国属首次发现，这对楚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根据出土资料，专家认为，其墓主应是一号墓主之妻。③

---

① 以上据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藤店1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9期。

② 以上据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③ 以上据徐志伟等：《荆州大型战国楚墓发掘纪实》，《湖北档案》2000年第5期。

（十七）九店楚国墓葬

九店墓地坐落在湖北江陵楚国故都纪南城东北一公里余的施家洼、范家坡的丘陵地带。九店墓地共发掘西周晚期墓1座、东周墓596座，发掘工作自1981年5月开始，至1989年底结束，历时9年。

这批墓葬从葬制和随葬器物观察，分属两种不同的文化，其中19座墓系姬周文化系统，称为甲组；另500余座墓当属楚文化系统，称为乙组。以下概述乙组墓葬。

乙组墓中有526座墓出土陶、铜、铁、玉、石、漆、木、竹、骨、角器，丝麻织物，皮、毛制品，及竹简等各种质地的器物4 954件。

M56侧盒内出土竹简205枚（包括残、断简），主要为记数术方面的内容，与云梦秦简《日书》性质相同。

从出土遗物及器物组合上看，乙组墓的年代可分为四期七段：一期一段：春秋晚期晚段；二期二段：战国早期早段；二期三段：战国早期晚段；三期四段：战国中期早段；三期五段：战国中期晚段；四期六段：战国晚期早段；四期七段：战国晚期晚段。

这批资料系统反映了东周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作为楚国都城的江陵纪南城地区下层贵族、庶民阶层的丧葬习俗、文化基本状况，为这一时期中小型墓葬的考古年代分期提供了一个标尺。①

（十八）楚皇城遗址

楚皇城遗址位于湖北宜城东南7.5公里处。1976年冬，由湖北省博物馆等联合组成考古发掘队对该地进行勘察发掘。在城址内发掘探方1个，解剖城墙1处，在城外发现古墓群3处，试掘清理墓葬13座。

楚皇城城垣，现存城墙底宽24—30米、高2—4米不等。城垣周长6 440米，东南西北分别长2 000、1 500、1 840、1 080米。城址的年代，上溯至春秋战国，下续到秦汉以至更晚。

城址出土的文物，有厚实庄重的大铜方壶，有精巧实用的铜车軎，更有造型奇特的鳖形错金嵌玉铜带钩。出土古代货币种类之多，也是湖北省内其他古城所罕见的。这里有楚之金币郢爰和铜蚁鼻钱，有其他战国货币，有秦半两、汉初半两与五铢、东汉五铢和新莽钱，还有钱范等。由此可以看出，从楚至两汉，这里一直是一

① 以上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江陵县九店东周墓发掘纪要》，《考古》1995年第7期。

个经济中心。这里有宏大的军事设施如烽火台，出土了数量可观的箭镞和其他兵器，说明这里又是兵家争战的重要目标。①

(十九) 大冶楚国墓葬

大冶战国墓葬坐落在湖北大冶县城关与大箕铺古城之间的龟墩山上，1984 年 2 月，大冶县大箕铺乡邓垅大队群众，在取土时发现一批陶器和一把较完整的青铜箭。经调查，这批遗物为一墓葬所出。因墓葬破坏比较严重，出土的陶器仅能看出鼎、敦、壶、豆等。

从墓葬出土器物来看，此墓应为战国晚期的楚国墓葬。此战国墓葬，在大冶地区还是首次出现，为研究大冶地区的楚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②

(二十) 余岗战国墓

余岗墓群位于湖北襄樊市(今襄阳市襄樊区)余岗乡余岗村北，墓地比周围略高。1987 年 12 月，在余岗发现 5 座土坑墓，从西至东分别编号为 M1、M2、M3、M4、M5。

5 座墓共出土器物 35 件。其中陶器 31 件、铜器 2 件、漆器 2 件。

从出土器物及其组合情况来看，余岗 M1、M3、M4 为战国晚期墓葬，M2 的时代下限在秦统一以前，M5 的时代属秦统一六国之后。

襄樊地区发现的战国晚期墓较少，此次发掘的 5 座墓以楚文化风格为主，深受中原文化、秦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多种文化浑融并存的风格，有助于探索汉北地区战国末年复杂的文化面貌，以及相关的历史问题。③

(二十一) 黄土岗楚国墓

黄土岗墓地位于湖北孝感市城南约 10 公里处的三汉镇涂店砖厂。墓地在一椭圆形台上。台地东西宽约 400 米、南北长约 500 米，高出四周约 1 米，总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1991 年，孝感市曾配合工程清理战国时期土坑木椁墓 5 座，编号 M1—M5。京珠高速公路从台地东部穿过，1998 年 7 月对京珠公路经过地段及附近进行了勘探，对已暴露在外的 1 座墓葬进行了清理，编号 M6。

随葬器物有陶器、木器和葫芦等，计 16 件。

无论从墓葬形制、葬具、随葬器物组合形式还是器物形态等方面看，此墓都应

---

① 以上据楚皇城考古发掘队:《湖北宜城楚皇城勘查简报》,《考古》1980 年第 2 期。

② 以上据大冶县博物馆:《大冶县发现一战国墓葬》,《江汉考古》1984 年第 4 期。

③ 以上据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阳余岗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1992 年第 9 期。

为战国中期楚墓。它的发掘，对于战国时期葬物的研究，尤其是对随葬器物的组合的研究具有极大的价值。①

（二十二）益阳战国墓

益阳县位于湖南省北部，1978 年 6 月至 1979 年 9 月，在益阳县新桥山和赫山庙发掘了从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墓葬共 54 座，其中新桥山发掘战国墓 25 座，赫山庙一带发掘战国墓 22 座、西汉墓 4 座、新莽墓 1 座、东汉墓 2 座。

新桥山和赫山庙两地战国墓，共出土随葬器物 420 余件，质地有陶、铜、铁、琉璃、玉和漆木器，器类有生活用器、兵器、生产工具和装饰品。赫山庙出土印章 1 枚，白色，正方形，阴刻“干”字。

根据湖南益阳战国墓的三种墓坑及三种器物组合，发掘者认为，第一种时代为战国早期，第二种时代为战国中期，第三种时代为战国晚期或迟至秦汉之际。②

（二十三）麻阳战国铜矿遗址

麻阳铜矿遗址位于湖南湘西元麻盆地中段，东侧为辰溪、麻阳两县交界之处的九曲湾。1982 年，由湖南省博物馆等单位的考古工作者和麻阳铜矿工程技术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对矿井作了比较全面的调查，先后发现古矿井 14 处，对木支柱保存较为完好的 2202“老窿”中的一段，进行了实测和抢救性的清理工作。

出土有木、铁、陶质器物。它们大多数是当时的采矿工具，少数是当时矿工的生活用器。其中，大小不一的木槌 10 件，完好的两件；木撬棍 1 件；小铁錾 1 件。

根据 2202 等“老窿”的出土遗物，推断它们的年代属于战国时期。

麻阳古铜矿是我国继湖北大冶铜绿山春秋战国时期古铜矿发现之后的又一处重要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矿冶史和江南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的矿源等有关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③

（二十四）团结村楚国墓

1985 年，怀化地区文物工作队在湖南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进行文物调查时，在江东乡团结村枫树脚砖瓦厂首次发现战国墓葬，并对已暴露的 4 座墓葬进行了清理。

---

① 以上据湖北省京珠公路考古队孝感组：《孝感黄土岗战国楚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0 年第 3 期。

② 以上据湖南省博物馆等：《湖南益阳战国两汉墓》，《考古学报》1981 年第 4 期。

③ 以上据湖南省博物馆等：《湖南麻阳战国时期古铜矿清理简报》，《考古》1985 年第 2 期。关于大冶铜绿山春秋战国时期古铜矿遗址的基本情况，参见张为民：《试论大冶铜绿山古铜矿发掘的意义》，《黄石师院学报》1984 年第 4 期。

4座墓共出土随葬器物11件。出土陶器有罐、壶、豆，铜器有剑、矛、镦，另外还有玉环等。随葬陶器组合为罐、豆与壶、豆，此组合在湖南战国早期楚墓中常见。所出陶罐、铜剑与其他地区战国早期楚墓出土的同类器一致。因此推测这批墓葬为战国早期楚人的墓葬。①

(二十五) 德山茅湾战国墓

德山位于湖南常德市区东南约5千米处的沅江南岸。整个德山的大小山包上，多数均分布着战国、汉墓群。1993年10月，常德市文物处为配合茅湾砖厂取土，在这里集中发掘清理了古墓25座，出土各类文物98件。

出土器物主要有铜器、陶器、玉器和石器等。该处葬品以罐、钵、豆为主，随葬兵器较少，而且墓葬规格较小，形制大致相当，时代延续变化不大，没明显的贫富差别，因而可能为当时平民的公用墓地。墓主是楚人还是秦人，目前还没找到确实的证据。对于此墓所属的时代，据推测，这批墓葬的时代大致应属战国中期较早，个别稍晚。②

(二十六) 跑马岗楚国墓

跑马岗位于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镇德桥镇和白鹤山乡交界处，西北部岗顶目前还有封土直径20米左右、排列有序的古墓葬。1999年冬，为配合洞庭湖区防洪综合治理工程中的公路改道施工，常德市文物处在这里首次集中清理了38座战国古墓。

除3座墓不出随葬品外，其余各墓共出311件(套)。其中陶器共279件、铜器9件(套)、铁器2件(套)、漆木器21件(套)。

从出土的随葬品的组合情况来看，此墓群前后时间跨度大，从战国早期，经过中期，到晚期后段，无明显间断痕迹。出土311件(套)器物中，兵器仅出了3件，没有楚墓中常见的戈、矛、镦等兵器，显现当地应有一个相对平静的生活环境，无剧烈变革，而且大批晚期后段墓的出土，证明到战国晚期，这一带仍应属楚人的势力范围。③

(二十七) 郴州市战国木椁墓

1999年10月，湖南郴州市文物处文物工作者在龙门小区建设工地考古调查

① 以上据向开旺等:《湖南靖州县团结村战国西汉墓》,《考古》1998年第5期。

② 以上据常德市文物事业管理处:《湖南常德德山茅湾战国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7年第3期。

③ 以上据龙朝彬:《湖南常德跑马岗战国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3年第3期。

中,发现一座战国时期的土坑竖穴墓。墓内出土豆、鼎、壶、罐、戈、矛、钵、盘等器物20余件。此墓葬内的椁室、椁板保存完好,在郴州市尚属首次发现。①

(二十八)凤凰山木椁墓

凤凰山位于浙江绍兴县城东约10公里。1975年3月下旬,绍兴县上游公社在凤凰山东麓挖泥取土时,发现了铜器,经县文物部门调查,清理了两座木椁墓。

两墓随葬器物39件,计黑陶23件、印纹陶2件、铜器6件、漆木器6件、玛瑙环1件,还有竹编。

从出土陶器的组合及纹饰来看,都具有战国的特点,这两座木椁墓的年代可定为战国时期。

墓2出土的陶器中鼎占很多,在奴隶社会中随葬鼎的数量,标志着死者等级的高低。但战国时"礼崩乐坏",墓中随葬品的组合是对"旧礼制"的一种"僭越"。但在另一方面也看到,在这两座墓葬中,作为意识形态的"葬礼"仍保留奴隶制时代习俗。②

(二十九)江山战国墓

此墓位于浙江江山县大溪滩乡大夫第村一座小山的北坡,1983年7月4日发现,12—15日作了清理发掘。

出土陶器、原始瓷器等共19件。此墓随葬品以原始瓷与陶器为基本组合,未见鼎、壶之类。从其形制、纹饰等情况看。此墓年代应在战国中晚期。

此墓为一竖穴土坑墓,这在该地区为首见,对研究这一时期墓葬形制由早期土墩墓向两汉时期土坑墓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同时,所出原始瓷器,胎料较细腻,烧结度较高,釉层涂布均匀,与所出商、周原始瓷器比较,工艺上有很大进步;但与汉墓所出青釉瓿比较,仍有它的原始性,因而对探讨瓷器从原始瓷向成熟瓷器过渡,具有一定意义。③

(三十)垄坝村战国楚墓

1998年3月,为配合省道工程建设,浙江安吉县博物馆对沿途墓葬进行抢救性清理,在安城镇垄坝村吴家山清理了6座墓葬,其中有1座是战国墓。出土器物有陶鼎2件以及盒、壶及玉璧等。

---

① 唐涛等:《郴州市首次发现战国时期木椁墓》,《郴州年鉴》2000年。

② 以上据绍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绍兴凤凰山木椁墓》,《考古》1976年第6期。

③ 以上据毛兆廷:《浙江省江山县发现战国墓》,《文物》1986年第6期。

从墓葬、器物形制看，此墓应为战国晚期小型楚墓。①

(三十一) 齐故城

1958年10月，山东省文化局举办的文物训练班组成了临淄考古队，在临淄齐故城内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钻探和试掘。此次调查，古城四角都已找到，大致可绘出原来古城址的范围，惟城西南角与南墙西部尚不明确。

调查未见有商代或更早的陶器。西周时代遗物以古城东部与东北部分布较多。古城西南角有一小城，当地称为皇城，县志称营丘城。根据钻探材料，小城城墙夯土打破周代文化层，夯土中杂有灰土与战国时期陶片，可说明小城的时代最早不过战国。②

(三十二) 郎家庄1号齐墓

郎家庄1号墓位于山东淄博市旧临淄县城东南一公里郎家庄的村旁，北距东周齐国国都临淄故城南城墙0.5公里左右，是齐故城周围数以百计的"冢子"中的一座。1971年12月至1972年5月，山东省博物馆对此墓进行了发掘。

此墓虽多次被盗，但发掘中仍有不少收获，出土随葬器物约1 000件，包括铜器、陶器、漆器以及玉、石、骨、琉璃等质料制成的饰品和器物，丝麻织物和铁削2件。发现殉人9人，陪葬者17人、狗8只。

从墓葬、器物形制判断，此墓年代当属于春秋末期或迟到战国初期。至于墓主是谁，无直接根据可以说明。但此墓临近临淄齐故城，墓葬规模巨大，随葬品丰富，又有大批殉人，可以肯定是春秋战国之际齐国卿大夫一级的大贵族。

墓中的17个陪葬坑是一项新发现，它可以对我国古代的陪葬制度有更具体的认识。这些陪葬者各有墓穴和棺椁，井然有序地埋葬在主人椁室的周围，随葬品的大同小异和人骨架的特定姿态，表明这些陪葬者是按一定的葬仪埋葬的。③这为研究战国时期齐国的经济、文化和阶级关系等，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特别是对于研究战国时期贵族的葬墓形制、陪葬礼仪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十三) 淄河店二号齐国墓

淄河店墓地位于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淄河店村南，西北距临淄齐国故城约7.5公里，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田齐王陵"相邻。1990年4—11月，在墓地

---

① 以上据金翔：《浙江安吉县垄坝村发现一座战国楚墓》，《考古》2001年第7期。

② 以上据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6期。

③ 以上据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墓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东北部的第19号取土场内发掘了4座战国时期的大型墓葬。

随葬器物根据用途大体分礼器、乐器、兵器、俑、车及车马器五大类。礼器由于多次被盗，未发现铜礼器。一件有铭铜戈，铭文为“国楚造车戈”1行5字，其格式、文字特征均具齐国特有的风格。

墓室内发现的20余辆独辀车是这次发掘的重要收获。由于结构不同，用途也不同。第一类车属于轻车类，可用于战事和田猎；第二类车属于安车类，为墓主人的主要坐乘；第三类为大车类，为古代的栈车或役车，是用来装载货物的。这些物品为古代独辀车及战国车制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殉马坑位于2号墓北侧，南距墓室13米。马坑内共殉马69匹，东西单行排列。

从出土器物组合看，盖豆和敦最早出现于春秋末期，多见于战国早期。根据其墓葬规模，拥有12名殉人和大批殉马，随葬众多的马车，并享有棺椁相重、七鼎六簋的礼仪看，墓主在齐国是具有一定权势的卿大夫。①

(三十四) 长桥新塘战国墓

1988年，在京杭大运河苏州市河段整治工程中，苏州博物馆考古人员配合工程，在龙桥以西新塘村沿大运河一线拓宽工程范围内发现一批墓葬，随即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10座，确认是一处战国墓地。

10座墓葬中共出土几何印纹硬陶器10件，其中黑衣灰陶器8件。青铜器4件，其中剑1件、镞2件、弭(即弓之末梢)1件。另有木器9件、原始青瓷器3件。

苏州是吴国后期都城所在地。新塘战国墓地的发现，更能清晰地反映苏州城西南部的战国遗址的分布及范围，同时也能反映春秋战国时期人流的迁徙、变化，对研究苏州城的建造年代，吴大城位置的所在地等学术问题，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史料。②

(三十五) 新庄东周遗址

新庄位于江苏苏州市西郊。1983年冬，苏州磁记录厂在市郊新庄新建厂房工程中，发现一口古井。1984年1月，苏州市博物馆配合工程对新庄东周遗址进行了清理和试掘。

遗迹有灰坑2个、水井3个以及烧窑遗址。

---

① 以上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淄河店二号战国墓》，《考古》2000年第10期。

② 以上据张志新：《西塘河遗址》，《江苏文物综录》1988年；朱伟峰等：《苏州市长桥新塘战国墓地的发掘》，《考古》1994年第6期。

出土遗物有陶器和原始青瓷器，以陶器为主，此外还有石器、木器和兽骨等。木器有木臿2件，1件保存完好。

从出土器物形制等推测，新庄遗址的时代也应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其下限或可至战国晚期。①

(三十六) 中山王墓

1974—1978年，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发掘了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1号墓出土的铜器上的铭文中，提到中山国的世系和中山王兽十三年、十四年，因此推测此墓主应为中山王兽，而年代相当于战国中晚期。

1号墓出土的青铜器有鼎一套9件、鼎一套5件，此外还有陶鼎一套5件，说明其用鼎制度较乱。列鼎和编磬说明主人为高级贵族。铜器有不少是有铭文的，在圆壶、方壶和铜鼎上有三篇较长铭文，描述了中山国与邻国的关系，据李学勤研究，这三篇铭文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反复引用了儒家典籍，主要是《诗经》，这对深入探讨先秦经学很有启发，“过去人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长篇而且富于思想性的战国金文”。②

珍贵品还有“兆窆图”，系用铜版制成，长94厘米、宽48厘米。版面上用金银嵌出中山王陵墓的规划平面图。兆窆图上居中并列5座享堂，有铭文注明中间为王堂，两侧为王后堂和哀后堂，哀后堂左侧为夫人堂，王后堂右侧为另一堂，铭文不清。图上享堂及其他建筑物之间的间距都注明尺寸、距离。

从总体来看，中山国墓葬是一个以国君为中心的墓葬，这种格局开创了秦汉以后帝陵布局的先声。③

(三十七) 曾侯乙墓

曾侯乙墓位于湖北省随县擂鼓墩，1978年发掘，是一座年代和墓主都很明确的墓葬遗址。墓葬建在一座小山岗上，为一座竖穴岩坑墓。出土遗物有乐器、青铜礼器、容器、杂器、车马器、竹木用具、金制小器皿、竹简及金、玉服饰，等等，总数达7 000余件。

乐器计出编钟、编磬、镈、鼓、瑟、琴、笙、排箫、横吹竹笛共124件。编钟、编磬均

---

① 以上据苏州市博物馆:《苏州新庄东周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4期。

② 李学勤:《平山墓葬群与中山国的文化》,《文物》1979年第1期。

③ 以上除李学勤论述外，皆据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报告》,《文物》1979年第1期。

立架悬挂，瑟、笙、箫、笛列于钟、磬之间。

据铜镈上的铭文，推断其埋葬年代为公元前433年或稍晚。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用器、乐器和兵器中，几乎都有“曾侯乙”的铭文。据此，曾侯乙无疑就是这个墓的墓主。

因为墓葬的年代比较确切，文物又特别丰富，这就为同时期墓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断代标尺。此外，曾侯乙墓出土的文字资料极为丰富，各种铜器铭文、石磬刻文、木器上的刻文和漆书以及竹简文字等，字数总计在1万以上，对于古文字和当时历史的研究都有很大意义。①

(三十八）高庄战国墓

高庄墓位于江苏淮阴市城区西南约10公里处，1978年3月发现并发掘。墓内随葬器物以青铜器为主，次为陶瓷器及玉石器等，近300件。

从墓葬结构和出土遗物大致推论，高庄墓的年代可断在战国中期前后，但其国属和墓主身份，尚缺乏直接证据来判明。②

(三十九）南干河出土的战国青铜器

1985年11月，陕西凤翔县范家寨乡南干河村一队农民在田间劳动时，挖得一批战国青铜器，其中剑1件、盖弓冒25件、节约6件、方策3件。

从青铜器形制看，这批青铜器大部分可定为战国之物。③

(四十）山门口秦墓

1988年秋，陕西西安市南郊北山门口村电子城205工地在基建中探出大批战国秦墓，市文物管理处配合基建清理了11座。均为横式墓。出土随葬器物较少，仅M7、M9、M10、M11墓中每墓葬2—4件陶器。

在这批墓葬中，封门沟槽出现在横式墓中，这为研究战国晚期横式墓的形制提供了新的元素。对于个别口含石子或石璧断节及两手握石子或石璧断节的习俗，则更是研究战国晚期葬俗的重要资料。④

(四十一）零口秦国墓葬

陕西临潼零口战国墓葬遗址坐落于渭河南岸二级阶地的前缘地带，零河自南

---

① 以上据随县擂鼓墩1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
② 以上据淮阴市博物馆：《淮阴高庄战国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
③ 以上据赵丛苍：《陕西凤翔南干河出土战国、汉代窖藏青铜器》，《考古》1989年第11期。
④ 以上据王久刚：《西安南郊山门口战国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1期。

而北，注入渭水，将遗址分割为二，西是居住区，东为墓葬区。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为了配合高速公路的建设工程，1994 年 10 月至 1995 年 12 月，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工作。

在一墓中发掘出 7 件随葬器物。按质料分为陶器、铜器、铁器和骨器 4 类，均为实用器皿。以墓葬结构、随葬品与已经积累的资料相比判断，当属战国葬墓。

此次发掘的战国秦墓，均为小型墓葬，随葬品数量少。发现不少屈肢葬式，其意义何在，为何葬墓中死亡者的年龄均在 14—30 岁之间，为何死亡者男性青年为多，等等，这些都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探索。①

(四十二) 尤家庄 20 号战国墓

1996 年 8 月，在陕西西安市北郊尤家庄村东，发掘清理了战国秦汉墓葬 200 余座，其中 20 号战国墓保存完好，出土有青铜器等器物。

从墓葬形制看，20 号墓的年代为战国晚期(公元前 275—前 222 年)。随葬品中虽有 4 鼎，但形制相同者 3 件，根据文献中关于古代礼制的记载，该墓主的身份当属士这一阶层。②

(四十三) 东旱坪秦国墓葬

东旱坪遗址位于甘肃武山县东 13.5 公里的洛门镇裴家庄村西南。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 2000 年 8—12 月进行了大面积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共清理墓葬 71 座、灰坑 2 个，出土铜、铁、陶、骨器 300 余件。71 座墓中有战国墓 3 座、秦汉墓 34 座、宋元墓 34 座。战国墓葬 M42、M43 是其中两座较有代表性的墓葬。

M42、M43 均为土洞墓，洞室开凿于竖穴式墓道短边一侧。这种类型的洞室墓主要存在于西安和宝鸡地区，年代绝大部分可到西汉早期。但从这两座墓中的出土器物、墓的形制及葬式特点，应为战国晚期秦人墓葬。

此外，有一座有围墓沟的墓葬，从其规模、出土的随葬品上看，这座墓比同时期其他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以前甘肃地区秦墓发掘的材料比较少，也未发现此类墓葬。围墓沟可能为战国时期秦墓所特有。秦大型陵墓的这种特点对后来中、小型墓葬有一定影响，中、小型墓的主人为显示其特殊身份也予以仿效，这就逐渐形成了秦墓的又一主要特点。③

---

① 以上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临潼零口战国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8 年第 3 期。

② 以上据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郊尤家庄 20 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 年第 1 期。

③ 以上据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武山县东旱坪战国秦汉墓葬》，《考古》2003 年第 6 期。

（四十四）孟家庄战国墓

孟家庄位于山西省长子县城西南约1.5公里处，孟家庄北面的一块东西较广阔，且较周围地区高出3—4米的台地上。继1988、1989年之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东南工作站又于1992年5月、1993年6月，在孟家庄发掘古墓葬12座，其中战国墓11座、汉墓1座。

在11座墓中，出土铜器剑1件；陶器79件，器类有鼎、盖豆、壶、平盘豆、豆柄壶、盘、盒、罐等。器物多由精至简，由大到小，越来越趋于明器化。推测其年代当在战国中期晚段。

通过长子县孟家庄战国墓的发掘可以看出，战国后期的墓葬形制与战国前期的墓葬形制有了较大的不同，同时也为汉代的墓葬形制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①

（四十五）余家坝巴国墓葬

余家坝遗址位于四川开县长江支流彭溪河右岸的一级阶地上，由两条大致平行的低矮土岗组成。1994年春，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发现战国中期墓葬3座、元明时期的墓葬和灰坑各1座。

战国墓葬编号为M2—4。3座墓葬出土随葬物共31件，其中发掘品18件、征集品13件，种类有青铜器、陶器、玉器和漆器4类。从器物形制推测，这3座墓葬约为战国中期。

M2和M3两座墓葬平行排列，相距仅0.75米。M2的随葬品中，出土了一组实用的青铜兵器，计有剑、戈、矛和钺4种。由此可以推定M2的墓主为男性，其身份当为武士。M3的随葬品中，除了铜、陶容器之外，不见武器和工具类器形，而另有1件玉质装饰品，因此，M3的墓主应是女性。如果上述分析正确的话，M2和M3很可能是一对夫妻的并穴墓葬，其排列是男右女左。

M4的墓室较大，随葬品的种类较多，随葬兵器上的花纹复杂精美。综合来看，M4的墓主生前的社会地位显然要高于M2和M3，其身份应是中下级军官。

余家坝应是一处十分重要的巴人墓地。这一发掘，对于进一步揭示巴文化内涵和促进巴文化研究的深入，无疑有重要意义。②

（四十六）成都战国墓葬

2000年，在四川成都商业街发现一战国墓葬，初步确定为古蜀开明王朝晚期

---

① 以上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东南工作站：《长子县孟家庄战国、汉墓发掘简报》，《文物世界》1999年第1期。

② 以上据山东大学考古系：《四川开县余家坝战国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期。

（约战国早、中期）的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

发掘后共发现9具船棺、8具独木棺，均由整木刳凿而成。共出土铜器、陶器、漆器、竹木器等重要文物数以百计。漆器种类繁多，其色彩亮丽、纹饰斑斓，是战国漆器中仅见之精品。

经专家推测，此墓地应是古蜀国开明王朝的王族或上层贵族的家族墓地。其丧葬方式在国内属首次发现，其规模堪称全国之最。此次发现，填补了四川地区春秋战国考古的空白，为研究古蜀国历史、文化及丧葬制度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①

（四十七）巴塘、雅江、东俄洛石板墓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广泛分布着一种石棺葬和石板盖土坑墓，大多数位于两河交汇处三角地带的台地上，往往与现代的村寨相邻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此类墓葬发现甚多。1978年8—9月，在巴塘扎金顶清理了墓葬8座，在雅江团结公社呷拉大队本家地生产队采集了陶器、铜饰物和珠饰多件，在康定东俄洛公社采集了金发饰2件。

巴塘扎金顶墓群位于巴塘县城以北巴曲河和小巴河汇合处，高出河面40—60米。巴塘扎金顶的墓葬则应属于土坑墓的范畴，仅墓顶用千枚岩打制的石板覆盖。在盖板之上，有时另外再堆几块乱石，然后用土覆盖。墓内出土器物，分陶器、铜器、金器、玉石、象牙等类。巴塘扎金顶在同一墓地之内，亦有石棺葬，其出土器物与土坑墓并无区别。

雅江团结公社呷拉大队本家地生产队采集的陶器中，陶器嵌铜的工艺，尚属首次发现。

这批墓葬的器物与岷江上游石棺葬相一致，其时代可能亦大致相近，即战国至秦汉之际。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在西汉时，大致今雅江、义敦巴塘一带有白狼、槃木、楼薄等部族，这批古墓葬可能即是他们的遗留。②

（四十八）吉里龙古墓葬

仁果乡吉里龙（藏语语意为八个石板的沟）古墓葬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城南约20公里的雅砻江南岸山麓第二级台地上。1979年发现古墓葬，出土了一些陶器和铜器。1981年清理了1座残墓，采集了2件陶器和铜器，初步估计是一处古墓葬群。1983年8月，再次进行调查，试掘了6座墓葬，清理了2座残墓，出

① 以上据程实：《成都发现一大型战国墓葬》，《历史教学》2000年第12期。
② 以上据甘孜考古队：《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考古》1981年第3期。

土了陶器、铜器、铁器、骨器和装饰品等百余件。

在同一墓地，既有石棺墓，也有土坑墓和卵石镶砌墓边的墓葬。但三种墓葬所出同类器物无甚差别，只是组合略有不同，均属“石棺葬文化”类型的古墓。

吉里龙古墓葬所出土的器物，具有鲜明的“石棺葬文化”的固有特征。墓中出土的双耳陶罐、单耳陶罐和陶簋，是“石棺葬文化”墓葬中具有特征性的器物，也是以川西山区为中心的其他地区“石棺葬文化”类型墓中所共有的器物。但是，吉里龙古墓葬中不见汉文化因素羼入的现象。根据这些情况分析，吉里龙古墓葬的时代上限为春秋战国，下限为战国至秦，最晚不过汉初。

此墓葬中用狗、牛头殉葬，这在四川地区的“石棺葬文化”墓中还是首次发现，特别是用经肢解后的马殉葬的风俗，又同于北方战国秦汉时代的少数民族墓葬。这为今后更进一步探讨“石棺葬文化”类型墓葬的文化特征、文化来源和族属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①

（四十九）贡觉县石板墓

西藏自治区贡觉县在1971、1984年曾两次在城北学校周围发现石板墓葬多座，并出土了较多的随葬品，但均被毁不存。1986年8月，对现存的一座残墓进行了清理。

清理前，石板墓大半已毁，残存部分出土随葬品4件，有陶单耳环一件、铜耳环2件、铁刀1把。

石板墓葬多发现于川西、云南等地，其时代约在战国秦汉之际。这次清理的石板墓结构与其基本类同，但型制和出土物都较前进步了些。加之，这里受地域、交通的限制，文化交流比较缓慢，因而这座石板墓的时代可能要比川西、云南一带石板墓的时代稍晚一些。

在藏东，对石板墓葬进行科学的发掘、清理尚属首次，类似的墓葬在该县的香贝区、三号桥等地均有发现，它们不但填补了藏东石棺墓葬的空白，扩大了“石棺葬文化”的分布范围，而且随葬品的出土也为建立西藏古代文化的考古序列，研究藏民族的埋葬风俗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②

（五十）香贝石棺墓葬

石棺墓葬在西藏自治区贡觉县香贝区区公所周围。1975年，贡觉县香贝区兴

---

① 以上据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馆：《四川甘孜县吉里龙古墓葬》，《考古》1986年第1期。

② 以上据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普查队：《西藏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文博》1992年第6期。

建区公所时发现石棺墓葬多座,但均被毁坏。1979年实地调查,仅采集陶罐1件。1986年8月,对香贝区石棺墓地进行了清理工作,共清理石棺墓葬5座。

从5座墓葬的型制和结构看,可分为石板墓和石块墓两类。共出土随葬器物13件,分陶器和铜器两类。

香贝区墓葬的葬具和出土器物与四川巴塘、雅江石棺墓的葬具和出土器物十分相似,与四川吉里龙古墓葬的型制及单耳陶罐也基本相似。所以,香贝区石棺墓葬的年代也应与上述四川岷江上游石棺墓葬的年代相当,即在战国秦汉时期。当然,这里受地形、交通等方面的限制,文化交流较少,发展比较缓慢,其年代也许还要稍晚一些,但最晚也不会晚于唐代。

贡觉与岷江上游距离较远,又有金沙江天险,可能贡觉、藏康、昌都一带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定居着一个较大的部族,这个部族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并与四川及中原地区进行过长期的物质文化交流。

关于"石棺葬",已有学者认为,创造这一文化的民族是氐羌族,而藏民族的族源也有人认为与"羌人"有关。有些墓中头箱内放置石块的现象又与羌人用石头随葬的习俗相似,从而说明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当与羌族相关。[①]

(五十一) 皮央·东嘎遗址古墓群

皮央·东嘎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东嘎乡,由位于皮央村的皮央遗址群和位于东嘎村的东嘎遗址群两个遗址群组成,由于两村相距不远,故以"皮央·东嘎遗址"总称。整个遗址由石窟、寺庙建筑、佛塔群和墓葬等几个部分组成,其中的佛教石窟遗迹等曾做过考古调查。1999年调查时发现东嘎遗址Ⅴ区墓群、格布赛鲁墓群和皮央遗址萨松塘墓群、格林塘墓地,并对东嘎遗址Ⅴ区墓群和皮央遗址萨松塘墓群、格林塘墓地的部分墓葬进行了试掘,它们均位于遗址范围之内,呈"品"字形分布。共清理墓葬26座、殉马坑1处、列石遗迹1处。

清理的26座墓葬中,包括石丘封土墓16座、竖穴土坑墓5座、穹窿顶洞室墓2座,还有3座情况不明。出土的随葬品包括陶器、铜器、铁器、石制品、木器、竹器等,种类较多,以陶器为主。

列石遗迹位于格林塘墓地的北部,用砾石摆成。推测可能与墓地祭祀有关。此类列石遗迹的发现在西藏尚属首例,其含义尚待进一步考证。

---

① 以上据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

首先，葬俗中火葬习俗的遗迹现象值得注意。从发掘情况来看，火葬墓在东嘎Ⅴ区和萨松塘均占有一定的比例，但规模较小。火葬是一种古老的葬俗，在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丧葬风俗中曾多有流行，如文献记载中的羌、突厥等都流行过火葬习俗，此次在西藏西部墓葬中发现的火葬遗迹，丰富了对西藏地区古代丧葬风俗的认识。

其次，这次发掘出土的器物有陶器、铜器、石制品、木制品等多种类型，其用途涉及生活用具、兵器、装饰品等不同的方面，对于认识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状况、工艺技术水平，都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丰富的一批新材料。其中，尤其是对陶器工艺水平及其基本状况的了解，将为划分西藏地区不同类型的考古学文化，初步建立西藏西部地区的考古学年代体系，提供宝贵的资料。此外，墓葬中出土的一柄青铜剑，其形式与云南出土的一件剑非常相似，这种文化上的联系也发人深思。

就墓葬的形制、出土器物看，这些墓葬的年代当不早于战国末期，最迟不晚于西汉初期。根据两组测定的碳十四数据，年代为距今 2725—2170 年和 2370±80 年，这个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秦汉时期，在西藏则相当于吐蕃王朝建立之前，史籍所记载的各“小邦”时期。因墓葬的地望在“象雄”范围之内，故推测其很可能与“小邦”时期的“象雄”文明有关。①

战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社会迅速发展的时代，这从以上所列 20 世纪后半期出土的战国时期主要历史文物中已有所反映。因此，加强对战国文物的梳理和深入研究工作，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战国历史的认识，进一步拓宽研究的视野，推动战国史和先秦史的研究深入。

八、“世界第八大奇迹”——秦陵兵马俑

秦陵兵马俑自 1974 年被当地农民发现，随后出土了众多的兵马俑以及青铜武器，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被世人称作“世界第八大奇迹”，并于 1987 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之列。在兵马俑面世以后的 30 余年里，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考察，使人们对秦代军事制度、武器制造、生活方式、雕塑艺术等方面，都有了较为直观和全面的认识。

---

① 以上据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古墓群试掘简报》，《考古》2001 年第 6 期。

(一) 秦陵兵马俑的发现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位于陵园东侧 1 500 米处。1974 年初，陕西关中农村发生严重春旱，在西安东 30 多公里的秦始皇陵园东侧的临潼县晏寨公社下河大队西杨生产队决定打一眼机井抗旱。3 月 25 日，生产组组长杨全义带领杨志发、杨彦信、杨新满等打井社员来到这里打井。3 月 29 日，杨志发和杨彦信在作业时，发现了没有头的陶制兵俑。

晏寨公社有一位管水利建设的干部房树民，他得知消息后，认识到这可能是需要保护的文物，马上联系当地的文物主管部门，干事赵康民立即将发现的陶俑集中收集整理，运送到 10 多里外的县文化馆，之后又进行了文物的修复工作，使得这些兵马俑得到了初步的保护，他也成为修复兵马俑的第一人。

后新华社记者蔺安稳却无意中得知了这个发现，在 6 月 27 日的《人民日报》内参《情况汇编》第 2396 期刊发了一篇近 600 字的内参，当月底即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7 月上旬，经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正式组织秦俑考古队，进行发掘工作。7 月 15 日，考古队进驻工地，由此拉开了 20 世纪最为壮观的考古发掘序幕。经过约半年的大面积钻探和部分发掘，考古人员才基本探清，这是个东西长 230 多米、南北宽 60 多米，总面积有两个足球场大的巨型兵马俑陪葬坑。因是首先发现，编号为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简称一号俑坑。

1975 年 7 月 12 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千余字的消息，首次向全世界公开披露了秦始皇陵发现兵马俑的情况①。至此，秦陵兵马俑算是正式为世人所知。

1976 年 4 月 23 日，在一号俑坑东端北侧 20 米处，探出了另一个兵马俑坑，按其发现顺序，定为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简称二号俑坑。5 月 11 日，在一号俑坑的西北侧 25 米处，又发现了一个俑坑，按其发现顺序，定为秦始皇陵兵马俑三号坑，简称三号俑坑。在二、三号俑坑之间，还发现了一个未建成的土坑，俗称"四号坑"，坑内没有放置陶俑、陶马。三个俑坑内共发掘出类似真人、真马大小的陶俑、陶马近 8 000 件，木质战车百余乘和 4 万多件青铜兵器。②其中长铍、金钩等都是兵

---

① 以上据王兆麟:《秦陵兵马俑发现揭秘》,《世纪行》1999 年第 4、5 期。

② 以上主要据张涛:《秦兵马俑的发现、发掘及其研究》,《丝绸之路》1999 年第 5 期。据《走进科学》丛书编委会所编《触摸尘封的历史》(科学普及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1 页),在 1974—2002 年的28 年中,出土而又能真正站立起来的兵马俑只有 1 040 个。

器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兵器铸造的标准化工艺、兵器表面防腐处理技术的发现，填补了古代科技史研究的空白。[①]

(二) 有关秦陵兵马俑的研究

秦陵兵马俑的发现、发掘，对于研究秦朝时期的军事史、艺术史和科技史等都有着重要价值。

1. 有关秦陵兵马俑的军事研究

(1) 军阵

第一，一号坑与秦军步兵阵。

一号俑坑东端廊房里有陶俑 219 件，除去南北两端分别面南、面北的 6 件陶俑外，其余 204 件呈南北向三列横队面东排列，每列 68 件，前后左右成行。在中间一列横队的左右两端，各有 1 件头戴长冠的军吏俑，似为统帅前锋部队的将领。这 204 件陶俑，仅有 3 件为甲俑，其余均为袍俑。陶俑手势也多作提弓状，只有 11 件陶俑的手作持戈、矛等兵器状。

对于这个军阵，有的学者认为，是攻守兼备，以攻为主的军阵。[②]有的学者认为，是整装待发的阵容。[③]有学者认为，再现了 2 200 多年前方阵的战术队形。[④]

第二，二号坑与秦军车骑弩兵阵。

二号坑兵马俑也面向东，象征秦军技术兵种构成的曲尺形军阵。它由轻车兵、带甲车兵、骑兵、弓弩兵俑编成。

根据这个军阵排列情况，学术界中大多数人认为，它由四个单元组成：第一单元是由弓弩徒兵组成的方阵，第二单元是由战车编成的方阵，第三单元为编伍组合的长方形军阵，第四单元为骑兵阵。这四个单元有机结合，组成一个大型曲尺形军阵，这也就是兵书上所说的方、圆、曲、直、锐五种军阵中的曲尺形军阵。这种布阵

---

① 《兵马俑》，http://baike.baidu.com/view/78727.shtm。

② 王辉强：《秦兵马俑与秦军阵法》，《文博》1994 年第 6 期。徐卫民：《地下军阵：秦兵马俑坑考古大发现》，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 页。

③ 古方：《秦风永驻：秦始皇・始皇陵・兵马俑》，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25 页；张涛：《秦兵马俑的发现、发掘及其研究》，《丝绸之路》1999 年第 5 期。

④ 周韵曦：《浅谈秦兵马俑的审美特点》(《中国文化研究》2008 年春之卷)认为，一号坑是一个长方形的以步兵和战车为主的军阵，由前锋、侧翼、后卫、主力四部分构成。位于俑坑前面的是排列整齐的三列朝东的武士俑，每排 68 人，三排共 204 名武士，个个身着战袍，手握弓弩，站在整个军阵的最前面。其后是 3 路纵队步兵尾随着驷马战车，成为兵阵的主力军。军阵左、右两侧，各有一列面向南、北的弓弩武士，组成左、右侧翼。俑坑的西端，还有一列面西的弓弩武士，他们应该是整个军阵的后卫。

方法，分而各自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单位，合而浑然为一个整体。①

也有人认为二号俑坑军阵是攻击形式即历史上的雁行之阵，还有人认为它是方阵，又有人认为它是古代的疏阵，不管它应该叫什么军阵，殿后的骑兵则是机动部队。②

第三，三号坑与秦军的军事指挥集团。

三号俑坑南北厢房内出土的陶质武士俑的排列与一、二号俑坑内的陶俑的排列迥然不同。一、二号俑坑内的陶俑均为战斗队形的排列，完全体现了士有什伍、车有编列的战术原则。而三号俑坑内出土的步兵铠甲俑不作战斗队形的排列，而作仪卫的列队。且人数不多，布局不大。66件武士俑的装束和装备也不同于一、二号俑坑的武士俑。一、二号俑坑出土的陶俑或者持长剑，或者持长戟，或者持弓弩、背负箭镞，或者手执吴钩，武器配备呈多样化特点，而三号俑坑内的武士俑每每手执长殳，殳属于古代一种无刃礼器，这个装备特点似乎与古代仪仗有关。这表明三号俑坑很可能是保卫室内统帅的部队。

三号俑坑的车马房内，出土木质战车一乘，其形制与一号俑坑发现的战车明显不同，车舆不仅彩绘着华丽而鲜艳的文饰，同时还发现了一个直径为42厘米的彩绘华盖。战车上未发现兵器，也未发现金、鼓之类的指挥器械。古代战争史上，春秋时代就有一种四人乘坐的指挥车。三号俑坑的战车无疑属于这一类型。

专家普遍认为，三号俑坑为统帅一、二号俑坑的指挥部，古名军幕、幕府或帷幄。这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军幕的形象记录，展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过程中军队指挥部的风貌，对研究秦国军事系统具有重大意义。③此外，中国古代史书中关于警戒队形的记载不多，三号坑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形象资料。④

第四，四号坑与秦军军阵。

因为在四号俑坑中没有发现兵马俑，所以自从它发现以后，一般认为是这一个废弃或者是未完成的俑坑。而有的学者认为四号俑坑代表中军。古代军队的编列不外乎左、中、右三军。从兵马俑坑来看，一号俑坑可视为右军，二号俑坑可视为左军，三号俑坑是军幕，唯独缺少一个中军，未建成的四号坑，其位置正处于中军的部

① 张涛：《秦兵马俑的发现、发掘及其研究》，《丝绸之路》1999年第5期。

② 张涛：《秦兵马俑的发现、发掘及其研究》，《丝绸之路》1999年第5期。所谓“雁行之阵”，即形如大雁飞行之阵，特点是主要发挥射击方面的威力，但不善于攻击，也不善于行军。

③ 以上三段据张涛：《秦兵马俑的发现、发掘及其研究》，《丝绸之路》1999年第5期。

④ 王辉强：《秦兵马俑与秦军阵法》，《文博》1994年第6期。

位，这样一来，左、中、右三军加上一个象征指挥部的军幕，就构成了一组完整的军阵编列系统。[①]但"中军"说并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而且持反对意见者大有人在，有人还认为四号坑并非兵马俑坑，只是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当地农民的取土壕，它与秦军军阵没有什么关系。[②]

（2）战车[③]

目前，三个俑坑共出土木质战车 130 乘，可分为四种类别：一般战士乘的战车、高级军官乘的指挥车、佐车和驷乘车。

一般战车，轮高舆短，驾四马，每车甲士 3 人。指挥车，高轮短舆，御四马，高级将领车有华盖。作战时车上亦有 3 人。佐车，可能是骑兵阵中军吏的副车，即主车的后备车。驷乘车，驾四马，军吏一人、御手一人和士兵两人。是一种特殊状况下使用的车辆。

（3）兵器[④]

出土四万余件青铜兵器，绝大部分是青铜镞，另有剑、戈、矛、戟、金钩、铍、殳、钺、弩等。兵器中发现了一些铭文，多数是刻画的文字，少数为铸文，字体为小篆。从这些铭文中可知，兵器的铸造时间为秦始皇当政期间，相国为吕不韦，铸造单位是少府下的寺工。其中首次发现的有：金钩，形状像弯刀，分身、柄两部分，双刃，通长 65.2 厘米，属于短兵器，用于近身格杀。铍头，形制和短剑相似，长 35.3—35.5 厘米。茎插于柄端，用铜钉固定，柄为木制，下有铜镦，通长 3.59—3.82 米。铍的作用类似于长矛，铍头和短剑相同，穿刺力更强。

出土兵器，均为铸造成型，其成分主要包括铜、锡和铅等。锡和铅有降低熔点，提高兵器硬度的作用。出土兵器中锡与铅约占合金比例的 20%，处于这个比例的

---

① 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65 页。古方：《秦风永驻：秦始皇·始皇陵·兵马俑》，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0 页；张自成等主编：《复活的文明：一百年中国伟大考古报告》，团结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8 页。

② 刘占成：《秦兵马俑"四号坑"质疑》，临潼旅游网 http://www.ltlyw.gov.cn/show.asp?id=682。

③ 本部分内容据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5—111 页。关于兵马俑中战车的研究，古方《秦风永驻：秦始皇·始皇陵·兵马俑》也有相同或相似的描述，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3—110 页。

④ 本部分内容主要据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66—192 页。关于兵马俑中兵器方面的研究，古方《秦风永驻：秦始皇·始皇陵·兵马俑》也有相同或相似的描述，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0—138 页；徐卫民：《地下军阵：秦兵马俑坑考古大发现》（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中除了涉及相似内容，也谈到兵马俑中的防御性武器，认为其中未发现如盾之类的防御性武器，是由于腐烂或是根本就没有放置，这可能与秦人的英勇好战的性格有关。

青铜兵器硬度较高。另外,一号坑中的青铜剑在出土时没有腐蚀,这是因为当时使用了氧化铬防锈技术。这项技术在西方是 20 世纪 40 年代才发明和申请专利的,但远在两千多年前的我国秦代就已经应用于兵器生产中了。此外,数百件弩机的牙、栓、悬刀等部件,完全可以互换通用,轮廓误差不超过 1 毫米。这说明,当时已经开始了武器的标准化生产,统一的度量衡使得秦军使用的武器大小几乎一样。① 这些都反映了秦代手工业和科技的发达。

(4) 军事制度

袁仲一认为,秦陵兵马俑的出土所反映的当时秦国的军事制度,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秦军的编制有郡县兵、中央宿卫军及国防上的屯卫兵三类,秦陵兵马俑军队属于担任警卫京师的中央宿卫军;第二,秦实行征兵制,士兵均为男性,多为关中地区的秦人以及巴蜀和西北地区的男子;第三,秦推行军功爵制,共二十级,兵马俑中戴冠者均有爵位者,不戴冠者为普通士兵;第四,中央宿卫军的武器取自中央;第五,秦军作战服装自备,兵俑中的衣着各式各样,颜色不同,鞋、靴也不统一,为普通百姓平日所穿之服饰。②

2. 有关秦陵兵马俑的艺术研究

秦陵三个兵马俑坑中共出土有 8 000 兵马,其中兵俑不但拥有和真人大小相同的身体,穿着带有彩绘的服饰,并且每个人的面部表情、动作、发型,甚至连脚上鞋子的绳纳针脚都不相同。马俑也是一样,伟大的古代工匠们忠实于时代的原貌,把当时秦军作战用的河曲良马打造得栩栩如生,巧妙地同兵俑、作战用的武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气吞山河的恢弘气势。

(1) 陶俑百态

秦人崛起于边陲,尚武善战,故兵马俑中的武士被刻画成威武有力的形象。数量巨大的兵俑中,除立射俑和跪射俑外,其余都是站姿,目视前方,显得刚毅勇猛。将军俑神态自若,透露出非凡的气质;一般战士则体态多样,面部表情丰富,有的微笑,有的肃穆,有的轻松。从陶俑的全身比例看,头的长度基本符合“立七坐五蹲三”的标准。有些为了突出体魄的高大,头的比例有所缩小。五官的位置接近于“三停五部”,即下巴到鼻尖、鼻尖到眼睛、眼睛到头发沿的三段距离相等,从整个头

① 张童心等:《考古发现与华夏文明》,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0 页。

② 本部分内容据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23 页。

形看，基本符合头骨的构造。[①]

秦俑中的面型有八种，国字脸、用字脸、风字脸、田字脸、目字脸、由字脸、甲字脸、申字脸。[②]陶马造型准确，风格写实，表现手法有详有略，繁简结合，局部如眼、耳、口、鼻都刻画得十分传神，而马的躯干则简约洗练。陶马原型应为我国西北地区的河曲马种。[③]

（2）秦俑艺术

秦俑最大的特点在于写实的艺术风格。兵马俑中的兵马均按真人真马大小塑造，从着装等方面也是完全按照当时的状况来刻画，而且各自体态不同，形神相异，动作逼真。俑身花纹则以各种各样的菱形花纹为主，也有几何图案，这说明秦代彩绘花纹图案的风格和主调是菱形花纹。可以说，这样一个恢弘的地下军团，不仅反映了秦人军事方面的状况，而且生动地再现了两千多年前秦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特点。秦俑也给现代人留下了一座气势磅礴的雕塑宝库，它继承了前代雕塑的精要部分，并运用塑、堆、贴、捏、刻、画等六种技法，以表现立体形象的体、量、形、神、色、质，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更加真切，其技法之娴熟令人惊叹。[④]这不能不使我们由衷地感佩古代工匠们的辛勤劳动和杰出智慧！

（3）陶俑、陶马的制造工艺

据袁仲一研究，陶俑和陶马的制作流程基本一致。陶俑是由俑头、躯干和手制作成型后组装而成的。三者均是先作成粗胎，而后再分别加以刻画。俑头制作方法为单模制作和手塑结合或合模法。俑身较为复杂，制作顺序自下而上，先制成足踏板，然后是双足、腿及短裤、躯干，最后是双手。躯干及四肢雕刻成型后，再将事先制作好的俑头安装上，随后阴干，放入窑中烧制，出窑后再施以彩绘。陶马制作也是先分别做好局部，而后拼装完成。随后入窑烧制，最后出窑彩绘。[⑤]

陶俑、陶马的烧成温度为 950 ℃—1 025 ℃。由于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兵马俑身上的鲜艳彩绘已经大多脱落，只有个别的局部彩绘保存较好。[⑥]

---

① 李鼎铉：《秦兵马俑的写实主义艺术风格》，《文博》1985 年第 1 期。

② 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16 页。

③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 1974—1984》（上），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8 页。

④ 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69 页。

⑤ 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30—352 页。

⑥ 张涛：《秦兵马俑的发现、发掘及其研究》，《丝绸之路》1999 年第 5 期。

关于兵马俑的彩绘材料，通过对两种主体色（多见于手足中的粉色和铠甲之上的绿色）成分的剖析可知，兵马俑的彩绘主要由天然矿物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而成。绿色彩绘主要由孔雀石、石英、伊利石、鳞绿泥石、钠长石和微斜长石等矿物组成，其绿色正是孔雀石的本色。粉红色彩绘则由碳磷灰石、石英、镁铁闪石、伊利石等矿物及密陀僧（氧化铅）、铅丹组成。[1]

3. 其他研究

陈景元在《兵马俑真相》（华文出版社2009年版）中对兵马俑的主人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从秦陵整个地理环境、"吕不韦戈"、发型、车辆等方面加以说明，认为兵马俑的真正主人是秦始皇的祖母宣太后，而不是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的秦始皇。岳南在《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新世界出版社1997年版）中除对兵马俑的一些基本情况进行了陈述，还包含了兵马俑发掘后与中外人物的趣闻轶事，以及类似将军俑头颅被盗这样的不幸事件，把兵马俑的研究扩展到了考古学范围之外的一些方面，等等。

秦始皇陵兵马俑的研究课题涉及政治史、军事史、艺术史和科技史等多个领域。21世纪以来，对兵马俑坑的发掘工作以及相关的研究工作还在深入进行，并出版了一些重要论著，[2]兵马俑背后的历史真相会不断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九、秦汉以后历史遗迹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考古学事业屡屡取得重大收获，仅对秦汉以后的历史考古发掘来看，重要者就有秦始皇陵兵马俑（详前）、汉长安城与未央宫遗址、长沙马王堆汉墓、临沂银雀山汉墓、满城汉墓、曹魏至十六国邺城遗址、隋唐两京城郭宫殿、唐法门寺地宫、明定陵等不下百项重要的考古发现。而出版的与这一时期考古成果有关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具有影响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考

---

① 贾建业、刘建朝：《秦陵兵马俑的矿物彩绘》，《陕西地质》1993年6月第11卷第1期。

② 例如，王晓谋：《彩绘兵马俑》，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徐卫民：《地下军阵：秦兵马俑坑考古大发现》，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王学理：《轻车锐骑带甲兵：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与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孙伟刚：《秦始皇帝陵与兵马俑》，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袁仲一：《秦兵马俑》，三联书店2004年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0》，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1—2003》，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陈景元：《兵马俑真相》，华文出版社2009年版；岳南：《秦始皇兵马俑发现记》，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田静：《秦始皇陵与兵马俑》，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孟剑明：《秦兵马俑》，中国旅游出版社2009年版；郝熙美：《秦始皇陵兵马俑》，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文物出版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 1961 年版)、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文物出版社编《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等。以下分四个部分: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分别记述考古的新发现。

(一) 秦汉遗址考古新发现

秦汉时期历经秦代、西汉、新莽、东汉,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考古调查、发掘的全面展开,考古资料有了相当数量的积累,两汉时期考古断代分支学科框架基本建立,若干专门化的研究开始分野。秦汉时期的考古研究已经不再是考古工作者的专利,一大批从事古代史、思想史、艺术史、科技史研究的学者都从中汲取营养,使得各相关学科的研究发生了深刻变化。20 世纪后半期以来,秦汉考古的成就主要集中于都城、县邑和聚落遗址以及长城、鄣塞、烽燧遗址与墓葬的调查与发掘等方面。

1. 研究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博物馆、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相关单位,对秦汉时代各种遗址和墓葬进行了长期的、广泛的、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出土的遗物数量很大、种类甚多。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成果,著作方面主要有: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 1984 年版)、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战国秦汉考古》(1973 年铅印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洛阳市文物局等《汉魏洛阳故城》(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 1973 年版)、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洛阳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 1978 年版)、曾昭燏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 1956 年印)等。

2. 都城遗址

在都城遗址方面,秦代的咸阳城、西汉的长安城和东汉的雒阳城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设计对历代都城营造有着重大的影响。

秦咸阳城位于渭河北岸咸阳原上,作为秦国都城历经一百四十多年,后毁于战火。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来,对秦咸阳城做了一定规模的勘探与发掘,但调查和发掘尚少,加之渭河改道对咸阳破坏较为严重,目前除了发现多处宫殿夯土基址、手工业作坊遗址以及在渭北发现一小段可能属于宫城的城墙外,迄今尚未找到咸阳大城城墙以及街道的遗迹,因而现在还很难勾画出咸阳都城的整体轮廓和布局。①

汉长安城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郊,汉高祖五年(前 202 年)开始在秦兴乐宫的基础上建造长乐宫,七年兴建未央宫并建都长安。1956 年以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汉长安城进行了长期勘探发掘,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状、城墙和城壕的结构、城门的形制、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市肆的位置和宫殿的范围,并全面发掘了武库。南郊的明堂辟雍和王莽九庙,以及西南郊的昆明池和上林苑的部分宫观的遗址也经勘探和发掘。调查和勘探工作证明,长安城的形制与布局基本与《周礼·考工记》的形制相符。四面总长合汉代 62 里,总面积约 36 平方公里。12 个城门平均分布在四面,全城共 8 条大街,最长的是安门大街。②

东汉雒阳城位于今河南洛阳市东,北靠邙山,南临洛河。东汉雒阳城的考古工作始于 1954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通过长期全面的调查发掘,明确了东汉雒阳城的平面形状、城墙的规模等。全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约汉代 9 里,东西约汉代 6 里,故称“九六城”。城墙用土夯筑,总长合约汉代 31 里,今东、西、北三面墙址尚存。全城共设 12 个城门,与城内主要大街相通,大街相互交叉,分割成 24 段,故

① 刘庆柱:《论秦咸阳城布局形制及其相关问题》,《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0—80 页。

② 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考古通讯》1957 年第 5 期;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 年第 2 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发掘队:《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群发掘简报》,《考古》1960 年第 7 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发掘的初步收获》,《考古》1978 年第 4 期;李遇春:《汉长安城考古综述》,《考古与文物》1981 年第 4 期。

有“洛阳二十四街”之说。城中主要宫殿为南宫和北宫。①

3. 郡县烽燧遗址

汉代的长城主要沿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至辽宁辽河以西的秦代长城并加以修缮，其城墙的修建因地制宜，平地用土夯筑，山间用石块垒砌，有的地段则是土石混合，汉代新筑的极西长城多在夯土中夹芦苇。此外，汉代在长城沿线普遍设立鄣塞和烽燧，已发现遗址数百处之多，其中以内蒙古居延地区的发现最为重要。

居延是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治所地，位于今内蒙古居延海、额济纳河流域一带。居延汉简是在居延烽燧遗址中出土和采集的简牍。早在1930—1931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这一地区的汉代烽燧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中，发掘出汉简10 000余枚，今称“居延汉简”。1972年，甘肃考古队沿额济纳河流域再次进行考古调查，采集到简牍和各种遗物800余件。此后，又在居延甲渠候官等处的汉晋烽燧遗址进行发掘，面积4 500平方米，新出简牍1.9万余枚，实物2 300余件。1976年采集木简173枚，1982年又采集木简20枚，统称为“居延新简”。居延汉简记录了汉代居延地区屯戍情况，再现了汉代西北边疆地区生活情景，是研究汉代政治、军事、法律、西北屯戍、中西交通等各方面的第一手资料。②

4. 墓葬遗址

两汉时期，墓葬种类复杂，墓主身份各异，等级甚多，而墓的形制和构造又因时期、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在帝陵方面，主要有西汉帝陵和东汉帝陵。

西汉和东汉的皇帝陵墓分别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和河南省洛阳市附近。1970年以后，曾对西汉帝陵的方位和陵园形制作过调查验证。西汉帝陵除了文帝的霸陵在西安东郊凤凰嘴、宣帝的杜陵在西安三兆镇之南，其余九帝的陵寝都在渭水以北咸阳至兴平县境内。西汉帝陵的考古工作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长陵陪葬墓、安陵陪葬墓的陪葬坑、文帝窦后陵的丛葬坑、武帝茂陵陪葬墓的丛葬坑、景帝阳陵附近的刑徒墓等进行了试掘。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对所有帝陵做了进一步调查和测量，绘制了各陵的遗迹平面图。重点发掘了宣帝杜陵陵园的东阙门、北阙门、寝园和一号、四号丛葬坑以及皇后陵园的东阙门、寝园等。90年代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景帝阳陵展开大规模的勘探

① 阎文儒:《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察记》,《考古学报》1955年第9期。

② 甘肃文物工作队:《额济纳河下游汉代烽燧遗址调查报告》,《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

和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①如在景帝阳陵的丛葬坑中出土有数量惊人的骑步兵人俑、动物俑以及车马、兵器、生活用品等。②

东汉的 12 座帝陵，除了汉献帝的禅陵在山阳（今河南焦作）外，其余 11 陵皆在洛阳附近。但由于洛阳建都朝代较多，洛阳附近特别是邙山一带大冢林立，东汉帝陵具体位置目前均不能确定。③

高级贵族、官吏的墓葬，已经发掘且重要的木椁墓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

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及其家属的墓葬，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东郊。该墓曾被讹传为五代十国时楚王马殷的墓地，故称为马王堆；又曾被附会为长沙王刘发埋葬其母程、唐二姬的“双女冢”。湖南省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72 年发掘了 1 号墓。1973—1974 年初，发掘了 2 号、3 号墓。1 号墓发现年约 50 岁左右的女性尸体，墓内又出“妾辛追”名章，墓主应是利仓的妻子。这具女尸经病理解剖表明，虽经历了两千多年，其身体各部位和内脏器官的外形仍相当完整，并且结缔组织、肌肉组织和软骨等细胞结构也保存较好，这在世界尸体保存记录中是十分罕见的。3 号墓墓主遗骸属 30 多岁的男性，可能是利仓儿子的墓葬。3 号墓出土的一件木牍，有“十二年十二月乙巳朔戊辰”等字样，标志着该墓的下葬年代应该是汉文帝十二年（前 168 年）。随葬品主要有漆器、木俑、乐器、竹木器、陶器、兵器、衣物、食品、药材，以及竹简、彩绘帛画、帛书等。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为研究西汉初期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④

---

① 刘庆柱等：《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文物资料丛刊》1982 年第 6 辑；陕西省文管会等杨家湾汉墓发掘小组：《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 年第 10 期；咸阳市博物馆：《汉安陵的勘察及其陪葬墓中的彩绘陶俑》，《考古》1981 年第 5 期；王学理等：《西安任家坡汉陵丛葬坑的发掘》，《考古》1976 年第 2 期；咸阳文管会等：《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丛葬坑的发掘》，《文物》1982 年第 9 期；秦中行：《汉阳陵附近钳徒墓的发现》，《文物》1972 年第 7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宣帝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丛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 年第 4 期。

② 梁佐：《汉武帝茂陵与霍去病墓》，《文博》1985 年第 3 期；何汉南：《霍去病冢及石刻》，《文博》1988 年第 2 期。

③ 陈长安：《洛阳邙山东汉陵试探》，《中原文物》1982 年第 3 期。

④ 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 1973 年版；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 年第 7 期；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银雀山1号、2号汉墓位于今山东临沂市南，1972年由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发掘。出土陶器、漆器及铜镜、钱币等。最有价值的是两墓出土竹简共计有完整简、残简4 942简，此外还有数千残片。其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十三篇》、《元光元年历谱》等先秦古籍及古佚书，这对研究中国历史、哲学、古代兵法、历法、古文字、简册制度和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提供了可贵的资料。①

此外，还有咸家湖汉墓、象鼻山汉墓、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北京大葆台汉墓、扬州高邮神居山西汉广陵王墓等也属于木椁墓类型。②其中，扬州广陵王汉墓是迄今为止，全国同类墓葬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保存最完整的“黄肠题凑”木椁墓葬。

土洞墓流行自秦至东汉，但限于黄河流域、北方及西北地区，以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和旱滩坡汉墓为代表。③空心砖墓流行于秦和西汉的中原、关中一带，墓主人多为中下层地主，以河南洛阳西汉壁画墓为代表。④

崖墓是在山崖和岩层中开凿横穴式洞穴以为墓室，开始于西汉，在河北、山东、江苏等地有所发现，较重要的有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河南永城芒砀山西汉梁王墓、河北满城汉墓等。⑤其中以满城汉墓最为代表。

满城汉墓位于河北省满城县陵山上，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及其妻窦绾墓。196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工作队进行了发掘，并于1980年出版了《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两墓南北并列，属于夫妇并穴合葬。两人均以“金缕玉衣”作为殓服，其外观和人体一样，分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5部分，全部用玉片拼成，用金丝加以编缀，其中刘胜的玉衣由2 498片玉片组成，所用金丝约1 100

---

① 吴九龙等:《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竹简的简报》,《文物》1974年第2期。

② 长沙市文物局文物组:《长沙咸家湖西汉曹䂣墓》,《文物》1979年第3期;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咀一号西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事业五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③ 党寿山:《甘肃武威磨嘴子发现一座东汉壁画墓》,《考古》1995年第11期;武威地区博物馆:《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文物》1993年第10期。

④ 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⑤ 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商博:《永城芒砀山发现汉代梁国王室墓葬》,《中国文物报》1986年10月31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克。这两套“金缕玉衣”是中国考古工作中第一次发现的保存完整的玉衣，也是有准确年代可考的最早的玉衣。出土的随葬器物还有4 200多件，其中如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错金银鸟篆文壶、鎏金银蟠龙纹壶和鎏金银镶嵌乳丁纹壶等，都是汉代铜器中难得的艺术瑰宝。

砖室墓，已发掘的具有代表性的有山西平陆汉壁画墓、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安徽亳县曹氏墓、河北望都汉壁画墓、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汉墓壁画等。①

石室墓，已发掘的以山东沂南汉墓为代表。②

5. 手工业遗址

两汉时期，冶铁和制造铁器的遗址遍及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江苏、内蒙古等省区，其中发现于河南省的约占半数。具有代表性的有河南巩县铁生沟遗址、郑州古荥镇遗址、南阳瓦房庄遗址以及温县招贤村遗址等。③

（二）魏晋南北朝遗址考古新发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流动频繁，各民族融合加速。因此，考古发现中，地方特色比较浓厚，过渡性较为显著，边远地区遗迹增多，出土文物体现民族特色和文化交流，佛教遗迹增多。

1. 研究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工作有计划、有系统的正式开展。考古工作者在各地陆续发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种遗迹、墓葬，并对地上遗迹进行了勘测和调查，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196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古收获》提出了此期考古应注意豪强大族墓和南方青瓷手工业的发展问题；1979年，文物编委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以及后来的《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对有关三国魏晋南北朝考古部分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予以阐述和总结；198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将三国

---

① 杨陌公等：《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汉墓》，《考古》1959年第9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打虎亭汉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安徽省亳县博物馆：《亳县曹操宗族墓葬》，《文物》1978年第8期；北京历史博物馆等：《望都汉墓壁画》，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5年版；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王大方等：《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五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曾昭燏等：《沂南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

③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巩县铁生沟》，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2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南阳北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1年第1期；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省温县汉代烘范窑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9期。

魏晋南北朝考古以分区域、按类别的方式，对全国的重大发现作了分类综合概述。1996年，罗宗真《六朝考古》对这一时期南方发现的重要遗迹和珍贵文物进行了整理和总结。

2. 城市遗址

城址方面，中原地区主要有魏邺城遗址、魏晋北魏的洛阳城遗址和东魏北齐的邺南城遗址。

曹魏洛阳城是在东汉雒阳城废墟上重建的，其规模不超过东汉，西晋时城的形制和布局也无多大改变。魏明帝时曾在洛阳城的西北角建筑了金镛城，后在其外壁又设置了墩台，类似于以后的"马面"，这是中国古代城制上的创举。北魏洛阳城不仅改建了魏晋洛阳城的布局，建立了单一的宫城，并在城外四周修建了外郭城垣。①

邺城遗址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是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的都城遗址，包括南北毗连的邺北城和邺南城两个城址。1957年，考古工作者首次对邺城遗址进行调查。城区曾出土东魏、北齐的大长砖和黑色板瓦。②

北魏之洛阳城和东魏、北齐新建之邺南城，扩大并规整了居民区（坊里），调整并对称安排了工商业区（市），这形成了中国古代都市规划的一种新模式，直接影响到南北朝和隋唐都城的规划。此外，北魏洛阳城和北齐时期的邺城都营建了众多的佛寺，已经勘察发掘的有北魏洛阳永宁寺遗址和北齐邺城兴圣寺遗址。③

南方地区则有南京附近的六朝都城建邺（建康）城、湖北鄂城的武昌城以及扬州和镇江的六朝古城。

建康城在地面上几无存遗，而历年来所得六朝墓葬则为推测建康城范围提供了一些参考依据。④

---

① 阎文儒：《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察记》，《考古学报》1955年第9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考古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第4期；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文物》1978年第7期；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邺城遗址"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605页；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第1期；临漳县文物保管所：《邺城考古调查和勘探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7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考古队：《北魏永宁寺塔基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北魏洛阳永宁寺西门遗址发掘纪要》，《考古》1995年第8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河北临漳县邺南城遗址勘探与发掘》，《考古》1997年第3期。

④ 蒋赞初：《南京城的历史变迁》，《江海学刊》1962年第12期。

武昌城南垣和东垣南段保存较好，夯层中杂有大量汉代灰色绳纹陶片。城西有郭城遗迹，城南有冶铁遗址。①

1978 年，南京博物馆对扬州市北蜀岗的古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试掘，出土了东晋广陵城墙砖，初步搞清了古城的时代、沿革情况。1984 年，镇江博物馆在镇江市东北发现一段古城，城上和城内发现汉至隋唐的古墓 19 座，出土大量砖、瓦、陶瓷等器物。通过考古发现和文献对比，推测该城为东晋陵罗城遗址。②

此外，在东北及北方边疆地区，主要有魏晋十六国少数民族、游牧民族和高句丽遗址，而北魏迁洛阳前的城址分布在今内蒙古大青山以北、南迄山西大同一带，还有在今陕西靖边县城北的大夏和吐谷浑城遗址。西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是吐鲁番县城东南的哈拉和卓（高昌）城址及雅尔湖古城遗址。③

3. 手工业遗址

中原地区的手工业遗址主要以采矿为主，分布于晋南、豫西地区。以山西运城洞沟铜矿遗址为代表，矿洞内发现铁锤、铁钎等采矿工具，矿洞附近分布着冶炼遗址。此外在河南渑池的铸铁作坊遗址，出土大量铁器农具、手工业工具和兵器，经化验和研究表明，这是中国早期钢制农具和工具的一次重要发现。④

南方手工业遗址主要是以青瓷器的烧造为主，多分布于浙江和江苏靠近浙江的个别地点。龙窑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上虞曹娥江及其支流两岸的窑址。上虞鞍山吴窑保存完整。上虞帐子山发现的晋代残窑，窑床内保存的窑具自前向后排列有序。这表明龙窑从南朝时期就开始走向定型化。江苏宜兴也发现了均山吴晋青瓷窑址群，出土青瓷种类繁多，造型成熟，胎釉细腻精致，反映了宜兴青瓷窑器在西晋时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其他的青瓷窑址还有湖南湘阴窑和岳州窑、江西丰城窑等。⑤

4. 佛教遗存

东汉以后佛教传入中原大地并逐渐盛行，因此这一时期的佛教遗迹保存较多。

---

① 蒋赞初等：《湖北鄂城六朝考古的主要收获》，《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蒋赞初：《六朝武昌城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

② 罗宗真：《魏晋南北朝考古》，文物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3 页。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23—429 页。

④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20 页。

⑤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22 页。

中原和北方地区是我国佛教遗存比较集中的地区。5世纪以后的北朝，石窟大量开凿，最著名的莫过于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龙门石窟。

敦煌莫高窟位于甘肃敦煌东南鸣沙山东麓断崖上。据文献记载，洞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南北朝一直到隋唐宋元，历代不断增修。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一些探险者盗掠了大批文物，使得敦煌石窟遭受巨大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对石窟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加固，并于1963—1966年、1979—1980年不断进行考古发掘和整理研究，又发现了不少窟前建筑、洞窟和文物。在其南区崖面上，上下开凿有5层492个窟，现存壁画约4.5万平方米、彩塑2 400躯。这是中国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石窟。随着研究不断发展，"敦煌学"日益发展。①

位于甘肃省永靖的炳灵寺石窟，其第169窟中标有"建弘元年岁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420年)字样，这是现存最早的开窟纪年题记，为石窟断代提供了重要标尺。②此外，还有甘肃榆林窟、玉门昌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肃南金塔寺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庆阳平定川石窟、庆阳南北石窟寺、陕西耀县药王洞石窟、河南巩县石窟、河北响堂山石窟等。

佛寺遗址方面，洛阳永宁寺遗址是现知南北朝时期唯一可以大体复原的佛寺遗址，通过考古发掘揭示出该寺平面呈长方形，永宁寺塔位于寺院正中，塔北有佛殿遗迹。③

南方地区开窟凿像之风远逊于北朝，仅知有南京栖霞山南齐永明二年迄梁天监十年(484—511年)营造的无量寿佛石窟和浙江新昌石城山永明四年创建、天监十五年竣工的弥勒佛石窟，其主像与外观均与同时期的北朝石窟有别。南方地面建寺盛于开凿窟龛，但已发现的寺院遗迹也甚少，较重要的是成都西门外万佛寺遗址，该地先后出土了一批罕见的萧梁石像，其中中大通元年(529年)梁武帝的孙子益州刺史萧范所造释迦立像，可以视作南朝后期佛像的典型。④

5. 帝王陵墓和世家大族墓

现在发现的曹魏时期的陵墓主要集中在洛阳地区，在形制、结构等方面仍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敦煌石窟"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115页。

② 甘肃省博物馆等：《炳灵寺石窟》，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基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北魏洛阳永宁寺西门遗址发掘纪要》，《考古》1995年第8期。

④ 罗宗真：《魏晋南北朝考古》，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62—65页。

沿袭东汉晚期风格。魏武帝曹操的高陵、魏文帝曹丕的首阳陵，其地望还无线索。①

关于西晋陵墓，崇阳陵是司马昭的陵墓，位于洛阳北邙山南麓枕山头。已勘察，但未进行发掘。峻阳陵是武帝司马炎的陵墓，尚未发现陵垣遗迹。②

十六国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立国时间短，且丧葬习俗为浅葬，故该时期陵墓资料，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均很少。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北魏盛乐故城北（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附近）发现了几处鲜卑时代到北魏时期的墓地，并发掘了一座北魏时期的大型壁画墓，这为探讨北魏早期皇陵提供了线索。太和五年（481年）北魏孝文帝在平城方山为其祖母（魏文成帝拓跋睿之妻冯氏）修建了永固陵，并在陵后方修建了自己的寿宫万年堂。1976年，考古工作者对永固陵和万年堂进行了发掘。因多次被盗，出土随葬品很少。仅万年堂甬道内石质券门上的武士浮雕较为珍贵。③

北魏迁都洛阳后，开始在洛阳附近的邙山修筑陵寝。1991年6月，考古工作者对洛阳附近邙山上的北魏宣武帝景陵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为砖室墓。至少被两次盗掘。出土器物经整理粘对，得完整及可复原者45件，分属青瓷器、釉陶器、陶器、石器、铁器等五类。其中方形四足陶砚和龙柄盘口壶、龙柄鸡首壶等青瓷器，颇有价值。④

南方六朝的帝王陵墓，主要集中在南京及其附近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考古调查，地面有遗迹可考者33处，其中世家大族墓占突出地位。具有代表性的有江苏南京象山王氏墓群、老虎山颜氏墓群、雨花台和铁心桥谢氏墓群及宜兴周氏墓群。这些葬地的选择和排列十分讲究风水、辈分。墓中出土的文物可以反映士族门阀制度的很多内容。⑤

（三）隋唐遗址考古新发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隋唐考古发展迅速，在城市遗址、墓葬、宗教遗址、手工业遗址、石刻、窖藏文物等方面的考古发掘收获颇丰，各种考古调查、考古简报、考古报告和研究成果更是数以千计。以下略作记述。

---

①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西晋帝陵勘察记》，《考古》1984年第12期。

③ 大同市博物馆等：《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等：《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

⑤ 罗宗真：《魏晋南北朝考古》，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141页。

1. 城市遗址

隋唐时期重要城址，目前已经发掘的有20余处。其中作为隋唐都城的隋唐长安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的重点。

隋唐长安城兴建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开皇三年，定名为大兴城。唐朝建立后仍以大兴城为都城，改名为长安城。直到唐末天祐元年（904年）被废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于1957年对城址进行了初步勘探，此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城址进行了全面勘察和部分发掘，从而对城址的平面布局、坊市的形制、宫殿的分布及其建筑基部的构造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①

隋唐长安城，规划、布局严密，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城市的典型。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城内大明宫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发掘的主要有大明宫正衙含元殿遗址和宴会群臣的麟德殿以及与道教有关的三清殿等遗址。隋唐长安城在中国都城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特别是其形制，不但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典型，也影响了邻近国家都城的形制。②

隋唐两代的东都洛阳，位于河南洛阳城区及近郊，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宇文恺所营建，次年建成。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54年对隋唐洛阳城进行了勘察，1959年重点探索了宫城、皇城及周围小城的平面布局，确定了一些门址的具体位置，并发掘了皇城南面的右掖门。1960—1965年继续勘察了街道、里坊及市场位置，同时在宫城内做了发掘工作。洛阳城的建筑规模略小于长安城，但宫城、皇城的位置选择在郭城西北地势较高的地方，其注重安全防御远甚于长安城。城内三市的位置都傍临河渠，比长安城更多地考虑了工商业的繁荣。城市中里坊的设计，不仅影响了当时国内各地城市的营建，也为周围国家都城所效仿。③

地方上值得注意的城址有隋唐扬州城遗址、北庭都护府遗址、西州高昌古城遗址、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等。

隋唐时期的扬州城，因隋炀帝在此建江都宫，其城市规模不同于一般地方城

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城考古记略》，《考古》1963年第11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1995—199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3期；刘致平等：《麟德殿复原的初步研究》，《考古》1963年第7期；马得志：《唐长安城发掘新收获》，《考古》1987年第4期。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察和发掘》，《考古》1961年第3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年第6期。

市。对扬州唐城的考古发掘时断时续,其中以 1978 年对子城北墙的发掘和 1986—1988 年的全面考古勘察和发掘最为重要。隋江都城坐落在今扬州市北蜀岗上,唐代扬州城子城沿用隋江都宫城遗址,并在蜀岗下营建罗城,现已勘测清楚子城与罗城的范围,并根据地层堆积确定罗城约修建于 9 世纪。罗城为里坊区,安置工场市肆和居民。现基本能复原罗城内道路、水道网络及里坊分布的整体面貌。①

北庭都护府遗址,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北的护堡子,唐长安二年(702 年)时设北庭大都护府。1979—1980 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两次调查和测图,并在城西发现一处高昌回鹘时期佛寺遗址,出土大量泥塑像和精美壁画。城址现存内外两重城墙,从中可以看到唐代州级边防城市建筑布局。②

西州高昌故城,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城西,临近哈拉和卓。此遗址始建于汉魏时代,历高昌郡治、高昌国都、唐西州州治、高昌回鹘国都等阶段,元末明初废弃。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先后到高昌故城掠夺文物。1928 年和 1930 年,黄文弼曾两次到古城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设立了文物保护管理所,开展了古城研究工作。遗址分内城、外城。内外城中有多处残存建筑遗址,在佛塔塔基和残窟中仍有残存壁画。其中以回鹘时期的摩尼教壁画、塑像、经典及文书数量最多、最负盛名。③

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位于黑龙江宁安市,是靺鞨族渤海国所建都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 1963—1964 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发掘。发掘表明,其与隋唐城址一样属封闭式城市。宫城居全城北部中央。由南北大街三条和东西大街五条构成规整的里坊区。此后的一系列考古工作,又发掘出了东半城的一号佛寺主殿、宫城台基、宫城门址、官衙址、古道等遗址。④

此外还有位于甘肃境内的唐沙州城、寿昌城和瓜州城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隋大同城遗址,隋唐胜州城遗址、唐丰州城、唐天德军城遗址等;位于云南省境内的南诏太和城和阳苴咩城遗址等。

2. 隋唐墓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对隋唐墓葬进行了大量的勘察和发掘,对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扬州城考古工作简报》,《考古》1990 年第 1 期;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事业五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庭都护府城址”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2 页。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高昌古城遗址”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34 页。

④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4 页。

其形制、规模、地面遗存等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除了发表在《文物》、《考古与文物》等杂志上的大量研究论文、发掘简报以外，还有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 1964 年版)，其中引用了已经发掘的 175 座隋唐墓资料；文物出版社《唐长安城郊隋唐墓》，介绍了 6 座具有典型意义的墓葬；黄景略、叶学明《中国历代帝王陵墓》(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有更全面的说明。

隋代帝陵中，隋文帝杨坚死于仁寿四年(604 年)，同年十月与皇后独孤氏合葬于太陵。太陵位于今陕西省扶风县东南的五泉乡王上村旁。隋炀帝杨广于大业十四年(618 年)被宇文化及等人所杀，葬于今江苏省扬州市北的雷塘。恭帝杨侑投唐为臣，故不以帝礼葬。隋代的帝陵均未正式发掘。①

唐代共 21 帝，其中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合葬于乾陵，唐末的昭宗李晔葬于河南渑池和陵，哀帝李柷葬于山东菏泽温陵，其他 18 个皇帝的陵墓都在渭河以北的礼泉、乾县、泾阳、三原、富平、蒲城六县境内，东西绵延达 100 余里，以西安为中心呈一弧形展开。除乾陵外，其余各陵大多被盗掘，至今尚无一进行正式发掘，但均已经勘查或部分试掘，地面遗存极为丰富。②

唐陵石刻是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瑰宝，其题材和雕刻手法均大大超过了以前的陵墓石刻，既有圆雕，也有浮雕和线雕。昭陵，有唐高宗永徽年间所立的 14 尊“番酋”像，在东西两庑还有唐太宗生前所乘的六匹战马的浮雕——昭陵六骏。自乾陵以后，石刻群的组合基本固定，按不同性质，可分为 6 类：狮子，石人、石马和马夫，异兽和北门六马，“番酋”像，华表，碑石、无字碑和述圣记碑。③

此外，对昭陵和献陵的一些陪葬太子、公主和勋臣墓进行了清理发掘。其中有昭陵陪葬墓中的长乐公主墓、李勣墓、程知节墓、郑仁泰墓，陪葬乾陵的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等。许多墓中的壁画十分精美。④

3. 手工业遗址

窑址方面，隋唐时期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阶段，传统的青瓷生产有

---

① 秦浩编著：《隋唐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0 页。

② 贺梓城：《关于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1980 年第 3 辑。

③ 阎文儒：《关中汉唐陵墓石刻题材及其风格》，《考古与文物》1986 年第 3 期；张崇德：《唐代建陵及其石刻》，《考古与文物》1988 年第 3 期。

④ 昭陵博物馆：《唐昭陵长乐公主墓》，《文博》1988 年第 3 期；陕西省博物馆等唐墓发掘组：《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 年第 7 期；陕西省博物馆等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 年第 1 期；陕西省博物馆等唐墓发掘组：《唐永泰公主墓壁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7 年版；陕西省博物馆等唐墓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 年第 7 期。

了进一步的发展，白瓷生产越趋成熟，形成“南青北白”的局面，生产工艺相互融合，争相斗艳。除了举世闻名的邢、越两窑之外，全国各地的民窑也是蜂拥而起。通过大量的发掘和广泛调查，隋唐五代窑址至少遍及14个省、市、自治区以上。①

以相州为中心的隋代北方瓷窑向南北扩展，苏、浙、皖、赣、鲁、湘、闽、川等省都有新的发现。隋代瓷器的窑场主要以河南安阳窑、湖南湘阴窑和安徽淮南窑最为引人瞩目。②

唐代以后，烧制白瓷的窑址主要有河北临城、内丘交界处的邢窑遗址，位于河北曲阳涧滋村的曲阳窑，以及河南巩县、密县窑，江西景德镇窑等。

烧制青瓷的主要有分布于浙江东部的越窑，浙南瓯江之滨的瓯窑，浙江金华、义乌一带的婺州窑，湖南湘阴的岳州窑，湖南长沙的长沙窑，江西南昌的洪州窑，四川邛崃县的邛窑等。越窑产品质量最优，是唐代青瓷代表作。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河南巩县以及陕西铜川耀州窑发现了烧制唐三彩的窑炉，这为研究三彩的烧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③

还有一些考古发现也能够反映隋唐时期手工业的发展水平。1997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垣曲、夏县、平陆三县黄河沿岸，共发现和勘测黄河古栈道遗迹5 000余米。发现方形壁孔、牛鼻型壁孔、桥槽孔、底孔2 600余个，经初步研究，古栈道始建于汉，繁盛于唐。黄河古栈道的考古工作对隋唐漕运史的研究帮助极大。④

1991年，开始发掘山西永济蒲津渡遗址，出土了唐代所铸铁牛四尊。铁牛身长约3米、高1.9米，形体矫健强壮。每牛由一铁人策之，面向西，分南北两排前后站立。这座古渡口遗址的发掘，对历史地理、桥梁交通、冶金科技史等多学科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⑤

4. 宗教遗迹

隋唐时期，佛教、道教得到了充分发展，这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宗教遗址主要是石窟寺遗址、遗存塔寺和地下发掘的寺院遗址以及佛塔基址。

① 详见中国硅酸盐协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② 《河南安阳隋代瓷窑址的试掘》，《文物》1977年第2期。
③ 以上三段详见李德金：《古代瓷窑遗址的调查和发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版，第634—639页。
④ 张庆捷等：《黄河古栈道的新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98年第8期。
⑤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工作五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对寺院遗址的发掘，主要有长安城内青龙寺、西明寺的发掘工作。[①]此外，20 世纪 80 年代，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发掘了有别于中原地区的佛寺建筑，发现有精美的壁画、塑像，应是高昌回鹘建造的王家寺院。[②]

对于隋唐佛塔塔基的发掘有许多重要发现，其中尤以唐法门寺地宫最为重要。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建于唐咸通十五年（874 年），其地宫中保存着中国目前唯一的释迦牟尼真身舍利。1981 年，在对寺中唐代塔基的考古发掘中取得了重大收获。出土文物有舍利 4 枚，以及大量金银器、珍珠、宝石、玉器、瓷器、石质文物、漆木器、丝绸织品等。其出土文物代表着晚唐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③]

此外，还有甘肃泾川大云寺塔基地宫、陕西临潼庆山寺塔基地宫等。[④]

（四）宋元明遗址考古新发现

宋元明考古，按朝代来划分包括两宋、辽、金、元、明等朝代以及西夏、于阗、回鹘、大理等地方政权。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址遍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境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宋元明考古得到了实质性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考古工作是以考古调查为主，重要的工作是对边疆地区废弃城址的调查和发掘，皇陵方面则是对明定陵和西夏王陵的发掘。此后，宋元明考古得到了长足发展。从城市的调查勘探，到陵墓群的考察，再到手工业、矿业和交通运输遗迹的发掘等。

1. 城市遗址

关于宋元明时代城市遗址的考古收获，都城方面主要是北宋东京汴梁城、南宋临安城、辽中京、金中都、元大都的考古勘测和发掘。

北宋时期的东京汴梁城位于今河南开封市。1981 年，在清理旧城区的龙亭东湖淤泥时，发现了宋代宫殿基址和明周王府的部分遗址，拉开了开封宋城考古序幕。此后的 20 年间，实测并解剖发掘了汴梁城外城遗址，确定了 10 座城门位置；勘探并试掘了内城，弄明了其四墙位置、走向；考古工作的重点是发掘宋皇宫，探明了四墙位置，发现了明紫禁城城墙，城下压着宋皇城北墙。此外，还发掘了一些重

① 安家瑶：《唐长安城西明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唐研究》第 6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1 年版。

③ 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 年第 10 期。

④ 甘肃省文物队：《甘肃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文物》1966 年第 3 期；临潼县博物馆：《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理记》，《文博》1985 年第 5 期。

要遗迹。①

临安城位于今浙江杭州市，是南宋时期的都城。它始建于隋代，五代钱氏定为都城，北宋时期成为东南地区重镇。金人南下，临安成为南宋政权"临时避难所"。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对南宋临安城尤其是皇城开始了大规模勘察和发掘工作。经过四次发掘，探明了南宋皇城宫殿区范围，发现了一些与皇城有关的建筑遗址；证明了文献中关于西墙仅有一段，其余以凤凰山为屏障的记载。此后，又发现了御道、六部衙署、太庙、德寿宫、恭圣仁烈皇后宅、老虎洞官窑等重要遗址。②

早在 20 世纪初，西方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便对辽金时期都城遗址作过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考古工作者对辽王朝五京中的上京、中京和南京开展了较系统的考古工作。辽上京遗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南，是辽五京中开建最早、最重要的都城。在建制上，辽上京由南、北二城构成，北曰皇城，南曰汉城。这种两城制是辽推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政策的产物，对后世影响很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对皇城进行重点勘探，并测绘了平面图和地形图。1997 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采用航空摄影方法对上京城做了全新的考察。③

辽中京遗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1959—1960 年进行的勘察和发掘，探明了城址的布局以及外城、内城、宫城的方位。在外城还发掘了宫署、庙宇和廊舍遗址。辽中京的勘察和发掘表明，它比辽代初期所建的上京，更多地模仿了中原都城的制式。④

金代都城以金上京和中都为代表。金上京遗址，位于黑龙江阿城县南，平面建制模仿辽上京，分为南北二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黑龙江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多次勘察，实测了上京遗址，并试掘了周边地区遗迹，出土一些金代遗物。⑤

金中都城址，位于今北京城西南部宣武区境内，是金海陵王即位后在辽南京旧

---

① 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开封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南宋临安城皇城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 · 1993 年》，文物出版社 1995 年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杭州发现南宋六部官衙遗址》，《杭州考古》1995 年第 12 期。

③ 辽宁省巴林左旗文化馆：《辽上京遗址》，《文物》1979 年 5 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上京城址勘查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年版；中国历史博物馆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等：《内蒙古东南部航空摄影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④ 辽中京发掘委员会：《辽中京城址发掘的重要收获》，《文物》1961 年第 9 期。

⑤ 许子荣：《金上京会宁府遗址》，《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 年第 1 期。

城基础上扩建的。对金中都的考察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1966年开始进行了全面的勘察，掌握了金中都的基本结构。1990年又发现了金中都水关遗址，为了解金中都内水系流向提供了实物依据。从金中都的设计上看，一方面是中轴线得到了强化，另一方面封闭的坊制和开放式的长巷制共存，反映出中国的城市规划从隋唐的坊制向宋以后的长巷制转化。①

元代都城遗址以元上都和元大都为主。元上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元亡后遭废弃。如今保存完好，已成为一处游览胜地。该遗址由宫城、皇城、外城和关厢等部分组成，城内安排自由，并不严格对称。1956年和1973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上都进行调查，基本摸清了上都的城市构造。②

元大都位于北京旧城及其以北地区。1964—1974年，考古工作者用了10年的时间勘察了元大都的城垣、街道、河湖水系等遗迹，发掘了十余处不同类型的居住遗址和建筑遗存，出土了大量的瓷器等生活用品。使人们对元大都的平面布局、建筑形式和技术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③

此后的南京城和明清北京城，继承了历代都城建设经验，其雄伟、严谨、周备，体现了明清两代大一统帝国的气势。④

在地方城址的考古方面，主要有宋代扬州城遗址、洛阳城遗址、江西赣州宋代古城遗址，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和东三省辽、金、元城址的调查和发掘。⑤

2. 主要墓葬遗迹

宋代墓葬中，北宋皇陵位于河南巩义市西南，地理上位于嵩山与伊洛河之间的丘陵地带。其营建始于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至北宋亡。陵区葬有被追尊为宣祖的赵弘殷的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等，共七帝八陵。北宋皇陵在金代初期遭到严重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农田改造也对宋陵造成了一些破

① 阎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第9期；《金中都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年》，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金中都“太液池”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年》，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② 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文物》1977年第5期。

③ 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调查与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徐苹芳：《元大都的勘察与发掘》，载徐苹芳《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5年版。

④ 徐苹芳《明北京城》、罗宗真《明南京城》，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⑤ 扬州城考古队：《江苏扬州宋三城的勘探和发掘》，《考古》1990年第7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发现宋代门址》，《文物》1992年第3期；李海根等：《赣州古城调查简报》，《文物》1993年第3期。

坏。对巩县宋陵的考古工作始于 20 世纪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陆续对宋陵进行调查和发掘，取得了一些成果。1992—1995 年，为了配合宋陵保护方案的制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宋陵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试掘和文物建档工作，对宋真宗永定陵上宫进行了勘察试掘，发掘了永定禅院，对宋陵有了更全面、详实的认识。

北宋皇陵，诸陵建制大致相同，皆由兆域、上宫、下宫、祔葬后陵和陪葬墓组成。地宫又称玄室，尚未发掘。北宋皇陵留下了丰富的石刻艺术，现存的望柱、人物、动物和上马石等达 800 余件。①

南宋帝陵都葬于绍兴东南的宝山，始建于绍兴元年(1131 年)，建造简单，故称之为"攒宫"。元初时遭到彻底破坏，废陵毁尸，攒宫遗迹已无存。

辽代帝陵中开展考古工作较充分的是庆陵。它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白塔子北大兴安岭山中，包括辽圣宗的永庆陵、兴宗的永兴陵和道宗的永福陵。其中以永庆陵保存最为完好。墓室都是有前、中、后室以及四个侧室的七室墓。三陵出土文物大部分已经遗失，仅存部分石刻哀册，其中有五盒汉文哀册、两盒契丹文哀册。②

金陵位于今北京市房山区大房山，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 年)迁都后所建，葬有从上京迁来的太祖、太宗陵和太祖以上、始祖以下十帝陵以及在中都埋葬的五代帝陵。20 世纪 50 年代，考古工作者做过一些地面调查。1986 年和 2001 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制定金陵考古课题，进行了两次详细的考古调查，大体确定了金陵的位置，发现并清理了世宗之父睿宗景陵前的陵碑、御道等遗迹。金人墓葬既保有自己的特色，又加上契丹人和汉人的墓葬风格，因而造成了金墓多元化的状况。③

元代皇帝和蒙古宗室贵族死后，都"秘葬"于蒙古高原。尽管学者们为了寻找元陵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至今未发现其踪迹。

明帝陵的发掘是明代考古的重头戏。明帝陵共有 5 处，位于今安徽凤阳城南

---

① 郭湖生等:《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考古》1964 年第 11 期;傅永魁:《巩县宋陵》,《河南文博通讯》1980 年第 3 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 年第 3 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② 李逸友:《辽庆陵》,《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

③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金墓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一辑 1983 年;徐苹芳:《金元墓葬的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宋大川等:《金陵遗址第一阶段报告》,《北京文博》2001 年第 3 期;宋大川等:《金陵遗址主陵区第二阶段调查报告》,《北京文博》2002 年第 3 期。

的太祖朱元璋父母的明皇陵，位于今江苏泗洪县东南的朱元璋祖父的明祖陵，南京钟山南麓的朱元璋的明孝陵，北京金山的景帝朱祁钰的景泰陵以及北京昌平天寿山下的十三陵。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主要对十三陵中的定陵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察和发掘。从 1956 年开始发掘，到 1958 年结束玄宫内的器物清理，历时两年两个月。

定陵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墓，位于十三陵陵区中部偏西的大峪山下。始建于万历十二年(1584 年)，历六年而成，墓中合葬有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定陵的玄宫由前殿、中殿、后殿和左右配殿组成，全部用石材起券建造，总面积达 1 195 平方米。地宫随葬品大多放在后殿宝床上和梓宫内，分为葬仪用具和生活用具两大类，总计出土器物 2 648 件。其中万历金冠、凤冠等是罕见珍品。②

明代墓葬除了帝陵之外，还有明鲁荒王朱檀、宁王朱权等的坟墓。③异姓王坟墓主要有南京附近的东胜侯汪兴祖墓、黔宁王沐英墓和定远王沐晟墓、安徽蚌埠东瓯王汤和墓等。另外在贵州、湖南等地发现了家族墓地，其构造与明皇族、贵族墓不同，体现出少数民族地区墓葬特色。

3. 手工业遗址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陶瓷器生产的黄金时期。一谈宋元瓷器，言必称“五大名窑”、“六大窑系”。对这一时期瓷窑遗址所开展的考古工作较多，研究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④

宋元制瓷业的发达主要表现为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民间窑场普遍增加，发现的窑场遗迹遍布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的近 150 余个县，南北方同时繁荣，各取所长；各地纷纷发明和采用新的工艺技术，形成各处独有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一些以某些特定的制瓷传统为主要产品的生产区域。宋代商品生产的发展促进了陶瓷外销的发展，扩大了中国的对外影响力。⑤

明代是中国古代瓷器制造业又一个高峰。关于这一时期窑址的调查和发掘，

---

① 徐苹芳：《明皇陵与祖陵》，《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
③ 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 年第 5 期；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 年第 4 期。
④ 马文宽：《中国古代瓷器考古与研究五十年》，《考古》1999 年第 9 期。
⑤ 详见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

除了御窑厂遗址，还有景德镇民窑、德化窑、漳州窑、宜兴窑、玉溪窑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瓷窑。从20世纪7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对景德镇官窑遗址进行发掘和研究，确定了明代御窑厂的范围，并从考古中获知，御窑的窑炉除了文献所说的分色窑、青窑、缸窑、匣钵窑外，宣德时期的窑炉是马蹄形半倒焰式窑，几座窑炉并连也是御窑厂的建窑特色。此外，御窑厂在釉色品种方面发扬光大了传统品种，并有所创新。其中以青花、釉里红两种最为著名。①

景德镇各处的民窑以仿烧官窑青花为主。宜兴窑则烧制紫砂器，在嘉靖、万历年间涌现出以时大彬为代表的紫砂名家。此外，德化窑最著名的是以乳白釉为特征的德化白瓷，即欧洲人所说的“中国白”或“鹅绒白”。漳州窑大量吸取了景德镇及北方地区先进制瓷工艺，形成独具特色的砂底青花瓷器，又称“克拉克”瓷，与“吴州赤绘”(红绿彩瓷)、“交趾三彩”(带紫色彩的三彩器)合称“汕头器”，是明代后期重要的外销产品。②

宋元明时期的冶铸和矿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生产规模扩大，产地范围扩展，行业内分工更加细致，劳动工具逐渐完善。考古发现的该时期冶铁业遗址有湖北铜绿山炒钢炉、河北邢台的官督民营冶铁作坊、安徽繁昌冶铁遗址以及河南安阳县的冶铁遗址等。③铜矿业遗址发现较少，主要有河南镇平县楸树湾铜矿洞、安徽铜陵铜矿遗址等。④

宋元时期的采矿业中，最突出的是煤炭的大量开采和采煤技术的进步。1960年在河南鹤壁发现了宋代煤矿遗迹，其中包括1个井筒、4条较大的巷道、10个采煤区以及提升、照明、运煤等工具。⑤

4. 水下考古

随着20世纪后半期现代潜水技术的发展，考古学的研究对象逐渐扩展到水

① 刘新园：《景德镇出土明成化官窑遗址与遗物之研究》，《成窑遗珍——景德镇珠山出土成化官窑瓷器》，香港徐氏艺术馆1993年版；潘文锦：《明代景德镇几种色釉的特点与工艺》，《中国陶瓷》1982年第7期。

② 详见梁白泉：《宜兴紫砂》，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福建省博物馆：《德化窑》，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 朱寿康等：《铜绿山宋代冶炼炉的研究》，《考古》1986年第1期；唐云明：《河北邢台发现宋墓和冶铁遗址》，《考古》1959年第7期；胡悦谦：《繁昌县古代炼铁遗址》，《文物》1959年第7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省五县古代铁矿冶遗址调查》，《华夏考古》1992年第1期。

④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省镇平县楸树湾古铜矿冶遗址的调查》，《华夏考古》2001年第2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铜陵市古代铜矿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6期。

⑤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鹤壁市古煤矿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底遗物。海底遗宝不断被发现，水下考古学也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这为人们探索古代海上文明开辟了新的途径。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水下考古取得了许多重大发现。①

1987年，在广州台山海域发现“南海一号”宋元沉船。出土了大批瓷器和镀金器、锡器、铜器、陶器等。可以推知“南海一号”沉船是宋元时期的一艘海上贸易货船。②

1990年，在福建定海进行了白礁宋元沉船调查行动，这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水下考古专业人员。经水下考古确认，该沉船紧靠暗礁，当为触礁沉没。黑釉盏是其代表遗物。③

1991年，在辽宁省绥中县三道岗海域发现元代沉船。此后六七年间，对其进行了六次水下考古发掘，是中国第一次独立开展的水下考古发掘工作，成功发掘出水文物2 000余件，种类包括罐、盆、碟、碗、瓶等瓷器以及大量成摞的铁锅、铁犁铧等铁制用品。④

同期，西沙群岛诸沉船的调查、东海海域的勘察等，也为人们了解宋元时期海上贸易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可靠的实物资料。⑤

十、简帛出土与历史研究⑥

简帛的出土是中国20世纪考古发现的重要成果之一。关于简帛的定义，可以从它们的材质载体和文字内容两个方面来界定：“就材质而言，它指文献记载中通常所说的‘书之竹帛’，即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有墨书文字的竹、木简牍和绢帛的总称；就文字而言，它仅指汉语言文字资料，而不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内。”⑦

---

① 张威等：《中国水下考古大事记》，《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俞伟超：《十年来中国水下考古学的主要成果》，《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

② 张威：《南海沉船的发现与预备调查》，《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任卫和：《广东台山宋元沉船文物简介》，《福建文博》2001年第2期。

③ 保罗·克拉克：《中国福建省定海地区沉船遗址的初步调查》，《福建文博》1990年第1期；中澳联合定海水下考古队：《福建定海沉船遗址1995年度调查与发掘》，《东南考古研究》第2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④ 孙键：《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的发现》，《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08年第4期。

⑤ 栗建安：《福建水下考古工作回顾》，《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崔勇：《广东水下考古回顾与展望》，《福建文博》1997年第2期。

⑥ 本节主要参考了：谢桂华等：《20世纪简帛的发现与研究》，《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沈颂金：《20世纪简帛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等。

⑦ 谢桂华等：《20世纪简帛的发现与研究》，《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中国简帛出土的记载,始见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因此,孔子故宅中的这次竹简发现,可以说是中国简帛出土的最早记载。从此以后,汉宣帝时期、西晋武帝时期、南朝刘宋和萧齐、北朝北周、唐、宋等朝代大多有简帛陆续出土的记载。虽然这些简帛出土还不是专业性质的考古发掘,这些实物也已经荡然无存,但却可以从文献的记载中对于简帛出土的历史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简帛出土,是从 1901 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新疆尼雅故城发现汉晋木简和残纸开始。此后,日本大谷考察团的橘瑞超等人先后到新疆、甘肃等地的尼雅、楼兰和敦煌等处进行考古调查,相继发现了数量更多的汉晋木简和文书,并在二三十年内出现了简帛出土与研究的高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简帛的出土与发现、整理工作进一步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这些已经出土的简牍主要是战国简、秦简、汉简、三国两晋简,出土的帛书主要是敦煌帛书、战国楚帛书和马王堆汉墓帛书。

由于简帛的内容广泛,引起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和多个层次进行研究,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学科——简帛学。以下概要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2000 年的简帛出土、发现和整理、研究情况。

(一) 简帛的出土、发现与整理

以下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介绍:

1. 1949 年 10 月至 1966 年 5 月

与 20 世纪上半期的简帛发现相比,这一时期的简帛发掘在数量上和地域上均取得重大突破,主要出土发现有:

(1) 五里牌楚简。1951 年,在湖南省长沙市近郊五里牌 406 号古墓中,发掘出土 37 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内容为记载随葬器物的清单,即遣策。详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等。

(2) 仰天湖楚简。1953 年 7 月,湖南省长沙市南门仰天湖 25 号战国古墓中,发掘出土竹简 43 枚,内容为遣策。详见《湖南省文管会清理长沙仰天湖木椁楚墓发现大量竹简彩绘木俑等珍贵文物》(《文物参考资料》1953 年第 12 期),史树青《长沙仰天湖楚简研究》(群联出版社 1955 年版)等。

(3) 杨家湾楚简。1954 年,湖南省长沙市杨家湾 M006 号战国墓中,发掘出土竹简 72 枚。详见《长沙杨家湾 M006 号墓清理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4 年第

12期)和《长沙出土的三座大型木椁墓》(《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4) 长台关楚简。195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在河南信阳发掘长台关1号战国墓时,出土竹简229枚,其中包括一篇记载申徒狄和周公谈话的短文和遣策。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完整公布了该墓竹简、释文及考释。

(5) 武威汉简。1959年,甘肃省博物馆先后发掘了武威磨咀子6号和18号汉墓。从6号墓出土竹木简600余枚,内容属于《仪礼》、《服传》和《丧服》等。其中《仪礼》简为《仪礼》的版本、校勘提供了重要资料。详见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考古》1960年第5期)。从18号墓出土10枚木简,即"王杖十简"。详见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汉墓发掘》及考古研究所《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王杖十简释文》(《考古》1960年第9期)。

(6) 望山楚简。1965年秋,在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望山1号楚墓中,出土竹简24枚,内容为论述祭祀礼仪的文稿。望山2号楚墓出土竹简13枚,内容为遣策。详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版)。

2.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

这一时期,简帛出土的地区大大扩展。其主要出土发现有:

(1) 1966—196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53号墓出土晋泰始九年(273年)木简1枚,内容为私人书信。详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

(2) 甘谷汉简。1971年,在甘肃省甘谷县,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座东汉时期的墓葬,从中清理出木简23枚。内容记载了东汉桓帝延熹元年(158年),宗正府卿刘柜上报皇帝的奏章,以及皇帝颁发的诏书。详见张学正《甘谷汉简考释》(《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 武威汉代医简。1972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的一座东汉墓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土92枚木简,内容多为医方类,共有医方30多个,涉及内、外、妇、五官和针灸等科,方剂中所列药物有100多种,其中20余种为《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等书所无。详见甘肃省博物馆等《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

(4) 居延新简。1972—1974年,甘肃额济纳河流域居延地区的汉代城障烽塞中发掘出土近2万枚汉简,内容包括诏书、律令、科别、品约、牒书、推辟书、爰书、劾状、各类簿籍以及干支表、《九九术》以及各种形式的历谱、医药方、《苍颉篇》、《急就

篇》等残简，其中有70多个完整或基本完整的簿册，特别是发现了详细记载有长安至河西20个驿置的里程简，途经京兆尹、右扶风、北地、安定、武威、张掖等郡，这些对于确定西汉京城长安以西、敦煌以东的交通路线具有重大意义。详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华书局1994年版）。

（5）银雀山汉墓竹简。1972年，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出一批竹简，其中1号墓出土竹简4 942枚，内容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等，还有《晏子》等先秦古籍以及《相狗经》、《阴阳书》等残简。其中，《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二者的同时出土，解决了长期以来对于这两部兵书作者问题的困扰。2号墓出土竹简32枚，内容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详见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年版）、吴九龙《银雀山汉墓竹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骈宇骞《银雀山汉墓竹简晏子春秋校释》（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等。

（6）马王堆汉墓竹简。这些竹简分二次出土：第一批，1972年从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中发掘出竹简312枚、木楬49枚，竹简内容为遣策，木楬所书文字是对竹简所载物品的补充说明。这批简牍是迄今所见遣策中竹简数量最多的。详见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第二批，1973—1974年，从马王堆3号汉墓中发掘出竹木简600余枚，其中220枚为4种医书，发表时分别定名为《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详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7）马王堆汉墓帛书。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简牍的同时，还出土了一批汉代帛书，共有26件、12万字，内容以哲学和历史为主，也有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以及各种图籍和杂书。这些帛书中包括《老子》甲乙本及其卷前和卷后佚书、《周易》、《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刑德》、《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五十二病方》及其卷前佚书4篇、《胎产书》、《养生方》、《导引图》及其卷前佚书2篇，此外还有《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等。这批帛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详见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一、三、四（文物出版社1980年、1983年、1985年版），陈松长《马王堆简帛文字编》（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等。

(8) 定州汉墓竹简。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中出土100余枚竹简,但竹简炭化成块,残损严重。经整理后得到一些古籍的佚文,其中有《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保傅传》、《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日书·占卜》、《奏议》等。其中《文子》的出土,不仅证实了这部古籍的存在,而且其内容涉及对天道、功德、仁义和教化等方面颇具特色的阐述,为古代思想史研究补充了新的史料,同时对校勘和辑佚古代书籍也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详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儒家者言释文》(《文物》1981年第8期)、《文子》(《文物》1995年第12期)等。

(9) 凤凰山汉简。1973年,湖北省江陵纪南城凤凰山发掘了8、9、10号三座汉墓,共出土竹简428枚、木牍9方。竹简内容大致可以分为田租账和商业账。详见《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6期)。1975年,又在当地发掘了167、168、169号三座汉墓,出土100余枚竹简,主要为遣策。详见纪南城凤凰山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9期)和《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

(10) 藤店楚简。1973年7月,在湖北省江陵县藤店1号墓中出土竹简24枚,但因出土时残断现象十分严重,仅识别出文字47个。详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县藤店1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9期)。

(11) 1974年,江西南昌M1号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牍1枚。内容为随葬衣物的清单。详见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晋墓》(《考古》1974年第6期)。

(12) 睡虎地秦墓竹简。1975年,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在云梦睡虎地发掘了12座秦代墓葬,其中11号墓出土竹简1 155枚(另有残片80枚)。主要内容包括《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和《日书》甲、乙种等10种。详见云梦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等。

3. 1976年10月至2000年

主要出土发现有:

(1) 阜阳汉简。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竹简6 000余枚。但因墓葬早期被盗,木简损坏十分严重。经过整理有十多种古籍,为《诗经》、《苍颉篇》、《刑德》、《万物》、《日书》、《年表》、《周易》、《行气》、《辞赋》、《相狗经》、《大事

记》、《作务员程》、《杂方》等。其中的《诗经》和《苍颉篇》是现存最早的古本。在出土的木牍文书中，有许多语句在今本《孔子家语》中也可以见到，从而澄清了过去以为《孔子家语》是王肃作伪的说法。详见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 年第 2 期)、《阜阳汉简苍颉篇》(《文物》1983 年第 2 期)和《阜阳汉简诗经》(《文物》1984 年第 8 期)等。

(2) 敦煌等汉简。这批汉简分四批出土：第一批是 1977 年，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在甘肃玉门花海长城烽燧遗址出土木简和觚 92 枚，属于汉代酒泉郡北部都尉的文书档案，最重要者为“武帝遗诏”觚。第二批是 1979 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现为考古研究所)与敦煌县文化馆组成汉代长城调查组，在敦煌小方盘城以西 11 千米的马圈湾一座汉代烽燧遗址，掘获简牍 1 217 枚、帛书 1 件，上面墨书一行，内容与绢帛交易有关。第三批是 1981 年，敦煌市博物馆从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简牍 76 枚。第四批是 1986—1988 年，敦煌市博物馆在文物普查过程中采集到汉简 137 枚。以上这几批汉简的主要内容，大都以边塞屯戍文书为主，其中包括诏书律令、官府公文、各类簿籍、过关符传、来往邮书以及私人信件等。详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3) 随县楚简。1978 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竹简 240 多枚，均为两面书写，大多保存较为完好，为遣策。详见湖北省博物馆《随县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等。

(4) 天星观楚简。1978 年，湖北江陵县天星观 1 号楚墓中出土竹简 70 枚，文字书写在竹黄上，内容为遣策和祷辞。详见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的《江陵天星观 1 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 年第 1 期)。

(5) 大通上孙家寨汉简。1978 年，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在大通县上孙家寨 115 号汉墓出土木简 400 余枚，但大多数已经残断。考古工作者根据字体和内容，把这些简文划分为三部分：其一是与《孙子》有关的兵书，其二是有关军事方面的律令文书，其三是有关军队的编制、阵法和标识。详见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文物出版社 1993 年版)。

(6) 1979 年，江西南昌三国吴墓出土木刺 21 枚、木牍 2 枚，其中 1 枚木牍内容为随葬器物的清单。详见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南昌东吴高荣墓的发掘》(《考古》1980 年第 3 期)。

(7) 青川秦牍。1979 年，四川青川县郝家坪 50 号秦墓发现木牍 2 枚。详见四

川省博物馆等《青川县出土秦更田律：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

(8) 武威汉简。1981年，在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又发现《王杖诏书令》木简26枚，详见武威县博物馆的《武威新出土王杖诏书令册》(《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此外，1989年在武威旱坡滩东汉墓中出土木简16枚，内容主要为养老受王杖的制书和关于王杖受令的律令，坐臧为盗、虫灾、水灾的刑律。详见武威地区博物馆《甘肃武威旱坡滩东汉墓》、李均明等《武威旱坡滩出土汉简考述》(均见《文物》1993年第10期)。

(9) 九店楚简。1981—1989年，湖北省博物馆在江陵九店发掘出一大批墓葬，其中的M56、411、621三座楚墓出土残简、整简共344枚。主要内容：一是与农作物有关，二是与数术方面有关，与云梦秦简《日书》的性质相同。详见荆州博物馆编《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九店楚简》(中华书局2000年版)。

(10) 张家山汉墓竹简。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竹简2 787枚，包括汉律、《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日书》、历谱、遣册等，内容十分丰富。其中《算数书》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数学著作。1985年，张家山336号汉墓也出土了汉律、《功令》、《盗跖》等简牍。汉律的发现，对于秦汉法律的比较研究以及律令的发展沿革的研究，有重要价值。详见荆州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85年第1期)和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等。

(11) 马鞍山三国东吴木简。1984年，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出土木刺14枚以及木楬3枚，详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

(12) 仪征胥浦汉简。1984年，江苏仪征县胥浦101号汉墓出土竹简17枚、木牍2方和封检1枚，其主要内容为墓主临终前所立之遗嘱。详见扬州博物馆的《扬州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文物》1988年第10期)。

(13) 武威等晋简。1985年，甘肃武威旱滩坡19号墓出土东晋木牍5枚，内容为墓主人身份、职位记事和随葬衣物疏。1986年，甘肃高台常封晋墓出土木牍1枚，文字大多磨灭难以识别，上书若干姓名，很可能是往还书信。详见李均明、何双全的《散见简牍合编》(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14）张家界汉简。1987年，湖南张家界古人堤遗址出土简牍90片，属汉代遗物，但这些简牍破损严重，主要内容有汉律及其目录、官府文书、书信及礼物谒、医方、历日表和九九乘法表等六部分。详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张家界古人堤遗址与出土简牍概述》和《湖南张家界古人堤简牍释文与简注》（均见《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2期）。

（15）清水沟汉简。1990年，甘肃敦煌市黄渠乡的一位农民从清水沟汉代烽燧遗址发现汉简27枚、散简14枚。敦煌市博物馆随后又采集到汉简数枚，内容为历谱、符、爰书、品约、簿籍等。其中的历谱为汉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历书，是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历谱，为研究太初改历后的标准历谱格式提供了实物资料。详见敦煌市博物馆《敦煌清水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文物调查及汉简考释》（《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16）敦煌悬泉汉简。1990—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与安西交界处的悬泉置遗址发掘出土3万枚汉简，其中内容包括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簿籍、劾状、爰书、符传、历谱、术数、医方以及一些古籍残片。其中，完整和较为完整的册子共40多个。尤其是邮驿文书和簿籍的发现，对"置"的职能、管理组织和人员构成等都有明确的记载，对两汉邮驿制度研究、中西交通研究、民族关系研究等方面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详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以及《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第5期）。此外，还出土帛书10件，均为私人信札，共370字，是已知西汉时期最完整和文字最多的私人信件。

（17）杨家山秦简。1990年，湖北荆州杨家山135号秦墓出土竹简75枚，内容为遣策。详见荆州地区博物馆的《江陵杨家山135号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8期）。

（18）沙市秦汉简。1990年，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关沮秦汉墓出土秦汉简牍500余枚。1993年，沙市周家台30号秦墓中，又出土竹简387枚，内容为《历谱》、《日书》和《病方及其他》等。详见湖北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2001年版）。

（19）王家台秦简。1993年3月，在湖北江陵荆州镇邱北村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813枚秦代竹简，主要内容为《归藏》、《效律》、《日书》和《易占》等。其中《归藏》简394枚，约4 000余字，使《归藏》这部亡佚已久的上古易书重见天日。详见荆

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 15 号秦墓》(《文物》1995 年第 1 期)。

(20) 郭店楚墓竹简。1993 年,湖北省荆门郭店 1 号楚墓出土一批竹简,计 804 枚,其中儒家类著作有:《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及《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等。道家类有:《老子》甲、乙、丙三组,内容均系摘抄,且彼此不相重复,并附有一篇《太一生水》作为对《老子》的解说与引申。另有《语丛》四组,内容均为杂抄百家之说,很有可能是当时的教学用书。详见荆州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一书(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

(21) 尹湾汉墓简牍。1993 年,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 2 号、5 号汉墓分别发掘出土木牍 24 枚和竹简 133 枚,共计 4 万余字。这些简牍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包括《集簿》、《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元延元年历谱》、《神乌傅(赋)》等。其中对于西汉时期东海郡的上计和吏员设置、任命、升迁、考绩和巡行视察等内容的记载,是已发现的中国最早和较完整的一份郡级档案。《神乌傅(赋)》的发现,把俗赋这一民间说唱艺术的历史提前了 200 多年。详见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22) 新蔡葛陵楚简。1994 年,河南新蔡葛陵村平夜君成墓出土楚简,共计 1 500 余枚,内容有卜筮、祭祷、记录和遣策,简文以事纪年,祭祷的对象有楚文王、平王、昭王、简王和子西等,从而考证出墓葬年代大约为战国中期,即公元前 340 年左右的楚宣王时期。这批竹简数量较多,内容丰富,对战国楚国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详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发掘》(《文物》2002 年第 8 期)。

(23)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1996 年,湖南长沙走马楼发现数量达 10 万余枚三国吴简,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券书、官府文书、户籍、名刺及账籍五类。有助于重新审视三国时期的历史。详见胡平生等《长沙走马楼简牍概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 年第 3 期),长沙市文物工作队等《长沙走马楼 J22 发掘简报》(《文物》1999 年第 5 期),王素等《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 年第 5 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等。

(24)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1995 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市场购得 1 200 余枚战国竹简,内容涉及《易经》、《诗论》、《缁衣》、《子羔》、《孔子闲居》、《彭祖》、《乐

礼》、《曾子》、《武王践阼》、《赋》、《子路》、《恒先》、《曹沫之陈》、《夫子答史留问》、《四帝二王》、《曾子立孝》、《颜渊》、《乐书》、《鲁邦大旱》、《卜书》等80余种先秦古籍，这些都是秦始皇焚书之前的第一手战国古籍，其中少数有传本，但大多已失传，即使是有传本的，也与出土本差异较大。可参见《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12年版）。

（25）虎溪山汉简。1999年，湖南沅陵虎溪山一座西汉沅陵侯吴阳墓葬中出土千余枚竹简，内容分为《黄簿》、《美食方》、《日书》三类。其中《黄簿》记载了沅陵侯国至长安和长沙国的水陆距离，描述了侯国的人口、乡邑、田土、赋税、畜力、船只、兵甲、对老人和残疾人的赋税减免情况。《美食方》记载了加工各种食物的选料和加工方式，填补了中国古籍中关于食物制作流程记载的空白。《日书》有许多关于秦汉时期历史人物以及事件的记载。这批竹简有极重要史料价值。详见郭伟民《虎溪山一号汉墓葬制及出土竹简的初步研究》（载《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二）20世纪后半期的简帛研究与历史研究

自20世纪初简帛出土和陆续整理之后，学者们就开始了对这些简帛进行学术研究。1914年2月，王国维与罗振玉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公开出版，这是中国最早研究简帛的著作之一，也是世界上较早将简帛资料用于历史研究并取得重要成就的著作。此后，王国维又发表一系列研究汉代历史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便是将传世文献与出土简帛资料紧密结合，实际上已经是他后来明确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从此，对出土简帛本身的研究和利用简帛资料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论著不断问世，构成20世纪简帛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综合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论著主要有：饶宗颐《长沙出土战国楚简初释》（1954年油印本）、《战国楚简笺证》（上海出版社1957年版）、《长沙出土战国增书新释》（香港义友昌记印务公司1958年版），史树青《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劳干《居延汉简考释·图版之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7年版）、《劳干学术论文集甲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年版），严一萍《帛书竹简》（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年版），高敏《云梦秦简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马先醒《居延汉简新编》（台北简牍学社1981年版），陈直《摹庐丛著七种》（齐鲁书社1981年版），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饶宗颐等《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2 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甘肃省文物考古队等《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林梅村等《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林剑鸣《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饶宗颐等《楚帛书》(香港中华书局 1985 年版),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 1985 年版),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薛英群等《居延新简粹释》(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郑有国《中国简牍学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傅举有等《马王堆汉墓文物》(湖南出版社 1992 年版),饶宗颐等《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 1993 年版),侯灿等《楼兰简纸文书集成(1—3 册)》(天地出版社 1999 年版),骈宇骞《本世纪以来出土简帛概述》(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 1999 年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九店楚简》(中华书局 2000 年版),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等等。

陈梦家在 1980 年出版《汉简缀述》一书(中华书局),主要结合考古学的方法,对汉代边境防御及烽燧制度、官吏俸禄等问题进行了疏证与考实,涉及汉代的职官、吏俸、量制、烽燧、地理、年历、简册制度等许多方面。在汉历研究方面,他以居延汉简为主,并以汉代的金石刻辞等为佐证,对汉简的年历、记时、占时测时的仪具等诸多问题作了探讨。此外,他对玉门关址和河西四郡设置年代的考订,也极具参考价值。

陈直的《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等书,利用居延、敦煌木简等资料与传世史籍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了以往单纯以文献证文献所无法比拟的成就。他撰写的《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一书,包括《居延汉简综论》、《居延汉简解要》、《居延汉简释文校定》、《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定》、《居延汉简系年》等五个部分,对汉代的诏书、簿检、符传和券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与考证,是一部研究居延汉简的力作。

中华书局编辑的《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 1981 年版)论文集,收录了于豪

亮《秦简中的奴隶》、《秦简〈日书〉记时记月诸问题》,李学勤《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秦简的古文字学考察》,裘锡圭《啬夫初探》,高敏《秦汉时期的亭》等众多学者的秦简研究论文18篇,涉及秦代的政治、经济、法律、语言文字等许多方面,是全面深入研究云梦秦简的第一部论文集。书后还附有云梦秦简资料和论著目录。

黄文弼的《罗布淖尔汉简考释》一文(《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采用逐简释文与随附考证相结合的方式,对罗布淖尔汉简作了考释。针对汉朝在西域的职官、邮传、仓储等项制度以及往来交通、屯戍给养、地理、历日、器物、古籍残片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澄清了一些相沿已久的误说。

饶宗颐等《敦煌汉简编年考证》及《新莽简辑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版),前者属于补充《资治通鉴》的史料;后者除释文部分外,还有考证之部,对汉简中涉及王莽时期的历史作了详细考证,是一部资料与研究并重的著作。

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是一部关于尹湾汉墓研究的论文集,其中收录论文近30篇,着力于对尹湾汉墓发掘的简牍内容进行综合性研究,其中包括对简牍所见上计、行政建制、官吏除迁、盐铁生产、兵器管理及汉赋等方面的论证考述,涉及简牍的发掘、保护、整理和考释等工作,从多角度、多层面对这批珍贵文物进行了论述,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

李均明等《简牍文书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对简牍文书的质材和文字、符号和版面、文体和分类等方面均作出较详尽的考述,着重对书檄、簿籍、律令、案录、符券和检楬等六类文书中的具体文种进行举例说明,揭示文书行政的内在联系,系统全面地阐述了简牍文书的一般规律,是研究简牍的基础著作。

2. 专题研究

(1) 政治制度史研究

这方面论著较多,如: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傅荣珂《睡虎地秦简刑律研究》(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高恒《秦汉法制论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于振波《秦汉法律与社会》(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专题研究了秦汉法律制度等。

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公司1998年版)、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专题研究了汉代官文书制度等。

(2) 经济史研究

蔡万进《秦国粮食经济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是利用云梦睡虎地秦简资料研究战国至秦始皇时期秦国经济史的力著。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是三国时期吴国经济史研究的力著。

(3) 社会史研究

马先醒《汉简与汉代城市》(台北简牍学社 1976 年版)、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台北食货出版社 1977 年版),都是利用汉简研究汉代社会史的力著。

(4) 文化思想史研究

王关仕《仪礼汉简本考证》(台湾学生书局 1975 年版),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 1980 年版)、《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 2000 年版),胡平生等《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魏启鹏《马王堆帛书〈德行〉校释》(巴蜀书社 1991 年版),赵平安《隶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994 年版),高大伦《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巴蜀书社 1995 年版),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 1996 年版),邢文《帛书周易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丁原植《郭店竹简〈老子〉释析与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 1998 年版),戴维《帛书老子校释》(岳麓书社 1998 年版),崔仁义《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侯才《郭店楚墓竹简〈老子〉校读》(大连出版社 1999 年版),魏启鹏《楚简〈老子〉柬释》(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 1999 年版),刘信芳《郭店楚简〈老子〉训诂》(台北艺文印书馆 1999 年版),王贵元《马土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张光裕主编《郭店楚简研究·文字编》(台北艺文印书馆 1999 年版),陈伟武《简帛兵学文献探论》(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 2000 年版),魏德胜《〈睡虎地秦墓竹简〉语法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李零《〈孙子〉古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第 2 版),邹安华《楚简与帛书老子》(民族出版社 2000 年版),尹振环《帛书老子与老子术》(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彭浩《郭店楚简老子校读》(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张守中等《郭店楚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 2000 年版),赵建伟《出土简帛〈周易〉疏证》(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 2000 年版),魏启鹏《简帛〈五行〉笺释》

(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丁原植《郭店楚简儒家佚籍四种释析》(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岳麓书社2000年版),李学勤《拥彗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胡平生《胡平生简牍文物论集》(台北兰台出版社2000年版)等,都是研究力著。

(5) 科技史研究

如周一谋等《马王堆医书考注》(天津科技出版社1988年版),魏启鹏等《马王堆医书校释》一、二(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马继兴《马王堆古医书考释》(湖南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高大伦《张家山汉简〈脉书〉校释》(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张显成《马王堆汉墓帛书房事养生典籍》(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韩健平《马王堆古脉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显成《简帛药名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先秦两汉医学用语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版),张寿仁《医简论集》(台北兰台出版社2000年版)等,都是研究力著。

3. 20世纪后半期简帛研究的不足

(1) 简帛考古资料公开的滞后性

由于种种原因,简帛出土后整理工作相对滞后,导致简帛考古材料的公布并不及时,也有的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考古资料的垄断现象,从而造成学术界无法迅速有效地利用这些史料。这就需要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共同合作,需要建立健全简帛整理、管理与研究的体制,保护考古工作者的正当权益,加快简帛资料的公布进程,促进简帛研究健康迅速发展。

(2) 简帛研究的基础工作还很薄弱

简帛研究的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发掘报告的撰写、简帛文字的辨识、残短简帛的拼接与修复、简帛内容的考证与资料索引等方面。这些工作虽然琐碎并具有一定难度,但却是简帛研究的重要基础。如果基础不扎实,简帛研究也会随之发生偏失。只有翔实而准确的发掘报告,才有助于简帛的综合研究。这需要考古工作者与学者加强基本功学习与磨练,切忌浮躁。

(3) 简帛目录学著作、理论著作以及工具书的匮乏

通过检阅文献目录,可以了解学术界的研究近况,并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简帛研究也是如此,了解学术界关于简帛研究的成果与问题,使自己站在前人奠定的坚实基础上,明辨简帛研究存在哪些成就和不足,分析简帛研究存在哪些问题和疏误,从而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这就需要对简帛目录学的研究。在这一方面,中国学

者需要向日本学者学习，日本学者森鹿三早在1957年就出版了《简牍研究文献目录》，而中国直到1982年才出版了《简牍资料论著目录》，这是令国人汗颜的事情。

简帛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同样需要理论和方法论指导。目前学术界关于简帛的理论性著作还很少。简帛研究方法已有考古学研究法、历史学研究法、古文书研究法等方法，但从已出版的论著看，这些方法还有待进一步圆融与贯通、创新与突破。

简帛学专业工具书的编纂，相对来说还是太少，仅王梦鸥《汉简文字类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和李正光《楚汉简帛书典》（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等很少几种，需要大力加强。

十一、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①

（一）敦煌文献的整理和出版

“敦煌文献”，广义的是指在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所有写本和印本文献；狭义的是专指1900年以后从藏经洞（17号窟）散出的文献。②它的发现，和河南安阳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明清大库档案，并称为20世纪初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考古发现。③敦煌文书发现后，一直没有引起清朝地方当局的重视，结果被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奥登堡等人掠走大部分，劫余部分，后由清政府运归学部，藏京师图书馆。④

敦煌文献的最早整理开始于1909年，伯希和携带部分卷子来到北京，罗振玉、王仁俊、蒋黻、董康、曹元忠、叶恭绰等前往参观，并拍照、抄录经卷。根据这些卷子，1909年9月，王仁俊刊行《敦煌石室真迹录》上下两册。同年11月，罗振玉、蒋黻出版《敦煌石室遗书》。此后，更大规模的敦煌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出版此伏彼起，20世纪上半叶，敦煌学已成热门学科，蔚为大观。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敦煌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出版继续着，如1950年王重民出版《敦煌曲子词集》（商务印书馆），1954年周绍良出版《敦煌变文汇录》（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初版、1955年增定再版），1955年任二北出

---

① 本节主要参考了：郝春文《20世纪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李锦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

② 府宪展：《敦煌文献辨疑录》，《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

③ 杨秀清：《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图书与情报》2006年第3期。

④ 吴光正等：《1949年前敦煌文献的收集著录和整理》，《学术交流》2005年第1期。

版《敦煌曲校录》(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姜亮夫出版《瀛涯敦煌韵辑》(上海出版公司),1956年饶宗颐出版《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东南书局),1957年王重民、向达等出版《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出版《敦煌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71年饶宗颐等在法国出版《敦煌曲》等,都是敦煌专题文献的汇录或校订之作。目录书有,1958年王重民出版《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1962年王重民又与刘铭恕合作出版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①

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因受到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影响,中国大陆敦煌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出版发展不快。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推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实力大大提升,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快速发展,敦煌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出版也飞速发展起来。

1. 对国外敦煌文献的搜集、整理

(1) 对英藏敦煌文献的搜集、整理

英国藏有敦煌文献16 000余号。1957年,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通过交换,得到了英国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汉文文献S.6980号以前部分的缩微胶片。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于次年购得相同内容的编印本(用缩微胶片冲印成册)。20世纪70年代末,巴黎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主体部分的缩微胶卷也先后公布。

1981—1986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了黄永武据英国图书馆、法国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发行的缩微胶卷编纂而成的《敦煌宝藏》140册。同时出版了黄永武主编的《敦煌遗书最新目录》。②

1987年8月,中国学者与英方合作拍摄、整理、研究、出版《英藏敦煌文献》的国际合作项目启动。1995年5月,大型图集《英藏敦煌文献》的14卷图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齐。被认为是反映英藏敦煌文献最清晰、最完整、最准确的图版本。2009年,《英藏敦煌文献》第15卷《英藏汉文佛经以外敦煌文献目录索引》,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3年,台北福记文化图书公司出版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敦

---

① 张涌泉:《敦煌文献整理:百年行与思》,《光明日报》2009年3月5日。
② 夏生来:《近二十年来敦煌文献的收藏、整理与刊布》,《敦煌研究》2008年第5期。

煌学研究小组编纂的《伦敦藏敦煌汉文卷子目录提要》。①

1994 年，作为《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之四，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了荣新江编辑的《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因便于使用，出版后很受同行推崇。②

2000 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方广锠编辑的《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S.6981 号—S.8400 号）》。③

（2）对俄藏敦煌文献的整理

俄藏敦煌文献 19 000 余号（大多为残片）。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俄藏敦煌文献》，经过中俄双方专家和出版工作者十余年的共同努力，全书 17 册于 2004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全部出齐。

（3）对法藏敦煌文献的整理

法藏敦煌文献 7000 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编纂的《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4 册，从 1995—2005 年出齐。

（4）对日藏敦煌文献的整理

日藏敦煌文献 2000 号。在 1982 年，饶宗颐出版了《京都藤井氏有邻馆藏敦煌残卷纪略》（香港中华书局）。1991 年，王三庆出版《日本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典藏之敦煌写本》（汉学研究中心），尚林等 1991 年出版《中国所藏"大谷收集品"概况：特别以敦煌写本为中心》（龙谷大学）。施娉婷相继发表《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遗书叙录》一、二、三（《敦煌研究》1993 年第 2 期、1994 年第 3 期、1995 年第 4 期）。荣新江发表《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吐鲁番敦煌文献纪略》（《文献》1996 年第 2 期）。

2. 对中国国内敦煌文献的搜集、整理

在敦煌遗书入藏之初，京师图书馆即派专人负责，整理编目，约于 1912 年编撰完成《敦煌石室经卷总目》，著录 8679 号敦煌文献。1922 年，陈垣在此基础上主持编撰分类编目《敦煌劫余录》，1931 年 3 月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第四种出版，著录 8653 号。1929 年成立的写经组，负责编撰馆藏敦煌文献目录，至

---

① 此据杨宝玉：《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目录述要》，《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此据杨宝玉：《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目录述要》，《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③ 夏生来：《近二十年来敦煌文献的收藏、整理与刊布》，《敦煌研究》2008 年第 5 期。

1935年完成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及《续编》，但因当时政局动乱，未能及时面世。1981年7月，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组将新字号部分整理编目，完成《敦煌劫余录续编》，著录1065号。1990年，《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编纂工作正式启动，但因资金有限，出版工作迟迟未能跟进。2004年，这一编纂工作正式立项，国家财政部拨款200万元，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也将敦煌遗书作为重点项目，拨款50多万元，全书150册才陆续出版。

1987年，《敦煌研究》第2期刊登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天津文物公司藏敦煌写经》，公布的均为写经。2005年，《敦煌吐鲁番研究》第8期发表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编辑的《天津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

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上海博物馆合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卷)出版。

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2册)。

1999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甘肃藏敦煌文献》6册。

2000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浙藏敦煌文献》。

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献32件，方广锠、徐忆农编辑的《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目录》将其全部著录，但基本都是佛经。此外，旅顺博物馆也藏有敦煌文献9件。

台湾"中央图书馆"也整理出版了《"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全6册)。①

敦煌资料的大量公布，给读者带来了极大便利，直接引领了敦煌文献整理工作的向前推进。一大批分类汇编的敦煌文献专集相继出版，如陈铁凡《敦煌本孝经类纂》，潘重规《敦煌云谣集新书》、《敦煌变文集新书》，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等。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推出《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包括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类书仪辑校》，宁可等《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方广锠《敦煌佛教经录辑校》，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周绍良等《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邓文宽等《敦煌本禅籍录校》，李方《敦煌〈论语集解〉校证》等10种。这套书以收集较全、录校质量较高而受到好评。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同一专题文献有多个整理文本的情况，如王素《唐写本论语

① 郭锋：《敦煌西域出土文献的一个综合统计》，《敦煌学辑刊》1991年第1期。

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和陈金木《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研究——以考据、复原、诠释为中心的考察》(文津出版社 1996 年版),等等。这种情况既反映了敦煌文献整理繁荣的景象,也有因为研究信息闭塞而造成的重复劳动。

(二) 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

敦煌文献所涉及的年代上至十六国,下至宋初,内容更是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艺术、文学等方面,而且其中大部分是佚书,所以对敦煌文献的研究牵涉到各个不同的学科,并形成专门的独立学科——敦煌学。其中,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许多学者利用敦煌文献在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以下略述之。

1. 归义军史的研究

归义军是唐宣宗大中五年(851 年)至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 年)的沙州地方政权武装,由唐朝名将张议潮建立,并推翻了当时吐鲁番贵族对沙州长达 60 年的统治。后因内乱,几经周折,最终被沙州回鹘所取代。这方面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是: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等。

2. 莫高窟史的研究

这方面比较重要的成果有: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及敦煌研究院编著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版)、《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 1986 年版)等工具书。

3. 社会史研究

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杨际平等《5—10 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岳麓书社 1997 年版),赵守俨《唐代婚姻礼俗考略》(中华书局 1998 年版),毛汉光《敦煌唐代氏族谱残卷之商榷》(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9 年版),史苇湘《世族与石窟》(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邓文宽《归义军张氏家族的封爵与郡望》(汉语大辞典出版社 1990 年版)等。

4. 经济史研究

这方面研究主要涉及唐五代的赋役、均田、户籍和财政史等。代表性成果有宋家钰《唐代均田制与户籍法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种植林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年版)、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2001

年版)、马德《敦煌工匠史料》(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陈国灿《唐代的经济社会》(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9 年版)、高启安《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4 年版)等。

5. 历史地理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李正宇《敦煌史地新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6 年版)等。

20 世纪末以来,学术界也开始了对百年敦煌学成就进行总结的工作,如 1998 年,郝春文在《历史研究》第 1 期发表《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一文,对 20 世纪敦煌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全面概述。台湾地区对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做全面概述的,主要有金荣华《台湾地区近四十年来之敦煌文书整理》(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朱凤玉《台湾地区敦煌文学研究之考察与展望》(《敦煌吐鲁番研究》2004 年第 7 期)等。

在取得以上成就的同时,必须看到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第一,虽然敦煌文献已经整理出版了很大一部分,但是仍然还有许多没有整理出版。同时敦煌文献的电子化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要将全部敦煌文献数字化还有一定的距离。

第二,在敦煌文献全部公布以后,迫切需要一个完整的"点校本",以便有利于更多的人来研究。希望完整的"点校本"能够早日问世。

第三,仍应该努力设法收回被劫掠的敦煌文献。

第四,应大力发展敦煌文献的跨学科整理、研究。